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第1卷

定性研究：方法论基础

诺曼·K·邓津
伊冯娜·S·林肯
主编

风笑天 等
译



封面设计/黄河封面工作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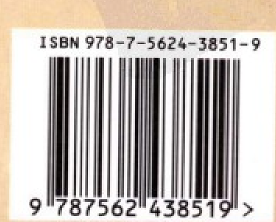
这是一部在社会科学定性研究方法方面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

全书约200万字，对定性研究的近40个专题进行了讨论，其中每一个专题的作者都是该领域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著名学者，其主编诺曼·K·邓津(Norman·K·Denzin)和伊冯娜·S·林肯(Yvonna·S·Lincoln)更是社会科学定性研究方面的国际旗手。即便是这样一个精英的团队，面对这个庞大而意义深远的工程仍然需要艰苦卓绝的工作，正如两位主编在本书的前言中所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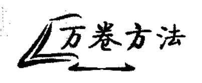
> 在许多情形下，关于谁应该写作某个章节或者某个章节应该如何写，我们常常不情愿地进入了一场政治斗争……
>
> ……为了最后期限和页数的要求，我们和作者们进行着斗争；关于各章节的理论性以及关于那些我们能够明白但其他人却未必明白的内容，我们也和作者们进行着斗争；关于各章节何时完成，我们还得做斗争；而且，当我们要求更多的修改时，我们是在不断地测试着作者们的耐性。

正是这些一流学者的艰苦和“斗争”，才为我们奉献了这样一个定性研究方面的精神盛宴。为了使国内的学者也能享此盛宴，我们组织来自全国知名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二十余位学者历时三年完成了本书中文版本的翻译和出版。考虑到读者阅读的方便，我们在征得原出版公司的同意后，将本书中文版以四卷本的形式出版，分别是：

《定性研究(第1卷)：方法论基础》(原书第1、2部)
《定性研究(第2卷)：策略与艺术》(原书第3部分)
《定性研究(第3卷)：经验资料收集与分析的方法》(原书第4部分)
《定性研究(第4卷)：评估、解释与描述的艺术及定性研究的未来》(原书第5、6部分)



ISBN 978-7-5624-3851-9
9 787562 438519 >
定价：58.00元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第1卷

定性研究：方法论基础

诺曼·K·邓津
伊冯娜·S·林肯
主编

风笑天 赵延东 田 凯
孙 龙 邓 锁 张 莉
张艳霞 唐美玲 周晓春
译

重庆大学出版社

版贸渝核字(2003)第4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定性研究(第Ⅰ卷):方法论基础/(美)邓津(Denzin, N. K.),(美)林肯(Lincoln, Y. S.)主编;风笑天等译.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7.1
(万卷方法)
书名原文: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ISBN 978-7-5624-3851-9

Ⅰ.定…　Ⅱ.①邓…②林…③风…　Ⅲ.定性分析—研究方法　Ⅳ.C3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127749号

定性研究(第Ⅰ卷):方法论基础
诺曼·K·邓津　伊冯娜·S·林肯　主编
风笑天　等译
责任编辑:雷少波　陈　荟　　版式设计:雷少波
责任校对:邹　忌　　责任印制:张　策
*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张鸽盛
社址:重庆市沙坪坝正街174号重庆大学(A区)内
邮编:400030
电话:(023) 65102378　65105781
传真:(023) 65103686　65105565
网址:http://www.cqup.com.cn
邮箱:fxk@cqup.com.cn (市场营销部)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华林天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26　字数:537千　插页:16开2页
2007年1月第1版　2007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 000
ISBN 978-7-5624-3851-9　定价:58.00元

作者简介

H·拉塞尔·伯纳德(H. Russell Bernard)　弗罗里达大学人类学教授
埃本·A·维茨曼(Eben A. Weitzman)　马萨诸塞大学社会与组织心理学副教授
埃斯特·麻德里兹(Esther Madriz)　圣弗罗西斯克大学社会学副教授
安德里亚·方塔纳(Andrea Fontana)　内华达大学社会学教授
巴巴拉·泰德洛克(Barbara Tedlock)　纽约州立大学人类学教授
本杰明 ·F·克莱布特里(Benjamin F. Crabtree)　新泽西药学与牙医大学教授
彼特·麦克拉伦(Peter McLaren)　加利福尼亚大学教育学教授
道哥拉斯·哈珀(Douglas Harper)　杜克大学社会学教授
大卫·西尔弗曼(David Silverman)　伦敦大学教授
戴维·J·格林伍德 (Davydd J. Greenwood)　康奈尔大学人类学教授
迪博拉·K·迪默(Deborah K. Deemer)　北衣奥华大学教育学副教授
厄弗·钱姆伯斯 (Erve Chambers)　马里兰大学人类学教授
弗吉尼亚 ·L ·奥利森(Virginia L. Olesen)　加利福尼亚大学社会学教授
格洛利亚·拉德森—比林斯(Gloria Ladson-Billings)　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课程与教学论教授)
基姆伯利·A·梅斯·德培雷(Kimberly A. Mays de Pérez)　塔帕德医疗翻译师
杰瑞·W·瑞安(Gery W. Ryan)　密苏里—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副教授
卡洛琳·艾利丝(Carolyn Ellis)　南弗罗里达大学传播学和社会学教授
凯西·查马兹(Kathy Charmaz)　索诺马州立大学社会学教授
克里福德·G ·克里斯琴斯(Clifford G. Christians)　伊利诺大学传播学教授
肯尼斯·J·格根(Kenneth J. Gergen)　斯沃斯莫尔学院心理学教授
拉雷尔·里查德森(Laurel Richardson)　俄亥俄州立大学社会学、文化研究、女性研究方面的教授
雷·C·里斯特(Ray C. Rist)　世界银行评估顾问
卢恩曼·王(Loonmun Wong)　服务于非政府组织的社会心理学家

罗宾·麦克塔格特(Robin McTaggart) 詹姆斯库克大学教育学教授
罗伯特·E·斯泰克(Robert E. Stake) 伊利诺大学教育学教授
洛伊丝·韦斯(Lois Weis) 纽约州立大学教育社会学教授
玛莉·M·格根(Mary M. Gergen)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心理学教授
迈克尔·V·安格罗西诺(Michael V. Angrosino) 南弗罗里达大学人类学教授
麦克尔·M·麦考(Michal M. McCall) 马克里斯特学院社会学教授
米甘·莫里斯(Meaghan Morris) 香港岭南大学文化研究首席教授
米歇尔·法恩(Michelle Fine) 纽约城市大学社会/人格心理学教授
默顿·勒温(Morten Levin) 挪威湾大学社会学与政治科学教授
诺曼·K·邓津(Norman K. Denzin) 伊利诺大学传播学教授
乔·L·金奇洛(Joe L. Kincheloe) 宾夕法尼亚大学文化研究与教学教授
乔舒亚·加默森(Joshua Gamson) 耶鲁大学社会学副教授
斯蒂芬·凯米斯(Stephen Kemmis) 巴拉腊特大学教授
斯坦福·M·莱曼(Stanford M. Lyman) 罗里达亚特兰大大学社会科学教授
苏珊·维辛(Susan Weseen) 社会人格心理学方面的博士研究生
托玛斯·A·施瓦特(Thomas A. Schwandt) 伊利诺大学教育心理学教授
瓦莱丽·J·简西克(Valerie J. Janesick) 罗斯福大学教育领导与组织变革教授
威廉姆·L·米勒(William L. Miller) 宾夕法尼亚某医院家庭医学部主席
威廉姆·G·蒂尔尼(William G. Tierney) 南加利福尼亚大学高等教育学教授
雅伯·F·古布里厄姆(Jaber F. Gubrium) 弗罗里达大学社会学教授
亚瑟·P·博克纳(Arthur P. Bochner) 南弗罗里达大学传播学教授
亚瑟·J·维迪奇(Arthur J. Vidich) 社会学与人类学荣誉教授
伊恩·霍德(Ian Hodder) 斯坦福大学文化与社会人类学教授
伊冯娜·S·林肯(Yvonna S. Lincoln) 德克萨斯A & M大学高等教育学教授
伊贡·G·古巴(Egon G. Guba) 印第安娜大学教育学教授
伊万·布莱迪(Ivan Brady) 纽约州立大学人类学教授
约翰·K·史密斯(John K. Smith) 北罗万大学教育学教授
约翰·弗劳(John Frow) 爱丁堡大学英语文学教授
约翰·贝弗利(John Beverley) 匹兹堡大学西班牙与拉美文学与文化研究教授
詹姆斯·H·弗里(James H. Frey) 内华达大学社会学教授
詹姆斯·A·霍尔斯泰因(James A. Holstein) 马凯特大学社会学教授
珍妮弗·C·格林尼(Jennifer C. Greene) 伊利诺大学教育与社会项目评估教授
朱莉安娜·奇克(Julianne Cheek) 南澳大利亚大学健康学教授

译者简介

风笑天　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易松国　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博士，深圳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系主任
赵延东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博士，科技部科学促进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田　凯　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
郝玉章　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乐　章　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社会保障研究所副教授
孙　龙　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讲师
邓　锁　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中国社会工作协会研究人员
唐利平　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苏州科技学院社会学系讲师
徐连明　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讲师
唐美玲　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厦门大学社会学系讲师
聂春雷　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东南大学社会学系讲师
龙书琴　华中理工大学社会学硕士，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
黄　河　华中理工大学社会学硕士，英国肯特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讲师
张艳霞　南开大学社会学硕士，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讲师
陈　璇　华中理工大学社会学硕士，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讲师
习　涓　华中理工大学社会学硕士，美国阿拉巴玛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
张　莉　华中理工大学社会学硕士，美国德克萨斯 A & M 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
王晓辉　华中理工大学社会学硕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博士生，讲师
苏莹荣　华中理工大学社会学硕士，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培训司干部
周晓春　华中理工大学社会学硕士，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社会工作系讲师
罗凌云　华中理工大学社会学硕士，四川师范大学政治系讲师

译者前言

经过二十多人将近三年紧张的翻译工作，这本在国际社会科学界享有盛誉的著作终于要以中文的形式出版了。在译稿即将付梓之际，心中充满了感慨。

2000年8月，我在美国杜克大学做访问学者期间，参加了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召开的"美国社会学协会（ASA）第95届学术年会"。每年年会中的一项常规活动是各家出版社都将自己出版的社会学方面的新书拿到会场上来展览销售。那真是一些好书啊！在书展期间，我很快发现了这本刚刚修订出版的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这部有着蓝色硬皮封面、大开本、厚达一千多页的、重重的"砖头式"著作，深深地吸引了我。虽没有购买，但心中却留下了印象深刻的一笔。

时间真快，转眼两年半过去了。当重庆大学出版社的编辑同志拿着一堆英文方法著作请我帮他们筛选时，我首先推荐了这本书。其原因除了这本书的影响大以外，更主要的一点是考虑到我国学术界的实际需要。国外社会研究方法的著作已有一些先后译成了中文，但专门介绍定性研究方法的著作则基本没有中文译本，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陷和遗憾。

但当出版社邀请我主持这本著作的翻译工作时，我的确十分犹豫。一方面，定性研究方法对于我（以及所有译者）来说相对生疏，翻译的难度相对较大。另一方面，此书的篇幅巨大，非一两个人在有限的时间内所能完成，必须组织起一个较大规模的团队来承担。更重要的是，我自己手头不仅压着几本早就该写的书，同时还承担有几项科研课题，再加上平时的教学和指导研究生工作，实在担心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来承担这一工作。后来，当出版社的编辑两次专程到南京拜访，我最终还是无法推托出版社的真诚邀请，接受了这份"苦差"，为此，我又付出了整整两年半的紧张生活。

实事求是地说，翻译工作既非我们的专业，也不是我们的长项。特别是从经济的观点来看这更是一件极不划算的事情——一千字的译稿通常要花费译者大半天甚至一整天的时间和精力，而区区几十元钱的翻译稿酬是无法用来衡量这种翻译工作的艰苦和价值的。细想起来，当初之所以承担此项苦差，一是出版社的盛情之邀难以推托，二是心中长期以来形成的那种为中国社会学的发展，特别是为国内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提高作点贡献的情感使然。

在这本著作即将出版之际，我首先要感谢参加本书翻译工作的我的学生们。他们

有的获得社会学博士、硕士学位后已参加工作好几年,自身承担有繁重的教学、科研任务;有的在撰写自己的著作和论文;有的正在美国、香港的大学以及国内的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紧张地攻读博士学位,特别是有的正在撰写自己的博士论文或为博士生入学考试而紧张地做着准备。但当我邀请他们参加翻译此书时,他们都毫不犹豫地给予了积极的支持,并且全身心地投入到翻译工作中来。他们中没有一个人问过报酬,有的只是不计得失,认真尽力地查找资料,斟字酌句地翻译每一段话。没有他们的努力和合作,此书是难以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在此,请允许我真诚地向他们道一句:大家辛苦了!谢谢大家!

在翻译过程中,我们深感这本著作翻译的困难。虽然译者们的英文水平可以阅读英文书籍和资料,但自己看明白和将它用准确、恰当,甚至地道的中文表达出来却并不是同一件事情,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此我们深感翻译工作的责任重大,非常认真地对待。在翻译过程中,当听到学生们一个个叫苦不迭、一个个被翻译工作压得抬不起头来的时候,我心中反倒充满了踏实感——只有认真的、一丝不苟的对待翻译工作、对译文反复推敲、不轻易放过一处疑问的工作态度和精益求精的精神,才会使翻译者有这样一种感受,才会有这样一种工作状态。

关于书名的翻译,需要略作说明。之所以用"定性研究"的概念,而不用诸如"质的研究"、"质性研究"、"质化研究"等概念,主要考虑的是国内社会科学界的习惯和误解。与有的学者采用换一个名称的方式所不同的是,我们依旧使用定性研究这一名称,其目的就是为了直接说明,定性研究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方法;就是为了纠正目前存在的对定性研究方法认识上的偏误;就是为了明确地告诉读者,定性研究也是一种类似于定量研究那样的,有特定的哲学基础、特定的视角和策略、特定的操作方法和技术的具体研究方式,而不是像许多人长期以来所认为的那样,只是一种"非定量"意义上的泛泛而论或纯粹的主观思考(那种泛泛而论和主观思考或许只能称为议论、只能称为思考,而不能称作研究)。简言之,定性研究也有着一整套相对成形的、具体的方式方法,当然,其方式方法与定量研究的方式方法之间有着较大的不同。

各部分的译者是:第1章,风笑天;第Ⅰ部分序言、第2章,田凯;第3章、第14章,周晓春;第4章、第9章、第33章,邓锁;第5章、第23章,张艳霞;第Ⅱ部分序言、第6章、第7章,赵延东;第8章、第Ⅲ部分序言、第Ⅴ部分序言,唐美玲;第10章、第11章,孙龙;第12章、第21章,张莉;作者前言、第13章、第19章、第20章、第36章,陈璇;第15章、第17章,王晓辉;第16章、第24章,郝玉章;第18章、第34章、第40章,易松国;第22章、第Ⅳ部分序言,唐利平;第25章,黄河;第26章、第29章、第30章,龙书琴;第27章、第28章,聂春雷;第31章、第32章,罗凌云;第35章,乐章;第37章,习涓、徐连明;第38章、第39章、第Ⅵ部分序言,苏莹荣;第41章,徐连明。各章译者翻译完后,由风笑天与陈璇进行了校订。

由于译者的学识水平所限,译文中肯定会存在一些误译和错译的地方,欢迎各位专家和读者随时批评指正,以便重印时及时校正。

风笑天

2006年12月于南京

作者前言

本书第2版几乎是一本新书,第1版中的多半章节都由新的著述所替换。本版新增了33位各章节的作者(含合著者),新增了6个全新的主题内容,包括酷儿理论、表演民族志、证词法、女性研究中的焦点群体、应用民族志、人类学诗歌等。在第2版中保留下来的章节都作了大量的修改,有的甚至完全改头换面。

第2版是第1版的继续。在第1版的前言中,我们曾断言,过去的20年在社会科学领域悄然进行了一场方法革命,学科间的界线正在模糊化。在理论与研究中对诠释性定性方法的共同关注使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之间越来越靠近。我们认为,尽管这些趋势并非什么新趋势,但是社会科学及相关专业领域所发生的"定性革命"影响范围之广还是非常令人惊奇。人们对于第1版强烈、积极的反馈也肯定了我们的断言。对于第1版如此受欢迎我们也感到诧异。研究与教学人员都可从该版本中找到进行教学与开展新研究所需的有用资料。

本书在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领域的三大读者群依然是:想学习如何做定性研究的研究生,希望对本领域有更多了解的有兴趣的教学人员,那些已经是本书所讨论的某个领域或几个领域的专家但是仍然希望了解该领域最新发展的学者。我们未敢设想本书有一个很大的读者群,也不敢想象本书会成为本科生、研究生的研究方法课程的课本,但它确实做到了。1998年,在第1版的基础上,我们设计了三册平装本的课本,即《定性研究方法导论》、《定性研究策略》和《定性资料的诠释》。

正如托马斯·施瓦特所言(见本书第7章),我们可能发现定性研究即是"开始于1970年代的学术界的改革运动"的别名。在这场运动中,诠释范式和批判范式以其多种不同形式成为讨论的核心。托马斯·施瓦特认为实际上这场运动包含了多重范式的理论,还包含了对传统社会科学研究的复杂的认识论与伦理的批判。现在该运动已经有了自己的期刊、科学协会、学术会议和大学教学岗位等。

发生于1990年代早期的定性研究领域的转型在随后这十年中继续不断地获得动力。到了20世纪末,现在几乎没有人带着怀疑的目光去回顾这次叙述性转型。现在我们进而知道男人和女人对文化的写作是不同的,而且写作本身并非一个简单的实践活动。

用实验法写作第一人称民族志文本现在已非常普遍。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继续在探索民族志写作的新方法,其中许多人在写作小说、戏剧、表演文本,以及民族志诗歌等。社会科学的期刊在主持着关于虚构文本的辩论。公民新闻学正在塑造、在呼吁一种公民的或曰公众的民族志。

目前迫切需要知道的是定性研究实践如何能够帮助这个世界朝着积极的方向改变。所以,值此21世纪来临之际,非常有必要对作为生产性调查形式(Peshkin,1993)和作为激进的民主实践形式的定性研究的理论前提进行再一次地探讨。本书第2版的这一纲要就是要展示定性研究的话语如何能够被用来帮助创造、想象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书中的每一章都以某种形式支持这一课题。

出版商告诉我们,理想的手册应该代表某一领域知识的浓缩;它应该成为一本综合现存文献的标志性的书卷,有助于界定和塑造该学科的现状与未来。正是这一训令指导了本书第1版的组稿。打个比方,如果你要带一本定性研究方面的书去一个荒岛(或者准备一次研究生的综合考试),那么你需要的就是一本手册。1996年的春夏我们再一次回到这一训令之下,问自己如何能够最好地展现本领域自1994年以来所产生的新成果。

定性研究的"领域"

本书封面设计(指英文原版)的布兰克林大桥图片别有蕴涵。就像这座复杂的建筑一样,本书在新与旧之间架起了桥梁。它连接了多种诠释群体,延伸到不同的领地,提供了一条在公与私、科学与神圣、学科研究与艺术表达之间自由进退的通道。

无须花费太多时间我们就能发现,定性研究"领域"自1991年春以来已经经历了大幅度的跳跃,当时我们正开始计划本书的第1版。我们再一次地了解到定性研究领域主要是通过一系列根本性的紧张、矛盾和犹豫徘徊来加以界定。这些紧张(许多都是1991年以后出现的)在本领域相互竞争的定义与概念之间纵横捭阖。

这些紧张并非存在于一个统一的舞台之上。我们发现护理与传播学方面的定性研究者所关注的问题和文化人类学研究者的关注存在着根本的差异。象征互动主义社会学家所处理的问题与教育研究中批判理论家的兴趣也迥然不同。而且,定性研究者的学科网络未必相互连接,他们未必相互对话、相互阅读。

那么面对这些根本性的范式差异,不同风格、类型研究的内在矛盾,以及跨越不同学科、民族、种族、文化和性别所造成的障碍,我们再一次试图将定性研究领域凝聚、诠释、组织起来。在导语和结论章节,我们对这些张力如何自我解决提出了自己的界定。各章节作者中很多人对于这一领域的看法与我们的大不相同,这一点在我们与许多作者的隐含对话中表现明显。为了读者能理解为什么我们以那种方式来处理这些困境,那么首先我们必须将自己置于这些张力与矛盾之中。

诺曼·邓津负责的是文化研究、表演文本、后现代、后结构主义部分,强调社会文本及其建构的重要性。伊冯娜·林肯宣称是建构主义者,她极为注重的是理论和范式的形成。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即实证主义及其后继者后实证主义有其局限性。林

肯给本课题带来的学科有教育学、心理学和历史学，而邓津的基地是社会学、传播学、人类学和人文学科。这些倾向塑造了本书的结构，让我们直接进入彼此的对话。尽管我们并非总是意见一致（例如，关于各范式是否可以相互沟通、整合的问题），但我们俩的声音在本书中都常常可以听到。其他的编者也纷纷从不同的视野，用不同的方法界定这一领域、建构本书。他们为每一主题选择不同的代言人，关注不同的问题，强调不同的方法，或者干脆组织完全不同的内容。

本书的组织结构

本书的组织是从一般到具体，从过去到现在。第Ⅰ部分是对本领域的定位，从历史开始，然后转到应用定性研究传统，探讨实地研究的他者、政治与伦理。第Ⅱ部分专门讨论现在正建构并影响着人类各学科之定性研究的我们所认为的历史与当代的主要范式。其相关章节包含从相互竞争的各范式（实证主义、后实证主义、建构主义、批判理论）的论述到具体诠释性的视角。第Ⅲ部分专门讨论研究者可以用于具体研究的主要研究策略（历史地讲是研究方法）。方法问题以定性研究课题的设计为起点。而这种设计又总是开始于一个社会情境中的研究者，他的探索从研究的问题到范式（视角）再到经验的世界。如此定位之后，研究者然后才提出在任何研究中都能运用的方法的范围。第Ⅲ部分的 11 章广泛探讨了这些研究策略的历史与应用。

第Ⅳ部分检视了收集与分析经验材料的方法。它探讨的内容从访谈到观察，到运用文化物质文献和历史记录，到视觉的、个人的经历，再到数据资料管理、计算机应用、叙述、内容分析和语义分析等分析方法。第Ⅴ部分探讨的是解释的艺术，包括定性资料之适合性的判断标准、诠释的过程、写作文本，以及定性政策研究与评估等。第Ⅵ部分着重论述定性研究的未来与前景。

修订版的准备工作

1996 年春在多伦多举行的一次全天的会议上开始了关于修订版的慎重讨论。作者中有两人，彼特·拉贝拉（Peter Labella）和米奇·艾伦（Mitch Allen），参加了与来自 Sage 和 AltaMira 出版社的编辑的会谈。我们冗长的讨论再一次清楚地表明我们需要从外部注入不同于我们自己的新的视角。为了完成这一目标，我们聚集了在国际上和跨学科领域享有盛誉的学者组成编委会，这有助于我们挑选同样著名的作者、准备全书的内容，以及阅读每一章的草稿（通常有多个草稿）。我们将编委会各成员视为一扇通往他们各自领域的窗口。我们就那些需要探讨的关键主题、视角和歧见搜索相关信息。在彼特·拉贝拉的帮助下，我们还回顾了来自选用本书第 1 版作为教材者的调查反馈。我们寻求发现他们认为本书最大的价值在哪里。在选择编委会成员和各章节作者时，我们试图跨越学科、性别、种族、范式和民族的界限。我们希望借助他们的视野来实现我们自己学科盲点的最小化。

我们从编委会那里获得了全面的反馈，包括对于新章节以及每一章中不同倾向的

建议,还有对于不同章节之作者的建议等。本书的每一作者(他们各自的研究领域都获得了国际承认)都被要求探讨以下这些问题,例如历史、认识论、本体论、试验文本、关键分歧、竞争性范式以及对未来的预测等。

对批评家的反应

我们非常感谢来自实地的对本书第1版的巨大反响,特别是成百上千来自世界各地将本书(以某种形式)选作学生必读书目的教授们的反馈①。我们也感谢对本书的批判性反应。本书有助于开启一块长期被遗忘的对话的空间。许多读者将我们的方法用于实地时发现了问题,这些问题指出了更多需要对话的地方。

对于第1版的批判包括以下这些:框架不够张扬、对于芝加哥学派关注不够、太注重后现代时期、有一个过于武断的历史模型、选择性太强、过分强调第五阶段和代表性危机、太重视政治正确而对知识本身重视不够、对如何去做的相关论述不够。有些人觉得并没有发生一场革命,他们也感到很疑惑:既然已经发生了叙述的转型,那么我们如何对定性研究进行评价呢?

我们不可能为本书第1版和第2版中总共八十多位各章节的作者进行辩护。每个作者在这些问题上都采取了某个立场。作为编者,我们试图展现多种相互竞争的意识形态和参考文献框架。本书既不是,也不试图成为邓津和林肯观点的传声筒。我们并不是在说,做研究只有唯一一种方法,也不是说我们的方法就是最好的,或者说所谓的旧方法就是坏的。我们只是在讲,这是将这一领域理论化的方法之一,而且我们发现这种方法很有用。

当然,这本书也并不简单。它超越了各部分之和,而且每一章节内部及各章节之间都存在巨大的多样性。我们希望读者在这些空间之中发现对他们有用的东西。我们渴望在这些空间之中产生新的对话。这将是一种温和的、探索性的、邻里式的且具有批判性的对话。这种对话将在构成今天所谓定性研究领域的众多各不相同的诠释性群体之间架起一座桥梁。

界定本领域

这些诠释性群体是由散布世界各地的人们所组成。他们在尝试运用定性的、诠释性的方法帮助他们(以及其他人)理解那些用以界定世纪之初日常生活之令人生畏的背景②。这些人应用建构主义、批判理论、女性主义理论、酷儿理论、批判种族理论以及文化研究等模式进行诠释。他们运用了本书第Ⅲ部分所讨论的所有研究策略(个案研究、民族志、现象学、扎根理论、自传法、历史法、参与法以及临床法等)。作为诠释性研究者,这个群体的成员精于使用本书第Ⅳ部分所讨论的所有经验资料收集与分

① 我们感谢伊萨穆·以托(Isamu Ito)教授对本部分的建议,感谢彼特·拉贝拉做出的评论。

② 这一部延伸了邓津和林肯(Denzin & Lincoln,1995)的观点。

析的方法。而且,作为本书章节的作者和诠释者,这些人在评价他们的文章时运用了实证主义、后实证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标准①。

这些学者构成了松散定义的国际诠释研究群体。对于什么是"好的"、"坏的"、淡然无味的、解放性的还是有问题的分析与诠释,他们逐渐达成了一致的看法。他们不断地挑战"真实"与建构之间的界线;他们认识到所有的事件和理解都可以调节,都可以通过人际互动和物质材料的实践,通过本领域的话语、对话、写作、叙述、科学论文、现实主义、后现实主义和表演故事等变为真实。

这个群体在正在浮现的跨学科态势的中心与边缘都能起作用,而这一态势跨越了原来各自独立的一些学科之间的界线,如传播学、种族、民族、宗教与妇女研究、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文学批评、政治科学、经济学、社会工作、健康护理,以及教育学等。这一点鲜明地表现为其整体状况上的悄然变迁,表现为跨国的、跨学科的对话,表现为实践与习惯上倾向实用的变化。

正是在这个关节点上(实用主义与后实证主义的十字路口)一场革命悄然发生。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实用主义本身是一种理论与哲学的关注,它牢牢地扎根于现实主义传统。因而,它是一种理论立场,它认为实践与方法优先于反思与有意识行动。事实上,后现代主义本身并没有预设话语对观察的优先权。与之相反,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只是让我们对待话语要像对待观察(或者其他实地方法)一样严肃,让我们认识到话语是让我们与那些未亲临实地的人分享我们的观察的路径。

正是这种焦虑帮助我们认识话语的潜在力量,该力量现在将我们留在了后现代主义的门槛边,向我们暗示着与我们息息相关的问题的来临。事实上,当代定性的、诠释性研究存在于相互竞争的话语场域之中。本领域目前的历史分六个阶段再加一个第七阶段——未来。这些阶段在相互循环、相互竞争、相互界定。在同一时间,话语向着不同的方向发展。其效果就是,既为定性研究方法同时创造新空间、新机会和新局势,又将其他的方法搁置一旁。

有些人会将后现代、后结构主义版本的定性研究边缘化和政治化,将其等同于激进的相对主义、自我叙事和摇椅上的评论。有些人批评本书对于亲历亲为的实地法没有给予足够的尊重,对于那些告诉我们如何研究"真实的"世界的文本也没有给予足够的尊重。还有一些人想为本课题寻找一种有倾向性的、正统的,却机敏灵活的版本,他们回归到芝加哥学派,或回归到当前正式的、分析性的、现实主义的版本。有些人会从目前局势的内部进行批判,认为话语对观察的优先并未产生评价诠释性研究的合适标准。当只剩下声音与诠释之时,他们疑惑的是以后怎么办。许多人还要求一个规范的框架评价他们的研究。然而,所有这些愿望短期内都不可能实现。竞争、矛盾以及哲学上的紧张使得在这些问题上业已取得的共识显得不甚突出。

在这里,我们不是在做详细的历史比较,尽管每一章节都包含了描述历史的内容。我们所有作者的目的都是指向未来,指向十年以后定性研究方法领域的态势。当然,

---

① 这些标准包括从后实证主义的(信度与效度的变异,如信用与信任)到后结构主义的,女性主义的立场注重强调合著的、唤起式表演文本,这些文本在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创造了伦理上负责任的关系。

这一领域的许多研究还是在早期历史阶段所界定的框架之下进行。它也应该如此。做诠释性的定性研究并非只有某一种方法。我们这些诠释性研究者都是在比照着过去进行着现在的研究并探索着走向未来。

定性研究方法的一些竞争性定义

定性研究课题的开放性特征导致了人们永远抵制任何企图给该课题强加某个唯一的、像伞一样笼罩性的范式的做法。诠释性的课题有多种,包括表演民族志,立场认识论,批判种族理论,女性主义民族志,与英国文化研究和法兰克福学派相联系的课题,几种不同的扎根理论,民族方法论的多个分支,预言性的、后现代以及新实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美国为基础的批判文化研究模式,国际文化研究课题,等等。

这些定性研究课题中的每一种一般都同时沿着四个方向发展:①"在诠释理论中迂回徘徊";②对代表政治的分析和对文学、文化形式的文本分析,包括其生产、分配与消费;③日常生活中这些形式的民族志研究、定性研究;④对介入课堂与地方社区批判文化研究的新的教育与诠释性实践的调查。

谁的革命

总之,一个统一的但由几个部分组成的论点组织了对本书中今日之定性研究方法论状况的讨论。首先,这个课题发生了变化,因为定性研究所面对的世界已经发生了变化。它变化了,也因为各地的诠释性研究者正在变得越来越复杂(不管是理论上还是方法上)。分裂与差异界定着全球文化经济。这是一个后殖民的世界。在研究中有必要超越国家或当地群体来进行思考。

其次,现在是这样一个世界,民族志文本就像其他商品一样在电子化世界经济中流通。民族志可能是后现代世界中主要话语形式之一,但是,即使如此,我们依然不能理所当然地了解对于不同的人而言民族志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即便是传统的、现实主义的定性研究(参见:Snow, 1999, p.97)①。全球与地方性的法律过程已经抹去了民族志研究者与他们的作品之间的个人的与制度的差距。我们并不"拥有"关于我们研究对象的那些实地记录。我们并不具有毫无争议的正当理由去研究某个人、某件事。研究的主体现在开始挑战他们是如何被描写的,而且,不止一个民族志研究者已受到起诉。

第三,这是一个性别化的课题。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和酷儿理论的理论家质疑这样一种异性的、民族志叙事文本的传统逻辑,即,在实际的叙述中,将民族志研究者反思性地定位成性别中性化(或男性化)的自我。经历、话语、自我理解和更宽泛的关

---

① 詹姆森(Jameson,1990)认为,现实主义文本建构其版本的世界是通过"将读者……编入程序;在新习惯新实践中训练读者……这种叙述最终必须产生关于现实……关于真实、客观或外在世界的类型,这种类型本身是历史的,它可能在其他生产模式下进行决定性的修正,如果不是在以后阶段的话"(p.166)。新民族志文本正在生产自己版本的现实,正在教读者如何介入这一视野的社会世界。

于种族、民族、国家、性别、阶级、年龄等的文化假设相互碰撞。确定的身份已经决不可能存在;民族志研究者必须不断要问的不是"我是谁?",而是"我在何时何地,我是何种状况?"(Trinh, 1992, p. 157)。

第四,定性研究既是一个研究课题,但它也是道德的、讽喻的、治疗性的课题。民族志不仅仅是对人类经验的记录。民族志研究者写作一些小的道德故事,这些故事不仅仅是文化差异的汇聚,也不仅仅是另一种文化重生。正如威廉姆·福克纳(Faulkner, 1967, p. 724)所言,研究者的故事写作是一种支柱,它帮助男人和女人们忍受和超越21世纪的黎明岁月。

第五,尽管对定性研究领域的界定常常存在断裂与分歧,但是该课题一直有一个中心:即明确地宣称从互动个体的视角人道主义地研究社会世界。从这一原则分化出自由与激进的行动政治学,其研究者分别来自女性主义、临床研究、民族研究、批判理论、酷儿理论、批判种族理论和文化研究等领域。虽然在定性研究领域存在多种诠释性群体,但是它们都统一在这一原则基础之上。

最后,定性研究的第七阶段将由民族志研究者贯彻以上假设所做的研究来进行界定。这些状况为定性研究在21世纪的转型支起了一个平台①。

本书背后的故事

写作诸如此类的一本书所遭遇的许多困难和任何其他相同规模课题的困难相似。而另一些困难则是在本领域活动中产生的根本性张力与矛盾。在本书第1版中,许多"适合"某些章节写作的学者或者联络不到、太忙、负荷过重或者去海外做实地研究去了。因此,我们找其他的学者,而这些学者却证明比我们所想象的更"适合"。几乎没有重叠的网络覆盖我们所试图囊括的众多学科。尽管这一次我们对该领域了解更多了一点,但是关于应该向谁询问如何去做我们依然不甚知晓,还有许多未知空间。我们遭遇了学科的界线——包括我们自己的——发现了在不同的诠释性群体的内部围绕我们的每一主题存在不同的传统。要知道如何跨越这些常常很困难,而我们的桥梁又常常是移动性的建构。我们还不得不应对关于一系列不同主题的、迥异的理论风格,其建构的基础包括学科的、认识论的、性别的、种族的、民族的以及国家的信仰、疆界、意识形态等。

在许多情形下,关于谁应该写作某个章节或者某个章节应该如何写,我们常常不情愿地进入了一场政治斗争。这些争端清楚地指出了本课题的政治特性,指出了一个事实,即每一章节都是一个潜在的(如果不是真实的话)多重诠释的领地。不止一次,我们和某个作者以及某个编委会成员产生了分歧。我们常常发现自己要在编委们相互竞争的观点中做出裁决,在意义形成与交际手段之间进行连接。很遗憾,在某些情形下我们造成了感情伤害,或者甚至损害了长期的友谊。如果有先见之明,许多事情今天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处理。在这里,我们为我们所造成的伤害真诚致歉。

---

① 最后,我期待一个持续的定性研究的表演转向,作者为他人表演其文本。

我们,以及作者与顾问专家,努力地探询我们想要讨论的一些术语的意义,这些术语包括理论、范式、认识论、诠释性框架、经验资料与数据、研究策略等。我们发现,定性研究这一术语对于不同的人意义是不同的。

即使有两千多页的初稿,我们还是放弃了追求全面的目标。为了最后期限和页数的要求,我们和作者们进行着斗争。关于各章节的理论性以及关于那些我们能够明白但其他人却未必明白的内容,我们也和作者们进行着斗争。关于各章节何时完成,我们还得做斗争。而且,当我们要求更多的修改时,我们是在不断地测试着作者们的耐性。

本书的阅读

如果我们自己对本书作评论,我们将指出我们自己所见的不足。在某些意义上,这些不足类似于我们在1994年版本中的发现——过分依赖各自学科(社会学、传播学、教育学)的视角,缺乏对自我及其在实地研究情境中的位置的研究,对新的社会与文化历史的研究太少——尽管我们努力地想避免这些问题。另一方面,我们也涉及了第1版中所体现出的一些问题。我们努力地试图涵盖应用定性研究的更多领域。我们帮助开启了各章节作者之间的对话。我们为来自其他学科(特别是人类学)的更多的声音创造了空间,但是我们依然缺少代表有色的及第三世界人们的声音。而你,读者,肯定对本书有你自己的反应,可能关注另一些我们所没有看到的问题。

这些都体现了本书的本质特征,体现了做定性研究的本质特征。这本书是一种社会建构,一种社会实施的、共同创造的实体。而且,尽管它以物质的形式存在,但是随着一代代的学者、研究生反复地使用它、修改它,从它发起更多的方法论范式的、理论的、实践的研究,它将毫无疑问地被再创造。它并非一个最终的论断。它是一个起点,一个新思想、新研究的跳板。新的研究新鲜而敏感,模糊了学科间的界线,但总能深化我们对较大的人类研究课题的理解。

尽管既有优势也有缺陷,我们希望这个课题有助于定性研究在人类研究学科中逐渐成熟并扩大影响。而且,正如我们原来所受到的训令,我们希望它能说服你——读者,相信现在定性研究本身已构成了一个研究领域,使你能更好地将自己的研究定位于定性研究传统之中。如果能这样,我们就成功地架起了一座为我们所有人服务的桥梁。

致　谢

如果没有各章节的作者及编委会各成员对本书无偿付出的时间、意见与真诚的建议(常常未被给予足够的注意),本书将不能得以出版。在这里我们一并感谢所有作者与编委会成员,他们的名字列在本书的扉页上。他们既能够为本课题提供长期的、持续的支持,又能提供短期的、应急式的帮助。

我们还有其他一些人情债,非常个人化和家庭式的。如果没有我们的编辑彼特·拉贝拉及其前任米奇·艾伦无处不在的帮助、支持、智慧与鼓励,将不可能有本书的出版。他们对本领域及其历史与多样性的把握是非凡的。他们对本课题的性质的构想极具价值。是他们的力量推动着我们向前。而且,不管我们何时碰到问题,彼特总是耐心地在那里提供帮助。回到家,回到萨基(Sage)出版社这支舰队,托马斯·盖伊(Thomas Gay),罗尔夫·詹卡(Rolf Janke),萨拉·米勒·麦克丘恩(Sara Miller McCune)在许多情况下保证了本书这条舰船向着正确的方向行驶。

我们也要感谢以下这些个人与院系给我们的帮助、支持、洞见与耐心,包括我们各自的大学与院系等。尤其要感谢伊冯娜的院长琼·康诺莉(Jane Conoley),副院长欧内斯特·戈茨(Ernest Goetz)和系主任布赖恩·R·科尔(Bryan R. Cole),他们每个人都以某种重要的方式为本研究提供了方便。在厄巴纳(Urbana),杰克·布拉奇(Jack Bratich)提供了必要条件。他的幽默与优雅使我们不断增加的文档井然有序,使每个人都按部就班。没有杰克,这个课题决不能够完成。还有伊利诺斯大学的伊丽莎白·威尔逊(Elizabeth Wilson),吉纳·曼宁(Gina Manning) 和德洛斯·简·希尔(Delores Jean Hill),她们保证了传真在厄巴纳、沃尔纳特·克里克、波士顿和世界其他一些地方之间的通畅。

诺曼真诚感谢传播学院的院长金·罗茨奥(Kim Rotzoll)和传播研究所的所长克利福德·克利斯琴斯(Clifford Christians)在道义上、知识上和经济上给予本课题的支持。他也感谢黛安娜·蒂普斯(Diane Tipps)和汤姆·吉勒·安蒂(Tom Galer-Unti)对经济账目的管理,以及社会学系的主任约翰·利(John Lie)对本课题的慷慨资助。在萨基出版社那边,阿斯特里德·弗丁(Astrid Virding)负责本课题的出版;我们非常感谢她和塞尔霍斯特(Judy Selhorst),还要感谢彼隆纽(Eileen Peronneau),伯格斯泰德

(Kris Bergstad),哈利(Cristina Haley)和波姆普拉斯卡(Uma Pimplaskar),她们娴熟的校对与索引技术使本书在形式上更完善。勒梅斯特(Janelle LeMaster)负责页面设计,巴拉素里亚(Ravi Balasuriya)设计了书的封面,沃伦(Marion Warren)负责的是排版部分。凯瑟林·瑞安(Katherine Ryan)和埃贡·古巴(Egon Guba)夫妇帮助我们保持课题的正常运作,聆听我们的抱怨,表现出非凡的耐性与支持。

最后,我们还要感谢一群人,他们在我们需要读者时毫不吝啬时间与精力为我们提供专业的、深思熟虑的观点。没有他们的帮助,我们会常常发现自己对本书中所提出的不同的传统、视角与方法缺乏全面的理解。我们要感谢下列各位对于本课题的重大贡献,他们是:米歇尔·阿加(Michael Agar),马里兰大学人类学系;大卫·费特尔曼(David Fetterman),斯坦福大学教育学系;埃贡·古巴(Egon G. Guba),印第安那大学教育学系;杰夫里·M·约翰逊(Jeffrey M. Johnson),东卡罗莱纳大学海事学院;史蒂芬·凯米斯(Stephen Kemmis),史蒂芬·凯米斯研究咨询有限公司;J·加里·诺尔斯(J. Gary Knowles),密西根大学教育学系;雷蒙德·李(Raymond Lee),伦敦大学社会政策研究所;伦基拉(Markku Lonkila),赫尔辛基大学社会学系;马休·B·迈尔斯(Matthew B. Miles),纽约政策研究中心;约翰·奥格布(John Ogbu),加利福利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学系;丹尼斯·帕隆博(Dennis Palumbo),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公正研究系;乔恩·H·里格(Jon H. Rieger),路易斯维尔大学社会学系;雷纳托·罗萨尔多(Renato Rosaldo),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系;汤姆·施瓦特(Tom Schwandt),伊利诺大学教育学系;约翰·赛德尔(John Seidel),马萨诸塞州阿默斯特(Amherst)定性研究会;雷纳塔·泰什(Renata Tesch),定性研究管理;迪塞特·斯普林斯(Desert Springs),加里弗尼亚;亨里·T·特鲁巴(Henry T. Trueba),维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教育学系。

诺曼·K·邓津
伊利诺斯大学厄巴纳分校
伊冯娜·S·林肯
德克萨斯 A&M 大学

参考文献

Denzin, N. K., & Lincoln, Y. S. (1995). Transforming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Is it a revolutio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24, 349-358.

Faulkner, W. (1967). Address upon receiving the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In *The portable Faulkner* (Rev. ed.; M. Cowley, Ed.; pp. 723-724). New York: Viking.

Jameson, F. (1990). *Signatures of the visible.* New York: Routledge.

Peshkin, A. (1993). The goodnes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Educational Researcher*, 22(2), 24-30.

Snow, D. (1999). Assessing the ways in which qualitative/ethnographic research contributes to social psychology: Introduction to special issue.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62, 97-100.

Trinh T. M. (1992). *Framer framed.* New York: Routledge.

本卷目录

1 导论:定性研究的学科与实践 / 诺曼·K·邓津 伊冯娜·S·林肯
INTRODUCTION: THE DISCIPLINE AND PRACTICE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1·

第Ⅰ部分 界定领域

2 定性研究方法:在社会学和人类学中的历史 / 亚瑟·J·维迪奇 斯坦福·M·莱曼
QUALITATIVE METHODS: THEIR HISTORY IN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40·

3 通过行动研究重建大学和社会的关系 / 戴维·J·格林伍德 默顿·勒温
RECONSTRUCTING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UNIVERSITIES AND SOCIETY THROUGH ACTION RESEARCH ·91·

4 为了谁——定性研究、描述和社会责任 / 米歇尔·法恩 洛伊斯·韦斯 苏珊·维辛 卢恩曼·王
FOR WHOM? QUALITATIVE RESEARCH, REPRESENTATIONS,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113·

5 定性研究中的伦理与政治 / 克里福德·G·克里斯琴斯
ETHICS AND POLITICS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143·

第Ⅱ部分 处于转型中的范式与视角

6 范式间的争议、矛盾及正在出现的融合 / 伊冯娜·S·林肯 伊贡·G·古巴
PARADIGMATIC CONTROVERSIES, CONTRADICTIONS, AND EMERGING CONFLUENCES ·175·

7 定性研究的三种认识论取向:解释主义、诠释学和社会建构论 / 托马斯·A·施瓦特
THREE EPISTEMOLOGICAL STANCES FOR QUALITATIVE INQUIRY: INTERPRETIVISM, HERMENEUTICS, AND SOCIAL CONSTRUCTIONISM ·204·

8 新世纪的女性主义和定性研究 / 弗吉尼亚·L·奥利森
FEMINISMS AND QUALITATIVE RESEARCH AT AND INTO THE MILLENNIUM ·232·

9 种族化话语与种族认识论 / 格洛利亚·拉德森—比林斯
RACIALIZED DISCOURSES AND ETHNIC EPISTEMOLOGIES ·276·

10 批判理论和定性研究的再思考 / 乔·L·金奇洛 彼特·麦克拉伦
RETHINKING CRITICAL THEORY AND QUALITATIVE RESEARCH ·301·

11 文化研究 / 约翰·弗劳 米甘·莫里斯
CULTURAL STUDIES ·341·

12 性别,酷儿理论与定性研究 / 乔舒亚·加默森
SEXUALITIES, QUEER THEORY, AND QUALITATIVE RESEARCH ·377·

总目录

定性研究(第1卷):方法论基础

1 导论:定性研究的学科与实践
2 定性研究方法:在社会学和人类学中的历史
3 通过行动研究重建大学和社会的关系
4 为了谁——定性研究、描述和社会责任
5 定性研究中的伦理与政治
6 范式间的争议、矛盾及正在出现的融合
7 定性研究的三种认识论取向:解释主义、诠释学和社会建构论
8 新世纪的女性主义和定性研究
9 种族化话语与种族认识论
10 批判理论和定性研究的再思考
11 文化研究
12 性别,酷儿理论与定性研究

定性研究(第2卷):策略与艺术

13 定性研究设计的编舞艺术:米奴哀小步舞、即兴表演与晶体化
14 未言说的故事:做受资助的定性研究
15 表演民族志:简史和一些建议
16 个案研究
17 民族志和民族志描述
18 诠释实践之分析
19 扎根理论:客观主义与建构主义方法
20 无所畏惧:来自生命历程和后现代的挑战
21 证词、从属地位以及叙述的权威

22 参与行动研究
23 临床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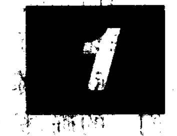
定性研究(第3卷):经验资料收集与分析的方法

24 访谈:从结构式问题到引导式话题
25 反思观察:从程序到文本
26 文献和物质文化的诠释
27 反思视觉方法:从伽利略到"神经浪游者"
28 作为主体的研究者:自我的民族志、个体叙事、自反性
29 数据处理与分析方法
30 软件和定性研究
31 对话和文本分析
32 女权主义研究中的焦点小组法
33 应用民族志

定性研究(第4卷):解释、评估与描述的艺术及定性研究的未来

34 相对主义的标准问题
35 解释的实践与政治问题
36 写作:一种研究方法
37 人类学诗学
38 通过评估理解社会计划
39 以定性研究影响政策过程
40 定性研究压力与革新
41 第七阶段

导论:定性研究的学科与实践[①]



INTRODUCTION: THE DISCIPLINE AND PRACTICE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 诺曼·K·邓津　伊冯娜·S·林肯

在人文学科中,定性研究有着悠久的、卓著的,有时也是痛苦的历史。在社会学中,"芝加哥学派"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的工作,建立起定性研究对于研究人类群体生活的重要性。在同一个时期的人类学中,博厄斯(Boas),米德(Mead),本尼迪克特(Benedict),依万斯—普里查德(Evans-Pritchard),拉德利克夫-布朗(Radcliffe-Brown),以及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关于学科定义的研究描绘出田野工作方法的轮廓(Gupta & Ferguson,1997;Stocking,1986,1989)。议程是清晰的:观察者到一个异质的背景中,去研究另一种社会和文化的风俗和习性(见本书第2章、第17章。对于这一传统的批评,又见:Rosaldo,1989,pp. 25-45)。很快,定性研究又在其他的社会与行为科学学科中得到应用,这些学科包括教育学(特别是杜威的工作)、历史学、政治学、商学、医学、护理学、社会工作以及传播学。

在本书第2章中,维迪奇(Vidich)和莱曼(Lyman)描绘出这一历史的许多关键特征。在这一经典的分析中,他们指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社会学和人类学中,定性研究"来自于对理解'他人'的关注",而且,这种他人还是外国的他人,一种来自比研究者本国文明程度更低的外国文化的、原始的非白人。当然,在有人类学家很久以前就有殖民主义者。尽管如此,殖民地将不再存在,现在后殖民地也不再存在,历史由于这种将黑皮肤的他人转变为民族志学者关注对象的探究精神而有所不同。

贝尔·胡克斯(Bell Hooks,1990,pp. 126-128)正是把阅读《书写文化》(*Writing Culture*,Clifford & Marcus,1986)一书封面上的著名照片作为这种精神的一个例子(另见:Behar,1995,p. 8;Gordon,1988)。该照片描述了斯蒂芬·泰勒(Stephen Tyler)在印度做田野工作的情景。泰勒坐在离三个黑色皮肤的人不远处。一个孩子从篮子里伸出头,一个妇女处在棚屋的阴影处,一个男人,肩上披

---

① 作者注:我们十分感谢许多在本章的撰写中给予我们帮助的人,包括埃贡·古巴,米奇·艾仑,彼特·拉贝拉,杰克·布拉奇(Jack Bratich)和凯瑟林·E·瑞安。我们采用了格普塔和弗格森(Gupta & Ferguson,1997)的书名作为这一章的副标题。

着黑白相间的披肩，肘部支撑在膝盖上，手停在面孔的一边，凝视着泰勒。泰勒正在记田野日志，或许是为了遮阳，一块白布搭在他的眼镜上。这块白色的点缀，标志出泰勒作为白皮肤男性作者正在研究这些被动的棕色和黑色皮肤的人们。的确，棕色皮肤男人的凝视显示出某种期望，或者对泰勒的某种依附。和他形成对照的是，妇女的凝视被完全隐藏在阴影中，用该书中标题的话来说，阴影覆盖了她的面孔(hooks,1990,p.127)。所以，这一张在20世纪后半叶民族志方面或许是最有影响的著作的封面照片，复制了"两种在种族主义者想象中十分鲜明的观念：白人男性作为作者/权威的观念……和被动的、什么也不做、只会盯着看的棕色/黑色男人(以及妇女和儿童)的观念"(hooks,1990,p.127)。

在导论这一章中，我们将定义定性研究的领域，然后穿越、描绘和回顾定性研究在人文学科中的历史。这样做可以使我们在其历史时期(historial moments)之内来确定这本书及其内容的位置(历史时期是某种人为的东西，它们是由社会建构的，准历史的，与惯例重叠的。不管怎样，它们将允许一种发展中的思想的"表演"。它们也使得我们对有关民族志与定性研究的缺陷和许诺的强词夺理增加了敏感性)。我们将为阅读定性研究展示一种概念的框架，起到一种多文化的、对产生过程说明的作用。然后，将对后续的各章提供一个简要的介绍。再回到维迪奇和莱曼以及胡克斯的观察上来，我们将以一段简要的关于定性研究和重要的种族理论(另见本书第9章和第35章)的讨论作为结束。正如我们在序言中所指出的，我们用桥梁来比喻后续各章的建构。我们把这本书看作是一座连接各个历史时期、各种研究方法、各种范式，以及各种解释性学者的社团的桥梁。

定义问题

定性研究因其自身的特点而成为一个特定的研究领域。它横跨不同的学科、领域和主题①。在定性研究这一术语下，包含着由一系列复杂的、相互关联的术语、概念和假设所组成的家族。这其中包括基础主义、实证主义、后基础主义、后实证主义、后结构主义等理论传统，以及许多与文化研究和解释性研究相联系的定性研究视角与(或)方法(参见本书第1卷第Ⅱ部分的章节)②。一些分别地、详细地论及多种方式与方法的文献被归于定性研究的范畴中，例如个案研

① 定性研究在教育学、社会工作、传播学、心理学、历史学、组织研究、医学、人类学和社会学中有着各不相同的历史。

② 这里我们列出某些定义。实证主义声称可以对现实世界进行客观的说明。后实证主义认为，由于所有考察现实世界的方法都是有缺陷的，因而我们只能对现实世界作出部分客观的说明。根据基础主义的观点，我们对于世界的认识可以有一个最终的基础，这种基础包括对经验主义的和实证主义的认识论的运用(Schwandt,1997,p.103)；非基础主义认为，我们可以作出有关世界的陈述而不需要"求助于这种认识的最终的证据或基础"(p.102)；半基础主义则认为，我们可以根据新现实主义的标准，包括相应的真理概念，来作出有关世界的确定的知识断言，存在一种独立的可以被映射的现实(本书第34章)。

究、政治与伦理、参与性研究、访谈、参与观察、视觉方法和解释性分析等。

在北美,定性研究在跨越七个关键的历史时期(我们在下面将详细讨论这些时期)的复杂历史领域中发挥作用。这七个历史时期相互重叠,并且在目前同时起作用①。我们分别将它们定义为:传统时期(1900—1950);现代主义时期或者黄金时期(1950—1970);类型模糊时期(1970—1986);表述危机时期(1986—1990);后现代时期,即实验的和新民族志的时期(1990—1995);后实验研究时期(1995—2000);以及未来时期,也就是现在(2000年以来)。未来时期,即第七个时期,将与道德对话及宗教文本的发展有关。第七个时期要求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成为有关民主、种族、性别、阶级、民族—国家、全球化、自由和社区的重要讨论场所。

后现代时期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一种对文学和修辞学比喻以及叙述性转折的关注,一种对讲故事、对采用一种新方式构建民族志的关注来定义的(Ellis & Bochner,1996)。劳雷尔·里查德森(Laurel Richardson,1997,p. 173)注意到这一时期是由一种新的敏感性、怀疑以及拒绝给予任何方法和理论以特权所形成的。但是现在,在21世纪开始的时候,叙述性转折已经被接受。许多人已经学会如何不同地写作,包括如何将他们自己置于其文本之中。我们现在正在为把定性研究与一个自由民主社会的希望、需要、目标和承诺相连接而奋斗。

认识论的连续不断的理论化浪潮贯穿了这七个时期。传统时期与实证主义的、基础主义的范式相伴随。现代主义时期或黄金时期以及类型模糊时期则是与后实证主义争论的出现相联系。同时,各种各样新的解释性、定性的视角,包括解释学、结构主义、符号学、现象学、文化研究以及女权主义都被采用②。在类型模糊阶段,人文学科成为重要的、解释性的理论以及定性研究项目广泛构思的中心资源。研究者成为了一个用手头现成工具摆弄修理的人(参见下文),学习如何从各种不同的学科中进行借鉴。

类型模糊阶段产生出下一个阶段——表述危机时期。在这一时期中,研究者为如何将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对象置于反身的文本(reflective text)中而斗争。一种方法论的双向传播发生了。人文学科向社会科学迁移,寻找新的社会理论、新的方式来研究大众文化及其当地的、民族志的背景。社会科学转向人文学科,希望学习如何分析有着复杂结构和后结构的社会文本读物。从人文学科那里,

① 詹姆森(Jameson,1991,pp. 3-4)提醒我们,任何划分历史时期的假设都是令人怀疑的,即使是拒绝直线的、类似于阶段的模式的假设。一个阶段所指那段现实从来都是不清楚的,用什么来划分出一个阶段而不是另一个阶段也总是充满争议的。我们的七个时期只是希望在风格、类型、认识论、种族、政治和审美方面标出可辨别的变换。

② 下面是某些进一步的定义。结构主义认为,任何系统都是由一组嵌入语言中的相对立的类别所组成的。符号语言学是有关符号或符号系统的科学,这种系统是一种结构主义的项目。根据后结构主义的观点,语言是一种不稳定的参考体系,因此,要完全地掌握一种行为、文本或意图的含义永远是不可能的。后现代主义是一种从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发展起来的、不给任何一种权威、方法或范式以特权的当代意识。诠释学是一种强调先前的理解和偏见是如何形成解释过程的文本分析方式。现象学是一种复杂的思想体系,它是与胡塞尔(Husserl),海德格尔(Heidegger),萨特(Sartre),梅隆—庞蒂(Merleau-Ponty)和艾尔弗雷德·舒尔茨(Alfred Schutz)的著作相联系的。文化研究是一种复杂的、多学科间的领域,它融合了批判理论、女性主义以及后结构主义。

社会科学家也学习到如何产生出不能按过分单纯化的、线性的、不容置疑的方式来阅读的文本。文本与背景之间的分界线是模糊的。在后现代实验时期,研究者继续偏离基础的和准基础的标准(见本书第34章、第36章、第40章)。人们寻求替换的评价标准,这种标准既根植于本土的理解,同时又能够被证明是具有唤起作用的、合乎道德的和重要的。

任何定性研究的定义都必须在这种复杂的历史领域中起作用。定性研究在这些不同的时期中意味着不同的事情。但无论如何,我们还是可以提供一个初始的、一般性的定义:定性研究是一种将观察者置于现实世界之中的情景性活动。它由一系列解释性的、使世界可感知的身体实践活动所构成。这些实践活动转换着世界。它们将世界转变成一系列的陈述,包括实地笔记、访问、谈话、照片、记录和自我的备忘录。在这种程度上,定性研究包含着一种对世界的解释性的、自然主义的方式。这意味着定性研究者是在事物的自然背景中来研究它们,并试图根据人们对现象所赋予的意义来理解或来解释现象①。

定性研究包括使用和收集各种经验材料的研究:个案研究,个人经历,内省,生活史,访问,人文产物(artifacts)研究,文化文本和产品研究,观察的、历史的、互动的以及视觉的文本研究——描述日常事务和有疑问的环节以及个人生活中的意义。因此,定性研究者使用广泛的、内在相连的解释性实践,希望总是能够得到一种对身边的主题更好的理解。然而,不难理解,每一种实践都会以一种不同的方式感知世界。因此,一种常见的约定是,在任何一项研究中都运用不止一种解释性实践。

作为用手头工具摆弄修理者(bricoleur)和百衲被制作者(quilt maker)的定性研究者

定性研究者可能具有多种类别的形象:科学家、自然主义者、田野工作者、新闻记者、社会批评家、艺术家、表演家、爵士音乐人、电影制作者、百衲被制作者、随笔作家。定性研究的许多方法论实践可以被看作是软科学、新闻报道、民族志、拼凑物品、缝制百衲被,或者蒙太奇。类似的,研究者可以被看作是一个用手头现成工具摆弄修理的人,一个缝制百衲被的人,或者,一个电影制作者,一个将各种图像装配成蒙太奇的人(关于蒙太奇,见下面的讨论以及 Cook,1981,pp. 171-177;Monaco,1981,pp. 323-328;关于缝制百衲被,见 hooks,1990,pp. 115-122;Wolcott,1995,pp. 31-33)。

内尔森、特雷克尔和格劳斯伯格(Nelson, Treichler & Grossberg,1992),利瓦伊—斯特劳斯(Levi-Strauss,1966),以及维特根斯坦双氏(Weinstein & Weinstein,

---

① 当然,所有的背景都是自然的——即日常经历所发生的地方。定性研究者在人们做事情的地方将人们和他们所做的事情一起研究(Becker,1986)。人们去做这种工作的实地场所或者自然的地方并不存在(Gupta & Ferguson,1997,p. 8)。这种场所由研究者的解释性实践所构成。从历史上看,分析家区分了实验的(实验室)与实地的(自然的)研究背景,因此,得出了定性研究是自然主义的观点。行动理论则抹掉了这种区别(Keller & Keller,1996,p. 20;Vygotsky,1978)。

1991)说明了利用手头的东西拼凑成的物品和用手头现成工具摆弄修理者的含义①。一个用手头现成工具摆弄修理的人是一个“万事通或一种职业性自己动手的人”(Levi-Strauss,1966,p.17)。有许多种不同的摆弄修理者——解释性的、叙述性的、理论性的、政治性的(见下文)。解释性的摆弄修理者产生出一种利用手头的东西拼凑成的物品——即一组凑合在一起、对一种复杂情景的细节做出的合适的描述。“用手头现成工具摆弄修理者所得结果的解答(利用手头的东西拼凑成的物品)是一种(自然发生的)诠释”(Weinstein & Weinstein,1991,p.161)。当不同的陈述和解释工具、方法及技术被添加到这一难题上时,它改变并采取了新的形式。内尔森等人(Nelson et al.,1992,p.2)将文化研究的方法论描述为“一种利用手头的东西拼凑成的物品。这即是说,其对实践的选择是实用主义的、战略性的和自我反身的”。这种理解可以有条件地应用于定性研究。

作为用手头现成工具摆弄修理者或者百衲被缝制者的定性研究者,运用审美的和带有其手艺的物质工具,并调动手边所有的策略、方法或经验材料(Becker,1998,p.2)。如果必须发明或者凑集新的工具或技术,那么,研究者将会去做这一切。事先不必对使用哪种解释性实践进行选择。“研究实践的选择依赖于所提出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又依赖于它们的背景”(Nelson et al.,1992,p.2),依赖于在背景中什么是合适的,以及在那样的背景中研究者能做什么。

这种解释性的实践包括审美的问题,一种超出了实用主义或实践的表述美学。在这里,蒙太奇的概念是有用的(Cook,1981,p.323;Monaco,1981,pp.171-172)。蒙太奇是一种编辑电影画面的方法。在电影摄影术的历史中,蒙太奇是与谢尔盖·爱森斯坦(Sergei Eisenstein)的工作,特别是与他的影片《波特金号战舰》(*The Battleship Potemkin*,1925)相伴随的。在蒙太奇中,几个不同的形象一个接一个地层叠出现,创造出一幅画面。在某种意义上,蒙太奇就像修饰痕的重现,在这种重现中,某些一直被涂在画面下层的图案(一种被画家“悔改掉的”或否定掉的图像)再次成为可见的,并创造出某些新的东西。这种新的东西正是一直被先前的图像弄模糊的东西。

就像爵士乐一样,蒙太奇和修饰痕的重现,是一种即兴创作,它创造出某种将图像、声音以及理解混合在一起、交叠在一起的感觉,形成一种复合的、新的作品。图像似乎是相互塑造、相互定义,产生出一种情感的格式塔效果。这些图像经常在一种快速运转的电影情节中结合在一起,几个图像围绕着一个中心或者焦点画面或者情节,产生出一种令人头昏眼花的旋转的聚集。这种效果经常用于表示时间的流逝。

也许蒙太奇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波特金号战舰》中敖德萨台阶(Odessa

① 根据维特根斯坦双氏(Weinstein & Weinstein,1991)的观点,“在法语日常讲话中,bricoleur 的意思是‘用他(或她)的双手和比工匠更曲折的方式工作的人’…… bricoleur 是实践的和干活的”(p.161)。通过将这一术语与德国社会学家和社会理论家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与鲍德莱里(Baudelaire)的工作联系起来,这两位作者提供了这一术语的一种历史。哈默斯利(Hammersley,待出版)则抵制我们对这一术语的运用。遵循利瓦伊—斯特劳斯的观点,他把 bricoleur 错误地当作创造神话的人。他建议用造船者(boatbuilder)的概念来取代这一术语。哈默斯利也不同意我们关于定性研究的“时期”模型,认为它暗示着某种进步的意思。

Steps)的情节①。在影片的高潮,敖德萨的平民正被拥护独裁统治者的军队屠杀于通向港口的石阶上。爱森斯坦剪辑了一位年轻的母亲镜头,她在开枪的军队前面将她的孩子推进马车穿过码头。平民们冲过她的面前,摇晃着马车,这使她很担心,便将马车推到下一段台阶的下面。军队在她上面,向平民射击。她被困在军队和台阶之间,她尖声喊叫。硝烟中来福枪迸发出的射线直冲天空。这位母亲的头转向后面,马车的轮子在台阶的边缘摇摇欲坠。母亲的手紧紧抓住她腰带上银色的搭扣。在她下面,人们被士兵追打。鲜血滴在母亲雪白的手套上。婴儿的手伸出了马车。母亲来回地转头,军队向前去了。母亲倚靠着马车。一位妇女惊骇地看着马车的后轮滚出了阶梯平台的边缘。随着速度的加快,马车猛地冲下台阶,碾过死去平民的身体。婴儿在马车内来回撞击。士兵用来福枪向一群受伤的平民开火。当马车跳越过台阶,倾斜,翻倒,一个学生发出惊叫(Cook,1981,p.167)②。

蒙太奇运用简洁的图像清楚地创造出紧张、复杂的感觉。随着场景的铺开,蒙太奇引导着观众以一个个场景为基础去建构解释。这些解释建立在联想上,而这些联想的基础是对混合在一起的图像进行相互对比。蒙太奇的基本假设是:观众是根据一种“不连续的,也不是一次一个的,而是同时性的蒙太奇序列”(Cook,1981,p.172)来感知和解释镜头的。观众一次性地将所有的序列集中在一起,形成一种有意义的感情整体,就像匆匆一瞥那样。

运用蒙太奇的定性研究者就像是一个缝制百衲被的人,或者一个爵士乐的即兴表演者。这种人将现实的碎片集缝合、编织在一起。这一过程创造并带来了心理上和情感上的统一,成为一种可解释的经验。在当前的定性研究中有许多蒙太奇的例子(Diversi,1998;Jones,1999;Lather & Smithies,1997;Ronai,1998)。拉舍和史密西斯(Lather & Smithies,1997)用多样的声音,不同的文本形式,以及各种不同的字体,编织了一个复杂的主题。这是一个关于女性艾滋病病毒阳性患者和女性艾滋病患者的主题。琼斯(Jones,1999)用来自于比莉·哈乐黛(Billie Holiday)所唱的忧郁布鲁斯歌曲(蓝调音乐)中的抒情诗创造了一个表演的主题。

在基于蒙太奇隐喻、缝制百衲被,以及爵士乐即兴表演的主题中,许多不同的事物在同一个时刻发生——不同的声音、不同的全景、不同的观点、不同的视角。像表演的主题一样,作品运用蒙太奇的手法同时创造并制定了精神的含义。它们从个人的发展到政治、从当地的发展到历史和文化,这些都是对话的主题。

---

① 布雷恩·迪帕尔玛(Brian De Palma)在他1987年的影片《贱民》(*The Untouchables*)中,再现了这一婴儿马车的场景。

② 在港口,波特金号战舰的两门大炮的炮口慢慢地转向照相机。银幕上的文字在告诉我们:“残忍的军事力量用战舰上的大炮来作出回答。”最后,一个著名的三镜头式蒙太奇序列首先显示出一个沉睡的狮子的雕塑,然后是一个从沉睡中醒来的狮子,最后是一个怒吼的狮子,象征着俄罗斯人民的愤怒(Cook,1981,p.167)。在这一序列中,爱森斯坦运用蒙太奇的方式来展开时间,为这一可怕的事件创造了一个心理上的持续时间。通过抽出这一序列,通过展现马车中的婴儿、向市民开火的士兵、滴在母亲手套上的鲜血、台阶上下滑的马车,他揭示出一种巨大的毁灭程度。

它们利用积极的听众,在读者和作者之间创造出互让的空间。它们所做的比将他人转变成社会科学关注的对象更多(见本书第15章)。

定性研究在本质上是多种方法的焦点(Flick,1998,p.229)。然而,多种方法的运用,或者三角测量(trigulation),反映出一种获得对问题中现象的深度理解的企图。客观现实从不可能被捕获,我们只能通过事物的表现去理解它。三角测量并不是一种确认的工具或策略,而只是确认的一种替换物(Flick,1998,p.230)。在一项单独的研究中,多种方法论实践、多种经验材料、多种视角,以及多种观察者的结合,可以得到最好的理解。因而,严密性、广泛性、复杂性、丰富性,以及深入性都作为一种策略添加到任何的探究中(Flick,1998,p.231)。

在本书的第36章中,里查德森就三角测量的概念进行了争论,他坚持认为,定性研究的中心形象是晶体状的,而不是三角形的。后实验时期的混合型主题就不止三个方面。与晶体状相似,爱森斯坦的蒙太奇,爵士乐独奏曲,或者缝制百衲被的碎片,混合型的主题,都如里查德森所说,“将对称性和带有一种无穷变化的形状、形体和颤变的物质相结合……晶体状生长、变化、更替……晶体状是折射外部和折射其自身内部的多面体,它创造出不同的颜色、形状和排列,向不同的方向释放。”

在晶体化的过程中,作者从不同的视角来讲述同样的故事。例如,在《一个讲了三遍的故事》(*A Thrice-Told Tale*,1992)中,玛格利·沃尔弗(Margery Wolf)用小说、田野笔记和科学论文三种方式,对在一个土著村庄的同一段经历进行了说明。类似的,安娜·迪弗尔·史密斯(Anna Deavere Smith)在她的戏剧《镜中之火》(*Fires in Mirror*,1993)中,展现了一系列的表演片断,这些片段是根据对卷入1991年8月19日发生在克朗·海斯(Crown Heights)的一场种族冲突的人的访问形成的(本书第35章)。该剧有多场谈话部分,包括与帮派成员、警官以及不知名的青年男女的谈话。关于这一事件,不存在“正确的”讲述。每一种讲述,就像光射中一个晶体一样,反射出对这一事件的不同的观点。

三角测量被看作是一种晶体状的形式、一种蒙太奇,或者一种围绕着中心主题的创造性表演,因而可以扩展作为有效性的一种形式,或者一种替代。三角测量是多样的显示,同时折射出现实。每一种隐喻都“发挥作用”,创造出同时性,而不是依次的或者线性的。读者和听众因此而去探索相互竞争的有关背景的想象,并变得专注于或融合于所要理解的新现实。

在方法论上,用手头现成工具摆弄修理的人擅长表演大量不同的任务,其范围从访问到深刻的自我反思和内省。理论性的摆弄修理者阅读广泛,在许多解释的范式方面(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建构主义、酷儿理论)知识渊博,这些范式可以运用到任何特定的问题。然而,他或者她可能感觉不到各种范式可以是相互结合的或综合的。这即是说,我们不能像跨越哲学体系特定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那样,轻易地在各种范式之间变动。各种范式代表着将使用者与特定世界观连在一起的信念系统。相反,视角则是较不发达的体系,我们可以十分容易地在不同视角之间变换。作为理论性摆弄修理者的研究者,在相

互竞争和相互重叠的视角与范式之间及之内发挥着作用。

解释性的摆弄修理者明白,研究是一种互动的过程,这一过程受到他或者她的个人历史、经历、性别、社会阶级、种族,以及民族的影响,同时也受到其生活背景中的那些人的影响。政治性的摆弄修理者确信,科学就是权力,所以,所有的研究发现都具有政治上的应用。不存在价值无涉的科学。要寻求的是一种建立在信任的政治基础之上的市民社会科学(Lincoln,1999)。叙述性的摆弄修理者也认为,所有的研究者只是在讲述他们所研究的世界的故事。因此,科学家所做的叙述,所讲的故事,都是在通常定义为范式(例如,实证主义、后实证主义、结构主义)的特定的讲故事传统之内,对措辞和框架的说明。

解释性的摆弄修理者的劳动产品,是一种复杂的、像百衲被一样的拼凑的物品,一种反身的抽象拼贴画或蒙太奇——一组流动的、相互连接的图像和描述。这种解释性的结构像一床百衲被,一段表演的文本,一个将部分连接成整体的描述片断。

作为多种解释性实践场所的定性研究

作为一组解释性活动,定性研究不会给予某种方法论实践比其他不同的方法论实践更多的特权。作为一种讨论或对话的场所,定性研究很难作出清楚的定义,它没有明显的属于自己的理论或范式。正如本书第1卷第Ⅱ部分内容所揭示的,多种理论范式,从建构主义到文化研究、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及研究的种族模式,都宣称是对定性研究方法和策略的运用。正如我们下面将讨论的,定性研究也运用在许多不同的学科中,它不属于一个单独的学科。

定性研究也没有一组完全属于自己的明显的方法或实践。定性研究者运用符号学、叙事、目录、对话、档案与音素分析,甚至统计、表格、图形和数字。此外,他们也利用和使用民族方法学、现象学、诠释学、女性主义、扎根理论、解构主义、民族志、访问、心理分析、文化研究、调查研究,以及参与观察的方式、方法与技术①。

所有这些研究实践"都能够提供重要的眼光和知识"(Nelson et al.,1992,p.2)。没有一种特定的方法或实践比其他的方法或实践有更多的特权。这些方法或研究实践中的大部分一直应用于人文学科的其他背景中。每一种都带有其自身学科历史的痕迹。例如,在教育学中,有着民族志与人种学的运用和内涵的广泛历史(本书第4章);在人类学(本书第17章、第29章、第37章)、社会学(本书第18章、第27章、第24章、第31章)、传播学(本书第28章)和文化研究(本书第11章)中,有着参与观察与民族志学的运用和内涵的广泛历史;在电影与文

① 这与认识到不同学科中都普遍使用的方法和只在各学科内部使用的方法之间的差别有关。例如,民族方法学家把他们的研究方式作为一种方法,而其他的研究者有选择地借用这种方法,将其作为应用于自己研究中的一种技术。哈里·沃尔科克(Harry Wolcott)(个人交流,1993)提出了这种差别。这也与认识到在主题、方法、资料之间的差别有关。方法也可以作为研究的主题来研究,比如说如何从事一项个案研究。在这种意义上,民族方法学的意识和方法,既是研究的资源,也是研究的主题。

学研究中,有着文本分析、阐释分析、女性主义分析、心理分析、符号学分析以及叙事分析的运用和内涵的广泛历史(本书第 8 章、第 37 章);在历史学、传记学和考古学中,有着档案学、物质文化、历史分析以及文献分析的运用和内涵的广泛历史(本书第 26 章、第 20 章);在医学、传播学和教育学中,有着叙述分析与谈话分析的运用和内涵的广泛历史(本书第 23 章、第 31 章)。

围绕着每一种方法或研究策略的众多历史揭示出每一种实践是怎样与多种不同的运用和内涵相联系。例如,文学研究中的文本分析常常将文本作为自我包含的体系来处理。另一方面,一个采用文化研究或女性主义视角的研究者,则会根据这一文本在一种标有特定的性别、种族或阶级类别的历史时刻中的位置来阅读它。民族志在一项文化研究中的运用将给这一项目带来一套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理解。这种理解不被主流的实证主义社会学家所共享。类似的,后实证主义的和后结构主义的历史学家也会给历史研究的方法和发现带来不同的理解和运用(本书第 20 章)。这种张力和矛盾在本书的各章中都可以看到。

定性研究在方法运用与内涵上的这种个别的和多元的特征,使得研究者要同意这一领域中任何基本的定义都很困难,因为它从来就不是同一件事情①。但我们仍然必须在这里为我们的目的建立一个定义。我们从内尔森等(Nelson et al.,1992,p. 4)对文化研究的定义中借用并重新释义得到下列文字:

> 定性研究是一种学科间的、跨学科的(transdisciplanary),并且有时是反学科的(counterdisciplanary)领域,它横跨人文学科、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定性研究在同一时刻意味着多种事物。它的中心点是多范式的,它的实践者对多方法途径的价值十分敏感,他们承认自然主义的视角和对人类经验的解释性理解。同时,这一领域本质上是政治的,并受到多种伦理的和政治的立场的影响。
>
> 定性研究同时包含两种张力:一方面,它受到宽泛的、解释性的、后实验主义的、后现代的、女性主义的和批判的敏感性的吸引;另一方面,它又受到更为狭窄定义的实证主义、后实证主义、人文主义和自然主义等有关人类经验及分析的概念的吸引。而且,这些张力可以在同一个项目中相结合,使其同时带有后现代的和自然主义的,或者批判的和人文主义的视野。

这一相当复杂的陈述意味着,作为一组实践活动,定性研究在其自身多学科的历史范围内,包含着持续的张力和矛盾,这种持续的张力和矛盾遍及研究计划本身,包括它的方法,以及它的结果和解释所采取的形式。这一领域在所有人文学科之间蔓延,同时横穿所有人文学科,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包括自然科学。它的实践者以不同的方式承认现代的、后现代的、后实验的敏感性,以及这些敏感性所暗示的社会研究方式。

---

① 的确,任何给与定性研究一种基本定义的企图都要求一种对产生这种定义的环境的定性分析。

定性研究的阻力

定性研究所具有的专业的和学科的阻力说明了这一对话领域中所包含的政治。定性研究所面临的挑战很多。定性研究者被称作新闻记者或者软科学家。他们的工作被看作是非科学的,或者仅仅是探索性的,或者是主观的。它被称作是批判主义而不是理论,或者它被政治地表述为马克思主义或世俗的人道主义的一种伪装的版本(Huber,1995;Denzin,1997,pp. 258-261)。

这些阻力反映了一种传统上把定性研究者交给实证主义的或者后实证主义来评论的不安意识。但是,实证主义对定性研究的阻力超出了那种“经常存在的在硬科学与软学问之间保持一种区分的愿望”(Carey,1989,p. 99;本书第7章、第34章)。实验的(实证主义的)科学(例如物理学、化学、经济学、心理学)经常被看作是西方文明的最高成就,在它们的实践中,通常假定“真理”可以超越看法和个人偏见(Carey,1989,p. 99;Schwandt,1997b,p. 309)。定性研究被看作是对这一传统的一种攻击,这一传统的拥护者经常退却到一种“价值无涉的客观科学”(Carey,1989,p. 104)模式来为他们的处境辩护。他们很少企图“在他们自己可能的工作中”作出明确的“道德的和政治的承诺”,或者作出评论(Carey,1989,p. 104;本书第6章)。

实证主义者进一步断言,所谓的新实验的定性研究者写的是小说,而不是科学。同时,这些研究者也没有办法证明他们关于现实的陈述。人类学的诗歌和小说是经验科学死亡的信号,通过从事道德批评的尝试将一无所获。这些批评认定,一种稳定的、不变的现实可以通过运用客观社会科学的经验方法来研究(Huber,1995)。因此,定性研究的领域是有经验之生命的世界,因为这里是个体的信念和行动与文化互动的地方。在这种模式下,与构成陈述和描述的具体解释性实践一样,对话和方法都不存在当务之急。这样,文本的、叙述的行动就被实证主义者所抛弃。

然后,后实证主义(见下文)和后结构主义对实证主义科学的反对立场被看作是对推理和真实的攻击。与此同时,实证主义科学对定性研究的攻击也被看作是一种通过立法程序确立有关现实的版本而压制其他版本的企图。

这种复杂的政治地形解释了定性研究的许多传统和趋势:英国传统及其在其他国家背景中的表现;社会学、人类学、传播学以及教育学中的美国实用主义、自然主义和解释性传统;德国和法国现象学的、诠释学的、符号学的、马克思主义的、结构主义的,以及后结构主义的视野;还有女性主义研究、非裔美国人研究、拉丁美洲人研究、酷儿研究、土著人和土著文化研究等。定性研究的政治创造了一种激活上述每一种传统的张力。由于定性研究面临一种变化的历史世界,新的理性立场,以及它自身制度的和专业的条件,这种张力本身也不断地被考查和被询问。

小结:定性研究对于许多人来说意味着许多不同的事。它的本质是双重的:一种是对其主题的某些自然主义的、解释性的方式的看法的承诺,同时又是一种

正在进行的对后实证主义的政治和方法的批评。我们现在转到一种对定量与定性的研究方式之间的主要差别的简要讨论上来。然后我们再来讨论定性研究内部正在形成的差别和张力。

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

定性的一词意味着一种对实体的性质和过程的强调,同时,其涵义不能通过实验来考察,也不能以量、数字、强度或频率来测量。定性研究者强调现实的社会建构性,强调研究者与他(她)所研究的对象之间的密切关系,强调研究问题受情景的限制。这种研究者强调研究的价值承载性质。他们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即强调社会经验是如何被创造出来并被赋予意义。与此相反,定量研究强调变量间因果关系的测量和分析,而不是过程。这种研究的拥护者声称,他们的工作是在一种价值无涉的框架内完成的。

研究风格:能以不同的方式做同样的事吗

当然,定性研究者与定量研究者都"认为他们了解社会的某些方面,并值得告诉其他人,他们运用各种不同的形式、媒介和方法来交流他们的思想和发现"(Becker,1986,p. 122)。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在五个重要的方面有所不同(Becker,1996)。这些不同点体现出处理同一组问题的不同方式。他们总是返回到研究的政治,返回到谁有权力通过立法正确解决这些问题上来。

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的效用。首先,这两种视野都受到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中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传统的影响(见下面的讨论)。这两种实证主义的科学传统在有关现实及其理解方面持有自然的与批判的现实主义立场。实证主义的观点所声称的是,客观上存在着一种可以研究、捕获和理解的现实。而后实证主义者则认为,现实从来就不可能被完全把握,只可能被接近(Guba,1990,p. 22)。后实证主义依赖于多种方法,将其作为捕获尽可能多的现实的一种方式。与此同时,他们将重点放在理论的发现和证明上,强调传统的评价标准,比如内在效度与外在效度,正如那种使他们能够进行结构分析(有时是统计分析)的定性程序的使用一样。他们也可能使用计算机辅助的分析方法,进行频数统计、交互统计,以及低层次的统计分析。

实证主义的和后实证主义的传统像遮盖在定性研究设计上的长长的影子一样长期徘徊。从历史上看,定性研究是在实证主义范式的范围内被定义的。那时,定性研究者试图用不太严格的方法和程序来做好的实证研究。20世纪中期的一些定性研究者(例如,Becker,Geer,Hughes & Strauss,1961)采用准统计的方式来报告参与观察的发现。直到最近的1998年,两位定性研究中扎根理论方法的领导者,斯特劳斯(Strauss)和考宾(Corbin),还试图将好的(实证主义)科学的通常标准修改为适合于他们自己关于严格的研究的后实证主义概念(本书第19章;Glaser,1992)。当某些应用研究者当声称与理论无关时,常常默认与实证主义或后实证主义的参考框架相符合。

弗里克(Flick,1998,pp.2-3)有效地总结了研究的这两种途径之间的差别。他观察到,定量研究常常被用于隔离出"原因和结果……对理论的关系进行操作化……(以及)测量和……量化现象……允许对发现进行概括"等目的。而目前的怀疑正是集中在这种设计上,因为"急剧的社会变迁及其所导致的生活世界的多样化使社会研究者面对新的社会背景和视野的情况不断增加……传统的演绎方法论……正在失势……而研究不断地被迫使用归纳的策略来取代从理论开始并检验它们……知识和实践被作为本土的知识和实践来研究"。

斯平德勒双氏(Spindler & Spindler,1992,p.69)总结了他们处理定量材料的定性方式:"使用仪器和进行量化都是用于扩充和增强某种类型的资料、越过样本来解释和检验假设的简单程序。二者都必须被放在适当的位置上。人们必须避免将它们作为一种安全机制过早地或者过于广泛地运用。"

尽管许多后实证主义传统的定性研究者将使用统计的测量、方法和文献作为一种在大量的人口总体中确定对象群体的方式,但他们很少采用吸引定量研究者的各种复杂的统计测量或统计方法(例如,路径分析、回归分析,或者对数线性分析)来报告他们的发现。

后现代敏感性的认同。定量的、实证主义的方法和假设的运用,被新一代的定性研究者所拒绝。新一代定性研究者认为后结构的和/或后现代的敏感性更为重要(见下文的讨论;另见:本书第2章、第36章)。这些研究者认为,实证主义的方法只是讲述有关社会或社会世界的故事的一种方式。这种方法可能不比其他方法更好或者更坏。它们只是在讲述不同类型的故事。

这种宽容的观点并不是每个人都同意(Huber,1995)。在评价他们自己的工作时,批判理论、建构主义、后结构主义以及后现代思想学派的许多成员都拒绝实证主义的和后实证主义的标准。他们把这些标准看作与他们的工作无关,认为这种标准只是在复制一种类型的科学,即那种压制太多声音的科学。这些研究者寻求评价他们工作的替换方法,包括逼真性、情绪性、个体的反应性、人道的伦理、政治的惯例、多种声音的文本以及与对象的对话等。相对应的,实证主义者和后实证主义者认为他们所做的是排除了个人偏见和主观性的好的科学。正如上面所提到的,他们将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看作是对推理和真实的攻击。

捕获个体的观点。定性研究者和定量研究者都关注个体的观点。然而,定性研究者认为他们通过详细的访问和观察,可以更加接近行动者的视野。他们认为定量研究者很少能够捕获他们的对象的视野,因为他们不得不依靠更为远距离的、推论性的经验方法和材料。由解释性方法所产生的经验材料被许多定量研究者看作是不可靠的、易受影响的和不客观的。

考察日常生活的限制。定性研究者更有可能面临和遇到日常社会世界的限制。他们将这个世界看作是在运转的,并将他们的结论嵌入其中。定量研究者从这个世界中进行抽象,很少直接地对其进行研究。他们寻求一种建立在由大量随机选择的个案所导出的概率基础之上的客位的(etic)、发现普遍规律的科学。这种陈述高高在上,并且在日常生活的限制之外。但另一方面,定性研究者

致力于一种主位的(emic)、具体的、基于个案的立场,这一立场将他们的注意力引向特定个案的特殊性上。

获得丰富的描述。定性研究者相信对社会世界的丰富描述是有价值的,而定量研究者带着他们客位的、关于普遍性规律的允诺,很少关注这种细节。定量研究者有意地不关注这种丰富的描述,因为这种细节打断了他们概括的过程。

以上描述的五点差异(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的效用、后现代敏感性的认同、捕获个体的观点、考察日常生活的限制、获得丰富的描述)反映了不同的研究风格、不同的认识论、不同的表达方式的承诺。每一种工作传统都受到其自身类型的支配;每一种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它自身最推崇的表达方式、解释方式、信赖方式,以及文本评价方式(Becker,1986,pp. 134-135)。定性研究者采用人类学的散文、历史的故事、第一人称的陈述,以及照片、生活史、小说化的“事实”、传记和自传等其他材料。定量研究者则采用数学模型、统计表格和图表,并且通常采取非人称的或者第三人称的口气来进行他们的研究写作。

定性研究的内部张力

如果认为所有的定性研究者都赞同有关上面描述的五点差异的假设那就错了。正如下面的讨论所将揭示的,实证主义的、后实证主义的以及后结构主义的差异决定并形成了定性研究者之间的对话。在解释性定性研究传统之内的现实主义者和后实证主义者批评后结构主义者向文本的、叙述的方式转向。这些批评主张关注中心点。它提出了“在自己和公众之间的一种聋子般对话”的条件(Silverman,1997,p. 240)。那些试图在世界中捕获互动对象观点的研究者被指责为天真的人文主义和复制“一种罗曼蒂克冲动,这种冲动将经验提升到真实的程度”(Silverman,1997,p. 248)。

还有一些其他的人认为,活的经验被那些向文本的、表演的方式转向的研究者所忽视。斯诺和默里尔(Snow & Morrill,1995,p. 361)指出,“这种表演的转向,就像专注于谈话和讲故事那样,将使我们进一步远离社会行动的领域和日常生活的真实场面。因此敲响了作为一种根植于经验的事业的民族志学的死亡丧钟”。当然我们并不同意这种看法。

掌握了目前这两种传统之内和之间的这些差别,我们现在必须简要讨论定性研究的历史。我们将这种历史分为七个历史时期,注意,任何历史的划分总是带有一些武断的,同时,也总是至少部分地由社会建构的。

定性研究的历史

正如维迪奇和莱曼在本书第2章提醒我们的,定性研究的历史揭示出现代社会科学学科已经将“分析和理解社会中的各类行为和社会过程”作为它们的使命。能够完成这一任务的见解预示着社会科学家有能力客观地观察这个世界。

而定性方法就是这种观察的一种主要工具①。

在定性研究的整个历史中,研究者总是根据希望和价值,以及"宗教的信念、职业的和专业的意识形态"(本书第2章)来定义他们的工作。定性研究(像所有研究一样)总是被按照"这一工作是否向我们传达了或'说'了些什么的标准"(本书第2章),根据我们是如何将我们的现实以及我们对世界的印象概念化来评价的。认识论就是历史地定义这些评价标准的词语。正如我们在上面所指出的,在当前的时期中,有关认识论的许多公认的观点现在正在被重新评价。

维迪奇和莱曼的历史划分包含了下列(有点重叠)阶段:早期民族志学(到17世纪);殖民地的民族志学(17世纪、18世纪和19世纪的探险者);美国印第安人作为"他者"的民族志学(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早期人类学);"文明他人"的民族志学,或者社区研究,以及美国移民的民族志学(20世纪早期到1960年代);种族区分和同化研究(20世纪中叶到1980年代);以及现在,我们称之为第七个时期。

在这每一个时期中,研究者一直被他们的政治希望和意识形态所影响,在证实先前的理论和信念的研究中发现结果。早期的民族志学者证实了遍及全球的人们在种族和文化上的多样性,同时试图使这种多样性与一种关于历史、种族和文明起源的理论相符合。在20世纪民族志学的专业化之前,殖民地的民族志学者促进了一种殖民地的多样化社会形态,只要殖民地的管理机构能够为他们指定领导者,土著就能够留在他们自己的地域。

欧洲的民族志学者研究了非洲、亚洲和其他第三世界有色人种。早期的美国民族志学者从征服者的视角研究了美国印第安人,他们把这种原始的生活世界看作是了解史前时期的窗口。加尔文教徒拯救印第安人的传教工作和活动不久就转变成拯救那些在工业化初期进入美国的移民"游牧部落"的传教工作与活动。对种族他人的定性社区研究从1900年代早期到1960年代急剧增加,这其中包括了富兰克林(E. Franklin),帕克(Robert Park)和里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及他们的学生,还有怀特(William Foot Whyte),林德(Lynd)夫妇,霍林斯海德(Hollingshead),甘斯(Herbert Gans),莱曼(Stanford Lyman),维迪奇(Arthur Vidich),以及本斯曼(Joseph Bensman)的工作。1960年代后期的种族区分研究向帕克和他的同行的"各民族融合"假设提出了挑战,并与那些试图控制分别对他们自己人进行研究的土著美国人、拉丁美洲人、亚裔美国人,以及非裔美国人进行分割的种族研究项目的形成相符合。

在1980年代中期,出现了后现代的和后结构的挑战。它对每一个殖民化时期中组成这一早期历史的假设提出了疑问。维迪奇和莱曼在本书第2章中指出,跨越"后现代分水岭"的定性研究要求我们"抛弃所有已经建立的和事先形成的价值观、理论、视野……以及作为民族志研究资源的偏见"。在这个新的时代中,定性研究者不仅仅是在观察历史,他或她也在其中扮演一定的角色。现在所

① 在这种意义上,所有的研究都是定性的,因为"观察者处于研究过程的中心"(本书第2章)。

描写的是来自这一领域中的新的故事,这些故事将反映出研究者与这一历史时期的直接的和个人的关联。

维迪奇和莱曼的分析遍及民族志历史的全部范围。我们的分析则限制在20世纪和对他们的许多部分进行补充上。我们从早期英国、法国,以及芝加哥、哥伦比亚、哈佛、伯克利和英国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基础性工作开始。这一早期的基础性时期建立了经典的定性研究和民族志研究的规范(Gupta & Ferguson,1997;Rosaldo,1989;Stocking,1989)。

定性研究的七个时期

正如上面所指出的,本世纪在北美的定性研究的历史分为七个阶段,我们在下面逐一对它们进行描述。

传统时期

我们把第一个时期称作传统时期(它涵盖了维迪奇和莱曼的第二和第三个阶段)。这一时期起始于1900年代早期,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这一时期中,定性研究者撰写"客观的"、有关实地经验的殖民化陈述,它所反映的是实证主义科学的范式。在他们的写作中,他们关注的是提供有效度的、可靠的和客观的解释。那些被研究的"他者"则是异族的、外国的、陌生的。

下面是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1967)对他于1914—1915年,以及1917—1918年在新几内亚和特罗布里安德(Trobriand)群岛实地经历的讨论。他用自己的方式交换实地资料:

> 没有任何东西吸引我做民族志的研究……总地来说,村庄给我的印象相当不快。组织的瓦解确定无疑……那些粗暴而又好争吵的人,以及他们持续不断的讥笑、凝视和谎言使我有些气馁……我到村庄希望照几张巴拉(Bara)舞的场景。我将半捆草烟分给大家,然后观看一些舞蹈;然后照相——但结果十分可怜……他们的姿势还没有摆完曝光已经结束了。当时我十分恼怒地看着他们,特别是在我分给他们那一部分草烟后他们却全部走开了(Geertz,1988,pp. 73-74)。

在另一部著作中,这位孤单的、沮丧的、孤立的田野工作者用下列文字来描述他的方法:

> 在实地中,研究者不得不面对一堆混乱的事实……在这种天然的形式中,它们一点也不是科学的事实;它们绝对是难以捉摸的,并且仅仅只能通过解释来将它们集中在一起……只有定律和概括是科学的事实,田野工作只是由那种混乱的社会现实和独有的解释所组成,并从属于一般的规律(Malinowski,1916/1948,p. 328;摘自 Geertz,1988,p. 81)。

马林诺夫斯基的评论是令人沮丧的。一方面,他们贬低田野工作,而另一方面,他们又在具有科学美名的语言范围内谈论它,用定律和概括将这种完全相同的经验塑造成特定的状态。

这一时期中的田野工作者是被奉为名人的,他们被变成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们进入实地,然后带着有关陌生人的故事从实地返回。罗萨尔多(Rosaldo,1989,p.30)将这一时期描述成孤单的民族志学者时期,孤单的民族志学者讲述的是一个男科学家在远方的大陆寻找土著人时去世的故事。在那里,这位人物"遭遇到他所探寻的对象……(并且)通过持久的'田野工作'的极端折磨,最终经历了他的通过仪式"。带着资料回到家里,这位孤单的民族志学者写完了一份有关文化研究的客观说明。这些说明由经典的民族志学的规范所建构。这一神圣的术语束(Rosaldo,1989,p.31)按照四种信念和许诺组成了民族志学的文本:一种对客观主义的许诺,一种带有帝国主义的共谋,一种对纪念主义的信念(民族志学将创造一种像博物馆一样的文化研究图片),以及一种对永恒的信念(所研究的东西将不会改变)。他人是一个将要被存档的"客体"。同样能够写出有关研究内容的复杂的、晦涩难懂的理论的研究者的这种模型一直保持到今天。

孤单的民族志学者的神话描述了经典民族志学的产生。马林诺夫斯基,雷德克利夫—布朗(Radcliffe-Brown),米德(Margaret Mead)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的文本也被仔细地研究过,以便于了解在有关进行田野工作、纪实的笔记,以及写作理论方面,他们能够告诉初学者些什么。今天,这一形象已经被粉碎了。经典民族志学者的工作被许多人看作是殖民时代的遗物(Rosaldo,p.44)。尽管许多人对这一段往事充满怀旧之情,但是,其他人则庆幸这些已成为过去。罗萨尔务引用一位退休的哈佛大学人类学教授杜博伊斯(Cora Du Bois)的话来反映人类学中的这种危机。这位教授在1980年的一次会议上哀叹这一过去:"从复杂性和杂乱状态来看,(我觉得)与我曾经发现的一种无可非议的和充满挑战的学科(有了一段距离)……它已经像是从一个高贵的艺术博物馆变成了一个现场出售旧货的地方。"

杜博伊斯把经典的民族志学看作是保存在博物馆中的永恒的艺术品,而在现场出售旧货的混乱状态中她觉得不自在。相反,罗萨尔多(Rosaldo,1989,p.44)却被这种比喻所吸引:"(现场出售旧货)提供了一种准确的后殖民地情景的形象,在那里,文化的典型产物在不可能的地方之间流动,没有什么是神圣的、永久的和被封锁的东西。人类学作为一种现场出售旧货场所的形象描绘出我们目前的全球化情境。"的确,如果我们愿意长久地、仔细地查找,我们就会在未曾料到的地方发现许多有价值的珍宝。陈旧的标准不再保持。民族志学并不产生出永久的真理。对于客观主义的承诺现在受到怀疑。与帝国主义的共谋在今天是一种公开的挑战,而对于纪念主义的信念则已是一种过去的事情。

这个第一时期的遗产开始于19世纪末,当时,小说和社会科学已经成为明显分离的话语系统(Clough,1992,pp.21-22;Clough,1998)。然而,带着对生活故事和用"如实反映生活一个侧面"的方式来看待民族志学材料的强调,芝加哥学

派正寻求发展出一种保持叙述生活史方式中心性的解释的方法论。这导致了大量文本的生产,在这种文本中,作为写作者的研究者被给予了表达对象故事的权力。这些文本运用普通人的语言,在直截了当的、不带感情色彩的社会现实主义的形式下写作。它们清楚地表达了一种文学的自然主义的社会科学版本,这种版本经常引起对某一社会问题已经找到解决办法的感应的幻想。像大萧条时期青少年犯罪和其他社会问题的电影一样(Roffman & Purdy,1981),这些描述使主题传奇化。它们将不正常的人变成一种社会学版本的银幕英雄。这些社会学的故事,像其电影副本一样,当个人通过经典道德故事的三个阶段,通常有着幸福的结局:先是处于仁慈阶段,然后被魔鬼诱骗并堕落,最后经过苦难而得到救赎。

现代主义的阶段

现代主义的阶段或第二个时期,以规范的工作为基础而与传统时期有所不同。社会现实主义、自然主义,以及如实反映社会生活一个侧面的民族志学者仍然是有价值的。这一阶段从战后那些年一直扩展到1970年代,同时在目前许多工作中仍然有所表现(相关评论见 Wolcott,1990,1992,1995;Tedlock,本书第17章)。在这一时期中,许多文本寻求使定性方法形式化(例如,Bogdan & Taylor,1975;Cicourel,1964;Filstead,1970;Glaser & Strauss,1967;Lofland,1971,1995;Lofland & Lofland,1984,1995;Taylor & Bogdan,1998)①。现代主义的民族志学者与社会学的参与观察者尝试对重要的社会过程,包括在教室背景与社会背景中的越轨与社会控制进行严格的研究。这是一个创造性的酝酿时期。

横跨不同人文学科的一代新的研究生遇到了新的解释性理论(民族方法学、现象学、批判理论、女性主义)。他们被吸引到定性研究的实践中,这种实践将使他们表达社会下层阶级的状况。后实证主义作为一种有影响力的认识论范式发挥着作用。研究者试图使坎贝尔和斯坦利(Campbell & Stanley,1963)的内在效度与外在效度模型适合于有关研究行动的结构主义的和互动主义的概念。他们返回到芝加哥学派的文本中,以此作为灵感的来源(Denzin,1970,1978)。

来自这一时期的一个规范的文本是《穿白大褂的男孩》(*Boys in white*,Becker et al.,1961;Becker,1998)。这一工作坚定地确立了在20世纪中期方法论对话中的地位,它试图使定性研究像与之对应的定量研究一样严格。因果描述是这一研究的中心。这一多种方法的工作将开放式的和半结构的访问与参与观察和对资料的标准化、统计形式的仔细分析结合起来。在一篇题为《参与观察中的推断与证明问题》(*Problem of Inference and Proof in Participant Observation*)的经典论文中,贝克尔(Becker,1958/1970)描述了准统计的运用:

> 参与观察有时候以一种标准化的形式来收集资料,以便于将资料转化成正规的统计数据。但是,实地中的紧急情况常常阻止这种适合统计假定

① 对于这一传统在1980年代的延伸和详尽的细节,可见:Lincoln & Guba,1985;对于最近的发展可见:Taylor & Bogdan,1998;Creswell,1997。

的数据的收集,所以,观察者只得采用一种被称作"准统计"的方法。虽然有这种含蓄的数量化,但他的结论并不要求精确的定量分析(p. 31)。

贝克尔指出,在资料分析中,定性研究者从统计语言中获得了某种提示。研究者为有关某种结论在实际中应用于一种特定情境的可能性或者应用频率的论述寻找概率或支持(Becker,1998,pp. 166-170)。在现代主义的时期,这样的工作为自己披上了实证主义与后实证主义论述的语言和花言巧语的外衣。

这是严格的定性分析的黄金时代,在社会学中,它起始于《穿白大褂的男孩》,结束于《扎根理论的发现》(*Discovery of Grounded Theory*,Glaser & Strauss,1967)。在教育学中,这一时期的定性研究是由乔治(George)和斯平德勒(Louise Spindler),亨里(Jules Henry),沃尔科特(Harry Wolcott)和辛格勒顿(John Singleton)定义的。这种形式的定性研究仍体现在斯特劳斯和考宾(Strauss & Corbin,1998),及瑞安和伯纳德(见本书第29章)这样一些人的工作中。

"黄金时代"增强了定性研究者作为文化传奇人物的形象。受普罗米修斯人权思想的影响,他们把反面角色和外来人视为主流社会的英雄。在自我和社会的不确定性中,他们包含着一种信念,一种"生死为之"的解放的理想。他们适当地表达了有关自我和社会的一种悲剧的并且常常是讽刺的观点,同时把一长串左派文化传奇人物连接起来,其中包括埃默森(Emerson),马克思(Marx),詹姆斯(James),杜威(Dewey),格拉姆西(Gramsci),以及小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Jr.)(West,1989,第6章)。

当这一时期结束时,美国社会中到处呈现的都是越南战争。1969年,紧接着这一政治潮流,布卢默(Herbert Blumer)和休斯(Everett Hughes)在旧金山召开的美国社会学年会上遇见一群被称作"芝加哥非正规军"的年轻的社会学家,分享了他们对"芝加哥年代"的回忆。洛夫兰德(Lofland,1980)这样描述1969年的会见:

> 创造性产生的时刻——学者的与政治的。旧金山的大会不仅见证了布卢默—休斯(Blumer-Hughes)事件,而且见证了一场"反革命"……一群人第一次来到大会……谈论有关作为一个社会学家和一个女性的众多问题……这一学科在字面上似乎将塞满新的……思想:标签理论(labeling theory)、民族志方法学、冲突理论、现象学、拟剧分析(dramaturgical analysis),等等(p. 253)。

这样,现代主义的阶段到此结束。

类型模糊时期

在第三个阶段(1970—1986),也就是我们称之为类型模糊时期开始时,定性研究者在他们的研究中拥有了充分的范式、方法和策略供他们使用。理论的范围从符号互动主义到建构主义、自然主义研究、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现象学、民族志方法学、批判理论、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符号语言学、结构主义、女性主义,以及各种种族的/人种的范式。应用的定性研究获得了一定地位,同时,在定性

研究的各种应用中,包含于其内的政治和伦理也成为了值得关注的主题。研究的策略和报告研究结果的形式也广泛变化,从扎根理论到个案研究,到历史学的、传记的、民族志的、行动主义的,以及临床的研究方法。收集和分析经验资料的各种不同的方式都是可用的,这些方式包括定性访问(开放式的和半结构的)和观察的、视觉的、个人经历的,以及文献的方法。伴随着叙述的、内容的、符号语言学的方法在阅读访问和文化文本中的运用,计算机也进入这一领域,并在下一个十年中充分发展成为定性资料分析的助手。

格尔茨(Geertz)所撰写的两部著作,《文化的解释》(*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1973)和《本土知识》(*Local Knowledge*,1983),划定了这一时期的开始和结束。在这两部著作中,格尔茨认为,旧的功能主义的、实证主义的、行为主义的对人文学科的总结方式已经让位于更为多元的、解释性的、开放的视野。这种新的视野将文化的表征及其含义作为它的出发点。格尔茨号召对特定事件、仪式和习俗做"丰富的描述",并提出所有的人类学写作都是对解释的说明①。在所写出的解释中,观察者没有特殊的发言权。理论的中心任务是从本土的情境中理解其意义。

格尔茨继续建议说,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之间的边界已经变得模糊了。社会科学现在转向人文学科寻求模型、理论和分析方法(符号语言学、解释学)。出现了一种特定类型的传播形式:读起来像小说一样的文献(Mailer),装成民族志模样的寓言(Castaneda),看起来像旅行见闻一样的理论论述(Levi-Strauss)。与此同时,也产生了其他一些新的方式:后结构主义(Barthes)、新实证主义(Philips)、新马克思主义(Althusser)、微观—宏观描述主义(Geertz)、戏剧的和文化的仪式理论(V. Turner)、解构主义(Derrida)、民族志方法学(Garfinkel)。社会科学的黄金时代结束了,一个新的、模糊的、解释性类型的时代来到了我们面前。像艺术品一样的随笔取代了科学的论文。现在所争论的焦点是作者在解释性文本中出现的问题(Geertz,1988)。研究者如何在这样一个不再有关于文本的确定的规则,包括作者在其中的位置,它的评价标准,以及它的主题的时代,以权威的方式来发言?

自然主义的、后实证主义的和建构主义的范式在这一时期中获得了权力,特别是在教育学,在沃尔科特(Harry Wolcott)、埃里克森(Frederick Erickson)、格萨(Egon Gusa)、林肯(Yvonna Lincoln)、斯泰克(Robert Stake),以及艾斯纳(Elliot Eisner)的著作中。到1970年代末,出现了几本定性研究的期刊,包括《文化与城市生活》(*Urban Life and Culture*),也即现在的《当代民族志学杂志》(*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文化人类学》(*Culture Anthropology*),《人类学与教育学季刊》(*Anthropology and Education Quartery*),《定性社会学》(*Qualitative Sociology*)和《符号互动》(*Symbolic Interaction*),以及"符号互动研究"(*Studies in Symbolic Interaction*)系列丛书。

---

① 对于格尔茨带给深度描述这一术语的许多含义和实践,格林布莱特(Greenblatt,1997,pp. 15-18)提供了一个有用的解构的阅读。

表述的危机

一场意义深远的决裂出现在1980年代的中期。那个被我们称作第四个时期，或者表述的危机时期的年代，与《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Anthropology as Cultural Critique*,Marcus & Fischer,1986),《经历的人类学》(*The Anthropology of Experience*,Turner & Bruner,1986),《书写文化》(*Writing Culture*,Clifford & Marcus,1986),《工作与生活》(*Works and Lives*,Geertz,1988)以及《文化的困境》(*The Predicament of Culture*,Clifford,1988)一起出现了。这些著作将研究和写作变成更加反身的，并且呼吁将有关性别、阶级和种族的争论作为研究的问题。他们清楚地表达了格尔茨关于1980年代早期这一领域中"模糊类型"解释的结果①。

人们在寻求有关真理、方法和表达的新模式(Rosaldo,1989),人类学中的经典规范(客观主义、与殖民主义的共谋、由固定的仪式和习俗所建构的社会生活、民族志作为一种文化的纪念碑)的侵蚀已经完成(Rosaldo,1989,pp. 44-45;Jackson,1998,pp. 7-8)。在这一舞台上，批判的、女性主义的和有色的认识论争相吸引人们的注意力。诸如效度、信度以及客观性这样一些以前被认为是已经澄清的争论再一次成为问题。与因果的、线性的理论相反，典型的和解释性的理论作为作者向旧的真理和意义模式的不断挑战，现在更加常见(Rosaldo,1989)。

斯托勒和奥尔克斯(Stoller & Olkes,1987,pp. 227-229)描述了他们在尼日尔的桑海(Songhay)部族的田野工作中是如何感觉到这种表述的危机的。斯托勒观察到:"当我开始写作人类学的文本时，我遵循着长期训练养成的习惯，我'收集资料',一旦'资料'被排成整齐的一叠时，我'就将它们写好'。在这种情况下，我将桑海部族的侮辱性行为简化为一系列整齐的逻辑公式。"斯托勒慢慢地不喜欢这种写作的形式，这部分是由于他了解到"每个人都对我说了谎……我这么辛苦地收集的资料都是无价值的。现实给我上了一课:被访者例行公事地对人类学家说谎"(Stoller & Olkes,1987,p.9)。这一发现又引出了第二个发现——遵循着民族志现实主义的习惯，他将自己从文本中删除。这使得斯托勒产生出一种不同的文本类型，一种传记，在这种文本类型中，他成为了他所讲的故事的中心人物。这种故事，也就是他在桑海部族中的经历的描述，成为一种在他自己的世界与桑海部族巫术的世界之间的战斗。因此，斯托勒的旅程代表了一种对抗第四个时期中的表述危机的尝试。

克拉夫(Clough,1992)详细阐述了这种危机，同时对那些认为新的写作形式代表了摆脱危机的一种方式的人进行了批评。她指出:

> 当许多社会学家对民族志学把写作看作"民族志研究计划的中心"(Van Maanen,1988,p. xi)的批评进行评论时，写作的问题仍然是与方法或田野工作本身所不同的问题。因此，通常所提供的解决办法只是写作的实

① 这些著作忽视了在这种对话中女性主义的理论观点和研究的贡献，并将其最小化(Behar,1995,p. 3;Gordon,1995,p.432)。

验,即一种有关写作的自我意识(p. 136)。

应该分析的正是这种关于写作与田野工作之间差别的主张(在本书的第36章中,里查德森相当清楚地对这一问题进行了阐述)。

在写作中,实地研究者对道德的和科学的权威提出了要求。这种要求使得现实主义的和实验的民族志文本起到了经验科学有效性的来源的作用。它们表明,只要是在作者的记忆里,或者在虚构的实验中,或者在戏剧性的读物中,真实的有经验生命的世界仍然是可以捕获到的。但是,这些著作具有将人们的注意力从某种方式上引开的危险,在这种方式中,文本从性别的角度在具有社会差别的领域中建构地位不同的个体。它们也使"经验科学的霸权"永存(1992,p. 8),因为这些新的主体写作技术成为"生产知识/权力……与……资本/地位这一中轴的支点"(Aronowitz,1988,p. 300;引自:Clough,1992,p. 8)。这样的实验遭遇到——后来又撤离出——经验科学与社会批判主义的差别问题。它们经常在充分使用一种"拒绝经验科学特征"(Clough,1992,p. 135)的新的文本政治中遭到失败。这种新的社会批判主义"将干预信息经济学、单一民族国家政治,以及大众传播技术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以一种经验科学的方式进行干预"(Clough,1992,p. 16)。当然,这是由文化研究所占据的领域。

在本书中,里查德森(第36章)、泰德洛克(第17章)、布莱迪(第37章)、埃利斯和博克纳(第28章)发展了上述观点,他们把写作看作一种通过连续自我反省阶段的研究方法。作为一连串的写作表达,实地研究者的文本出自实地的经历,通过中间的工作,到后来的工作,最后成为研究文本。这种文本是民族志的和叙述的经历的公共展示,因此,田野工作和写作相互之间的界限变得不清楚。在最后的分析中,写作与田野工作之间也不存在任何差别。这样的两种视野互相渗透,贯穿本书的每一章。在这些方式中,表述的危机把定性研究转向新的、批判的方向。

三个方面的危机

今天,民族志学者的权威在攻击之下依然保存(Behar,1995,p. 3;Gupta & Ferguson,1997,p. 16;Jackson,1998;Ortner,1997,p. 2)。在人文学科中,定性研究者遭遇到表述、合法化以及惯例三个方面的危机。嵌于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对话中(见本书第2章、第36章),这三方面的危机被贴上了多种不同的标签,被以不同的方式称呼,并与社会理论中批判的、解释的、语言学的、女性主义的以及修辞学的转向相伴随。这些新的转向使得定性研究的两个关键假设具有一定的问题。第一个是定性研究者不再能够直接地捕获鲜活的经验。这样的经验被认为是由研究者在社会文本的写作中创造的。这就是表述的危机。它遭遇到不可避免的表述的问题,但是,就是在一种直接将经验与有问题的文本链接起来的框架中也是如此。

第二个假设使得评价与解释定性研究的传统标准成为问题。这就是合法化危机。它包括一种对诸如效度、概括性、信度这样的术语的严肃的再思考,这些

术语已经在后实证主义(Hammersley,1992)、建构主义—自然主义(Guba & Linchon,1989,pp.163-183)、女性主义(Olesen,本书第8章)、解释主义(Denzin,1997)、后结构主义(Lather,1993;Lather & Smithies,1997)以及批判主义(Kincheloe & McLaren,本书第10章)的对话中再理论化。这一危机提出的疑问是,在当代的、后结构主义的时期中,如何来评价定性研究?这前两个危机又形成了第三个危机,这一危机提出的问题是,如果社会仅仅只是或者始终只是一种文本,那么,影响世界的变迁是可能的吗?显然,这些危机相互交叉和影响,对于它们所产生的各种问题的回答也是如此(见本书第7章、第9章、第34章)。

第五个时期,即以实验的民族志写作为特征的后现代时期,在为理解这些危机而努力。人们在探讨构成民族志的新的方式(Ellis & Bochner,1996)。理论像来自田野的故事一样被阅读。作者努力地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他人",尽管他们现在由于对新的表述的关注而将这些方式结合起来(本书第4章)。一些以前沉默不语的认识论者开始为这些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冷漠超然的观察者的概念已经被抛弃。更为主动的、参与式的,以及行动导向的研究开始出现。对宏大的叙述的寻求已经被更为本土的、适合特定问题和特定情境的小规模理论所取代。

第六个时期(后实验的)和第七个时期(未来时期)来到了我们面前。小说式的民族志、民族志的诗作,以及多媒介文本在今天是被认可的。后实验主义的作者们希望将他们的作品与一种自由民主社会的需要相结合。一大群来自于多种不同学科的新作者积极地探索一种道德的和神圣的定性社会科学的要求(Jackson,1998;本书第6章)。

阅读历史

从这一简要的历史中,注意,像所有的历史一样,它是有些武断的,我们得出四个结论。第一,每一个较早的历史时期在目前仍然有其影响,或是作为遗产,或是作为研究者继续遵循的或者反对的一套实践。现在,这一多元的、断裂的定性研究历史可以使任何特定的研究者将一个研究项目与上面所描述的任何一个历史时期中的一种规范的文本联系起来。这一领域中多元的评价标准为吸引人们的关注而相互竞争(Lincoln,待出版)。第二,定性研究的领域目前表现出一种选择的困窘特征。从来没有这么多的研究范式和研究策略,也没有这么多的分析方法供研究者利用和使用。第三,伴随着新的考察方式、解释方式、争论方式以及写作方式的相互辩论和对话,我们处在一个发现和再发现的时期。第四,定性研究行动不再被放在一种中立的或客观的实证主义视野内来看待。阶级、种族、性别以及民族性影响着研究的过程,使得研究成为一种多文化的过程。现在我们转到这一问题上来。

作为过程的定性研究

三种内在相连的、不同类型的活动定义了定性研究的过程。它们可以依照

不同的标签来判断,这些标签包括理论、方法、分析、本体论、认识论以及方法论。在这些术语背后,有着研究者个人的经历,研究者是从一种特定的阶级、性别、种族、文化以及种族社区的视角来说话的。这种具有性别的、多文化特征的研究者带着一套观念,一种说明他或她用特定的方式(方法论,分析)考察的一组问题(认识论)的参考框架(理论,本体论)来接近世界。这即是说,研究者收集与问题相关的经验的材料,然后分析它们,并撰写有关它们的结论。每一个研究者都在一个明确的解释性社区的范围内发言,这一解释性社区以其特定的方式,为研究行动配置多文化的、性别化的成分。

在本书中,我们在五个标题下,或者说从五个阶段,来论述这些不同类型的活动:研究者与作为多元文化对象的被研究者;主要的范式和解释性视角;研究策略;收集与分析经验资料的方法;解释的艺术、实践与政治。在这些阶段的每一个内以及在每一个阶段的背后,都有一些对研究者的传记般的说明。这些个体从一个解释性社区的内部进入这一研究过程。这一社区具有它自己的历史传统,它制定了一种明确的观点。这一视角引导着研究者采用特定的观点来看待他们所研究的"他人"。同时,还必须考虑研究的政治与伦理,因为这些考虑渗透在这一研究过程的每一个阶段。

作为研究对象的他人

自从解释性形式在20世纪早期的现代社会中产生以来,定性研究就一直受到一个双面幽灵的折磨。一方面,定性研究者认为,合格的、有能力的观察者能够客观地、清楚地、精确地报告他们自己对社会世界的观察,包括对他人经历的观察。另一方面,研究者坚信,现实世界中所存在的一个真实的对象,或一个真实的个体,能够以某种形式报告他的或她的经历。在这样两种条件下,研究者可能将他们自己的观察与通过访问、生活史、个人经历、个案研究以及其他文献所得到的研究对象的自我报告掺合在一起。

这两种信念导致定性研究者穿越不同的学科去寻求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将允许他们准确地记录他们自己的观察,同时也能发现他们的研究对象赋予其生活经历中的含义。这种方法将依赖于个人对所研究的个体给出的意义的口头和书面的表达,这种表达作为了解这些个体内在生活的窗口。从狄尔泰(Dilthey,1900/1976)开始,这种对方法的寻求在人文学科中导致了一种对定性的、解释性方法的长期关注。

最近,正如上面所提到的,这种前提及其信念开始受到攻击。后结构主义者与后现代主义者在帮助我们理解不存在了解个体内在生活的清楚的窗口方面作出了贡献。任何注视总是经过了语言、性别、社会阶级、种族以及民族的透镜过滤的。不存在客观地观察,在观察者与被观察者的世界中,以及在二者之间,只有处于社会场景定位中的观察。对象或者个体,对他们的行为或者动机很少能

够给出充分的解释;他们所能够提供的只是关于他们是如何做的以及为什么做的说明或者故事。没有一种单独的方法能够抓住正在发生的人类经历中的所有微妙变化。因此,定性研究者发展出具有适应性的内在相连的解释性方法,总是寻求用更好的方式来增强他们对所研究的经验世界的理解。

表1.1描述了在定性研究过程的五个阶段中我们所看到的联系。除了一个阶段外,在所有这些阶段背后都有一些对研究者的传记般的说明。这五种活动或者实践的水平通过研究者的传记在向前发展。我们这里按顺序将它们简要列出,并在本书导论中的这一部分更充分地讨论这些阶段。

第一阶段:研究者

我们的上述评论指出了传统的和应用的定性研究视野的深度和复杂性,一种社会场境定位中的研究者进入到这种视野中。这些传统将研究者置于历史中,同时指引并限制着任何一项特定研究中所要完成的工作。这一领域一直具有差异与冲突的特征,同时,这些特征也是其最持久的传统(本书第3章)。作为这一复杂的和矛盾的历史的承载者,研究者也必须面对研究的伦理与政治(本书第5章)。人文学科中价值无涉的研究时代结束了(本书第2章、第4章)。今天,研究者们努力发展出具有语境含义的和超语境含义的伦理,以应用于所有形式的研究行为及其人与人的关系。

第二阶段:解释性范式

在"所有的人类都受着高度抽象的原理的指导这一普遍意义上"(Bateson, 1972, p. 320),所有的定性研究者都是哲学家。这些原理将有关本体论(人类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物?现实的本性是什么?)、认识论(探索者与认识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和方法论(我们如何才能了解世界?或者如何才能获得有关世界的知识?)的信念结合在一起(Guba, 1990, p. 18; Lincoln & Guba, 1985, pp. 14-15;本书第7章)。这些信念形成了定性研究者如何看待世界的方式,以及他们在这种世界中的行动。研究者"被限制在一个认识论的和存在论的前提网络之内,这些前提——不管最终的真实或虚假——在某种程度上是自我确认的"(Bateson, 1972, p. 314)。

包含研究者的认识论、本体论和方法论前提的网络可以称作是一种范式,或者一种解释框架,一组"基本的指导行动的信念"(Guba, 1990, p. 17)。所有的研究都是解释性的,它受着一组有关世界和应该如何理解与研究世界的信念和感觉的指导。某些信念被认为是已承认的、无形的、唯一假定的,而另一些则是有很大问题的和有很大争议的。每一种解释性范式对研究者都提出了特定的要求,包括他或者她所提出的问题,以及研究者对这些问题所作出的解释。

表 1.1 研究过程

第一阶段:作为多元文化对象的研究者
历史与研究传统
自我与他人的概念
研究的伦理与政治
第二阶段:理论范式与视野
实证主义、后实证主义
解释主义、建构主义、诠释学
女性主义
种族化叙述
批判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模式
文化研究模式
酷儿理论
第三阶段:研究策略
研究设计
个案研究
民族志、参与观察、表演民族志
现象学、民族方法学
扎根理论
生活史、证据学
历史方法
行动研究与应用研究
临床研究
第四阶段:收集与分析资料的方法
访谈
观察
人文产物、文献与记录
视觉方法
自我民族志
数据管理方法
计算机辅助分析
文本分析
焦点小组
应用民族志
第五阶段:解释与表达的艺术、实践和政治
判断合适性的标准
解释的实践与政治
作为解释的写作
政策分析
评价传统
应用研究

在最一般性的水平上,四种主要的解释性范式构成了定性研究:实证的与后实证的、建构—解释的、批判的(马克思主义的、解放的),以及女性主义—后结构的。这四种抽象的范式在特定解释性社区的具体层次上则是更为复杂的。在这种层次上,它可能不仅被看作是建构主义范式的,而且也是多种不同的女性主义的(非洲中心的和后结构主义的)①,以及特定种族的、马克思主义的和文化研究的范式。这些视野或者说范式,将在本书第Ⅱ部分中讨论。

第Ⅱ部分中所考察的范式在与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模式相反的和相同的(有些是在这些模式内)方向发挥作用。它们都在相对主义本体论(多元建构的现实)、解释性认识论(认知者与认知对象相互作用且相互影响)以及解释性的、自然主义的方法的范围内起作用。

表1.2展示了这些范式以及它们的假定,包括它们评价研究的标准,以及每一种范式所采取的解释性或者理论性陈述的典型形式②。在第Ⅱ部分中,对这些范式进行了相当详细的探讨。上面我们已经讨论了实证主义的和后实证主义的范式。它们在一种唯实论的和批判的唯实论的本体论与客观主义认识论的范围内,依赖于实验的、准实验的、调查的以及严格定义的定性方法论来发挥作用。第29章发展了这一范式的基本要素。

建构主义的范式假定一种相对主义的本体论(存在着多元的现实),一种主观主义的认识论(认知者与对象共同创造理解),以及一套自然主义的(在自然的世界中)方法论程序。它通常按照扎根理论的或原型理论(pattern theories)的标准来表达研究发现(本书第6章、第19章、第29章)。诸如可信性(credibility)、可转移性(transferability)、可靠性(dependability)和可确定性(confirmability)这样一些术语则取代了内在效度、外在效度、信度和客观性等常用的实证主义标准。

女性主义的、种族的、马克思主义的以及文化研究的和酷儿理论的模式给予唯物主义的—唯实论的本体论以特权。这即是说,现实世界在种族、阶级和性别方面存在着重要的差异。民族志学者通常也使用主观主义的认识论和自然主义的方法论。经验的素材与理论的论证是以它们是否有助于解放的方式来评价的。所应用的可能是来自于性别和种族社区(例如非裔美国人)的标准(情绪性和感觉、有同情心的、个人的责任、对话)。

后结构主义的女性主义理论强调与社会文本、它的逻辑以及它的缺陷相关的问题,这种社会文本曾经充分地表达了具有鲜活经验的世界。实证主义与后实证主义的评价标准被其他一些术语,包括反身性、多声音文本所取代,这些文本扎根于受压迫的人们的经历中。

文化研究和酷儿理论范式是多元聚焦的,同时带有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以及后现代敏感性中抽取出来的多种不同的内容(本书第11章、第12章、第36章)。在一种人文主义的文化研究与一种更为结构化的文化研究项目之间,存在

---

① 奥利森(Olesen,本书第8章)确认了女性主义研究的三种趋势:主流是经验的、立场与文化研究,以及后结构的、后现代性。她将非洲中心模式和其他有色模式置于文化研究与后现代性的范畴下。

② 当然,这些是我们对这些范式和解释风格的解释。

着一种张力。前者强调鲜活的经验(含义),后者强调结构和物质的决定性(种族、阶级、性别)及其经验的效果。当然,任何事物都有两面,这两面都是必需的,并且也的确都是批判的。文化研究和酷儿理论范式战略性地运用方法——即将其作为理解的手段,作为产生出对地方统治结构的阻力的手段。学者们可能进行封闭的原文阅读和文化文本的谈话分析(本书第 8 章、第 11 章、第 31 章),也可能进行本土的民族志、开放式访谈和参与观察。其焦点是关于种族、阶级和性别是如何产生的,以及在历史的特定情境中扮演什么角色。

掌握了范式和个人历史,将焦点集中到一个待考察的具体经验问题上,研究者现在就可以转到研究过程的下一个阶段——即考虑研究的一种特定策略。

第三阶段:研究的策略与解释性范式

表 1.1 展示了一个研究者可以运用的某些主要的研究策略。第三阶段从研究设计开始。普遍认为,研究设计包括清楚地聚焦于研究的问题、研究的目的,"什么样的资料对于回答特定的研究问题来说是最合适的,以及什么样的策略对于获得这样的资料是最有效的"(LeCompte & Preissle,1993,p. 30;本书第 13 章、第 14 章)。一个研究设计描述了一组灵活的指导方针,这组指导方针首先将理论范式与研究策略相连接,其次将它与收集经验材料的方法相连接。研究设计将研究者置身于经验的世界中,同时将他们与特定的场景、个人、群体、机构以及所有相关的解释性材料,包括文献和档案相连接。研究设计也详细说明研究者将如何处理表述与合法化这两个重要的问题。

研究的策略由研究者在从范式到经验世界的过程中所使用的大量的技巧、假定和实践所组成。研究策略使解释的范式开始运转。同时,研究策略也使研究者与收集和分析经验资料的特定方法连接起来。例如,个案研究依赖于访问、观察和文献分析。研究策略在特定的经验场所,或在特定的方法论实践中来实施和依靠范式,比如在将一个个案作为研究的对象的实践中。这些策略包括个案研究、现象学的和民族方法学的技术,还有扎根理论的运用,以及传记的、自我民族志的、历史的、行动的和临床的方法。这些策略中的每一种都与一批复杂的文献相连接,每一种都具有一个单独的历史、典型的成果,以及使策略运转的首选的方式。

表1.2 解释性范式

范式/理论	标　准	理论的形式	叙述的类型
实证主义的/后实证主义的	内在效度、外在效度	逻辑—演绎的、扎根的	科学的报告
建构主义的	确实性、可信性、可转移性、可确定性	主观的—形式的	解释性的个案研究、民族志小说
女性主义的	非洲中心的、鲜活的经验、对话、有同情心的、有责任的、种族、阶级、性别、反身性、惯例、情感、具体场所	批判的、立场	散文、故事、实验性的写作
种族的	非洲中心的、鲜活的经验、对话、有同情心的、有责任的、种族、阶级、性别	立场、批判的、历史的	散文、神话、戏剧
马克思主义的	解放的理论、可虚构的、对话的、种族、阶级、性别	批判的、历史的、经济的	历史的、经济的、社会文化的分析
文化研究	文化的实践、惯例、社会文本、主观性	社会批判主义	作为批判主义的文化理论
酷儿理论	反身性、解构	社会批判主义、历史分析	作为批判主义的理论、自我的民族志

第四阶段:收集与分析经验材料的方法

研究者有好几种收集经验材料的方法①。这些方法将在第Ⅳ部分中介绍。它们的范围从访问到直接观察,以及人工制品、文献、文化记录分析和运用视觉材料或个人经历。研究者也可以运用多种不同的阅读与分析访谈资料或文化文本的方法,这些方法包括内容分析、叙事分析以及符号语言分析策略。面对大量的定性材料,研究者寻求管理和表达这些文献的方式,这时可以运用数据管理方法以及计算机辅助分析模型。瑞安和伯纳德(本书第29章)以及维茨曼(本书第30章)讨论了这些技术。

① 对于传统上被描述为数据的资料来说,首选的术语是经验材料。

第五阶段:解释与评价的艺术和政治

定性研究不断地创造和解释。研究者不是仅仅带着小山般的经验资料离开实地,然后轻易地写出他的或她的研究发现。定性的解释是建构出来的。研究者首先创造出一个由田野笔记和来自田野的其他文献所组成的实地文本,这就是罗格(Roger Sanjek,1990,p. 386)所说的"标定指数"(indexing)以及普拉斯(Plath,1990,p. 374)所说的"田野工作"。作为解释者的作者从这一文本出发到达一种研究的文本:基于实地文本的注释和解释。然后,这一文本又再次被创造成为一种初步的解释性文件,这一初步的解释性文件中包含着作者最初的理解他所了解到的情况的试图。最后,作者写出了面向读者的公共的文本。来自田野的这一最终的叙述可以采取多种不同的形式:忏悔的、现实主义的、印象派的、批判的、常规形式的、文学的、分析的、扎根理论的,等等(Van Maamen,1988)。

理解某人发现的解释性实践既是艺术的又是政治的。现在存在多种评价定性研究的标准,我们看重的是那些强调置于情景的、相互联系的标准,以及民族志经历的原文结构。不存在单一的解释性真理。正如我们前面所指出的,存在着多种解释性社区,在每一个社区中都有着他们自己的评价和解释的标准。

项目评价是定性研究的一个主要的应用场所,定性研究者可以以一种重要的方式影响社会决策。由格林伍德和列文(第3章)、凯米斯和麦克塔格特(第22章)、米勒和克拉布特里(第23章)、钱伯斯(第33章)、格里尼(第38章)和里斯特(第39章)撰写的文章回顾并讨论了应用性定性研究在社会科学中的丰富历史。将理论、方法、实践、行动以及政策聚集在一起。定性研究者能够分离出目标人口,表明某种项目对某些群体所形成的直接影响,同时也能够将这种背景中反对政策变化的活动的限制分离出来。行动导向的与临床导向的定性研究者也能够为那些被研究的"他人"创造出说话的空间。评价者则成为人们听到这种声音的渠道。钱伯斯、格里尼和里斯特在他们所撰写的章节中明确地阐明了这些主题。

架起连接不同历史时期的桥梁:接下来的将是什么

埃利斯和布克纳(第28章)、格杰双氏(第40章),以及里查德森(第36章)认为,我们已经处在后"后"(post)时期——后一后结构主义、后一后现代主义、后一后实验主义。虽然这对于解释性的民族志实践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还不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事物将再也不会与以前相同。我们正处在一个新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凌乱的、不确定的、多声音的文本,文化的批判主义,以及新的实验工作将变得更为普通。同样的,田野工作、分析以及原文之间表达的形式也更为灵活。我们将本书的这第五、第六和第七个时期作为我们最后评论的主题。确实,正如诗人所说,中心不再被把握。我们能够思考的是新的中心应该包括

什么。

这样,我们又回到原地。回到我们的桥梁比喻上来,后续的章节带着研究者往返于研究行动的每一个阶段。像一座好的桥梁那样,各章提供了双向的交通,来往于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形式以及不同的解释性社区。每一章分别考察了相关的历史、论战以及与各种范式、策略和方法相伴随的目前的实践。每一章中也提供了对未来的估计,即从现在起到未来十年,乃至21世纪更远的年代中所将出现的特定的范式、策略和方法。

在阅读后续章节时,十分重要的一点是要记住,定性研究的领域是由一系列的张力、矛盾和踌躇来定义的。这种张力在广泛的、令人怀疑的后现代敏感性与这一项目的更传统的实证主义、后实证主义以及自然主义的概念之间往返。后续的所有章节都是在这种张力中来描述和表达的。

参考文献

Aronowitz, S. (1988). *Science as power: Discourse and ideology in modern societ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Bateson, G. (1972). *Steps to an ecology of mind.* New York: Ballantine.

Becker, H. S. (1970). Problems of inference and proof in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In H. S. Becker, *Sociological work: Method and substance.* Chicago: Aldine. (Reprinted from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58, 23, 652-660)

Becker, H. S. (1986). *Doing things together.*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Becker, H. S. (1996). The epistemology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R. Jessor, A. Colby, & R. A. Shweder (Eds.), *Ethnography and human development: Context and meaning in social inquiry* (pp. 53-71).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Becker, H. S. (1998). *Tricks of the trade: How to think about your research while you're doing i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Becker, H. S., Geer, B., Hughes, E. C., & Strauss, A. L. (1961). *Boys in white: Student culture in medical school.*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Behar, R. (1995). Introduction: Out of exile. In R. Behar & D. A. Gordon (Eds.), *Women writing culture* (pp. 1-29).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ogdan, R. C., & Taylor, S. J. (1975). *Introduction to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A phenomenological approach to the social sciences.* New York: John Wiley.

Campbell, D. T., & Stanley, J. C. (1963). *Experimental and quasi-experimental designs for research.* Chicago: Rand McNally.

Carey, J. W. (1989). *Communication as culture: Essays on media and society.* Boston: Unwin Hyman.

Cicourel, A. V. (1964). *Method and measurement in sociology.* New York: Free Press.

Clifford, J. (1988). *The predicament of culture: Twentieth-century ethnography, literature, and ar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lifford, J., & Marcus, G. E. (Eds.). (1986). *Writing cultur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Clough, P. T. (1992). *The end(s) of ethnography: From realism to social criticism.* Newbury Park, CA: Sage.

Clough, P. T. (1998). *The end(s) of ethnography: From realism to social criticism* (2nd ed.). New York: Peter Lang.

Cook, D. A. (1981). *A history of narrative film.* New York: W. W. Norton.

Creswell, J. W. (1997). *Qualitative inquiry and research design: Choosing among five traditions.* Thousand Oaks, CA: Sage.

Denzin, N. K. (1970). *The research act.* Chicago: Aldine.

Denzin, N. K. (1978). *The research act* (2nd ed.). New York: McGraw-Hill.

Denzin, N. K. (1997). *Interpretive ethnography.* Thousand Oaks, CA: Sage.

Dilthey, W. L. (1976). *Selected writing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00)

Diversi, M. (1998). Glimpses of street life: Representing lived experience through short stories. *Qualitative Inquiry*, 4, 131-137.

Ellis, C., & Bochner, A. P. (Eds.). (1996). *Composing ethnography: Alternative forms of qualitative writing.* Walnut Creek, CA: AltaMira.

Filstead, W. J. (Ed.). (1970). *Qualitative methodology.* Chicago: Markham.

Flick, U. (1998). *An introduction to qualitative research: Theory, method and applications.* London: Sage.

Geertz, C. (1973).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Selected essays.* New York: Basic Books.

Geertz, C. (1983). *Local knowledge: Further essays in interpretive anthropology.* New York: Basic Books.

Geertz, C. (1988). *Works and lives: The anthropologist as author.*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Glaser, B. G. (1992). *Emergence vs. forcing: Basics of grounded theory.* Mill Valley, CA: Sociology Press.

Glaser, B. G., & Strauss, A. L. (1967). *The discovery of grounded theory: Strategies for qualitative research.* Chicago: Aldine.

Gordon, D. A. (1995). Culture writing women: Inscribing feminist anthropology. In R. Behar & D. A. Gordon (Eds.), *Women writing culture* (pp. 429-441).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Gordon, D. A. (1988). Writing culture, writing feminism: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xperimental ethnography. *Inscriptions*, 3/4 (8), 21-31.

Greenblatt, S. (1997). The touch of the real. In S. B. Ortner (Ed.), The fate of "culture": Geertz and beyond [Special issue]. *Representations*, 59, 14-29.

Guba, E. G. (1990). The alternative paradigm dialog. In E. G. Guba (Ed.), *The paradigm dialog* (pp. 17-30). Newbury Park, CA: Sage.

Guba, E. G., & Lincoln, Y. S. (1989). *Fourth generation evaluation.* Newbury Park, CA: Sage.

Gupta, A., & Ferguson, J. (1997). Discipline and practice: "The field" as site, method, and location in anthropology. In A. Gupta & J. Ferguson (Eds.), *Anthropological locations: Boundaries and grounds of a field science* (pp. 1-46).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Hammersley, M. (1992). *What's wrong with ethnography? Methodological explorations.* London: Routledge.

Hammersley, M. (in press). Not bricolage but boatbuilding.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hooks, b. (1990). *Yearning: Race, gender, and cultural politics.* Boston: South End.

Huber, J. (1995). Centennial essay: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s on sociolog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1, 194-216.

Jackson, M. (1998). *Minima ethnographica: Intersubjectivity and the anthropological projec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Jameson, F. (1991).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Jones, S. H. (1999). Torch. *Qualitative Inquiry*, 5, 235-250.

Keller, C. M., & Keller, J. D. (1996). *Cognition and tool use: The blacksmith at work.*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ather, P. (1993). Fertile obsession: Validity after poststructuralism. *Sociological Quarterly*, 35, 673-694.

Lather, P., & Smithies, C. (1997). *Troubling the angels: Women living with HIV/AIDS.* Boulder, CO: Westview.

LeCompte, M. D., & Preissle, J. (with Tesch,

R.). (1993). *Ethnography and qualitative design in educational research* (2nd ed.).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Lévi-Strauss, C. (1966). *The savage mind* (2nd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Lincoln, Y. S. (1999, June). *Courage, vulnerability and truth.* Keynote address delivered at the conference "Reclaiming Voice Ⅱ: Ethnographic Inquiry and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a Postmodern Ag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

Lincoln, Y. S. (in press). Varieties of validity: Quality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J. S. Smart & C. Ethington (Eds.), *Higher education: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New York: Agathon Press.

Lincoln, Y. S., & Guba, E. G. (1985). *Naturalistic inquiry.* Beverly Hills, CA: Sage.

Lofland, J. (1971). *Analyzing social settings.* Belmont, CA: Wadsworth.

Lofland, J. (1995). Analytic ethnography: Features, failings, and future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24, 30-67.

Lofland, J., & Lofland, L. H. (1984). *Analyzing social settings: A guide to qualitative observation and analysis* (2nd ed.). Belmont, CA: Wadsworth.

Lofland, J., & Lofland, L. H. (1995). *Analyzing social settings: A guide to qualitative observation and analysis* (3rd ed.). Belmont, CA: Wadsworth.

Lofland, L. (1980). The 1969 Blumer-Hughes Talk. *Urban Life and Culture*, 8, 248-260.

Malinowski, B. (1948). *Magic, science and religion,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Natural History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16)

Malinowski, B. (1967). *A diary in the strict sense of the term* (N. Guterman, Tran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Marcus, G. E., & Fischer, M. M. J. (1986). *Anthropology as cultural critique: An experimental moment in the human scienc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Monaco, J. (1981). *How to read a film: The art, technology, language, history and theory of film* (Rev. e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lson, C., Treichler, P. A., & Grossberg, L. (1992). Cultural studies: An introduction. In L. Grossberg, C. Nelson, & P. A. Treichler (Eds.), *Cultural studies* (pp. 1-16). New York: Routledge.

Ortner, S. B. (1997). Introduction. In S. B. Ortner (Ed.), The fate of "culture": Geertz and beyond [Special issue]. *Representations*, 59, 1-13.

Plath, D. W. (1990). Fieldnotes, filed notes, and the conferring of note. In R. Sanjek (Ed.), *Fieldnotes: The makings of anthropology* (pp. 371-384).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Richardson, L. (1997). *Fields of play: Constructing an academic life.*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Roffman, P., & Purdy, J. (1981). *The Hollywood social problem fil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Ronai, C. R. (1998). Sketching with Derrida: An ethnography of a researcher/erotic dancer. *Qualitative Inquiry*, 4, 405-420.

Rosaldo, R. (1989). *Culture and truth: The remaking of social analysis.* Boston: Beacon.

Sanjek, R. (Ed.). (1990). *Fieldnotes: The makings of anthropolog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Schwandt, T. A. (1997a). *Qualitative inquiry: A dictionary of terms.* Thousand Oaks, CA: Sage.

Schwandt, T. A. (1997b). Textual gymnastics, ethics and angst. In W. G. Tierney & Y. S. Lincoln (Eds.), *Representation and the text: Re-framing the narrative voice* (pp. 305-311).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Silverman, D. (1997). Towards an aesthetics of research. In D. Silverman (Ed.), *Qualitative research: Theory, method and practice* (pp. 239-253). London: Sage.

Smith, A. D. (1993). *Fires in the mirror: Crown Heights, Brooklyn, and other identities.* Garden City, NY: Anchor.

Snow, D., & Morrill, C. (1995). Ironies, puzzles, and contradictions in Denzin and Lincoln's vision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22, 358-362.

Spindler, G., & Spindler, L. (1992). Cultural process and ethnography: An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 In M. D. LeCompte, W. L. Millroy, & J. Preissle (Eds.), *The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education* (pp. 53-92).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Stocking, G. W., Jr. (1986). Anthropology and the science of the irrational: Malinowski's encounter with Freudian psychoanalysis. In G. W. Stocking, Jr. (Ed.), *Malinowski, Rivers, Benedict and others: Essays on culture and personality* (pp. 13-49).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Stocking, G. W., Jr. (1989). The ethnographic sensibility of the 1920s and the dualism of the anthropological tradition. In G. W. Stocking, Jr. (Ed.), *Romantic motives: Essays on anthropological sensibility* (pp. 208-276).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Stoller, P., & Olkes, C. (1987). *In sorcery's shadow: A memoir of apprenticeship among the Songhay of Nig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trauss, A. L., & Corbin, J. (1998). *Basic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Techniques and procedures for developing grounded theory* (2nd ed.). Thousand Oaks, CA: Sage.

Taylor, S. J., & Bogdan, R. (1998). *Introduction to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A guidebook and resource* (3rd ed.). New York: John Wiley.

Turner, V., & Bruner, E. (Eds.). (1986). *The anthropology of experience.*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Van Maanen, J. (1988). *Tales of the field: On writing ethnograph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Vygotsky, L. S. (1978). *Mind in society: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psychological processes* (M. Cole, V. John-Steiner, S. Scribner, & E. Souberman, Ed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Weinstein, D., & Weinstein, M. A. (1991). Georg Simmel: Sociological flaneur bricoleur.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8, 151-168.

West, C. (1989). *The American evasion of philosophy: A genealogy of pragmatism.*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Wolcott, H. F. (1990). *Writing up qualitative research.* Newbury Park, CA: Sage.

Wolcott, H. F. (1992). Posturing in qualitative inquiry. In M. D. LeCompte, W. L. Millroy, & J. Preissle (Eds.), *The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education* (pp. 3-52).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Wolcott, H. F. (1995). *The art of fieldwork.* Walnut Creek, CA: AltaMira.

Wolf, M. A. (1992). *A thrice-told tale: Feminism, postmodernism, and ethnographic responsibility.*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第Ⅰ部分

界定领域

PART Ⅰ LOCATING THE FIELD

本书的这一部分从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中定性方法的历史和传统开始，然后转向行动研究，以及大学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接下来继续探讨研究者的社会、政治、道德责任以及定性研究中的伦理和政治问题。

历史和传统

第 2 章和第 3 章揭示了传统的和应用的定性研究观点的深度和复杂性。这些观点被 bricoleur 研究者有意或无意地加以继承，这些研究者是根据手边的材料随意理解的[1]。这些传统把调查者定位在一个历史的（和组织的）话语之中，该体系指导和约束着理解活动，这些活动在任何具体的研究中都存在。

维迪奇和莱曼展示了民族志传统如何从古希腊人经由十五六世纪的西方人对原始文化起源的兴趣，发展到殖民地人种学，再到 20 世纪在美国和欧洲的转变，殖民地人种学是与西班牙、英国、法国和荷兰这些帝国相联系的。在这段历史中，定性研究的使用者信奉着一小部分信念，包括客观主义（objectivism），把经历溶入背景加以理解的渴望，以及从理论上理解他们所观察现象的愿望。

这些信念用第 1 章讨论的殖民主义（colonialism）、对纪念主义（monumentalism）的信奉，以及永恒文本（timeless texts）的生产，补充了实证主义传统。这种殖民模式把定性研究定位于种族和性别的话语之中，它们赋予了白人女权制特权。当然，正如我们在介绍性章节指出的，近年来这些观点受到了大量攻击。维迪奇和莱曼，以及拉德森—比林斯（第 9 章）说明了早期的定性研究者陷入这些沉闷体系的程度。

格林伍德和勒温扩展这条批评主义的路线。他们非常清楚，学者有责任从事具有社会意义和社会责任的工作。学者、大学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必须从总体上加以改变。

---

① 关于是应用性还是非应用性定性研究传统的区分在某种程度上是任意的。每种都有着悠久的传统和历史，都具有理论和社会变迁方面的重要意义。好的理论研究应该具有应用方面的意义和相关性。有时应用研究和行动研究被认为是非理论的，但正如凯米斯和麦克塔格特在第 22 章所说，这个结论是可以争论的。

由政治理念推动的行动研究,以及致力于实践和社会变迁的调查,是完成这种转变的工具。

行动研究者开展一系列严格的、实质性的实践,带来了公民领域激进的、民主化变革。这些实践包括合作性的对话、参与式决策、包容性的民主商议、最大化参与和代表所有相关各方(Ryan & Destefano, 2000, p.1;也可参见:Stringer, 1996, p.38)。行动研究者在很大程度上把调查转变成了实践或行动。研究的主体变成了调查过程中的共同参与者和利益相关者。研究变成了旨在解决现实世界问题的实践——实际的、反思的、实用的行动。

这些问题起源于合作参与研究者的生活——它们并不是来自于宏观理论或者为了宏观理论,利益相关者和行动研究者一起创造了实际有用的知识。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共同界定了研究目的和政治目标,共同建构了研究的问题,共享知识,研磨共同的研究技能,形成解释和实施具体的社会变迁策略的执行文本(Conquergood, 1998)。

20 世纪的学术研究经常不能完成这些目标。在格林伍德和勒温看来,这种失败有几个原因:不能创造所谓实证的、价值中立的社会科学来开展有用的社会研究;由外部企业来界定大学的需求和价值,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了;企业和私人部门研究机构的研究基金的不足;臃肿的、无效率的内部行政结构。

格林伍德和勒温并没有拒绝科学的实践,相反,他们呼吁对科学研究的内容重新进行明确阐述。他们以实用为基础的行动研究,并不是要退出规范的科学调查①。这种形式的调查把科学重新界定为合作的、沟通的、社群主义的、强调与事物存在相关背景因素的、合乎道德的工程。格林伍德和勒温撰写的章节是一个对公民的社会科学、注重实效的科学的呼吁,这将导致 21 世纪大学与社会、国家以及社区关系的激进的再造。

反思性、社会责任和研究伦理

法恩,韦斯,维森,王(第 4 章)和克里斯琴斯(第 5 章)继续呼吁一种有责任的(committed)、道德的、公民的社会科学。法恩和同事认为,大量的定性研究对"他者"(other)的殖民话语进行了再生产,也就是说,他者被按照研究者的眼睛和文化标准加以理解。他们回顾了导致研究者代表他者讲话的传统,尤其是与信仰体系相关联的传统,这是由维迪奇和莱曼提出的。他们正在进行一项研究,该研究是以 150 个穷人以及工人阶级的男性和女性、白人、非洲裔美国人、拉丁裔美国人、亚裔美国人为对象的,他们为这项研究提供了一系列"写作故事"(writing-story)。这些故事揭示了凸现出来的伦理和修辞的困境。这些困境非常棘手,研究者在力图去为这些穷人和工人阶级的利益相关者写作,和他们一起写作,以及以他们为主题写作时会遇到。

这些是第 6 章和第 7 章研究的问题。他们讨论了声音(voice)、反思性

① 在下面和第 41 章,我们会发展出一个神圣科学的概念。

(reflexibility)、"种族"(race)、知情同意(informed consent)、好的和坏的故事(good and bad stories)等这些论题。声音和反思性是首要的。法恩及其合作者力图弄清,如何在文本中给自己和他们的利益相关者定位,包括是否应该讲述那些负面地反映正在工作的穷人的故事,尤其是在保守派喜欢有关穷人如何通过欺骗获得福利的故事的情况下。他们回避了这些故事。他们也力图弄清,如何进行有关"种族"的写作,这是一个漂浮不定的故事,也是自我和其人格历史不可磨灭的一个方面。

法恩和同事给回答者的每一个访谈支付了 40 美元。一旦这些访谈被转录,谁是它们的拥有者呢?它们是谁的故事呢?当你给故事付钱以后,被告知的同意又意味着什么呢?谁在同意什么呢?谁被保护了?被告知的同意能够防止公开的、共享的、合作的关系形成吗?同时,研究者如何移动到连字号的另外一边、变成利益相关者的支持者?他得到了什么?损失了什么?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呢?用法恩和合作者的话来说,在许多有色人种不再相信白人或学者会给他们或者他们的社区带来任何好处的情况下,如何以一种及时回应城市贫民的需求的方式写作呢?

一个女性主义、社群主义的伦理框架

克里斯琴斯把定性研究定位在更为广阔的历史、知识的框架之下。他首先考察了实证主义的启蒙模式、价值中立的调查、功利主义和功利主义伦理学。在价值中立的社会科学中,专业协会的伦理规范变成了道德原则的传统形式。到 1980 年代,美国每个主要的社会科学协会,都发展出了自己的伦理规范(同时通过了联邦法案,颁布了国家方针),强调了几个指导方针:知情同意、不能欺骗(nondeception)、不能有身体的或心理的伤害、保护隐私和保守秘密,以及收集和展示可靠的、有效的经验材料的承诺。制度评审委员会(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s,简写 IRBs)实施这些方针,包括保证知情同意总是存在于以人为主题的研究中。然而,克里斯琴斯指出,正如法恩和同事们所说,在现实中,IRBs 保护的是制度,而不是个人。

几个事件对启蒙模式形成了挑战,包括纳粹的医学实验、图斯克基(Tuskegee)的梅毒研究、1960 年代的 Camelot 工程、米尔格莱姆(Milgram)在心理实验中对实验对象的欺骗、汉弗莱(Humphery)对同性恋的欺骗性研究,以及社会科学家在越南与军事行动的共谋。此外,对欺骗、剽窃、数据篡改和误传的指责,一直持续到今天。克里斯琴斯详细论述了这种模式的不足:它为欺骗、侵蚀私人空间、欺骗研究对象、怀疑研究对象的道德价值和尊严创造了条件(也可参见本书第 25 章;Cuba & Lincoln, 1989, pp. 120-141)。

克里斯琴斯呼吁,用一种建立在女性主义社群主义(feminist communitarianism)价值基础上的伦理替代这种模式。这是一种演进的、正在出现的伦理框架,它是一种对以欺骗为基础的、功利主义的 IRBs 体系的有用的矫正方法。它假定,社区在实体论和价值论上是先于个人的。这种社区具有共同的道德价值,该研究建立在关怀、共同治理、友善、爱、亲切和道德上正确这样一些概念的基础上。对社会生活的解释应该表现

这些价值,并建立在充分理解的基础上。它们应该有足够的深度,以便让读者形成关于被研究世界的批判性理解。这些文本应该展现种族、阶级和性别的缺失。它们应该产生社会批判,并导致抵制、授权和社会行动;它们应该刺激社会世界积极的变化。

在女性主义社群主义模式中,以及格林和勒温倡导(也可参见本书第22章)的行动研究模式中,参与者拥有同等的话语权去表达研究应该如何开展,应该研究什么,应该采用什么方法,以及什么发现是有效的和可接受的,这些发现应该怎样实施,这种行动的后果应该如何被评价。与此同时,这些研究模式认识到了意见不一致的可能性,所以很多话语致力于相互理解,以及对道德义务的提倡。

一种神圣的、存在主义的认识论把我们放在了一种与地球、自然以及更大世界的非竞争、非等级的关系之中(Bateson, 1972, p. 335)。这种神圣的认识论强调授权、共同治理、关心、团结、爱、社区、契约、具有道德的观察者,以及公民改革等价值。正如克里斯琴斯观察到的,这种伦理的认识论揭示了理性的、启蒙科学所排斥的道德价值,它是建立在宣称"所有人类不分阶级和种族都拥有尊严和神圣地位"(Christians, 1995, p. 129)这样一种哲学人类学基础上的。这个立场产生了一种强调生命、人类尊严、真实讲述和非暴力的普遍人类伦理(Christians, 1995, pp. 12-15)。这种伦理建立在地方性经验以及文化上规定的元规范(protonorms)基础之上(Christians, 1995, p. 129)。这些元规范提供了"植根于普遍的人类团结之中的关于'善'的概念"(Christians, 1995, p. 129;也可参见 Christians, 1997, 1998)。这种神圣的认识论认识到,在当今世界中种族、阶级和性别是作为重要的压迫体系运作的,并对此提出了质疑。

因此,克里斯琴斯扼要论述了未来激进的伦理道路。在这个过程中,他超越了一般的中间道路的伦理模式,该模式集中关注定性研究中与背叛、欺骗和伤害相关的问题。克里斯琴斯所呼吁的合作社会科学研究模式,使研究者不是对无关的学科(或制度)负责,而是对那些被研究对象负责。这继承了批判、行动和女权主义的传统,把研究伦理和有关被压迫者的政治有力地联系起来。克里斯琴斯的框架对现有伦理和社会科学话语进行了再组织①。

通过克里斯琴斯,我们认识了一种女性主义社群主义的伦理,它呼吁研究者和被研究对象建立合作、信任、非压制的关系。这种伦理假定,研究者有义务认识到个人责任、个人表达和关怀的价值、移情和分享情感的作用(Collins, 1990, p. 216)。

---

① 在克里斯琴斯的框架下,主要有两种伦理模式:功利主义的和非功利主义的。然而,无论过去还是最近,研究者都采用了五种伦理立场中的一种:绝对论者(absolutist),后果主义者(consequentialist),女权主义者,相对主义者,或者欺骗。这些立场经常是相互混合的。绝对论者认为,任何有助于对社会自我理解的方法都是可接受的,但只有公共领域的行为才应该被研究。欺骗模式认为,任何方法,包括谎言和歪曲的运用,在真理的名义下都是正当的。相对主义者的立场认为,研究者有研究他们想研究的东西的自由,伦理标准是个人意识的问题;克里斯琴斯的女性主义社群主义框架详细论述了一个强调相互尊重、非强制、非操纵、支持民主价值的,注重前后关系的后果框架(contextual-consequential framework)。

参考文献

Bateson, G. (1972). *Steps to an ecology of mind.* New York: Ballantine.

Christians, C. G. (1995). The naturalistic fallacy in contemporary interactionist-interpretive research. *Studies in Symbolic Interaction: A Research Annual*, 19, 125-130.

Christians, C. G. (1997). The ethics of being in a communications context. In C. G. Christians & M. Traber (Eds.), *Communication ethics and universal values* (pp. 3-23). Thousand Oaks, CA: Sage.

Christians, C. G. (1998). The sacredness of life. *Media Development*, 45(2), 3-7.

Collins, P. H. (1990). *Black feminist thought: Knowledge, consciousness, and the politics of empowerment.* New York: Routledge.

Conquergood, D. (1998). Health theatre in a Hmong refugee camp: Performance,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e. In J. Cohen-Cruz (Ed.), *Radical street performance: An international anthology* (pp. 220-229). New York: Routledge.

Guba, E. G., & Lincoln, Y. S. (1989). *Fourth generation evaluation.* Newbury Park, CA: Sage.

House, E. R. (1990). An ethics of qualitative field studies. In E. G. Guba (Ed.), *The paradigm dialog* (pp. 158-164). Newbury Park, CA: Sage.

Mitchell, R. J., Jr. (1993). *Secrecy and fieldwork.* Newbury Park, CA: Sage.

Ryan, K., & Destefano, L. (2000). Introduction. In K. Ryan & L. Destefano (Eds.), *Evaluation in a democratic society: Deliberation, dialogue and inclusion* (pp. 1-20).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Smith, L. M. (1990). Ethics, field studies, and the paradigm crisis. In E. G. Guba (Ed.), *The paradigm dialog* (pp. 139-157). Newbury Park, CA: Sage.

Stringer, E. T. (1996). *Action research: A handbook for practitioners.* Thousand Oaks, CA: Sage.

定性研究方法：在社会学和人类学中的历史 2

QUALITATIVE METHODS: THEIR HISTORY IN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 亚瑟·J·维迪奇　斯坦福·M·莱曼

现代社会学认为，它的使命是分析和理解社会中模式化的行为、社会过程以及个人和集体参与社会生活的价值和态度基础。它预先假定为了实施与使命相关的任务，社会学家必须具有：

1. 感知并把他或她自身的经历置于背景中研究的能力，以及对他或她没有直接经历的生活或社会制度背景进行超经验的概念化的能力。要求社会学家对知觉感知能看见和不能看见的事物都有着敏感性和好奇心，同时要有足够的自我理解能力，使得对他人角色和价值的移情作用成为可能。

2. 把他或她自己从组织化群体的特定价值和特殊利益中分离出来的能力，以使他或她能够获得一种不是建立在事先价值基础上的理解能力。对每一个人和群体来说，意识形态和信仰界定了好和坏的区别，并导致了日常判断和决策中非社会学的，但是常规的倾向性。在民族志中，社会学家的任务不仅是要成为这些思想和行动的一部分，而且应该在更高的概念化层次上理解它们。

3. 与现行规范和价值保持足够的社会距离和个人距离，从而能够客观地分析它们。通常情况下，自我客观化的能力足以产生定位特性，这是个人想要成为民族志社会学家或人类学家需要具备的。

民族志的定性研究要求具有一种对社会的超然态度，这种态度允许社会学家去观察自我和他人的行为，去理解社会过程的机制，去理解和解释为什么行动者和过程会是它们现在的样子。任何关于合适的民族志调查方法的有意义讨论，都预先假定了这种社会学态度的存在（参见 Adler, Adler, & Fontana, 1991; Hammersley, 1992）。

社会学和人类学这两门学科产生于对理解“他者”的关注。然而，它们也致力于理解自我。如果因循着符号互动主义的信条，承认他人仅仅可以被作为与自我关系的一部分加以理解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有一个运用民族志和定性研究的不同方法，该方法在定义上重新创造了观察者与被观察者——他者——的关系，把观察者设想成是拥有自我身份的。

在整个过程中,研究任务既要求观察,也要求把这些观察结果与他人交流(有关描述该过程如何完成的著作,参见 Johnson, 1975; Schatzman & Strauss, 1973;也参见 Pratt, 1986)。产生于这些过程的关系不仅是最终研究成果特性的决定因素,而且是社会学方法的竞技场,社会学方法很容易对习俗化的理解进行处理,关于过程的资料永远不能在总体上加以描述,因为这些"田野故事"本身就是正在进行的社会过程的一部分,这个过程中每时每刻的经验是难以重述的。作为目标来说,对收集资料方法的总体描述将会改变民族志的参考框架,进而替代达到结果的方法。当研究方法的精确性比实质性社会学问题的解决更为重要的时候,这种替代就会发生。

事实上,对特定研究方法的描述通常是作为反思性解释进行的,也就是说,报告是在研究完成后写作的。这个经常发生但没有被认识到的事实阐明了一部分研究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观察行动暂时和它们被如何完成的描述是分离的。这些有关方法论的论文是对民族志现实的重新构建。它们使用了最原始的经验,然后把它浓缩为一系列想象。尽管这些想象是为了描述实际运用的研究方法,却成为了教科书理想的范例。

我们可以比较被假定为"科学的"社会学家的世界和诸如画家、小说家、作曲家、诗人、舞蹈家或者国际象棋大师这样的艺术家世界,这种比较有助于澄清论点。欣赏绘画、聆听音乐、阅读小说、朗诵诗歌、观看对弈,或参加芭蕾舞表演,一个人体验了一个已经完成的生产过程,如同戈夫曼(Goffman,1959, p. 107)所说的"前台"。这种方法看来似乎天生要采用已经完成的形式(Goffman, 1949, pp. 48-77)。更适当地说,我们可以认为,作曲、写作、绘画、表演,或者无论哪一种方法,都是创造者技能的内在部分,没有这个方法,创造就不能实现。如果艺术家被问到,"你是如何做的? 把你的方法告诉我",他或她的答案需要事后重新构造的行动:描述那种方法的方法。然而,最初的生产仍然保持了它原始的完整性;无论从后来关于它是如何完成的讨论中得出什么结论,它都是不能改变的。关于社会学方法,罗伯特·尼斯贝特(Robert Nisbet,1977,p. 3)回忆说:

> 在我致力于探讨现代社会学的某种来源的时候发现,在上个世纪中,给社会学提供了持续挑战和理论基础的不是什么重大主题,而是时至今天仍然受宠的"科学的方法"。我指的是那种倡导统计分析、问题设计、假设、证明、回答和理论建构的方法,这种方法在关于方法论的教科书和课程中得到了广泛描述。

从尼斯贝特的敏锐观察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社会学研究中使用的方法是该研究所独有的,不能按照它实际发生的进行描述或重复。社会调查者可能选择不同材料作为他们的资料——历史学家的文献、人口学家的定量报告,或者民族志学者对社会中某一部分的直接感知,这些并不能改变社会科学家是观察者的事实。作为世界的观察者,他们也参与其中,因此,他们是在一个中介框架(midiated framework)中进行观察的,也就是说,他们的生活史赋予了他们符号和文化意义的框架,他们把这个框架带入了观察之中。隐藏在每种研究方法之后

的是为单个观察者提供背景的个人因素(Clifford, 1986)。在这个根本意义上,所有的研究方法实际上都是定性的,都是同样客观的;定量数据或数学程序的运用,并没有消除成为社会研究基础的主体间因素。客观性并不在于方法本身,而在于研究问题的适合程度,以及研究者不论数据和直觉会把他们领向何方,也仍有要继续研究该问题的愿望(Vidich, 1955;也可参见 Fontana, 1980; Goffman, 1974)①。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的研究都是定性的——因为观察者处于研究过程的中心,这是否意味着这种方法得出的结论只不过是每个观察者特殊的现实呢(Atkinson, 1990)?

一个简单的答案是,我们按照该项工作是否给我们传递或"诉说"了什么这个标准来自己判断——换句话说,它是否和我们的现实联系在一起②?它能帮助我们把自己的线索组织起来吗?它和我们关于世界的想象产生了共鸣吗?或者,它是否提供了一种进入后者的有效方式,从而促使我们重新考察我们长久以来认为自己生活世界里真实的东西?

如果使用的方法并不是问题,那么我们能够采用什么标准判断社会学研究的价值呢(Gellner, 1979)?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判断他人工作的价值,接受它,或者如果它不能传递关于世界的有意义东西,就拒绝它。当然对一个人有意义的东西并不必然对另一个人是有意义的。

在现在及可预见的将来,世界范围内共同价值的瓦解以及建立在一致同意基础上社会的解构,促使人们认识到存在着许多相互竞争的现实,这个事实产生了社会学原先没有碰到的问题。事实上,这种状况创造了一种条件,在该条件下,被认为是从社会学视角来看待世界的理论观点的数量,取决于现有科学世界观的数量。至于调查中潜在的研究主题,它们的前景仅仅受到宗教信仰、职业和专业意识形态,以及引导或扰乱他们生活的其他世界观的限制。在本书写作期间,一种新的认识论观点引起了人们关注,它剥夺了所有已经被接受的话语特权,使得话语本身成为知识社会学的主题③。

定性研究的历史说明情形并不是始终如此(Douglass, 1974)。在过去,许多调查者研究的问题,是他们对一种宗教信仰或种族信条的忠诚或反对所赋予的,或者是他们对具体的民族目标或社会经济方案的认同或反对而产生的。接下来,在对运用定性研究方法的历史解释中,我们会说明,该方法的使用是如何被个人观察者的观点以及曾经指引着定性研究的主要假定偶然化的,这些假定现在已经失去了原有作用了。然而,我们先行者的信仰、信条和希望,并没有完全从社会学家的精神地图中消失(Luhmann, 1986)。它们仍作为人们甚至没有意识到的背景存在,成为了所有人熟悉的社会学思想工具。昆德拉(Kundera,

① 关于定性和定量方法的基本相似性的讨论,参见:Vidich & Bensman(1968,第13章)。

② 这里我们只是对社会科学的哲学和认识论中的一个严肃问题进行注释,并说明一种可能的方法。如下著作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讨论:C. W. Smith,1979; Rabinow and Sullivan,1979; G. Morgan,1983; Fiske and Shweder,1986; Hare and Blumberg,1988; Ashmore,1989; Minnich,1990; Bohman,1991; Sadri,1992, pp. 3-32, 105-142; Harré,1984。

③ 这种新理论提出的许多问题在A.洛丝(A. Rose,1988)收集的论文中得到了论述。

1988)在《小说的艺术》(*The Art of the Novel*)中指出了我们当前困境的核心问题:"如果上帝走了,人类不再是主人,那么谁是主人? 行星没有任何主人,它们正穿越空间,具有人类无法承受的轻盈。"(p. 41)

在社会科学运用观察方法的整个阶段,研究者无形中——或者在某些情况下明确地——带着希望和信仰所界定的问题,进入到他们的研究当中。通过集中关注这些问题的实质和他们预示的思想,我们把对这段历史的讨论,限定在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在民族志研究中使用的定性方法,也就是个人观察者使用的对社会现实的直接观察。我们的历史沿着一个连序谱前进,它开始于早期民族志学者与新世界的第一次遭遇,结束于我们同时代人的工作所面临的理论和实际问题。

早期民族志:对他者的发现

希腊术语 *ethnos* 表示了人、种族或文化群体(A. D. Smith, 1989, pp. 13-18)。当 *ethnos* 作为一个前缀和 *graphic* 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术语 *ethnogrphic* 时,是指描述人类学(descriptive anthropology)的分支。更广义地说,描述人类学是用于描述人类生活方式的科学。民族志学是指对民族和民族意识的文化基础进行的社会科学描述(Peacock, 1986)。描述人类学和民族志都被认为是与理论无关的,仅仅关注于描述。然而,民族志学者的观察总是受到世界精神观念的影响,这些观念决定了什么资料是突出的,什么不是突出的:注意力集中在某一个客体而不是另一个客体,揭示了观察者价值取向的纬度,以及价值所负载的兴趣。

早期民族志产生于西方人对文化和文明起源,以及这样一个假定的兴趣,该假定认为,这些同时代的被西方人认为没有文明的原始民族,事实上是连接西方和其史前开端的"人类伟大链条"活生生的复制品(Hodgen, 1964, pp. 386-432)。这样的民族志模式产生于 15 和 16 世纪,是哥伦布(Columbus)以及后来的探险者,在被称为新大陆的西半球和南部海域岛屿文化的航海产生的基本问题。

对生活在非西方环境中人类的发现,引发了欧洲知识分子从未想象过的宇宙论难题。他们感到,有必要把新的事实整合到已经被接受的知识和理解中去①。因为,圣经,尤其是《创世纪》,被认为是理解地理历史和创造过程的唯一有效来源。它把人类的起源置于伊甸园中——定位在今天称为中东的地方,所有人类都被认为是来源于此的。后来,依照洪水民族志学(Numbers, 1992)的说法,来源于世界范围内洪水的唯一幸存者——诺亚及其家庭的后代。要把哥伦布在新大陆遭遇的我们现在知道的泰诺人(Taino)、阿拉瓦人(Arawak)和加勒比人(Carib)(Keegan, 1992; Rouse, 1992)和圣经的解释联系起来是很困难的。尤其是哥伦布的"发现"揭示了基督教兄弟关系以外的他者的存在,这就提出了这

① 接下来的论述参见:Lyman,1990a。

样一个问题:在前哥伦布时代,这些人类的祖先是如何到达美洲的?任何认为他们不是从欧亚大陆或非洲移民过来的论文都被认为是异端,是在宣扬人类可能不只产生于上帝创造人的行为。

一般来说,全球范围内人类种族和文化的多样性,把如何解释种族、文化和文明的多样性起源、历史和发展问题,摆在了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人面前(参见 Baker, 1974; Barkan, 1992; Trinkhaus & Shipman, 1993)。不仅宇宙论者有必要解释"他者"①的存在,而且学者有义务去说明,欧洲人和这些"他者"在道德价值方面的差异是如何存在的、为什么会存在。事实上,如此丰富的价值、文化和生活方式,对有关基督教学说的合法性和真实性构成了挑战。诸如残杀婴儿、同类相食、用人做祭品以及最初出现的男女乱交现实,重新提出了文化价值间的矛盾,以及这些矛盾应该如何解释和解决的问题(Oakes, 1938)。

这些价值冲突问题与美洲西班牙殖民地劳动分工中的征募、组织这些实际问题交织在一起。这可以在德拉斯卡萨斯(Bartolome de Las Casas)与德塞普尔维达(Juan Gines de Sepulveda)在 Valladolid 委员会的争论中发现。"德塞普尔维达,这个为了把西班牙人奴役印第安人的行为合法化,而运用了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自然奴隶学说的人"(Hosle, 1992, p. 238),事实上在与德拉斯卡萨斯的争论中获胜了。而后者坚持认为,现在被称为美洲本地人的民族,是"拥有自己的传统、尊严和权利的完全同样的人类"(Marty, 1992, p. xiii)。如今,也许正因为对于文化多样性的新认知,普遍主义价值与相对主义价值之间的紧张,仍然是西方民族志学者没有解决的难题(Hosle, 1992)②。在实践中,它变成了这样一个问题:观察是被什么价值引导的?选择要么是民族志学者的价值,要么是被观察者的价值——用现代的说法,要么是主位(emic),要么是客位(etic)(Pike, 1967;一个精彩的讨论请参见 Harre, 1980, pp. 135-137)。这里存在一个更深层次、更基本的问题:当他者的价值不是一个人自己的价值时,怎么可能理解他者呢?当西方的基督教价值不再是真理的保证,并因此不再是判断充满自信的有效观察的基准时,这个问题开始困扰民族志学。

---

① 这种取向与修昔底德(Thucydides,1972)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中使用的是不一样的。他是从参与者的角度进行观察的,他把自己从参战各方的规范中分离出来,从不明确表示自己的价值。他的书让许多试图找到他的根本主题的学者很困惑,不能理解为什么该书充满了含糊性,总不给他们一个明确的观点。关于修昔底德著作的各种观点,参见:Kitto, 1991, pp. 136-152; Kluckhohn, 1961, pp. 4, 34-35, 55, 64-66; Humphreys, 1978, pp. 94, 131, 143, 227-232, 300-307; Grant, 1992, pp. 5, 45, 148-149。

② 在讨论西班牙人对印第安人犯下的罪行时,霍斯勒(Hosle, 1992)写道:"当然,要回答下面的问题并不容易:即使伴随西班牙征服者的牧师谴责了实施的暴力,他们是有责任的吗?在特定意义上说,他们的到场是否把该事业合法化了?不可否认的是,通过一种虚伪的宗教出场,他们对基督教作出了贡献。他们满口是博爱,却是残忍的罪犯的宗教。当然,如果没有传教士,可能会有更多的暴行发生,这一点是很清楚的。不过这种伪善至少可以给被压迫的人声明某些权利的可能性。公开的残忍可能更真诚些,但真诚并不是唯一的价值。真诚的残忍不能产生任何积极的东西。另一方面,伪善却表现出了征服它的力量。"(p. 236)如果这些有用的话,霍斯勒对基督教的辩护则揭示了关于普遍主义和相对主义价值的争论中仍然存在的困难,并对这个问题留下了悬而未决的解决方式。也参见:Lippy, Choquette and Poole(1992)。关于卡萨斯—塞普尔维达的争论及其对美国人种史学和人种学的意义的进一步的讨论,参见:Hanke, 1949/1965, 1959/1970, 1974。

殖民者心态与他者的持续

在民族志学职业化之前,世界种族与文化的描述和评价是由西方传教士、探险家、海盗以及殖民地管理者提供的。他们的报告可以在全世界的教堂、国家和地方档案中找到,绝大部分报告是由占领文明的代表写成,或者是从占领文明代表的角度写成的,这些报告的绝大部分内容是当代民族志学者并不知道的。他们自信地认为,自己的使命是使这些世界文明化(关于这个问题的中肯讨论,参见 Ginsburg, 1991, 1993)。一些17世纪、18世纪和19世纪的探险者、传教士和管理者,对那些"原始人"的实践活动进行了丰富的描述,在这些描述中,观察者的基督教价值观是很明显的①。对被这些观察者(比如 Degerando, 1800/1969)研究的社会来说,作者的民族志报告是他自己的民族文化理想颠倒的镜子。这些早期的民族志,展现了和他们的研究目标一样多的西方世界。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些民族志没有被当代的人类学家重新分析和利用:现在的民族志学者希望把自己和西方征服的历史分割开来,而把早期的民族志作为毫无希望的偏见加以拒绝(参见"定性方法座谈会", 1993)。近年来,他们开始认真对待本地人对西方"发现者"的解释,而剥夺了西方发现者提供报告的特权,并把他们去中心化了(Abeyesekere, 1992; Salmond, 1991; Todorov, 1984)。

在后来殖民地管理者的著作中,可以找到丰富的资源。通过这些资源,我们可以看出早期民族志文献对这些民族征服的影响(比如 Olivier, 1911/1970)。人种学(ethnology)起源于西班牙、英国、法国和荷兰这些老海上帝国的管理者写作的报告(Maunier, 1949)。这些帝国为业余的,以及后来专业的民族志学者提供了很多机会,不仅可以考察"土著"文化的主人②,而且可以管理影响民族"文化进步"的生活状况(Gary, 1911/1970, pp. 79-85)。对这些海上帝国来说,欧洲人的兴趣通常在于,利用土著的劳动力、利用他们的土地发展榨取性的产业,或者在帝国主义者的竞争中根据军事战略优势建立基地(一些代表性的例子可参见 Aldrich, 1990; Boxer, 1965; Duffy, 1968; Gullick, 1956; Suret-Canale, 1988a, 1988b)。因此,在殖民地管理者手下发展出来的人类学,对土著的文化适应以及间接规则的文化保存效果没有兴趣。他们的方法被称为多元主义的发展(pluralistic development; M. G. Smith, 1965)。只要土著人本土的领导人能够支持殖民当局有限的利益,殖民地多元主义就或多或少地把土著人置于这些领导人的权威之下(Lugard, 1922/1965)。这种倾向在殖民社会(Boeke, 1946;

① 一个很好的例子是主教科德林顿(Codrington, 1891)的名为《美拉尼西亚人》(*The Melanesians*)的民族志研究。他的研究给耶鲁大学人类学家哈夫迈耶(Havemeyer, 1929)关于美拉尼西亚人的章节提供了唯一的来源。参见科德林顿(Codrington, 1974)名为"Mana"的对《美拉尼西亚人》的摘录,也可参见库珀(Kuper, 1988, pp. 152-170)的批判性讨论。

② 一个能够说明人类学家对传教士对本地人生活所做工作的灾难性后果感到绝望的好例子,可以在里弗斯(Rivers, 1922/1974)出版的著作中找到。

Furnivall, 1956)中心创造了市场经济,这种市场经济被多种地方文化群体所包围(Boeke, 1948),一些群体成员不由自主地被拉入到市场经济当中,并承受身份被边缘化的后果(Sachs, 1947)。

在殖民地区从事田野研究的民族志学者,可以根据他们对文化和(或者)政治民族主义以及自主的态度分成几类:一些人成为了民族文化解放和反殖民起义的斗士;一些人尊重传统文化的自主权,但反对土著人为了寻求他们生活方式现代化而反抗殖民主义的任何倾向。后者中有一些人是马克思主义者,赞美反殖民的运动,但是更希望看到本地人保持资本主义以前的状态。一些人可能想象资本主义以前的土著过着恩格斯1884年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描述的原始共产主义生活。事实上,恩格斯的原始共产主义思想来自于摩根(Morgan,1877/1964)的《古代社会》(*Ancient Society*),它是一个关于美洲土著的人种史学的原创性实证研究,把后者想象成古希腊人的"祖先"(有关批评可参见Kuper, 1988)。其他人不再关心,如何通过对美拉尼西亚人、塔斯马尼亚人(Tasmanians)、班图人(Bantus)、婆罗洲土著人(Dayaks)的民族志解释,去证明"母权"先于"父权"(Hartland, 1921/1969),而是把注意力转向了文化适应。他们不能确定这个过程会有多长,以前被殖民化的主体接受西方规范的程度如何,由此再次使用"幸存者定律"(the doctrine of survivals)来解释持续存在的本土文化要素(Herskovitz, 1958, 1966)。他们对某些本土民族宁愿用新生活换取旧生活感到吃惊(Mead, 1956/1975)。这些多样化的价值和意识形态取向在早期专业民族志学者的著作中很普遍,并给人类学提供了大多数理论争论的基础。

文化与社会的"演进":孔德与比较方法

在人类学这门学科专业化以前,开明的民族志学者已经放弃了与残忍的征服者相关的任何态度,而代之以仁慈的演进态度。在人类学内部,殖民主义历史以及与之相关的道德相对主义,产生了价值冲突,这种价值冲突被社会演进理论部分代替了。运用达尔文主义和斯宾塞主义原理来理解社会和世界文化,把民族志学者从道德相对主义带来的问题中解放出来,这种观点承认存在一个有关价值的时空层级。这些价值共时性地在世界上可以找到的文化种类中得以呈现,但可以根据发展进步理论历时性地加以分类。

这种理解西方的新方法,首先是由孔德(Auguste Comte)正式论述的,很快被命名为"比较方法"(Bock, 1948, pp. 11-36)。根据孔德及其后继者的说法,有关文化和文明演进的研究,假定文化有三个阶段。世界上的民族和文化可以按照时间排序,从而形成"人类的伟大链条"(Lovejoy, 1936/1960)。此外,这些阶段是可以说明的,它们在链条上有序地连接起来,标明人类社会从原始文化状况过

渡到现代文明的过程①。通过使用这些技术及社会指标,民族志学者可以发现某一特定民族属于"链条"上的哪一阶段,并因此赋予该民族在文化演进中一定的位置(关于孔德作为一个历史及演进理论家的讨论和批评,可参见:R. Brown, 1984, pp. 187-212)。这些不同的文化在民族志学者从事研究的时代共存,看起来是个困难的事实,但这些事实通过"不均匀演进"(uneven evolution)理论得到了解释。该理论在知识论的假设下,认为除去西欧以外所有的文化,都经历了某种形式被抑制的发展(Sanderson, 1990; Sarana, 1975)。在缺少成文的历史材料的情况下,民族志学者利用现场田野研究来解释史前文明的构造,同时提出了一个道德谱系。这个关于文明发展的历时分析继承了孔德的思想,通常以三个进步的、不可逆转的阶段为特征:原始状态(savagery)、野蛮状态(barbarism)和文明(civilization)。被对应到这些阶段的民族,是与一种肤色—文化(color-culture)等级的历时分析相对应的,并且充满了西方民族中心的偏见(Nisbet, 1972)。

在19世纪,孔德通过指明宗教发展过程中道德成长(孔德的术语)的三个阶段,形成了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的思维模式。民族学者采用了孔德的比较方法,加上他们自己的努力,形成了一系列关于"原始"文化的演绎假设。这种强加的、预想的、以欧洲为中心的发展框架,使得民族志学者的工作简化了很多②。他们的任务变成了针对文化特点的分类员的工作。最后,这种方法在耶鲁大学收藏的人类关系领域档案(Human Relations Area Files,HRAF)中被制度化了,HRAF成为了保存人类学资料库和几乎所有现存民族志文献的地方——在HRAF的抽屉里,任何一种文化都可以找到在类别上合适可靠的地方(Murdock, 1949/1965)。耶鲁大学出版的种类手册,为民族志学者提供了指导他们观察的方针以及对文化特点进行分类的基础③。耶鲁的跨文化档案中的资料,以存在行动者的、有生命的社会世界形式展现了民族志学。他们是对截然不同的文化种类的

---

① 因此,如果读者希望把默多克(Murdock,1934)的《我们原始的同时代人》(*Our Primitive Contemporaries*),作为"比较方法"的某一方面的例子,作为一个众所周知的"原始"文化的说明加以精读,他或她会发现,那18个占据了时间和空间的民族的民族志,按照地理学的安排,与作者是一致的,但——使用"原始的"(primitive)这个术语作为描述性形容词——却使该书的标题从历史方面(也就是历时的)成为矛盾的修辞。可参见博克(Bock, 1966)富有思想性的评论。

② 需要注意这种民族中心表达模式的两个例外:萨姆纳(Sumner,1840—1910),他创造了"民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的术语,他认为国会或法院没能做点什么来阻止在南方对黑人的私刑:"在文明化的现代国家中,任何人被用火烧死都是不体面的。"(Sumner, 1906/1940, p. 471;也参见:Sumner, 1905/1969)维布仑(Thorstein Veblen,1857—1929)使用了"野蛮状态"(savagery)和"无知和鄙俗"(barbarism)这样的用语,经常把这些人的道德规则和金钱观,看成是高于那些坚持新教伦理或资本主义精神的人的,并与他那个时代正流行的雅利安人(Aryan)优越论进行了争论(参见 Veblen, 1899/1959, 1914/1990, 1919/1961b;也参见 A. K. Davis, 1980; Diggins, 1978; Tilman, 1991)。

③ 人类关系领域档案被复制、交易、分配到了其他大学的人类学系,这不仅增加了文化研究的标准化和一致性的因素,而且增加了民族志学者放弃短期进入该领域的可能性。这种正流行的方法在哈佛大学社会学家帕特森(Patterson,1982)的两项研究得到了说明。帕特森是在默多克61个拥有奴隶的社会"样本"(从总共186个社会中)基础上进行该研究的。这些社会是按照地理位置排列的,但为了服务于一篇论文,它们被暂时重新排列了,该论文试图探讨奴隶制度变化和功能上的起源。在这种方法的基础上,我们并不惊奇地发现,在研究的结尾,帕特森(Patterson,1991)相信他能够说明"图皮南巴族人、古希腊和罗马人、美国南方人,在时间、地点、社会文化发展水平上有着明显的不同,并揭示了这种复杂的文化特性的坚韧性"(p. 15)。

丰富收藏,代表了民族志方法的对立面。

20世纪的民族志:孔德主义与冷战

20世纪的两个发展破坏了各种"殖民的"人类学观点和演进理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的30年内,非洲和亚洲的非殖民化运动,成功终结了西方世界进行全球殖民主义的直接形式。作为该运动的一部分,对西方民族中心主义的反殖民攻击,直接导致了对"原始人"思想以及整个人种学思想的批判(Montagu,1968)。实际上,到20世纪60年代以前,人类学家已经开始不考虑"原始"社会,并开始放弃演进认识论,这种认识论曾经论证他们是最先存在的。

一个新的术语——不发达的——开始替代"原始的"。殖民权力及其支持者变成了学术起诉的被告,他们被认为应该对新命名的"第三世界"的不发达负责。他们也没有认识到美国"黑人文化"及其他有色民族文化的完整性(Willis,1972)①。民族学者发现,他们的基本价值取向正在受到攻击。这些价值取向导致,他们以及深受他们尊敬的先行者与帝国政府在镇压和剥削当地民族中的合作,或者是与美国军方及其在越南的"绥靖"方案合作。人类学家开始集体的、学科内反省(Nader, 1972)②。世界历史方向的变化,促使人类学家重组民族志方法。因为根据定义来看,几乎没有什么原始人可用于研究了,新命名的"不发达"的第三世界国家的代言人经常指责人类学家应当对它们的现状负责,因此,进入部落社会比以往困难得多。随着田野工作机会的减少,人类学开始求助于语言学研究、耶鲁档案馆的资料库,或者对美国社会的人类学考察中出现的民族志。人类学绕了个大圈,回到了出发点,回到了对它自己社会的研究,从而来进行更"原始"文化的调查。语言学和资料库拥有丰富的文献和历史档案,借给了他们研究的文本。这些趋势开启了民族志学运用现代主义——后来是后现代主义——方法研究外来民族、调查在西方工业社会中生存的外来文化承载者的路径。

然而,尽管人类学深受非殖民地化运动的震动,并且受到了进入传统的田野工作地点的严格制约,但是,冷战给了社会学以现代主义形式复兴孔德和斯宾赛(Spencer)的演进学说的机会,可以把它们和自然神学结合起来,后者发端于美国清教徒。

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的两卷本社会发展研究恢复了加尔文教徒——清教徒的形象,并把后者运用到对"他者"的研究中去,这些"他者"是没有包括在西

---

① 对第三世界民族的概念化,对"发达的"、"不发达的"、"欠发达的"社会的概念化,参见:Worsley,1964,1984。

② 资本主义导致了欧洲的海外帝国和美国自身的"聚居区殖民主义"(ghetto colonialism)的欠发达,这种观点成为了一种塑造后传统的民族志学理论的假设,甚至信念(参见:Blauner, 1972; Marable, 1983;也参见:Hechter, 1975)。

方基督教的兄弟关系之中的。在美国与前苏联几十年的竞争期间,根据美国认为达到了社会发展最高阶段的标准,被选择的民族和社会被安排在了一个图表当中;其他的民族、文化和文明,被假定为正在向美国这个"第一个新民族"描绘的方向移动(Lipset, 1979;Lyman, 1975),或者正遭到某种前进的抑制。发展规划坚持着这样一种思想:经济进步是工业化固有的,民族建构应该与资本主义、民主化的逐步扩展以及有序地提供个人权利相一致。尽管与特加特(Teggart, 1941)及其后继者(Bock, 1952, 1956, 1963, 1974; Hodgen, 1974; Nisbet, 1969, 1986;Lyman, 1978; Kuper, 1988)有关的社会历史思想学派对比较方法提出了尖锐批评,但孔德的观点在帕森斯的著作及其宏观社会学的追随者中仍然存在。

冷战期间的社会科学文献包括这样一些标题,比如海尔布伦纳(Robert Heilbroner)的《伟大的攀升》(*The Great Ascent*),奥甘斯基(A. F. K. Organski)的《政治发展阶段》(*The Stages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以及罗斯塔(W. W. Rostow)的《经济增长的阶段》(*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美国的政治经济和民主的社会秩序替代了早期关于文化演进的最终阶段的想象。世界上采用美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民主的社会秩序的其他民族的变革,成为了社会科学家衡量人类"前进"程度的标准。这个标准给分析家—民族志学者提供了一个评价"他者"(在 1947 年以后,这包括前苏联以及那些"不发达"世界的民族和文化)进步程度的新手段。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研究宇宙论、道德、经济、军事等问题的学者,宣称拥有把善意的基督教化的西方文明传播到世界的权利,并开始对共产主义的崩溃、前苏联的解体,以及前苏联在东欧的联盟解组而欢呼(Gwertzman & Kaufman, 1992)。但是对有些人来说,产生了一种新的忧虑:担心这些事件是否标志着历史自身的终结(Fukuyama, 1992)①。

冷战的结束和前苏联的解体,在世界上几乎每一个地方都唤醒了民族主义者,增强了民族意识。在这样一个新的去中心化的世界,尤其是对那些希望把自己和其他种族、民族区别开来的人来说,文化多元主义成为了一个新的口号。文化相对主义带来的困境,被一些新的问题代替了,这些问题产生于假定最初的血统是十分明确的。民族志学者现在发现,他们自己陷入到了不可比较的,但相互竞争性的价值困境当中。

美国印第安人的民族志学:一个本土的"他者"

在美国,新教加尔文派的拓荒,开始于清教徒到达新英格兰之后。清教徒深信自身的正义以及要把上帝的王国传播到这片"新大陆"的使命,他们首先把印第安人纳入到自己的信仰盟约中来。但是,由于错误判断了印第安人的可塑性以及他们对外来世界观的抵制,清教徒的努力并没有成功(Calloway, 1991, pp.

---

① 关于来世论的、千年的、神圣的、世俗的"末世论",以及其他的按时间排列事件的模式,参见:Paolo Rossi,1987。

57-90; A. T. Vaughan, 1965)。在19世纪和20世纪,他们继续努力(Coleman, 1985; Keller, 1983; Milner & O'Neil, 1985)。美国对待印第安人的政治和法律政策,以及美洲土著文化的民族志研究,都产生于这个失败,并影响了这个结果。结果,北美洲的几个土著部落在民族志、道德和文化方面,被保留在欧洲移民的领土和定居的白人美国社区之外。

17世纪到19世纪——也就是跨越美洲大陆进行西部扩张期间,关于印第安文化的民族志报告,是从欧洲—美洲征服者和他们的传教士同盟者的角度来写作的(Bowden, 1981)。印第安人以一种特殊的"差异性"形式存在着,他们的差异性甚至比曾经被奴役的非洲人及其在美国出生的后代更大。有关这个事实的一个显著社会指标是,他们在保存自己的思想和群体方面受到限制。在传统的学术课程里,对本土美洲人的研究是"原始"民族文化人类学的一部分,然而,对欧州和亚洲移民以及美国黑人的研究,则是社会学的"少数民族"课程和"种族和民族关系"课程的制度化特征。

在美国,民族志理论从被传教士和军事征服者书写转换到专由人类学家来书写。这种转换发生在史密斯—索尼安 Smithsonian 协会人种学部建立之后(Hinsley, 1981)。然而,各种印第安"部落"的民族志学,更早是由为印第安人事务局(BIA)服务的人种学家写作的(Bieder, 1989;可以在 McKenney & Hall, 1836/1972; Schoolcraft, 1851/1975 找到史密斯—索尼安以前的美国印第安人民族志的两个代表性的例子)。一些理论家希望用与《圣经》里创世纪和洪水神话相一致的理论,来解释美洲印第安人起源、建构他们的祖先,对这些理论家来说美国国内印第安人的出现形成了另外的问题:他们在法律中的反常地位(R. A. Williams, 1990)。印第安"部落"在政治上认为自己是分离的、独立自主的民族,在一定的时期内,殖民当局和美国政府也是这样对待他们的。然而,1883年最高法院重新确立了他们的法律地位。首席法官马歇尔(Marshall)宣布,印第安人在法律中占有独特的地位。他说,他们形成了"一个驯服的、依赖的民族",他们与联邦政府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监护"关系。联邦政府设立了印第安人事务局来处理与印第安人相关的事务。在这个决定的限制和约束下,印第安人事务局开始管理印第安人的相关事务。美国的民族志学发展出了关于本土美洲人的特殊观点①。

印第安人事务局和史密斯—索尼安协会雇佣了民族志学者担任各种机构的职员,研究印第安人的生活方式。这些观察者的研究重点不是印第安人的转化问题,而是如何叙述他们的文化——仪式的记录、亲属体系的描绘、技术的描述、

---

① 值得注意的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美国民族志学集中在美国印第安人和美国殖民地的土著居民。人类学家对中美洲和南美洲文化的兴趣是考古学取向的,是为了填写"史前记录"和充实博物馆而设计的。一些民族志的工作是在美国控制的太平洋岛屿上开展的(与夏威夷的伯奈斯主教博物馆有关)。米德在美属的萨摩亚群岛(Somoa)工作,是最早在太平洋群岛从事民族志研究的非传教士人员之一。她的工作部分是为了批判美国清教徒的性观念,夸大叙述了大洋洲的实际状况,最终遭到了他人的反驳(参见:Freeman, 1983; Holmes, 1987; Mead, 1928/1960a, 1930/1960b, 1949/1960c, 1935/1960d)。

手工艺品的收集,所有这些都是从世俗的、管理的角度来进行的①。印第安人事务局所持观点的理论支持是文明/原始的两分法,它已经认为,印第安人是没有文字的。事实上,这个"驯服的,依赖的民族"的部落土地和保留地,成为了民族志学者收集早期原始生活阶段状况的活生生的人类学博物馆。在这个国家中印第安人大量居住的地方——尤其是西南②——和考古学研究的手工艺品很多的地方,孔德的演进理论被用于寻找现存部落的祖先,他们可能在古生物学的研究成果中找到印第安人的起源。然而,西南部从一开始就是充满争论的地方,它不仅把人类学家和传教士、联邦官员区别开来,也把人类学家彼此区别开来(Dale, 1949/1984; Dockstader, 1985)。

"原始人"的生活世界被认为是一个窗口,透过它可以看见、描述和理解史前的过去。这种观念在1904年的圣路易斯(St. Louis)世界博览会(the St. Louis World's Fair)得到了人种学的认可。当时,一个具有科学头脑的传教士弗纳(Samuel Phillips Verner)允许奥塔本加(Ota Benga)——一个来自刚果的矮人——被作为活生生的原始风格标本加以展览。一年以后,奥塔本加在一个动物园的猴馆被展出(Bradford & Blume, 1992)。1911年,美国人类学家克罗伯(Alfred Kroeber)把亚以(Yahi)部落的最后幸存者伊升(Ishi)放到了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人类学博物馆。在伊升死前两年,他一直居住在博物馆,像他之前的奥塔本加一样,事实上成为了一个活生生的人造物品,一个被陈列的原始人,一个被文明人看成可以和美国博物馆里印第安人立体模型相比较的事物(参见Kroeber, 1962, 1965;同时代的报纸和其他媒体的解释,可参见Heizer & Kroeber, 1979)。

尽管美国的印第安人政策确立了大多数人种学者工作的方案和观点,但它并不被早期的田野工作者认为是正统学说。在这些异端的人种学家中,最重要的可能是富兰克·汉米尔顿·库欣(Frank Hamilton Cushing, 1857—1900),他在作为人种学家为史密斯-索尼安协会工作期间,成为了祖尼人萨满教的巫师(Zuni shaman)和战争领袖(参见Cushing, 1920/1974, 1979, 1901/1988, 1990;也可参见Culin, 1922/1967)③。库辛的案例之所以凸现出来,是因为,尽管他是祖尼人生活的积极参与者,但他仍然是一个力图从本土视角描述祖尼人文化和世界观的专业人种学家。此外,库辛参加了R·S·库林(R. S. Culin)那篇异端论文的工作,该论文认为,美洲是亚洲的摇篮,在哥伦布时代之前,祖尼人的祖先迁移到了亚洲,为中国人、日本人、韩国人和其他亚洲文明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些文明反过来又经过了几世纪传播到非洲和欧洲(Lyman, 1979, 1982a, 1982b)。

保罗·雷丁(Paul Radin, 1883—1959)并没有尝试把自己变成一个土著,但

---

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管理日本人的重新安置中心的人类学家和接受了关于保留(reservation)训练的人类学家,使用了同样的理论。关于那些人类学家从美国印第安人转向日裔美国人的原因,参见:Leighton, 1945; Wax, 1971; Spicer, Hansen, Luomala, and Opler, 1969; Myer, 1971;以及德林农(Drinnon, 1987)的猛烈批评。

② 关于美国西南部印第安民族的代表性民族志,参见:Schwatka, 1893/1977; Nordenskiold, 1893/1979; McGee, 1899/1971; Spier, 1933/1978; Kluckhohn, 1944; Eggan, 1966, pp. 112-141。

③ 最近泰德洛克(Tedlock, 1992)对祖尼人的民族志研究进行了反思并赞扬了库辛在那个部落的工作。

他把自己的一生贡献给了温尼贝戈印第安人(Winnebago Indians)的民族志研究(参见 Radin, 1927, 1927/1957a, 1937/1957b, 1920/1963, 1933/1966, 1953/1971b, 1923/1973, 1956/1976)①。雷丁认为,深刻学习一种不同文化的语言和符号系统,才能从一种局内人的观点看待这种文化。他在报告中评述了温尼贝戈人的神话、仪式和诗歌,并对这些材料进行了英文翻译。由于库辛和雷丁的著作被作为美国印第安人民族志学的标准典范,因此,他们的观点能够用于重新理解早期民族志学者的工作,并使得未来的田野调查者能够理解美国印第安人民族志学的文化界限,同时成为人种学知识的批判社会学的一个出发点(Vidich, 1966)。但是,他们的工作也认识到了文字出现以前文化的史实性,以及参与者从他者的观点来理解他者世界存在的问题。正如修昔底德的著作和韦伯(Weber)理解社会学的概念所说的,库辛和雷丁超越了价值不可比较的问题。

作为市民的他者的民族志学:少数民族聚居区、自然地区和小城镇

加尔文教徒拯救和(或)包容印第安人的使命,可以在后来力图把城市中黑人、亚洲人和欧洲移民的少数民族聚居区纳入到新教教义的道德和社区价值的努力中,找到对应的地方。这些移民把他们天主教、犹太教,或者佛教的宗教文化带到了美国。近来被解放的黑人生活方式与美国白人市民的生活方式并不一致,这些问题是较早定居的群体担心的原因。他们担心美国新教文明未来的完整性(Contosta, 1980, pp. 121-144; Hartmann, 1948/1967; Jones, 1992, pp. 49-166)。最初把这些群体纳入进来的努力,集中在新教徒在移民和少数民族聚居区布道和传播"社会福音"的工作上(Holden, 1922/1970; Woods & Kennedy, 1922/1990)。

大约在内战后三十年,新的城市居民的绝对数量如此之大,文化如此多样化,以至于单靠个人努力已经无法了解,这时不得不求助于统计调查。统计调查提供了一种方法,来确定在任何一个地方每一宗派、国籍和种族会有多少居民,并描述每一个群体在适应中存在的问题(C. A. Chambers, 1971; Cohen, 1981; McClymer, 1980)。通过这种方式,"他者"被转换成统计上的合计,并以表格形式的普查,对外来生活方式加以报道。这些报告最初是由美国东部城市的各种教会赞助的,它们是统计调查的先驱,后来才开始由社团赞助的对移民和黑人的调查,以及在1911年大范围进行由政府赞助的对欧洲人、亚洲人、墨西哥人和其他移民劳工调查(Immigration Commission, 1911/1970)。教会调查以及后来社团和社会学的后续调查,被用于实施针对新来者和少数民族聚居区人群的"道德改革"和社会适应计划。现在社会学中的定性研究可以在这种基督教的使命中找

① 雷丁(Radin,1935/1970, 1936/1971a)也在旧金山的意大利人和中国人中间进行了田野工作。

到起源(参见 Greek, 1978, 1992)。

这个活动并不是努力把外来因素纳入到在双方意愿下成立的社区。杜博依斯(Du Bois)的《费城黑人》(*The Philadelphia Negro*,1899/1967)是对该市第七区的调查,它是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学院领导者苏珊·B·沃顿(Susan B. Wharton)支持下完成的。对沃顿、杜博依斯及其同事来说,"对社会事实的收集和分析是和科学活动一样的宗教活动,是一种救赎黑皮肤人群的祷告方式。"(Vidich & Lyman, 1985, p. 128)这项由杜博依斯指导的研究包括了 5 000 个访谈。它的目标不仅是描述,而且试图通过教友派信徒到社区,改善费城黑人的状况。杜博依斯著作最后几页的贵族阶级语调,暗含家长式作风的善行,而这是第一个社区民族志研究的基础。

教会和社团资助的调查方法一直统治着社会研究,直到 20 世纪 20 年代早期(参见:Burgess, 1916)海伦(Helen)和林德(Robert Lynd)开始他们的中镇(Middletown)研究。林德是个新被任命的新教牧师。他很关心工业化的美国基督教社区的道德状况,被教会委员会选中考察被认为是典型的美国社区的生活方式。由于突然进入到两人研究小组的状态,林德夫妇向人类学家威斯勒(Clark Wissler,1870—1947)以及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职员,请教了如何进行这样的调查,以及一旦数据收集上来该如何报道①。威斯勒给他们提供了一个详细的文化清单,这是人类学家用来组织田野资料的标准的内容列表(参见 Wissler, 1923, 第 5、7 章)。那些内容——生活、建立家庭、训练年轻人、从事宗教和社区活动——成为了林德和他们的著作(Lynd,1929/1956)的组织原则,并给他们的调查提供了一系列提示。尽管中镇研究是给教会提供用于制定教会政策信息的,林德夫妇却以社会人类学家的方式进入到中镇社区。正如威斯勒(Wissler, 1929/1956)在给这项研究的公开出版物所写的序言中所说,"对大多数人来说,人类学是关于野蛮人的古怪信息,到目前为止这是正确的,因为人类学的大部分观察是在文明程度较低的地方……这本书的作者像人类学家接近原始部落一样进入到了一个美国社区。"(第Ⅵ页)在中镇中,人类学家的"他者"找到了进入到美国社会学实践和目标的路径。此外,从中央教会当局政策制定者的观点来看,他曾经被认为是市民的"兄弟",结果实际上变成了"他者"——一个在印第安那曼西(Muncie)的普通居民。

1929 年《中镇》出版后不久,发生了大萧条。林德夫妇被委托去做一项对曼西的再次研究。1937 年,这部名为《转变中的中镇:关于文化冲突的研究》(*Middletown in Transition: A Study in Cultural Conflicts*)的书出版了。这项调查不仅反映了这个城镇的变化,而且也是两个民族志学者视野中的变化。在大萧条早期的那些日子里,林德,这个教会的改革论者,开始转向前苏联寻求解决资本主义显著矛盾的答案,这些矛盾在大萧条时期的美国集中地显现出来。这种新的政治取向不仅反映在林德夫妇观察的事物当中,也反映在他们如何报告他们

① 威斯勒(Wissler,1940/1966a, 1938/1966b)在一生对美国人种史学和民族志学研究的基础上确立了自己的地位。

所观察的事物。第一卷没有提到鲍尔(Ball)家族对“公司城”的控制、对鲍尔州立大学的家族慈善赞助,以及对地方图书馆和医院、银行的控制。《转变中的中镇》包括了“X 家族:商业阶级控制模式”一章,还有名为“繁荣与萧条中的中镇银行业制度”的附录。林德夫妇相信,美国自由放任的自由市场经济完全失败了,他们放弃了在《中镇》中使用的民族志范畴,而替代性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观点的范畴和概念,这是他们最近亲身获得的从而把社会学的焦点从宗教价值转向了政治价值。

在下半个世纪,《转变中的中镇》会成为社会学民族志的标准典范和受到高度赞扬的著作。林德在哥伦比亚大学教了几代学生,在那里,伦理倾向的政治激进主义代替了明确的基督教价值和语言。随着许多哥伦比亚训练的青年(还有他们在城市学院志同道合的学生,这些人许多后来成为了杰出的社会学家)的激进化,马克思主义给对美国社区具有人类学倾向的民族志观察者,提供了一种相反的观点。然而,在《转变中的中镇》出版将近 50 年之后,一组非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开展了对中镇的第二次再研究,又把关注点重新集中在探讨亲属关系和家庭关系的重要性——这是早期民族志的主要特征,并把它和更早的美国社会学取向的惯用方法——对新教徒虔诚的关注——结合起来(Caplow, Bahr, Chadwick, Hill & Williamson, 1982, 1983)。

即使在林德夫妇的原创性研究之前,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的民族志学,已经受到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重视。由阿尔比恩·W·斯莫尔(Albion W. Small)领导的芝加哥第一代社会学家认为,他们执教的学科应该影响美国的命运。美国将成为一个统一的基督教兄弟友爱的国家,信守一种所有人共享权利和适当价值的观念(Vidich & Lyman, 1985, p. 179)。斯莫尔力图寻求一种社会学方法,让新教教义的价值和道德有力地影响芝加哥新的种族、人种和宗教聚居区的居民。然而,这种明确的基督教态度在芝加哥大学并没有保存下来。后来罗伯特·E·帕克(Robert E. Park),欧内斯特·W·伯吉斯(Ernest W. Burgess),W·I·托马斯(W. I. Thomas)和路易斯·沃思(Louis Wirth)成为了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的指导教授,帕克的女婿罗伯特·里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成为了该大学人类学的重要人物,在此之后,斯莫尔的这些观念被抛弃了。帕克对“自然区域”(natural area)的世俗概念化,替代了基督教对城市中非教会地区的关注。罗伯特·里德菲尔德的观点与帕克不同,他明确指出,应该从道德上提升“小社区”(little community),这给大城市的小社区提供了一种相反的形象。

帕克(Park,1925/1967)把城市看作一个社会实验室,它包含了民族、生活方式以及竞争性的、对比鲜明的世界观的多样性和异质性。在帕克看来,对一个由他者组成的城市来说,少数民族聚居区是它的固有特征。在他和伯吉斯的指导或鼓舞下,涌现了一系列民族志研究,对城市中人类生活的某一方面进行了非同一般的描述。这些研究频繁地考察了那些在值得尊敬的中产阶级以外或以下城市群体的生活方式。除了描述这些群体经常互不相容的价值之外,这些民族志学与早期传教士的研究特点并不相同。帕克和同事们忙于证明他们所感受到的

市民之间各种形式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正在城市中凸现(参见 Burgess & Bogue, 1967)。

帕克对城市的核心观点是,城市是一些"自然区域"在建筑上的市政界限,形成了一个个类似马赛克的小社区,每一个都和别的有着显著区别,但每个都或多或少是它所在种类的典型代表。帕克(Park,1952a)观察到,"每个美国城市都有它的贫民窟、少数民族聚居区、移民区,这些地方或多或少地保持着不同的外来文化。几乎每个大城市都有游民居住的贫民窟,在那里生活比其他地方更自由,更冒险,更孤独。这些被称为城市的'自然区域'。"(p. 196)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城市民族志学三十多年来一直集中描述这些"自然区域",比如犹太人聚居区(Wirth, 1928/1956),小意大利(Nelli, 1970),波兰裔侨民(Lopata, 1967; Thomas & Znaniecki, 1958, pp. 1511-1646),小德国(Park, 1922/1971),唐人街(Lee, 1978;Siu, 1987; Wu, 1926),黑人住宅区(Drake & Cayton, 1962; Frazier, 1931, 1937a, 1937b),黄金海岸和贫民窟(Zorbaugh, 1929),流民群体(N. Anderson, 1923/1961),单屋居住者(Zorbaugh, 1968),文化的和社会的不同政见者(Ware, 1935/1965)①,黑社会的城市生态学(Thrasher, 1927/1963),自杀者躲藏的城市地区(Cavan, 1928/1965),吸毒成瘾者(Dai, 1937/1970),精神错乱者(Faris & Dunham, 1939/1965),以及房地产交易的社会和经济动力学(Hughes, 1928; McCluer, 1928; Schietinger, 1967)。帕克(Park,1952b, 1952c)的取向是孟德斯鸠式的(Montesquieu),他强调城市应该给那些共享社会文化多样性的"浪漫"和"魔力"的人提供自由。

另一方面,帕克的一些学生追随着沃思提出的思想,喜欢把思想和行动中自由的形式——也就是对"分割化的"人格和特殊角色行为的鼓励,对非人格性、次级关系、厌烦享乐的态度的培育(Roper, 1935;Burgess & Bogue, 1967, pp. 231-244)——和他们认为那些居住在农村、在种族和民族上同质性的小城镇中的人所拥有的、具有人格安全感的东西——也就是,从对习惯的遵从中得到的满意感,产生于熟悉的面对面接触的舒适感,完全人格的安全感,对初级关系的共处能力——相对比(参见 Bender, 1978, pp. 3-27; Redfield & Singer, 1973;也可参见 M. P. Smith, 1979)。对那些把"民俗社会"理想化,以及把它和对"小社区"的理想化混和在一起的人来说,"原始人的"原始主义、牧歌式的宁静、小城镇、即将到来的乡村城市化(Dansereau, 1961; McKenzie, 1968)——以高速公路的修建、年轻人离开乡村前往城市的趋势(对该现象的早期记录,可参见 Weber, 1899/1967)、汽车(Bailey, 1988; Rae, 1965)、电话(Ball, 1968; Pool, 1981)、收音机(Gist & Halbert, 1947, pp. 128, 505-507)对乡村社会习俗的破坏为先导——不仅是变化的征兆,也是不可挽回的悲剧的征兆(参见 Blake, 1990; Gusfield, 1975; Lingeman, 1980; Tinder, 1980)。另一方面,对那些以亲身的田野经历为基础得出结论的民族志学家来说,美国不公平的阶级结构的过程和异常现象,已

① 尽管这项研究并没有在芝加哥大学实施,但却带有这个学派方法的痕迹。

经深嵌在这个国家小城镇的语言和风俗之中。同样有一种预示性的观察:美国杰弗逊式的理想,在那些宣称是安全堡垒的社区中得到了公开宣扬,但并没有得以实施。正如霍林斯黑德(Hollingshead,1949/1961)在对"埃尔姆镇(Elmtown)的青年"进行民族志研究后指出,"美国的阶级体系是超越于法律之外的……(但是)社会具有那些人认识到的法律以外的纬度……正是文化使人们面对阶级体系这一事实,这远离了美国信奉的理想。"(pp. 448, 453)

遵循着这一传统的民族志研究,是在一种对19世纪小城镇价值的怀旧之情的指导下进行的。这种价值美国过去曾经拥有,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在其鼎盛时期,社会中所有的人亲如兄弟姐妹。

然而,不论是帕克认为的他者关系,还是霍林斯黑德寻求的没有阶级的兄弟关系,都不能解释美国社会对黑人的拒斥。E·富兰克林·弗雷泽(E. Franklin Frazier,1894—1962)强调美国黑人的"他者"关系正是为了突出这一点。在帕克和杜博依斯教学的基础上,弗雷泽从对黑人聚居区各种生活方式的分析入手,开始了他在芝加哥的社会学研究。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该聚居区与更广泛的社会和政治经济之间存在分离与孤立。在他后来对"黑人资产阶级"(1957a)的评价中,他把这视为是黑人中产阶级面对有限的经济和社会流动时不可避免的、但悲剧性的结果。在对大量以大学为基础的黑人中产阶级观察的基础上,弗雷泽展现了黑人中产阶级对白人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仿效:他关于该主题的专论同样可以被认为是对白人资产阶级的研究。弗雷泽的民族志研究是建立在几乎终身观察基础之上的,不仅是对这个具体阶级的观察,而且是在观察哈勒姆(Harlem)和芝加哥非洲裔美国人聚居区的居住者,南部农村和北部城镇黑人家庭以及社会经济问题中的黑人年轻一代(参见 Frazier, 1925, 1957b, 1963, 1939/1966, 1940/1967, 1968)。

弗雷泽的著作暗含着,在民族志的描述和理解中,个人经历的重要性。他的方法论和研究地点选择可以和另一个完全不同类型的民族志学家——索尔斯坦·维布伦(Thorstein Veblen)相提并论。维布伦在美国大学社区的研究,比如《美国的高等教育:关于商人对大学行为的备忘录》(*The Higher Learning in America: A Memorandum on the Conduct of Universites by Businessmen*)中,利用自己在芝加哥大学、斯坦福大学、密苏里大学的亲身经历,提供了他对美国大学中发生的官僚政治变化,进行高度组织化、预见性考察的原始材料①。弗雷泽和维布伦的全部作品,实际上都是以丰富多彩的生活经历作为资料的定性研究的例子。在这些研究中,是不可能把研究方法和使用的理论以及使用它的人区分开来的。这种方法是民族志研究的最终理想。

威廉姆·福特·怀特(William Foote Whyte)给芝加哥大学的民族志研究带来了新的转折。怀特使正式设计的研究成为其生活经历的一部分,并把它称为"参与观察"。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给怀特提供了报告他对居住在波士顿北部边

① 在那个报告中,他是第一个看到大学校长作为行政上"博学的统帅"(captain of erudition)的新角色的人,并开始设计大学的公共关系,以便保护大学的知识形象,并促进商业基金会对美国大学体系的筹资(捐献)。

缘的意大利裔美国人的研究发现的机会,这是他在《街角社会》(*Street Corner Society*)(1943a, 1955, 1981)中所写的。这项工作的最初动机本来是改善居住在贫民窟大众的生活状况,结果变成了参与观察研究技术的典范:怀特住在意大利人社区,采用了很多方式(但不是所有的方式),成为"Cornerville"男孩的一员①。尽管怀特描述性地展现了他关于Cornerville的发现,但他的理论立场仍然是不言而喻的。该书具有谜一样的性质,因为怀特从他与研究对象之间关系的角度展现着他的资料。也就是说,怀特既是一个研究者,也是他自己著作的一个对象。

芝加哥大学的人类学也充满了定性研究的倾向。直到1929年,该大学的人类学和人种学一直包含在被称为社会科学与人类学部的"历史社会学"下面。人类学和人种学的研究最初是由弗里德里克·A·斯塔尔(Frederick A. Starr)指导的,他是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人种学的负责人(Diner, 1975)。斯塔尔初次到日本之后,变成了一个崇拜日本的人,他被委派带一些阿伊努人(Ainu people)到1904年圣路易斯世界博览会上展览(Statler, 1983, pp. 237-255)。1929年,独立的人类学系成立了。但是,它反映了社会学家托马斯和费尔斯(W. I. Thomas & Ellsworth Faris)(参见Faris, 1970, p. 16)而不是斯塔尔的倾向。在新系成立的前一年,里德费尔德发表了论文《对墨西哥的捷普兹特兰的研究计划》(*A Plan for the Study of Tepoztlan, Mexico*, 1928)。里德费尔德借用了滕尼斯(Tönnies, 1887/1957)的二分法——礼俗社会和法理社会,并利用了冯威斯和贝克尔(Von Wiese & Becker, 1950/1962, 1932/1974)的神圣的—世俗的连续谱,强调了"民俗文化"和后来称为"小社区"的价值(Redfield, 1962, pp. 143-144; Redfield, 1930, 1941, 1960, 1950/1962b; Redfield & Rojas, 1934/1962a)。

里德费尔德认为,大城市是一个不快乐、不满意的他者聚集地,他反对与城市生活和工业文明相关的价值。他赞美那些拒绝融入到全球范围内的、都市世界的、非工业化的民族和小社区的生活方式。他在1958年,也就是他去世那年的最后一篇论文中,描述了一个与外星来客的想象性对话。里德费尔德(Redfield, 1963)谴责了冷战时期的状况,那个时期是以毁灭对方为特点的,并对无法阻止以技术为中心的发展、无法阻止把田园牧歌和前现代等同在一起感到绝望,对都市中的非村社生活感到悲哀。里德费尔德的倾向在气质上具有卢梭的风格。他给一代人类学家提供了一种乡村视角——一种寻求保存和保护古老生活方式的后传教士态度。他是清教主义反城市生活的变体。清教主义认为,小规模的、面对面的社区比其他的都好。对那些追随着里德费尔德思想脚步的

---

① 1992年,当对怀特研究的种族文化和民族方面提出了新的问题之后,一个讨论会广泛地评论了这个事情(参见《街角社会》的修订版,1992)。

人种学者来说,这些村社价值是原始人性的代表①。

1958 年,维迪奇和本斯曼出版了他们对纽约北部的一个乡村社区——"斯普林戴尔(Springdale)"的民族志研究,这为民族志学对小城镇、原始主义的公社和原始价值的浪漫情怀提供了一个相反的形象②。正如他们的标题警示的,这是"大众社会里的小城镇"③。此外,这个现状是其他美国城镇的典型。斯普林戴尔令人神往的地方主义,在社会、经济和政治上的自治,都是对过去时代的幻想。

作者在专著出版十年后的修订版引言中指出,"他们关注的中心问题是小城镇(间接地是美国社会的所有部分)不断卷入到中央机器的过程,以及整体社会的过程和动力学。"(Vidich & Bensman, 1968, p. xi)

在报告他们发现的过程中,维迪奇和本斯曼扭转了方向,把神话学(mythology)纳入到美国社会学思想中礼俗社会—法理社会(Parsons, 1937/1949, 1973)、民俗的—城市的连续谱分析中来(Ducan, 1957; Firey, Loomis, & Beegle, 1950; Miner, 1952)。尽管对他们的研究有一些争论,还有人指责他们没有采取足够措施隐瞒该城镇中主要市民的身份,他们的研究在理论上的重要性也常常被忽视,但他们的观察结论——也就是说,在美国发生了中产阶级革命,新的中产阶级的兴起和优势,改变了美国城市和城镇的特点和文化,"远离农村的城镇政府、商业、宗教、教育方面超级官僚机构在制定着政策,而乡村世界只能用愤怒来回应"(p. 323;Bensman & Vidich, 1987)——对一直统领着社区生活田野研究的旧范式构成了挑战。

到 1963 年,罗兰德・L・沃伦(Roland L. Warren)注意到了他称之为"美国社区中的'大转变'"的现象,并且指出,劳动分工的发展、利益和协会的日益分化、与更广泛社会的系统联系的增加,地方职能向营利性企业、州和联邦政府的转移、城市化和郊区城市化,既是变迁原因也是变迁结果的价值上的转变等,是如何伴随着"社区凝聚力和自治程度下降的"(参见 Warren, 1972, pp. 53-94)。事实上,社区民族志学不仅不得不面对城市和郊区对城镇的蚕食,而且还要扩大视野,把州和国家的政治经济对美国以及第三世界城镇和村庄的影响也纳入进

---

① 里德费尔德的观点找到了进入城市社区、民族飞地,或者美国小城镇研究的途径,这些研究是由人类学家或芝加哥的社会学家实施或指导的(Hannerz, 1980; Lyon, 1987; Suttles, 1972, pp. 3-20)。生态学研究的复兴开始于莱曼和斯科特(Lyman & Scott)1967 年的著作;也参见:Ericksen, 1980。该研究植根于空间的使用是社会建构的思想。早在 1914 年,当时埃默尔(M. C. Elmer)还是芝加哥大学一个前途光明的研究生,写了一篇城市社区社会调查方面的博士论文,它反映了社会福音运动和社会学学科中从教会到"科学"调查传统的转移;七年以后,斯通(Stone,1921)以《调查运动的起源》(*The Origin of the Survey Movement*)作为他在芝加哥的博士论文,他宣布,新的研究取向的转变正刚刚起步。1913 年,在同一所大学,阿尔伯特・贝利・布卢门撒尔(Albert Bailie Blumenthal)把《小城镇的社会学研究》(*A Sociological Study of a Small Town*)作为他的博士论文(Faris, 1970, pp. 135-140)。然而,在帕克之后,芝加哥社会学系人种学研究的中心,开始转向城市中的社区以及居住小区的组织(例如:N. Anderson, 1959),有些人关注在大城市中如何重构礼俗社会(参见:Fishman, 1977; Quandt, 1970)。

② 小城镇和大城市的民族志学或多或少采用了与宏观政治—经济取向一致的方法。这种取向被维迪奇和本斯曼所强调(P. Davis,1982; Wallace,1987; Arsenault,1988; Campbell,1992; Moorhouse,1988; Reid,1992)。

③ 维迪奇(Vidich,1952, 1980)早期促进了对所谓原始社会的人类学研究方法的再思考,提出并重新构想,认为这些研究需要关注全球殖民主义的后果以及它与被殖民化社会的结构和过程的敌对状态。关于他在各种殖民当局下对贝劳(Palau)的人类学研究和对斯普林戴尔研究的联系,参见:Vidich,1986。

来(Toland, 1993;Marcus, 1986)。斯坦(Stein,1964)在他关于美国社区研究60年的反思中指出,“关键在于,研究贫民窟和郊区的学者(他也许加上了小城镇)要求对美国社区演进以及正在凸现的问题和格局有着某种整体把握。”(p.230)如果美国社区的研究者采用冯吉尔克(von Gierke,1868/1990]或者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的研究取向,也许从一开始就会对滕尼斯理论的“卢梭式”变化采取更加批判的态度(McKinney, 1957)①。

关于同化的民族志学:他者仍然是他者

另一个基本范式的失败,影响着对少数民族或种族的民族志研究。到20世纪60年代以前,许多关于民族和种族关系的社会学观点,集中在美国多元化民族的同化、文化适应和融合过程及其发展。研究美国少数民族群体的民族志学者,受到了以“熔炉”为中心的思想和观念的支配,他们普遍受到帕克种族周期理论的影响,预期每个人最终会被同化。最初,这些学者力图在一个连续谱上绘制出每一个民族的位置,该连续谱从“接触”开始,经过连续的“竞争和冲突”、“适应”,最终被“同化”(对帕克的周期理论的批判性评价,参见Lyman,1972,1990b, 1992b)。帕克早期认为,种族周期是进步的、不可逆转的,到1937年,他已经开始对这个观点感到失望,但他的学生和后继者并没有放弃寻找一种模式或过程,来使种族关系以及相伴而生的问题最终有一个好的答案。

当美国特殊民族的种族史对帕克设计的顺序构成挑战的时候——例如,当埃茨以奥尼(Etzioni,1959)对犹太人聚居区的再研究显示,即使在美国定居很多年后,犹太人的宗教和风俗也是不能去除的;当李(Lee,1960)发现,即使在恐华的偏见好转之后,唐人街以及他们旧有世界的核心的制度仍然存在;当伍德(Wood,1972)详细叙述路易斯安娜的李托延特·克里奥勒斯(Letoyant Creoles)如何在美国定居十代后,仍然不能侵蚀他们的民族传统或这些被边缘化人群的民族身份(也参见Woods,1956);当克莱默(Kramer,1970)证明了少数民族社区在适应美国过程中发生的许多变化———种哀叹同化失败或对美国民族文化的未来表示忧虑的不和谐音产生了(Christopher, 1989;Schlesinger, 1991; Schrag, 1973)。

甚至在社会大众和评论家宣称“WASP衰退”(Schrag, 1970)、“不可熔化的人种”兴起(Novak, 1972)的时代来临之前,一些社会学家已经开始重新检验他们关于美国种族划分的假设,重新思考他们和先行者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发现。1952年,内森·格拉泽(Nathan Glazer)促成了汉森(Hansen,1938/1952)那本关于“第三代回归定律”(Law of Third Generation Return)的著作再版,这本书曾经

① 开展小城镇历史社会学研究的英国方法没有采用滕尼斯的理论立场(Abrams & Wrigley, 1979)。

被忽略了①,这鼓舞了学者们新的研究兴趣。在现代美国,是否存在孙辈移民保留、重新介绍、重新发现或者发明他们祖先的风俗的现象,他们是如何做的,又是在多大程度上做的(Kivisto & Blanck, 1990)? 莱曼(Lyman,1974, 1986)把参与观察和文献与历史分析结合起来,显示了唐人街的团结和维系,在很大程度上是与持续的社区内冲突,以及造成忠诚和口角的传统群体网络相关联的。克莱默和勒文特曼(Kramer & Leventman,1961)描述了一个美国犹太人三代人间解决冲突的图景,尽管第三代已经变成了"富裕的聚居区小孩",但他们仍然保留了许多,但不是全部的民族宗教传统。阿尔巴(Alba,1985, 1989, 1990)重新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欧洲人种族幸存的现象是否在美国发生,如何发生。他指出了该问题的表现、再现和瓦解的几个纬度,并进行了几次对意大利裔美国人的研究。这个群体经常被从事民族志研究的社会学家选作支持、反对、修正或重新论述以往关于同化的论文的例子(例如,参见 Covello, 1967; Gans, 1962; Garbaccia, 1984; Landesco, 1968; Lopreato, 1970; Tricarico, 1984; Whyte, 1943a, 1943b)。

对同化理论的再思考导致了一种方法论的批判,并对假设的实质表示了怀疑。1950 年,西摩·马丁·利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指出,"从本质上说,关于周期不可避免的假设,不论它们是种族关系的周期还是文明的兴起或衰落,都是根本无法检验的。"(p.479)更早的研究种族群体的美国民族志学家尝试着建构与他们的田野调查发现相一致的更冗长的、替代性的周期。罗斯和博加杜斯(Bogardus,1930, 1940; Rose & Bogardus, 1940)提出了加利福尼亚多样化的日本社区中三个与众不同的周期。马索卡(Masuoka,1946)警告说,在美日本人的文化适应需要三代,第三代才是"真正的种族问题"的受害人。这些都证明了对同化理论的失望。包括布朗(W. O. Brown,1934)、格里克(Glick,1955)、里伯森(Lieberson,1961)、金洛克(Kinloch,1974, pp. 205-209)在内的其他人得出了与1937 年帕克的重新论述相似的结论——也就是说,同化仅仅是持续的种族间互动的一个可能的结果,同时,孤立、服从、民族主义或本土主义运动、脱离都应该被考虑到。

一些人试图把帕克原创的不再被相信的周期决定论从经验批评中拯救出来,于是转向了政策建议或劝告性呼吁。沃思(Wirth,1945)强烈建议采用一些方案来减轻少数民族群体在反复尝试被民主的美国接纳时遭到的挫折;李(Lee, 1960,pp. 429-430)转变了她对帕克预言不加批判的拥护,而转向悲哀地呼吁中国聚居区的居民做到这一点——即尽快同化自己(也可参见 Lyman, 1961—1962, 1963)。还有一些人把帕克的周期理论当作"逻辑上的"而不是"经验上",来解决该理论中本体论和认识论方面的问题。弗雷泽(Frazier,1953)认为,帕克理论中的那些阶段并不是按年代顺序发生的,而有可能在时空上共存:"他们代表了对该问题进行系统的社会学分析的逻辑步骤。"什布坦尼和克万(Shibutani & Kwan,1965)在审查了许多对种族和民族社区进行综合的或零散的研究之后认

---

① 也参见:Glazer,1954。"汉森法则"(Hansen's Law)是肯尼迪(Kennedy,1944)和赫尔伯格(Herberg, 1960)工作的基础。

为,尽管作为描述性理论,帕克的观点有许多例外,并由此影响了它的有效性,但他的阶段说"为研究移民被融入到已经建立的社会的过程提供了一种处理资料的有用办法"(参见 pp. 116-135)。格什文德(Geschwender,1978)走的更远,他认为帕克的种族关系周期理论是"对'理想类型'序列的抽象模型,它尚待进一步发展"(p. 25)。

1918 年,爱德华·拜伦·路特尔(Edwrd Byron Reuter)把美国的种族问题定义为,"占据着同一块领地的、同时又是不可同化的成员之间,如何达成和维持彼此满意的工作关系的问题。"(p. 18)。社会学研究表明,没有种族或民族群体穿越了周期路径达到完全同化,在这些研究的半个世纪以后,美国的种族问题不仅变得更加普遍,而且成为了社会学理论的基本问题。这就是人种学人类学家贝里(Berry,1963)确定的位置。他的田野调查最终包括对拉丁美洲各民族的研究,以及以前一直没被美国吸纳的种族混血儿社区的研究(也参见 Lyman, 1964)。贝里和蒂施勒(Berry & Tischler,1978)指出,种族关系的周期理论并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具有普遍的有效性,他们观察到,"一些学者……对存在一种普遍模式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他们更倾向于相信种族关系中包含的因素如此之多,以致于每一种状况都是独特的,把这些现象一般化的努力是一个危险的过程。"(p. 156)尽管贝里的论文没有刻意去指引这个方向,却确立了后来很多民族志的基调,它们很少在理论上有所进展,而是提供了更多少数民族和其他人类群体日常生活的细节。

在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的二十年里,对非洲裔美国人、美国印第安人、墨西哥裔美国人以及亚裔美国人的民族志研究也大量怀疑,美国是否会发生民族文化融化的过程,它何时发生,谁会受益。对北部和南部黑人奴隶和自由民的民族志研究和语言学研究表明,早期社区分析中使用的工具不够细腻,它不足以让社会学家洞悉到那些文化风格和社会实践,从而把非洲裔美国人和社会中其他部分区别开来(例如: Abrahams, 1964, 1970, 1992; E. Anderson, 1978; Bigham, 1987; Blassingame, 1979; Duneier, 1992; Evans & Lee, 1990; Joyner, 1984; Liebow, 1967;关于总体看法,参见: Blackwell, 1991)。其他的批评家观察到,对"美国困境"的社会学研究没有对政治学、市民权利、历史给予足够关注(Boxhill, 1992; Button, 1989; Jackson, 1991;Lyman, 1972; V. J. Willliams, 1989)。面对民族和种族意识的日益高涨(Cornell, 1988;Martin, 1987; Sando, 1992),对返还美国印第安人博物馆所有物的选择性需求(Berlo, 1992; Clifford, 1990; Messenger, 1991; Milson, 1991—1992;"A museum is set",1993),印第安人向美国法庭求援、寻求赔偿和谈判的权利(T. L. Anderson, 1992; Jaimes, 1992),政治联盟,还有把美国印第安人和西班牙人、非洲裔美国人、犹太人联系起来的对民族历史世系的追溯(Forbes, 1973, 1988; Gutierrez, 1991; Tobias, 1990; Vigil, 1980),对文化保存和假定被孤立的美国民族和部落的人类学研究不得不让步了。对墨西哥裔美国人,早期是通过研究农场工人的民族志进行的历史制度研究,到 20 世纪 80 年

代成为了新的后现代主义革命的一部分①。一直被民族志社会学家研究的美国的亚洲民族——也就是中国人和日本人——增加了最近的抵达者,包括朝鲜人、泰国人、越南人、柬埔寨人、老挝人(例如,参见 Chan, 1991; Hune et al. ,1991; Knoll, 1982; Nomura et al. , 1989; Okihiro et al. , 1988; Takaki, 1989)。与研究墨西哥裔美国人的民族志学家的例子相似,对美国亚洲人的研究中,问题和方法都在开始凸现——从关于是否存在同化和文化适应现象、如何测量它们的争论,到一些后现代的主题,比如美国的亚洲人的种族话语的特点、内容和意义(例如 K. J. Anderson, 1991; Okihiro, 1988)。东部的印度人、缅甸人、大洋洲人、马来人,以及其他过去被称为"东方人"的民族,开始宣称与更早确立的亚洲人群体有着共同的理想(Espiritu, 1992; Ignacio, 1976; Mangiafico, 1988),但是他们坚持认为,应该在美国社会保持每个民族社会文化和历史的完整性,以及选择自己道路的权利。因此,民族志的后现代主义倾向变得越来越明显了(例如,Hune et al. ,1991; Leonard, 1992)。

1980 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庞大的《哈佛美国种族群体百科全书》(*Harvard Encyclopedia of America Ethnic Groups*, Thernstorm, 1980),该书不仅包括单独的"非洲人"(Africans)和"美国黑人"(Afro-Americans)的词条,还包括研究美国印第安人 173 个部落的个人论文,以及研究从苏伊士(Suez)以东来到美国的每个亚洲民族的报告。阿巴汉姆逊(Harold J. Abahamson)的词条"同化和多元主义",事实上宣称,美国社会学已经从最终把这个国家中的每个民族同化,并把同化与美国化等同的梦中醒来,"美国社会……是一个不仅具有许多种族背景,而且具有很多不同的种族反应的复合体……并不存在单一的反应或适应。多元主义和同化的多样风格,意味着种族划分像生活本身一样复杂。"(p. 160;也可参见 Gleason, 1980; Novak, 1980; Walzer, 1980)

目前,多元主义已经进入到范式的核心阶段②。但是,即使这种取向,也没有消除或解决美国多样化的种族和民族产生的问题。西摩·马丁·利普塞特在 40 年以前,批判了帕克关于同化是不可避免的周期理论。1993 年,他们指出,"种族和民族划分是专家失败地参与变动中的社会发展的最明显的例子"(Jalali & Lipset, 1992-1993, p. 585)。此外,现在社会思想中流行的多元主义的胜利,模糊了对基本问题的认知:每个民族和种族群体提出了更多自我约束而不是竞争性的主张。

---

① 说明这些研究的演进阶段的专题论文,参见:Blackman, 1891/1976; P. S. Taylor, 1930/1970, 1983; Gamio, 1930/1969, 1931/1971; Bogardus, 1934/1970; Galarza, 1964, 1970, 1977。关于在新墨西哥的社区研究,参见:Gonzalez, 1967; Sanchez, 1967; Forrest, 1989。关于亚里桑那参见:Sheridan, 1986。关于得克萨斯,参见:Rubel, 1971。关于印第安那,参见:Lane & Escobar, 1987。关于芝加哥,参见:Padilla, 1985。关于一般性的、历史的研究,参见:Burma, 1985; Officer, 1987; D. J. Weber, 1992。关于从种族—阶级到后现代分析的转变,参见:Barrera, 1979, 1988。

② 后续的工作(比如 Fuchs, 1990; Keyes, 1982; Kivisto, 1984, 1989; Lieberson, 1980; Lieberson & Waters, 1988; Royce, 1982; Steinberg, 1981; Waters, 1990)强调了种族和民族划分的多元主义、偶然性,以及志愿的和社会建构主义者的方面。

当前的民族志:后现代的挑战

从历史上看,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都使用民族志的方法。但是,他们过去使用的主要框架都被当代民族志学家抛弃了。现代世界社会和意识的社会—历史转型,改变了过去民族志学的理论和价值基础。

随着对被现在认为是孔德、滕尼斯、威斯勒、里德费尔德、帕克、帕森斯的相互关联的、世俗的、来世论的遗产几乎每一个方面的放弃——也就是,认识到"比较的方法"和原始主义人类学,由于充满欧洲中心的偏见和不适当的方法论,具有天生的缺陷;小社区的礼俗社会被法理社会的政治经济无法抗拒的力量推翻了;发现同化现象并不是必然的;认识到种族团结和聚居区的维持会有一个很长的时期(有时候把深嵌的内部不和谐与对外部展现的社会文化的团结结合起来;有时候作为"虚幻的民族",或者作为公开宣称的种族文化独特性的空壳存在,它掩盖了文化适应现象,该现象已经侵蚀了存在的各种基本形式,或者作为不完全清晰的论断而存在,它宣称一种没有被"熔炉"完全熔化的民族意识)——民族志学和人种学可以根据自己的主张出现了①。

民族志学不必再服务于进步理论的利益,该理论倡导瓦解每个民族的精神气质;不必再描绘田园牧歌式的宁静、道德上的优越性,或者描述精神上的安全感,而这些都被假设在没有文字的村落、非西方民族的民俗社会、树木遍布的小社区、美国的小城镇,或者美国的都市或世界大城市中的民族聚居区是可以找到的。民族志学也不必再描绘每一个传统的、以天赋因素为基础的地位群体,沿着社会文化所决定的路径,最终到达大众的、阶级的、市民社会,并在该过程中重组时代的精确位置。

从这些概念和理论上的约束解放出来之后,民族志学和人种学第一次可以把他们自己反对"生活形式"的"生活"(life)革命——齐美尔(Simmel,1968)预示为即将到来的、悲剧性的20世纪的文化革命——的思想付诸行动。齐美尔预言,他所看到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欧洲,将会反对婚姻和卖淫,因为他们认为二者都是性爱的形式,并希望把性爱从它本身的所有形式中解放出来。与此类似,新的民族志学家宣布,他们会从历史意识的重负中获得自我解放,减轻忧

---

① 在人类学中,向新理论的转变包括由小斯托金(George W. Stocking, Jr. ,1983,1984, 1985, 1986, 1988, 1989, 1991)主编的七卷论文中,对民族志学和人种学几乎每一方面的重要的重新评价。里德费尔德的儿子赞扬了向古代经典的转变,以及它们同现代和后现代人类学的关系(参见 J. Redfield, 1991)。

虑的影响(参见 Bloom,1979)①,而心满意足地成为世界堂吉诃德式各种图景的见证人和报道者,这种世界是在宗教和世俗社会理论的废墟上凸现出来的(参见 Kundera, 1988)。

民族志学在社会学和人类学中自我定义的取向和实践,以及把后现代主义理论引入其中,是最近才不规则地发生的,在某种程度上是无序运动。索尔仁尼琴(Solzhenitsyn,1993)曾经指出,"没有与早期创造的有机联系,新的艺术作品就不会存在。"(p.3)在社会科学中也是如此,正如我们在社会学和人类学民族志的新发展中将要看到的。

民族志方法论解放运动的一个开端可以在彼特·曼宁(Peter Manning)的学术论文"分析归纳"(Analytic Induction, 1982/1991)中发现。曼宁力图把民族志学建立在更坚实的符号互动主义理论基础上,希望强化它与"芝加哥学派"经典时期的联系。他首先警告社会学领域的实践者,不要运用"用来处理诸如行为心理学、经济学、医学,或者自然或物理科学等其他学科问题的概念和理论"。他把分析归纳看作一种程序,可从乔治·赫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和弗洛里安·兹纳涅茨基(Florian Znaniecki)关于科学方法的著述中找到渊源。他注意到,这种方法已经或多或少精确地被经典的芝加哥民族志学家托马斯(Thomas)和兹纳涅茨基(Znaniecki),罗伯特·库利·安杰尔(Robert Cooley Angell),阿尔弗雷德·林德史密斯(Alfred Lindesmith)和唐纳德·克雷西(Donald Cressey)使用过。与演绎、历史一文献、统计这些方法不同,分析归纳是"一种非实验的定性社会学方法。为了证明普遍的、一般化的因果联系,它对个案进行了彻底的考察"。案例方法是定性社会学获得新生的重要基础。

因果关系概括的普遍性——在曼宁提供的作为该方法范例的例子中②——是最缺乏说服力的,因为它来自于根据事先阐述的假设对单一个案的研究,这些假设如果与事实不符,可能需要重新论述。在研究了"少数量个案之后",(重新论述的)假设获得了"实践的确定性"(practical certainty)。某个否定性的个案被用来反驳假设,要求对假设进行重新论述。在获得"确定性"之后,"为了论证,还要考察定义规定的范围之外的个案,以便决定最终的假设是否对它们适用"。如果适用,那意味着假设出了问题,因为"科学的概括是由条件陈述构成的。当现象出现的时候,这些条件总是存在,而当现象不存在的时候,该条件就不存在"。曼宁指出,这个过程的两个关键之处是对调查现象的定义,以及形成试验性的假设。然而,最后曼宁承认,分析归纳并不满足科学关于"理论要理解、预测和控制

---

① 一个知识和道德方面的影响是,产生了忧虑、反责和美化的努力,以使申辩、开释或逃脱它给那些人带来的负担。那些人相信,后现代主义是一种左派的、反主流文化的取向,也就是,谴责后现代主义的卓越的哲学创建者——海德格尔和迪曼——同情希特勒政权和纳粹主义,并是他们的支持者。关于这个远未解决的问题的争论,参见:Habermas,1983; Farias,1989; Neske & Kettering, 1990; Ferry & Renaut, 1990; Lyotard, 1990; Rockmore, 1992; Derrida,1992; Hamacher, Hertz, and Keenan,1989;Lehman,1992。后现代主义的另一位主要贡献者——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担心他的性偏好和乱交的生活方式会影响其哲学观点。关于该问题的各种观点,参见:Poster,1987—1988; Foucault,1992; Eribon,1991; Miller,1993; Nikolinakos,1990;Paglia,1991。

② 曼宁使用的一个程序上例子来自于:Cressey,1953, p. 16。

事件"的要求。在仔细而全面地研究了方法论上的不同观点者对该程序的批评之后,曼宁认为,"分析归纳不是一种预测手段;它并不能清楚地建立因果联系;它关于普遍性陈述的论断很可能不能经受有原则的检验"。事实上,曼宁走的更远,他指出,"根据学科最苛求的理想标准,作为一种独特的、哲学的、方法论的观点,分析归纳并没有列举归纳或模拟公理的方法有力"。曼宁的论文看来似乎要从科学的角度排斥民族志学的内在方法。

曼宁对分析归纳弱点的评价,"来自于对实证主义演绎模式的科学努力,该模式获得了被选择群体的关注"。这个模式的支持者力图根据该模式的标准建立社会科学的术语和边界。事实上,尽管几乎没有什么美国学者太多了解社会科学中关于认识论争论的长期历史或其不可解决性,但是,这些争论中的问题正是实证主义者提出的最主要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参见 Rorty, 1982, pp. 191-210)。

在为分析归纳辩护的过程中,曼宁援引了索罗金(Sorokin,1965)未被认可的早期批评,也就是,"在特定的时间内,什么被认为是(适当的)方法论,受到时尚、流行和癖好的影响"。曼宁继续称赞分析归纳方法,认为它是"资料和概念的可行来源",可以帮助调查者挑选出"特定事件的细节,并把它们与那些一般的、理论上的事物区分开来"。戈夫曼(Erving Goffman)当然是一个社会学实践者,他的方法论取向与分析归纳类似,但并不完全相同。他走得更远。在为自己民族志社会学的标签辩护的过程中,他既反对系统建构也反对列举归纳。1961 年,他写道,"当前,如果社会学的概念要受到善意对待的话,每个概念都要被追溯到它最好能运用到哪里,它会导向何方,并揭示其家族的其他概念。也许,不同的外套能比单一绚丽的帐篷让孩子穿上更好的衣服"(p. xiv)。十年后,戈夫曼(Goffman,1971)完全抛弃了实证主义社会学家的科学主张,"这似乎是一种讨人喜欢的魔幻之术,是一种假设如果你仔细考察了可以被归结为科学的行动,科学就会形成。但是,绝对不是如此"(p. xvi)。

随着对人种学过去的目标兴趣的减退,到 20 世纪 70 年代,在社会学(参见 Vidich, Lyman, & Goldfarb, 1981)和人类学(比如 Clifford & Marcus, 1986; Fox, 1991; Mangnaro, 1990)的主流理论中产生了对认识论和隐藏的或秘密的政治用语的不满(参见 Diamond, 1992; Horowitz, 1967)。由此,迫切需要一种理论,既能被用于开展研究项目,又可以把每个学科的资源都看作能够被批判性调查的主题。于是后现代主义出现了,它满足了这种需求。

在论文的末尾,曼宁暗示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会在战后和冷战后的美国集中体现,"在存在主义的时代,自我建构像理论建构一样,是社会学方法的一部分"。他后来感觉到,发展出形式主义和符号学的田野工作方法的原因在于,每一种建构都被看作与他人密切相关,每一种建构都被认为是给身体(Cornwell, 1992; Featherstone, Hepworth, & Turner, 1991; Feher, 1989; Sheets-Johnstone, 1990, pp. 112-113; 1992)和自我(Kotarba & Fontana, 1987; Krieger, 1991; Zaner, 1981)、个人的客观世界(Umwelt)和他人世界(Umwelt 的概念是由 Gurwitsch 1996

发展出来的)提供了扭曲的镜中形象(mirror image)。但是,一些人把批判作为民族志学的方法加以接受,而拒绝新形式主义,对这些人来说,这却开启了一个新的调查领域——呈现。因此,一些最好的后现代民族志集中关注展现真实生活的媒介(Bhabha, 1990b; Early, 1993; Gilman, 1991; Trinh, 1991)。之所以从活生生的经历转向被呈现的事物,其原因在于这样一个假设:活生生的经历被认为是亲身经历的,要求在建构"有说服力的虚构"(persuasive fictions)时,把呈现的主题化作为一个重要问题(Baudrllard, 1988a, pp. 27-106; Norris, 1990)。

后现代民族志学家把齐美尔的文化悲剧理论当作既成事实:当前,是不可能把自由漂流的生命,从约束它的所有形式中解放出来的(Strathern, 1990)。后现代社会学派的民族志学家(Sociologist-ethnographer),以及他们研究的对象,处在一个摇摆不定的世界中:一端是对消逝的美好时光的虚幻记忆,一端是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千年之梦。从这样一个位置来看,不仅调查者的立场是有问题的(Lemert, 1992; Weinstein & Weinstein, 1991),而且被调查者也是有问题的。事实上,每个人都"被大众传媒、异化现象、经济、新的家庭和儿童照顾体系、对社会世界的技术化,以及核毁灭的威胁所触及了"(Denzin, 1989, p. 139)。如果人类学家—民族志学者要依照后现代理论前进,他或她必须一方面较少害怕"走向原始"(Torgovnick, 1990),另一方面,要与以前所有来自"原始世界"报告中的欧洲中心论作斗争(Beverly, 1992; Bhabha, 1990a; Dirlik, 1987; Turner, 1992; West, 1992)。库兹米克斯(Kuzmics,1988)指出,对这些民族志学者来说,"文明理论的'演进的渐进主义'(evolutionary gradualism)不能解释文明的同时出现,我们需要更彻底地面对'野蛮状况'(barbarism)"(p. 161)。

正如分析归纳论的提倡者所建议的,让我们从对新理论——后现代——的定义开始。斯普里特奈克(Spretnak,1991)是一个后现代主义的批评家,她提出了一个综合的、有用的定义:

> 分离、替代和浅薄的盟约统治着解构的后现代美学,因为毫无根据(groundlessness)是这种敏感性认识到的唯一常量。世界被认为是"社会生产"的压抑的迷宫,是一种被文化推拉,并弥漫着"权力体制"的虚假的自我建构。价值和伦理被认为像"历史"一样是任意的。"历史"被解构的后现代主义者看作是一组事实,或者是他人为服务于自我而对事实的选择。解构的后现代主义者抛弃了所有的"元叙事"(metanarratives),或者在想象中对现实的普遍呈现,而坚持认为,人类存在的每个方面都是文化创造的,是在特殊的、不能被一般化的、地方化的环境中被决定的。然而,即使是特殊化的意义,也被认为是相对的和暂时的(pp. 13-14)。

斯普里特奈克的定义让我看见后现代民族志学者是如何前进的。后现代主义民族志学者进入到了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他或她被要求在方法论上变成分离的、可替代的。这样的民族志学者事实上被按照齐美尔(Simmel,1950)的"陌生人"(stranger,也参见 Frisby, 1992)和帕克(Park,1929/1969a)及斯通奎斯特(Stonequist,1937/1961)的"边缘人"(marginalized person,也参见 Wood,

1934/1969, pp. 245-284)被重新建构了。理想型的民族志学家是能够悬置自我身份(in-spite of-themselves),像他们这种社会科学家需将自我定位成其研究对象的居住地和生活世界的新来者开始研究工作(参见 Agar, 1980; Georges & Jones, 1980; D. Rose, 1989)。他或她是一个居民—学者(citizen-scholar, Saxton, 1993)和参与观察者(Vidich, 1955)。为了追求"深度描述"(thick descriptions, Geertz, 1973),民族志学对于老的传统和目标,尤其是对有效概括和实质性结论的追求,暂时顾不上了。这种"深度描述"会反过来使得"深刻诠释"(thick interpretations)——把民族志学加入到传记和活生生的经历中——成为可能(Denzin, 1989, pp. 32-34)。除了地方的民间历史进入到该学科使用的有关动机和行为的词汇以外,历史被从民族志工作中消除掉了①。因为,要跨越后现代的划分(Borgmann, 1992; I. Chambers, 1990),要求放弃所有已经建立的和预想的价值、理论、角度、偏好和偏见。民族志学家必须把这些相提并论,把它们当作任意的、偶然的,而不是支配的、导向的(Rosenau, 1992, pp. 25-76)。因此,后现代主义民族志学者采纳了德里达(Derrida, 1976, 1981)、利奥塔(Lyotard, 1989)、博德利拉(Baudrillard, 1981, 1983, 1988b)的目标,为了所有关于知识的批判性怀疑主义,要剥夺所有已被接受的文本和已建立话语的特权。这样做使民族志学者替代并解构了他或她自己在地位等级中的位置,因为这些地位等级经常掩盖了它们作为二分法的特性(参见 Bendix & Berger, 1959;关于对二分法的后现代分析,参见 Lyman, 1992a)。所有这些都被赋予了偶然性——语言的偶然性、自我的偶然性,以及社区的偶然性(Rorty, 1989; C. Taylor, 1989)。

对人类学家来说,新形式的民族志学开始于对他们不可减少的局限性的认识:在一本专著中,民族志信息的表达是一种"文本",并因此而容易受到后现代视角带来的与文本有关的整个批评手段的影响②。民族志事业被认为是经常由一个未适应文化的陌生人来承担的任务,他被一种诗意和政治的不稳定混合物所引导,尽力去理解外来文化。首先,民族志学现在被认为是一件作品——它不能被用来呈现或再现以前的民族志学宣称的老的和新的意识形态:对直接经历的没有更改、没有过滤的记录,对"他者"文化的精确描述。

后现代的批评已经造成了当前人类学的某种危机。在对其他危机的反应中,一种新的自我—他人的意识站到了前台,反思性的要求已经把注意力转向了民族志的文学的、政治的和历史的特征,以及职业的要求,这些迄今为止都没有被注意到。一些学科领头人,比如克里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克劳德·利瓦伊—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维克特·特纳(Victor Turner)已经模糊了艺术和科学之间的过去的区分,并对主张严格的精确、坚定的事实叙述、无偏见报道的基础形成了挑战,这些基础原本表明了彼此区分的界限。

重读古典民族志学的经典著作,现在成为了最重要的任务。如果我们要挖

① 关于历史学和民族志学关系的几个问题的讨论,参见:Comaroff & Comaroff, 1992; Natanson, 1962。

② 接下来可见克里福德和马库斯(Clifford & Marcus, 1986)的论文和评论。

掘那些著作,发现它们被隐藏的真相和限制的障碍,必须设计一种结构主义者的新方法。这些经典现在被视为西方殖民主义时代的产物,并在方法论上受到表达它们的文学传统和意识形态的约束。然而,这些民族志学并不能被今天和明天的人类学家转移到该学科可抛弃的、孩童时期的历史垃圾桶里去。考虑到几乎没有人会遵循类似于马林诺夫斯基或者鲍德梅克尔(Powdermaker)的职业轨迹——也就是,或者花费几十年生命与没有文字的大洋洲民族居住在一起,或者把接近地观察一群南部非洲人的民族志任务转向另一部分,居住在被隔离的密西西比小城镇的黑人中间,然后转向另外的人,或者仔细考察好莱坞的电影工厂是如何成为"梦工厂"的——当今和不久的将来的民族学家很可能就做一种民族志学——一种申明自己具有人种学家的称号和把大量的学术生命花费在田野之外的权利。

此外,职业上的考虑并不是影响民族学的唯一因素。这个"领域"本身就被曾经"原始的"民族的非殖民化和现代化步伐压缩了。由于这些原因,重读老的民族志学成为了一种替代性方法,可以去体验该学科最初的研究方式,然而,批判它们给民族学家提供一个让他或她远离现代主义者弱点的途径。除了专题民族志学和那些选择城市和工业化背景下的后现代社会学民族志学家的研究领域的人类学家之外,人类学民族志的任务可能成为专用于阅读文本和写作批评。这个"领域"可能位于某人的图书馆或某人的研究之中。

在假设了后现代民族志学者的认识论立场和失去了特权的社会地位之后,社会学版本的新民族志学的两个基本问题是它与社会变迁和社会行动之间的关系,以及它表现现实的适用范围。

布洛维(Burawoy et al., 1992)在他们"被解放的民族志学"(ethnography unbound)的概念和"扩展的个案方法"(intended case method)的作用中提出并回答了第一个问题。他们把民族志学者引向了观察事件发生的宏观政治、经济和历史背景,并在后者中发现了控制和抗拒的基本问题(也参见 Feagin, Orum, & Sjoberg, 1991)。邓津(Denzin,1989)是一个后现代民族志学方法的领导者,他用两种尽管相关但不同的方式,提出了一般性问题。他给民族志学者的建议是,他们首先应该沉浸在他们的研究对象的生活当中,在通过努力实现对这些生活的深刻理解之后,产生融入背景的再生产以及对对象讲述的故事的理解。最后,民族志报告将展现对经验和理论的完整综合。"最后的解释是多元表达的、对话性的。它建立在对本地人的理解基础上,仅仅是清楚表达了那些理解中隐含的东西。"(p.120)邓津在策略上走出了认识论的死胡同,是把后现代状况作为展现新型民族志学的好机会。这些认识论上的死胡同,可以在一些观察中得到体现,比如贝里对在一个种族民族多元主义社会中,进行有效的一般化的可能性的怀疑主义,或者对由于社会学家提倡实证主义和自然科学模式而导致对结果的种类和性质的怀疑论(T. R. Vaughan, 1993, p.120)。实际上,邓津鼓励一种与在本体论上是荒谬的,但对生活于其中的人是有意义的民族志态度(参见 Lyman & Scott, 1989)。因此,他主张,世界现在已经进入到了第四个纪元(继古代、中世

纪、现代之后),最新的纪元是“后现代时期”(Denzin, 1989, p. 138),进而进行了方法论上的论述。对这个时期适用的民族志方法,是致力于“理解这个历史性的时刻如何在有趣的个人生命中把自己普遍化的”(p. 189)。方法和实质在共同的认识中结合起来了,在同样世界上的每个人共享这种认识,并对它做出反应。对共同条件的研究和对不寻常反应的揭示,成为了后现代时期脆弱但不落俗套的社会学方法的经纬。

后现代是一种文化形式,是一个历史时代。关于前者,正如齐美尔注意到的所有形式,它引起了对抗的和反叛的趋势。然后,它也遭受了倒数第二个文化悲剧——不能把生命从它的所有形式中解放出来(Weinstein & Weinstein, 1990)。然而,在这个时代,社会学家—民族志学者不会仅仅观察那段历史,他或她也会参与到对自由的永恒追求中去,成为人类生命的“痛苦、愤怒、情感经历、大大小小的胜利、创伤、恐惧、忧虑、梦想、幻想和希望”的伙伴和报道者。这些构成了这个时代的民族志学——该领域的真实故事(Van Maanen, 1988)。

民族志学的方法已经变得高度精确和多样化了,从事民族志研究的原因也增加了。新的民族志学不再与曾经引领和关注早期民族志学者工作的价值相联系,它们涉及大量扩展了的研究主题,仅仅受到现代生活中经历种类的限制。民族志学的观察所依托的观点与现代生活中生活方式的选择一样伟大。我们希望,民族志方法技术上的精练有助于找到更好的理解现代世界的新问题。

尽管在某种层面上讲,所有的研究都是独特的个人事业——不是神圣的知识积累的一部分——但它总是受到对调查者来说并不是唯一的价值的引导:我们都是自己社会和文化历史的创造者。然而,当我们自己的研究经历的独特性与我们先辈的理论和同辈人的研究相关联时,这些独特性就具有了重要价值,对他人也有了意义。只有当民族志学者意识到激发他们的思想来源,并愿意去面对它们的时候,他们才能实现对社会和文化的理解。



参考文献

Abeyesekere, G. (1992). *The apotheosis of Captain Cook: European mythmaking in the Pacific.*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Abrahams, R. D. (1964). *Deep down in the jungle: Negro narrative folklore from the streets of Philadelphia.* Hatboro, PA: Folklore Associates.

Abrahams, R. D. (1970). *Positively black.*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Abrahams, R. D. (1992). *Singing the master: The emergence of African American culture in the plantation South.* New York: Pantheon.

Abrahamson, H. J. (1980). Assimilation and pluralism. In S. Thernstrom (Ed.), *Harvard 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ethnic group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Abrams, P., & Wrigley, E. A. Eds.). (1979). *Towns and societies: Essays in economic history and historical soci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dler, P. A., Adler, P., & Fontana, A. (1987). Everyday life sociology. In K. Plummer (Ed.),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Vol. 1. Foundations and history* (pp. 436-454). Brookfield, VT: Edward Elgar.

Agar, M. H. (1980). *The professional stranger: An informal introduction to ethnograph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Alba, R. (1985). *Italian Americans: Into the twilight of ethnicity.*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Alba, R. (Ed.). (1989). *Ethnicity and race in the U. S. A.: Toward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Routledge, Chapman Hall.

Alba, R. (1990). *Ethnic identity: The transformation of white America.*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Aldrich, R. (1990). *The French presence in the South Pacific*, 1842-1940.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Anderson, E. (1978). *A place on the corn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Anderson, K. J. (1991). *Vancouver's Chinatown: Racial discourse in Canada*, 1875-1980. Montreal: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Anderson, N. (1959). *The urban community: A world perspective.* New York: Henry Holt.

Anderson, N. (1961). *The hobo: The sociology of the homeless ma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23)

Anderson, T. L. (Ed.). (1992). *Property rights and Indian economics.*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Arsenault, R. (1988). *St. Petersburg and the Florida dream*, 1888-1950. Norfolk, VA: Donning.

Ashmore, M. (1989). *The reflexive thesis: Writing 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Atkinson, P. (1990). *The ethnographic imagination: Textual constructions of reality.* London: Routledge.

Bailey, B. L. (1988). *From front porch to back seat: Courtship in twentieth century America.*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Baker, J. R. (1974). *Ra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all, D. W. (1968). Toward a sociology of telephones and telephoners. In M. Truzzi (Ed.), *Sociology and everyday life* (pp. 59-75).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Barkan, E. (1992). *The retreat of scientific racism: Changing concepts of race in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arrera, M. (1979). *Race and class in the Southwest: A theory of racial inequality.* Notre Dame, IN: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Barrera, M. (1988). *Beyond Aztlan: Ethnic autonomy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Notre Dame, IN: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Baudrillard, J. (1981). *For a critique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sign* (C. Levin, Trans.). St. Louis, MO: Telos.

Baudrillard, J. (1983). *In the shadow of the silent majorities; Or, the end of the social and other essays* (P. Foss, J. Johnston, & P. Patton, Trans.). New York: Semiotext(e).

Baudrillard, J. (1988a). *America* (C. Turner, Trans.). London: Verso.

Baudrillard, J. (1988b). *The ecstasy of communication* (S. Lotringer, Ed.; B. Schutze & C. Schutze, Trans.). New York: Semiotext(e).

Becker, H. (1962). *Through values to social interpretation: Essays on social contexts, actions, types, and prospects.* New York: Greenwood.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50)

Becker, H. (1974). *Systematic sociology: On the basis of the* Beziehungslehre *and* Begildlehre *of Leopold von Wiese.* New York: Arno.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32)

Bender, T. (1978). *Community and social change in America.*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Bendix, R., & Berger, B. (1959). Images of society and problems of concept formation in sociology. In L. Gross (Ed.), *Symposium on sociologcal theory* (pp. 92-118). Evanston, IL: Row, Peterson.

Bensman, J., & Vidich, A. J. (1987). *American society: The welfare state and beyond* (2nd ed.). Amherst, MA: Bergin & Garvey.

Berlo, J. C. (Ed.). (1992). *The early years of Native American art history: The politics of scholarship and collecting.*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Berry, B. (1963). *Almost white.* New York:

Macmillan.

Berry, B., & Tischler, H. (1978). *Race and ethnic relations* (4th ed.).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Beverly, J. (1992). The margin at the center: On *testimonio* (testimonial narrative). In S. Smith & J. Watson (Eds.), *De/colonizing the subject: The politics of gender in women's autobiograph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Bhabha, H. K. (Ed.). (1990a). *Nation and narration*. London: Routledge.

Bhabha, H. K. (1990b). The other question: Differences, discrimination and the discourse of colonialism. In R. Ferguson, M. Gever, Trinh T. M., & C. West (Eds.), *Out there: Marginalization and contemporary cultures* (pp. 71-88). Cambridge: MIT Press.

Bieder, R. E. (1989). *Science encounters the Indian, 1820-1880: The early years of American ethnology*.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Bigham, D. E. (1987). *We ask only a fair trial: A history of the black community of Evansville, Indiana*.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University of Southern Indiana.

Blackman, F. M. (1976). *Spanish institutions of the Southwest*. Glorieta, NM: Rio Grande.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891)

Blackwell, J. E. (1991). *The black community: Diversity and unity* (3rd ed.). New York: HarperCollins.

Blake, C. N. (1990). *Beloved community: The cultural criticism of Randolph Bourne, Van Wyck Brooks, Waldo Frank, and Lewis Mumford*.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Blassingame, J. W. (1979). *The slave community: Plantation life in the antebellum South* (Rev. e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launer, R. (1972). *Racial oppression in America*. New York: Harper & Row.

Bloom, H. (1979). *The anxiety of influence: A theory of poetr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lumenthal, A. B. (1933). *A sociological study of a small town*.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Bock, K. E. (1948). *The comparative method*.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Bock, K. E. (1952). Evolution and historical process.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54, 486-496.

Bock, K. E. (1956). *The acceptance of histories: Toward a perspective for social scienc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ock, K. E. (1963). Evolution, function and chang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7, 229-237.

Bock, K. E. (1966). The comparative method of anthropology.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8, 269-280.

Bock, K. E. (1974). Comparison of histories: The contribution of Henry Maine.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16, 232-262.

Boeke, J. H. (1946). *The evolution of the Netherlands Indies economy*. New York: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Boeke, J. H. (1948). *The interests of the voiceless Far East: Introduction to Oriental economics*. Leiden, Netherlands: Universitaire Pers Leiden.

Bogardus, E. S. (1930). A race relations cycl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35, 612-617.

Bogardus, E. S. (1940). Current problems of Japanese Americans. *Sociology and Social Research*, 25, 63-66.

Bogardus, E. S. (1970). *The Mexican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Arno/New York Time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34)

Bohman, J. (1991). *New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 Cambridge: MIT Press.

Borgmann, A. (1992). *Crossing the postmodern divid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Bowden, H. W (1981). *American Indians and Christian missions: Studies in cultural conflic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Boxer, C. R. (1965). *Portuguese society in the tropics: The municipal councils of Goa, Macao, Bahia, and Luanda*.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Boxhill, B. R. (1992). *Blacks and social justice* (Rev. ed.).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Bradford, P. V., & Blume, H. (1992). *Ota Benga: The Pygmy in the zoo.* New York: St. Martin's.

Brookhiser, R. (1991). *The way of the WASP: How it made America, and how it can save it, so to speak.* New York: Free Press.

Brookhiser, R. (1993, March 1). The melting pot is still simmering. *Time*, p. 72.

Brown, R. (1984). *The nature of social laws: Machiavelli to Mil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rown, W. O. (1934). Culture contact and race conflict. In E. B. Reuter (Ed.), *Race and culture contacts* (pp. 34-47). New York: McGraw-Hill.

Burawoy, M., Burton, A., Ferguson, A. A., Fox, K. J., Gamson, J., Gartrell, N., Hurst, L., Kurzman, C., Salzinger, L., Schiffman, J., & Ui, S. (Eds). (1992). *Ethnography unbound: Power and resistance in the modern metropoli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urgess, E. W. (1916). The social survey: A field for constructive service by departments of sociolog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21, 492-500.

Burgess, E. W., & Bogue, D. J. (Eds.). (1967). *Contributions to urban soci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Burma, J. H. (Ed.). (1985). *Mexican-American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Washington, DC: Urban Institute.

Button, J. W (1989). *Blacks and social change: Impact of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in southern communiti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Calloway, C. G. (Ed.). (1991). *Dawnland encounters: Indians and Europeans in northern New England.* Hanover, NH: 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

Campbell, W. D. (1992). *Providence.* Atlanta: Longstreet.

Caplow, T., Bahr, H. M., Chadwick, B. A., Hill, R., & Williamson, M. H. (1982). *Middletown families: Fifty years of change and continuit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Caplow, T., Bahr, H. M., Chadwick, B. A., Hill, R., & Williamson, M. H. (1983). *All faithful people: 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Middletown's religi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Cavan, R. S. (1965). *Suicide.* New York: Russell & Russell.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28)

Chambers, C. A. (1971). *Paul U. Kellogg and the survey: Voices for social welfare and social justic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Chambers, I. (1990). *Border dialogues: Journeys into postmodernity.* London: Routledge.

Chan, S. (1991). *Asian Americans: An interpretive history.* Boston: Twayne.

Cherokee Nation v. Georgia, 30 U.S. (5 Pet.) 1 (1831).

Christopher, R. C. (1989). *Crashing the gates: The de-WASPing of America's power elite.*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Clifford, J. (1986). On ethnographic self-fashioning: Conrad and Malinowski. In T. C. Heller, M. Sosna, & D. E. Wellbery (Eds.), *Reconstructing individualism: Autonomy, individuality, and the self in Western thought* (pp. 140-162).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Clifford, J. (1990). On collecting art and culture. In R. Ferguson, M. Gever, Trinh T. M., & C. West (Eds.). *Out there: Marginalization and contemporary cultures* (pp. 1-169). Cambridge: MIT Press.

Clifford, J., &: Marcus, G. E. (Eds.). (1986). *Writing cultur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Codrington, R. H. (1891). *The Melanesians.* Oxford: Clarendon.

Codrington, R. H. (1974). Mana. In A. Montagu (Ed.), *Frontiers of anthropology* (pp. 255-259).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Reprinted from *The Melanesians*, Oxford: Clarendon, 1891)

Cohen, S. R. (1981). *Reconciling industrial conflict and democracy: The Pittsburgh survey and the growth of social research in the United States.*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Coleman, M. C. (1985). *Presbyterian missionary attitudes toward American Indians*, 1837-1893. Jackson: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Comaroff, J., & Comaroff, J. (1992). *Ethnography and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Boulder, CO: Westview.

Contosta, D. R. (1980). *Henry Adams and the American experiment.* Boston: Little, Brown.

Cornell, S. (1988). The transformation of tribe: Organization and self-concept in Native American ethnicities.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11, 27-47.

Cornwell, R. (1992). Interactive art: Touching the "body in the mind." *Discourse: Journal for Theoretical Studies in Media and Culture*, 14, 203-221.

Covello, L. (1967). *The social background of the Italo-American school child: A study of the southern Italian family mores and their effect on the school situation in Italy and America* (F. Cordesco, Ed.). Leiden, Netherlands: E. J. Brill.

Cressey, D. R. (1953). *Other people's money: A study in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embezzlement.* Glencoe, IL: Free Press.

Culin, S. (1967). Zuni pictures. In E. C. Parsons (Ed.), *American Indian life* (pp. 175-178).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22)

Cushing, F. H. (1974). *Zuni breadstuff.* New York: Museum of the American Indian, Keye Foundation.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20)

Cushing, F. H. (1979). *Zuni: Selected writings of Frank Hamilton Cushing* (J. Green, Ed.).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Cushing, F. H. (1988). *Zuni folk tales.* Tucs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01)

Cushing, F. H. (1990). *Cushing at Zuni: The correspondence and journals of Frank Hamilton Cushing*, 1878-1884 (J. Green, Ed.). Albuquerque: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

Dai, B. (1970). *Opium addiction in Chicago.* Montclair, NJ: Patterson Smith.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37)

Dale, E. E. (1984). *The Indians of the Southwest: A century of development under the United States.*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49)

Dansereau, H. K. (1961). Some implications of modern highways for community ecology. In G. A. Theodorsen (Ed.), *Studies in human ecology* (pp. 175-187). Evanston, IL: Row, Peterson.

Davis, A. K. (1980). *Thorstein Veblen's social theory.* New York: Arno.

Davis, P. (1982). *Hometown: A contemporary American chronicle.*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Degerando, J.-M. (1969). *The observation of savage peoples* (F. C. T. Moore, Trans.).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800)

Denzin, N. K. (1989). *Interpretive interactionism.* Newbury Park, CA: Sage.

Derrida, J. (1976). *Of grammatology* (G. C. Spivak, Tran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Derrida, J. (1981). *Positions* (A. Bass, Tra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Derrida, J. (1992). *The other heading: Reflections on today's Europe* (P.-A. Brault & M. B. Naas, Tran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Diamond, S. (1963). The search for the primitive. In I. Goldston (Ed.), *Man's image in medicine and anthropology* (pp. 62-115).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Diamond, S. (1972). Anthropology in question. In D. Hymes (Ed.), *Reinventing anthropology* (pp. 401-429). New York: Pantheon.

Diamond, S. (1992). *Compromised campus: The collaboration of universities with the intelligence community*, 1945-1955.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Diggins, J. P. (1978). *The bard of savagery: Thorstein Veblen and modern social theory.* New York: Seabury.

Diner, S. J. (1975). Department and discipline: The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1892-1920. *Minerva*, 13, 518-519, 538.

Dirlik, A. (1987). Culturalism as hegemonic ideology and liberating practice. *Cultural Critique*, 6, 13-50.

Dockstader, F. J. (1985). *The Kachina and the white man: The influences of white culture on the Hopi Kachina religion* (Rev. ed.). Albuquerque: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

Douglas, J. (1974). A brief history of sociologists of everyday life. In J. Douglas et al. (Eds.), *Introduction to the sociologies of everyday life* (pp. 182-210). Boston: Allyn & Bacon.

Drake, S. C., & Cayton, H. R. (1962). *Black metropolis: A study of Negro life in a northern city* (Rev. ed., Vols. 1-2). New York: Harper Torchbooks.

Drinnon, R. (1987). *Keeper of concentration camps: Dillon S. Myer and American rac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Du Bois, W. E. B. (1967). *The Philadelphia Negro: A social study.* New York: Benjamin Blom.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899)

Duffy, J. (1959). *Portuguese Afric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Duncan, O. D. (1957). Community size and the rural-urban continuum. In P K. Hatt & A. J. Reiss, Jr. (Eds.), *Cities and society: The revised reader in urban sociology* (pp. 35-45). Glencoe, IL: Free Press.

Duneier, M. (1992). *Slim's table: Race, respectability, and masculin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Early, G. (Ed.). (1993). *Lure and loathing: Essays on race, identity, and the ambivalence of assimilation.* New York: Allen Lane/Penguin.

Eggan, F. (1966). *The American Indian: Perspectives for the study of social change* (The Lewis Henry Morgan Lectur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lmer, M. C. (1914). *Social surveys of urban communities.*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Engels, F. (1884). *The origins of the family,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 Moscow: Foreign Languages.

Eribon, D. (1991). *Michel Foucault* (B. Wing. Tran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Ericksen, E. G. (1980). *The territorial experience: Human ecology as symbolic interaction.*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Espiritu, Y. L. (1992). *Asian American panethnicity: Bridging institutions and identities.*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Etzioni, A. (1959). The ghetto: A re-evaluation. *Social Forces*, 37, 255-262.

Evans, A. S., & Lee, D. (1990). *Pearl City, Florida: A black community remembers.* Boca Raton: Florida Atlantic University Press.

Farias, V. (1989). *Heidegger and Nazism* (J. Margolis & T. Rickmore, Eds.; P. Burrell & G. Ricci, Trans.).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Faris, R. E. L. (1970). *Chicago sociology, 1920-1932.*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Faris, R. E. L., & Dunham, H. W. (1965). *Mental disorders in urban areas: An ecological study of schizophrenia and other psychos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39)

Feagin, J. R., Orum, A., & Sjoberg, G. (1991). The present crisis in U. S. sociology. In J. R. Feagin, A. M. Orum, & G. Sjoberg, *A case for the case study* (pp. 269-278).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Featherstone, M., Hepworth, M., & Turner, B. S. (Eds.). (1991). *The body: Social process and cultural theory.* London: Sage.

Feher, M. (Ed.). (1989). *Fragments for a history of the human body* (Vols. 1-3). Cambridge: MIT Press/Zone.

Ferry, L., & Renaut, A. (1990). *Heidegger and modernity* (F. Philip, Tra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Firey, W., Loomis, C. P., & Beegle, J. A. (1950). The fusion of urban and rural. In J. Labatut & W. J. Lane (Eds.), *Highways in our national life: A symposium* (pp. 154-163).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Fishman, R. (1977). *Urban utopia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Ebenezer Howard, Frank Lloyd Wright, and Le Corbusier.* New York: Basic Books.

Fiske, D. W., & Shweder, R. A. (Eds.). (1986). *Metatheory in social science: Pluralisms and subjectiviti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Fontana, A. (1974). Toward a complex universe: Existential sociology. In J. Douglas et al. (Eds.), *Introduction to the sociologies of everyday life* (pp. 155-181). Boston: Allyn & Bacon.

Forbes, J. D. (1973). *Aztecs delnorte: The Chicanos of Aztlan.* Greenwich, CT: Fawcett.

Forbes, J. D. (1988). *Black Africans and Native Americans: Color, race and caste in the evolution of red-black peoples.* New York: Blackwell.

Forrest, S. (1989).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village: New Mexico's Hispanics and the New Deal.* Albuquerque: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

Foucault, M. (1992). *Michel Foucault, philosopher* (T. J. Armstrong, Ed. & Trans.). New York: Routledge, Chapman & Hall.

Fox, R. G. (Ed.). (1991). *Recapturing anthropology: Working in the present.* Santa Fe, NM: School of American Research Press.

Frazier, E. F. (1925). Durham: Capital of the black middle class. In A. Locke (Ed.), *The new Negro* (pp. 333-340). New York: Albert & Charles Boni.

Frazier, E. F. (1931). *The Negro family in Chicago.*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Frazier, E. F. (1937a). The impact of urban civilization upon Negro family lif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 609-618.

Frazier, E. F. (1937b). Negro Harlem: An ecological stud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43, 72-88.

Frazier, E. F. (1953). The theoretical structure of sociology and sociological research.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4, 292-311.

Frazier, E. F. (1957a). *Black bourgeoisie: The rise of a new middle class in the United States.* Glencoe, IL: Free Press/Falcon's Wing.

Frazier, E. F. (1957b). *The Negro in the United States* (Rev. ed.). New York: Macmillan.

Frazier, E. F. (1963). *The Negro church in America.* New York: Schocken.

Frazier, E. F. (1966). *The Negro family in the United States* (Rev.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Phoenix.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39)

Frazier, E. F. (1967). *Negro youth at the crossways: Their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in the middle states.* New York: Schocken.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40)

Frazier, E. F. (1968). *E. Franklin Frazier on race relations: Selected papers* (G. F. Edwards,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Freeman, D. (1983). *Margaret Mead and Samoa: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an anthropological myth.*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Frisby, D. (1992). *Simmel and since: Essays on Georg Simmel's social theory.* London: Routledge.

Fuchs, L. H. (1990). *The American kaleidoscope: Race, ethnicity, and the civic culture.* Hanover, NH: 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

Fukuyama, F. (1992).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Free Press.

Furnivall, J. S. (1948). *Colonial policy and practic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Burma and Netherlands India.*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Galarza, E. (1964). *Merchants of labor: The Mexican bracero story—an account of the managed migration of Mexican farm workers in California*, 1942-1960. San Jose, CA: Rosicrucian.

Galarza, E. (1970). *Spiders in the house and*

workers in the field. Notre Dame, IN: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Galarza, E. (1977). *Farm workers and agri-business in California*, 1947-1960. Notre Dame, IN: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Gamio, M. (1969). *Mexican immigrat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A study of human migration and adjustment.* New York: Arno/New York Time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30)

Gamio, M. (1971). *The life story of the Mexican immigrant: Autobiographic documents.* New York: Dover.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31)

Gans, H. J. (1962). *The urban villagers: Group and class in the life of Italian-Americans.* New York: Free Press.

Garbaccia, D. R. (1984). *From Sicily to Elizabeth Street: Housing and social change among Italian immigrants*, 1880-1930.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Geertz, C. (1973). Thick description: Toward an interpretive theory of culture. In C. Geertz,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Selected essays* (pp. 3-32). New York: Basic Books.

Gellner, E. (1979). Beyond truth and falsehood, or no method in my madness. In E. Gellner, *Spectacles and predicaments: Essays in social theory* (pp. 182-19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eorges, R. A., & Jones, M. O. (1980). *People studying people: The human element in fieldwork.*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Geschwender, J. A. (1978). *Racial stratification in America.* Dubuque, IA: William C. Brown.

Gilman, S. L. (1991). *Inscribing the other.*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Ginsburg, C. (1991). *Ecstasies: Deciphering the witches' sabbath* (R. Rosenthal, Trans.). New York: Pantheon.

Ginsburg, C. (1993). The European (re) discovery of the shamans. *London Review of Books*, 15, 2.

Gist, N. P., & Halbert, L. A. (1947). *Urban society* (2nd ed.). New York: Thomas Y. Crowell.

Glazer, N. (1954). Ethnic groups in America: From national culture to ideology. In M. Berger, T. Able, & C. H. Page (Eds.), *Freedom and control in modern society* (pp. 158-173). New York: D. Van Nostrand.

Gleason, P. (1980). American identity and Americanization. In S. Thernstrom (Ed.), *Harvard 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ethnic groups* (pp. 31-58).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Glick, C. E. (1955). Social roles and social types in race relations. In W. A. Lind (Ed.), *Race relations in world perspective* (pp. 239-262).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Goddard, P. E. (1976). *Indians of the Southwest.* Glorieta, NM: Rio Grande.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13)

Goffman, E. (1949). *Some characteristics of response to depicted experience.*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University of Chicago.

Goffman, E. (1959).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Goffman, E. (1961). *Asylums: Essays on the social situation of mental patients and other inmates.*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Goffman, E. (1971). *Relations in public: Microstudies of the public order.* New York: Basic Books.

Goffman, E. (1974). *Frame analysis: An essay on the organization of experience.* New York: Harper Colophon.

Gonzalez, N. L. (1967). *The Spanish Americans of New Mexico: A heritage of pride.* Albuquerque: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

Grant, M. (1992). *A social history of Greece and Rome.*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Gray, J. (1970). The intellectual standing of different races and their respective opportunities for culture. In G. Spiller (Ed.), *Papers on inter-racial problems communicated to the First Universal Race Congress, University of London, July* 26-29, 1911 (pp. 79-85). New York: Citadel.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11)

Greek, C. E. (1978). The social gospel movement and early American sociology, 1870-1915. *Graduate Faculty Journal of Sociology*, 3(1), 30-42.

Greek, C. E. (1992). *The religious roots of American sociology.* New York: Garland.

Gullick, J. M. (1956). *The story of early Kuala Lumpur.* Singapore: Donald Moore.

Gurwitsch, A. (1966). The last work of Edmund Husserl. In A. Gurwitsch, *Studies in phenomenology and psychology.* Evanston, I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Gusfield, J. R. (1975). *Community: A critical response.* New York: Harper Colophon.

Gutierrez, R. A. (1991). *When Jesus came the corn mothers went away: Marriage, sexuality and power in New Mexico,* 1500-1846.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Gwertzman, B., & Kaufman, M. T. (Eds.). (1992).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Soviet empire.* New York: New York Times.

Habermas, J. (1983). Martin Heidegger: The great influence (1959). In J. Habermas, *Philosophical-political profiles* (F. G. Lawrence, Trans.; pp. 53-60). Cambridge: MIT Press.

Hamacher, W., Hertz, N., & Keenan, T. (Eds.). (1989). *On Paul de Man's wartime journalism.*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Hammersley, M. (1992). *What's wrong with ethnography? Methodological explorations.* London: Routledge.

Hanke, L. (1965). *The Spanish struggle for justice in the conquest of America.* Boston: Little, Brown.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49)

Hanke, L. (1970). *Aristotle and the American Indians: A study in race prejudice in the modern world.*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59)

Hanke, L. (1974). *All mankind is one: A study of the disputation between Bartolome de Las Casas and Juan Gines de Sepulveda on the religious and intellectual capacity of the American Indians.* De Kalb: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Hannerz, U. (1980). *Exploring the city: Inquiries toward an urban anthropolog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Hansen, M. L. (1952). The problem of the third generation immigrant. *Commentary,* 14, 492-500.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38)

Hare, A. P., & Blumberg, H. H. (1988). *Dramaturgical analysis of social interaction.* New York: Praeger.

Harré, R. (1980). *Social being: A theory for social psychology.* Totowa, NJ: Rowman & Littlefield.

Harré, R. (1984). *Personal being: A theory for individual psycholog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Hartland, E. S. (1969). *Primitive society: The beginnings of the family and the reckoning of descent.* New York: Harper & Row.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21)

Hartmann, E. G. (1967). *The movement to Americanize the immigrant.* New York: AM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48)

Havemeyer, L. (1929). *Ethnography.* Boston: Ginn.

Hechter, M. (1975). *Internal colonialism: The Celtic fringe in British national development,* 1536-1966.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Heizer, R. F., & Kroeber, T. (Eds.). (1979). *Ishi the last Yahi: A documentary hist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Herberg, W. (1960). *Protestant-Catholic-Jew: An essay in American religious sociology.*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Herskovitz, M. (1958). *The myth of the Negro past.* Boston: Beacon.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41)

Herskovitz, M. (1966). *The new world Negro: Selected papers in Afroamerican studies* (F. S. Herskovitz, Ed.).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Hill-Lubin, M. A. (1992). "Presence Africaine": A voice in the wilderness, a record of black kinship. In V. Y. Mudimbe (Ed.), *The surreptitious speech: Presence Africaine and the politics of otherness,* 1947-1987 (pp. 157-173).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Hinsley, C. M., Jr. (1981). *Savages and scientists: Th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anthropology,* 1846-1910. Washington, DC: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Hodgen, M. T. (1936). *The doctrine of survivals: A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scientific method in the study of man.* London: Allenson.

Hodgen, M. T. (1964). *Early anthropology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Hodgen, M, T. (1974). *Anthropology, history and cultural change.* Tucs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Wenner-Gren Foundation for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Holden, A. C. (1970). *The settlement idea: A vision of social justice.* New York: Arno/New York Time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22)

Hollingshead, A. B. (1961). *Elmtown's youth: The impact of social classes on adolescents.* New York: Science Edition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49)

Holmes, L. D. (1987). *Quest for the real Samoa: The Mead/Freeman controversy and beyond.* South Hadley, MA: Bergin & Garvey.

Horowitz, I. L. (Ed.). (1967). *The rise and fall of Project Camelot: Studies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science and practical politics.* Cambridge: MIT Press.

Hosle, V. (1992). The Third World as a philosophical problem. *Social Research*, 59, 230-262.

Hughes, E. C. (1928). *A study of a secular institution: The Chicago Real Estate Board.*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Humphreys, S. C. (1978). *Anthropology and the Greeks.*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Hune, S., et al. (Eds.). (1991). *Asian Americans: Comparative and global perspectives.* Pullman: 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Ignacio, L. F. (1976). *Asian Americans and Pacific Islanders (Is there such an ethnic group?).* San Jose, CA: Pilipino Development Associates.

Immigration Commission (W. P. Dillingham, Chair). (1970). *Immigrants in industry* (25 parts). New York: Arno/New York Time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11)

Jackson, J. S. (Ed.). (1991). *Life in black America.* Newbury Park, CA: Sage.

Jaimes, M. E. (Ed.). (1992). *The state of Native America: Genocide, colonization and resistance.* Boston: South End.

Jalali, R., & Lipset, S. M. (1992-1993). Racial and ethnic conflicts: A global perspective.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07(4), 585-606.

Johnson, J. M. (1975). *Doing field research.* New York: Free Press.

Jones, J. (1992). *Soldiers of light and love: Northern teachers and Georgia blacks*, 1865-1873. Athens: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Joyner, C. (1984). *Down by the riverside: A South Carolina slave community.*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Keegan, W. F. (1992). *The people who discovered Columbus: The prehistory of the Bahamas.* Gain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Keller, R. W., Jr. (1983). *American Protestantism and United States Indian policy*, 1869-1882.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Kennedy, R. J. R. (1944). Single or triple melting pot: Intermarriage trends in New Haven, 1870-1940.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44, 331-339.

Keyes, C. F. (Ed.). (1982). *Ethnic change.*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Kinloch, G. C. (1974). *The dynamics of race relations.* New York: McGraw-Hill.

Kitto, H. D. F. (1951). *The Greeks.* London: Penguin.

Kivisto, P. (1984). *Immigrant socialist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case of Finns and the Left.* Cranbury, NJ: Associates University Presses.

Kivisto, P. (Ed.). (1989). *The ethnic enigma: The salience of ethnicity for European-origin groups.* Philadelphia: Balch Institute Press.

Kivisto, P., & Blanck, D. (Eds.). (1990). *American immigrants and their generations: Studies and commentaries on the Hansen thesis after fifty years.*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Kluckhohn, C. (1944). *Navajo witchcraft.*

Boston: Beacon.

Kluckhohn, C. (1961). *Anthropology and the classics: The Colver Lectures in Brown University*, 1960. Providence, RI: Brown University Press.

Knoll, T. (1982). *Becoming Americans: Asian sojourners, immigrants and refugees in the western United States.* Portland, OR: Coast to Coast.

Kotarba, J. A., & Fontana, A. (Eds.). (1987). *The existential self in socie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Kramer, J. R. (1970). *The American minority community.* New York: Thomas Y. Crowell.

Kramer, J. R., & Leventman, S. (1961). *Children of the gilded ghetto: Conflict resolutions of three generations of American Jew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Krieger, S. (1991). *Social science and the self: Personal essays on an art form.*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Kroeber, T. (1962). *Ishi in two worlds: A biography of the last wild Indian in North Americ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Kroeber, T. (1965). *Ishi: Last of his tribe.* New York: Bantam.

Kundera, M. (1988). *The art of the novel* (L. Ascher, Trans.). New York: Grove.

Kuper, A. (1988). *The invention of primitive society: Transformations of an illusion.* London: Routledge.

Kuzmics, H. (1988). The civilizing process (H. G. Zilian, Trans.). In J. Keane (Ed.), *Civil society and the state: New European perspectives.* London: Verso.

Landesco, J. (1968). *Organized crime in Chicago* (Part 3 of the Illinois Crime Survey, 1929).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Lane, J. B., & Escobar, E. J. (Eds.). (1987). *Forging a community: The Latino experience in Northwest Indiana*, 1919-1975. Chicago: Cattails.

Lee, R. H. (1960). *The Chinese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Lee, R. H. (1978). *The growth and decline of Chinese communities in the Rocky Mountain region.* New York: Arno.

Lehman, D. (1992). Signs of the times: Deconstruction and the fall of Paul de Man. *Contention: Debates in Society, Culture and Science*, 1(2), 23-38.

Leighton, A. H. (1945). *The governing of men: General principles and recommendations based on experience at a Japanese relocation camp.*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Lemert, C. (1992). Subjectivity's limit: The unsolved riddle of the standpoint. *Sociological Theory*, 10, 63-72.

Lenzer, G. (Ed.). (1975). *Auguste Comte and positivism: The essential writings.* New York: Harper Torchbooks.

Leonard, K. I. (1992). *Making ethnic choices: California's Punjabi Mexican Americans.*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Lieberson, S. (1961). A societal theory of race and ethnic relation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6, 902-910.

Lieberson, S. (1980). *A piece of the pie: Blacks and white immigrants since* 188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Lieberson, S., & Waters, M. C. (1988). *From many strands: Ethnic and racial groups in contemporary America.*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Liebow, E. (1967). *Tally's corner: A study of Negro street corner men.* Boston: Little, Brown.

Lingeman, R. (1980). *Small town America: A narrative history*, 1620-*the present.*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Lippy, C. H., Choquette, R., & Poole, S. (1992). *Christianity comes to the Americas*, 1492-1776. New York: Paragon.

Lipset, S. M. (1950, May). Changing social status and prejudice: The race theories of a pioneering American sociologist. *Commentary*, 9, 475-479.

Lipset, S. M. (1963). *The first new nation: The United States in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New York: Basic Books.

Lipset, S. M. (1979). *The first new nation: The*

United States in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Rev. ed.). New York: W. W. Norton.

Lopata, H. Z. (1967). The function of voluntary associations in an ethnic community: "Polonia." In E. W. Burgess & D. J. Bogue (Eds.), *Contributions to urban sociology* (pp. 203-223).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Lopreato, J. (1970). *Italian Americans.* New York: Random House.

Lovejoy, A. O. (1960). *The great chain of being: A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an idea.* New York: Harper Torchbooks.

Lugard, L. (1965). *The dual mandate in British tropical Africa.* Hamden, CT: Archon/Shoe String.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22)

Luhmann, N. (1986). The individuality of the individual: Historical meanings and contemporary problems. In T. C. Heller, M. Sosna, & D. E. Wellbery (Eds.), *Reconstructing individualism: Autonomy, individuality, and the self in Western thought* (pp. 313-328).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Lyman, S. M. (1961-1962). Overseas Chinese in America and Indonesia: A review article. *Pacific Affairs*, 34, 380-389.

Lyman, S. M. (1963). Up from the "hatchet man." *Pacific Affairs*, 36, 160-171.

Lyman, S. M. (1964). The spectrum of color. *Social Research*, 31, 364-373.

Lyman, S. M. (1972). *The black American in sociological thought: A failure of perspective.*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Lyman, S. M. (1974). Conflict and the web of group affiliation in San Francisco's Chinatown, 1850-1910.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43, 473-499.

Lyman, S. M. (1975). Legitimacy and consensus in Lipset's America: From Washington to Watergate. *Social Research*, 42, 729-759.

Lyman, S. M. (1978). The acceptance, reje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histories. In R. H. Brown & S. M. Lyman (Eds.), *Structure, consciousness and history* (pp. 53-105).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yman, S. M. (1979). Stuart Culin and the debate over trans-Pacific migration. *Journal for the Theory of Social Behaviour*, 9, 91-115.

Lyman, S. M. (1982a). Stewart Culin: The earliest American Chinatown studies and a hypothesis about pre-Columbian migration. *Annual Bulletin of the Research Institute for Social Science* (Ryukoku University, Kyoto, Japan), 12, 142-162.

Lyman, S. M. (1982b). Two neglected pioneers of civilizational analysis: The cultural perspectives of R. Stewart Culin and Frank Hamilton Cushing. *Social Research*, 44, 690-729.

Lyman, S. M. (1986). *Chinatown and Little Tokyo: Power, conflict and community among Chinese and Japanese immigrants in America.* Millwood, NJ: Associated Faculty.

Lyman, S. M. (1990a). Asian American contacts before Columbus: Alternative understandings for civilization, acculturation, and ethnic minority status in America. In S. M. Lyman, *Civilization: Contents, discontents, malcontents and other essays in social theory.* Fayetteville: University of Arkansas Press.

Lyman, S. M. (1990b). *Civilization: Contents, discontents, malcontents and other essays in social theory.* Fayetteville: University of Arkansas Press.

Lyman, S. M. (1992a). The assimilation-pluralism debate: Toward a postmodern resolution of the American ethnoracial dilemm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tics, Culture and Society*, 6, 181-210.

Lyman, S. M. (1992b). *Militarism, imperialism and racial accommodation: An analysis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early writings of Robert E. Park.* Fayetteville: University of Arkansas Press.

Lyman, S. M., & Scott, M. B. (1967). Territoriality: A neglected sociological dimension. *Social Problems*, 15, 236-248.

Lyman, S. M., & Scott, M. B. (1989). *A sociology of the absurd* (2nd ed.). Dix Hills, NY: General Hall.

Lynd, R. S., & Lynd, H. M. (1937).

Middletown in transition: A study in cultural conflict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Lynd, R. S., & Lynd, H. M. (1956). *Middletown: A study in modern American culture*.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29)

Lyon, L. (1987). *The community in urban society*. Chicago: Dorsey.

Lyotard, J.-F. (1989). The sign of history. In A. Benjamin (Ed.), *The Lyotard reader* (pp. 393-411). Cambridge, MA: Blackwell.

Lyotard, J.-F. (1990). *Heidegger and "the Jews"* (A. Michel & M. Roberts, Tran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Manganaro, M. (1990). Textual play, power, and cultural critique: An orientation to modernist anthropology. In M. Manganaro (Ed.), *Modern anthropology: From fieldwork to text* (pp. 3-47).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Mangiafico, L. (1988). *Contemporary American immigrants: Patterns of Filipino, Korean, and Chinese settle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Praeger.

Manning, P. K. (1987). *Semiotics and fieldwork*. Newbury Park, CA: Sage.

Manning, P. K. (1991). Analytic induction. In K. plummer (Ed.),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Vol. 2. Contemporary issues* (pp. 401-430). Brookfield, VT: Edward Elgar. (Reprinted from *Qualitative methods*, by R. Smith & P. K. Manning, Eds., 1982, Cambridge, MA: Ballinger)

Marable, M. (1983). *How capitalism underdeveloped black America: Problems in race, political economy, and society*. Boston: South End.

Marcus, G. E. (1986). Contemporary problems of ethnography in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In J. Clifford & G. E. Marcus (Eds.), *Writing cultur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 (pp. 165-193).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Martin, C. (Ed.). (1987). *The American Indian and the problem of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arty, M. E. (1992). Foreword. In Bartolome de Las Casas, *In defense of the Indians: The defense of the most reverend Lord, Don Fray Bartolome de Las Casas, of the Order of Preachers, late Bishop of Chiapa, against the persecutors and slanderers of the peoples of the New World discovered across the seas* (C. M. S. Poole, Ed. & Trans.). De Kalb: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552)

Masuoka, J. (1946). Race relations and Nisei problems. *Sociology and Social Research*, 30, 452-459.

Maunier, R. (1949). *The sociology of colonie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race contact* (E. O. Lorimer, Ed. & Trans.; Vols. 1-2).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McCluer, F. L. (1928). *Living conditions among wage-earning families in forty-one blocks in Chicago*.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McClymer, J. F. (1980). *War and welfare: Social engineering in America*, 1890-1925. Westport, CT: Greenwood.

McGee, W. J. (1971). *The Seri Indians of Bahia Kino and Sonora, Mexico* (Seventeenth Annual Report of the Bureau of American Ethnology to the Secretary of th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1895-1896, part 1). Glorieta, NM: Rio Grande.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899)

McKenney, T. L., & Hall, J. (1972). *The Indian Tribes of North America—with biographical sketches and anecdotes of the principal chiefs* (Vols. 1-3). Totowa, NJ: Rowman & Littlefield.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836)

McKenzie, R. D. (1968). *On human ecology: Selected writings* (A. H. Hawley,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McKinney, J. C., in collaboration with Loomis, C. P (1957). The application of *Gemeinschaft* and Gesellschaft as related to other typologies. In F. Tönnies, *Community and society* (*Gemeinschaft and Gesellschaft*) (C. P. Loomis, Ed. & Trans.; pp. 12-29). East Lansing: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Mead, M. (1960a). *Coming of age in Samoa: A*

psychological study of primitive youth for Western civilization. New York: Mentor.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28)

Mead, M. (1960b). *Growing up in New Guinea: A comparative study of primitive education.* New York: Mentor.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30)

Mead, M. (1960c). *Male and female: A study of the sexes in a changing world.* New York: Mentor.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49)

Mead, M. (1960d). *Sex and temperament in three primitive societies.* New York: Mentor.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35)

Mead, M. (1975). *New lives for ol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Manau*, 1928-1953.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56)

Messenger, P. M. (Ed.). (1991). *The ethics of collecting cultural property: Whose culture? Whose property?* Albuquerque: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

Miller, J. (1993). *The passion of Michel Foucault.*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Milner, C. A., II, & O'Neil, F. A. (Eds.). (1985). *Churchmen and the Western Indians*, 1820-1920.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Milson, K. (1991-1992). (En) countering imperialist nostalgia: The Indian reburial issue. *Discourse: Journal for Theoretical Studies in Media and Culture*, 14, 58-74.

Miner, H. (1952). The folk-urban continuum.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7, 529-537.

Minnich, E. K. (1990). *Transforming knowledge.*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Montagu, A. (Ed.). (1968). The concept of the primitive. New York: Free Press.

Morgan, G. (Ed.). (1983). *Beyond method: Strategies for social research.* Beverly Hills, CA: Sage.

Morgan, L. H. (1964). *Ancient society* (L. White, Ed.). Cambridge, MA: Belknap.

Moorhouse, G. (1988). *Imperial city: New York.* New York: Henry Holt.

Murdock, G. P. (1965). *Social structure.* New York: Free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49)

Murdock, G. P. (1934). *Our primitive contemporaries.* New York: Macmillan.

A museum is set to part with its Indian treasures. (1993, February 19). *New York Times*, p. A12.

Myer, D. S. (1971). *Uprooted Americans: The Japanese Americans and the War Relocation Authority during World War II.* Tucs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Nader, L. (1972). Up the anthropologist: Perspectives gained from studying up. In D. Hymes (Ed.), *Reinventing anthropology* (pp. 284-311). New York: Pantheon.

Natanson, M. (1962). History as a finite province of meaning. In H. Natanson, *Literature, philosophy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Essays in existentialism and phenomenology* (pp. 172-178).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Nelli, H. S. (1970). *The Italians in Chicago*, 1880-193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ske, G., & Kettering, E. (1990). *Martin Heidegger and National Socialism: Questions and answers* (L. Harries & J. Neugroschel, Trans.). New York: Paragon House.

Nikolinakos, D. D. (1990). Foucault's ethical quandary. *Telos*, 23, 123-140.

Nisbet, R. A. (1969). *Social change and history: Aspects of the Western theory of develop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isbet, R. A. (1972). Ethnocentrism and the comparative method. In A. R. Desai (Ed.), *Essays on modernization of underdeveloped societies* (Vol. 1, pp. 95-114). New York: Humanities Press.

Nisbet, R. A. (1977). *Sociology as an art for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isbet, R. A. (1986). Developmentalism: A critical analysis. In R. A. Nisbet, *The making of modern society* (pp. 33-69).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Nomura, G. M., et al. (Eds.). (1989). *Frontiers of Asian American studies: Writing, research and commentary.* Pullman: 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Nordenskiold, G. (1979). *The cliff dwellers of the Mesa Verde* (O. L. Morgan, Trans.). Glorieta, NM: Rio Grande.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893)

Norris, C. (1990). Lost in the funhouse: Baudrillard and the politics of postmodernism. In R. Boyne & A. Rattansi (Eds.), *Postmodernism and society* (pp. 119-153). New York: St. Martin's.

Novak, M. (1972). *The rise of the unmeltable ethnics: Politics and culture in the seventies.* New York: Macmillan.

Novak, M. (1980). Pluralism: A humanistic perspective. In S. Thernstrom (Ed.), *Harvard 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ethnic groups* (pp. 772-781).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Numbers, R. (1992). *The creationists: The evolution of scientific creationism.*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Oakes, K. B. (1938). *Social theory in the early literature of voyage and exploration in Africa.*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Officer, J. E. (1987). *Hispanic Arizona*, 1536-1856. Tucs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Okihiro, G. Y. (1988). The idea of community and a "particular type of history." In G. Y. Okihiro et al. (Eds.), *Reflections on shattered windows: Promises and prospects for Asian American studies* (pp. 175-183). Pullman: 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Okihiro, G. Y., et al. (Eds.). (1988). *Reflections on shattered windows: Promises and prospects for Asian American studies.* Pullman: 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Olivier, S. (1970). The government of colonies and dependencies. In G. Spiller (Ed.), *Papers on inter-racial problems communicated to the First Universal Race Congress, University of London, July* 26-29, 1911 (pp. 293-312). New York: Citadel.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11)

Padilla, F. M. (1985). *Latino ethnic consciousness: The case of Mexican Americans and Puerto Ricans in Chicago.* Notre Dame, IN: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Paglia, C. (1991). Junk bonds and corporate raiders: Academe in the hour of the wolf. *Arion: A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the Classics* (third series), 1(2), 139-212.

Park, R. E. (1952a). *The collected papers of Robert Ezra Park: Vol. 2. Human communities: The city and human ecology* (E. C. Hughes et al., Eds.). Glencoe, IL: Free Press.

Park, R. E. (1952b). Community organization and the romantic temper. In R. E. Park, *The collected papers of Robert Ezra Park: Vol. 2. Human communities: The city and human ecology* (E. C. Hughes et al., Eds.; pp. 64-72). Glencoe, IL: Free Press.

Park, R. E. (1952c). Magic, mentality and city life. In R. E. Park, *The collected papers of Robert Ezra Park: Vol. 2. Human communities: The city and human ecology* (E. C. Hughes et al., Eds.; pp. 102-117). Glencoe, IL: Free Press.

Park, R. E. (1967). The city: Suggestions for the investigation of human behavior in the urban environment. In R. E. Park, E. W. Burgess, & R. D. McKenzie (Eds.), *The city* (pp. 1-46).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25)

Park, R. E. (1969a). Human migration and the marginal man. In E. W. Burgess (Ed.), *Personality and the social group* (pp. 64-77). Freeport, NY: Books for Libraries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29)

Park, R. E. (1969b). Introduction. In R. Adams, *Interracial marriage in Hawaii: A study of mutually conditioned responses to acculturation and amalgamation* (pp. xiii-xiv). Montclair, NJ: Patterson Smith.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37)

Park, R. E. (1971). *The immigrant press and its control: The acculturation of immigrant groups into American society.* Montclair, NJ: Patterson Smith.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22)

Parsons, T. (1949).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ion: A study on social theory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a group of recent European writers.* Glencoe, IL: Free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37)

Parsons, T. (1966). *Societies: Evolutionary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Parsons, T. (1971). *The system of modern societie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Parsons, T. (1973). Some afterthoughts on *Gemeinschaft* and *Gesellschaft.* In W. J. Cahnman (Ed.), *Ferdinand Tönnies: A new evaluation* (pp. 140-150). Leiden, Netherlands: E. J. Brill.

Patterson, O. (1982). *Slavery and social death: A comparative stud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atterson, O. (1991). *Freedom: Vol. 1. Freedom in the making of Western culture.* New York: Basic Books.

Peacock, J. L. (1986). *The anthropological lens: Harsh lights, soft focu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ike, K. (1967). *Language in relation to a unified theory of the structure of human bebaviour.* The Hague: Mouton.

Pool, I. de S. (Ed.). (1981). *The social impact of the telephone.* Cambridge: MIT Press.

Poster, M. (1987-1988). Foucault, the present and history. *Cultural Critique*, 8, 105-121.

Pratt, M. L. (1986). Fieldwork in common places. In J. Clifford & G. E. Marcus (Eds.), *Writing cultur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Quandt, J. B. (1970). *From the small town to the great community: The social thought of the progressive intellectuals.*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Rabinow, P., & Sullivan, W. M. (Eds.). (1979). *Interpretive social science: A reade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Radin, P. (1927). *The story of the American Indian.* New York: Boni & Liveright.

Radin, P. (1957a). *Primitive man as philosopher.* New York: Dover.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27)

Radin, P. (1957b). *Primitive religion: Its nature and origin.* New York: Dover.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37)

Radin, P. (1963). *The autobiography of a Winnebago Indian: Life, ways, acculturation, and the peyote cult.* New York: Dover.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20)

Radin, P. (1966). *The method and theory of ethnology: An essay in criticism.* New York: Basic Book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33)

Radin, P. (1970). *The Italians of San Francisco: Their adjustment and acculturation.* San Francisco: R&E Research Associate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35)

Radin, P. (Ed.). (1971a). *The golden mountain: Chinese tales told in California, collected by Jon Lee.* Taipei: Cave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36)

Radin, P. (1971b). *The world of primitive man.* New York: Dutton.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53)

Radin, P. (1973). *The Winnebago tribe.*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23)

Radin, P. (1976). *The trickster: A study in American Indian mythology.* New York: Schocken.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56)

Rae, J. g. (1965). *The American automobile: A brief hist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Ratzel, F. (1988). *Sketches of urban and cultural life in North America* (S. A. Stehlin, Ed. & Trans.).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876)

Redfieid, J. (1991). Classics and anthropology. *Arion: A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the* Classics (third series), 1(2), 5-23.

Redfield, R. (1928). *A plan for the study of Tepoztlan, Mexico.*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Redfield, R. (1930). *Tepoztlan—A Mexican village: A study of folk lif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Redfield, R. (1941). *The folk culture of Yucata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Redfield, R. (1960). *The little community and peasant society and cultur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Redfield, R. (1962a). The folk society and civilization. In M. P. Redfield (Ed.), *The papers of Robert Redfield: Vol. 1. Human nature and the study of socie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Redfield, R. (1962b). *A village that chose progress: Chan Kom revisit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50)

Redfield, R. (1963). Talk with a stranger. In M. P. Redfield (Ed.), *The papers of Robert Redfield: Vol. 2. The social uses of social science* (pp. 270-284).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Redfield, R., & Rojas, A. V. (1962). *Chan Kom: A Maya villag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34)

Redfield, R., & Singer, M. B. (1973). The cultural role of the cities: Orthogenetic and heterogenetic change. In G. Germani (Ed.), *Modernization, urbanization, and the urban crisis* (pp. 61-71). Boston: Little, Brown.

Reid, D. (Ed.). (1992). *Sex, death and God in L. A.* New York: Pantheon.

Reuter, E. B. (1969). *The mulatto in the United States: Including a study of the role of mixed-blood races throughout the world.* New York: Negro Universities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18)

Rivers, W. H. R. (1974). The psychological factor. In A. Montagu (Ed.), *Frontiers of anthropology* (pp. 391-409).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Reprinted from *Essays on the depopulation of Melanesia*, by W. H. R. Rivers, Ed., 192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ockmore, T. (1992). *On Heidegger's Nazism and philosoph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Roper, M. W. (1935). *The city and the primary group.*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Rorty, R. (1982). *Consequences of pragmatism: Essays, 1972-1980.*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Rorty, R. (1989). *Contingency, irony and solidar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ose, A. (Ed.). (1988). *Universal abandon? The politics of postmodernis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Rose, D. (1989). *Patterns of American culture: Ethnography and estrangement.*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Rosenau, P. M. (1992). *Post-modernism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Insights, inroads, and intrusion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Ross, R. H., & Bogardus, E. S. (1940). The third generation race relations cycle: A study in Issei-Nisei relationships. *Sociology and Social Research*, 24, 357-363.

Rossi, p. (1987). *The dark abyss of time: The history of the earth and the history of nations from Hooke to Vico* (L. G. Cochrane, Tra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Rouse, I. (1992). *The Tainos: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people who greeted Columbu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Royce, p. (1982). *Ethnic identity: Strategies of diversit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Rubel, A. J. (1971). *Across the tracks: Mexican Americans in a Texas city.*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Sachs, W. (1947). *Black anger.* New York: Grove.

Sadri, A. (1992). *Max Weber's sociology of intellectual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almond, A. (1991). *Two worlds: First meetings between Maori and Europeans, 1642-1772.*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Sanchez, G. S. (1967). *Forgotten people: A study of New Mexicans.* Albuquerque: Calvin Horn.

Sanderson, S. K. (1990). *Social evolutionism: A critical history.* Cambridge, MA: Blackwell.

Sando, J. S. (1992). *Pueblo nations: Eight centuries of Pueblo Indian history.* Santa Fe, NM: Clear Light.

Sarana, G. (1975). *The methodology of anthropological comparison: An analysis of comparative methods in social and cultural anthropology.* Tucs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Saxton, S. L. (1993). Sociologist as citizen-scholar: A symbolic interactionist alternative to normal sociology. In T. R. Vanghan, G. Sjoberg, & L. J. Reynolds (Eds.). *A critique of contemporary American sociology* (pp. 232-251). Dix Hills, NY: General Hall.

Schatzman, L., & Strauss, A. L. (1973). *Field research: Strategies for a natural sociology.*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Schietinger, E. F. (1967). Racial succession and changing property values in residential Chicago. In E. W. Burgess & D. J. Bogue (Eds.), *Contributions to urban sociology* (pp. 86-99).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chlesinger, A. M., Jr. (1991). *The disuniting of America: Reflections on a multiculiural society.* Knoxville, TN: Whittle.

Schoolcraft, H. R. (1975). *Personal memoirs of a residence of thirty years with the Indian tribes of the American frontiers, with brief notices of passing events, facts and opinions,* A. D. 1812 to A. D. 1842. New York: Arno.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851)

Schrag, P. (1970). *The decline of the WASP.*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Schrag, P. (1973). *The end of the American future.*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Schwatka, F. (1977). *In the land of cave and cliff dwellers.* Glorieta, NM: Rio Grande.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893)

Sheets-Johnstone, M. (1990). *The roots of thinking.*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Sheets-Johnstone, M. (Ed.). (1992). *Giving the body its due.*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Sheridan, T. E. (1986). *Los Tucsonenses: The Mexican community in Tucson,* 1854-1941. Tucs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Shibutani, T., & Kwan, K. M. (1965). *Ethnic stratification: A comparative approach.* New York: Macmillan.

Simmel, G. (1950). The stranger. In G. Simmel, *The sociology of Georg Simmel* (K. H. Wolff, Ed. & Trans.; pp. 402-408). Glencoe, IL: Free Press.

Simmel, G. (1968). *The conflict in modern culture and other essays* (K. P. Etzkorn, Ed. & Trans.).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Press.

Siu, P. C. P. (1987). *The Chinese laundrymen: A study of social isolation* (J. K. W Tchen, Ed.).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Smith, A. D. (1989). *The ethnic origin of nations.* New York: Blackwell.

Smith, C. W. (1979). *A critique of sociological reasoning: An essay in philosophical sociology.* Oxford: Blackwell.

Smith, M. G. (1965). *The plural society in the British West Indi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mith, M. p. (1979). *The city and social theory.* New York: St. Martin's.

Solzhenitsyn, A. (1993, February 7). The relentless cult of novelty and how it wrecked the century.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p. 3.

Sorokin, P. (1965). *Fads and foibles in modern sociology and related sciences.* Chicago: Henry Regnery-Gateway.

Spicer, E. A., Hansen, A. T., Luomala, K., & Opler, M. K. (1969). *Impounded people: Japanese-Americans in the relocation centers.* Tucs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Spier, L. (1978). *Yuman tribes of the Gila River.* New York: Dover.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33)

Spretnak, C. (1991). *States of grace: The recovery of meaning in the postmodern age.* New York: HarperCollins.

Statler, O. (1983). *Japanese pilgrimage.*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Stein, M. (1964). The eclipse of community: Some glances at the education of a sociologist. In A. J. Vidich, J. Bensman, & M. Stein (Eds.), *Reflections on community studies.* New York: John Wiley.

Steinberg, S. (1981). *The ethnic myth: Race,*

ethnicity, and class in America. New York: Atheneum.

Stocking, G. W., Jr. (Ed.). (1983). *Observers observed: Essays on ethnographic field work.*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Stocking, G. W., Jr. (Ed.). (1984). *Functionalism historicized: Essays on British social anthropology.*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Stocking, G. W., Jr. (Ed.). (1985). *Objects and Others: Essays on museums and material culture.*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Stocking, G. W, Jr. (Ed.). (1986). *Malinowski, Rivers, Benedict and others: Essays on culture and personality.*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Stocking, G. W., Jr. (Ed.). (1988). *Bones, bodies, behavior: Essays on biological anthropology.*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Stocking, G. W, Jr. (Ed.). (1989). *Romantic motives: Essays on anthropological sensibility.*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Stocking, G. W, Jr. (Ed.). (1991). *Colonial situations: Essays on the contextualization of ethnographic knowledge.*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Stone, R. W (1921). *The origin of the survey movement.*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Stonequist, E. V. (1961). *The marginal man: A study in personality and culture conflict.* New York: Russell & Russell.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37)

Strathern, M. (1990). Out of context: The persuasive fictions of anthropology, with comments by I. C. Jarvie, Stephen A. Tyler and George E. Marcus. In M. Manganaro (Ed.), *Modern anthropology: From fieldwork to text* (pp. 80-130).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Street corner society revisited [Special issue]. (1992).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21(1), 3-132.

Sumner, W. G. (1940). *Folkways: A study of the sociological importance of usages, manners, customs, mores, and morals.* Boston: Ginn.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06)

Sumner, W G. (1969). Foreword. In J. E. Cutler, *Lynch-law: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history of lynch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p. v). Montclair, NJ: Patterson Smith.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05)

Suret-Canale, J. (1988a). The end of chieftancy in Guinea. In J. Suret-Canale, *Essays on African history: From the slave trade to neocolonialism* (C. Hurst, Trans.). Trenton, NJ: Africa World.

Suret-Canale, J. (1988b). Guinea in the colonial system. In J. Suret-Canale, *Essays on African history: From the slave trade to neocolonialism* (C. Hurst, Trans.). Trenton, NJ: Africa World.

Suttles, G. D. (1972).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communiti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ymposium on qualitative methods. (1993). *Contemporary Sociology,* 22, 1-15.

Takaki, R. (1989). *Strangers from a different shore: A history of Asian Americans.* New York: Penguin.

Taylor, C. (1989). *Sources of the self: The making of modern identit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Taylor, P. S. (1970). *Mexican labor in the United States* (Vols. 1-2). New York: Arno/New York Time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30)

Taylor, P. S. (1983). *On the ground in the thirties.* Salt Lake City: Peregrine Smith.

Tedlock, B. (1992). *The beautiful and the dangerous: Encounters with the Zuni Indians.* New York: Viking.

Teggart, F. J. (1941). *The theory and processes of hist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Thernstrom, S. (Ed.). (1980). *Harvard 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ethnic group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Thomas, W. I., & Znaniecki, F. (1958). *The Polish peasant in Europe and America.* New

York: Dover.

Thrasher, F. M. (1963). *The gang: A study of 1,313 gangs in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27)

Thucydides. (1972).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R. Warner, Trans.). Harmondsworth: Penguin.

Tilman, R. (1991). *Thorstein Veblen and his critics, 1891-1963.*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Tinder, G. (1980). *Community: Reflections on a tragic ideal.*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Tobias, H. J. (1990). *A history of the Jews in New Mexico.* Albuquerque: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

Todorov, T. (1984). *The conquest of America* (R. Howard, Trans.). New York: Harper & Row.

Toland, J. D. (Ed.). (1993). *Ethnicity and the state.*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Tönnies, F. (1957). *Community and society (Gemeinschaft und Gesellschaft)* (C. P. Loomis, Ed. & Trans.). East Lansing: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887)

Torgovnick, M. (1990). *Gone primitive: Savage intellects, modern liv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Tricarico, D. (1984). *The Italians of Greenwich Village: The social structure and transformation of an ethnic community.* Staten Island, NY: Center for Migration Studies of New York.

Trinh T. M. (1991). *When the moon waxes red: Representation, gender and cultural politics.* New York: Routledge.

Trinkhouse, E., & Shipman, P. (1993). *The Neanderthals: Changing the image of mankind.*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Turner, V. (1992). African ritual and Western literature: Is a comparative symbology possible? In V. Turner, *Blazing the trail: Way marks in the exploration of symbols* (E. Turner, Ed.; pp. 66-88). Tucs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Van Maanen, J. (1988). *Tales of the field: On writing ethnograph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Vaughan, A. T. (1965). *New England frontier: Puritans and Indians, 1620-1675.* Boston: Little, Brown.

Vaughan, T. R. (1993). The crisis in contemporary American sociology: A critique of the discipline's dominant paradigm. In T. R. Vaughan, G. Sjoberg, & L. J. Reynolds (Eds.), *A critique of contemporary American sociology.* Dix Hills, NY: General Hall.

Veblen, T. (1959). *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New York: Mentor.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899)

Veblen, T. (1961a). The blond race and the Aryan culture. In T. Veblen, *The place of science in modern civilization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Russell & Russell.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19)

Veblen, T. (1961b). The mutation theory and the blond race. In T. Veblen, *The place of science in modern civilization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Russell & Russell.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19)

Veblen, T. (1965). *The higher learning in America: A memorandum on the conduct of universities by businessmen.* New York: Augustus M. Kelley.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18)

Veblen, T. (1990). *The instinct of workmanship and the state of the industrial arts.*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14)

Vidich, A. J. (1952). *The political impact of colonial administration.*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Boston.

Vidich, A. J. (1955).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and the collec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dat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60, 335-360.

Vidich, A. J. (1966). Introduction. In P. Radin, *The method and theory of ethnology: An essay in criticism* (pp. vii-cxv). New York: Basic Books.

Vidich, A. J. (1980). *The political impact of colonial administration.* New York: Arno.

Vidich, A. J. (1986). *Anthropology and truth:*

Some old problem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Society, Philadelphia.

Vidich, A. J., & Bensman, J. (1968). *Small town in mass society: Class, power and religion in a rural community* (2nd ed.).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Vidich, A. J., & Lyman, S. M. (1985). *American sociology: Worldly rejections of religion and their direction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Vidich, A. J., Lyman, S. M., &: Goldfarb, J. C. (1981). Sociology and society: Disciplinary tensions and professional compromises. *Social Research*, 48, 322-361.

Vigil, J. D. (1980). *From Indians to Chicanos: The dynamics of Mexican American culture.* Prospect Heights, IL: Waveland.

von Gierke, O. (1990). *Communit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 translation of selections from Das Deutsche Genossenschaftsrecht (the German law of fellowship)* (A. Black, Ed.; M. Fischer, Tra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868)

Wallace, A. F. C. (1987). *St. Clair: A nineteenth-century coal town's experience with a disaster-prone industry.*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Walzer, M. (1980). Pluralism: A political perspective. In S. Thernstrom (Ed.), *Harvard 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ethnic groups* (pp. 781-787).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Ware, C. (1965). *Greenwich Village, 1920-1930: A comment on American civilization in the post-war years.* New York: Harper Colophon.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35)

Warren, R. L. (1963). *The community in America.* Chicago: Rand McNally.

Warren, R. L. (1972). *The community in America* (2nd ed.). Chicago: Rand McNally.

Waters, M. C. (1990). *Ethnic options: Choosing identities in Americ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Wax, R. H. (1971). *Doing fieldwork: Warnings and advi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Weber, A. F. (1967). *The growth of citie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 study in statistic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899)

Weber, D. J. (1992). *The Spanish frontier in North America.*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Weinstein, D., & Weinstein, M. A. (1990). Dimensions of conflict: Georg Simmel on modern life. In M. Kaern, B. H. Phillips, & R. S. Cohen (Eds.), *Georg Simmel and contemporary sociology* (pp. 341-356). Dordrecht, Netherlands: Kluwer.

Weinstein, D., & Weinstein, M. A. (1991). Simmel and the theory of postmodern society. In B. S. Turner (Ed.), *Theories of modernity and postmodernity* (pp. 75-87). London: Sage.

West, C. (1992). Diverse new world. In P. Berman (Ed.), *Debating P. C.: The controversy over political correctness on college campuses* (pp. 326-332). New York: Dell.

White, L. A. (1974). *The A'Coma Indians: People of the sky city* (Forty-Seventh Annual Report of the Bureau of American Ethnology to the secretary of th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1929-1930). Glorieta, NM: Rio Grande.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33)

Williams, R. A., Jr. (1990). *The American Indian in Western legal thought: The discourses of conques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illiams, V. J., Jr. (1989). *From a caste to a minority: Changing attitudes of American sociologists toward Afro-Americans, 1896-1945.* Westport, CT: Greenwood.

Willis, W. S., Jr. (1972). Skeletons in the anthropological closet. In D. Hymes (Ed.), *Reinventing anthropology* (pp. 121-152). New York: Pantheon.

Wirth, L. (1938). Urbanism as a way of lif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44, 1-24.

Wirth, L. (1945). The problem of minority groups. In R. Linton (Ed.), *The science of man in the world crisis* (pp. 347-372).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Wirth, L. (1956). *The ghetto*.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28)

Wissler, C. (1923). *Man and culture*. New York: Thomas Y. Crowell.

Wissler, C. (1956). Foreword. In R. S. Lynd & H. M. Lynd, *Middletown: A study in modern American culture*.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29)

Wissler, C. (1966a). *Indians of the United States* (Rev. ed.).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40)

Wissler, C. (1966b). *Red man reservations*. New York: Collier.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38)

Wood, M. M. (1969). *The stranger: A study in social relationships*. New York: AM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34)

Woods, F. J. (1956). *Cultural values of American ethnic groups*.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Woods, F. J. (1972). *Marginality and identity: A colored Creole family through ten generations*.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Woods, R. A., & Kennedy, A. J. (1990). *The settlement horizon*.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22)

Wu, C. C. (1926). *Chinese immigration in the Pacific area*.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Whyte, W. F. (1943a). *Street corner society: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an Italian slu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Whyte, W. F. (1943b). A slum sex cod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49, 24-31.

Whyte, W. F. (1955). *Street corner society: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an Italian slum* (2nd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Whyte, W. F. (1981). *Street corner society: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an Italian slum* (3rd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Zaner, R. M. (1981). *The context of self: A phenomenological inquiry using medicine as a clue*. Athens: Ohio University Press.

Zorbaugh, H. W. (1929). *The Gold Coast and the slu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Zorbaugh, H. W. (1968). The dweller in furnished rooms: An urban type. In E. W. Burgess (Ed.), *The urban community: Selected papers from the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Sociological Society*, 1925 (pp. 98-105). Westport, CT: Greenwood.

通过行动研究重建大学和社会的关系[①] 3

RECONSTRUCTING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UNIVERSITIES AND SOCIETY THROUGH ACTION RESEARCH

⊙ 戴维·J·格林伍德　默顿·勒温

社会科学中理论和实践的关系，以及大学和社会的关系构成了本章的核心内容，特别是影响科学院或社会科学研究的部分②。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们主张把行动研究作为局部地改变大学内部结构的手段同时也作为一种方法去加强大学中社会研究人员与大学之外广大支持者的关系。在进行这些讨论时，我们讨论了学术过程的一系列标准前提，其中包括明确而且广泛采用的应用研究和纯研究的区别，社会研究中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的差异。我们认为，除了在概念上的差别外，这些二分法并不具有意义，它们不能作为社会研究实践的指导性概念③。

我们关于学术界的批判是直率的和不妥协的。我们之所以这样是为了获得清晰性，但是我们认识到，世界并不像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图画一样简单。一些社会科学家的确有效地整合了实践和理论，有些社会科学家有效地连接了大学以外的环境，一些多学科的项目和团队获得了学术上的成功，还有一些社会科学家洞察到定性研究和定量的复杂组合是社会科学改革的中心。然而，由于学院式的社会科学的当前结构，大量基于大学的社会研究具有彻头彻尾的反实践导向。这又影响了大学管理者的内心结构。我们相信，除了正在增长的实践导向的社会研究者群体的努力，在大学系统的绝大部分，几乎没有人对在基本层面改变现

---

① 作者注：这一章是三篇文章的综合和扩展："行动研究、科学和社会研究的新合成"（Greenwood & Levin 1998a），"大学的重建：寻找知识发展过程的不同整合"（Greenwood & Levin，1998c），"行动研究导论：社会变迁的社会研究"（Greenwood & Levin，1998b）。

② 由于林肯和邓津，以及非常有帮助且具有挑战性的批评者、读者博尔达（Orlando Fals Borda）和史密里奇（Linda Smirich），这一章节的准备成为了一次特别富有成果的知识体验。所有的评价都是有用的，而这个过程的最后阶段尤其有益。林肯不让这些问题漏掉，她认为这些东西太重要了，她用巧妙的批评和鼓励的方式"压迫"我们。在她的督促下，我们用有效的方式，通过体现三方电子邮件对话，不断思考以澄清了我们的论述。这些讨论既澄清了我们的论述，又使我们对大学的批评真正令人满意。读者将是这个过程的受益人。

③ 这个观点也许会因为显而易见而使有些读者感到惊讶。然而，常常令人惊讶的还有学术同仁和社会研究的使用者把应用研究和定性方法融为一体的现象。我们认为这是建立在一种假定上的非理性推论，这种假定认为，因为应用研究被认为不是科学的，它必定在某种程度上是定性的。

存安排有紧迫感①。

即使读者同意我们对学术性机构和社会科学的极具批判性的描述,还是很有可能会不同意由这些描述导出的行动暗示。我们知道,在其他机构有很多出色的人,他们在出版物、教学,以及对学校改革的压力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是,我们个人并不相信仅靠这种必须但有限增加的个人努力,对获得必须的改革来说是足够的。在我们看来,当前的情况被各种强大的力量所决定,需要更系统化的,更对抗性的和多国的改革努力。有鉴于此,虽然我们在我们的研究机构和通过网络和其他很多全球同侪一起工作,我们仍然寻求通过我们的写作和工作达到更直接对抗。我们的不妥协的批判只有在我们相信情况真的会改变,才会使我们有伦理和政治上的意义。我们做下面的事情并且把我们的工作看成对建设性社会过程的贡献,而不只是一声哀叹。

我们相信,各种不同的、差异很大的大学可以由现存机构建立,而且他们可以扮演重要的社会功能。即使我们认为现在的大学在培养年轻人方面做得并不好,但没有证据表明,将有一个新的机构在培养这些批判的、反思的、文化的和社会性忙碌的新骨干年轻人方面能替代大学。我们深刻关注这些批评和社会相关研究的努力被大学里面的自产系统化(autopoctic)和自我参照(self-referential)的学术性活动所破坏,这些学术活动都是被职业机会主义和试图成为老师模仿者而非原创的思想者的学生所控制。现在的教育制度对模仿性的学生,而非拥有对社会整体具有广博的、独立的理解的有创造性的、批判性的和分析性的专业人士有利。大学的核心挑战是从传统的讲课模式转向基于解决实际生活、开放式问题的学习机制。

为什么我们认为学院式的社会研究者对更高标准的社会责任负责是恰当的呢? 总地来说,社会科学家在同大众和私人资助者争论时,声称他们的学派和活动是总体上有益于社会的。我们只需要看看众多的职业社会科学协会的宣言就可以看到其正当性。此外,许多学院的社会科学家的行为暴露了他们和自己同一专业的同事对话的中心。这在大多数情况下反映了他们从大学训练中开始的职业社会化情形。作为结果,他们都表现出对他们工作结果的应用缺乏关心,或者直接摒弃应用这些结果,他们要么争论说如果和超出大学的世界联系会损害知识分子自治,要么,如果他们是实证主义,认为这样的联系威胁他们的"客观性"。为了批评这种行为,我们把注意力放在学院式社会科学正当性的宣称和这些学派成员的日常实践之间的不一致上。

虽然我们倡导行动研究是从学院化社会科学到有社会意义的任务转化的有前途的方法,但我们并不是仅仅基于行动研究在道德上的优越性。我们讨论的

① 读者会注意到,我们认为,社会研究必须对变迁、多样化的观点和回应的复杂性有开放的心态。因而我们认为行动研究是最有价值的一种社会研究。所以,看起来我们并没有倡导多元论,因为我们没有对我们的学术同仁采取"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姿态。不管这个批评的逻辑,我们反对它是因为我们倡导这样一种关于社会科学使命的观点,这和总的正当性完全一致,即社会科学家从这些学科开始的时候就放弃了他们的工作。我们的同仁们一致说,社会科学因为它对社会的理解和进步的贡献而存在和被资助。我们简单地指出,这些传统的学术化的社会科学家的实践违背了他们声称的原则,而行动研究则对这些原则乐于接受。

中心在于,主张行动研究可以带来传统的社会科学曾经许诺的有效的知识、理论的发展,以及社会的进步。行动研究把学院派社会科学宣称要做的事情做得更好。因此我们倡导行动研究作为传统社会科学实践在学术圈的成果斐然的替代品。看来学院派社会科学仅有选择是,继续坚持他们对扮演有用的社会角色没有任何义务,或者因为他们只是不愿意做,或者他们不能想象他们的工作怎么才能应用。显然,承认这些会造成制度性和财政方面的后果,但至少可以扫清现在的困惑。

大学的历史

为了理解当代大学里面社会科学的两难困境是怎么产生的,我们需要了解一些大学历史的知识。下面的讨论是简洁和肤浅的,但是包含了我们讨论的核心成分。

我们的大学起源具有修道院的色彩,他们擅长于作为高等学习中心,这个源于由教堂赋予修道院的功能。虽然最初大学是用来提供更高级培训神职人员的教会机构,时间长了,就成为世俗赞助者和教会共同的机构,用来培训医生、律师、公证人、工程师和其他世俗的职业人士。欧洲最早的大学出现于13世纪(例如博罗尼亚大学、萨拉门哥大学)。

和我们现在最熟悉的大学形式最相像的大学主要是普鲁士的发明,它的建筑和赞助人是威廉·梵·洪堡(1767—1835),他不是孤单的文化英雄,他用非常清晰的方式描绘大学的设计和逻辑。洪堡的大学重建的一项重要的操作原则是关于研究和教学的联合。大学教员和学生应该能够学习和进行研究,因为大学教育应该是基于研究,而不是基于未经检验的教条。洪堡的大学课程包括历史、哲学、古典语言,以及政治经济学,突破了以前的大学通常没有的对学科的跨越。

在洪堡的系统中,思考和探索的自由是大学生活规则的中心,这个观点是我们讨论的中心内容。自由的提问意味着研究不能受理论和政治的限制。为了保证这一自由,洪堡大学把决定什么可以教、可以写,什么不可以教、不可以写的最终决定权交给学校系统,而不是教会或政治的权威。同事们在被完全告知并在求知欲(而不是教会当局或政治领袖)的驱动下,被赋予互相规范其他人知识方面的行动的权力。

这种大学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种机构迅速成为西方社会最"先进"的知识中心。在很短的时间内,洪堡大学模式在课程设置、研究实施和教育社会精英等方面具有近乎无限的控制力。这些社会精英因而成为大学的支持者,大学—精英关系变得非常有自我强化力(参见:Bourdieu,1988)。大学变成了使"市民"管理和实施民族国家增多的一个重要设置(Readings,1996)。

学院系统以及与它相关的同行审查机构致力于从理论教条和政治操纵限制中获得知识分子自由。虽然强调此问题显然很重要,但采用的解决方案相应地

对削弱大学和强力精英之外各个群体社会的联系起很大作用。

大学系统的一个主要目标,是创立基于个体或群体的能力和兴趣,进行自由和自我定位的研究的一种环境。这也导致了大学研究过程某种程度上独立于教会和政府,却付出了使研究议程在学术圈内高度自我参照和自产系统化的代价①。随着研究的主题和适当的研究框架在研究共同体的建立,研究被给予鼓励,但是研究机构和大学外面各种社会部门的需要和兴趣之间的联系被减弱了。

虽然这种分离只是确保自由思考和研究的副产品,这还是创造了大学和资助大学的外界社会之间持续的紧张的根源。很多大学或者通过直接的资助,或者通过税收利益,使用大量的公共资源来资助他们的教学和研究活动。毫不奇怪,社会总地来说也会偶尔想到,他们应该为自己对教授们的投资和给予的自由得到更有用的回报。由于自产系统化的研究程序给知识分子自由重要保障的同时,也为无用的研究及与重要的公共社会事务分离的学术野心打开了大门,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可以想象的。

当然,我们知道,大学并不是像洪堡的理想模型设想的那样完全独立于社会。教授们从社会中纳入大学,生活在特定的社会场景中,即使不是直接的,也会从总体的社会生活中考虑题目和议程。学生们也来自大学边界的外部,必须对大学教的东西感兴趣,从大学出来后能够在更广阔的社会里面应用。除了许多虚假的对学术界外部的世界毫不关心的研究之外,大学研究的题目和知识分子的话题的历史和主要社会力量联系得非常紧密:战争、移民、种族主义、变迁的性别角色、种族冲突、武装力量、信息系统等(参见 Chomsky et al. ,1997)。

另外的影响来自政府和大企业对学校的可观的投入。这些实体长期把大学看作是对社会有益的场所,并分配财政资源来维持大学。毫无疑问,他们因而可以利用对基金的控制来强调感兴趣的项目并调控大学研究。政府和企业界也会控制大学操作的常规环境,比如对大学账目进行审计,设定大学操作的法律框架,要求评估大学的工作和大学机构本身。各种科学基金和其他的国际基金机构像各种大的公共和私人企业部门一样,具有通过资助研究的条款参考来使大学研究集中的能力。

上面的这些都不足为怪。无论如何,有趣的是,西方的大学被绝大部分当代学术界看作是公共和私人部门对大学的控制与大学的同行审查系统之间的妥协的结果。像勒万廷(Lewontin,1997)指出的,在大部分西方国家,强势的基金会利用用来保证大学研究独立性的同行审查制度来对申请进行评估,并且在研究者们、大学竞争的基础上分配资金。从而政府和企业界设置研究议程,并且使学术化研究者和他们所在的大学在获得和使用资金的两个过程中相互竞争和监督,这实在是一个奇异的,需要更好理解的现象。

同行审查制度,虽然非常重要,但显然不是明确的自由的来源。在各种学科内都有统治性的范式和方法、关键因素,以及强势的学派(Freidson,1985;Kuhn,

① 术语自产系统化指的是社会场景的自我参照和自我生产的特点,在这种场景中,社会性的互相依赖的个体小圈子在整体上没有考虑他们所处的场景中的社会利益的情况下,生产一个对彼此和彼此表现的判断标准。

1962)。不符合这些研究范式的研究计划将得不到资金资助,所以,同行审查制度主要是保证了研究处于学术化职业中的精英(和年龄大的)成员的控制之下。

这是两种明显矛盾的组织原则——外部控制和内部自治——的奇妙混合。计划书和审查程序的复杂性是所有成功的学术化研究者和大学管理者都懂得如何完好航行的迷宫。大学中的很多研究生训练花在学习怎么操作这个复杂系统上了。

国防相关资金在大学的科学和工程研究中的角色广为人知,但是大量的和国防无关的资金也流向了大学。据联邦政府所说,大学现在储存了“大约60%的联邦基础研究费用……30%的应用研究和……大约7%的发展(基金)”(Lewontin,1997,pp. 20-21)。这些钱并非均等地分配到各类别的大学。例如,在美国,前十名的大学现在控制了联邦研究和发展资金的95%(Lewontin,1997,p. 25)。

此外,大部分学院和大学还以其他形式依赖于政府和私人部门。大学或者直接受到国家或州的税收支持,或者享受到重要的税务利益。在美国,私人部门基金会(基金会的成立使私人部门在税务方面受益)和私人捐助者可以因为对大学捐钱而在税收方面得到好处。从而,大学、政府、私人部门之间的关系很紧密。同行在设定研究议程方面的自产系统化角色只是一个幻想。能够获取的一些自由行动来自大学管理当局对外面获得大的资助研究项目的管理费所做的内部再分配。管理当局可以通过对一些研究操作从外部得到的钱的再分配来支持那些无法养活自己的特定学科。但是,这种再分配在高度企业化的研究者和部门之间制造了各种内部紧张和敌意。

这显然是一种复杂和对立的情景。一方面,大学通过实施政府和其他大学外机构强调的主题的研究获得合法性和资金。另一方面,同行审查程序给其他(往往是竞争)大学和研究所评估研究计划书的过程以竞争动力。对抗、隐私信息等东西在这个过程中常被使用。成功的学术化研究主管们不得不非常具有政治上的精明。他们一点也不像公众心中典型的教授形象,是“林中婴儿”一样纯洁和没有经验的人,他们的院长、教务长、副校长、校长等一样不是。

尽管非常复杂,这个系统总体来看是平稳的运行的,但是也有证据表明,这种学术化的资本主义的自产系统化形式越来越不能满足多数社会群体的要求。学生、学生家长、普通大众、私人部门和政府对大学表达不满成为普遍现象,而且不仅仅来源于那些被大学假想的“自由”意识形态所冒犯的政治上的保守派。在大学企业精神—自产系统化研究的全然的复杂性之外,我们认为大学和赞助者之间的分离,尤其是,和过去曾经作为大学的主要赞助来源的私人部门,以及在社会中处于劣势的群体社会成员的疏远关系,是持续增长的不满的关键因素。

社区、小群体、少数民族和其他面临问题的弱势人群

很多群体对大学研究的焦点没有显著的影响力。社区成员、小规模组织、少数民族和其他无权的人或穷人,他们需要在广阔的社会变迁背景下寻求特定

的——包括诸如贫困、沉溺、种族主义、环境退化等——场景下的日常问题的解决方案方面寻求帮助。一个大学是不是比其他大学拥有更多的政府资金,或者在年度商业周刊的大学评比中有更高的排名,对他们来说并不重要,他们看重的是他们是不是能从在做的研究中得到帮助,以解决他们的问题。显著度检验、厚厚的研究摘要以及其他学术视角的声望不是他们兴趣的中心——研究的结果才是。

这些社会群体,属于社会权力体系中中间和底部的部分,和大学的联系很少,而且几乎不会影响大学的研究议程。鉴于施加在大学研究方向上的政府和大型私人部门的压力,在大学里面,和社会相关的研究处于边缘化状态就不足为奇了。这意味着大部分的人不能在解决他们最有压力的问题方面获得大学的帮助。如果幸运,他们可以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大学,并希望他们用这种方式加入精英的行列。但是他们明白,总地来说,他们不能指望从绝大部分学术化研究者那里获得解决他们自己问题的直接帮助。

在美国,很多人认为,对大学和研究机构的保护性税收和资金投入是公共投资,但是没有获得足够的收益,他们逐渐地把这种感受以"美元的价值"等于孩子的教育成本的形式传达给他们的民选代表。当然,这种变化是缓慢的,因为在选举出来的立法者所需要满足的选民名单上,这些投票者的排名并不靠前。尽管如此,他们的确投了票,的确付了学费,他们说的话,在某种程度上被听到了。

大商业机构

奇怪的是,大学工作的最强有力的资助者和受益者也走进了一个和大学的矛盾关系中。在我们前面论述过的情况下,企业和大学之间陷入麻烦的联系显得令人困惑。毕竟,大的基金会设立主要的研究议程,而职业的学术化协会和出版界给这些议程不假思索的支持。私人部门还进一步集中讨论这些大学研究者的议程之外的事情,包括雇佣他们作为私人部门的私人顾问,以获得学术收入之外的好薪水。

尽管他们在支持大学的科学和工程研究方面仍然扮演强有力的角色,有证据表明,多数企业、各个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当权者变得在关键的方式上和大学分离。虽然资金仍然从这些来源流入高校,许多企业对大学为他们培养的人才方面不满。毕业生的有效雇佣是高校成功的必要条件,反映很重要的问题。

我们知道,企业在员工培训项目上投入大量资金。部分这类投资是因为高度竞争的商业气候的结果,这种竞争把在企业内部的继续学习作为生存的前提。一段时期以来,大学通过校内培训和付费的企业咨询,控制了企业培训的相当大部分市场。现在,大企业逐渐开始更加多方面地寻求自己的培训资源,而不是依赖高校的供给。他们或者创建自己的培训机构或者雇佣专业的企业培训咨询公司。

这些培训努力看起来有两种不同的元素。一种是对刚雇佣的新的大学毕业生。我们知道的大部分企业主管认为对新毕业生的培训远不充分。尽管一些企

业的培训实际是对特定公司的"企业文化"的社会化，一些培训则是对大学课程里缺少的实践工作经历的弥补。虽然这些情况是混合的，而且公司内部的培训都很近似，培训还是明显地表现出了对现在的毕业生所接受过的训练的不满。

另一种培训元素的中心是企业人事的内部培训。这样看来，大学输给了企业的培训中心(Eurich,1985)、培训公司，以及——在美国——社区学院。因而行使政府政治优先权——最终包括政府对大学研究的资助权——的主要企业现在开始寻找自己的机制和其他的组织来提供以前由大学所垄断的各种培训。

虽然这些大学自身的弊病不是致命的，但是各种力量的组合表明，大学—企业—政府的研究连接将会出现问题。我们必须记得，企业和政府之所以资助高校研究，不是因为慈善或者对心灵生活的责任，而是因为实践立场。使大学获得资助的主要原因是它的基础构造和一群作为低成本的研究员的研究生。这使大学成为和私人部门研究机构、政府研究单位比较起来廉价并且高效的研究场所。这些研究机构在他们需要雇佣并维持全职的研究人员的情况下，非常昂贵。相比之下，大学有学费，税收利益，州和联邦的拨款，还有捐赠收入来维持学校，并因此能够提供比私人部门和政府更具有竞争力的价格。

但是近年来，用来管理研究过程和预算日益复杂，减低了大学对私人部门和政府兴趣的反应能力。为了管理研究，许多大学创造了明显昂贵且效率很低的管理机构。大学雇佣大量的人和膨胀的研究成本使我们不得不认为，大学以外的很多私人部门和政府研究的资金运作更廉价更有效率。不足为怪的是，具有经营头脑的学术化研究者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很多把研究资金从大学拿走的私人研究组织同样也雇佣了大量在职的和前任的大学员工，把他们作为付费的咨询专家或全职雇员①。

在科学和工程方面，这种从大学核心研究机构分离出去的运动已经有些时日了，现在则迅速地扩展到了组织发展、领导培训、群体动力、项目评估等领域。这些项目日益被市场化的、向大学教授提供好的合同条件的私人公司所掌握，进一步降低了大学在校内的研究能力。

如果上面的描述是准确的，当代的大学现在只满足了特定的一些社会利益，而且没有满足他们的重要资助人。大学严重依靠政府和社区、学生和家长的善意，依靠资助的税务优势，我们怀疑大学这种情况是否具有可持续性。社会的主要部分为什么要继续支持大学的理由并不清楚。大企业和政府可以在其他地方更便宜地完成他们的研究。兴趣没有被注意，需要没有被满足的社区和社会变迁的成员将来对大学的支持会逐渐减低。

虽然惯性可以在一定时间内保持现状，但并不能持续很久。如果大学不改

---

① 我们非常惊异地发现，最近二十年以来，关于大学的规模、增长和大学管理性结构的成本的文献是如此的少。这好像是学术社会有目的的对研究自己所处的环境闭上了眼睛。有鉴于此，这些判断主要是根据比较老的信息而做出的。我们的确认识到，一些管理性的增长是变化的社会所致，例如信息技术的激增和提供更广泛的学生服务就是如此。但我们也强烈认为，管理性结构增长的相当大一部分是由于大学内的权力等级结构和大学研究作为"生意"的集中化造成的。而且我们相信，在很多情况下，这种研究管理的操作既无能，又以在大学研究和社会需要之间的共同生产和持久的关系为代价，追求短期利益。

变他们自己,以对社会的大众有更多元有效的回应,我们认为,相当部分的公共和私人的资助不仅将会而且应该枯竭。

作为资深的学术化研究者,我们知道许多大学管理者和教员的满足和自大不能使他们预见到这一风险。我们期望大学能很快感受到竞争的压力,但我们不相信,当前大部分具有组织能力和机构领导能力的人能够做出有效的反应①。

社会科学的理论和实践

我们已经述及了围绕大学比较广泛的历史和政治经济背景,现在我们转而讨论复杂的环境对社会科学的总的影响,这是本章研究的兴趣中心②。我们的目标是描述行动研究在联系大学社会研究和大学的主要社会赞助人中扮演的角色,从而对积极地重建大学与社会关系作出贡献。科学家们、工程师和人文学者们怎么应付这种挑战在于他们如何考虑,虽然我们认为我们的讨论至少给他们提供了进行反省的一些有用要点。

在社会科学的开始阶段所知道的,并被从亚里士多德到17世纪初之间许多社会思想家思考的问题(参见 Toulmin,1990),到现在比以往都更显而易见。瞄准社会进步的社会研究不是一个"纯"社会研究的次一级的对等物。社会变迁导向的社会研究,尤其是行动研究,是社会研究想要获得有用的结果,带来有用的社会变迁,重建大学和大社会的联系所必须采用的形式。

相比之下,现在基于大学的社会研究是脱离实际的行动,宣称要通过探讨尽可能地从社会中脱离出来以某种形式使社会研究更"科学化",体现对社会结构的科学研究。在否认任何关于实践方面的思索的检验需要的同时,建立了对社会过程的解释。

高校社会科学是付费的,受到的社会影响只在于彼此影响和课堂上年轻一代的全职学者的活动。这些学者和他们的信徒们对社会变迁没有什么兴趣,除了"搜集"数据的探险外,不经常冒险到校园以外。他们根据被专业组织内最有声望的成员制定的知识和职业议程来选择研究的问题,而不是回应学术圈以外

---

① 我们准备进行的讨论根本不新鲜。通过弗赖里(Freire,1970)和霍尔(Hall,1975)关于成人教育领域的研究,通过博尔达(Borda,1991)在参与性研究方面的开创性研究,坦登(Tandon,1997)以及其他很多人的研究,早就开始了这个批判。博尔达最近还在哥伦比亚组织一次行动研究者的纪念性会议,参加者超过1 800人。很大比例的与会者来自大学,而且大学和自由的社会研究之间的有问题的关系也被从多角度进行了探索。这个会议的很多成果被博尔达(Borda,1998)发表,更多地出现在由蒂莫西·派奇(Timothy Pyrch)编辑的《文化、组织和社会研究》(*Stadies in Cultures, Organizations and Societies*)特刊里面。

② 意识到欧洲公立大学和美国公立大学之间差异的读者会疑惑,这个讨论对欧洲的情况如何应用。两者有重要的差别,但并不像想象的那样差异巨大。欧洲的公立大学,失去社会参与的程度,和他们把教员和经费丢到政府研究机构和私人部门那里的程度相近。而且,他们逐渐的失去了学生,学生都到处理这个关系比较好的大学去了。虽然公立大学面对的是不同的竞争情景,但他们还是处于竞争之中,而且由于他们对公共基金的依赖,他们在来自多种政治群体的批评面前非常脆弱。因而最终,各地的大学都必须为满足广阔的社会群体需要方面进行主要的行动。

的需求。

当他们从事他们的研究和精炼自己研究方法的时候,研究只有很少的机会能影响绝大部分校园外的人,或者,他们的工作会让学术圈外的当权者感到失望。

人人都知道大学的社会科学实践的种类很多:定量的、定性的、混合方法、实证主义者、结构主义者、后现代主义者、后结构主义者等。大学的奇异之处在于,尽管多年来对实证主义的摧毁性批评,任何人看待这种由主要机构和基金会资助、学术管理者给予特权的研究的时候,会认为这些研究是彻头彻尾的实证主义(参见:Scheurich,1997)。就这样,实证主义有赖于其对社会的脱离,在我们看来并非偶然。这是把学术社会研究从社会变迁系统的排除的产物。

实证主义

以实证主义为基础的定量研究者使用这样的语言:客观性(objectivity)、距离(distance)和控制(control),因为他们相信这些是进行真正的社会科学的关键。虽然我们坚定地相信在有用的目的和适当的条件下,定量研究的价值,我们也注意到,实证主义版本的定量研究是对不想成为社会研究"主题"和不想被社会研究者批判的掌权人提供了一种社会性便利。用公正性和客观性的幌子,实证主义社会科学自我缺席了争论的社会舞台,在这里,由官僚主义、独裁主义和不平等产生的问题被清扫,或者通过数字而非词汇来清洗出不平等。

新近学术新一代的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批评已经破坏了实证主义的概念和方法论基础,但是对取代实证主义者的实践和传统社会科学、大学管理者和校外的基金会之间舒服的安排,却很少付出努力。我们经常惊异于传统社会科学家能够对实证主义明确的强烈批评,却继续接受和实施许多实证主义方法的元素①。另外,有很多(虽然不是所有的)后现代主义者和后结构主义者认为所有知识都是知识论的妥协,因而对任何事情知道或做任何事情都是不可能的,是对社会涉入的一种同样的无意识的自我放逐。

定性研究

尽管定性研究具有明显的价值,我们相信对它的批评依然适用。虽然看起来定性研究能够对社会变迁做非常有效的研究,然而一些定性研究包括社会批评,绝大部分陷入了职业内的斗争,或在追求分析最新的文献趋势中疲于奔命,这种趋势与任何特定的社会群体的分析和支持的需要都不符合。虽然抱着反实证主义的态度,定性研究在任何重建社会科学和社会的关系基本的方式方面仍没有成功。而且它的很多追随者对定量研究的敌视也减弱了它的可信度,即使是贫穷和被压迫的人,也知道在和当权者斗争的时候,应该用所有能用的争论、方法和数据来帮助自己。

---

① 参见朔伊尔里奇(Scheurich,1997,第3章)对伊利奥特·米什勒(Eilliot Mishler)关于后实证主义访谈的批判部分所进行的出色论述。

虽然我们知道对定性研究/定量研究的区分的重要性,以及当前定性研究的繁荣成果,我们并不准备给定性/定量研究的区别给予特别关注,因为我们没有发现这种划分改变了我们关于社会研究和社会实践之间分离的判断。没有应用的检验,任何研究取向都不可以确定其理论的实用性和有效性,不管它的重心是定量的还是定性的。此外,行动研究是固有的多方法研究,包括科学实验、定量社会研究、定性研究方法等对解决手头问题必要的尽可能多的专业方法。有效的行动研究不能接受任何研究形式的预先限制。

应用研究与纯研究

应用研究和纯研究这样一个在物理学和生物学中早就是非常有问题的区分,却被广泛采用并产生误导。在美国,国会最近试图把国家研究基金限制在"应用"科学研究(出于国会自己让人困惑的原因,国会相信该研究更"有价值")方面。结果,科学家们不得不费心地弄明白怎么把他们做的工作用应用的语言表达出来。总地来说,大部分物理学家和生物学家相信这个区分在实践上是行不通的,而且他们都试图避免使用这种区分。把基础研究改名为应用研究,并没有使他们的行为模式有多少改变。

如果说在基础科学中,这种二分法是有问题的,在社会科学中则问题更为严重,因为能够让实证主义者宣称他们"科学化"的原因是实证主义的社会研究不是"应用的"而是"纯的"①。实证主义社会科学家在模仿他们想象的是"真的"科学的模式,然而这个模式在绝大部分情况下对"真的"科学家的行为并不适合。综上所述,我们发现应用研究/纯研究的划分既没有用又有误导性,并且在损害社会科学。

把社会研究重新定义为行动研究

在我们看来,回答我们上面提出的两难问题的答案是行动研究。我们把行动研究定义为,由共同合作的专业(insider-professional)研究人员在知识的生产和应用中——以增加社会变迁中的公平、健康和自主为目标——对研究的效度和研究结果的价值进行检验的研究。对我们来说,行动研究是能够使这一议程充分发展的唯一形式。在行动研究中,社区或者组织的管理者和职业的研究者合作,定义目标、构建研究问题、学习研究技巧、汇集知识和努力、实施研究、解释结果,并且应用得到的知识以促进积极的社会变迁。为了有效地理解和行动,行动研究模糊学科界限,而且把跨越学术圈和社会的界线作为操作的基本原则②。

尽管实证主义和解释主义者对行动研究有一些防御性的反应,我们对将来社会研究中的根本性改变怀着希望。我们非常清楚,这样的变化不会很容易达到,而且这样的变化在学术圈内外不会很平静和顺利的进行。学术化的社会科

---

① 奇怪的是,解释主义者对他们的优越性的宣称是建立在解释主义是如此的纯粹,以至于"不可应用"这样的基础上的,因而他们从另一方面支持应用和纯粹的划分。

② 关于行动研究杰出的见解和论述,参见:Brown & Tandon,1983。

学已经发展了拥有同行审查系统的很强的职业化结构，而且他们现在的形式已经进入到绝大部分学术机构的新陈代谢组织。改变从大学社会研究到行动研究的平衡会形成对职业组织霸权和学术分工的挑战，而这两个都是声名狼藉且难以改变。而且，显然，社会变迁导向的社会研究会使许多当权者感到不快。他们一定会为了防御而抵制这样的研究，尤其是在肖尔（Shor，1996）所说的"保守的回归"的年代。所以，我们会强力推行，但是不会盲目乐观。

为了在本章剩余的部分说明行动研究，我们会在很短的篇幅内做以下四件事：

1. 在哲学上巩固我们关于行动研究的讨论。
2. 描述大学和它的研究机制对促进行动研究的各种敌意的方式。
3. 调查这样一群社会力量，他们进行着当前形式下最有可能赢得出路的研究，即做持续分析的、政治上消极的社会研究。
4. 给出简略的基于大学的行动研究的例子。

简要的做这些事情，意味着讨论的结构可能很清晰，但表述上，没法充分展现很多证据。

为什么是行动研究

就像我们曾经在上文指出的那样，行动研究拒绝在社会研究中对实践和理论的分离。社会研究要么是应用性的，要么就不是研究。像"纯研究"和"应用研究"这样的术语暗示了对纯研究的和应用研究的工作可以有所区分，这样的区分在我们看来，会使社会研究变得不可能。对行动研究者来说，社会探索的目的在于在释放社会变迁方面得到知识和行动。对社会研究的检验，在于它是否在行动的管理者、组织，和/或者社区的自决社会变迁中起到支持作用。对我们来说，世界划分为我们支持和实践的行动研究，以及我们从认识论、方法论和政治方面反对的传统社会研究（细分为纯研究和应用研究，并由职业次群体组织化了）。

行动研究不是科学的退却

因为在传统社会科学的组织中实证主义框架的统治地位，我们常听到，我们的观点被机械地认为是从科学方法退却到了行动主义。而且在走强硬路线的解释主义者看来，我们是如此的天真，以至于不理解在任何一种社会研究的基础上，我们投入任何的行动过程都是不可能的。传统社会科学的操作假设是，相关和联系会自动导致科学性效度的损失或者失去面对主观性的悬崖的勇气。

实用主义者的基础

这些争论是欺骗性的。在实用哲学中可以发现社会研究的一种不同立场。杜威（Dewey）、詹姆斯（James）、皮尔斯（Peirce）和其他人提供了与行动相关的社

会研究的有趣并富有成果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基础(参见 Diggins,1994)。实用主义把联系理论与实践放在最优先的位置。核心的反思过程是和涉及在特定场景下使用物质和社会因素的行动结果联系起来的。经验来自于人和人所处的环境的持续互动,因此,这个过程既包括了探索的主体也包括了探索的客体。行动是有目的,并且是在力图创造期望结果的情况下进行的。因而,知识的创造过程建立在探索者的规范、价值和兴趣之上。

效度的宣称被确定为"有保证的",是通过在具体场景下的具体行动使不确定的情况变得确定的探索过程的结果。研究的逻辑建立于探索过程本身,而且它指导知识的产生过程。

作为行动研究者,我们强烈提倡在社会研究中使用科学的方法,并强调创造有效的知识的重要性和可能性(参见 Greenwood & Levin,1998b)。这种探索是社会民主过程的基本元素。杜威尤其把自己的知识能量聚焦到民主参与上。在他看来,参与精神是有意义的知识创造过程的核心要素。

这些实用主义立场的总的特点为行动研究方法建立了基础。两个中心参数清晰地显现出来:通过行动和场景中的实验来产生知识,以及既是方法又是目标的参与式民主。两者在现在的大学结构中都没有得到满足。笛卡儿把精神和身体分离开来,把实践从反思分离,把科学从行动分离。研究的问题由职业的标准来形成,忽视了真实生活问题情况的整体属性。

关于科学的行动研究理论

现在所有的人都该知道,社会研究和对原子、分子、岩石、老虎等的研究不同。所以,我们对如此多的传统社会科学家还在强调要实现"科学化"就要切断和观察事物的所有关系感到惊异。这还是没有受到挑战,特别是在获得大量社会科学研究经费和在社会科学出版(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科学)方面有统治地位的领域。这些实证主义的教条显然是错误的,导致对可信信息的生产、有意义的解释和社会研究中的社会行动的偏离。这引起了批判的产生,甚至来自传统社会科学内部①。因而教条的坚持,表明它的嵌入本身需要关注。

我们相信,干预大学组织和职业学术圈子,以及广泛的行动研究会根除这种教条。更简单地说,行动研究潜在的认识论思想并不是什么新思想,它们只是因为传统社会研究者(有意或无意的和他们切断的社会利益)在社会变革中将大学拒之门外而曾经被广泛的忽略了。

行动研究怎么整合理论和实践

行动研究力图通过职业研究者和地方管理者合作,寻找并实施对管理者非常重要问题的解决方案,解决给定情景中的适当问题。我们把这称为共同生成的探索,因为它建立在职业的研究者—管理者的合作之上。可以把行动研究描

① 对这种盲目的实证主义的批判可见于最卓越的社会科学思想家(亚当·斯密、卡尔·马克思、马克斯·韦伯、爱米尔·迪尔凯姆、约翰·杜威等)的理念核心。当前对其批判的有力来源是:Scheurich,1997。

述如下：

1. 行动研究，通过所有参与者的贡献都被认真考虑的合作的沟通过程，参与者和研究者共同产生知识。在探索过程建立起来的意义导致社会行动，或者这些对行动的反思导致新的意义的建立。

2. 行动研究把存在于当地群体中的经验和能力差异看作是对研究/行动过程进行丰富的机会。

3. 行动研究产生有效的研究结果。

4. 行动研究是以情景为中心的，它力图解决在情景中的真实生活问题。

我们对这些要点简要地做如下解释：

(1)共同生成的探索：行动研究的中心是共同形成的探索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训练有素的职业研究者和富有知识的地方管理者为了定义要研究的问题、收集和组织相关的知识和数据、分析结果信息、设计社会变迁干预而一起工作。职业研究者和地方管理者之间的关系是基于使用所有参与者的知识和他们独特的社会定位的差异来合作性地形成研究问题的基础上的。职业研究者往往带来其他相关案例的知识和方法，并且对组织研究过程富有经验。权威人士对手头的问题和问题发生的背景拥有广泛并长期的知识，并且还知道怎么以及从哪里可以获得额外的信息。他们还对过程提供了紧迫性和集中性，因为这是他们急于解决的问题的中心。这些参与者一起创造了有力的研究团队。

(2)本土知识/专业化的知识。行动研究建立于本土知识和专业化知识的互动。虽然传统社会研究和咨询认为专业化知识优先于本土知识，但行动研究并不这样认为。行动研究建立在这样的前提下，即专业化知识重要而且有价值，但本土知识是任何研究必须的元素。只有在特定环境中拥有多年经验的当地的管理者，才拥有充分的信息和知识来设计有效的社会变迁过程。行动研究并不是对本土知识传奇化而贬低专业化知识。正是因为两种知识对它来说都很重要，所以这是共同生成性的探索。

(3)效度/可信性/信度。行动研究并不宣称脱离具体场景的知识，也无意去获取这样的知识。在行动研究中，可信性、效度和信度是由地方当权者是否愿意按行动研究的成果来行动，也就是把自己福利押宝在自己想法的有效性上来衡量的，也是由行动后果与他们期望的符合度来衡量的。因而情景性知识，本体论和效度对行动的保证在行动研究中具有中心地位。核心的效度在于实际从事的社会变迁活动的可使用性，对它的检验是这个实际解决方案能否达到解决问题的要求。

和斯蒂芬·图尔敏(Stephen Toulmin)一样，我们提倡重新建立自17世纪笛卡儿模式出现以来进入错误方向的西方知识的历史，这个模式把知道方式(实践智慧)从理智、抽象和距离等科学技术世界中分离出来。行动研究把社会研究转向实践智慧，以通过对现象的行动“知道如何做”，并且反对非行动的科学技术世界和对主体的假想的距离(Toulmin，1990；Toulmin & Gustaviesn，1996)。

(4)情景—中心的知识。情景中心的知识怎么才能做到有效的传播给学院

和其他潜在的接受者呢?行动研究聚焦于解决实际问题,因而行动研究的中心探索是和在特定地点解决实际问题联系在一起的。不管问题是社会的、组织的或者是物质的,行动研究的结果必须是切实的,也就是说,参与者可以看出他们发展的解决方案能实际解决他们自己提出的问题。行动研究探索过程因而和行动紧密联系在一起。通过在特定情景下探索和行动的联系,行动研究强调在整体环境中把人类探索者作为行动的主体。

对行动研究的挑战是把行动研究结果用没有参加特定项目的人(包括其他的面临类似但不相同情景的管理者)可以理解和相信的方式进行抽象和传播,而由此使他们可以产生他们自己的、有效的行动过程就更为困难。这正是因为知识包括本土知识和分析,是共同产生的,是深深植根于当地情景中的,在个案之间比较结果和创立归纳的确是个挑战①。

我们并不认为,这是把比较性的概括和抽象理论化的领域拱手让给传统社会研究者的充分理由。实证主义研究方式的归纳从场景中抽象出来,把均值从个案中抽象,忽视了作为人类生活的世界,因而总体上使他们的知识不可能得到应用。尽管对这种研究投入了大量的金钱和人工,我们发现这样的理论性收获非常可怜。从根本上对归纳和学习的可能性完全排除,尤其是像许多解释主义、建构主义和本土的后现代主义那样,只是能震惊我们的一种索然无味的知识姿态。

行动研究认为,归纳意味着任何独特的和归纳背道而驰的个案会使归纳无效(Lewin,1948)并需要重新形成归纳。相应地,实证主义则用试图把特殊个案排除在外以维持已有的归纳的方法来处理。研究者常常找出可以忽视特殊个案的方式来处理,而不是对可以颠覆他们归纳的机会表示欢迎。

格林伍德在蒙卓根劳工管理企业——也是该行业最好的企业,进行行动研究的时候,切实感受到了这些(参见 Greenwood & Santos,1992)。因为"办公室故事"使这个企业不能成功,这些西班牙人不擅长工作和挣钱等,20 世纪 60 和 70 年代蒙卓根出版了大量的关于蒙卓根文献试图解释这个个案。巴斯克文化的倾向性、领导者的魅力等都被用来解释这些可能被忽视的例外,即这家普通的资本主义公司所庆贺的没有受到假想的强大竞争者影响而正常运行的耀眼事例。与认为重要的例外是新知识的最有价值的潜在来源完全相反,实证主义的理论家不准备从这个个案中学习。

怀特(Whyte,1991)在他们的"社会发明"概念里面抓住了这个例外的生产力的思想。他建议,所有形式的商业组织都通过弄清楚巴斯克人独特的社会发明来解释他们的成功,从巴斯克案例中有所收获。认识到这点以后,研究者就可以开始弄清楚哪些是可以归纳并扩散到可以在又一次合作行动过程中检验其效用的情景中。当然,这个方法的关键在于,这个比较的效度也被行动检验,而不是被看作是思维实验。

---

① 对这个问题的全面讨论,参见:Stake,1995。

如果根据上面的论述重申归纳，我们把归纳重构成一个反思的过程，而不是关于基于规律的解释的结构。基于我们关于知识是情景限制的立场，在不同的社会场景中利用知识应该采用两步走模式：首先，对产生知识的情景的理解很重要。这把知识本身放到了产生它的背景中。其次，把这个知识往新的环境的转移意味着对新的环境的情景的充分理解，对新情景和产生知识的情景有多少差别，包括对在新情景中应用这个真实知识的后果的反思。因而，归纳变成了反思的积极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相关的人必须心里清楚在新的情景中，以前的知识是不是有意义。

讲全这个案例，还需要更多的篇幅（参见 Greenwood & Levin，1998b），但是我们相信，对行动研究不是社会科学的死胡同已经说得足够清楚了。行动研究是促进社会发展有效的知识和理论的严格方法。

大学能促进涉及行动研究的知识产生吗

我们相信，对上面提出的认识论的、方法论的、政治经济的和伦理的问题的回应，是对大学和社会上多重管理者之间关系的重建。我们相信，这些回答的部分是把行动研究作为社会研究策略的中心。这是因为，像我们上面解释的那样，行动研究涉及用户（政府、社会服务机构、合作的不同大小规模的社区、非政府组织等）对正在研究的问题的明确关切，并且这个研究过程整合了和非大学的合作伙伴的合作性的教和学。我们了解这种基于大学的行动研究是因为存在大量成功的例子。从大量的例子中，我们给出下面的两个成功案例。

案例 1：社会科学工程研究关系和大学—工业企业：海上工场

这个项目由挪威研究院从 SINTEF 得到研究发展的合同；SINTEF 是位于特隆赫姆的挪威研究组织，和挪威科技大学有紧密的联系。这份合同聚焦在所谓的企业建模上，是一种为了提高效率和重组组织行为、基于信息系统中心，以用来发展复杂组织过程模型的技术。SINTEF 接到这个合同是作为一个大的旨在支持制造行业的应用研究和组织发展的国家行动的一部分。

国家研究委员会对这个项目的关键要求是，企业建模的工程研究要与以组织、领导为内容的社会研究联系起来。这需要 SINTEF 内部的工程师和社会科学家按照比以往更强的方式进行合作。国家研究委员会认为，不能把企业建模简化为技术性的努力，而是企业建模本身必须同时处理组织性的问题，因为它们的实施将会取决于在日常工作中，雇员们把模型作为“工具”的能力。

在开始阶段，这个行动的焦点并不是非常清楚。国家研究组织的工具性目的是创立一个有用的企业模型，而非仅仅是一个让信息技术专家解决的难题。研究的焦点：工程的焦点是把企业模型看作是所有员工学习的机会，社会科学焦点在参与者变迁过程方面得到显现。

海上工场同意作为这种努力的一个合作者,该项目启动于1996年的早些时候①。这个位于特隆赫姆海湾的海上工场雇佣了大约1 000人。这个工厂在为北海油田勘探设计和建设大型复杂海上设施方面具有悠久的历史。

这个项目由工程师和社会科学家的联合小组来共同管理。关键的研究者是两个工程师和两个社会科学家,都是SINTEF的雇员。这样配置是期望由于他们在一个项目工作,跨越职业界线的合作会自动出现。

这个过程无论如何不是如此简单。在项目开始的阶段,唯一出现的合作仅仅是团队成员同时在公司的同一个地点出现。部分原因是,团队中的两名工程师在公司中呆了很长时间。他们作为咨询研究员和公司有长期的接触,在此之前,他们曾以工程师的身份做海上工场的员工。结果是,在项目早期活动中,工程师处于领导地位②。他们在运行这个项目,而社会科学家相当被动。工程师们的工作具体在关于企业模型的基于计算机实物大模型方面,而且,由于这是公司计划中兴趣的焦点,他们相应地获得了来自工场高级管理人员的很多关注。

与此同时,社会科学家把注意力投入到对公司进行的总的调查并用民族志的方法,来了解这个组织和公司的社会真实。这对社会科学家们掌握这个公司的情况来说非常重要。对公司的人来说,基于研究的知识产生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公司和团队里面的工程师对这个工作既不理解,也不重视。

社会科学知识的第一次机会来自于一次研究会议,在会上发布了从车间层次发现企业存在的问题③。研究会议的后果是,抓住了当地单位和管理层的注意力,部分地清楚显示了社会科学家具有在公司提供显著的学习机会和合作计划的技巧。这也是第一次研究者把组织里面相当大数量的、各个层次的员工纳入到同一个知识产生过程。

由于这个经历,大学和海上工场的合作开始深入。此时,公司正在发展一个领导培训项目。通过社会科学家,公司领导学到了关于运作类似项目的其他经验,这帮助他们根据自己情况做计划。他们能比较好地在他们自己的培训项目中配合全组织发展的行动,因为他们知道社会科学家设计的其他项目帮助过他们。此外,他们感到,如果项目里面的公司参与者能够因为他们的参与而获得大学的正式学分的话,将会是一个优势。作为结果,这个项目是由大学和公司的对话而设计完成,并由一个社会科学家来执行。这个项目还会给愿意通过正式考试的参与者正式的大学学分。领导培训项目成为了提高参与者正式技巧水平的努力。而且大学的文凭给了他们在工场情景外的认可。

这个项目非常成功,成为公司和大学之间亲密合作如何获得双赢结果的范例。大学的人可以在真实生活情景中检验职业性和教学法,而公司从大学和通

---

① “海上工场”是化名。

② 勒温(Levin)能够全程观察这个项目是因为他是这个项目的地方指导委员会的成员。他收集到了在项目开始的时候,工程和社会科学之间的联系有多少的情况。

③ 研究会议是行动研究的民主化方法,是用来把一群问题拥有者聚在一起的反思、分析和计划行动的过程。更详细的描述参见:Greenwood & Levin,1998b。

过大学联系到的其他公司那里得到了尖端的知识。作为有趣的副效应,工场的领导决定邀请临近工地的管理者参加。他们意识到,工场自己的前途依赖于他们和邻居以及供应商的良好关系。他们决定,提升合作的一个方法是分享他们的项目,作为他们互相依赖关系和他们对彼此成功的共同支持的象征性姿态。

在项目的过程中,工程师和社会科学家们之间的合作有了进步,并创造了新的见识。在这个方向的关键的第一步是重新设计工场的管道制造设备。这个工作程序的重组过程,是通过工人的参与而合作性地发展起来的,这意味着来自车间的工人们直接接触到了公司的工程师使用的、基于计算机的生产计划和日程表。与通过车间主任获得的系统过滤传达到他们的信息不同,车间工人们可以利用信息系统并决定如何管理生产过程。如果不是作为团队产生的 SINTEF 的工程师、社会科学家,以及伙伴公司的相互理解,这样的组织形式根本不会出现。

建立在这些经历的基础上,发展企业模型的完整方法的再概念化逐建形成了。在企业模型方面传统的工程是,专家(例如工程师)收集信息,进行分析,根据模型需要的样子作出专业的决策。而海上工场的企业建模的新方法是在参与的所有员工都畅所欲言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虽然这只是参与方向上的适度的一步,但却是潜在的很重要的一步。公平地说,如果社会科学家没有通过参与过程呈现出对组织和领导方面的实质性知识,在参与性方面的改变就不会出现。

随着公司的人和研究者之间更多的互相信任,社会科学家的边缘地位逐渐变化,而且公司开始同样的倚重社会研究者。例如,公司未来主要的挑战之一,是如何在不破坏公司士气的同时,有人情味地削减雇员。这个变化有两个原因,海上工场公司的重组以及新的工程和生产程序导致的对劳动力需要的减少。工场邀请了研究者,通过让他们对这个困难问题从全世界范围提取知识和多元的视角,来认真参与这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研究者们支持、改变或者扩展了公司关于对其减小规模的挑战的理解,这往往是新的,而且是关键的知识。

研究团队还被要求协助做工场学习气氛方面的工作。这包括为了提高工场的继续学习能力,而对各阶层员工的大量访谈。访谈的结果被反馈给相关的员工,为了把结果报告给员工并通过和工人的本土知识的比较检查研究员的推论,研究员们同这些员工进行了对话。我们可以又一次看到,从社会科学循环起源的学习模型如何能应用到本土学习过程,而且这个结果于研究者对他们的学术发现的力量和价值的评价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也许这个项目最有趣的是公司和大学的关系是如何发展的。海上工场的资深执行官成了富有成果的公司和大学关系的有力支持者。在公开的阐述中,他表扬研究者为公司带来了相关而重要的知识,而且解释说他可以看到这种关系是越来越重要的。虽然建立这种合作关系历经了多年的磨合,但是现在,他有需要大学就会作出反应。虽然由于有不同的评价和兴趣出现,没有理由把这种关系浪漫化,这种关系看来还是如此强健,进一步的发展是有可能的。

最后,只有通过多学科长时间的行动研究,这种结果才有可能。在这个过程中,研究的价值和行动的价值都得到了尊重,而且所有的参与者都从这个过程中

受益。

案例2:在大学内的组织改革合作研究

这里,我们报告的例子是最初在康奈尔大学开始的行动研究,是大学的主要课程——物理学导论的改革结果。这个努力的主要参与者是米歇尔·雷诺兹(Michael Reynolds),他把这个工作写成了他在康奈尔大学的科学教育方面的博士论文(Reynolds,1994)①。大学和其他事物一样,是等级制度和本位行为的防御力量,由学生、助教和讲师发起的变迁非常罕见。

在项目开始的时候,雷诺兹是在一门为准备进入医学院的学生必修的入门物理学课程做助教。这门课不仅具有在通往医学职业的非常激烈的竞争过程关键的守门作用,而且使学生力图在课程中表现优异,因而教员和大学拥有对这些学生的生活相当大影响的权力。这也意味着,几乎不管教的多么差,听这门课的学生都是有保障的。

虽然提供了不止一门的物理学课程,但这个课程对学生的医学预科要求尤其关键。因为这门课程在20世纪60年代进行的综合改革,过去和现在都是按“自我辅导”的形式进行的。这意味着学生(有限制的)按照自己的进度对课程材料进行学习,在一个学习中心做实验,并求得建议,按照单元(通常由很多单元)进行考试,直到他们达到掌握材料和分数要求。虽然这门课因形式灵活而有吸引力,但它也成为学生中声名狼藉的课程。在标准化的全国考试中的表现很差,学生和教员的士气也相对比较低,物理学系对这些都很关注。

教员结构包括一名负责教授,一个实际上是主要课程管理者的资深讲师,几个研究助理。在其中,雷诺兹作为一名助教在课程中工作来支持自己的博士教育。听说了行动研究并发现这和自己的观点一致以后,他建议教授和主管的讲师进行行动研究评估并对课程进行改革。在格林伍德的帮助下,他们从副校长为学术项目而设立的办公室那里获得资助,以支持他们的改革努力。

接下来是在雷诺兹技巧性的指导下漫长而复杂的过程。在长期的过程中,涉及本科生、助教、讲师、教授以及雷诺兹的博士委员会。这个项目开始的时候,对学生面对这门课程的主要困难进行评估,然后涉及对修订的课程的新课文和试验性考试的挑选。雷诺兹对这个项目进行了持续而耐心的指导。最终,教授、讲师、导师、助教以及学生通过众多会议和讨论在重新设计课程方面进行合作。

他们的一个发现是,让课程变得难以实行的原因之一是这门课处于一种非常自发的状态。物理学有了新概念和理论,就加到课程里面,但是没有用来检验哪些材料需要被删减或巩固来为新东西腾地方的全面系统。结果成了一门越来越过度冗杂的课程,以至于学生发现课程越来越难以对付。通过向所有管理者提交所有课程,以及检查对可能的新教材的选择,这个小组能处理这种问题。

---

① 格林伍德是雷诺兹的博士委员会的成员,并始终和他一起参与这个研究。不过,这里呈现的思想、过程和解释,是由雷诺兹,而不是格林伍德归纳的。由于雷诺兹现在在为中学改革而辛苦工作,他没能对他的工作进一步写出文章,所以我们鼓励有兴趣的读者直接参考他的论文(Reynolds,1994)。

在这个过程中，有许多对实质和权威问题的冲突，这让所有涉及的人倍感压力。但是他们还是在一起并继续这个过程，直到他们完整地重新设计了这个课程。然后进行了试验，结果是学生在全国考试中取得了巨大进步，学生对课程满意度提高。

于是雷诺兹根据他的详细实地记录和日志写出了这一过程，并草拟了他的论文。为了征求意见和修订文章，他向他的合作者提交了这个草稿，并向他们解释了自己准备做的修订。他还向他们提供了这样一个选择，让他们的书面评价加在论文后面的一章，署上真实姓名或者笔名。

这个过程的反复给论文带来了显著的变化，并巩固了小组自己的学习过程。最后，许多合作者参加了雷诺兹的论文答辩并参加了讨论，据我们所知，这是康奈尔大学首次发生这样的“合作性”答辩。后来，这种有合作者参与的答辩又在另一位博士候选人身上再次出现(Grudens-Schuck,1998)。

有趣的是，虽然这个过程对参与者来说非常沮丧，但这个结果却对学生有明显的好处。有一个建议要求把这种方法扩展到康奈尔大学其他课程的改革，虽然在这个案例中得到了伟大的成功，但学校当局却未承诺这一过程。

也许一门课程的改革与社会变迁没有很大的相似性，但我们认为这个案例具有预示性的意义。它说明，在有牢固的官僚主义和等级制度的组织、大学，从劣势群体发起的基于行动研究的改革是有可能的。各类管理者的知识价值被显现，而且让学生好的共同兴趣维持大家在一起进行改革的探索。这种改革的可能并且成功意味着那些否认大学可以进行重要改革的人显然是错误的。当然，这也表明，如果没有更广阔的支持策略，一个单独的成功并不能对持续的制度变迁有所增益。所以，这是个成功，但只是孤立的个案。

我们意识到，以上两个案例只是来支持我们的主张的大量案例资料的一小部分，但是我们相信，这些案例至少给读者带来对我们思路的总的感觉。

结论：如果行动研究成为大学社会研究的中心，大学和学术化知识分子的角色会有什么变化

自产系统化和参与式评估

如果行动研究成为了大学研究策略的核心，大学将会按照和现在情况大不相同的方式联系社会。他们将会变成在广阔范围行动的社会参与者，内部的学术化的自产系统化并不会就此终结，但是它的作用会剧烈的缩减。对教员和管理者审查的实施必须涉及和职业同辈、学生一样重要的外部管理者的评估。我们从美国大学的扩展划分的历史知道，外部管理者对大学人事的评估是可能的。然而，我们也知道这种评估在行动研究的框架中也很少实施。发展对大学表现的参与性的评估策略对这个过程而言是本质的成分。

对大学自产系统化的反作用力在大学的不同部分会有不同的经历。对许多工程、应用科学、管理、社会服务等学科,这个变化不会太显著,因为他们总是在与外部的社会管理者合作。对传统社会科学家来说,这个变化就比较深远。在作出总的社会卷入的宣称后,他们需要在让校外管理者满意的过程中展示他们工作的价值。对极端的解释主义学者和后现代主义的人文学者,这种变迁是一种真正的震撼。几十年来,他们宣称知识分子的优越性和对社会采取了统治性的批判姿态,而几乎没有采取任何积极的社会行动,人文学者应该从基础的层面质疑他们工作的价值①。人文学科的许多要素(例如批判理论、话语分析、伦理学等)对这个变化来说相当重要。差别在于,这些观点的价值需要在大学外部管理者而不是职业同事的小圈子里面有效的体现。当然,一些人文学者早就开始有效地承担这个角色了,这也表明这是有可能的(例如,Harbermas, Hans-Georg Gadamer, Charles Taylor, Richard Rorty)。

民主化研究

这些变化的中心是对民主化研究的彻底挑战,它把外部管理作为知识产生和评估过程的完整要素,而不是试图延续宣称大学是社会中唯一合格的研究社会的场所,学者应该把他们的技术拿到大学之外,在更广阔的知识产生和评估过程中作为职业的研究者和合作的支持者参加研究过程。这对大学和学术化学者来说并非是全新的角色,但是,在我们的理想情景中,它应该是重要的任务,因为自产系统化的学术活动曾经被沉淀下来成为大学追求的目标。靠着社会的支持,大学也许能获得更多的管理者的认同,使得基于大学的研究者可以抽取出部分的研究领域。于更有效地回馈社会来说,这些领域中所需要的智慧及与社会联系的程度尚且不明。我们可以想象得到,这类研究取决于不断提出的问题,问题的产生却受制于既缺乏基础知识又缺少技术的合作性的行动研究。为解决这些循环出现的问题而向大学捐献,并通过进一步的行动研究来展开研究结果是站得住的,尤其是建立在包括大学和外部管理者之间民主的对话过程的情况下。这类工作的一个完美的最新例子是拉舍(Lather)和克里斯史密西斯(smithies)的《混乱的天使》(*Troubling the Angels*,1997)。

收　编

我们可以想象,有些读者会马上发现最后一段"收编"的怪异之处。大学自产系统化的隐含的核心思想是把知识分子的工作从审查制度和强力的社会利益的直接控制中脱离出来。而我们看起来像是建议大学收编他们自己。毫无疑问,大学被项目权力收编的危险一直存在。但是,在我们看来,使行动研究成为大学同社会关系的中心,一个要点是打破现有的社会科学的收编模式。像我们

① 有趣的是,大学的语言和写作老师在这种情况下做得很成功。他们的工作主要是为学生服务的。他们普遍受够了与文学评论家和哲学家相比缺乏声望的情况。也许这种声望的等级结构可以被我们所建议的变化所颠覆,至少是削减。

曾经指出的那样，大学现在是在政府的研究机构和私人部门行动者的雇佣之下。虽然大学也为这些管理者的利益工作，大学还是特别忽略了更广泛的和更大的没有权力和资金的政府和企业的管理者群体的利益。传统社会科学家和人文学者很少打破这种形态，因而大学现在仍然是被收编的，而且传统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被动性很清晰地显现了这一点。依我们的立场来看，做出更广的行动研究的承诺，来支持作为合作伙伴和共同学习者进入项目的社会管理者，通过从为少数人到为多数人服务的转变，打破现有的被收编的形势。

这样能够自动地避免被收编吗？当然不是，但是这能带来关于研究主题的谈判和关于要支持或避免项目的争论更加公开。最后，我们关于行动研究的经验告诉我们，合作并不像给大学生产和沟通相关知识的能力方面带来的急剧变化一样，导致很多的收编。多年的实践，让我们发现了作为一个行动研究者，在理论上、方法论上和经验方面受到的最困难的挑战。我们的合作者为了帮助他们达到目标，经常需要从我们这里得到更多、更好的知识。所以我们发现行动研究比自产系统化的大学研究受到更多知识方面的挑战。和我们项目所产生新的知识的要求比起来，保持我们研究作为优质研究的完整性算不上什么问题。

参考文献

Bourdieu, P. (1988). *Homo academicus* (P. Collier, Tran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Brown, L. D., & Tandon, R. (1983). Ideology and political economy in inquiry: Action research and participatory research. *Journal of Applied Behavioral Sciences*, 19, 277-294.

Chomsky, N., Zinn, H., Lewontin, R. C., Montgomery, D., Wallerstein, I., Katznelson, I., Nader, L., Ohmann, R., & Siever, R. (1997). *The Cold War and the university: Toward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he postwar years.* New York: New Press.

Dewey, J. (1954). *The public and its problems.* Athens: Ohio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27)

Diggins, J. P. (1994). *The promise of pragmati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Eurich, N. (1985). *Corporate classrooms: The learning business.* Princeton, NJ: Carnegie Found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Teaching/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Fals Borda, O. (Ed.). (1998). *People's participation: Challenges ahead.* New York: Apex.

Fals Borda, O., & Rahman, M. A. (Eds.). (1991). *Action and knowledge: Breaking the monopoly with participatory action-research.* New York: Apex.

Freidson, E. (1985). *Professional powers: A study of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formal knowledg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Freire, P. (1970). *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 (M. B. Ramos, Trans.). New York: Herder & Herder.

Greenwood, D. J., & Gonzúlez Santos, J. L. (with Alonso, J. C., Markaide, I. G., Arruza, A. G., Nuin, I. L., & Amesti, K. S.). (1992). *Industrial democracy as process: 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 in the Fagor Cooperative Group of Mondragón.* Assen-Maastricht, Netherlands: Van Gorcum.

Greenwood, D. J., & Levin, M. (1998a). Action research, science, and the cooptation of social research. In T. Pyrch (Ed.), Convergence [Special issue]. *Studies in*

Cultures, Organizations and Societies, 5(1).

Greenwood, D. J., & Levin, M. (1998b). *Introduction to action research: Social research for social change.* Thousand Oaks, CA: Sage.

Greenwood, D. J., & Levin, M. (1998c). The reconstruction of universities: Seeking a different integration into knowledge development processes. *Concepts and Transformation*, 2(2), 145-163.

Grudens-Schuck, N. (1998). *When farmers design curricula: Participatory 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in Ontario, Canada.*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Cornell University.

Hall, B. (1975). Participatory research: An approach for change. *Convergence*, 8 (2), 24-32.

Kuhn, T. S. (1962).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Lather, P., & Smithies, C. (1997). *Troubling the angels: Women living with HIV/AIDS.* Boulder, CO: Westview.

Lewin, K. (1948). *Resolving social conflicts.* New York: Harper & Row.

Lewontin, R. C. (1997). The Cold War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academy. In N. Chomsky, H. Zinn, R. C. Lewontin, D. Montgomery, I. Wallerstein, I. Katznelson, L. Nader, R. Ohmann, & R. Siever, *The Cold War and the university: Toward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he postwar years.* New York: New Press.

Pyrch, T. (Ed.). (1998). Convergence [Special issue]. *Studies in Cultures, Organizations and Societies*, 5(1).

Readings, B. (1996). *The university in ruin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Reynolds, M. A. (1994). *Democracy in higher education: 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 in the Physics* 101-102 *Curriculum Revision Project at Cornell University.*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Cornell University.

Scheurich, J. J. (1997). *Research method in the postmodern.* London: Falmer.

Shor, I. (1996). *When students have power: Negotiating authority in a critical pedag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take, R. E. (1995). *The art of case study research.* Thousand Oaks, CA: Sage.

Tandon, R. (1997). *Struggle for knowledge: A personal journe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vergence World Congress, Cartagena, Colombia. Available Internet: http://www. parnet, org

Toulmin, S. (1990). *Cosmopolis: The hidden agenda of modern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Toulmin, S., & Gustavsen, B. (Eds.). (1996). *Beyond theory: Changing organizations through participation.*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Whyte, W. F. (1991). *Social theory sociala ction: How individuals and organizations learn to change.* Newbury Park, CA: Sage.

为了谁——定性研究、描述和社会责任 4

FOR WHOM? QUALITATIVE RESEARCH, REPRESENTATIONS,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 米歇尔·法恩　洛伊斯·韦斯　苏珊·维辛　卢恩曼·王

在我成长的经历中，谈论别人的母亲似乎是一种生活的形式，一种日常活动。无论男孩还是女孩，对我们来说那不过是一种游戏或者表演而已。不管我们如何称呼它，"扣帽子"、"攀比"、"吹嘘"亦或仅仅是"列举"，多数是很可笑的，只是一种与现实相距甚远的荒诞幽默罢了。比如说，"你妈妈多胖啊，把食物链的正常运转都打断了！"，"瞧你妈妈灰头土脸的，活脱一个幽灵！"以及"你妈妈多蠢啊，她竟然把'衣领污垢'(ring-around-the-collar)当成小孩子的游戏！"，等等。不过，话说回来，掌握这些可笑的比喻还真得花点工夫才行，它是一种意图娱乐而非损害别人的艺术形式。

你可能认为，我会对这些侮辱进行还击，或者至少准备好随时去应对那些针对我妈妈、我的家庭、朋友及他们家庭的歪曲和诽谤。但是，当我进了大学，阅读到相关的报纸、专著、教材时，我发现，许多学者、记者、政策制定人或政客等都在某种层面上进行着类似的活动。在我的经历中，我很少听到过像加利福尼亚州湖畔郡的福利执行长官汤森(Lawrence Townsend)所说的那么尖酸刻薄的话，他说，"每次当我看到街头那位衣衫褴褛的妇人时，我就奇怪，享受子女补助计划的母亲为什么在更年期以后就不能再继续生育并享受补助呢?"曾经有小孩子对我讲，我的头发毛乎乎的，像成千的非洲人在对他们的黑色权力行礼。不过，倒是从来没有人对我说，我整个家族——特别是我的妈妈——都患了一种"乱发症"。然而自1965年以来，参议员莫伊尼汉(Patrick Moynihan)却是这样讲的，像是一个垫在母亲背后提供随时服务的靠枕，莫伊尼汉的叫嚷被许多分析家和政治家重复引用，其中包括迪奈什·丹索扎(Dinesh D' Souza)这样的极右立场的男士(Kelly,1997,pp.1-2)。

在这篇论文中，我们会讨论到在国家执行着惩罚性监控和审查的时代里，我们该怎样把穷人、工人阶级的生活中穷困的后果描述出来。在与朋友和同仁的讨论中，我们已经谈到了其中的一些问题——它们或可被称之为伦理学、困境以及研究等。一些人以为我们所做的是无用功，还有一些人则相信我们正在大声地揭示出这个时代的许多症结所在。有许多人希望我们可以继续隐藏在定性研

究这一半遮半掩的帷幕之下,但我们必须尝试将研究者与责任的公共话题转向对社会正义的研究。

由于我们处在穷人团体和右翼时代的社会政策之间,并希望寻求两者的认真对待,所以,我们需要认识到,对社会研究的权力、义务和责任进行思考是相当重要的。当涉及现代穷人、工人阶级和妇女,尤其是有色人种的那些不合理的表达时,我们的书写实际上是在用某些人的立场和眼光来看待的。这些人包括社区组织者、政策制定者、地区行动者、公共舆论以及研究生们。

这一章陈述的是一种具体的——或许是最新的——对关于法恩(Michelle Fine)所称呼的"连接性工作"的分析。

> 在冲突的条件下,许多定性研究实际上表达了关于"他者"的殖民性话语。这篇文章尝试回顾以往的定性研究课题是如何实现"他者化"的,并讨论了试图打破"他者"状态的行动主义/后现代主义之出现。首先,我们考察了在日常生活的政治中自我—他者的连接,也就是说,那些通过他者的发现而使个体认同得以分离或者融合的连接。当我们重新思考研究者如何针对或服务于他者而言说时,也同时禁锢了我们自己和自己的创造,掩盖了渗透在自我—他者连接的冲突。由此,接着我也会讨论定性研究者是如何通过相关的方法、伦理、认识论等一系列问题来认识"连接"这一问题的。

我们并非简单地反思那些由多个自我(犹太人、亚洲人、加拿大人、女性、男性、异性恋、同性恋)所共同创造的经验性材料,尽管很显然它们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可以参考:Weis & Fine,印刷中)。相反,我们在这里集中了关于怎样表达责任问题之一系列批判意识的自我反思,也就是说,要转变针对穷人和工人阶级的公众意识和日常看法,将生活与激进的社会经济结构连接起来,以及建构一种可以打破和重构责难受害者(victim-blaming)观念的故事与分析。

在写作时,应当反对那些陈腔滥调,我们认为大声表达出自身观点的政治性和学术性将是十分有益的。

反思性的波动

无论历史上还是现在,社会科学中研究者和主体之间的关系在文本中并不清楚,它保护了特权,也将两者的距离安全化并掩盖了冲突(Fine,1994,p. 72)。而且,还存在着一种把社会科学观察者的自我视为潜在的干扰者的倾向,认为自我是可以分离、中立化、最小化、标准化和控制的事物。这种研究者的立场可以从社会科学历史文献中占主导地位的形式里看出来(Madigan, Johnson & Linton, 1995),它们宣称要果敢地放弃主体或个人性的经验(Morawski & Bayer,1995),尤其是研究者的经验。就像贝哈(Behar,1993)所解释的那样,"我们试图揭示他人的状况,但却几乎没有或很少揭露过我们自身。我们把他人当作可以攻击的对象,但是我们自身却总是保持着不被攻击"(p. 273)。当我们隐藏在所谓中立的

立场下面时,我们的被访者则不得不承担着表达事实的任务。

当然,研究者在文本中从来也没有完全消失过,但怎样在其中将自我(及政治性的反思)纳入的问题依然存在(Billig,1994,p.326)。简短的个人介绍或者信息常常有助于研究者权威的树立和表露,并且最终产生了"自我得以净身抽离"的文本(Okely,1992,p.5)。但是反过来,如果文本中充塞着对研究者的主体性反思,也会不自觉地掩盖了参与者和研究"对象"之间的区分。

应当指出的是,当我们呼吁将研究者的主体体验引入以前被视为对象事实的文本中时,对于不同情境的研究者来说其意义也是不相同的。当研究那些被边缘化人群的经验时,研究者具有相对的特权地位,相对于沉默对象而言的反思性模式需引起特别的关注。此外,很容易使反思性成为克拉夫(Clough,1992)所称的"强制性之内在体验的外化"(p.63)。以罗萨尔多(Rosaldo. R.,1989)的话来说,"如果古典民族志的缺点是研究者和对象之间从相互分离到相互远离,那么现今的反思性对于以自我为中心的研究者来说,则日渐丧失对文化上异者的认识"(p.7)。然而,从另一种不同的、交叉的视角来看,一些批判性的种族理论家(比如,Ladner,1971;Lawrence,1995;Matsuda,1995)曾指出,对于那些我们一无所知的有色人种而言,"作为文本的创造者和解释者,我们宣称自己的主体存在实际上是一种政治行为"(Lawrence,1995,p.349)。哈拉韦(Haraway,1991)也指出,"视角其实常常是一个权力问题——又或是嵌于我们虚拟化实践中的暴力问题"(p.192)。谁有资格获得权力——或是否适当——以使他们可看到和讲述出隐藏在制约中的东西? 在对穷人的意识形态攻击年代里,它是书写和再现我们社会责任的一个核心问题。因此,在这个恶的时代中,我们努力寻求一种反思形式以阐述我们对表达和责任的关注。

文本主题

在这一章的附言里,我们节录了米歇尔·法恩和洛伊斯·韦斯(Lois Weis)所著的关于20世纪穷人和工人阶级城市居住者的书——《未知的城市》(*The Unknown City*),并对相关材料进行了反思。在这本著作中,他们把都市青年的声音、政治、失望以及希望放在了中心地位。对这些男性和女性——非裔美国人、白人、拉美人、穷人和工人阶级——进行了口述史的描述,包括他们的奋斗、胜利、激情、被工作或失业所充塞的生活、学校、家庭、精神、性爱、街头或家庭暴力以及不会再重现的社会运动等。我们的分析指出,这些青年人,男性和女性,建构了对美国民主的一种未知、未闻以及消极的表达形态。在23~35岁之间的这些人,他们既没有资源也没有X一代成员①的那种典型的权利意识,在媒体的报道和分析中,他们成为社会问题的起因,以及都市犯罪的源头,同时,他们也被描

① "X代"一般认为指美国婴儿期以后出生的一代人,大致出生于1965—1980。—译者注

述为福利改革的起因所在以及道德败坏的核心。尽管当代许多社会政策的设计主要是为了"对付"他们,但我们的调查显示,在政策制定者和其他美国人的背后,他们也需要充分地表达自己。

20世纪90年代的末期,以穷人和工人阶级群体为主题的书泛滥起来。但是这一群体的成员,尤其是年轻人,基本上不为社会所认识,他们曾经被明确视为"道德典范"(Roman,1997),而今却隐匿于书外,无人问津(Franklin,私人交流,1997年10月14日)。当我们的国家离他们的需求、渴望、力量、呐喊渐行渐远之时,我们也同时抛弃了一代人。在全球性企业重组的境遇中,在曾经熙熙攘攘的工厂的废墟之下,几百万的穷人和工人阶级的孩子们继续成长着,他们亦复活了美国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社会公共安全网已全然破损,在其社区甚至家里,暴力活动正日益增加。大部分情况下,他们指责自己或互相指责。国家从社会事务中退出,企业远离城市中心和北部地区,当责难需要变成救济时,美国却令人吃惊地缺席了。时值复兴公民权号召,坚定行动、福利以及移民政策之动力风起云涌之时,我们却从未听到穷人和工人阶级中那些男性和女性的声音。

《未知的城市》一书所揭示的不仅是存于穷人和工人阶级成员的共同心声,也深入刻画出20世纪末期美国都市社会的特征。尽管在20世纪60年代,立法和社会政策之设立标榜减少不平等,促使社会团结,但至90年代末,我们反而生活在一个民族、种群、社会阶级和女性之间分裂深化的国家里。引导我们对《未知的城市》做研究的目标是希望揭示美国人和美国社会之断裂性的共同特征,亦即我们所称的"差异的社区",在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里,低收入的人们却过着食不果腹的日子。更进一步,我们试图将这些声音置放于有关社会政策的论辩中心而非他们目前所处的边缘地位。本章有意识地重新反思本书之写成过程——20世纪末期很少有人关注穷人和工人阶级的境况,当我们投身于表达他们所发生之事的战斗之中,我们历经了怎样的困难和抗争。在地方性的经济和日渐压缩的公共领域之下,我们试图寻求重新呈现那些男性和女性,他们生活中的快乐和失望、愤怒和欢笑、绝望和诉求。

我们希望回避关于民主和本质主义分类之狭隘的框架,但从泽西城(Jersey City)和布法罗两个地方收集的资料似乎趋向于将我们带到这样的划分之中。包括我们所熟知的具有社会建构特征的种族、阶级和女性阅读、教育以及书写等(参看 Fine,Powell,Weis & Wong,1997),其中充斥着权力和复杂性,以及惯常的引用等。你可以听一听与泽西城和布法罗的非裔美国男性的访谈,它们的确明显不同于对白人、拉美人、非裔美国妇女的交流方式。但实际上,无论是那些独特性的材料、每一群体的历史性积累,或者是各种类别的巨大差异,都需要得到知识和政治的尊重。所以,我们所要讲述的,应该是那些生存于贫穷境地人的"普遍性的故事"以及关于性别、种族和族群中的"特殊的故事"。同时,我们通过后结构的理解来表达他们的身份和可能性,当游历于各种"差异"之间的细微区别时,我们也时时回到"共同性"的事实基础上(如经济、国家和身体)。

对研究的建构

关于社区

也许多数令人困扰的理论都围绕着一个问题。那就是,是什么组成了一个社区?我们该怎样去表达像布法罗或者泽西城那样的社区呢?它们尽管拥有不动产、街道门牌等诸如此类的实在地理状态,但我们却很少用心理、社会共享的记忆或想象的方式去对待它们。

从理论指向来看,我们所收集的各种叙事证明了社区生活正发生着深刻的断裂。以种族/族群、女性、阶级、代别以及性征等划分的细微民主差异在现实中却呈现出明显的差别。在地方邻里或种族/族群团体中,女性、性征以及代际划分等很大程度上扭曲了本来应该表现出来的内部连续性(可参考 West,1993)。比如,在似乎"相同"的地方,非裔美国人用折磨和恐惧来指称地方政治的实践,而白人则更可能抱怨的是犯罪率的上升,还常常讨论谁的姐夫是警察之类的话题。泽西城的白人怀念它们"过去的好日子",并渴望着有一天可以搬到巴约纳(Bayonne)去,而同一区的非裔美国人则对那些所谓的"过去的好日子"全无眷恋,照例在巴约纳惹是生非,没想那么多。

在历史上工作没有保障、经济困窘的时期,内部的分离、说闲话、指责以及猜疑等破坏了工人阶级和穷人社区的团结。虽然他们在生活上亦常有相互依赖,但彼此的通力合作甚少。在家庭中,性别和代际之间常常充塞着歧见与冲突。完整意义的社区对他们来说,不过是支离破碎的幻想,且很容易受到外部威胁和内部分裂的攻击。尽管可以用阶级划分来概括这种情况,但我们认为,只有排除了种族/族群、性别、性征等方法造成的差异后,才可以拿阶级的一致性作为划分的基础。不过,如果同时用人口统计和变迁史来分析的话,城市之间的共性也是惊人的。

我们可以不去纠缠社区的概念问题,只将它看作一个可以共享生活体验的地理空间,并以此来描绘两个城市社区——泽西城和布法罗里人们的生活。或者,也可以随便地出版一本关于非裔美国人、白人、拉丁裔人的著作,指出每一个群体都生活在一种与其他人完全无关的社会世界里。尽管我们的一些资料倾向于后者,但我们的理论和政治取向要求指向前者,寻求他们之间共同的基础,共享的语言,以及共有的经验。我们的论文则试图在这两种视角里去讲述共同的以及特定的问题,不是要偏向哪一方。我们认为《未知的城市》一书可以有两种章节的安排形式,一是凸显某一群体(比如非裔美国男性群体)的特殊经历,另一个便是探讨穷人和工人阶级群体在其生活中的相似经历(如教育、母亲的生活、犯罪)。在叙述中,我们描绘出了每一个社区的大致状况,并区分出"其中"差异的分析层次。对于我们的分析而言——在城市社区内或者之间——我们则有意

在一致性和差异性、固定的边界和开放的边界、价值共享的社区和争议不断的社区之间移动。

关于种族

凯利(Kelly,1997)把他最近的一本著作描述为“对黑人的人道捍卫和对那些无视复杂性的学者及政策制定者的斥责”(p.4)。其实,一些学者已经指出过这种复杂性:比如盖茨(Gates,1985)用优美的笔调描述了种族,字里行间使用了各种引语。戴森(Dyson,1993)则反对把一些概念作国家主义和本质主义的界定,无论是皮肤的颜色还是语言;克伦肖(Crenshaw,1995)对种族和性别的交叉进行了理论化;霍尔(Hall,1981)和迈克尔·奥米(Michael Omi)以及怀南特(Winant,1986)一样,描述了种族认同在不同情境中的状况。与这些理论家相仿,我们的被访者既把种族视为、用作或者设想成一种流动的、不稳定的幻象,也认为它们是社会体验和经历方面基本的、不可抹却的一部分。实际上,我们的一些被访者,如同我们以下将要引用的,都认为“种族”内在地建构了认同的边界,提供了一种与复杂性不同的,没有太多否定意义的叙述。

芒(Mun):你父亲的情况如何?

卢萨(Luisa):我的天!我父亲可是一个你可以在20世纪70年代看到的疯狂的波多黎各人。

芒:你妈妈的家庭背景是什么样的呢?

卢萨:我妈妈,妈妈在天主教的环境下成长的,但是在我妈妈的那个年代里,一个爱尔兰和德国血统的妇女与一个中国男人私奔,在那些日子,就像……哦,不,没有那些就什么都不会发生。我的祖父不得不为了我的祖母离开了他的家庭,然后他们才可以在一起,也因此,他的家庭里再没有人承认他。

芒:因为他结婚的对象是……

卢萨:对,他与我的祖母结婚。

芒:那你母亲的立场呢?

卢萨:那就是我母亲的立场。

芒:你祖父这边呢?

卢萨:我的祖父,他在越南,二战时候的一场战争,哦,我忘了战争的名字。那场战争很大,这个我知道。

芒:朝鲜战争?

卢萨:对,好像是这个。我只是不记得是什么。对,他还有勋章,每样事都是我妈妈告诉我的。

芒:所以你看起来很不一样。

卢萨:是,我是个混血儿。

芒:你有中国血统?

卢萨:对。我有爱尔兰和德国、波多黎各和意大利,我有很多血统。我

是一个混血儿。

芒:我有点奇怪。第一次看见你的时候,我以为你是从中东过来的。

卢萨:从中东?

芒:是啊!

卢萨:哦,天哪! 不。我只是像,但我真是混血的。我什么都像。我带着所有这些不同人的特点,它们一直都是这样。我对天发誓,没有骗你,真的没骗你。

当在泽西城和布法罗开始我们的访谈时,我们对种族问题采用的是一种后结构式的思考方式,尤其是依循霍尔(Hall,1997)的思想,承认人为的建构、展示,以及植根于种族观念的激进"渊源"(或许有大约1/32的血液)。基于此,我们构造出一种访谈约定,慷慨地邀请被访者像我们一样做"种族"的游戏。我们用了许多灵活的方式,要求他们描述特定时间和情境下的种族认同,比如当他们填写审核表时,当他们逛超市时,当他们一个人或者与朋友在一起的时候等。有色人种的被访者尽力表现得有礼貌并配合我们的"游戏",但是,三个小时以后,他们开始被这些问题所激怒。白人的被访者则或是以为我们视其为种族主义者,或是避免认同为白人——相反,谈论到做一个爱尔兰人、意大利人,或者是人类。毋庸置疑,问题"游戏"已经不再起作用了。

许多人以为种族"应该"不会造成差异①。我们也想写那样的书,它并非来源于自由主义的鲁莽,而是来自于对阶级、种族和性别分析,对"应当是什么"的郑重政治承诺。然而当我们聆听访谈资料时,被访者对生活故事的叙述完全融入那些激进的话语中,一旦读者阅读到这些材料,他们就会得出那是一个"匿名"的激进的群体。诸如个人的暴力故事、家庭结构、叙事方式、人们赚钱的历史、自发的唾弃男性及家庭(公开的)暴力、物质资源的获取机会、与亲属和国家的关系、政策互动的描述等,所有这些都要透过"种族"来讨论。

"种族"还是一个后结构主义和活生生的现实需要进行对话的场地。"种族"实际上是一个社会建构。但是,在激进的社会里,"种族"深刻影响了日常生活、认同和社会运动的结果,多数人也在这样的方式下成为"他者"。当面对一个具有深刻种族背景的读者,怎样去描绘"种族"这个概念始终困扰着我们。种族的分类是否是理所当然的、没有问题的? 如果那样做,我们就实际上固定了这种本质主义的地位特征。那么,应当在理论上视其为有问题的,并由此探讨它对日常生活的有形影响吗? 不错,种族是一个社会建构,但它与种族主义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以至于在日常生活和社区中,它也有着巨大的权力。对于我们与之交流的被访者来说,"种族"的确存在——它充塞于他们生活中的每一个角落。

① 法律学者威廉姆斯(Williams,1997)讲述了她学龄前儿子的故事,他似乎分辨不出物体的颜色。比如,当问他草是什么颜色,他就说,"我不知道"或者说"那并没什么差别啊!"后来,威廉姆斯发现,"在他们以白人为主的学校里,好心的老师勇敢地以及重复地让他们确信颜色并不会造成差别……而在进一步的了解中发现,老师之所以感到有必要第一次便在课堂上告知学生,是因为它的确造成了差别,且以可预料到的痛苦的方式:一些孩子一直激烈地反对黑人也可以成为'好人'"(p.3)。

当我们认可“种族”的现实存在时,如何能够同时在理论上动摇这个概念呢?

可以举一个虽小但很有说服力的例子:关于“种族”可能出现的“抽样问题”。我们要在两个城市中找到“同样是穷人”、“同样为工人阶级”的非裔美国人、拉丁裔人,以及白人青年,这样我们可用种族/族群而非阶级来进行相互的比较。而结果怎样呢? 不可思议。尽管我们确实找到了穷人和工人阶级的白人,但他们贫穷的范围和程度与非裔美国人的样本简直不可同日而语。尽管小心翼翼地对种族社区进行筛选,但我们试图寻找可比较性的愿望仍然为影响有色人种的贫穷和工人阶级家庭之“活生生的现实”所破坏。

获知和同意:谁获得信息和谁得到同意

分析框架或多或少总是不清楚的,由此,我们需要转到访谈本身。我们努力实现对穷人男性和女性的叙事建构上的伦理性,每一次访谈我们支付40美元。那么,我们要问,什么是同意呢? 为了谁的目的呢? 芒便经常面对这种困境。被访者的知情同意(informed consent)则需在其中注明:

> 我们正在进行一项有关青年人在高中阶段及以后的经验认知方面的访谈,并对探讨其高中阶段发展出的关注、态度以及(从那时到现在)期望尤为感兴趣……我与(访谈者的姓名)同意参与此项关于1980到1990年期间在泽西城长大的青年人的都市体验研究。访谈将被录音、转录以及写在书上。被访者的姓名将不会出现在访谈内容中。

知情同意的确立基于学术研究的制度化冲突背景。尽管确立知情同意的目标首先是为了保护被访者,但我们仍然需要提前告诉他们受到伤害的可能性,而且如果他们愿意亦可随时退出,不过知情同意也有效地减轻了制度或者机构的监督责任,给研究者更多的对研究过程的控制力。莱克斯(Lykes,1989)对这种研究过程的标准化进行了评论,她写道,“当反思对这种(被访者知情同意)形式的运用时,我发现它揭示出了一种复杂性,一方面我的角色既是研究者也是行动者,另一方面在权力不平衡情境中研究对象之间合作的发展也受到了诸多限制”(p.177)。她继续指出:

> 访谈的知情同意作为研究项目中保护主体的机制得到引入,反而亦成为一种障碍,使我不得不面对研究的需要和要求之间的裂缝。这种裂缝产生于大学内部,产生于信任与不信任的系统之中,以及产生于已经成为共同合作一部分的共享和连接之中。

在工作进程中,我们逐渐了解到知情同意的引入需要分析足够多的、我们日常简单称之为“资料”的内容——比如对参与者的叙述。无论什么时候,当芒拿出知情同意,他和被访者之间的(明显的)融洽关系似乎就此建立。许多人会问他,“这是做什么用的?”而当需要芒做出解释时,他却常常不知如何处理,很多时

候就搪塞过去。与官方的那些协议相反,芒在一些情况下则是先把访谈提纲拿出来,然后再展示知情同意的协议。但即便如此,许多女性也只是像签署其他协议一样匆匆签过,并不留意去看整个协议的具体内容。这种明显的冷淡或许反映了她们对程序性事务的态度。这些被访者——接受福利的妇女——常常被要求看一些令人费解和技术性的科层表格,而且经常要求她们只填好自己那份就行,别管其他人的责任。

知情同意促使我们直接面对着被访者和我们自身之间那种明确的分化关系。它成为一种天然的工具———种意识——提醒我们注意到我们的责任和位置;并击碎了那种两者之间友谊和互惠的错觉,它让"连接工作"变得更加艰难。无论芒怎样艰难地试图弥合"差异",找到一个可以执行研究的共同基础,我们的参与者对同意协议的回应总是提醒我们要消除所有试图代替差别的人为尝试。

斯泰西(Stacey,1991)曾经指出,由于研究过程有可能导致研究对象处于被操纵和背叛的危险地位,故(女性主义)民族志依赖人际关系、参与以及补充。她论述道:

> 那些不真实、变异,又或者是不可避免的、背叛被访者的状况是田野研究内生的情形。无论表现出怎样地热情、乐观,田野研究者总是存在于当地人面前,其社会工作经常表达了对一种关系系统的入侵和干预,在这种关系系统中,研究者比研究对象更容易和方便地撤离。这种关系的不平等和潜在的欺骗是逃避不了的(p. 113)。

当芒结束了他与里贾纳(Regina)的访谈之后,多西(Dorcy)找到他说,她也想参加到研究中去。芒则告诉她,他与杉(Melissa)和戴安娜(Diane)完成访谈之后就可以轮到她了。于是,接下来的大约三个星期,只要芒从多西旁边经过,她就会问:"什么时候该我啊?"芒则常常以对待要求访谈的人的那种例行之回答方式告诉她:"你就是下一个,下个星期,可以吗?""你要确定哦!"多西笑着说。她的重复以及友好的姿态,加上清脆的笑声和略带羞赧的表情,便是一种坚定的要求:"我想你所说的是该轮到我了。"

在他们最开始的访谈中,多西和芒在216房间里面对面地坐着。芒以他常用的开场白说,"谢谢你的参加。你知道,我正在与女性就她们关于福利的体验进行访谈,但我尽量希望得到她们生活的一种全貌。这是一份知情同意的协议,你可以先读一读。如果你同意遵守上面所写的内容,就在上面签字。如果你觉得有任何的不妥,只管说出你不想做即可,行吗?"她签了字,于是录音访谈便开始了。

> 芒:当你成长过程中……你的家庭是什么样的?
>
> 多西:哦,我成长……成长得很好……我的母亲,父亲都好。在我12岁那年,父亲去世了。之后,你知道的,他便……他便一直在那里看护着我们。我的母亲,她很好。她是一个坚强的女人。她爱我们并照顾我们……我们需要的东西……她帮我们摆脱困难……对。
>
> 芒:你有几个兄弟和姐妹呢?

多西:对不起?我没听清。

芒:兄弟和姐妹。

多西:哦……嗯……三个姐妹。我有三个姐妹和五个兄弟。我的……一个兄弟死于艾滋病,在1991年的……11月,他死于艾滋病。

芒:你是多少(What number are you)?

多西:25了。

芒:我的意思是,你在家里的排序。

多西:哦,我在……我在中间。

芒:(笑)

多西:(笑)……我排行中间……中间的孩子。

芒:这样好吗?

多西:挺好。

芒:我的意思是……怎么好?

多西:我的上面和下面都有啊,但是还是挺好的。

芒:你指什么呢?

多西:嗯?

芒:上面和下面?

多西:因为就像这样,最大的可以最先得到东西,最小的则可以在排行中间的之前拿……最多东西。(访谈继续)

一开始,你可能认为这个摘录与对其她女性的访谈无甚差别。但如果往深处看——尤其听了录音带——多西的犹豫、单音节的发音以及说话的勉强都值得注意。这与她在访谈过程以外,以及大多数接受访谈的其他女性的讲话截然不同。在那天的最后,芒在他的田野日志中写下了这个简短的备忘。

> 今天与多西访谈。前两个星期里,她一直要求我与她访谈。而当我今天与她谈话时,她却老是给我一些简短的回答,说话时也轻声轻语的,我几乎听不清她在讲什么。她不清楚的声音加上老说"我不知道"简直让我快疯掉了……她还拒绝详细地述说她的故事、讨论她的生活。我不知道为什么要选她……我本来可以选择玛丽(Mary)或者安妮(Annie)的。

当想到被访者的玩笑和姿势乃是为了发展一种友谊时,芒有种受骗的感觉,并奇怪是否多西的友好不过是一种有意赢得他的信任的表演姿态而已。

斯泰西(Stacey,1991)认为在田野研究中,被访者与研究者共享的生活、爱情或者悲剧归根到底是所要收集的资料——"是人种学加工厂中的谷物,而这个加工厂拥有真正的碾磨谷物的权力"(p. 113)。当女性被访者获知并同意做访谈时,这是否意味着她们的故事(她们选择——或者被迫——与访谈者共享的生活内容)将不再属于她们了?比如,是否芒会把她们的问题反映给福利机构的某些工作人员?他是否打断了群体之间或之内女性的种族敌对主义,抑或仅仅收集这种描述的事实?当罗西塔(Rosita)告诉访谈者她看见她的男朋友与项目执行官德伯拉(Deborah)粘在一块,而德伯拉就是给访谈者提供研究的人,这时该怎

么办呢？又当从焦点访谈群体中得知罗西塔被其中一个督导员性骚扰时，该怎样恰当地处理呢？芒发现他总是处于一个允许随心而入的组织和一个很难获得被访者的忠实与信任之间的矛盾之中。在许多这样的情形之下，他都战战兢兢，如履薄冰，避免陷入这种似是而非的状况，并记录下观察资料（Roman，1993）。但是，就像斯泰西所说的，人种学方法更可能使研究对象凸现出来，受到宰制：斯泰西认为，访谈者和被访者的关系越亲近，危险性就越高。不过，与这种观点相反，我们访谈过的许多女性和男性都认识到并很高兴地揭露出访谈过程中的权力不平等。他们认识到我们可能将他们的故事、他们的关注以及担心拿给读者、政策制定者和公众，这是他们自己做不到的，因为没有人会听到他们的声音。他们（以及我们）知道我们具有阶级和种族优势来这样做。所以，他们“同意”。他们既是清楚的也是明白的。

接下来是“故事”

从对担心“同意”到担心我们会收集到“糟糕的故事”：

芒：现在你是否感到你说的话不被信任，所以你需要其他人来讲，你需要律师或精神病学家来说你是正常的，对吗？

塔拉（Tara）：对，那是因为 DYFS（青年人和家庭服务组织）的原因。

芒：但是你无法让他们……

塔拉：他们不会的。他们不会只凭你的话就去做的。你需要——

芒：你需要其他人为你说话吗？

塔拉：是的，DYFS，对。

芒：那么，DYFS 会怎样对待你的孩子们呢？

塔拉：因为当你有孩子时，他们说我让他们的生活很危险，因为我确实这样，但我在……我在监狱里，我在精神病房。他们不得不尽量为了孩子，那时我无法照顾他们。

芒：哦，那么 DYFS 带走了你的孩子？

塔拉：对，因此 DYFS 把孩子给了他们的父亲。我现在要告他们。

芒：尽管这样，起码孩子有人养了。

塔拉：那也是我的意思。他们有了家庭。他们可能恨那里，他们不能忍受。我的孩子说他们更差了。

芒：他们恨父亲吗？

塔拉：不，他们不恨父亲，他们恨他们的祖母，他们恨继母，他们恨祖父。他们不喜欢他们的祖母。

芒：他的妈妈吗？

塔拉：对，他们不喜欢他们的姑姑，他们的叔叔。

芒：他们很多都是波多黎各人吗？

塔拉:他们都是波多黎各人,但是我的孩子一直像是被抛弃一样,因为他们不喜欢我,所以也不喜欢我的孩子们。我的孩子们,我的意思是,7岁的乔治,乔治生活的7年,只见过他祖母六次。尼克尔,则在她生活中的3年里从来都没有看过他们。你知道,我的孩子们被丢在家里,他们什么事都不晓得。

从我们访谈的内容里,我们能得到什么呢?特别是在穷人和工人阶级被右派、国会妖魔化的时代,我们如何处理这些“热门的”信息?被访者往往不能,或者是拒绝把这些有问题的社会/家庭模式从宏观结构上,进行理论的、经验的和政治的联系,而我们如何来做到这一点呢?

自决的个人主义霸权导致自我意识的,特别是对“糟糕故事”的一种强加性的理论(通过我们),而它们超过了多数被访者所表达的希望。比如,当接受福利的妇女事实上不得不为了生存而采用骗取福利的方式时,——“的确,他每个月来一次,给我一些钱。我也许不得不采用欺骗的方式,但是我的孩子们需要钱啊!”——我们该怎样解释呢?当然,我们不是指那些为了得到更多的钱而去吸毒的人;大多数人是非常称职的母亲,但他们为了孩子的这种愿望却被忽视了。而忽略这些信息就是否认贫穷、种族主义和歧视的影响。对这些事实的报道比研究逃税、毒品的使用、精英们对孩子的忽视等冒着更大的风险。

在历史上的某个时候,一些问题如社区和家庭暴力的复杂社会根源、社会福利依赖的经济负担,以及穷人和工人阶级的爱、希望和痛苦等,很少有人愿意去反映。那么我们又如何像窥私癖一样去展示这些肮脏的事物呢?历史学家斯科特(Scott,1997),在他富有启发意义的一本书《蔑视与怜悯》(*Contempt and Pity*)中,把今天左翼和右翼都使用的“破坏性的黑色灵魂”不正当的用法放在历史的视野中考察。我们的所作所为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这种不当用法的传继呢?如果白人的穷人和工人阶级也被描述为“破坏性的”会不会好一点呢?同时,把当前和历史上对穷人和工人阶级的攻击所造成的破坏性后果浪漫化甚至否认,难道不是不道德的吗?而这些他们的问题实际上是与国家、经济、社区或者家族等的原因有关。由此,我们提出了两个问题:首先,我们(即社会科学家)为了宣称对压迫和不公平的反对,必须历数这些损害吗?其次,在重写——也就是,干预——对“他们”损害的“常识性”的描述(并且,当然,也包括我们)中,以及反过来在提供一种民族性的破坏、侮辱或对正义的要求话语中,公共知识分子应当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当访谈结束后,我们还要继续努力,探讨怎样最好地去描述故事,因为它们造成的损害可能比好处要多。比如发现被访者在童年时期曾经受到身体和性的侮辱,并对其成年造成过阴影,以及那些仰仗福利支付而生活的人等,如何表述这些故事依赖于谁去阅读/探讨它们。这样的担心也导致许多人在他们的收入上“说谎”,所以他们自认为是“骗取福利”的人。还有一些关于被访者,特别是白人,用污蔑和辱骂的方式来描述有色人种的故事;一些关于种族/族群之间,女性生活中暴力的深入访谈资料等。那么,我们该在什么情况下,需要加上句这样

的话呢——“警告！滥用资料威胁我们的集体民族健康！”

有一些学术作品中谈到过这种忧虑（Cross，1991；Hooks，1990；Lather，1991），但是很少人讨论到或者与行动主义者一起来重新设想为了社会正义来进行社会研究（Austin，1992；Lykes，1989；Saegert，1997）。现在到了我们都需要搞清楚该如何说应该说的东西时候了，而不要危害到个体以及利于那些不正当的社会描述。

对于糟糕的故事，我们的担心是会刻意去避免它们而去搜寻“好的故事”。当进行访谈时，研究助手们会聚在一块讨论这些故事。我们会讨论被访者没有表露出来的事情、被访者的生活、“一些好笑的事情”、我们的痛苦感受、我们对材料的初始理解等。描述的词汇包括“有趣”、“没意思”、“跟常人生活没什么两样嘛”、“你肯定早就听过这些了吧！”，当然还有“这是一个精彩的故事”。但是，“精彩的故事”意味着什么呢？

精彩的故事可以被看作在其内容的层次和内容的涵意上具有突出的寓意。寓意，就像詹姆斯·克里福德（James Clifford）提醒我们的：

> 表示用一种虚拟的叙事连续地指代另一种观念或者事件模式的实践。它是一种“解释”自身的表达……（它）具有一种激发读者（或听者）联想到另一个故事的倾向，重复或者替代以往的一些故事……对寓意的认识强调这样一种事实，即在某种程度上，真实的描述是“令人信服的”或者是“丰富的”。而此时，它们便是一种扩展的隐喻，以及具有连贯（理论的、感知的和道德的）附属意义的联合模式……寓意将特别的注意力放在文化表达的叙事特征上，放在建立表达过程本身的故事上。

我们担心那些看似精彩的故事结果却有可能导致对穷人的整体误解和表现。实验者常常不可避免地形成“实验者的偏见”，和他们一样，定性研究者也带着对研究对象的误解和“偏爱的虚构”（Clifford，1986）。我们进入到一种寻找故事的场景中，可能偶尔会“不自觉地以那种产生自我实现预言的方式行事”（Suls & Rosnow，1988，p. 168）。通过寻找精彩的故事，我们可能进入到一个领域，在这里，对他者的建构似乎是善意的，却导致了表达（representation）的政治学以及变成对穷人负面描绘的一个部分。

对于我们来说，“好故事”的基本特征并不仅仅是辅以“社会问题”的标签，像是无家可归者、福利，以及/或者性侵害———一个被骚扰、调戏或者被问题所纠缠的受害者等。回过头来想，我们承认也曾经试图找寻那些“反抗者”，他们扮演着对国家和/或经济关系的批判角色。在芒对接受福利的妇女的访谈中，他总是希望她们乃是一种完美的批判者，能够一针见血地指出那种结构性的罪恶和国家的伪善。需要指出，这些受到深深压迫的男性和女性们指出了那么多霸权和责难受害者（victim-blaming）的现状是很有意义的。关于“他者”的判断，用一种主导贫穷、种族主义和性暴力这些引起悲哀的受害者的广泛的文化话语，故常常激起她们的共鸣。在我们许多访谈中，接受福利的贫穷妇女指责其他的妇女，认为她们是“福利王后”、“不负责任的母亲”以及“铁石心肠的官僚”等。我们把反

抗者的形象浪漫化——他们渴望大声地反抗不公平以及试图用一种集体的方式行动——结果事实上又返回到我们自己的理解上。

一旦我们从被访者那里收集到“精彩的(以及不那么精彩的)故事”时,下一个困难的阶段便是对资料的解释、表述以及分析。我们有时会有意识地或者故意地从这些“精彩的故事”中走出来,但当为了支持某种固有模式,确证某种意识形态和右翼势力的花言巧语,以及重新证实主导性的表述时,它们也可能变成为“糟糕的故事”。就像赫塔多和斯图尔特(Hurtado & Stewart,1997)论述的那样,某种有害和恶意的观念与态度的重复亦会给那些受害者造成痛苦。在这种情况下,当大家都知道某种观念且具有压迫性时,所需要的是最少的文献,同时让我们自身和他人都到一个非常高的分析深度的标准,在日常生活的种族主义和世俗的关注里,我们的研究带有导致被访者承受痛苦的高度风险性。

如果访谈充满了关于贫困的日常生活中那些无味的琐事时,它们并不能像“精彩故事”般吸引我们的注意,此时我们该怎么处理呢?

> 好吧,我一个月拿了……得到了424美元,行了吗?食物票是270美元,我领了……一个月有四个星期,所以我领了……我领了270美元,我把它们分成四份。这就是我在食物上的花费。只够我和我的女儿。我的大女儿不会吃那么多,我也是……我一天只吃一顿。我只吃晚餐。早上我不饿,我不吃早餐的。我喝一杯咖啡或者热巧克力。我的小女儿吃的比较多。不管怎样……一个星期在食物上要花费65美元。我每天出去买肉,买她们的早餐、午餐和她们的学校快餐。不管什么时候……我晚上工作……我工作是……如果接到电话我就去,去清扫别人家的房子。我做这些。你知道,她们的父亲给我一些钱。所以我做所有我能做的……你知道,无论什么,你知道吗?铲雪……(笑)我不在乎。你知道,给我一些钱,只要我的孩子们得到她们所需要的。但是基本上,她们的父亲对我帮助最大。你知道,他要来了……哦,我的爸爸也这样做,我不要依赖他。他要来了,他会查看我的橱柜,我的冰箱,我的衣橱。他会说:“好吧,你看你这有什么!”。然后,我就这样说,“我很好,约翰尼等会儿要回来了。”他就说,“别这样!”然后巴拉巴拉地说一些。然后,他就出去,买一些食物回来,她们的父亲经常回来看看冰箱,干这些事情,你知道吗?我总是让……我的孩子们有食物,那样很好,你知道吗?她们永远不会挨饿。你知道,我……恨自己说这些,但是如果我……我的意思是,如果有一天我的孩子们挨饿,我就出卖自己的身体。真是该死啊!我的孩子们不会挨饿的,你知道吗?我会做该做的。我在胡扯。人们能够……我的朋友们无论需要什么,都会告诉我。我有……有两个朋友,她们为了孩子,为了钱出卖自己的身体。谢天谢地,我不得不谨慎一点,我从来没有欠过钱,不过我不得不欠的话,我也会的。如果那样做可以养活孩子们……我的意思是,如果她们的父亲……许多接受福利的人,她们的丈夫简直是渣滓。她们不在乎。如果她们有父亲,我猜,如果这样的话……在我做这些以前,我会尝试各种其他办法。但是,如果那样做真的对我的孩子有帮

助，我也愿意去做。只要能养活孩子们的吃穿，什么事我都会做，你知道，要给她们挡风遮雨。我不会在乎地狱是什么，我想这就是我要做的，你知道吗？

当我们听到和读到这些叙述时，研究者（我们）被引向——实际上，是通过符号而获得——一种奇怪的、荒诞的、强烈的感觉。当我们反映关于贫穷的叙事时，我们却感到有义务去小心翼翼地探询材料中这些枯燥无味、世俗的部分，那些大量的篇幅都是让人难以产生兴趣的：世俗的内容，“她们”（被访者）的所作所为“我们”（研究者）也是这样做的——送孩子上学，读报纸，开电视，休息，看医生，希望孩子从学校到家里安全无虞等。这些日常生活的琐碎形式——显然更加难以表现出贫穷和歧视——常常被关于贫穷的人种学描述所摒弃。她们并没有多少可读性，只是日常生活的惯例。不过，我们也认识到，我们需要非常小心，这样我们才不会只选取那些热门性的主题。

不同的方法，不同的故事

访谈结束之后，我们可以运用社会科学中具有批判性特征的三角测量（triangulation）方法，把一种数据的层次加到另一种数据上面，提供更具有说服力的基础。在定量数据分析中，三角测量方法运用于两种情况：一是用一种量表内的多个项目去测量同一个对象；二是用两个不同的量表去测量同一个对象。在心理学，或者偶尔在社会学中，我们也可以用这样的思路，将定性方法作为定量方法的补充。

然而，在研究中，我们的主导方法仍然是叙事，但是也在政治性活动中使用调查方法。在此，我们并非寻求对数据或方法进行简单的、连贯性的综合。我们坚信应该依赖多元化的方法，并努力去采用、对比和选择不同种类的数据。同时，还应当找出对政策最具有影响力的方法之间的差异来。法恩和韦斯（Fine & Weis，1996）曾经讨论过：

方法并非是被动性的策略而已。它们创造、揭示，以及展现出不同类型的特性。具体一点说，如果对个体的访谈引致非常悲观的故事材料，问题几乎没有解决的可能性，同时被访者也认同这种受害事实，并处于无助的状态，那么，同样在特定的群体里同样是这些人，被访者从工人到母亲，到朋友，到情人，到姐妹，到精神治疗师，到儿子，到消防员，到一次性的雇佣者，再到福利接受者等，他们的绝望却开始消失，出现一种解决的可能性，他们的认同也在增加。在具有相对安全、信任、舒适特征，以及少数自由空间中由我们参与形成的反霸权的情境中，那种自我的模糊和缺乏公正性的意义展现了出来。在这种存有相似意向的社区中，人们走到一起来，分享彼此的苦闷、寻找希望，我们从中看到和听到了一种不同的状况，这里充满了奋斗的精神、可能性，以及在个案资料中缺乏的那种活力。（pp. 267-268）

我们认为,不同的方法论可能表明的是不同的男性和女性的视角,他们对福利、工作、教育以及暴力等的理解,一致性是不可能的,或者是不受欢迎的。后结构主义者强调冲突、异质性和多元性,在这种观念之下,产生出了多层次的故事以及各种声音的表达,相互之间的争论、不一致、支持、对话、辩解以及冲突等。一旦考虑到女性和男性的主体性,并把他们看作是多元的、变化的、冲突的和对立的,那么,“资料的得出”就自觉地依赖于参与者的社会位置和对方法的认识论假设。我们赞成巴纳尼(Bhavnani,1993)的观点,他提出,多样化方法和对差异的信诺(尤其是在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应当形成争论的核心,并在政治上进入社会科学中,由此,我们“不能与主导性的、强化不平等的表述站在一起。基于对权力和职位的关注,研究者必须注重研究行为的微观政治……当给出所有知识的片面性时,差异的问题不能被悬置,而是要建立在研究之中”(p. 98)。邓津和林肯(Denzin & Lincoln,1994)认为:

> 定性研究是一种内在的多元性方法(Brewer & Hunter,1989)。然而,多元方法的使用或者三角测量的方法,反映在问题上对现象进行深入理解的尝试。真正的客观现实永远无法得到。三角测量的方法并非一种工具或者一种确认有效的策略,而是一种对确定性的替代(Denzin,1989a,1989b,p. 244;Fielding & Fielding,1986,p. 33;Flick,1992,p. 194)。在一个单独研究中,多元方法、经验材料、观点以及观察者的结合最好被理解为一种策略,对于任何一个调查来说,可以增加其严格性、广度及深度(可参考 Flick,1992,p. 194)(p. 2)。

在谁的声音中

马克(Mark),一个白人工人阶级的被访者告诉我们:

> 那是另一个对象,黑人,哦,我一点都不反对黑人,嗯,你知道的,不管你是黑人、白人、黄种人,无论什么颜色,什么种族。但是,我不喜欢黑人运动,我也有黑人朋友在那里。我对他们说了,他们也表示同意。你知道的,他们考虑的是他们自己,有白人垃圾出现的地方就有白人,有黑人垃圾出现的地方就有黑人,所有的种族都是如此。但是,只要他们没有工作,他们马上叫起来,你知道的,他们便大声地嚷嚷种族歧视。

我们要表达的是谁的声音呢?当然,是我们自己的。但是,我们也在表达那些多样的、经过编辑的、从被访者那里获得的叙事。这些叙事中,特别是从工人阶级和穷困的白人那里得到的,包含着敌意,有时候奇怪地指向“他者”——有色人种、女性、街角黑人等。作为理论家,我们要避免那些天真的信念,认为这些声音应当站在它们自身的立场上,或者说,那些声音不应当被理论化。然而,我们发现我们自身也在对这些声音进行着有差异的理论化和情境化工作。也就是

说,那些在历史上被压制的声音——比如工人阶级白人妇女、男性以及有色人种的女性——我们展现出代表他们的用语,但也许很难用许多"我们"自己的理论去包含它们(Weis, Marusza, & Fine, 1998)。白人男性似乎很明显地竭力指向非裔美国男性,诉说自己的痛苦和困境。而当我们试图展示他们的声音时,我们进行了大胆的理论化,把它们放在广泛的情境中,以防止"他们"对"他们"进行重新的构造(Weis & Fine, 1996; Weis, Proweller, & Centrie, 1997)。

它开创了一个过去很少人注意到的话语空间,那么,这是一个需要革新的认识论上的双重标准,还是一种确定的叙述形式呢?赫塔多和斯图尔特(Hurtado & Stewart, 1997)在一篇题为"透过眼镜去看:白人研究的女性主义方法启示"的引人注目的文章中提出,女性主义学者应当自觉地回避(比如,不去过多地引用)那些文章中具有霸权性的观点,同时要毫不犹豫地为反霸权性的论点提供文本空间。尽管如此,我们也认为批判性地分析白人男性针对我们、"他们"以及经济和社会关系等所提出的观点是非常重要的。为了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尽力去阐释他们的语言、他们的故事以及他们关于"其他人"的立场。

不过,许许多多关于表达的问题也产生了。有三个方面需要我们去注意:①在精心组织收集到的资料过程中,怎样展现研究者自身?②怎样展现叙述者?他们中许多是很好的社会批评家,然而从我们的角度来看,一些人只是为了表达对地位的不满而滔滔不绝。③怎样展现"他者"?他们被叙述者加油添醋地批评,比如个案工作者被指责为小气鬼,得不到那些接受福利妇女的尊重;白人男性指责非裔美国人要为社会犯罪负责;警察则被有色人种社区的人所鄙视,他们在警察那里受到很多不公待遇。那么,是否我们也有责任将这些群体的行动、无辜或者共谋进行理论化呢?当白人男性对有色人种妇女进行污蔑性的评论时,我们需要表达有色人种妇女的观念,并进行抨击,以及重构这些表述吗?如果不这样做,那么我们不是仅仅贡献了污蔑性的表述资料么,社会科学历史上这种让人生畏的资料不是已经存在了么?

若在历史和社会的情境中考察这些参与者,而权力的差异和攻击俯拾皆是,那么理论家如何得到被访者意识和叙述的整体性呢?同时,又如何能够把他们放在社会历史情境中,却罔顾社会科学中的要求、定论以及穷人和工人阶级道德期盼呢(Roman, 1997)?对于这些困境并无简单易解的答案。在《未知的城市》一书中,我们试图将那些叙述情境化,把它们当作在经济、社会和种族情境中的表述,这样叙述者不会为其所在群体背上包袱,但是实际上,总有某个时候,在叙述中,"他者"——有色人种、个案工作者、男性、女性、邻里等——被一种污蔑性的方式所描绘。由此,我们要发动重新表述的战斗。我们努力去弄清楚怎样表述以及怎样在情境中表现叙述者、我们自身,以及叙述者滔滔不绝谈论的对象等。从历史学家斯科特(Scott, 1992)、卡茨(Katz, 1995)、凯利(Kelly, 1997)和斯科特(Scott, 1997),社会学家拉德纳(Ladner, 1971),文学评论家塞吉威克(Sedgwick),以及心理学家克劳斯(Cross, 1991)那里,我们可以理解这种二元性、这些分析的类别、"他者"以及冲突、谴责等,了解它们是怎样以及为何在历史中

被抛弃的,同时我们还可以知道在社会科学对"责难"的关注中,是谁正在受到保护(Opotow,1990)。不过,读者也经常对我们在文本中使用的语言,以及对似乎冷酷无情的社会工作者的描绘感到惊讶。目前,我们正在讨论这些问题,并希望其他对理论和经验资料的关系进行思考的他人给予我们协助。

什么样的诉说是安全的——由谁来说

我们是否可以成为合格的撰写者呢?考虑这件事情要比只是感觉或想象困难得多。我们要贡献或付出什么呢?我们对自身的期望变成约束自己的条件,难道我们的阶级、文化特征以及白人男性所要求我们表达的是为了让女性变的和我们具有一样的特征吗?

白人男性这样说:如果你想在右手主导的世界里获得立足之地的话,你也许可以擦掉脸上的色渍,也许把自己的骨头漂白,别用舌头说话,不用左手写字,也别去护理你那有色的皮肤,不要喋喋不休。(Anzaldua,1981,p.166)

我们在过去的六年中收集到了许多关于社区、经济、种族关系、个体生活的故事,它们受到那些陈腐的或正变得陈腐的公共政策与制度的深刻影响。这些相似的公共政策和制度曾经与我们的资料有着紧密的关联,而现在正在逐步分离,从我们讨论的社区主题中抽离——如公共学校、福利、社会服务、公共住宅等。当公共领域的批评消失,或者更恰当地说当批评的目标缩小或转移时,把批评定位在某个方面似乎是一种学术时间的浪费。最坏的情况便是它将与右翼分子实现合谋。然而,批判主义也是很激烈的。

塔玛拉(Tamara):我再也不想与孩子们的父亲在一起了。那时侯,他给我带来了许多麻烦。他还跟我说,"如果你不想和我在一起的话,我不会帮你去照顾孩子们的!"不过,他并非真的这样做,我还是很感谢他。但是我意识到"好了,麻烦来了!我要去工作……要得到福利!"因为我每月要付$640的房租,对一个两居室的公寓来说,这可是一大笔钱,你知道吗?社会福利只给我$424,所以我不得不补上这个差额。再加上我有一个电话。我还为女儿装了有线电视,又一笔钱!好了,我知道,我没法自己赚钱。什么事情我无法自己一个人扛。我不得不求助于福利机构。我也这样做了,就像……我不愿意这样。我不愿意坐在那儿。我不喜欢等待帮助。我不喜欢他们问我问题,你知道吗?

芒:什么样的问题呢……?

塔玛拉:嗯,他们问我是不是性爱频繁,问我和他上了多少次床,你知道吗?我跟那个家伙说,"对不起,那好象跟你没关系!"我拒绝回答问题。因为对我,如果,他们问你……他问我跟黑人、白人还是波多黎各人睡觉。我的偏好是什么。对于我,那种问题简直是……

芒:这是一种形式,还是他……

塔玛拉:不,他不仅仅是问问题,你知道吗?我拒绝了他。他好象不高兴,他说,“我们必须要问你这些。”我就像是,他们简直是“胡说八道”!你知道,他们只是想,他们只是问这些。他问我一天有几次性生活,你知道,真的就好象问我洗澡了么,是否是干净的,是否用淋浴这样的问题。我并不认为这跟他有什么关系,你知道吗?我每天晚上用淋浴。他还问我一生中有几个男人,是否不止一个。我转过身,冲他说,“我又不是你妈!”我从来没听过这样的问题——(笑)

芒:我也没听过。(笑)

塔玛拉:他们问我奇怪的问题。

芒:那么,情况是怎样的呢?

塔玛拉:真是很窘迫。对于孩子,比如医疗补助,还是很好的。对孩子来说,你知道,有了医疗补助,他们可以想到哪就到哪。他们付这些钱。而对于成年人,我想说的是,我有出血的毛病。我要看医生。自从12月份,我就开始出血,他们告诉我的。我一直去通过福利机构到妇科医生那里看病。医生说,“正常的,正常的。别担心,正常的。”所以,上星期我准备好去。过去一段时间总是有些困乏,真的虚弱,我太倒霉了。我要去看妇科医生,我自己付的钱。谢天谢地,医疗补助也对那家医院实行定点。但是,我还是不得不为我做的检查付了$700。(笑)我必须得做这些检查。要么做检查,要么就出血等死了,你知道的。(笑)但是,许多医生,我问过她,他们过去也常常使用医疗补助。我问她,“为什么现在你不继续使用医疗补助呢?”医生是不会告诉你的,因为他们不用付钱了。这个医生说她一直在等那些享受医疗补助的人们,以支付其本人两年、三年的账单——已经很久了,她仍然在等着。

在这一研究工作中,我们的责任并非去批判公共部门或者克服政策之分裂状况,而是要坚持实现对公民更好的服务和责任。也就是说,社会研究者必须要给市民创造一种“未来将会怎样”的想象与希望,同时要求复苏一种负责任的公共领域,其构成核心应是主动和积极地参与其中的市民们。由此,我们可以对类似“做了什么”这种批评进行分类。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很多事情并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比如许多人希望等着利用我们的叙述以便达到废除福利依赖的目的;泽西城的市长布雷特·舒恩德勒(Brett Schundler)则渴望可以在城市里通过学校代金券的立法,在这个城市里,公共学校并无良好的声誉;而当查里斯·默里(Charles Murray,1984)把穷人妇女描绘为懒惰的、不负责任的时候,他是想要骗取我们的描述。如果右翼势力很强大,且一直希望将攻击性的言论吸纳进去,那么,为知识分子、批判家和纵深的讨论创造一种安全空间或许是天真的愿望,但它仍然是值得我们去做的。

关于"安全的空间"

在进行《未知的城市》的研究时,那些成长于工人阶级和穷人社区的青年男女会告诉我们他们怎样看待经济机会;他们怎样扭转个体性和集体性的未来状况,尤其涉及教育权力;他们怎样概念化那些不断缩减的公共部门、经济、劳工,以及军队;以及他们怎样反思那场进步的社会运动,而正是它历史性和戏剧性地影响了他们先辈及其自身的生活机会。同时,我们发现公共领域正在日渐消失,但城市中也出现了反霸权的可能性,以及由这些青年男女所发起的批判、集会和表达愤怒的行为与场所等。在他们的失望之中蕴涵着希望,而它需要在"安全"的空间中得以孕育。这些空间是1990年代末由穷人和工人阶级所创造和使用的,那么我们该如何通过它或者对它进行描绘,而非将这种避难所和包含可能性的狭小角落浪漫化呢?如果人们在生存中伴随着希望和乐观的情怀,那么是否破坏也终被赋以正义或者得以管制呢?

在这些空间中,我们被邀来提供矫正、抗争以及"家"的营造。它们并非只是一系列地理/空间意义上的安排,而是理论的、分析的,以及空间的转置(displacement)——针对一种组织中或社区中的分立或分裂。个人的梦想、集体的行动以及批判思想则悄然而入,并得以重新构设。在这些空间中,并无屏障/隔离墙等严格的限制,而是常常被一系列(想象中的)边界所保卫,在这里,不允许社区的侵扰和国家的监控。陈腐的社会构造在此被急剧地改变。当青年男女经常面对着对其种族、族群、阶级、性别和性征严苛的公众表述时,他们也利用这些空间去打破那种服务于审查的公众形象,而发明出新的形象表述。

这些空间包括了非裔教堂——在此年轻人思考怎样"从街头返回"以"救赎年轻的孩子们;男女同性恋中心——由工人阶级里青年人和青春晚期的少年们自觉地成立的,当他们的地理和文化情境否定他们的性别表达时,他们在此寻求认同和网络;贫穷的母亲亦或父亲走到一起来,在这样一个充满种族主义和贫穷歧视的文化里,他们可以讨论各自抚养孩子的艰难和欢欣;文化艺术的工作项目——在此,不同种族与族群的男女自觉加入进来,为了共同创造一种空间、一种图景、一种对美好世界的希望和憧憬(Weis & Fine,待出版)。

这些空间的创设,来自于共同体成员的热情和关注,而很少由"上层"所建构。或许它们不过是昙花一现,又或者可以持续存在,但它们能够恢复那种由更大范围的文化所破坏的认同感。因而,也许有机会建立一种被主流文化和地方族群抛弃的认同与共同体。在这些空间中,还存在许多丰富的、有价值的关于青年人的故事,这些年轻人重新振作了起来,但不可否认,都市贫困中,社区生活的内部和边界仍然遭受着威胁和压迫。

在法律意义上,人们可能会问,是否我们所做的事情包括书写干扰了这一隐秘的空间。我们的存在是否影响抑或打断了"自由空间"的正常生活。社会科学

的那种窥视隐私的癖好是否打破了本来设想为(尽管没有某种承认)“自由”的圣洁性?

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通过展现两个不同的事件来讨论这些问题。一个事情发生在地下办公室中,新泽西的社区行动者在这儿碰头,讨论地方政治问题。我们被邀请来参加第一次的交流,但是我们的存在显然导致了某种不自然的感觉。我们悄悄地走开了——这对他们是比较好的,也表现了对他们的尊重。也有相反的情况,有时候我们被邀请到一些聚会里(比如,EPIC 的父母小组、黑人教堂、社区中心、男女同性恋俱乐部),在那里,成员、督导以及其他人渴望我们记录下他们的焦虑,他们希望他人知道自己的真实面貌、他们的所作所为有什么用处、那些“少女母亲”的精神和宗教信仰是如何强烈,以及同性恋者是怎样井井有条地进行组织的等。他们曾经欢迎我们进入到他们的空间里,并“试探”我们的能力——我们的阶级、专业地位以及社会网络等——以及我们是否愿意去书写和证明那些被媒体和主流文化所忽视的、其共同体生活的方方面面。

关于责任

关于研究者的主体性(Fine,1994)问题,我们阅读了一些资料,还撰写了许多内容。我们的义务是使这种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的“连接”清晰化,它意味着我们要在写作中不断质问我们是谁,因为我们也在共同生产着原以为只是“收集”到的资料,同时,我们要设想公众和政策制定者将会怎样接受、歪曲以及误读这些资料。现在,我们意识到批判的民族志学者有责任探讨我们的认同问题,它包括为什么我们要质问自己的所作所为、我们要选择什么去发表、怎样组织我们的资料、学术的视角是针对谁的、当我们做研究工作时,谁是受到保护的谁又是不受保护的,等等。为了一个更加美好的共同体生活,我们在研究中的参与责任是什么?作为这种讨论的一部分,我们还试图解释为了得到以及建设一个激动人心的共同体和社会运动,我们是如何与他们一起进行自己的研究工作的。此外,我们将努力向前推动不断进化的政治进程,在此,我们共同分享多种资助/行动,同时关注共同体中的行动主义是如何重新塑造研究工作的。

因此,在泽西城和布法罗,我们可以将国家政策和地方经济/社会转换对青年男女的信仰系统、世界观及社会意识的影响方式记录下来。对个体的访谈使我们得以积累许多这方面的信息。通过对焦点群体(比如在男女同性恋俱乐部,在非裔美国人和白人的教堂,在 EPIC 父母小组,在拉丁裔无家可归棚屋区,在青少年的 pre-cap 学院等)的研究,我们也已能够营造出一种情境,使被访者可以一同进入到对他们所做成就的分析中,比如,他们对“下一代非裔美国孩子”的承诺,对“按照祖母的方式来行事”的拉丁美洲之精神仪式的承诺等。一位持行动主义信念的修女与一位地方领导人都曾经邀请过我们,希望我们的工作可以与他们项目中的男女群体走得更近。推动这些焦点群体提出问题,找到方向,帮助

参与者对项目的重新塑造。一个筹备服务于“边缘”少年(标签!)的大学项目也希望我们对其进行进一步募资的评价。在EPIC小组中,我们得知由于我们所介入的一些个体与群体工作,使一些成员的工作活动得到了提升。对于这些妇女来说,小组的访谈提供给她们一种行为方式,把她们在生活中的一些优势结合起来,同时当面临贫困处境中的养家糊口困难时,也鼓励她们进行积极的行动。事实上,洛伊斯·韦斯就曾被要求为EPIC小组建立一个长期的基础。

更进一步,通过5年的研究过程,我们已经跨越了研究者—被研究者这样的机械连接,而进入到一个行动者的社区中,将我们的工作应用到支持地方政策和社区努力中。在关于特伦顿和泽西城中国家对地方学校的接管、监控等问题上,米歇尔·法恩证明了这一点,他在社区群体中进行倡导,指出只有鼓励和扶持有意义的地方参与才能够打破国家所保持的控制;芒则在接受福利的妇女中开展项目的合作,这些妇女渴望得到的是同一种物品在每个月不同时期以及社区中不同市场上的价格问题;洛伊斯·韦斯对EPIC小组的持续募集资金提供了陈述和证实;此外,在泽西城,我们把从拉丁美洲人社区中得到的普查和定性资料提供给了城市委员会的成员们。当我们的研究生在爱尔兰社区、非裔美国人教堂、服务白人工人阶级青年的邻里中心、邻里艺术中心等进行论文工作时,他们也在不同社区中进行了深入的参与。所有的这些空间里,研究生们“回到”了他们所工作的社区。在社区中,针对从我们的数据中得到的许多问题,研究者与关键的政策制定者进行了大量的对话。

我们常常认为1990年代的社会调查不仅促进了新知识的产生,而且改变了人们的常识,让大家得以了解一些重要的公共政策、目前的社会运动以及共同体日常的生活等。然而,不应当想当然地相信知识对于现实的“应用”。对于学者来说,决定在什么程度上使其工作变得有用,这是社会科学生活中一个(或者另一个)重要的时刻。

我们的一些同行热烈的欢呼这种知识的“应用”承诺,而一些人则认为我们不过太天真,以为自己的研究可以影响到对穷人和工人阶级社区的政策制定;还有一些同行则将他们的研究直接指向政治和社会的变迁(可以参看Gittell,1990,1994; Lykes,1994; Mullings,1984; Piven & Cloward,1971; Powell,1994等的研究)。而我们还同时不断听到一些同行们的呼吁(右翼或左翼),他们假设,如果一个人对政策感兴趣、参与或者去推动它,那么这个人的研究便是不可信赖的,他们的倡导、承诺、热情或者责任将使其研究受到歪曲。这种观点或许在某个时候会削弱,但也会以一种动听的声音重新回到学术界里。当然,我们所要做的是抛弃这种观点。学术界中,一些学者将我们的研究看作是深深地嵌入在共同体生活中的(他们认为共同体是一种剥夺性的概念),但我们仍然要求学者们走到一起来,中肯地认识我们对那些冗长故事的反应和态度:这是科学吗?这是鼓吹吗?它仅仅是持有偏见的进步性研究吗?它是政治还是政策呢?

我们必须要尽力去发现知识的支撑点、其责任和义务,由此,研究可以将公众的和政治的话语进行剖分,转变那种使穷人和工人阶级男女承受痛苦的意识

形态和物质的基础。也就是说，我们需要认真地承担起对这些共同体的责任来。法恩和洛伊斯目前则正在引导他们的研究生，与地方共同体一起——而不是相关或者触及——进行工作和努力。

指出另一个社区研究中的“基础争论”也是很重要的，它关注的是两种认识上的对峙，一方将历史上受压迫的群体看作“受害的”和“受破坏的”；另一方将他们看作是“反抗的”和“强大的”。它似乎是一种人为的和危险的两分法——我们认为是这样。但是，我们也发现那些进行女性主义、批判种族理论、贫困研究、残疾研究以及最近的酷儿理论工作的同行们，他们跨越了这种知识上的分割，在这里，突破了两种“选择”而要求（假定只有一个）适合的认识。对这种争论我们深感忧虑，但更忧虑的是提供了一种固定的选择。如果受害的故事没有反抗、复兴或者能动性，它们便是有缺陷的以及片面的；这些学者否认个体所具有的那种能够在艰难的社会环境下取得生存的丰富主体性。然而，相反的观点也会导致单调乏味。现在不断增长的流行故事是关于个体英雄式的：尽管存在很多困难，他们依然能够顽强地成长，而否定了人们在那样的环境下所承担的生存压力。

我们还要进一步指出那种只注重社会非正义和反抗的写作者，他们认可的是非正义结构的持久性，以及能动者的权力性行为。他们欣赏行动者的勇气，关注个体反抗行为所受到的限制，但是他们拒绝“受害者”只是无权的这种想法。要知道，这些男性和女性的强大力量并不能证明他们没有承受过压迫。个体和集体性的力量不能作为反对穷人和工人阶级人群存在的证据——比如他们会说，“看到了吗？事情并非那么糟！”我们需要创造一种知识的状态，在这里结构性的压迫、热情、社会运动，以及力量的证据、健康、“破坏”等都可以被认可以及理论化，而不需要消除掉任何复杂故事的基本特征，在非正义的反抗中也包含着都市生活的贫困。

在此，我们用非裔美国男性被访者的话来做结——我们是从教堂和一些精神生活的共同体中寻找到他们的——他们证实了这一点，就像人们说的那样，“只有信仰和希望能够拯救我们的共同体。我们已经走了很长……很长的路了……我们要继续走下去。只有信仰能让我们坚持。”在痛苦、绝望以及生存的希望中，这也是共同体生活的重要部分，而在光明的一面则很少看到它。

结 论

在文章的结尾，我们希望发出伦理上的呼吁，或者更直接一些，叫做伦理的指示。它需要一种精神，要求我们进入并为那种开放的、关于研究者责任的对话做出贡献，当然，同时要意识到，为“谁”的责任将永远是也应该是极其重要的——因为“谁”并非统一的总体，也不是单一的构成、同一性的社区、群体或者一系列的“他者”。此外，今天我们的书写情境在明天将会改变，人们对文本的阅

读也会随之改变。

之所以论述伦理责任是因为我们不想仅仅为了朋友或有关朋友而书写;我们希望书写能够以某种方式重塑人们关于贫穷、经济、社会和人际关系的"常识"。进而,我们也考虑到了社会正义和将里查德森(Richardson,1995)所称的"书写的故事"出版所涉及的伦理问题。通过下面的观点,我们希望对社会分析进行重新评价和考察。

重构表面上好或糟糕的故事

第一个指示是社会研究者要敢于结合理论的严格性和政治的敏感性讲述出核心的真理。在此,我们意指"糟糕的故事"和"好的故事"一样,常常是片面的或值得倾听的。无论被访者似乎很近或很远,他们所揭示的都和隐藏的一样多。当看到右翼势力对本国的教育、健康照顾、福利及移民等进行攻击时,我们更加确信,进步的行动者和研究者们需要认真地去审视——而非用浪漫的形式去掩盖——工作中的一些难点问题。将糟糕的故事模糊化不会糊弄到任何人。事实上,"使糟糕的故事"窒息只会阻碍我们真正希望讲述的压迫故事。发达的资本主义、种族性的社会关系、激烈的性别关系以及同一性的社区生活等,对于所有生活其中的人来说,已经产生了许多(不公正分配)破坏性后果,这也不是什么秘密了。在缺乏正义与公平的环境里,人们会进行那些被认定为非法、不合伦理或不道德的活动,这是社会不公正的表现——没有理由去责难受害者。问题层出不穷,尽管其出现的可能性众所周知。如何将生存、破坏,以及压迫性的社会/经济关系融合在一起迫切需要我们去解释。而怎样鼓舞和激励为"未来之幸福"而进行的社会运动亦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因此,实际上当讲述许多种类的故事时,我们也会犯错误。这些故事总是与历史、更大的社会结构、社会力量等连接在一起,它们无须被美化也不应标其为病态,而应重新考察过去的状况,重新构想在穷人和工人阶级社区中未来的情形,以及用批判的思维重新审视优势人群的生活、关系及其社区。

关于反思

第二个指示乃是我们要求那些初级或有经验的研究者们,或者所有介于两者之间的人,当他们跨越社会分析的不同阶段时,应当给他们自己提出一系列问题。我们把这些问题列在下面,它们并无特别的顺序,亦很少有明确的答案。在我们只是忙于书写这个世界却并没有(必要)准备去听的时候,我们坚信它们应当被提出来。

1. 我是否将个体的"声音"和"故事"与它们位于其中的历史、结构、经济关系连接起来?在此我们所指的并非一种线性的适合,亦非简单的决定性过程,而仅仅要意识到人们的表述与围绕着他们的结构和意识形态存在关系。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访谈者本人从来不去谈到它。理论工作便是明晰这些关系,发掘出定性叙述或者李克特(Likert)量表中的定量会如何被

嵌入历史体系和物质条件中。

2. 我是否运用了多元化的方法，以能建构许多不同类别的分析？在《未知的城市》一书中，我们发现对个体和特定群体的访谈产生出许多不同类别的叙述——它们都不比对方更真实，但是它们是不同的，尤其当个体对未来，以及他们对在其中的位置所表达的乐观主义或悲观主义时。我们逐渐理解到对回答为何及有怎样的不同形式进行理论化是很重要的，我们并非去寻求简单的一致性，或者轻易便得出结论说存在着一种冲突，或者一种叙述比另一种更真实。相反，我们要努力在可能非常不同的回答之间建立一种理论的关系，同时理解到"三角测量方法"的问题并非如此简单。事实上，不同的人的确经常看起来是同样的，然而又有区别的。同样的人则可以做同样的事情。我们不能将这些看作"冲突"的、无用的资料，因为这些资料可能导致我们忽略了个体和共同体生活的重要内容。

3. 我是否描述了普通的生活？如我前文所述，我们要抵制撰写记录时的那种诱惑，即渴望寻求一些奇怪的或者极端性的资料。编码的过程往往会出现这样的情形。我们多数的记录所展示的不过是最普通的生活的枯燥细节，包括与朋友、亲属、邻居、孩子及电视等的日常交往和互动。尽管这些描绘很少具有震撼力，但它构成了穷人生活的大部分，不应该被列入需要删减的部分。

4. 是否一些被访者/选民/参与者与我一道去作评论，并对我的阐述进行解释、表达不满或者挑战？以及我接下来该怎样呈现这些反对/赞同？这并非是要号召移交我们的决断权，而仅仅是希望对话、协商性阐释，以及形成多元解释的文本，将挑战亦融入文稿中。这种情况多发生于对特定群体的参与观察或者个案访谈过程中。

5. 对于被访者表述的理论化工作，我可以有多大的偏离？也即，考虑到法恩和韦斯(Fine & Weis,1996)所称呼的三重表达问题，你是否努力去理解你对那些表述及没有表述的事物/叙述所做的工作？你是否努力向读者去解释作陈述时被访者的地位？你是否努力去重新塑造被访者为求社会正义或非正义而"指责"或者信任的人(一个社会工作者，被访者的母亲或者黑人等)？再次说明，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并非要求所有的研究者都必须回答"是"——而研究者们(包括教授或者研究生)必须向他们自己问这些问题，并且理解为什么一些回答必须是"否"。

6. 我是否考虑到这些数据该怎样被用于进步、保守或压制性的社会政策？数据是否被人们听到？被误读？或者不恰当的理解？对于可能产生的滥用，是否需要增加一个警示标签？

7. 我可以返回到哪里以隐藏自己的表达以及减弱阐释的责任？也就是，在"他们"的叙述或者"他们的"的参与性阐释之间，你把自己的权威隐藏到哪里？

8. 我担心谁将看到这些分析？通过这些分析，谁被认为应受攻击的/负

责任或者被曝光？我要在发表以前将他/她/他们展示在文本中吗？如果不，为什么呢？我可以将他/她/他们的评论作为结束语来展现吗？我的担心是什么？

9. 对于表达出来的事物，我有什么样的期盼？从你个人的经历中，提出来什么样的问题？你是否高估或者低估了它们？

10. 在何种程度上，我的分析可以对"常识"或主导性话语提供一种替代选择？不同的读者对于呈现的分析会提出什么样的挑战？

以上任何问题都并非为了限制学术资格或坚持有一种回答它们的"正确方向"。相反，这些问题通过协助我们意识到对书写的可能影响来扩展我们的研究，包括：不同读者的推动力、幻想、预测以及可能的反应，同时还有我们所承担的责任，由此期望一种文本及其所等待/面临的"常识"之间的关系。通过问这些问题，我们也提出许多研究主题，迫使我们去处理研究中的一些困境。在此我们又一次重复：并非所有的人都要以同样的方式来回答这些问题。但我们应该清楚为什么要用某种方式来作答。

一些警示

在反思之后，我们认为特别是对那些书写有关贫穷的微观政治之结构关系问题的作者来说，应当撰写并发表一个题为"警示的神话：通向对于分析的误读、不恰当理解、滥用之路"的文章。也即，可以想象这样的一种神话，它试图警示读者们怎样不以某种方式读我们的研究——比如，不要用福利欺诈的故事作为例子，以削减支付或重建一个福利监督系统；不要因为对穷人社区的恐惧的探讨而去激发建立更多监狱的支持；不要以穷人社区在公立学校所表达的愤怒作为一种理由，去集会要求保证服务于少数相对优势地位者的政策。我们推荐使用许多这样的警示标签，但同时也预料到当没有这些警示时，分析被误读的可能性会比运用到我们赞同的结果之可能性要高。

在多元的题材下教育学生

我们用最为恳切的伦理指示作为这一章的结束：即我们有伦理责任从学术界那种普遍性的公正立场中退出，教育我们的学生通过对"书写故事"的自我反思，在某时或同时用多元的题材去分析、书写和发表他们的研究——包括政策言论、经验主义的表述，以及更可亲近的手册式语言、快件、社区小册子等方式。也就是，如果我们诚切希望学生能跨越方法的限制，参与到社区的斗争、将社会(非)正义的境况理论化，我们就必须意识到发生在不同地方为了社会变迁的反抗和运动——法庭、立法办公室、媒体、社区基础的组织、教会群体以及学术界等——也由此透过了不同的文本来表达。

我们也充分地意识到对于非终身任期的教员来说，用我们所建议的方式为读者书写可能造成的结果。任职评审委员会以及与之相连的外部评审者，他们也许不会将传统研究(包括定性分析)以外的书写方式作为个人可以得到任职或

提升为教授的成果计算在内。对于初级的教员来说，在传统的研究共同体中建立信任是很重要的。然而，当一个人为学术性读者而书写时，他/她也有可能同时选择以多种方式去这样做。我们并非强迫研究生和初级教员放弃学术性期刊、专著等书写方式，只为了广泛意义上的读者。目前，尽管学术界正处于变迁之中，但这种变动是缓慢的，同时阻力亦相当之大。

将这种警示保持在心中，把作为研究者责任的反思也体现在我们所有的文本里。如果没有那样的反思，而以中立或研究者的公正为名，那么我们就会丧失对社会的责任，学术界亦会在道德权威日渐破产的时代里，停留在另一种没有灵魂的制度中。



Anzaldúa, G. (1981). Speaking in tongues: A letter to Third World women writers. In C. Moraga & G. Anzaldúa (Eds.), *This bridge called my back: Writings by radical women of color* (pp. 165-173). New York: Kitchen Table/Women of Color Press.

Austin, R. (1992). "The black community," its lawbreakers, and a politics of identification. *Southern California Law Review*, 65, 1769-1817.

Behar, R. (1993). *Translated woman: Crossing the border with Esperanza's story.* Boston: Beacon.

Bhavnani, K. K. (1993). Tracing the contours: Feminist research and feminist objectivity. *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 16, 95-104.

Billig, M. (1994). Repopulating the depopulated pages of social psychology. *Theory and Psychology*, 4, 307-335.

Borland, K. (1991). That's not what I said: Interpretive conflict in moral narrative research. In S. B. Gluck & D. Patai (Eds.), *Women's words: The feminist practice of oral history* (pp. 63-76). New York: Routledge.

Brewer, J., & Hunter, A. (1989). *Multimethod research: A synthesis of styles.* Newbury Park, CA: Sage.

Clifford, J. (1986). On ethnographic allegory. In J. Clifford & G. E. Marcus (Eds.), *Writing cultur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 (pp. 98-121).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Clough, P. T. (1992). *The end (s) of ethnography: From realism to social criticism.* Newbury Park, CA: Sage.

Crenshaw, K. (1995). Mapping the margins: Intersectionality, identity politics, and violence against women of color. In K. Crenshaw, N. Gotanda, G. Peller, & K. Thomas (Eds.), *Critical race theory: The key writings that formed the movement* (pp. 357-383). New York: New Press.

Cross, W. E., Jr. (1991). *Shades of black: Diversity in African-American identity.*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Denzin, N. K. (1989a). *Interpretive interactionism.* Newbury Park, CA: Sage.

Denzin, N. K. (1989b). *The research act: A theoretical introduction to sociological methods* (3rd ed.).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Denzin, N. K., & Lincoln, Y. S. (1994). Introduction: Entering the field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N. K. Denzin & Y. S. Lincoln (Eds.),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pp. 1-17). Thousand Oaks, CA: Sage.

Dyson, M. E. (1993). *Reflecting black: African-American cultural criticis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Edin, K., & Lein, L. (1997). *Making ends meet: How single mothers survive welfare and low-wage work.*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Fielding, N. G., & Fielding, J. L. (1986). *Linking data*. Beverly Hills, CA: Sage.

Fine, M. (1994). Working the hyphens: Reinventing self and other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N. R. Denzin & Y. S. Lincoln (Eds.),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pp. 70-82). Thousand Oaks, CA: Sage.

Fine, M., Powell, L. C., Weis, L., & Wong, L. M. (Eds.). (1997). *Off white: Readings on race, power, and society*. New York: Routledge.

Fine, M., & Weis, L. (1996). Writing the "wrongs" of fieldwork: Confronting our own research/writing dilemmas in urban ethnographies. *Qualitative Inquiry*, 2, 251-274.

Fine, M., & Weis, L. (1998). *The unknown city: The lives of poor and working-class young adults*. Boston: Beacon.

Flick, U. (1992). Triangulation revisited: Strategy of validation or alternative? *Journal for the Theory of Social Behaviour*, 22, 175-198.

Gates, H. L., Jr. (Ed.). (1985). *"Race," writing, and differen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Gittell, M. J. (1990). Women on foundation boards: The illusion of change. *Women and Foundations/Corporate Philanthropy*, 1, 1-2.

Gittell, M. J. (1994). School reform in New York and Chicago: Revisiting the ecology of local games. *Urban Affairs Quarterly*, 30, 136-151.

Hall, S. (1981). Moving right. *Socialist Review*, 55, 113-137.

Hall, S. (1997). Subjects in history: Making diasporic identities. In W. Lubiano (Ed.), *The house that race built: Black Americans, U.S. terrain* (pp. 289-299). New York: Pantheon.

Haraway, D. J. (1991). *Simians, cyborgs, and women: 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 New York: Routledge.

hooks, b. (1990). *Yearning: Race, gender, and cultural politics*. Boston: South End Press.

Hurtado, A., & Stewart, A. J. (1997). 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 Implications of studying whiteness for feminist methods. In M. Fine, L. C. Powell, L. Weis, & L. M. Wong (Eds.), *Off white: Readings on race, power and society* (pp. 297-311). New York: Routledge.

Katz, M. (1995). *Improving poor peopl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Kelly, R. D. G. (1997). *Yo' mama's disfunktional! Fighting the culture wars in urban black America*. Boston: Beacon.

Ladner, J. A. (1971). *Tomorrow's tomorrow: The black woman*.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Lal, J. (1996). Situating locations. In D. L. Wolf (Ed.), *Feminist dilemmas in fieldwork* (pp. 185-214). Boulder, CO: Westview.

Lather, P. (1991). *Getting smart: Feminist research and pedagogy with/in the postmodern*. New York: Routledge.

Lawrence, C. R., III. (1995). The word and the river: Pedagogy as scholarship as struggle. In K. Crenshaw, N. Gotanda, G. Peller, & K. Thomas (Eds.), *Critical race theory: The key writings that formed the movement* (pp. 336-351). New York: New Press.

Lykes, M. B. (1989). Dialogue with Guatemalan Indian women: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constructing collaborative research. In R. K. Unger (Ed.), *Representations: Social constructions of gender* (pp. 167-184). Amityville, NY: Baywood.

Lykes, M. B. (1994). Speaking against the silence: One Maya woman's exile and return. In C. E. Franz & A. J. Stewart (Eds.), *Women creating lives: Identities, resilience, and resistance* (pp. 97-114). Boulder, CO: Westview.

Madigan, R., Johnson, S. & Linton, P. (1995). The language of psychology: APA style as epistemology. *American Psychologist*, 50, 428-436.

Matsuda, M. (1995). Looking to the bottom: Critical legal studies and reparations. In K. Crenshaw, N. Gotanda, G. Peller, & K. Thomas (Eds.), *Critical race theory: The key writings that formed the movement* (pp. 63-79). New York: New Press.

McCarthy, C., Rodriguez, A., Meecham, S., David, S., Wilson-Brown, C., Godina, H., Supryia, K. E., & Buendia, E. (1997). Race, suburban resentment, and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inner city in contemporary film and television. In M. Fine, L. C. Powell, L. Weis, & L. M. Wong (Eds.), *Off white: Readings on race, power, and society* (pp. 229-241). New York: Routledge.

Morawski, J. G., & Bayer, B. M. (1995). Stirring trouble and making theory. In H. Landrine (Ed.), *Bringing cultural diversity to feminist psychology: Theory, research, and practice* (pp. 113-137).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Mullings, L. (1984). Minority women, work and health. In W. Chavkin (Ed.), *Double exposure: Women's health hazards on the job and at home* (pp. 84-106).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Murray, C. (1984). *Losing ground: American social policy* 1950-1980. New York: Basic Books.

Okely, J. (1992). Anthropology and autobiography: Participatory experience and embodied knowledge. In J. Okely & H. Callaway(Eds.), *Anthropology and autobiography*(pp. 1-49). London: Routledge.

Omi, M. & Winant, H. (1986). *Racial forma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From the* 1960*s to the* 1980*s*. New York: Routledge.

Opotow, S. (1990). Moral exclusion and injustice: An introduction.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46, 1-20.

Piven, E F., & Cloward, R. A. (1971). *Regulating the poor: The functions of public welfare*. New York: Pantheon.

Powell, L. (1994). Interpreting social defenses: Family group in an urban setting. In M. Fine (Ed.), *Chartering urban school reform: Reflections on public high schools in the midst of change* (pp. 112-121).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Press.

Richardson, L. (1995). Writing-stories: Coauthoring "The sea monster," a writingstory. *Qualitative Inquiry*, 1, 189-203.

Roman, L. (1993). Double exposure: The politics of feminist materialist ethnography. *Educational Theory*, 43, 279-308.

Roman, L. (1997). Denying (white) racial privilege: Redemption discourses and the uses of fantasy. In M. Fine, L. C. Powell, L. Weis, & L. M. Wong (Eds.), *Off white: Readings on race, power and society* (pp. 270-282). New York: Routledge.

Rosaldo, R. (1989). *Culture and truth: The remaking of social analysis*. Boston: Beacon.

Saegert, S. (1997, May). *Schools and the ecology of gender*. Paper presented at the Schools and the Urban Environment Confer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pei.

Scott, D. M. (1997). *Contempt and pity: Social policy and the image of the damaged black psyche* 1880-1996.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Scott, J. W. (1992). Experience. In J. Butler & J. W. Scott (Eds.), *Feminists theorize the political* (pp. 22-40). New York: Routledge.

Sedgwick, E. K. (1990). *Epistemology of the close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Stacey, J. (1991). Can there be a feminist ethnography? In S. B. Gluck & D. Patai (Eds.), *Women's words: The feminist practice of oral history* (pp. 111-119). New York: Routledge.

Suls, J. M., & Rosnow, R. L. (1988). Concerns about artifacts in psychological experiments. In J. G. Morawski (Ed.), *The rise of experimentation in American psychology* (pp. 163-187).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Weis, L., & Fine, M. (1996). Narrating the 1980s and 1990s: Voices of poor and working class white and African American men. *Anthropology and Education*, 27, 1-24.

Weis, L., & Fine, M. (Eds.). (in press). *Speedbumps: A student-friendly guide to qualitative work*.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Press.

Weis, L., Marusza, J., & Fine, M. (1998). Out of the cupboard: Kids, domestic violence and school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of Education*, 19, 53-73.

Weis, L., Proweller, A., & Centrie, C. (1997). Re-examining "A moment in history": Loss of privilege inside white working-class masculinity in the 1990's. In M. Fine, L. C. Powell, L. Weis, & L. M. Wong (Eds.), *Off white: Readings on race, power and society* (pp. 210-226). New York: Routledge.

West, C. (1993). *Race matters.* Boston: Beacon.

Williams, P. J. (1997). *Seeing a color-blind future: The paradox of race.* New York: Farrar, Straus & Giroux.

定性研究中的伦理与政治 5

ETHICS AND POLITICS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 克里福德·G·克里斯琴斯

以一种极端的二分法为基础，使得启蒙思想形成了一个派别。思想史学家通常把这种分化总结为主观与客观、事实与价值或物质与精神的二元论。这三对范畴都是对传承于伽里略（Galileo）、笛卡尔（Descartes）和牛顿（Newton）关于宇宙论的合理解释，但却没有一个能揭示出启蒙思想的核心所在。启蒙思想的最深根源是一种普遍的自治意识，它推崇个性，宣扬人的我行我素，把人们从各种要求忠诚的信仰中解放出来。在自豪地意识到人的自治的同时，18 世纪的思想家还把自然界看作一个具有无限可能性的竞技场，在这个竞技场中，人类掌握着自然规律，并由此体现出人的个性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从自然界中的解放使得大量自认为独立于任何权威的自治个体产生，发轫于文艺复兴，成熟于启蒙运动时期的自由思想是最重要的推动力量①。

显然，人可以从主观与客观的二元论来理解自治。在启蒙世界观的建构中，自然科学的影响力在人们的解放中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数学、物理和天文学方面的成就使人类得以支配自然，而在此之前一直是自然支配着人类。通过理性以一种十分明显的方式在自然和人类中应用，科学明白无误地证明了人们的生活会越来越幸福。而诸如犯罪和卫生状况恶劣的问题，也不再需要压制性的神学解释，而被认为可以得到世俗的经验解答。

同样，根据客观事实与主观价值相分离的激进观点来提出问题，人们也可以理解自治的自我。通过把“是什么”（What is）和“应该是什么”（What ought to be）的知识分离开来，启蒙运动把价值问题置于边缘地位。并且启蒙运动中所有形式的唯物主义都把理性与信仰、知识与信念相分离。就像 300 年前罗伯特·胡克（Robert Hooke）帮助建立伦敦皇家学会（London's Royal Society）时所坚持的那样：“该学会将回避任何有关宗教、修辞、道德和政治的讨论。”那些隐含在应该、限制和命令中的人的旨趣部分仅仅是不再显现，而事实上仍然对启蒙思想起着一种束缚作用。当然，那些认为启蒙思想把事实和价值相分离的人已经认识

---

① 就该问题更为详细的讨论，参见：Christians et al.，1993，pp. 18-32，41-44。

到了这一重要难题。同样,精神领域会很容易陷入神秘与直觉之中。如果精神世界中没有什么约束力量的话,它将会听任于神学家的投机,而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接受了启蒙运动的信念,认为他们所追求的东西是不长久的。

然而启蒙运动的自治信条却产生了极大的危害。个人的自主性居于中心地位,这样带给我们一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即如何把人的自由与道德秩序加以整合。而在努力解决这一谜一样的复杂关系的过程中,启蒙运动拒绝牺牲个人自由。即使在18世纪当这一问题具有特殊的紧迫性时,它所抱的态度也不是解决问题,而是对自治的无条件坚持。鉴于这一时期君主专制的政体和压制性的基督教体系,启蒙运动在这一问题上对自由的顽固立场是可以理解的。启蒙运动始终都坚持这样的假设,即应该把人的自由与道德秩序相分离,二者永远不可能有意义地结合在一起。

让—雅各·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是这种极端自由的最坦率的倡导者。他认为理性的实质是人们对自己个性的自由和自主,这是理性最有价值的方面。卢梭是一个复杂的人物,他拒绝同时接受笛卡尔的理性主义、牛顿的机械宇宙论及洛克的利己主义,而且还不仅仅满足于把自由分离出来并神圣化,至少在他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Discourse on Inquality*)或《社会契约论》(*Social Contract*)[在该书中他辩驳了霍布斯(Hobbes)]中是这样。

卢梭代表了启蒙运动中反对理性主义的浪漫主义流派。由于倡导内在的、自发的而不是先验的、假定的价值观,一直到19世纪他都有广泛的追随者。虽然他承认人是有局限性的,但是却推进了一种非凡的自由思想——不仅与上帝或教会相脱离,而且从文化或任何权威中解放出来。自治成为人类的核心与宇宙的中心。卢梭对平等、社会系统、价值论和语言的理解都是基于这种观点,比起那些满足于一种贬值的、消极的自由的人,他更敏锐地认识到了这些因果关系。然而他发现唯一能够忍受的解决方法是人的一种高贵品质,即善意地享受自由,并因此可以设想,在某种模糊的意义上,人和某种道德秩序和谐共存。

价值无涉的实验主义

通常,关于社会科学特点的讨论是围绕着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论展开的。然而,我们在这儿讨论的并不是它们如何模仿自然科学,而是它们如何成为启蒙运动中主流世界观的组成部分。在政治理论中,自由国家在17和18世纪的欧洲出现的时候,就赋予了公民按自己的方式生活的自由,他们不必遵从于教会或封建秩序。心理学、社会学和经济学这些在18和19世纪为人所知的关于人或道德的科学,被认为是开启心智和解放想象力的"文科"(liberal arts)。在社会科学和自由国家在历史上出现并同时存在的时候,欧洲的启蒙思想家以倡导经验推理的"事实、技巧与技术"来支持国家与公民(Root,1993,pp.14-15)。

与个人自由高于道德秩序的假设相一致,社会的基本制度被设计为"在不同

的道德观念间确保中立"(Root,1993,p.12),禁止国家强求或鼓励公民认同某种宗教传统、家庭生活方式、仪表或艺术表现方式而压制另一种。鉴于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不再广泛而深入地树立共同的道德观,人们认为偏重道德问题并坚持社会理想的做法是达不到其预期目标的。"对于一个其成员信奉多种宗教,从事多种不同的职业并认同多种不同的习俗和传统的社会来说",价值中立是合乎逻辑的选择(Root,1993,p.11)。主流社会科学的理论与实践反映了自由启蒙哲学的思想,教育、科学和政治同样如此。只有把自治和道德秩序重新整合,才能为今天的社会科学提供一种替代性范式①。

密尔的社会科学哲学

在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看来,"中立对促进自治是必要的……不能强迫一个人做好人,国家也不应该干涉公民的生活方式;对公民来说,自己所做的很差的选择也比被国家强迫所做的很好的选择要好"(Root,1993,pp.12-13)。密尔在《自由论》(*On Liberty*,1859/1978)一书中认为,按照自己的想法和目的来筹划我们的生活是作为自治的个体必须具备的条件。"个性的自由发展是人的幸福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也是个人和社会进步的主要组成部分"。(p.50;Copleston,1996,p.303,注释32)这种建立在至高无上的个人自治基础上的中立,是他的《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1861/1957)和《逻辑系统》(*A System of Logic*,1843/1893)中的根本原则。密尔认为,"功利原则要求个人应享有充分的自由,除非这种自由会伤害别人"(Copleston,1996,p.54)。除了使经典功利主义获得最大的发展以及和洛克一起建立了自由国家理论外,对于作为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归纳式研究的基本原则,密尔还描绘出了大致的框架。按照经验主义的原则,他把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的归纳方法作为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论加以完善,来代替亚里士多德的演绎逻辑。

按照密尔的观点,三段论对人类知识没有贡献什么新的东西。如果我们推论:由于"所有的人都会死",韦灵顿(Wellington)爵士属于人类,所以他会死,那么这一结论对前提没有任何发展(参见Mill,1843/1893,Ⅱ,3,2,p.140)。关键性的问题不是重新组织概念世界,而是把迷信与真正的知识区分开来。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概括和综合对于从已知的东西归纳出未知的东西是必不可少的。密尔试图建立这种逻辑的函数,把它作为从已知的推理,而不是对推理中形式一致性规则的验证(Mill,1843/1893,Ⅲ)。当命题是从经验中推断而来,我们所有的知识素材全都由经验提供,并严格遵循归纳的方法时,我们就可以接近科学的

---

① 鲁特(Root,1993)是社会科学哲学家中唯一一个把社会科学与自由国家的理想与实践联系起来的人,联系的基础是这两种制度都"试图在不同的道德观念间保持中立"(p.xv)。就像他所详细阐述的那样:"虽然自由主义主要是一种国家理论,但其原则可应用于任何一种社会基本制度上;因为人们可以说,诊所、公司、学术协会或职业的作用并不是对一个人应该追求的生活类型提出要求甚至建议。中立可以作为这些制度运作的一种理想,就像它对国家所能起的作用一样。人们可以说,它们的作用应该是为学生、病人、委托人、顾客或会员所追求的任何类型的生活提供便利,而不是鼓励某种生活类型,同时压制另一种。"(p.13)鲁特对密尔和韦伯的解释对我自己的阐述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必然性了①。他为物理学建立了四个实验研究的模式:一致、不一致、残余和伴生变异原则(Mill,1843/1893,Ⅲ,8,pp.278-288),并认为只要假定了自然是由同一性建构起来的唯实论立场,那就只有它们才可能是实验验证的方法②。

在《逻辑系统》第六卷的"关于道德科学的逻辑"中,密尔(Mill,1843/1893)把归纳法的经验主义作为研究"构成社会生活的各种现象"的科学方法加以发展(Ⅵ,6,1,p.606)。虽然他认为社会科学是按照因果律来解释人类行为的科学,但他还提醒人们要反对充满预言的宿命论观点,"社会规律是假设的和建立在统计基础上的概括,它们在本质上承认有例外情况"(Copleston,1966,p.101;Mill,1843/1893,Ⅵ,5,1,p.596)。被经验证实有用的有关人的行为的知识,对群体比对个体有更强的预测力。

密尔的实证主义很明显地贯穿于他的经验研究中③。在孔德的基础上,他把事实定义为"感知的永久可能性(permanent possibility of sensation)"(Mill,1965b,p.198),并相信任何别的东西都不能用来表达形而上学的实体④。与休莫(Hume)和孔德一起,密尔坚持认为形而上学的实体是不真实的,只有感知现象的事实存在,在感知背后没有本质或终极的现实(reality),因此密尔(Mill,1865a,1865b)与孔德主张社会科学家应把精确的数据(data)作为事实的源泉,从中可以得出在经验上有效的规律。对于他们二人来说,这就是产生实际效益的唯一的知识类型(Mill,1865b,p.242)。事实上,社会的救济措施就是根据这种科学知识制定的(p.247)⑤。

与其效果论伦理学一样,密尔的社会科学哲学也是建立在手段与目的的二元论基础上的。在一个自由社会里,公民和政治家负责表达目的,科学负责达到目的的手段。科学不属于道德范畴,它讨论的是手段问题,而不用金钱或权威来支配目的。社会科学中的方法在实质和内容上必须是无偏见的,并受到不确定的行动过程中的风险与利益的严格限制。文科的实践规则"应该是规范式的,但不是道德或政治规范,其指向应是反对坏的科学,而不是坏的行为"(Root,1993,p.129);对研究不能用对或错,而只能用真或假来评价;"科学只有在应用的时候

---

① 虽然密尔在描述归纳的准则和方法中遵循他所称的"道德科学的逻辑",在关于自然的同一性和假设所有现象都服从因果关系律方面他持有与自然科学相同的信条。他的五个归纳原则反映了牛顿的宇宙论。

② 密尔的功利主义基本上是几种学说的混合物,这几种学说是本瑟姆(Bentham)的最大幸福原则、大卫·休莫的经验哲学与作为一种道德利益的功利概念,以及孔德的无法认识自在之物和知识局限于感知的实证主义信条。在其很有影响的《逻辑系统》一书中,密尔(Mill,1843/1893)的突出特点是把法国的实证主义(由孔德发展)和英国的经验主义结合为一个独立的体系。

③ 实证主义中对这一复杂性的详细阐述——包括它与密尔等人的联系,参见:Lincoln & Guba,1985,pp.19-28。

④ 密尔的现实主义在其《对威廉姆·汉米尔顿爵士哲学的分析》(*Examination of Sir William Hamilton's Philosophy*)(1965b)一书中得到最为显著的发展。在他看来,我们在共同的外部世界中的信仰植根于这一事实,即我们对物质现实的感知中"有关他人或其他有知觉个体的与有关我们自己的一样多"(p.196;Copleston,1966,p.306,注释97)。

⑤ 密尔把他对相反的演绎或历史方法的运用特别归功于孔德:"当我在孔德那里发现它时,它对我还是一种全新的思想;倘没有他,我不会很快(如果曾经有的话)就获得它"。(p.126)在区分社会静力学与社会动力学方面,密尔明显追随了孔德。

才具有政治性”(Root,1993,p.213)。鉴于密尔的民主自由主义的观点,他倡导中立性是出于对“个人或群体自治的关心”(这也是社会科学努力服务的对象)。这种中立性观点应该“把人们看作是有思想、有愿望、积极主动的个体,他们为自己的选择负责”,并根据多数决定原则自由选择自己的道德生活观念(Root,1993,p.19)。

韦伯的价值中立

20世纪的主流社会科学家在主张伦理与社会科学无关时,都一致会引用韦伯写于1904至1917年间的文章。鉴于韦伯在社会学和经济学方法论和理论方面的地位,他对政治判断和科学中立的区分也被视为权威的观点。

韦伯区分了价值无涉与价值关联。他认为在发现问题阶段,“个人的、文化的、道德的或政治的价值观是无法消除的……社会科学家对研究内容的选择……是在价值观的基础上作出的”,他们希望其研究能促进这些价值观的发展(Root,1993,p.33)。但是他坚持认为在研究的实施阶段社会科学应该是价值无涉的,研究结果不能表现出任何的道德或政治判断,教授们在进入演讲大厅时应该把他们的价值观和他们的外套一起挂起来。

“一种对道德漠不关心的态度,”韦伯(Weber,1904/1949b)写道,“和科学的客观性没有关系”(p.60),他的意思从价值无涉/价值关联的区分中可明显地看出来。社会科学要成为有目的的和理性的科学,必须满足“价值关联”的要求。

> 社会科学中对问题的选择是由所研究现象的价值关联性决定的……“价值关联”一词指的只是对特殊的科学旨趣的哲学解释,这种旨趣决定了对经验分析中某一特定主题和问题的选择(Weber,1917/1949a,pp.21-22)。
>
> 社会科学中促进科学问题形成的因素事实上总是由实践性“问题”提供的。因此,个人对某一科学问题的认识是与其特定取向的动机和价值观相一致的……
>
> 没有研究者的评价意识,就不会有主题的选择原则及有关具体现实的有意义知识。没有研究者对特定文化事实意义的确认,任何分析具体现实的努力都绝对是毫无意义的(Weber,1904/1949b,pp.61,82)。

韦伯(Weber,1904/1949b,p.72)认为,自然科学寻求的是支配所有经验现象的一般规律,而社会科学研究的是那些我们的价值观认为有意义的现实。自然世界本身就表明了应研究的现实,而“伴随我们接近现实的文化价值观”则使得社会世界具有无限的可能性(1904/1949b,p.78)①。然而,即使价值关联原则对社会科学有指导意义,韦伯认为还要有前述的价值无涉原则。自然科学中的主题使价值判断毫无必要,而社会科学家通过有意识的决定可以从其论著和演讲

---

① 迪尔凯姆(Durkheim)对自然与社会世界中因果关系的态度更为明显与直接。在他主张行为的社会学原因高于心理学原因并且不相信动机可以引起行动时,他清楚地认识到社会科学的任务就是发现社会事实与个人行为间的因果联系(参见:Durkheim,1966,pp.44,297-306)。

中排除“合意性与不合意性”(desirability or undesirability)的判断(1904/1949b, p. 52)。“真正有争议的问题是,研究者与教师应无条件地把经验事实与自己的政治评价分离开来这一内在的简单要求。”(Weber,1917/1949a,p. 11)

韦伯对社会科学中价值判断的反对是由实践环境所引发的。如果教授们把自己的专业工作局限于科学知识,普鲁士的大学就更有可能获得学术自由。由于大学的聘用由政府官员控制,教授们只有压抑住自己对政策的约束和批评,官员们才会放弃他们的控制。

在德国的政府和工厂中,由受过良好训练善于解决方法问题的人所占据的职位很少。韦伯认为,促使德国国力提高和经济繁荣的最好办法是训练一个精通方法问题而对目的保持缄默的新的管理阶层。在韦伯看来大学的任务,就是提供这样的训练(Root,1993,p. 41;Weber,1973,p. 4-8)①。

韦伯对价值无涉实用性的讨论以及把它明确局限于研究报告阶段的观点,使得他的价值中立思想对20世纪的社会科学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他不是一个像孔德那样的实证主义者,也不是一个追随密尔的彻底的经验主义者,他反对实证主义者把发现问题与检验过度割裂;而与密尔相比,他没有提出系统的认识论;与密尔的自由政治哲学相比较,他的国家主义是有偏向性的。然而,韦伯的价值中立观点以基本相似的方式反映了启蒙运动的自治思想,在坚持区分价值关联与价值无涉的过程中,他把事实与价值、手段与目的也分割开来。他引证了根植于人类理性的经验验证和逻辑推理:“作为一种规范的实践规则的有效性,与一个经验命题的真理价值在特征上是绝对不同的”(Weber,1904/1949b, p. 52),“在社会科学中,人们可能不会圆满得到一个完全正确的科学证据”,但那很可能是“由于错误的资料”造成的而不是因为它在概念上是不可能的(1904/1949b,p. 58)②。韦伯与密尔一样,认为经验科学解决的是手段问题,他对于灌输政治和道德价值观的反对与告诫,预设了手段与目的的二元对立(Weber,1917/1949a,pp. 18-19;1904/1949b,p. 52)。

就像迈克尔·鲁特(Root,1993)所总结的那样,“密尔倡导社会科学的中立是基于他的一种信念”,即科学语言是“用来认识现象和努力发现其规律的”。韦伯同样认为“理所当然地,可以有一种科学语言——一种真理的集合——它排除对行为的各种价值判断、规则或指导”(p. 205)。在他们二人看来,道德中立的科学知识是独立存在的。对于二人来说,“由于价值问题无法得到理性的解决”,所以需要中立性,而且他们假设社会科学中的中立有助于“政治的和个人的自治”

① 作为韦伯曾抵制过的滥用的一个例子,鲁特(Root,1993,pp. 41-42)提到了柏林大学授予路德维格·伯恩哈德(Ludwg Bernhard)经济学教授一事。虽然伯恩哈德没有大学教师证书,教育部还是在没有经全体教师投票的情况下给予了他这个职位(参见:Weber,1973,pp. 4-30)。用希尔斯(Shils,1949)的话来说,“他所关注的大量特殊的、具体的事情成为(他的1917年)文章的基础——他深入到经济学理论假设的不懈努力,他对于学术自由的伦理激情,他坚定热情的国家主义政治信仰,以及他对于知识分子诚实的不断要求”(p. v)。

② 1923年成立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SSRC)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在它努力把学术专家的意见与政策研究联系起来,以及它对精确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偏爱方面,SSRC反映并补充了韦伯的思想。

(p.229)。韦伯所主张的社会科学中的价值关联,与在不同的道德观念间保持科学中立这一更大的启蒙理想并不矛盾。

功利主义伦理观

除了它的现世(this-worldly)人文主义,功利主义的吸引力就在于它与科学思想的相容性,它符合启蒙运动的理性文化所培育的理性计算原则。

> 按照功利主义的观点,人们用强有力的证据使某种伦理观点合法化,他们计算某一或另一行为给人类带来多少幸福,并选择在整体上具有最大利益的那一种。什么是人类幸福这一问题被认为在概念上是不成其为问题的,是一个在科学上可以建立的事实领域。人可以抛开所有的形而上学或神学的影响,它们使伦理问题成为在科学上无法确定的问题(Taylor,1982,p.129)。

功利主义伦理观以实际经验数量的计算取代了形而上学的显赫地位。它遵循的程序要求是如果"每个人的幸福算作1的话……那么正确的行动方针应是满足所有人或最大多数人的愿望"(Taylor,1982,p.131)。自治理性是道德争议的仲裁者。

把道德推理与人类幸福的计算结果等同,功利主义假设有"一个独立的、坚实的道德领域和一组决定我们在道德上应做什么的因素"。这种"对道德的认识论上的化约与同质化"把赞美与鄙视的定性语言(如正直、健康、自由、犯罪、不诚实、放纵)边缘化了(Taylor,1982,pp.132-133)。功利主义者认为,这些语言所指的主观要素"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它们表现的是我们的感觉方面而不是事物的存在方面"(Taylor,1982,p.141)。这种片面的理论不仅要求我们把全体的幸福最大化,还要考虑与它相冲突的其他不相关的道德要求,如平等分配。这种"不喜欢对比性语言","在认识论上过于追求细节的价值中立的社会科学属于一种单因素模型"。然而,功利主义吸引人的是它"借助……理性选择理论为政策的精确计算提供了可能性"(Taylor,1982,p.143)。"它把所有的道德问题描绘成相互分离的主要依靠技术解决的问题"(Euben,1981,p.117)。但对它的批评者来说,这种精确性忽略了不能被计算的东西,是一种"虚假的有效性"(Taylor,1982,p.143)①。

在手段与目的的二元论假设下,功利主义理论中的道德领域是外在的,所有值得评价的东西就是它们的结果所产生的影响。把证据建立在初次印象基础上

---

① 在目前的职业伦理学中,我们通常把效果论与彻底的功利主义区别开来。我们对幸福最大化的观点已不抱希望,但"仍然试图仅根据效果来对各种行为过程进行评价,希望在我们的效果描述中说明每一件值得考虑的事项"。然而,用泰勒(Taylor)的话来说,即使这种宽泛的功利主义观点"仍然是从存在角度来对某些利益加以规定的"。道德的定义同样是限制性的,这种定义偏爱推理计算模式,阻碍我们认真考虑道德的所有方面并进行合乎规范的政治思考(Taylor,1982,p.144)。就像林肯所说的,功利主义无法回避的问题是"倡导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而小的人类群体(如所有的少数民族群体)则身处'多数人专制'的政治制度中"。她正确地提出"自由主义的趋势是用功利主义的原则对压迫重新加以思考"(Yvonna Lincoln,个人交流,1999年2月16日)。

的责任确实是不可想象的。"我的言行"中对某人很重要的东西的真正表现程度并不重要。效果论者的伦理和政治观从存在的角度来规定对内在东西的评价(Taylor,1982,p. 144)。伦理观的外化被看作是对经验程序的价值中立性的保证①。

伦理准则

在价值中立的社会科学中,道德原则的常规形式是专业和学术协会的伦理准则。到了20世纪80年代,各个大型学术协会都确立了自己的准则,其中有四个准则是大家共同强调的,它们对运用归纳法的科学(这种科学以指向大多数人目的的手段为研究内容)起着指导作用。

1. **知情同意**(informed consent)。与其对个人自治的信奉相一致,遵循密尔和韦伯传统的社会科学坚持认为,研究主体有权被告知他们所参与的实验的性质和后果。对人的自由的真正尊重一般包括两个必要条件:主体必须是自愿同意参与——也就是说,不受身体或心理上的强制;他们的同意必须建立在全面的、公开的信息基础之上。"纽伦堡法庭条款(the Article of the Nuremberg Tribunal)和赫尔辛基宣言(the Declaration of Helsinki)都声明:必须告知受试者实验的持续时间、方法、可能带来的风险以及目的或目标。"(Soble,1978,p. 40;Veatch,1996)

理性主义伦理观对该原则不言而喻的特征并未提出质疑,然而在对它的有目的的应用方面却不断产生争议。就像庞奇(Punch,1994)所说的,"在很多实地调查中,知情同意——完全暴露研究者的身份和研究目的——将会断送掉许多研究项目,这一两难问题看来是无法解决的"(p. 90)。与手段—目的模型中手段的优先性相符合,庞奇对伦理准则应作为实地调查前的一种指导方针,但是不影响充分的参与这一总的结论作了反省。"对准则的严格应用"可能会"限制和束缚"大量"无害的"和"不成问题的"研究(p. 90)。

2. **欺骗**。在强调知情同意的过程中,社会科学的伦理准则还一致反对欺骗,甚至那些对罪犯、小学生、精神病人的合理欺骗的家长式作风的论证也不再是可信的了。自斯坦利·米尔格莱姆(Stanley Milgram)实验以来不断曝光的欺骗事件给予了"禁止有意歪曲"这一道德准则特殊的地位。布卢默(Bulmer,1982)对此持特别强硬的态度,他把该准则总结为:欺骗"在伦理上是不正当的,在实践中是不必要的,对作为一种学术研究的社会学也是毫无益处的"(p. 217;Punch,1994,p. 92)。

该原则的直接应用就是要求研究者在设计各种实验时要避免有意的欺骗。

---

① 鉴于实证主义研究的性质,珍宁斯和卡拉汉(Jennings & Callahan,1983)总结道:只有很少一部分伦理问题被人们考虑到,并且它们"倾向于融入专业科学方法论的原则中。……知识分子的诚实,个人偏见的压制,对资料的仔细搜集与准确报告,以及坦率承认经验研究中科学可靠性的局限——这些基本上是唯一可能出现的问题了。而且,由于对这些伦理责任不是特别地有争议(起码在原则上),毫不奇怪地在这一时期(20世纪60年代)那些关注伦理学的人和社会科学家都没有投入很多的时间去分析或讨论它们"(p. 6)。

但在科学事业之外建构伦理学,该原则是不可能得到切实应用的。如果对知识的探究是必须的而欺骗在道德上又是不能接受的,那么在某些情况下这两条标准就无法同时得到满足。在心理学和医学中,如果不忽略这些欺骗,有些信息是难以获得的。对这一两难问题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在具有明确的实用原因时,允许少量的欺骗行为存在。反对欺骗的行为准则事实上要做这样的重新定义:如果"从欺骗性实验中所获取的知识"对社会具有明显的价值,那么"在实验过程中对人们不得不采取的欺骗行为就只是一个小小的缺陷"(Soble,1978,p. 40)。

3. **隐私与隐秘性**。伦理准则坚持要求对人们的身份和研究地点提供防护措施。为防止不必要的暴露,作为基本保护措施的隐秘性必须得以保证。所有的个人资料应保密,并仅在匿名的情况下公开。行业规范一致认为,没有人应承担由不适当的研究实践而导致的伤害和尴尬后果。"社会科学研究中可能性最大的一个伤害来源是"个人隐私的暴露,研究对象认为这是对自己的损害(Reiss,1979,p. 73;Punch,1994,p. 93)。

由于启蒙运动的自治思想在哲学人类学中的发展,神圣的内在的自我成为建构独一无二的人格的基本要素。在洛克那里,这一私人领域已经获得了无可争议的地位,民主生活就是在这些独立的个体之外组织起来的,是一个有谈判的契约和有疑问的交流构成的次级领域。在社会科学研究的逻辑中,以人们铭刻在心的自治思想为中心,对脆弱而又特殊的个人隐私的侵犯行为是令人无法容忍的。

尽管签名对保护隐私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无懈可击的隐秘性已被证明是不可能的。假名和假地址经常被内部人识破;有的在研究者看来无危险的事情却被参与者认为是对他们的误导甚至背叛;在书本上看来是中立的东西在实践中经常会引起冲突。在对政府部门、教育机构或卫生组织进行研究时,什么样的隐私内容不应该被暴露?如果有爱寻衅的媒体对研究报道得有些过火,那么谁应该受到谴责?在"对什么是公开的、什么是隐私的没有形成共识或一致"的时候,把保护隐私写入准则是没有意义的(Punch,1994,p. 94)。

4. **精确性**。确保数据的精确性也是社会科学准则中的一条主要原则。伪造和骗取资料、省略和杜撰既是不科学的也是不道德的。在该领域中,在实验和道德方面最有价值的东西(the coin)是具有内在和外在效度的数据。工具主义者认为,价值中立的社会科学、用测量程序所下的定义本身就确立了用来对其进行道德评价的目的。

制度审查委员会

作为资助的条件,各个国家的政府部门都坚持要求凡从事的研究涉及人类受试者的协会都必须建立审查与监督机构。制度审查委员会(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s,IRBs)体现了功利主义对研究范围、假设、研究程序方面的要求。

1978 年,美国成立了保护生物医学与行为研究中的人类受试者的全国委员会,该委员会提出了三条宽泛的伦理原则来作为具体规则建立的基础,这就是发

表在著名的贝尔蒙特报告(*the Belmont Report*)中的尊重个人、仁爱和公正原则,这是为涉及人类受试者的研究制定的道德标准。

> 1. 尊重个人这一准则反复强调受试者自愿参与研究并对实验的程序和可能出现的后果有充分的了解。在更深的层次上,尊重个人合并了两条基本的伦理原则:"第一,个人应被看作独立的个体;第二,不具备完全独立能力的人(未成年人和残疾人)有受到保护的权利"。
>
> 2. 仁爱原则要求研究者要保护受试者的健康。仁爱行为有双重含义,即完全避免伤害和在为获得有重大价值的利益而要冒一定风险时,应尽可能地减小伤害。"在特定的研究项目中,调查者和IRBs成员必须预先考虑到利益的最大化和降低调查研究中可能发生的风险。一般而言在科学研究中大型协会的成员应该认识到知识的进步和医学、心理治疗及社会方面的发展进程中可能带来的长期利益与风险"。
>
> 3. 公正原则坚持对研究的利益和责任都应公平分配。某些群体(如受益者、被收容者或与众不同的少数民族)由于容易支配或其可利用性而被滥用为研究的受试者,就是一种不公正现象。在受公共基金赞助研究"治疗设备和方法时,公正原则要求不能把好处仅提供给那些能支付得起的人"(University of Illinois,1995)。

这些原则反复强调了价值中立经验主义的基本主题——个人自治,利益最大化和风险最小化,以及外在于科学手段的伦理目的。建立于这些主题基础之上的策略性方法反映了与伦理准则相同的指导方针:知情同意、保护隐私和不欺骗。1989年,议会通过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新法案并成立了研究监察委员会,使IRBs的权威性得到提高。此时的重点是放在对资料的杜撰、伪造和歪曲行为的监管上。篡改、捏造和剽窃仍属于美国政府规定的不良行为类型,并又在1996年的新报告中增加了反对未获准许使用机密情报、省略重要资料和蓄意妨碍(即对别人资料的物质性损坏)的内容。

借助IRBs,密尔、孔德和韦伯的思想开始盛行起来。通过推理的方法(这些方法由服务于一个公正政府的价值中立的学术协会所操纵),价值中立的科学可以用伦理标准来加以说明。在概念体系方面,IRBs试图产生收益与成本的最佳比。IRBs表面上是保护符合其草约要求的受试者,然而,倘若社会科学、学术团体和国家的功利性职责是相互联系的(密尔认识到了这种联系并促进了它的发展),那么,IRBs实际上保护的是自己,而不是社会中广大的受试者群体(Vanderpool,1996,第2~6章)。

目前的危机

密尔和孔德都以自己的方式假设:通过发现有关人类生活状况的事实,经验性社会科学可以造福于社会。迪尔凯姆和韦伯都相信,对社会的科学研究可以帮助人们去全力应付"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的发展"(Jennings & Callahan,1983,p.3)。1865年,美国社会科学学会成立,其宗旨在于把"真理的现实要素"与"时

代的重大社会问题"联系起来(Lazarseld & Reitz,1975,p.1)。由于"纽伦堡审判所揭露的事实(它讲述了纳粹分子对集中营犯人所做的'医学实验')和曼哈顿计划中一些杰出科学家所扮演的角色",仁爱的神话被打破了(Punch,1994,p.88)。

随着对塔斯基奇梅毒(Tuskegee Syphilis)研究和威娄布卢克肝炎(Willowbrook Hepatitis)实验所导致的身体损伤事实的揭露,信任危机进一步加重。20世纪60年代,美国军队在一项名叫卡米洛特计划(Project Camelot)的研究中企图用社会科学来测量和预测革命与造反行为,遭到了全世界的强烈反对并被迫取消。米尔格莱姆(Milgram,1974)对不知情受试者的欺骗和汉弗莱斯(Humphreys,1970,1972)先在一个公共厕所,后在同性恋者家中对同性恋者的欺骗性研究,被认为是心理学界滥用研究对象的丑闻。诺姆·考姆斯基(Noam Chomsky)还揭露了社会科学家与越南军事行动的串通行为。

20世纪80和90年代期间对研究伦理的热情关注、来自基层的支持以及伦理准则和IRBs机构的发展,被其拥护者认为具有控制不道德滥用受试者的作用。然而,在有关伦理准则的意义和应用方面的困境、难题和争论并没有减少的同时,对欺诈、剽窃和歪曲行为的指控仍时有发生。倡导者对稀缺的研究经费的争取一般要服从协会的控制,但要充分监督大学和研究机构中大量的社会科学活动是不可能的。

在赞成与反对对一种负责任的社会科学进行管理的理由背后,认识论上的结构性缺陷已经变得非常明显(Jennings,1983,pp.4-7)。社会研究的实证主义哲学对道德的定义坚持中立的观点,但这种世界观已遭到人们的怀疑。把人的自由与道德秩序相对立的启蒙思想模式也已丧失了价值。即使是韦伯的运用对比性语言(而非对立统一体)的较为温和观点,也不能胜任这项任务。修改这些伦理准则使其明确性增强而忠告性降低,并不会产生根本性的作用。要求为大学毕业生开办伦理学讲习班、重新确定IRBs的任务以及强化政府的政策是必要的,但其作用是微不足道的。

在功利主义中,道德思考与经验程序被混同到一个推理证明的单向度模型中,并假定自治的个体能把理解自身及其周围社会世界的机制客观化,他们就会很深刻地认识到手段与目的的密切配合(Taylor,1982,p.133)。伦理学的这种限制性定义说明了某些我们所寻求的东西(如最小伤害),但那些不能进行实用性计算的则被排除在外。

如在决策过程中,"情感与直觉"被降到"次要的地位",对建立在"具体特性"基础上的"关怀伦理"不予关注(Denzin,1997,p.273;Ryan,1995,p.147),权力和意识形态对社会和政治制度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在精心选择的修辞学氛围和独立创造性的幻觉中,手段—目的系统基本上是在独自运行着。

这种狭窄的环境已经不再能够很好地处理我们在研究社会世界时所面临的复杂问题。名声为社会科学家带来地位和声望。在肯尼迪(Kennedy)执政期间,政治学家亨里·基辛格(Henry Kissinger)、丹尼尔·莫伊尼汉(Daniel Moynihan)

在参议院都享有很高的地位。然而,反贫困运动的失败、福利方面的矛盾及城市住房研究的曲折,使得人们对统治着整个道德领域的实用性计算方法的局限性格外关注①。

当然,即使在社会科学学科内部,成功与失败的程度还都有待于商榷。对经验主义主流来说,比令人失望的业绩更让人感到不安和受到威胁的是人们认识到中立性不是多元主义的而是帝国主义的。反思过去的经验,人们越来越认为在假定的价值无涉条件下的无偏见研究实际上需要重新加以考虑。经验主义在方法上要保证相同的测量,而不考虑研究对象会如何建构真实的人生目的。但经验主义并不是一个各种思想汇集的中立场所,而是一种不加批判地假设"自身的优越性,并以这种优越性"把自己的思想强加于别人的"奋斗信条"②。福柯(Foucault,1979,pp. 170-195)更明确地提出:社会科学是一个权力领域,它通过把研究对象标准化为由政治权威设计出来的各种类型来帮助维持社会秩序(Root,1993,第7章)。平等自由主义不是中立的,而是代表了诸多理想中的一种,而且它本身和其他道德是不相容的。

这种假定"道德中立、客观观察可以正确地获知事实"的非情境化、非情景化的模型,忽略了"与性别、性取向、阶层、种族、民族及国籍有关的权力关系的作用",它是有等级的(科学家—研究对象)和偏向于父权制的,"它掩盖了观察者—民族志学者与社会和文化的'统治机构'相牵连、相包容的方面"。科学家"披着"大学学术权威的"外衣"进入"地方社区从事研究"(Denzin,1997,p. 272;Ryan,1995,pp. 144-145)③。在民主社会中对专家意见的质疑得不到支持,虽然这一民主社会原则上是属于公民的,但他们并不享有这种专业知识(Euben,1981,p. 120)。

共产主义女性主义

社会伦理观

在过去的十年中,社会和女性主义伦理观与规范伦理学的个人自治及理性

---

① 就像泰勒(Taylor,1982)所说的,"现代对功利主义的争论不是它是否解释了部分道德动机,而是它是否垄断了对所有事物的解释。""临终关怀"是当代 Calcutta 的一条道德规则,尽管在生命尽头的临终者与(功利主义的)计算毫无关系"(p. 134)。

② 这里重新陈述了人所共知的对有关个人权利的民主自由主义的异议:"自由主义不是所有文化都可能遇到的一个问题,而是某种文化领域的政治表现,并与其他领域很不相容。自由主义不能也不应该声称完全的文化中立,自由主义也是一种斗争信条。就像当今经常争论的那样,多元文化主义同某些文化强加于别的文化之上以及操纵着这种强加行为的假定的优越性有很大的关系。西方自由社会被认为在这方面负有最大的责任,部分由于他们过去的殖民统治,部分由于他们把一部分来自其他文化的人群边缘化了。"(Taylor et al.,1994,pp. 62-63)

③ 在该段中,邓津称赞史密斯(Smith,1987,p. 107)提出了"统治机构"这一概念。

主义假设发生了彻底的决裂(Koehn,1998)。赫勒(Heller,1988,1990,1996)、泰勒(Taylor,1989,1991;Taylor et al.,1994)、佩特曼(Pateman,1985,1988,1989)、魏斯高格罗德(Wyschogrod,1974,1985,1990,1998)和威斯特(West,1989,1991)的社会伦理观,与吉里根(Gilligan,1982,1983;Gilligan, Ward,& Taylor,1988)、诺丁斯(Noddings,1984,1989,1990)、赫尔德(Held,1993)和本纳比(Benhabib,1992)的女性主义伦理观是在根本上重新建构的伦理学理论(Code,1991)。社会伦理观没有寻求所有派别都会求助的中立原则,而是依赖一种复杂的道德评判观点,它在人的关系和社会结构方面吸纳了有机整体、日常经验、道德信念、荣辱感的内容。这是一种哲学的方法,它把道德置于人类生活的总目的中,而这一总目的是人们在相同背景下和跨越文化、种族与历史的界限而共同拥有的。理想上,它将为社会科学研究带来一种新的职业角色和规范核心(White,1995)。

吉里根(Gilligan,1982,1983; Gilligan et al.,1988)把女性道德声音描绘成一种关怀伦理观。这种道德发展观的根本在于把人的关系放在首要位置,用同情和关怀解析人们之间相互矛盾的责任,并彻底反对仅仅避免伤害的标准①。在《关怀》(*Caring*)一书中,诺丁斯(Noddings,1984)彻底抛弃"其原则模棱两可和多变的伦理学"(p.5),坚持人性关怀应该在道德决定中起主导作用。在伍德(Wood,1994)看来,"自我的相互依赖感"形成了关怀伦理观的基础,"在和他人的关系中……协作行动"时,我们从相互依赖的行动中获得了慰藉(pp.108,110)。林达·斯坦纳(Linda Steiner)的女性主义在给感情、亲密关系、养育、平等与协作过程以及移情作用赋予精确性的同时,批判了伦理学中的公正和拘泥于形式的传统。女性主义伦理观的自我意识还鉴别了压迫与失调的微妙形式,并教会我们"质疑谁的利益被认为是值得考虑的"(Steiner,1991,p.158;Steiner,1997)。

在厌恶抽象的计算伦理观的同时,塞格弗里德(Seigfried,1996)还提出要反对吉里根—诺丁斯的思想传统。通过把女性主义和实用主义联系起来,认为性别是由社会建构的,她批驳了"把女性和照顾、养育,男性和公正、独立简单划等号的做法"(p.206)。以性别为基础的道德事实上使一种性别附属于另一性别。在她的社会伦理观中,性别(gender)由生育(engendering)所代替:"成为女性或男性不是用具体例证说明一种不可改变的特征,而是参与一种持续不断的对女性与男性的文化期望的商讨过程。"(p.206)赛格弗里德激励我们去关注社会道德,在这种道德中关怀价值观居于中心地位,但又被置于关系网络的背景中,并以"女性拥有更多的自主权,男性拥有更多的社交"的社会为目标加以建构(p.219)。面对当今的不确定性、大规模谋杀、伦理观念混乱和超现实情况,赫勒和魏斯高格罗德是响应赛格弗里德的挑战,倡导社会伦理观的两个很有前途的人物。

海勒(Heller)是社会研究新学派中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派的哲学教授。她的三部曲围绕着一个她称之为决定性的问题:"好人如何成为可能?"发

① 吉里根的研究方法和结论已在多个领域的学者中引起争议,关于这种争议及相关文章,参见:Brabeck,1990;Card,1991;Tong,1989,pp.161-168,1993,pp.80-157;Wood,1994;Seigfried,1996。

展了社会伦理观的当代理论(1998,p.7)。她不承认由外在于个体的规范、规则和理想构成的伦理学,认为只有在强制和困境条件下的异常职责行为(它们各有自己的方式)才"具有理论上的意义"(1996,p.3)。不断增长的认识、我们自己对行为准则选择的道德意义和他人的不断号召,把爱、幸福、同情和美重新引入一种现代的、非专制主义的但有原则性的道德理论中。

在《圣徒与后现代主义》(*Saints and Postmodernism*)一书中,魏斯高格罗德(Wyschogrod,1990)声称反权威的斗争是合理可行的,但没有假定我们的选择是自愿的。她阐明了一种遵循伊曼纽尔·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传统的关于自我与他人的社会伦理观(Wyschogrod,1974)①:"伦理之存在在于他人对自己伦理立场的公开。"他人"作为道德存在的试金石,不是一个概念的依托物,而是一种活生生的力量"。他人具有"一种批判性的融合"(as a critical solvent)功能,他们的存在起着"引人注目的道德作用"(Wyschogrod,1990,p. xxi)。作为莱斯(Rice)大学哲学与宗教思想教授的魏斯高格罗德致力于对道德的叙述,她认为为他人而活就是神圣的生活,其"主要特点是同情他人而不考虑神圣的代价"。圣徒们把自己的"身体和物质利益交予他人处置。……圣徒们不仅对传统的实践和信仰提出质疑,而且以更微妙的方式对叙事本身的法则提出质疑"(1990,pp. xxii-xxiii)。

除了信仰系统中广泛的他人(他们"在现实中生活、受苦和工作")取向,魏斯高格罗德(Wyschogrod,1990,p.7)还查阅了历史故事以阐明人们是如何对他人的自我表现进行描述的。她主要关注在剧烈变迁和灾难面前社会表现共同体验的方式,并批驳历史学家把自己置身于"与社会的对立关系之中"(1998,p.218)。按照魏斯高格罗德的观点,对伦理学具有颠覆性的挑战是历史学家是如何成为社会的一部分的(社会根据需要——"此时此地的需要"而不是"将来的需要"来创造和维持希望)(1998,p.248),除非这种希望是明确的、可行的,否则它就是用来应付那些被控制者的。仅仅指向未来救赎的希望掩盖了权力的滥用和人类现时的需要。

布伯(Buber,1958)在其著名的诗句("起点即关系"和"关系是生活的摇篮")中把人的关系看作是最重要的概念(pp.69,60,3),社会关系高于一切,"最基本的词汇就是你—我关系"。关系性现实、中介、相互联系、人际关系都是不能化约的现象,如果把它们分解为更简单的要素就会破坏它们原来的含义。鉴于关系的重要性,除非我们自愿帮助别人成功,否则我们就是放弃自己的福利。

这些学者不是去推行一种抽象的理性主义,而是把道德秩序放在极为重要的地位,这种重要性表现在生物和肉体上而不是精神上。"在这方面,伦理……就像天地万物一样古老。做有道德的人是在生命本身召唤下的一种原始运动"

① 伊曼纽尔·列维纳斯(生于1905年)是巴黎大学的哲学教授和巴黎以色列师范学校的校长。用魏斯高格罗德(Wyschogrod,1974)的话说,"他延续了布伯(Martin Buber)和弗兰兹·罗森韦格(Franz Rosenweig)的传统",是"第一个把胡塞尔的思想引进……法国现象学派的人"(pp. vii-viii)。虽然魏斯高格罗德是海德格尔、黑格尔与胡塞尔的学生(参见:Wyschogrod,1985)——并曾与德里达、利罗塔德(Lyotard)、福柯及德勒兹(Deleuze)论战——但是她的伦理研究并不是求助于传统的哲学论述,而是诉诸视觉艺术、文学叙述、编史工作及对死亡标准化的新闻报道中自我与他人交流的具体表达方式。

(Olthuis,1997,p.141)。列维纳斯的伦理观就是一例:

> 人的表情是对他人、一次访问、一次聚会、一句话等事物意义的消极的反映,这不是被胁迫的,而是道义上的责任。我的世界如果和他人断绝了联系,我的满足感就会被打破。我早已是负有道义上的责任的人,这是一种无法逃避的要求,是一种责任,一种作为人质的状态。在我做出任何打算、决定或行动之前,正是通过观察他人的表情来获悉自己的责任的(Olthuis,1997,p.139)。

人是生活在日常生活结构中的社会性的存在物。通过相互交流,多个个体一起创造了生活,并培养起彼此间对生活的道德义务。列维纳斯的伦理观假设并说明了一种激进的关于关系中的社会存在物的本体论观点(Levinas,1981)。

而且,用列维纳斯的话说,当我面对他人时,我不仅看到了血和肉,还看到了第三种东西——人的整体。在对他人需要的反应中,通过人的表情建立起一个基线。在本纳比(Benhabib,1992)看来,这是互动的普遍性①。我们的普遍团结植根于这一原则,即"我们相互间有无法逃避的要求,我们不能抛弃它,除非以我们人类为代价"(Peukert,1981,p.11)。我们相互支持的义务规定了我们的存在,毫无异议地,对所有人来说最神圣的东西就是把道德秩序放在中心位置(Christians,1997a,1998)。

共产主义女性主义模型

共产主义女性主义是邓津(Denzin,1997,pp.274-287)为这一重要转折期起领导作用的伦理理论所贴的标签②,这是一种矫正个人主义者的功利主义的规范模型。它假设在本体论和价值论上社会优先于个人,人的身份是通过社会而形成的。我们出生在一个社会文化世界,在这一世界中,人们通过对话来商讨价值、道德义务和存在意义。在与人隔绝的情况下人们是绝不会获得满足感的,只有通过人们在社会结构中的联系才能使人满足。

---

①　纽斯鲍姆(Nussbaum,1993)用这些术语讨论了美德伦理观,主张一种源自亚里士多德的模型,它可以不脱离社会生活的特殊形式而在不同文化中应用。在她的模型中,所有文化都具有的人类经验的各个领域代表了要回答的问题和要作的选择——对别人的厄运或好运的态度、如何对待陌生人、财产管理、对身体欲望的控制等。我们在这些领域的经验"决定了要进一步研究的主题"(p.247),而我们对每一领域的思考将使我们得到一个与该领域有关的一种美德的"肤浅的或象征性的定义",在这一基础上,我们可以跨文化地讨论每一领域中适当的行为(Nussbaum,1999)。

②　鲁特(Root,1993,第10章)也选择共产主义来取代主流范式。他认为,批判理论、参与研究与女性主义社会科学是共产主义研究方法的三个范例。该章提出了一种在政治哲学与思想史中加以发展的更为复杂的共产主义观点,而不是把它局限于社会理论和实践政治学之中。在哲学共产主义者(philosophical communitarians)(Sandel,1982;Taylor,1989;Walzer,1983,1987)中,卡洛尔·佩特曼(Carole Pateman,1985,1989)是鲜明的女性主义者,她的承诺主题构成了后面概括的多种声音表达原则的中心。该章中的共产主义女性主义模型把批判理论并入了第三个伦理要求——赋权与抵抗。尽管着重点不同,我还是同意鲁特(Root,1993)的结论:"批判理论总是对特定社会的批判,他们力求发展的价值观是该社会的价值观,在这方面,批判理论具有共产主义的特征。……对批判理论家们来说,选择或接受一种社会理论的标准是从该理论所批判的社会成员身上反映出的该理论的反身可接受性。"(pp.233-234)

在共产主义者看来,洛克和密尔的自由主义把个人追求与共同利益混为一谈,道德主体在对事物的价值进行评价时需要以社会义务与社会关系为背景,对于什么东西是好的、值得保留的这一问题,人们无法在与人隔绝的情况下自己作出决定,只有在形成人的身份的特定的社会情境中才能确定。公共领域被看作是由特定的社会团体组成的,多种种族身份与世界观相互贯穿构成一个社会结合体,而且每一种都被真诚地容纳,其地位不分上下。在假设两个层次的二元论时,共产主义并不只是口头上谈论自我的社会性质,它还把个人自治与社会福利联系起来,认为合乎道德的行动指的是具有社会性的行动,共同的道德价值观是一个社会持续存在与保持同一性的内在要求。

因此,社会科学研究的任务就是使社会生活能够成功——使人们相互间能够达成共识,其目标不是令人厌烦的数据本身,而是社会改革。一个得到大家共识的观点是,通过培养我们个人的推理和恰当决策能力,科学研究可以增进社会的利益;研究在设计阶段应是合作性的,在实施阶段是参与性的;伦理准则不是在学者办公室的文件中,研究报告也不是为委托人准备的,参与者本人应有发表意见的机会。与功利主义者的经验主义相比较,针对这些问题的真正的道德观反映的是社会的看法,而不是研究者或赞助机构的专家意见。

在共产主义女性主义模型中,参与者对研究应如何实施有发言权,并对实施过程进行干预,“在决定研究什么样的问题,采用什么样的研究方法,研究结果是否有效或可接受,以及如何应用或贯彻研究结果方面均有发言权或参与权”(Root,1993,p. 245)。这种研究扎根于“参与、共同支配……及友好关系”。鉴于它相互合作的特点,它服务的对象就是“它的研究对象群体,而不是知识生产者和政策制定者群体”(Lincoln,1995,pp. 280,287;Denzin,1997,p. 275)。“人们主宰自身的存在”这一准则体现了它的全部特征(Denzin,1989,p. 81)。

对共产主义女性主义者来说,人类所具有的推理能力使其能够“明确表达由地方社区和群体所熟悉的、具有一定立场的道德规则”,道德推理的发展是由于人们“能够在社会情境中共同理解彼此的观点”。植根于情感体验而非正式共识的相互关怀与理解,是道德推理能力成为可能的基础(Denzin,1997,p. 277;Denzin,1984,p. 145;Reinharz,1993)。

地方社区是多元的道德和社会存在的空间,而“每一个道德行为都是一个偶然的成就”,在对其评价时应依据这样的思想,即一致尊重每个人的人格而不考虑其性别、年龄、种族或宗教(Denzin,1997,p. 274;Benhabib,1992,p. 6)。利用道德秩序我们抵制了那些制造分裂的和排外主义的社会价值观。

解释能力

在共产主义女性主义模型中,社会科学研究的任务就是提供有力的解释。与追求工具性效率的实验主义相比,该范式试图探索多元的社会世界。这种强

调解释力的鲜明观点取代了公认的强调技术、外在和统计精确性的空洞无力的观点。社会科学研究不是为了政治家的需要把社会问题简化为金融和管理问题,而是使人们自己能够与其日常经验达到和谐统一。

解释能力意味着要重视建立在文化复杂性基础上并具有多重解释的生活(Denzin,1989,pp. 81,77)。民族志的记述"应包括深度、细节、情绪性、细微差别和一致性方面的内容,以便读者形成一种批判意识。这样的文本在描写上还应适当避免种族、阶层和性别方面俗套的东西"(Denzin,1997,p. 283;Christians,Ferre & Fackler,1993,pp. 120-122)。

从共产主义女性主义伦理观的视角来看,当论述具备以下三个条件时就可以说它具有真正的解释力,这三个条件是:代表多种声音、增强道德洞察力和推动社会改革。与这里所倡导的以社会为基础的规范相一致,其中心点事实上不是职业伦理观,而是普遍的道德观。

多种声音与跨文化表达

社会和政治团体是建构日常生活的多重空间,自我就置身于这些具有决定意义的性别、种族、阶层和宗教背景中与他人进行对话交流。与契约主义的观点不同,人们不是给予国家默许或义务,而是相互间承诺和守诺。研究叙事反映了守诺行为藉以发生的多种声音。

在佩特曼的共产主义哲学中,对社会政治团体并不是首先从契约方面来理解的。承诺是同意个体"自由建立自己的社会关系"的基本方式之一(Pateman,1989,p. 61;Pateman,1985,pp. 26-29),通过承诺我们承担了一种义务。当人们承诺时,他们就有义务采取相应的行动,但是承诺并不是主要通过政治契约面向权力机关的,而是公民之间的行为。如果义务是来源于诺言,那么人们对单位中的其他同事,对社会实践中的参与者就负有义务,因此,只有在参与性民主的条件下才会有自我承担的道德义务。

佩特曼对道德作用的性质颇有见地:我们首先是在社会关系中了解自己,然后才与行动分离成为思想者的;只有克服传统的思想者与行动者、心灵与肉体、理智与情感的二元论,我们才能把存在视为"个人间的相互关系"(MacMurray,1961a,p. 38);道德承诺产生于行动,并且还要在行动中得到具体化与检验;从对话的视角来看,利用行动与日常语言遵守诺言并不是过高的追求,因为我们的存在方式不是内源性的而是来自社会。

> 利用……我们在与别人的交往中学到的丰富的表达方式,我们成为完全的行动者,能够理解自己,并因此确定自己的身份……
>
> 我对自己身份的发现并不是在与人隔绝的状态下想出来的,而是通过与别人的对话(部分是外在的,部分是内在的)得来的。我自己的身份主要依赖于我与别人的对话关系……
>
> 在现实的文化中,关系被看作是自我发现与自我肯定的关键点(Taylor et al.,1994,pp. 32,34,36)。

如果道德关系是水平方向的并且义务是相互的,就会发生跨文化的肯定与遵守诺言的行为。然而当代多元文化的对抗增加了风险性,使得问题不再那么容易解决。当前民主日程上最迫切和最折磨人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在政治上承认明显的文化群体。“不承认或错误承认都可能导致伤害,可能成为一种压迫的形式,即把某人拘禁于一种错误的、扭曲的和艰难的存在模式中。”(Taylor et al.,1994,p.26)

然而,自由程序主义(proceduralism)不能满足人的这一重要需求。强调平等权利而没有对道德生活的详细的实质性观点,“仅仅是对明显的文化身份的一种非常有限的承认罢了”(Taylor et al.,1994,p.52)。坚持中立而没有集体目标,最多带来有同等意义的个人自由、安全和经济保障。就像邦奇(Bunge,1996)所说的:“契约主义是那些有权有势者,即那些起草契约而不是在契约上签字的人的行为准则。”(p.230)然而,在以诺言为基础的社会结构中,特殊文化、宗教和公民群体的繁荣才是我们真正的目标,作为人类的我们对此负有道德上的义务。在开头我们假设所有的人类文化都有一些重要的东西要表达,带着这一假设,社会科学研究承认与一般的人类尊严相一致的特殊文化价值观(Christians,1997b,p.197-202)。

道德洞察力

社会是制度、实践和结构的体现,并被人在内心里看作是合法的。没有对有秩序的关系网络的忠诚,社会会变得不可想象。社会不仅是语言共同体,而且要求对共同利益起码有一种最低限度的道德义务。由于社会共同体是道德的要求而不仅仅是功能性的安排,道德义务建构了关系中的自我,我们的身份由我们所赞同或反对的东西来确定。按照泰勒的观点,我们只有通过道德的维度才能理解人的活动。正像马尔霍尔和斯韦夫特(Mulhall & Swift,1996)所写的:

> 发展、维持与表达(我们的道德直觉与反应)并不是人类可以轻松地或令人信服地做到的事情……就像我们无法想象上下左右的方位感可以被随意更改的人类生活一样,我们同样无法想象不能在道德领域给人指引方向的人类生活……
>
> ……道德倾向是无法避免的,因为要用参考标准解决的问题本身是无法避免的(pp.106-108;Taylor,1989,pp.27-29)。

自我仅仅在“对话网络”(Webs of interlocution)中存在,而所有的自我解释都或隐或显地“承认它们所有的关于道德及自身的观点都必然来自社会。”就像需要“建立物质空间的方位”一样,道德参考标准是为我们指明社会空间方位的基础(Mulhall & Swift,1996,pp.112-113;Taylor,1989,pp.27-29)。

道德责任是从社会关系的要求中产生出来的,并不是抽象理论的产物。一个社会的共同道德观的核心是预先假设的一致性。然而,“被看作共同道德观的东西不仅是不精确的,而且是可变的……是实践中的一个难题”(Bok,1995,p.99)。道德义务必须用日常生活中易犯错误的、不确定的话语表达,在不一致

和不确定中,我们寻找解决争议和澄清疑惑的标准和知识,而互动型的规范理论可以增进我们共同的道德谈话。但普遍公认的理论对于公共道德的发展并不是必不可少的,公共道德不是"每个参与者全部的道德观……而是持有其他观点的代表人物间的一套协议,是普及范围较小的道德信仰"(Bok,1995,p. 99)。莱因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没有要求比历史根据更多的理论一致性,而是启发我们在坚持"一堆杂乱的非理论的协议"(即这里所说的公共道德)的同时,解决不可避免出现的社会冲突(Barry,1967,pp. 190-191)。利用共同的道德观我们可以对问题逐步达成共识,并在互动中解决争议。用哈贝玛斯(Habermas,1993 p. 66)的话来说,公共领域的讨论必须指向"相互的理解",但允许参与者对最终有效性的宣称有"表态的言论自由"(Habermas,1990)。

共产主义者激发研究者参与到社会的持续不断的道德表达过程中去。事实上,文化的持续存在依赖于对其规范基础的确认和保护,因此,民族志文本必须使我们能够"发现关于我们自身的道德真理";叙事应该通过说明那些对读者很重要的事物"对读者的生活给予道德上的指导"(Denzin,1997,p. 284);共产主义女性主义追求的是形成道德推论(Benhabib,1992,p. 10)。社会由叙事编织在一起,这些叙事促进了社会对善与恶、幸福与惩罚、生与死意义的共同理解。恢复并改变宗教词汇的形式有助于加深我们的人性。

因此,对社会科学研究来说道德任务就不能被简化为职业伦理。首要的问题是道德秩序在社会结构中是如何自我设计出来的,而不是实践者认为什么是有道德的。对那些记述文化的人提出的挑战是:不要把道德视角局限在他们自己的伦理准则中,而是要根据日常生活来理解伦理观与道德观。

抵抗与赋权

共产主义女性主义模式中的伦理观引起了社会批评,导致了抵抗,并赋予互动的自我与他人行动的权力(Habermas,1971,pp. 301-317)。因此,解释性研究的一个基本规范是使得社会生活多种领域(宗教、政治、种族、性别等)中的人文主义改革能够进行。

保罗·弗雷勒(Paulo Freire)从对话的视角谈到了重新构建权力意义的必要性:

> 我认为最重要的、真正的改革,现阶段彻底的社会改革,要求的不是从那些现在拥有权力的人手中夺走权力,或仅仅对社会进行某些改造,或使其发生某些变化。……从我自己的观点来看,问题不在于夺权而在于重新构建权力,也就是去创造一种不同类型的权力,拒绝把权力看作是形而上学的、科层制的、反民主的(引自 Evans,Evans & Kennedy,1987,p. 229)。

当然,研究者需要用审视的眼光来看待压迫性权力集团与垄断(经济的、技术的和政治的)。由于弗雷勒的政治制度倾向,权力是他社会分析中的一个核心观点。然而与他相呼应的共产主义女性主义者的研究拒绝把权力仅仅当作一个认知术语来对待,而把重点放在我们如何能够赋权于人们这一问题上。

对权力的主流观点不是建立在相互性基础上的;它是干涉者的权力,在实施中有对抗,追求的目标是控制。共产主义者则认为,权力是关系性的,其特点是相互性而不是统治性。从这种视角看,权力就是两个主体间的相互作用,是一种关系而不是统治,但这种关系又是亲密的与脆弱的——权力近似于嗜酒者互诫协会中的关系,在协会中对社团的服从使得个人能够获得控制权。在把我们从统治或敌对关系中解脱出来而不是囚禁于其中的解放策略中,对话是关键的要素。虽然权力的控制观不重视相互关系,但赋权模式对我们的人性极为重视并弥补了该方面的不足,在研究过程中对权力不加掩饰,并使其与团结相结合。研究者并不是在对权力玩语义游戏,他们本人是很想越过这一障碍的。就像弗雷勒所强调的,只有在每个人都充分行使他或她自己的政治权利,并把公民的违抗看作是必然的情况下,赋权才会意味着某种变革(Freire,1970b,p. 129)。

在弗雷勒的权力理论中,不容置疑的是被压迫者对文化的形成也起着一定的指导作用。如果需要解决某个重大的社会问题,最易受伤害的人将必须起领导作用:"革命实践不能忍受愚蠢的二分法,在这种二分法中,人民群众的实践仅仅是服从(统治精英)的决定"(Freire,1970a,p. 120;Freire,1978,第 17 页下面几页)①。得到一帮会计师、律师、经济学家和社会科学研究人员支持的傲慢的政治家轻视非专家的意见,认为这种意见是与问题或问题的解决办法不相关的。正相反,除非被压迫者是积极的参与者而不是被领导的对象,否则是不可能出现自内向外的改革行动的。"只有从弱小的被压迫者中产生的权力,才会强大到足以把二者都解放出来。"(Freire,1970b,p. 28)

用弗雷勒的话来说,目标就是觉悟,即一种指导日常生活中的实践与反省流的批判性意识。在压制言论的文化中,人们不加反驳地、听天由命地接受了压迫者的语言和存在方式,但批判意识可以训练我们人所特有的"讲述事实"(speaking a ture word)的能力(Freire,1970b,p. 75)。在社会政治控制的条件下,"被征服者的词汇、表达力和文化被剥夺了"(1970b,p. 134),通过觉悟,被压迫者获得自己的话语并相互合作地改造自己的文化(1970a,pp. 212-213)。因此,研究不是传达专业数据,而是在形式和内容上作为批判意识的催化剂。没有弗雷勒(Freire,1970b,p. 47)所称的"对现实的批判性理解"(即被压迫者"用自己的头脑来掌握有关自身现实的真理"),就只有默认现状。

社会科学研究要根据上述的三个道德原则提供有力的解释,就需要满足一系列新的伦理要求。它仍然承认 IRBs 作为生活的必需,并要求严格的精确性,然而由于研究者与研究对象间的关系是双向的,侵犯隐私、知情同意和欺骗都不再成为问题。在共产主义者看来,道德观念是由研究对象参与的,研究者以协同

---

① 相互关系是共产主义女性主义模型总体上的一个主要特征,因此对赋权原则非常重要。由于这一原因,批判理论被列入这里的第三个原则,而不是遵循鲁特的做法(参见前面的注释)把它单独作为共产主义的一个例证。鲁特(Root,1993,p. 238)本人认为,批判理论家们常常无法把"专家的理想"转变为他们的研究主题,或在研究的设计和解释上给予他们很少的发言权。没有向共产主义的互动性的根本转变,所有模式的研究都易于犯分配性谬误。

的方式把这些定义引入他们自己的概念。

结　论

就像古巴和林肯(Guba & Lincoln,1994)所说的,社会科学中的问题最终必须在世界观的水平上来加以解决,"方法问题从属于范式问题,我们把它定义为基本信仰系统或世界观,它不仅在方法的选择方面,而且在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基本方面为研究者提供指导"(p. 105)。具有外在性特点的传统伦理观提供给我们的是一个不完全的、不成熟的范式,需要在本体论上对其加以改造。对理论与实践的这一历史概述指出了对一种全新的研究伦理模型的需要,在这一模型中人的行动与道德观是相互作用的。

"由于人们之间的关系构成了他们作为人的存在……合乎道德的行动就是具有社会性的行动。"(MacMurray,1961b,p. 119)在共产主义女性主义者看来,个人的存在是社会世界的核心,我们只有以个人的形式才能对公共道德加以理解,它的基础和动力存在于人的社会本体论中①。"必须完全用个人与存在的视角来思考本体论,把本体论从淹没于物的境地中挽救过来"(Lotz,1963,p. 294)。"只有个人本体论才是真正的本体论,而个人只有在作为本体的时候才真正是他们自己。"(Lotz,1963,p. 297)

当对社会生活的解释以实证主义世界观为基础时,这种解释被认为是与参与者本人的描述不一致的。在问题分析中,研究者认为在语言形式、内容、研究成果方面比那些不是专家的目标受益人能够更好地掌握和更清楚地解释。自价值中立从密尔那儿起源时起,保护和提高个人自治一直被看作是它的哲学依据,但这种社会科学观点的不一致性现在已一目了然了。由于限制理性个体的积极参与,或把他们的自我理解判断为错误的,经验主义模型与理性个体(他们"在不同的道德观念间作出选择"并使其选择"值得尊重")的理想发生矛盾。工具主义体系的检验标准"抹杀了价值中立保护的目标:一个由自己制定行为原则的、自由平等的理性个体组成的社会"(Root,1993,p. 198)。通过把人类生活与道德秩序重新结合起来,共产主义女性主义者的社会本体论摆脱了这一矛盾。



参考文献

Barry, B. (1967). Justice and the common good. In A. Quinton (Ed.), *Political philosophy* (pp. 190-191).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enhabib, S. (1992). *Situating the self: Gender, community and postmodernism in contemporary ethics*. Cambridge: Polity.

Bok, S. (1995). *Common values*. Columbia:

① 特尼森(Theunissen,1984)认为布伯的关系性自我(以及列维纳斯、弗雷勒、赫勒、魏斯高格罗德和泰勒对它的传承)明显区别于欧洲大陆存在主义的主观性,如胡塞尔与萨特的主观领域"与'你'无关,也不是'我们'的成员"(p. 20;亦可参见 p. 276)。"按照海德格尔的观点,自我只有在与其他自我的自愿分离中才能苏醒,而按照布伯的观点,自我只有在关系中才能存在。"(p. 284)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Brabeck, M. M. (Ed.). (1990). *Who cares? Theory, research, and educational implications of the ethic of care*. New York: Praeger.

Buber, M. (1958). *I and thou* (2nd ed.; R. G. Smith, Trans.). New York: Scribner's.

Bulmer, M. (1982). The merits and demerits of covert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In M. Bulmer (Ed.), *Social research ethics* (pp. 217-251). London: Macmillan.

Bunge, M. (1996). *Finding philosophy in social science*.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Card, C. (Ed.). (1991). *Feminist ethics*. Lawrence: University of Kansas Press.

Christians, C. G. (1997a). Social ethics and mass media practice. In J. M. Makau & R. C. Arnett (Eds.), *Communication ethics in an age of diversity* (pp. 187-205).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Christians, C. G. (1997b). The ethics of being. In C. G. Christians & M. Traber (Eds.), *Communication ethics and universal values* (pp. 3-23). Thousand Oaks, CA: Sage.

Christians, C. G. (1998). The sacredness of life. *Media Development*, 45(2), 3-7.

Christians, C. G., Ferre, J. P., & Fackler, P. M. (1993). *Good news: Social ethics and the pres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ode, L. (1991). *What can she know? Feminist theor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knowledg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Comte, A. (1910). *A general view of positivism* (J. H. Bridges, Trans.). London: Routledge.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848; subsequently published as the first volume of *Positive philosophy*, 2 vols., H. Martineau, Trans., London: Trübner, 1853)

Copleston, F. (1966). *A history of philosophy: Vol. 8. Modern philosophy: Bentham to Russell*.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Denzin, N. K. (1984). *On understanding emotion*.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Denzin, N. K. (1989). *Interpretive biography*. Newbury Park, CA: Sage.

Denzin, N. K. (1997). *Interpretive ethnography: Ethnographic practices for the 21st century*. Thousand Oaks, CA: Sage.

Durkheim, E. (1966). *Suicide: A study of sociology*. New York: Free Press.

Euben, J. P. (1981). Philosophy and the professions. *Democracy*, 1(2), 112-127.

Evans, A. F., Evans, R. A., & Kennedy, W. B. (1987). *Pedagogies for the non-poor*. Maryknoll, NY: Orbis.

Foucault, M. (1979).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A. Sheridan, Trans.). New York: Random House.

Freire, P. (1970a). *Education as the practice of freedom: Cultural action for freedom*. Cambridge, MA: 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Center for the Study of Development.

Freire, P. (1970b). *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 New York: Seabury.

Freire, P. (1973). *Education for critical consciousness*. New York: Seabury.

Freire, P. (1978). *Pedagogy in process: The letters of Guinea-Bissau*. New York: Seabury.

Gilligan, C. (1982). *In a different voice: Psychological theory and women's developmen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Gilligan, C. (1983). Do the social sciences have an adequate theory of moral development? In N. Haan, R. N. Bellah, P. Rabinow, & W. M. Sullivan (Eds.), *Social science as moral inquiry* (pp. 33-51).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Gilligan, C., Ward, J. V., & Taylor, J. M. (1988). *Mapping the moral domai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

Guba, E. G., & Lincoln, Y. S. (1994). Competing paradigms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N. K. Denzin & Y. S. Lincoln (Eds.),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pp. 105-117). Thousand Oaks, CA: Sage.

Habermas, J. (1971). *Knowledge and human interests* (J. J. Shapiro, Trans.). Boston: Beacon.

Habermas, J. (1990). *Moral consciousness and communicative action* (C. Lenhardt & S. W. Nicholson, Trans.). Cambridge: MIT Press.

Habermas, J. (1993). *Justification and application: Remarks on discourse ethics* (C. Cronin, Trans.). Cambridge: MIT Press.

Held, V. (1993). *Feminist morality: Transforming culture, society, and politic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Heller, A. (1988). *General ethics*. Oxford: Blackwell.

Heller, A. (1990). *A philosophy of morals*. Oxford: Blackwell.

Heller, A. (1996). *An ethics of personality*. Oxford: Blackwell.

Humphreys, L. (1970). *Tearoom trade: Impersonal sex in public places*. Chicago: Aldine.

Humphreys, L. (1972). *Out of the closet*.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Jennings, B. (1983). Interpretive social science and policy analysis. In D. Callahan & B. Jennings (Eds.), *Ethics, the social sciences, and policy analysis* (pp. 3-35). New York: Plenum.

Jennings, B., & Callahan, D. (1983, February). Social sciences and the policy-making process. *Hastings Center Report*, pp. 3-8.

Koehn, D. (1998). *Rethinking feminist ethics: Care, trust and empathy*. New York: Routledge.

Lazarsfeld, P., & Reitz, J. G. (1975). *An introduction to applied sociology*. New York: Elsevier.

Levinas, E. (1981). *Otherwise than being or essence*.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Lincoln, Y. S. (1995). Emerging criteria for quality in qualitative and interpretive inquiry. *Qualitative Inquiry*, 1, 275-289.

Lincoln, Y. S., & Guba, E. G. (1985). *Naturalistic inquiry*. Beverly Hills, CA: Sage.

Lotz, J. B. (1963). Person and ontology. *Philosophy Today*, 7, 294-297.

MacMurray, J. (1961a). *The form of the personal: Vol. 1. The self as agent*. London: Faber & Faber.

MacMurray, J. (1961b). *The form of the personal: Vol. 2. Persons in relation*. London: Faber & Faber.

Milgram, S. (1974). *Obedience to authority*. New York: Harper & Row.

Mill, J. S. (1865a). *Auguste Comte and positivism*. London.

Mill, J. S. (1865b). *Examination of Sir William Hamilton's philosophy and of the principal philosophical questions discussed in his writings*. London: Longman, Green, Roberts & Green.

Mill, J. S. (1893). *A system of logic, ratiocinative and inductive: Being a connected view of the principles of evidence and the methods of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 (8th ed.).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843)

Mill, J. S. (1957). *Utilitarianism*. Indianapolis: Bobbs-Merrill.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861)

Mill, J. S. (1969). *Autobiography*.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posthumously 1873)

Mill, J. S. (1978). *On liberty*. Indianapolis: Hackett.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859)

Mulhall, S., & Swift, A. (1996). *Liberals and communitarians* (2nd ed.). Oxford: Blackwell.

Noddings, N. (1984). *Caring: A feminine approach to ethics and moral educ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Noddings, N. (1989). *Women and evil*.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Noddings, N. (1990). Ethics from the standpoint of women. In D. L. Rhode (Ed.),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on sexual difference* (pp. 160-173).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Nussbaum, M. (1993). Non-relative virtues: An Aristotelian approach. In M. Nussbaum & A. Sen, *The quality of life* (pp. 242-269). Oxford: Clarendon.

Nussbaum, M. (1999). *Sex and social justi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lthuis, J. (1997). Face-to-face: Ethical asymmetry or the symmetry of mutuality? In J. Olthuis (Ed.), *Knowing other-wise* (pp. 134-164).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Pateman, C. (1985). *The problem of political obligation: A critique of liberal theory*. Cambridge: Polity.

Pateman, C. (1988). *The sexual contract*.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ateman, C. (1989). *The disorder of women: Democracy, feminism and political theory.*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eukert, H. (1981). Universal solidarity as the goal of ethics. *Media Development*, 28(4), 10-12.

Punch, M. (1994). Politics and ethics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N. K. Denzin & Y. S. Lincoln (Eds.),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pp. 83-97). Thousand Oaks, CA: Sage.

Reinharz, S. (1993). *Social research methods: Feminist perspectives.* New York: Elsevier.

Reiss, A. J., Jr. (1979). Governmental regulation of scientific inquiry: Some paradoxical consequences. In C. B. Klockars & F. W. O'Connor (Eds.), *Deviance and decency: The ethics of research with human subjects* (pp. 61-95). Beverly Hills, CA: Sage.

Root, M. (1993).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 The methods, ideals, and politics of social inquiry.* Oxford: Blackwell.

Ryan, K. E. (1995). Evaluation ethics and issues of social justice: Contributions from female moral thinking. In N. K. Denzin (Ed.), *Studies in symbolic interaction: A research annual* (Vol. 19, pp. 143-151). Greenwich, CT: JAI.

Sandel, M. J. (1982). *Liberalism and the limits of jus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eigfried, C. H. (1996). *Pragmatism and feminism: Reweaving the social fabric.*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hils, E. A. (1949). Foreword. In M. Weber, *The methodolog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pp. iii-x). New York: Free Press.

Smith, D. E. (1987). *The everyday world as problematic: A feminist sociology.* Boston: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Soble, A. (1978, October). Deception in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Is informed consent possible? *Hastings Center Report*, pp. 40-46.

Steiner, L. (1991). Feminist theorizing and communication ethics. *Communication*, 12(3), 157-174.

Steiner, L. (1997). A feminist schema for analysis of ethical dilemmas. In F. L. Casmir (Ed.), *Ethics in intercultural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pp. 59-88).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Taylor, C. (1982). The diversity of goods. In A. Sen & B. Williams (Eds.), *Utilitarianism and beyond* (pp. 129-14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aylor, C. (1989). *Sources of the self: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identit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Taylor, C. (1991). *The ethics of authenticit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Taylor, C., Appiah, K. A., Habermas, J., Rockefeller, S. C., Walzer, M., & Wolf, S. (1994). *Multiculturalism: Examining 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A. Gutmann, Ed.).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Theunissen, M. (1984). *The other: Studies in the social ontology of Husserl, Heidegger, Sartre, and Buber* (C. Macann, Trans.). Cambridge: MIT Press.

Tong, R. (1989). *Feminist thought.* Boulder, CO: Westview.

Tong, R. (1993). *Feminine and feminist ethics.* Belmont, CA: Wadsworth.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1995, May). Part I: Fundamental principles for the use of human subjects in research. In *Handbook for investigators: For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subjects in research.* Urbana: Author. Available Internet: http://www.uiuc.edu/unit/vcres/irb/handbook/sec1)

Vanderpool, H. Y. (Ed.). (1996). *The ethics of research involving human subjects: Facing the 21st century.* Frederick, MD: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Veatch, R. M. (1996). From Nuremberg through the 1990s: The priority of autonomy. In H. Y. Vanderpool (Ed.), *The ethics of research involving human subjects: Facing the 21st century* (pp. 45-58). Frederick, MD: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Walzer, M. (1983). *Spheres of justice: A defense*

of pluralism and equality. New York: Basic Books.

Walzer, M. (1987). *Interpretation and social criticis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Weber, M. (1949a). The meaning of ethical neutrality in sociology and economics. In M. Weber, *The methodolog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E. A. Shils & H. A. Finch, Eds. & Trans.). New York: Free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17)

Weber, M. (1949b). Objectivity in social science and social policy. In M. Weber, *The methodolog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E. A. Shils & H. A. Finch, Eds. & Trans.). New York: Free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04)

Weber, M. (1973). *Max Weber on universities* (E. A. Shils, Ed. & Tra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West, C. (1989). *The American evasion of philosophy: A genealogy of pragmatism*.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West, C. (1991). *The ethical dimensions of Marxist thought*.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Books.

White, R. (1995). From codes of ethics to public cultural truth.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0, 441-460.

Wood, J. (1994). *Who cares? Women, care, and culture*. Carbonda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Wyschogrod, E. (1974). *Emmanuel Levinas: The problem of ethical metaphysics*.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Wyschogrod, E. (1985). *Spirit in ashes: Hegel, Heidegger, and man-made death*.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Wyschogrod, E. (1990). *Saints and postmodernism: Revisioning moral philosoph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Wyschogrod, E. (1998). *An ethics of remembering: History, heterology, and the nameless other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第Ⅱ部分

处于转型中的范式与视角

PART Ⅱ PARADIGMS AND PERSPECTIVES IN TRANSITION

在导论的章节中，我们采用了古巴（Guba，1990，p. 17）的看法，将范式定义为一组指引行为的基本信仰。范式处理的是关于第一原则或终极原则的问题。它们是人类的建构物。它们定义了作为解释性摆弄修理者的研究者的世界观。这些信仰决不能根据它们的终极真理性来建立。与范式相比，视角（perspective）并不是那么固定或统一。尽管视角与范式可以有许多共同的因素，诸如一组共同的方法论预设或某一个特定的认识论等。

一个范式通常包含四个概念：伦理（价值论）、认识论、本体论和方法论。伦理所关心的是：我如何作为一个有道德的人而生活在这个世界中？认识论的问题是：我怎样来认识这个世界？研究者和已知世界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正如克里斯琴斯在本书第5章中所指出的，每种认识论都暗含着一种针对世界及研究者自我的伦理道德姿态。本体论所提出的基本问题是关于现实的本质以及世界中人类的本质。方法论关注的则是获得关于世界的知识的最佳途径。

在本书第Ⅱ部分中回顾了当前构建和组成定性研究方法的几个主要范式和视角：实证主义、后实证主义、建构主义，以及参与行动。与这些范式并行的视角还有女性主义（其形式多种多样）、批判种族理论、酷儿理论，以及文化研究。这些视角都分别建立起了自己的标准、预设以及方法论的实践，并将它们应用于自身理论框架之内的有规范的研究之中（本书第6章的表6.1和表6.2中列出了实证主义者、后实证主义者、批判理论、建构主义者以及参与范式的主要区别）。

在第1章中我们已对每一种范式和视角进行了简要讨论，而在这里我们将对它们做更为细致的说明。但在展开讨论之前，必须说明的一点是在近十年来，这些范式和视角之间的边界和界限正变得日益模糊。正如林肯和古巴在本书第6章中所发现的，各种范式间已出现了“杂交”的趋势。这也正是我们将本部分命名为“处于转型中的范式与视角”的原因。

所有范式面临的主要议题

林肯和古巴在第6章中提出，当前所有的范式都必须面对七个基本的关键议题：

价值论(伦理与价值观)、适应与通约(范式能否彼此适合)、行动(研究者在世界中做了些什么)、控制(谁开始了研究,谁提出问题)、真理的基础(基础主义抑或是反基础主义及非基础主义)、效度(是传统的实证主义模型还是后结构主义—建构主义标准)以及声音、反思性和后现代再现(是单一声音的再现还是多重声音的再现)。

在以上各个议题中,不同的范式都表现出了不同的取向。当然,实证主义与后实证主义范式为其他那些范式及视角的操作提供了一个对抗的背景。林肯和古巴对这两种传统进行了相当细致的分析,包括它们对幼稚的实在论的依赖,它们的二元认识论,它们在研究问题上的证实方式,它们对于信度、效度、预测、控制以及知识建模方法的重视和强调。林肯和古巴还讨论了这些范式在处理有关声音、赋权及实践问题上的无能。他们还间接地提到,这些范式无法令人满意地说明以下问题:"事实"其实在本质上充斥着理论和价值,研究在本质上是互动的,以及同一组"事实"其实可能支持不止一种理论这一事实。

建构论、解释主义及诠释学

按林肯和古巴的看法,建构论采纳的是一种相对主义者的存在论(相对论)、一种交流的认识论,以及一种诠释学的、辩证的方法论。这种范式的使用者们常被引导着去生产一种对社会世界的重建的理解。传统的实证主义中的"内在效度"及"外在效度"标准被诸如"可信赖性"以及"真实性"之类的术语所取代。建构论者重视交流的知识。他们的工作与本书第22章中凯米斯和麦克塔格特所讨论的几种不同的参与行动方法有重合之处。建构论将行动与实践联结起来,在建立反基础主义论断的同时,也鼓励实验文本和多声音的文本的发展。

在第7章中,施瓦特对解释主义、诠释学和建构论视角做了一个精细、复杂而且微妙的分析。他区分了每一种方法内部各种思想流派的差异,同时也指出它们在反对实证主义以及从互动的个体角度来研究世界这些问题上是站在同一立场上的。但正如施瓦特所强调的那样,与其说这些视角是以它们使用的那些确定了某种定位的、独特的研究方法的方法论来区分的,倒不如说它们更多地是以其在认识和存在问题上的不同立场来区分的。施瓦特追溯了建构论与解释主义传统的理论和哲学基础,将它们与舒尔茨、韦伯、米德、布卢默、温奇、海德格尔、伽达默尔、格尔茨、里克尔(Ricoeur)、格根(Gergen)、古德曼、古巴和林肯的著述联系起来。施瓦特指出,建构论传统是丰富、深厚而且复杂的。这种复杂性体现在这些视角所暗含的伦理和政治之中。一个解释者必须不断地追问这样一个问题:在我所研究的这些人面前,我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女性主义

在第8章中,弗尼尼亚·奥利森根据观察发现女性主义定性研究是一个高度分化

而且充满争议的领域。各种相互竞争的模型混杂在一起,但在冲突与争论背后却存在着一种共识:即女性主义研究一直是辩证的,而且一直承诺在世界中采取行动。奥利森代表了一种激情洋溢的女性主义。她主张"仅有愤怒是不够的",我们需要"用敏锐的学识来构架、引导和使用那些出于对纠正妇女在诸多健康领域中所受到伤害的兴趣而产生的激情"。

在她为本书第1版所撰写的篇章中,奥利森(Olesen,1994)区分了女性主义方法的三个主要流派:立场认识论、经验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六年之后,由于整个研究领域变得更为复杂、理论上更为分化,研究流派也大大增加了(参见表8.1)。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女性主义,它们分别与关于有色妇女的写作、质疑白人妇女、后殖民话语、女同性恋研究和酷儿理论、残疾妇女、立场理论以及后现代和解构理论等相联系。这种复杂性使得研究者—参与者关系成为了问题。它动摇了研究中"局内人—局外人"模型,解构了诸如"经验"、"差异"和"性别"之类的传统术语,同时为达到推翻压迫的目标,力图建立起女性主义者之间的团结。在这些话语中出现了五个新构建的问题,它们关注的概念有偏见和客观性、效度和可信赖性、声音,以及女性主义伦理等。在最后一个问题上,奥利森的精彩篇章为克里斯琴斯在第5章中提出的框架提供了具体的说明。

种族化话语与种族认识论

在第9章中,格罗丽亚·拉德森—比林斯将批判种族理论直接移入了定性研究方法领域。批判种族理论"试图说明在美国,那些构建和管理以种族为基础的法律、管理政策、选举政治……政治话语(及教育)的评价方式仅仅在表面上是种族中立、与肤色无关的(但实际并非如此)"(Parker, Deyhle, Villenas, & Nebeker, 1998, p. 5)。批判种族理论制定了一种种族认识论,它声称人们在世界中的立场或位置塑形着他们认识和存在的方式。这种立场消解了欧洲中心启蒙范式的文化的、伦理的和认识论的逻辑(以及种族主义)。

拉德森—比林斯从近年来非裔美国人、亚洲大洋洲岛民、亚裔美国人、拉丁美洲人以及美国本土学者的著作中抽取出"多重或双重意识"、"混血儿意识",以及"部族秘密"等概念加以介绍。通过对这些理念的分析,他展示了居于统治地位的文化范式如何使得少数族裔研究者产生破碎的种族化认同以及被排斥经验。批判种族理论家们尝试了多重解释策略,包括对自我民族志的故事讲述、个案研究、文本和叙述分析、传统的田野调查等,另外,最为重要的策略还有合作的、基于行动的研究以及对日常生活中种族、性别、法律、教育以及种族压迫的研究。

批判理论

多重批判理论、马克思主义以及新马克思主义的模型现已被纳入定性研究的话语

体系。在林肯和古巴的范式框架中,这种范式尽管表现形式多样,但都清晰地表述了一种建基于历史实在论的本体论、一种交流的认识论,以及一种对话的、辩证的方法论。在第 10 章中,乔·金奇洛和彼特·麦克拉伦追溯了批判研究(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从法兰克福学派一直到近期向后结构理论、后现代理论、女性主义理论、批判教育学和文化理论的转变。他们还为新千年中的批判理论勾勒出了大致的轮廓,其起点是假设西方社会并非毫无疑问地就是一个民主自由的社会。他们认为批判理论应该拒绝经济决定论,并将注意力集中于传媒、文化、语言、权力、欲望、批判性启蒙,以及批判性解放等问题之上。与施瓦特一样,他们的框架中包含了一种批判诠释学。乔·金奇洛和彼特·麦克拉伦在杜威和格拉姆西(Gramsci)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对于文本及其与现实联系的批判的、实用主义的研究方法。这导致了一种"反抗"版的批判理论,它与致力于社会批判以及个人赋权的批判人种学以及党派性的批判研究有紧密联系。批判理论家力求生产出实际的、注重实效的知识,这些知识是文化的、有结构的,对它的判断标准是它被历史情境限定的程度以及它生产实践和行动的能力。

文化研究

文化研究不能放入某个单一的框架之中。有许多种文化研究项目,其中有与伯明翰学派相联的,也有与斯图尔特·霍尔及其同事的著作相联的(参见 Hall,1996)。从历史上看,文化研究是历史地自我反思性的、批判的、学科间的、精通高层理论的,它关注全球性和地方性问题,而这种关注充分考虑了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以及日常的话语。它还关注"有关社区、认同、行动及变迁的问题"(Groissberg & Pollock,1998)。

就其一般形式而言,文化研究包含着一种审视,即审视人们生活的历史是如何被历代相传的结构所生产出来的。文化研究的各种版本都含有一种三重的关注:对于文化文本的关注、对生活经验的关注以及对文本与日常生活间可明确表述的联系的关注。在文化文本的传统中,一些学者将大众传媒和通俗文化作为一个使历史、意识形态和主观经验汇聚一堂的场所来加以审视。这些研究者们生产出了与特定历史时刻相联的受众的批判人种学。其他的学者们将文本作为生产、传播并消费霸权意义的场所来加以解读。在人种学传统中,存在着一种对于社会文本及其生产的后现代关注。

文化研究项目的本质是开放的、无限制的,它持续地反抗着各种将单一定义强加于整个项目之上的企图。在这个框架中既有批判性马克思主义、建构论、后实证主义范式流派,也有新出现的女性主义和种族模型。从事文化研究的学者们被历史现实主义和相对主义所吸引,将它们作为自己的本体论。他们还被交易认识论(transactional epistemologies)和辩证方法论所吸引。与此同时,他们又保持了对于一种行动导向的历史和结构框架的忠实。

在第 11 章中,弗劳和莫里斯勾勒出了批判唯物主义文化研究项目的大致轮廓,指

出多种多样的女性主义、族性和批判种族研究、男女同性恋及酷儿理论、后殖民及文化传播研究，以及本土民族的学问。这些理论之间存在着碰撞和互动，这种碰撞和互动塑形了文化研究的各种现代版本，而且产生了对于文化的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包括审美的、政治的、人类学的、表演的、历史的和空间的表现形式——的敏感。因此，现在已经有了不少关于澳洲—亚洲文化研究，亚洲—大洋洲文化研究，拉美、墨西哥和奇卡诺人（Chicana）[①]文化研究，不列颠黑人文化研究，以及爱尔兰、英国、西班牙、意大利、日尔曼和非洲文化研究的著作。

与此同时，文化研究的学生们少不得要和诸如认同、位置、全球化、本土、国家地位和差异这些意义复杂的术语纠缠一番。这些术语在媒体中一直存在争议，而且在那些由新信息技术和通讯技术所定义和塑形的领域内以行动而非语言得到体现。文化研究的学者们审视了意义在各种媒体形态之间及其内部的移动，并由此产生了关于马多纳（Madonna）、埃尔维斯（Elvis）[②]、海湾战争以及安妮塔・希尔（Anita Hill）[③]的研究，还有关于博物馆、旅游景点以及购物中心的“记忆工作”的研究。从这些研究中，人们可以愈加清楚地看到文化是一组由认同和社区的意义圈起来的彼此竞争和冲突的实践。

界定文化研究的学科边界是不断变化的，目前要使这一领域成为一种正在形成的严肃的学科，尚缺乏一种公认的标准谱系。尽管如此，一些主导的趋势还是存在的，诸如对于日常政治和人际政治的女性主义理解，在文本主义、民族志和自我民族志（autoethnography）的支持者之间存在的争吵，以及围绕着现代公民身份梦想的无休止的争论等。

性学与酷儿理论

批判种族理论将种族问题和复杂种族主题的概念平等地引入了定性研究领域。随后就轮到酷儿理论来做同样的事情——那就是：对关于一个未经反思的、统一的性（和种族化）主题的概念进行质疑和解构。在第12章中，盖姆森记录了主流社会科学如何被迫面对性的政治以及种族的政治这一故事的发展。他展示了关于性的研究长期以来就是与定性研究（生活故事、人种学）结合在一起的。通过将日常生活中同性/异性二元论彻底搅乱的方式，酷儿理论为关于男性同性恋、双性恋、变性以及女性同性恋的多重话语创造了空间。这就意味着研究者必须审视各个社会领域是怎样（至少是部分地）被这种同性/异性二分法所构造的。他们必须询问：这种隐密的认识论是如何成为日常生活中性实践以及物质实践的中心的？酷儿理论对这种认识论形成了挑战，因为它解构了统一主题的理念。同性恋成为了一个主题，成为了为调查如何创

---

① 墨西哥裔美国人中的妇女或少女。——译者注

② 马多纳和埃尔维斯均为美国著名歌星。——译者注

③ 1991年，美国黑人女性（安妮塔・希尔）指控黑人大法官克拉林斯・托马斯（Clarence Thomas）曾对自己实施性骚扰，引起极大的社会反响。——译者注

造、协商并改变群体边界提供的资源。由于制度分析和历史分析可以使人们更清楚地认识到自我及其认同是如何嵌入于制度和文化之中的,因此这两种分析在这个领域的研究中处于中心的地位。

总 结

如果一个研究者要成为摆弄工具的解释者,那么他就不应该对于本书中第Ⅱ部分中出现的那些范式与视角感到陌生。研究者必须理解各种范式或视角的基本伦理、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预设,并能够将其运用于对话之中。不同范式和视角之间的差异在实践的、唯物的和日常的水平上都有着显著的、重要的含义。只要不同范式或视角的信徒们不断地共同讨论他们之间存在的差异,同时尝试在他们达成共识的领域共同进行建设工作,那么范式之间的差异必将日益淡化。

同样明显的趋势是,将不会存在单一的"真理"。所有的真理都是部分的而且是不完全的。正如林肯和古巴在第6章中所声称的那样,未来将不会存在所有社会科学工作者都认可的单一常规范式。我们正处于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其特征为多重性、意义之间的竞争、范式的论战以及新的文本形式。这是一个解放的年代,我们已从一个单一真理王国的局限中解放了出来,从一个戴着单一色彩眼镜看世界的习惯中解放了出来。



参考文献

Grossberg, L., & Pollock, D. (1998). Editorial statement. *Cultural Studies*, 12(2), 114.

Guba, E. G. (1990). The alternative paradigm dialog. In E. G. Guba (Ed.), *The paradigm dialog* (pp. 17-30). Newburg Park, CA: Sage.

Hall, S. (1996). Gramsci's relevance for the study of race and ethnicity. In D. Morley & K.-H. Chen (Eds.), *Stuart Hall: Critical dialogues in cultural studies* (pp. 411-444). London: Routledge.

Olesen, V. (1994). Feminisms and model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N. K. Denzin & Y. S. Lincoln (Eds.),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pp. 158-174). Thousand Oaks, CA: Sage.

Parker, L., Deyhle, D., Villenas, S., & Nebeker, K. C. (1998). Guest editors' introduction: Critical race theory and qualitative studies in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Qualitative Studies in Education*, 11, 5-6.

范式间的争议、矛盾及正在出现的融合



PARADIGMATIC CONTROVERSIES, CONTRADICTIONS, AND EMERGING CONFLUENCES

⊙ 伊冯娜·S·林肯　伊贡·G·古巴

在为本书第1版所撰写的章节中，我们特别关注了各种研究范式为争夺正统性以及知识活动与范式的霸权所进行的斗争(Guba & Lincoln, 1994)。我们所讨论的后现代范式(后现代主义批判理论和建构主义)①就与标准的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范式之间存在着争夺正统性的关系，同时它们彼此之间还存在着争夺知识活动正统性的关系。在该文问世后的6年中，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

在正统性问题上，我们经观察发现那些谙熟方法与范式文献的读者们在慎思熟虑之后已经开始对某些本体论与认识论产生了高度兴趣，这些本体论与认识论与那些在过去被当作常规社会科学基础的本体论和认识论之间有着很大的差异。第二，甚至那些一直接受定量社会研究训练的知名研究者们(包括我们自己)也愿意更多地了解定性研究方法，因为那些在研究生院中接受指导的新的年轻学者们正不断地就定性研究方法提出严肃的问题，并寻求在定性研究取向的研究和论文写作方面得到更多的指导。第三，与定性研究有关的文本、研究论文、研讨会和学习材料正在爆炸式地增长。事实上，社会科学已经呈现出一种向更具解释性、后现代性和批判性的实践和理论转变的明显趋势，要想忽略这种趋势是极其困难的(Bloland, 1989, 1995)。这种非实证取向已经创造出了一种语境，在这种语境中，几乎没有什么研究可以躲避开各种竞争范式的支持者们的挑战。此外，我们还可以很明显地看到使用新范式研究的研究者数量每天都在增加。我们几乎可以肯定无疑地说：后现代范式的正统性已得到充分确立，至少它已经与已被接受的范式和常规范式具备了同等程度的正统性(Denzin & Lincoln, 1994)。

就后现代范式中的霸权或支配权而言，很明显，格尔茨(Geertz, 1988, 1993)

---

① 批判理论有多种版本，包括古典批判理论，它与新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最为紧密；后实证主义陈述，它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脱离出来，但在对常规的严谨标准的坚持这一问题上仍是实证主义的；还包括后现代主义者、后结构主义者或带有建构主义取向的各种类别。可参见：Fay, 1987; Carr & Kemmis, 1986; Lather, 1991；亦可参见本书第22章、第10章。

关于"流派间界限将日渐淡化"的预言已经飞快地得到了证实。研究方法论已不能再被看作一组可以普遍应用的规则或抽象物了。方法论已经无可避免地从特定学科的本质(如社会学和心理学)以及特定视角(如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理论和酷儿理论等)之中产生出来,并和这些学科和视角交织在一起。因此,举个例子说,我们就可以阅读诸如奥利森(本书第8章)等女性主义批判理论家的著作,或是阅读如盖默森(本书第12章)等酷儿理论家的著作,或者我们在将次级文本理解为一种学校教育实践中教师的赋权和民主化的同时也接受将教师视为研究者的论断(Kincheloe,1991)。事实上,各种范式之间已经开始出现"杂交"趋势,以至于两个理论家可能在过去被认为是水火不相容的,而现在在一种不同的理论纲目下看起来却像是在为对方的观点说话。举个例子说,我们自己的著作就曾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行动研究的实践者们和后现代批判理论家们的影响。因此,仅仅声称范式之间存在着竞争还是不够的,更有益的工作应是去探索各种范式之间在何处、以何种方式表现出融汇,又在何处、以何种方式表现出差异、争议和矛盾。

所有范式面临的主要议题

在为本书第1版撰写的篇章中,我们将自己的立场归纳总结在两个表格之中。第一个表格是关于范式的公理本质的(当时我们所讨论的范式有实证主义、后实证主义、批判理论和建构主义(Guba & Lincoln,1994,p.109,表6.1),在第二个表格中则列出了我们认为可以用来区分这四个范式的最基本的议题(Guba & Lincoln,p.112,表6.2)。在本书中我们再次列出这两个表格,以帮助读者回忆起我们以前的论述。这些公理为已经存在的和正在产生的范式定义了本体论的、认识论的和方法论的基础,这些都被列在表6.1之中。在我们所审视的议题之中,研究的目标、知识的本质、知识积累的方式、好的标准(严谨或效度)或质量的标准、价值、伦理、声音、训练、适应和霸权等是经常会引起争议的议题,这些都被列在表6.2中。对这两个表格的审视将使读者重新熟悉我们在本书第1版中所做的处理。当然,如果读者还想获得更详细的信息,可以直接阅读原书中的有关章节。

自从那本书问世后,至少有一组作者[约翰·赫伦(John Heron)和彼特·里森(Peter Reason)]详细分析了我们的表格,并在表格中补充进了"参与/合作"(participatory/coorperation)范式(Heron,1996;Heron & Reason,1997,pp.289-290)。这样,在本章中除了实证主义、后实证主义、批判理论和建构主义以外,我们还加入了参与范式[补充一句,这本身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它的诠释学阐释已深深地嵌入于我们自己的观点(建构主义)之中]。

表 6.1 不同研究范式的基本信仰(形而上学)

项 目	实证主义	后实证主义	批判理论等	建构论
本体论	天真的实在论——“真实”的现实,但可以理解	批判实在论——“真实”的现实,但只能不完全地而且是概率性地理解	历史实在论——被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经济的、伦理的和性别的价值所塑形的实质现实;随时间的发展而逐渐形成	实在论——被本土化地、有针对性地建构的现实
认识论	二元论/客观主义;发现是真实的	经修正的二元论/客观主义;批判传统/社群;发现可能是真实的	交流/主观主义;由价值调节的发现	交流的/主观主义的/创造的发现
方法论	实验/操作的(方法);对假设的证实;主要使用定量方法	经修正的实验/操作(方法);批判多元主义;对假设的证伪;可以包括定性方法	对话的/辩证的(方法)	诠释学的/辩证方法

表6.2 各范式在特定的实际议题中的位置

项 目	实证主义	后实证主义	批判理论等	建构主义
研究目标	解释:预测和控制		批评和转型;恢复和解放	理解;重建
知识的本质	经证实的、作为事实或法则建立的假设	未被证伪的、可能是事实或法则的假设	结构的/历史的洞察力	围绕着共识结合起来的个体重建
知识的积累	增长——为"知识的大厦添砖加瓦";普遍化和因果联系		历史修正主义;根据共性进行的普遍化	更多知识和更复杂的重建;通感(vicarious)经验
"好"的标准或质量标准	常规的"严谨"标准:内部和外部效度、可靠性及客观性		历史定位;无知和误读的侵蚀;行动刺激	可信赖性和真实可信性
价值	价值无涉——否认价值的影响		包含价值——成长的(formative)	
伦理	外在的:欺骗的倾向		内在的:揭露的道德倾向	内在的:揭露的过程倾向;特殊的难题
声音	为决策者和变化的代理人提供信息的"公正无私的社会科学家"		作为倡议者和行动者的"变革知识分子"	作为多重声音重建推动者的"激情洋溢的参与者"
训练	技术的和定量的;实质理论	技术的;定量的和定性的;实质理论	再社会化;定性和定量;历史;利他主义和赋权的价值	
适应	可通约的		不可通约的	
霸权	对出版、资助、提升与合同的控制		寻求承认和投入	

我们这里的目标是以赫伦和里森的补充为基础来重新组织这些议题，以反映当代的新思潮，并进一步展开我们的分析。我们所选择的议题既包括了我们最初的构架，也包括了赫伦和里森（Heron & Reason，1997）所提出的补充、修正和扩充，此外我们还选择了自己认为在当前最为重要的议题。需要说明一下的是，对我们来说，“重要”（important）有几层含义。一个重要的主题可以是引起广泛争论（甚至是激烈辩论）的——效度就是这样一个议题；一个重要的议题也可以预示着某种新意识（例如对价值角色的承认这样的议题）；一个重要的议题还可以详细地阐明了某一范式对另一范式的影响（例如女性主义、行动研究、批判理论和参与模型等怎样影响了研究者对于研究所实施的社区以及社区内在行动的构想）。此外，某些议题之所以变得重要，还可能因为刚刚出现了与它们有关的新理论或延伸的理论以及（或者）田野工作导向的处理方法——声音（voice）和反思性（reflectivity）就是两个这样的例子。

表6.3是对最初的表6.1的重复，但增加了由赫伦和里森（Heron & Reason，1997）提出的参与范式的公理。表6.4中列出了七个议题，它还对老的表6.2中最初提出的部分议题做了更新。1994年版的表6.2中的“声音”在此被更名为“研究者的姿态”，而“声音”经重新定义后被插入了当前的表6.5中。除“研究者姿态”之外，所有关于参与范式的条目都是由赫伦和里森提出的。另外在一个他们所未涉及的地方，我们补充了一个自信能反映他们看法的符号。

我们无意在此重述在本书第1版中已经反复讨论过的材料。相反地，我们将全力集中讨论表6.5中提到的议题：价值论、适应和可通约性、行动、控制、真理和知识的基础、效度、声音、反思性，以及后现代文本表现。我们相信这是七个当前最重要的议题。

我们一方面认为这些议题极具争议性，另一方面，我们也相信它们为对话、共识和融汇的形成创造了知识活动的、理论的和实际的空间。观点的交织、多重视角的合并，以及借用或称现学现卖（其中借用似乎是非常有益的，增加了丰富性或是带来了理论上的启发）等都展现出了巨大的潜力。举个例子说，尽管我们自己是社会建构论者，但在我们对嵌入于真实性标准［我们在《第四代评价》（*Forth Generation Evaluation*；Guba & Lincoln，1989）一书中对该标准进行了详细说明］的行动的呼吁之中，就可以明显地看到一种体现于批判理论视角中的行动倾向。再如，尽管赫伦和里森不吝笔墨地阐释了他们称为合作范式的模型，但只要仔细阅读他们的著作，就不难发现某种带有后—后实证主义、后现代和批判理论取向的研究形式。因此，那些谙熟多种研究理论或范式流派的读者们就会发现许多思想潮流汇集到了一张扩大的表格之中。正如劳雷尔·里查德森（Laurel Richardson）所指出的，这意味着类型“是变动不居的，事实上应该成为类型的东西总是在改变和扩大”（私人交流，1998年9月2日）。她还注意到“甚至就在我们写作的同时，范式之间的边界就已发生变动”。这也正是我们前面提到过的格尔茨所谓“流派界限淡化”的范式对应物。

表6.3 各种研究范式的基本信仰(更新后)

议 题	实证主义	后实证主义	批判理论等	建构论	参 与
本体论	天真的实在论——“真实”的现实,但可以理解	批判实在论——“真实”的现实,但只能不完全地而且是概率性地理解	历史实在论——被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经济的、伦理的和性别的价值所形塑的实质现实;随时间的发展而逐渐形成	实在论——被本土地、有针对性地建构的现实	参与的真实——主观—客观的真实,由心智和给定的整体共同创造
认识论	二元论/客观主义;发现是真实的	经修正的二元论/客观主义;批判传统/社群;发现可能是真实的	交流/主观主义;由价值调节的发现	交流的/主观主义的/创造的发现	在与整体的参与交流中的批判主体性;有关经验主义的、提议的和实际认知扩大的认识论;共同创造的发现
方法论	实验/操作的(方法);对假设的证实;主要使用定量方法	经修正的实验/操作(方法);批判多元主义;对假设的证伪;可以包括定性方法	对话的/辩证的(方法)	诠释学的/辩证的(方法)	对合作行动研究的政治参与;实践的优先性;使用扎根于共享的经验语境的语言

① 本栏的内容以赫伦和里森(Heron & Reason,1997)的论述为根据。

表 6.4 各范式在特定的实际议题中的位置(更新后)

议 题	实证主义	后实证主义	批判理论等	建构论	参 与[①]
知识的本质	经证实的、作为事实或法则建立的假设	未被证伪的、可能是事实或法则的假设	结构的/历史的洞察力	围绕着共识结合起来的个体重建	扩大的认识论:实际知识的优先性;批判主体性;生活知识
知识的积累	增长——为“知识的大厦添砖加瓦”;普遍化和因果联系		历史修正主义;根据共性进行的普遍化	更多知识和更复杂的重建;通感(vicarious)经验	处于一群嵌入于一群实践之中的研究之中
质量标准	常规的“严谨”标准:内部和外部效度、可靠性及客观性		历史定位;无知和误读的侵蚀;行动刺激	可信赖性和真实可信性	实验的、表现的、命题的和实际的认知的一致重合;导向以服务人类繁荣为目标的变革世界的行动
价值	价值无涉——否认价值的影响		⟵	包含价值——成长的(formative)	⟶
伦理	外在的:欺骗的倾向		内在的:揭露的道德倾向	内在的:揭露的过程倾向;特殊的难题	
研究的姿态	为决策者和变化的代理人提供信息的“公正无私的社会科学家”	作为倡议者和行动者的“转型知识分子”		作为多重声音重建的推动者的“激情洋溢的参与者”	通过自我反思行动宣扬首要声音;在阐明理论、叙事、运动、歌唱、舞蹈,以及其他表现形式时发出次要声音
训练	技术的和定量的;实质理论	技术的;定量的和定性的;实质理论	再社会化;定性和定量;历史;利他主义和赋权的价值		合作研究者们从一开始就被推动者/研究者卷入到研究过程,并使其通过对此过程的积极参与来不断学习;推动者/研究者需要有情感能力、民主个性和技能

① 本栏内容(除有关“伦理”和“价值”的部分)以赫伦和里森(Heron & Reason, 1997)的论述为根据。

表 6.5 当代的关键议题

议　题	实证主义	后实证主义	批判理论等	建构论	参　与
本体论	对于世界的提议性认知本身就是一个终点,从本质上说是有价值的		提议性和交流性认知具有作为社会解放手段的工具性价值,它本身就是一个终点,从本质上说是有价值的		关于如何在某种文化中达到繁荣的同时,保持自治、合作与层级的平衡的实际认知本身就是一个终点,从本质上说是有价值的
适应与可通约性	所有实证主义的形式都是可通约的		无法与实证主义形式通约;与建构主义的、批判理论的和参与的方法有一定可通约性,特别是当它们在西方之外融合进解放的方法时更是如此		
行动	并非研究者的责任;被视为“煽动”或主观性,因此会对效度和客观性构成威胁		可以主要在赋权的形式中被发现;预期并希望得到解放;社会变革,尤其是朝向更为公平和正义的社会变革是终极目标	与效度纠缠在一起;如果没有参与者一方行动,研究常是不完全的;如果参与者不理解政治体系,则建构主义的系统陈述要求在政治行动方面的训练	
控制	完全由研究者掌握		经常由“变革知识分子”掌握;在新建构中,控制权归还给了社群	由研究者和参与者分享	在不同程度上分享
与真理和知识基础的联系	基础的	基础的	在社会批判内部是基础的	反基础的	非基础的

对效度的扩大的考虑(好的标准)	对效度的传统实证主义构建;严谨、内在效度、外在效度、可靠性、客观性	行动刺激(见上);社会变革;公平、社会正义	对效度的扩大的建构:①晶体的效度(Richardson);②真实可信标准(Guba & Lincoln);③催化的、根茎的、感官的效度(Lather);④关系的和伦理中心的标准(Lincoln);⑤以社群为中心决定的效度	见上面的"行动"
声音、反思性、后现代文本再现	主要是研究者的声音;反思性可能被视为客观性中的一个难题;文本再现不是一个问题,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是刻板的	研究者和参与者的混合声音	混合的声音,有时参与者的声音占主导;反思性是一个严肃、困难的问题;文本再现是一个延伸的议题	混合的声音;文本再现很少被讨论,但是是一个难题;反思性依赖于批判主体性和自我意识
		文本再现实践可能是成问题的——也就是说,"小说的表述",或未经检验的"真理的王国"		

按照一种比较松散的定义,我们可以将自己的立场归入建构论阵营。我们不相信判断"真实性"或有效性的标准是一种绝对意义上的标准(Bradley & Schaefer,1998),而宁愿相信它们是从社会公众关于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有用的以及什么是有意义的(特别是关于行动和之后步骤的意义)这些共识中生发出来的。我们坚信对社会现象的一种好的划分是由群体和个人围绕着这些现象进行的制造意义的行动组成的。这些制造意义的行动本身正是结构主义者或建构论者所最感兴趣的,因为正是这些制造意义/制造理解/归因的行为在塑形着行动(或互动)。在人们发现制造意义的行动是不完全的、不完善的(如歧视的、压迫的或不自由的),或者是畸变的(从可被证明是错误的数据中创造出来的)情况下,这些行动本身也是可以改变的。

我们还尝试着吸收了一些其他主要的非实证主义范式视角。这不是一个完全的总加,由于篇幅有限,我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在本章中我们所希望做的是使读者们能够熟悉一些更大的流派、论断、对话以及启发性的写作和理论,最好是能使大家看到一些或许连作者自己都没有看到的东西:比如,融汇在何时何处会成为可能?有建设性的和解会在何处达成?各种不同的声音会从哪里开始变成美妙的合唱?

价值论

在早期版本中,我们是将价值作为一个实证主义者或现象学者们可能会有某种"立场"的"议题"放入表中的(Guba & Lincoln,1989,1994;Lincoln & Guba,1985)。幸运的是,我们给自己留了条后路,保留了变得更聪明或是干脆改变主意的可能性。而现在我们也确实把这种可能性付诸现实了。现在我们对于"价值论"是否一定要与"基本信仰"组合在一起已经产生了怀疑(但在表6.3中并未反映这一点)。在《自然主义的探询》(*Naturalistic Inquiry*; Licoln & Guba,1985)一书中,我们讨论了价值介入探询过程的若干种方式,包括对问题的选择、对引导问题的范式的选择、对理论框架的选择、对主要的数据收集和分析方法的选择、对语境的选择、对已经存在于语境之中的价值的处理,以及对展示结果的格式的选择等。我们相信这些已经提供了足够的理由来说明为什么要将价值作为区分实证主义、常规的研究模式和解释主义的研究模式的一个要点。

在对当前迅猛增长的文献进行了"再阅读"之后,我们再次考虑了自己的基本理论,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实际的议题比我们最初想像的要大得多。如果我们能够再从头开始的话,我们会将价值——更确切地说法应该是价值论,即讨论伦理、审美和宗教问题的哲学分支——作为范式讨论的基本哲学维度之一部分。在我们看来,这样做将有助于我们发现伦理是嵌入于范式之中,而非外在于范式的(本书中克里斯琴斯撰写的第5章就提供了一个例证)。同时,这还将有助于我们去思考精神性在人类研究中扮演的角色,并就此展开对话。颇可争论的是,

价值论曾一度“从定义上被摒斥”于科学研究之外，其原因仅仅在于它也关注“宗教”问题。但如果宽泛地定义“宗教”，使之能将精神性包含进来，将使建构论者更接近于参与研究，同时也会使批判理论者更接近于建构论和参与研究（批判理论关注的主要问题是从压迫中获得解放以及人类精神的自由，而这些都是深层次的精神性关怀）。既然如此，将价值论补充进基本议题之中就提供了一种使各种各样的解释主义研究模式得以更好融合的方式。正如里森（Reason，1993）、林肯和邓津（Lincoln & Denzin，1994）在早些年所指出的那样，此处可以为里森对“神圣的科学”以及人类功能的深层关注提供正统性依据，也可以使劳雷尔·里查德森所谓的“神圣的空间”变成人类研究的权威地点，还可以成为精神性与社会研究相结合的一个场合——甚至是唯一的场合。

适应与可通约性

实证主义者与后实证主义者们偶尔还会声称不同范式在某些方面是可通约的，也就是说，它们可以按照某种能使双方有可能同时实践的方式改造成对方的模样。我们曾辩称在范式的水平上或者在哲学的水平上，实证主义者与后实证主义者的世界观不可能相互通约，但是在各种范式内部，混合的方法论（或策略）却可能是很有意义的（Guba & Lincoln，1981，1982，1989，1994；Lincoln & Guba，1985）。因此，我们在《有效评价》（*Effective Evaluation*）一书中指出：

> 最适合于反应性评价（resposive evaluation）的指导性研究范式是……自然主义的、现象学的或民族志的范式。人们将发现定性技术是支持这种方法的最适当的典型研究技术。当然，有时候听众提出的议题和关注要求我们由诸多常规的方法中抽取出最好的方法来，特别是定量研究方法……在这些情况下，反应性的常规评价者将不会在合适的方法应用上做任何让步（Guba & Lincoln，1981，p. 36）。

我们一直试图澄清一个问题，虽然许多新自然主义的、民族志的、现象学的和个案研究方法的批评者们假定相反，社会科学中产生的“争论”并非是关于方法的①。直到1998年，韦斯（Weiss，1989）还在声称“某些评价理论家——最明显的例子是古巴和林肯——坚持认为我们不可能在一项评价中将定性的和定量的研究方法合理地结合起来”（p. 268）。尽管我们早在《第四代评价》（1989）一书中就已指出：

> 这些尚未解决的主张、关注和议题成为了评价者信息收集的高级组织者……这些信息既可以是定量的，也可以是定性的信息。与许多人的错误理解相反，响应性评价从未排除过定性的方法，它所处理的是任何对未解决

① 如想更清楚地理解方法是怎样成为了范式的替身，或我们最初的（我们自认为是相当清楚的）立场是怎样被误置的，请参见：Lancy，1993；或更近的著作：Weiss，1998，特别是第268页的内容。

的主张、关注或议题构成回应的信息(p.43)。

在更早时候我们还在《自然主义的探询》(*Naturalistic Inquiry*,1985)一书中明确地断言:

> 定性研究方法之所以在自然主义范式中得到强调,并非因为这种范式本身是反对定量研究的,而是因为定性方法更容易把"人作为研究的工具"(human-as-instrument)。正因为自然主义范式和常规范式经常被(错误地)分别与定性的和定量的研究方法划上了等号,读者们应该特别注意到这种反定量姿态的缺失。事实上,信奉自然主义的调查者们可以有很多机会使用定量的数据——这种机会可能比人们所意识到的要多得多(pp. 198-199)。

既然已经证明了我们当时并非(现在也不曾)在谈论某种反定量方法的姿态或是有意识地排除过什么方法,而是在谈论范式所建构的哲学,那么我们就可以再次就可通约性提出问题了:范式之间真是可以通约的吗?有无可能将某一范式中的因素融入另一范式之中,使得我们从事的研究可以同时汲取这两种范式的精华呢?在我们看来,答案应该是谨慎的"可以"。特别是当不同模型(范式)之间共有着一些相似的或能够引起共鸣的公理性要素时更是如此。由此可见——举个例子说——实证主义与后实证主义之间很明显是可以通约的。同样地,解释主义的/后现代的批判理论、建构论和参与研究之间也能够很好地彼此适应。只有在研究者们想在实证主义和解释主义模型的公理之中"挑一挑,选一选"时,可通约性才会成为一个问题,因为公理总是彼此矛盾和互斥的。

对行动的呼吁

要展示范式之间存在的争议,有一个最清楚的办法就是去比较实证主义/后实证主义的信徒们和解释主义者的信徒们对行动的看法,前者将行动视为对于研究结果和研究过程的某种形式的玷污(contamination),而后者则将研究结果中的行动视为研究过程的一个有意义的重要产出。实证主义的信徒们坚信行动要么是一种煽动的形式,要么是一种主观性的形式,无论哪种形式都将对"客观性"这个目标造成损害。另一方面批判理论家们却总是在倡导不同程度的社会行动——从推翻某些特定的非正义实践一直到对整个社会的激进变革。对行动的呼吁——无论是就内部转型而言的(例如使自己摆脱虚假意识的控制),还是就外部社会转型而言的——在实证主义者和后现代批判理论家(包括女性主义和酷儿理论家)之间都存在很大的差异。

然而,向行动最激烈的转变却发生在建构论和参与现象学的模型之中,在这种转变之中,从解释和理解向行动迈出的这一步或许是从概念上说最有趣的地方(Lincoln,1997,1998a,1998b)。对于某些理论家来说,向行动的转变是对于一种普遍的不将评价结果付诸实用的潮流的回应,也是一种对渴求创造出新评价

形式的回应,这种新评价形式可以吸引那些会坚决贯彻提出了有意义行动计划的建议的支持者(Guba & Lincoln,1981,1989)。对于其他人而言,对行动的接受则是一种政治上和伦理上的承诺(参见本书第3章、第5章、第20章。还可参见:Carr & Kemmis,1986;Schratz & Walker,1995)。

无论研究者所要回应的问题之根源是什么,将研究、政策分析、评价和社会解构(例如,对于社会结构中表现为家长制形式的压迫的解构,这主要反映了女性主义理论化的情况;再如对嵌入于公共政策之中的"同性恋恐怖症"的解构)等与行动联系起来的这种变化已经开始成为大量新范式研究工作在理论上、实际中以及在实践导向水平上的特征。行动现已成为一个主要的争论话题,它反映了各种范式的奉行者之间的持久争论。实证/后实证主义范式的研究者与其他新范式研究者们在对社会行动的授权——特别是对那些在研究者的帮助与合作下由研究参与者自己设计或创造、其目标指向研究参与者本人的行动的授权——这个问题上存在着非常显著的差别。许多实证主义/后实证主义的研究者们仍然认为"行动"仅属于研究者和研究参与者之外的社会群体(如决策者、立法者以及政府官员)的领域。奉行强硬路线的基础主义者(foundationist)们假定行动的感染力会影响甚至削弱客观性,而客观性恰恰被认为是严谨的科学研究方法的特征。

控 制

另外一个越来越成问题的争议集中在对研究中控制问题的讨论:谁来开始研究?谁决定研究中突出的问题?谁来决定研究的发现由什么构成?谁来决定怎样收集数据?谁来决定是否将研究结果公开?以什么样的形式公开?谁来决定怎样再现研究的参与者们?让我们说得再清楚一些:控制的议题深深地嵌入于声音、反思性以及后现代文本再现等问题之中(这些问题我们将在后面详加论述),但这只是对新范式研究者们而言的。对于那些奉行更为常规范式的研究者们来说,控制的议题已被有效地与声音、反思性以及后现代文本再现的议题隔离开来,因为后面这些议题都或多或少地威胁到研究的严谨性(特别是客观性和有效性)。而奉行新范式的研究者们却已经认识到本体论和认识论中一些显著的范式问题实际上是彼此重叠的,而且方法论与价值论也是在逻辑上彼此重叠的(Lincoln,1995,1997)。因此在他们看来,对于研究的控制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要说有什么问题的话,那也是研究者如何获得参与者们真诚参与的问题(例如古巴和林肯在1981年所描述的,他们如何在一项评估的进行过程中与利益相关者群体联系,并试图让他们不仅旁观而且参与进来)。

批判理论家们,特别是那些从事社群组织项目的人,常常会痛切地感受到让社群成员或研究参与者控制自己的未来是多么的必要。建构论者希望参与者们能够扮演更为积极的角色,包括提出一些任何研究都感兴趣的新问题,以及设计

出可以使社群内部和外部的公众都能更广泛地共享研究成果的大致方案等。按照参与式研究的研究者们的理解,被当地语境中的成员们所控制的行动正是社群内研究的目标。对于这些范式的信奉者来说,控制从来就不是一个"煽动"的问题——"煽动"是一个多少带有欺骗性的术语,它常被用来在某种更大的元叙事中对研究的客观性、严谨性和公正性进行攻击。相反地,在新范式研究者们看来,控制是一种带来解放、民主和社群赋权的手段,是打破原有的权力不平衡,以使过去处于边缘的群体能够发出声音(Mertens,1998)或获得"人类的繁荣"(Heron & Reason,1997)的手段。

围绕着控制而展开的争议,为人们观察一种我们称之为"向卫理公会派教徒提天主教问题"的现象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这个说法是1980年代早期我们办的学习班中一个学员提出来的,我们用它来描述日益严重的提问无合法性的问题:由于这些问题的参照框架根本不是为这些问题而准备的,因此问题变得毫无意义(我们也可以把这种现象称为"向穆斯林信徒提印度教的问题",它从另一个意义上说明了不同的范式、不同涵盖性的哲学或神学之间其实是不可通约的,而某一框架中的问题在另一框架中只有很小的意义,或者根本就是无意义的)。范式的系统表述之间的互动使得控制与客观性的要求难解难分地纠缠在了一起。客观性源自启蒙哲学对物理世界知识的规定,这种知识是被假定为与人们所能了解的知识彼此分离的(Polkinghorne,1989)。但是,如果关于社会世界(与物理世界相对应)的知识本来就植根于个人所在的社会的、精神的和逻辑的世界里制造意义的机制之中,那么这些知识就根本无法与认识者分离,而是植根于他或她对于这个世界的精神的或逻辑的设想之中(Polkinghorne,1989;Sanlner,1989)。

范式中真理与知识的基础

在人们对世界的经验之外是否存在着一个"真实的"世界,这是一个开放的问题。在现代的(也就是启蒙的、科学方法的、常规的和实证的)研究者们看来,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在人类对真实性的有缺陷理解"之外"还存在着一个"真正的"真实性或实在。不仅如此,人们只有通过运用排除了人类理解干扰的方法,才可能接近这种真实性或实在。对于实证主义传统中的基础主义者来说,有关真实性的科学真理和知识的基础乃在于使用严谨的方法,用一种尽可能去除了人类的偏见、错觉和其他"幻象"的模板(template)去验证社会现象(Francis Bacon;转引自:Polkinghorne,1989)。正如保尔金霍恩(Polkinghorne,1989)所清楚表述的:

> 客观领域独立于认识者对它的主观经验之外,这一思想可以在笛卡尔的二元实在论中找到,它对客观领域和主观领域做出了区分……当真实被分裂为客观和主观两个领域之后,只有在客观领域内的东西才可以被"客观

地"了解。真实的知识仅限于物体及其在时间和空间领域中的联系。人类的意识也因其是主观的而被与科学隔绝,从而也不是真正可知的(p.23)。

现在,真理与知识的模板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来加以定义——它可以定义为理性过程的最终产物,可以定义为经验理解的结果,也可以定义为经验观察的结果,还可以定义为其他的什么。但无论在哪种情况下,它的参照物都是物理的或经验的世界:包括与这个世界的理性结合、对这个世界的体验以及对它的经验观察等。实在论者一向以存在着一个"外在的""真实"世界作为自己的基本预设,在个别情况下他们也可能同时是基础主义者,并同意所有这些定义的方式都植根于外在于人类心智的现象之中这样的观点。尽管我们可以思考它们、体验它们或观察它们,但它们却是先验的,我们可以谈论它们,但不能直接理解它们。实在论是一个本体论的问题,而基础主义则是一个标准的问题。某些基础主义者声称:真实的现象一定暗示着存在某种可检验其是否真实的最后的终极标准(尽管我们可能很难决定这些标准是什么);而非基础主义者们则倾向于认为根本不存在这样的终极标准,只存在我们在特定时间和特定条件之下所能接受的标准。基础主义标准是通过发现得到的,而非基础主义的标准则是通过协商得到的。事实上,绝大多数实在论者同时就是基础主义者,而许多非基础主义者和反基础主义者同时就是相对主义者。

把现实主义与基础主义联接起来的本体论观点是一种与建构主义的假设前提相吻合的观点,它瓦解了本体论与认识论相互脱节的康德式范畴。这种本体论观点非常适合于新范式主义的研究者。批判理论家、建构主义者以及参与/合作的研究者们的首要兴趣点恰恰就在于主观的和主体间性的社会知识,以及由人类意识所生产的人类行动者是如何积极建构并合作创造出这种知识来的。不仅如此,新范式研究者们开始饶有兴趣地开发社会知识领域,依靠各种各样社会的、知识活动的和理论的探索来获取信息。这些理论探险包括:索绪尔式(Saussurian)语言学理论,它将词语之间的所有联系以及这些词语的含义视为一种处于某种语言系统之中的内部关系的函数;文学理论中的解构流派,它试图解除文本与任何本质主义的或先验的意义之间的联系,而将文本重置于作者与读者共同的历史和社会语境之中(Hutcheon, 1989; Leitch, 1996);女性主义(Addelson, 1993; Alpern, Antler, Perry, & Scobie, 1992; Babbitt, 1993; Harding, 1993)、种族和族性理论(Kondo, 1990, 1997; Trinh, 1991),以及酷儿理论(本书第12章),它们试图探索和揭示在统治和被统治的性别、身份认同、种族和社会世界之间存在的压迫和历史性殖民;后现代历史阶段(Michael, 1996),它指出真理是片面的,认同是不固定的,语言是一种模糊的指示系统,而方法和标准则带有潜在的强制性(Ellis & Bochner, 1996);社会变迁的批判理论(Carspecken, 1996; Schratz & Walker, 1995)等。在新范式主义的后现代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研究者看来,那种无穷丰富的调查领域(必须)被严格地从先验主义的科学观中隔离出来。因为经过个人与社会群体创造,并经常再创造和共同创造而产生的精神、社会、心理、语言世界的丰富性,足以使研究者可以自由地择取文本,以压缩的形式再

建他们与研究参考者的关系,用题字、再题、元叙述和其他修辞策略公开展现人类行动,然而人类行动被展现的过程中在多大程度上被局部化、暂时化的问题是模糊不清的。解读题字形式的过程和元叙述的修辞方法是发生学或考古学的(Foucanlt,1971;Scheurich,1997),所谓发生学就是揭示那种沉积下来的、被作为真理接受的观点的源泉(Polkinghorne,1989,p. 42)。

新范式研究者们以多种不同的方式加入了有关基础的论战。批判理论家——特别是带有更多实证主义色彩且偏向于马克思主义解释的批判理论家们——倾向于基础主义的视角,但有一点显著的差别。他们不是将基础的真理和知识置于一些"外在的"外部真实性之中,而是倾向于将真理的基础置于造成压迫、不公正和边缘化的特定的历史、经济、种族和社会基础之中。认识者不再被描述为是隔离于客观现实之外的,而被视为在这些历史现实之中的不清醒的行动者("虚假的意识"),或虽然对压迫的历史形式有所认识,但由于冲突而不能或不愿在这一历史时刻针对某些历史形式采取行动以改变一些特定的条件("分裂的意识")。这样批判理论的"基础"就是一种二元性:社会批评分别与积极和解放的社会变迁可能性的意识相联系。社会批评可以独立于社会变迁而存在,但二者对于批判视角都是极为必要的。

在另一方面,建构论者则更倾向于反基础的观点(Lincoln,1995,1998b;Schwandt,1996)。反基础(antifoundational)这个术语表示了一种态度,即拒绝接受任何可用以认识普遍真理的永久不变的(或"基础的")标准。正如作者之一所强调的,真理——以及任何对什么是有效知识的同意——都产生于某些利益相关社群成员之间的联系(Lincoln,1995)。人们所同意的真理可能只是社群关于什么可以被接受为真理的协商的产物(尽管这种陈述本身也充满了问题;参见:Guba & Lincoln,1989)。或者这种同意最终只是一种对话的结果,这种对话将有关真理主张及效度的争论通过客观性和相对性这两个敌对的阵营送交"通过某一话语参与者们的争论而形成的一种对效度的共同体的测试"(Bernstein,1983;Polkinghorne,1989;Schwandt,1996)。这种"交流的、实用的效度概念"(Rorty,1979)从来都不是固定不变的。相反,它就是依靠社群的叙述而产生的,其自身亦服从于使社群得以产生的历史的、世俗的条件。施瓦特(Schwandt,1989)也声称这些话语(或称社群叙事)能够而且应该受到下列因素的限制:道德的考虑、扎根于批判理论家们的解放叙事之中的前提、罗蒂的实用主义哲学、建构论研究的民主关注,以及参与和合作研究所关注的"人类繁荣"目标。

围绕着基础主义(或在更低程度上说,围绕着本质主义)的争议似乎不太可能通过不同范式信徒之间的对话得到解决。更可能出现的情况是一种"后现代转向"(Best & Kellner,1997)——它强调对社会现实的社会建构,强调自我认同的流动性而非固定性,并强调一切真理的片面性——将简单地推翻现代性的信徒们关于一种客观真实的预设。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情况已经在物理科学中出现了。我们可以预测(尽管在我们的有生之年未必会看到),也许会有一天,一个受人类有限的主观实在唆使的客观实在的二元论思想会变得像"地球是平坦

的”一样诡异可笑。

效度:一个延伸的议程

在有关范式差异的对话中,围绕着效度所扩展的争论无疑是最为丰富多彩的(Howe & Eisenhart,1990;Kvale,1989,1994;Ryan,Greene,Lincoln,Mathison,& Mertens,1998;Scheurich,1994,1996)。效度与客观性不同。我们有相当有力的理论的、哲学的和实用的基本原则来检验客观性的概念并发现它所需要的东西。甚至在实证主义的理论框架中,它也被视为在概念上存在缺陷。但效度则是一个更令人头疼的建构,对新范式的奉行者来说,它既不可被轻易忽视,也不可被轻易定形(Enerstvedt,1989;Tschudi,1989)。效度不能被轻易地忽视,是因为它指向了一个必须以某种方式回答的问题:这些发现是否足够真实可信(与某种真实性同构、值得信赖、与他人建构其社会世界的方式相联系),以至于我们在按照它们的推论行动时可以相信自己?更进一步说,我们是否有充足的信心根据这些发现来构筑社会政策与制定法律呢?与此同时,由于对效度的激进重构,研究者们不得不面对多样的甚至有时是相互冲突的关于什么是严谨研究的法则。

围绕着效度的一个议题是方法与解释之间的合并。后现代转向认为没有任何方法可以带来终极真理,事实上它“怀疑所有的方法”,并认为越是这样做,他们的主张所带来的真理就越多(Richardson,1994)。因此,尽管有人可能会认为某些方法较之其他方法更适用于研究人类对社会现实的建构(Lincoln & Guba,1985),但没有人会声称某一种方法(或一组方法)就是通往终极知识的金光大道。但在新范式研究中,除了方法以外,解释的过程也同样承诺会带来某些本土的或扎根于文本的真理。这样我们就有了两个同时展开的论断。第一个是借用了实证主义的论断,它要求在运用方法时必须保持一定的严谨。而第二个论断则在认定某一解释较另一解释更为卓越以及在为某一项解释性研究本身确定框架和边界的时候,要求一种社群的赞同和某种形式的严谨——也就是说推理过程要经得起推敲,要与作者或读者已知的现实相符合。在我们真正理解事实上存在两种形式的严谨之前,我们就已经组装了一组方法论的标准,这些标准大多是从一批早期有思想的人类学社会学方法研究者那里借用过来的。这些方法论标准之所以至今仍然可用,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决非无足轻重的)一个原因就是它们保证了诸如“延长的约定”和“持续的观察”之类的议题会得到足够的重视。

在最近的著述中,第二种形式的严谨引起了最多的重视:我们是否是在解释上严谨的?我们能否相信由我们合作创造的建构可以提供对某些重要的人类现象的支撑?

人类现象本身也是争议的主题。古典的社会科学家们更愿意把“人类现象”限制在某些可以进行某种(科学的)概括的社会经验范围之内。而新范式研究者

们则越来越关心某一种独特的体验,一个个具体的危机、顿悟或是发现的瞬间,以及那种在所有对常规的客观性、感觉和激情所构成的威胁中最重大的一种。什么会被算作是社会数据,这越来越依赖于赋予生活以叙述性质的人类经验所具有的经验的、具体的和情感的特质,而这种扩张正是社会科学家们所关心的。以埃利斯、博克纳(参见本书第28章)和里查德森(参见本书第36章)为代表的社会学家们以及以法恩(参见本书第4章)为代表的心理学家们对于自我民族志的各种表现形式以及个人体验的方法非常关注,这既是为了挽救那种病入膏肓的定量化描述人类生活的社会科学抽象,也是为了更好地把握那些使得生活中充满冲突、变动和困难的因素。

出于这种讨论的目的,我们相信接受一些对社会科学最偏激的定义亦并无不妥,因为范式之间的争议经常发生在这些对话的边缘。这些边缘部分正是划定边界工作开展的场所,相应地,这些部分也是最有希望能规划定性研究方法的近期发展和长远未来发展的地方。

标准:是否应有、何去何从

在这些边缘部分上,围绕着效度产生了几种对话。第一种对话——也是最激烈的一种——是由施瓦特(Schwandt,1996)引发的,他建议我们"向标准学告别",或者是对那些"决疑解惑、判断真伪对错的规则性规范"说再见(p. 59),这些规范和标准学事实上已经造成了一种围绕着规范的迷信。然而,施瓦特本人却并没有真正做到与标准"再见";相反地,他与其他一些当代哲学中的实用主义者一起将社会研究重置于一种新的框架之中,这种框架把专业的社会研究转化为一种实践哲学的形式,其特征为"不仅有常规的科学的考虑,而且有审美的、深谋远虑的和道德的考虑"(p. 68)。当社会研究成为某种形式的实践哲学——一种深深的质疑,质疑我们应如何生活于这个世界之中、质疑我们所构想的人类知识与功能的潜力与限制——的实践时,我们就会对那些可能完全不同的判断社会研究的标准有一些最初步的理解。

施瓦特(Schwandt,1996)提出了三种这样的标准。第一,我们应该找到一种社会研究,它"可以生产出补充和完善对社会问题的外行探索(lay probing),而非简单替换之的知识",一种我们现在尚不知其内容,但可以从它那里寻求从不同的视角或角度来理解实践目的的知识形式。第二,他提出了一种"作为实践哲学的社会研究",其目标在于"增强或培育研究遭遇中双方的批判智识",这里的批判智识被定义为"参与道德批判的能力"。最后,他提出了我们可以将社会研究判断为实践哲学的第三种方式:我们可以对作为实践哲学家的社会研究者作出判断,他(她)"是否获得成功可以根据他(她)的调查报告是否促进了人类判断的训练或标准化或者是否提高了实践智慧的能力来加以评估"(pp. 69,70)。

但是施瓦特并不是唯一一个想"对标准学说再见"的人,至少在他之前已经有人这么设想过。舒尔里奇(Scheurich,1997)就曾发出过类似呼吁,而史密斯(Smith,1997)亦曾沿同一思路指出如果效度概念还要继续存在,并且还要继续

为现象学研究服务的话，就必须做大规模的重构工作（参见本书中第 34 章）。

这里的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应该保持标准，或我们作为科学研究群体应接受什么样的标准，而在于科学研究的本质应该是什么，这种本质是否应该经历某种转型，以及在某一转型计划中的标准基础应该是什么等。施瓦特（Schwandt，1989；1998 年 8 月 21 日的私人交流）明确地表示转型和标准都植根于对话的尝试中。这些对话的尝试本身很明显地属于"道德话语"的形式。通过与对话体、实践智慧的理念以及道德话语的特定联结，我们可以看到施瓦特的许多工作都与批判理论、参与范式以及建构主义相联系并且对它们有所反思，尽管他本人一直否认真理的相对性（有关建构主义、阐释学和解释主义形式的更详尽说明及批判，请参见本书中施瓦特所著第 7 章。他在文中清晰地说明了现实主义与非现实主义之间、基础主义与非基础主义之间的区别，其清晰程度远较我们在本章中所可能做到的为高）。

让我们再回到嵌入于效度之中的中心问题：当我们拥有某些足够忠实地反映了某些人类建构的特定社会研究时，我们怎么能知道依据它来采取行动是否安全？或更为重要的，我们如何知道研究所涉及的社群成员依据它来采取行动是否安全？对于这个问题没有最终的答案。但关于我们应使用什么来对某一项工作进行专业的或业余的判断，还是有一些讨论的。下面我们就将讨论这种意义上的效度问题。

作为真实性的效度

或许第一个非基础主义的标准就是我们为回应约翰·K·史密斯（John K. Smith）的挑战（参见本书第 34 章）而建立起来的。在这些标准中我们试图将标准定位于判断自然主义或建构论研究的过程与结果（而非方法的应用；参见：Guba & Lincoln，1989）。我们描述了社会建构论研究的五种潜在产出（评估是规范研究的一种形式；参见：Guba & Lincoln，1981），它们分别根源于对我们已经尝试着描述并建构起来的范式的特定关注之中，并且与任何从实证主义遗产中延续下来的关注无关。而标准则根源于建构论范式的公理和预设之中——不超出我们可以根据这些公理和预设外推和推论的范围。

这些真实性标准——之所以这样称呼它们，是因为我们相信它们就是真实的、可信的、严谨的或"有效的"建构论或现象学研究的特征——包括公正性、本体论意义的真实性、教育意义的真实性、催化意义的真实性，以及战术上的真实性（Guba & Lincoln，1989，pp. 245-251）。公正性被设想为一种平衡性；也就是说，所有利益相关者的观点、视角、主张、关注和声音都应在文本中得到彰显。在我们看来，对利益相关者或参与者声音的忽略反映了某种形式的偏见。这种偏见在过去和现在都与对客观性的关注——这种关注从实证研究流传下来，它反映了研究者的主观性和盲点——没有直接的联系。相反，这种公正性更多地是被一些深思熟虑的尝试所定义的，这些尝试包括防止边缘化、在纳入问题上的肯定性行动，以及用有力的行动来保证在研究努力中所有的声音都有在任何文本中

得到再现的机会,并保证他们的故事能得到公正和均衡的处理。

设计本体论意义和教育意义的真实性标准的目的,是为了能够确定一种意识层次的提升。而这些标准首先是由一个个研究参与者制定的,其次是由围绕着这些参与者或是这些参与者在研究中出于某些社会原因或组织原因而接触过的那些个人制定的。尽管我们没能在那一特定的历史时刻(1989)看到它,但在这一时间点上,按照我们在理论和实践上所能够达到的水平,我们没有理由声称这些观点不能够构成对施瓦特(Schwandt,1996)的"批判智识"的反思,或声称它们不具备参与道德批判的能力。事实上,我们最初提出真实性标准时带有强烈的道德和伦理意涵,而后来我们又回到了这个立场上(Lincoln,1995,1998a,1998b)。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受到了批评者们猛烈的反对,甚至我们自己也只是到了后来才充分清醒地意识到我们提议所暗含的意义(参见:Sechrest,1993)。

所谓催化意义和战术意义的真实性,首先指的是某种给定的研究能够推动研究参与者一方的行动,其次是指它能够在研究参与者希望得到某些特定的社会和政治活动形式的培训时推动研究者/评估者参加这种对研究参与者的培训。正是在这一点上,建构论研究实践开始表现出与批判理论行动、行动研究或是参与及合作研究等相似的形式,这些研究形式都以培养研究参与者创造积极社会变迁的能力或创造解放性的社群行动为基础。而奉行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的社会研究者们也正是对这一点提出了最多的批评,因为在他们看来研究者的任何行动都会引入主观性,削弱客观性,从而导致偏差。

主观性和偏差的问题有着漫长的理论历史,在本章中我们只能非常简略地涉及各种有关的构想,它们要么将主观性纳入考虑范围,要么假定它是一种积极的学习经验,是实践的、具体的、性别的和情感的。就这个讨论而言,我们只需说一句就已足够:有人劝告过我们,客观性只是一个幻想,它是一种从未实际存在过的神话,只存在于那些相信认识过程可以与认识者分离的人的想象之中。

反抗常规解构的效度

里查德森(Richardson,1994,1997)曾提出过另一种效度的形式,一种有意"抵抗常规(transgression)"的形式,或称晶体化。在尝试实验(即非权威、非实证)文本的写作,特别是写作诗和剧本时,里查德森(Richardson,1997)试着去"使现实、效度和真理问题化"(p. 165),尝试着去创造出一些新的联系,包括与她的研究参与者的联系、与她的工作的联系、与其他妇女的联系以及与她自己的联系等。她指出抵抗常规形式使社会科学家们可以"召唤一种另辟蹊径的社会科学……(这种社会科学)意味着改变某人的工作与本人的联系,改变人们怎样去认识和谈论社会学的方式"(p. 166)。为了解"抵抗常规看起来像什么,它的感觉怎样",我们有必要"找到并配备一些方法以使我们能够揭示社会学中隐含的预设以及否认生命的压迫,并且重新审视和重新感受社会学。重新审视和重新讲述是不可分离的"(p. 167)。

达到这种效度的方法（以一种隐喻的意义表达）就是去审视一个水晶体的属性。通过下面这段引文，我们或可对如何描述并配置这种效度略窥一斑：

> 我提议在后现代文本中对"效度"的中心想象不应是三角状的——一个死板的、固定的二维对象。这种中心想象应该是晶体状的，它将对称性、实质性与几乎有无穷种类的形状、物质、嬗变、多维度，以及切入的角度结合起来。晶体在不断成长、变化，但决不是无定形的。晶体是多棱镜，它反射出各种外在性而且在它们之间产生折射，创造出多样的色彩、模式和排列，并将它们按不同方向释放出去。我们能看见什么取决于我们所处的角度。不是三角状化，而是晶体化。在后现代主义混合类型的文本里，我们已从平面几何转向了光学理论，在后者中，光既是波，也是粒子。晶体化在保持结构的同时又解构了传统的"效度"理念（我们能感觉到为什么不存在单一真理，我们了解到文本怎样保证了自己的有效性）；同时晶体化还为我们提供了对于主题的一种深入的、复杂的、贯通的部分理解。吊诡异的是，我们知道得越来越多，但却总在怀疑自己之所知（Richardson，1977，p. 92）。

"固态对象"（晶体/文本）这种隐喻的提法是对效度的一种颇具吸引力的隐喻，它可以转向多条通路，它反射而且折射了光（光/意义的多种层面），通过这种反射和折射我们既可以看到"波"（光波/人流），也可以看到"粒子"（作为能量"束"的光/真理的要素、感受、联系、"流动"到一起的研究过程）。这种晶体隐喻的属性有助于作者和读者发现研究中过程的相互缠绕：发现、目睹、谈论、讲述和再现。

其他"抵抗常规"的效度

在提倡建立一种破坏现状的、"抵抗常规"的效度形式这个问题上，劳雷尔·里查德森并不缺乏同道者。拉舍（Lather，1993）试图寻找到"一种对话语的刺激物"，其目的在于"通过分散、循环和大量生产出对考虑到再现危机的权威的反实践……来割裂效度作为真理的领地，移置其历史的铭记"（p. 674）。除了催化效度（Lather，1986）以外，拉舍（Lather；1993）还提出了将效度作为一种模拟/反讽的效度；一种利奥塔式的（Lyotardian）形似的/新范式效度，这种形式的效度会"促进异质性，拒绝封闭"（p. 679）；一种德里达式的（Derridean）严谨/根茎效度，它是一种"通过传递、循环和多重开放"（p. 680）而进行的行动；一种感官的/境遇的效度，它"具体地表现为一种境遇的、部分的尝试"，并"将通过参与实践和自我反身性的实践……将伦理和认识论结合在一起"（p. 686）。它们总合起来形成了一种打断的方法，一种分裂的方法，一种将"纯粹的"在场转化为一种干扰的、流动的、部分的和成问题的在场的方法——一种后结构主义的和决定的后现代主义的话语理论形式，从而达到文本的揭露。

作为一种伦理联系的效度

正如拉舍（Lather，1993）所指出的，后结构形式的效度"将伦理和认识论结合

在一起”(p.686);的确,如帕尔默(Palmer,1987)也注意到的,“每一种认知的方法都包含了自己的道德轨迹”(p.24)。佩什金(Peshkin)则对诺丁斯(Noddings,1984)关于“对正当性证明的追求常使我们越来越远离道义之心”(p.105;转引自:Peshkin,1993,p.24)的观察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我们认知的方法是最为肯定地与我们所知以及我们与研究参与者的关系紧密相联的。相应地,林肯(Lincoln,1995)曾尝试着去理解伦理与人际和认识论(作为一种真实的或有效的认识)相交的途径。通过研究,我们对于一些正在形成的、同样植根于认识论/伦理联系之中的质量标准有了初步的理解,并根据研究总结出了七个新的标准:位置性,或称立场、判断;被社群或研究用来评定质量的特定话语;声音,或者说某一文本在多大程度上拥有多重声音的性质;批判主体性(或称深刻的自我反思性);互惠性,或者说研究中的关系在多大程度上是互惠的而非等级森严的;神圣性,或对于科学怎样能够(或在实际上去)服务于人类繁荣的深刻关注;以及对那些有助于巩固我们作为拥有大学教席的学者地位的特权的分享。以上每一种标准都是从一组常常是分散的学科研究(诸如管理学、哲学以及妇女研究等)之中提炼出来的(Lincoln,1995)。

声音、反思性,以及后现代文本再现

在今天,文本不得不承担比过去更多的工作。即便它们已经被后结构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们指派去反思他们的再现实践,但再现实践本身却已变得问题重重。三个最吸引人但同时也是最痛苦的议题分别是声音的难题、反思性的地位,以及后现代/后结构主义文本再现的问题,特别是因为这些问题被展现于那种朝向各种直接、公开处理人类情感的叙述和文学形式的变动之中。

声 音

声音是一个多层次的问题,其原因在于它对于不同的研究者都意味着许多事情。在过去的年代里,唯一适当的“声音”是“从无处来的声音”——即拉舍所谓的再现的“纯粹在场”。研究者们不仅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他们的文本所创造的抽象现实,而且他们也同时日益清醒地意识到:应该让读者们“听到”信息提供者的声音——让读者听到来自信息提供者的真实的词句(有时还可以是一些准语言学的信号、口误、暂停、停顿、开始和重构)。在今天,特别是在那些有更强参与性的研究形式中,声音不仅意味着在文本中可以出现真正的研究者——以及研究者的声音,还可以让研究参与者为自己发言,这种发言可以通过文本形式来表达,也可以通过戏剧、论坛、“村镇会议”,或是其他一些由研究参与者们自己设计的口头的以及表演取向的媒介或沟通形式来表达。尤其是表演的文本,它为研究者和研究参与者的声音涂上了一层充满激情的直接色彩,使之远远超越了自己原来的位置和领域(参见本书第15章)。

罗莎娜·赫茨(Hertz,1997)将声音描述为:

> 一场尝试着寻求怎样能够在呈现作者自我的同时也写出被调查者一方并呈现他们的自我的斗争。声音有着多重维度:第一是作者的声音;第二是被调查者的声音在文本中的呈现;第三个维度出现于当自我成为被研究的对象之时……声音就是作者如何在一种民族志中呈现自我的方式(pp. xi-xii)。

但是,比起常识性地理解"表现自我"来,知道如何表现自我要远为复杂得多。一代又一代在实证研究的"不带强烈色彩、不强调华丽辞藻"原则(Firestone,1987)下训练出来的民族志研究者们发现很难——甚至几乎没有可能——将自己有意识地、平等地"定位"于自己的文本之中[即便如此,如格尔茨(Geertz,1988)所最终肯定地证明的那样,作者的声音几乎从未真正地缺席,甚至很少真正被隐藏起来]①。因此,特定的文本实验——就是以各种各样的文学形式来撰写民族志的著作,劳雷尔·里查德森的诗作和剧作就是一些很好的例子——将是不无裨益的,这将有助于研究者克服那种以无实体的"我"的保持距离的、抽象的声音来写作的倾向。但这种写作尝试的确是很艰苦的工作。而这同时也是嵌入于反思实践与叙述实践中的工作,如果没有这些工作,就无法达到(部分)真理的声音。

反思性

反思性是一种对作为研究者的自我和"作为机器的人"进行批判性反思的过程(Guba & Lincoln,1981)。在我们看来,它就是早在里森(Reason)和罗万(Rowan)主编的《人类研究》(*Human Inqairy*,1981)一书中就已讨论过的批判性主体性。它是一种有意识地体验,体验到自我既是研究者,又是被调查者;既是教授者,也是学习者;体验到自我是一个在研究本身的过程中日渐认识到自我的人。

反思性迫使我们不仅要认真考虑我们对于研究问题的选择,认真考虑研究过程中的参与者,还必须认真地考虑我们自己、考虑在研究框架中代表了自我的多重身份(Alcoff & Potter,1993)。举个例子说,雷恩哈兹(Reinharz,1997)就争辩说我们不仅"将自我带入了田野中……(我们还)在田野中创造了自我"(p.3)。她建议说,尽管我们都携带着多重自我,但这些自我可以分成三个大类:基于研究的自我、携带的自我(历史地、社会地、个人地创造出我们立场的自我)以及在

---

① 举个例子,如果将本章与第36章、第28章进行比较,会发现在后面两章中,作者的声音是清晰的、个人性的、响亮的、内在的,与主体性互动的。尽管某些同事可以令我们惊讶地从指定的书中准确地辨别出我们写作的章节,但本章的风格更接近于一种保持距离的"现实主义"写作形式,而非其他章节中那种亲密的、个人性的"情感语气"。声音还可以作为被屏蔽的材料的功能而响起。本章中我们所选择的最重要的材料似乎要求一种更少个人性的语气,这可能是因为围绕着这些议题的"争论"似乎远远多于冷静的对话的缘故。这种"冷静"的语气似乎是滋生于我们试图创造一个更安静的可以围绕这些有争议的议题展开讨论的空间的心理反应之中。我们能说什么呢?

情境中创造出的自我(p.5)。这些自我都在研究框架中扮演着角色,因此会发出不同的声音。反思性——同时还有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对于定性研究质量的敏感性——要求我们根据形塑着我们生活的二元论、矛盾和悖论是如何塑造和安排了我们的研究努力的来逐个审讯每一个自我。此外,我们还必须不断地询问自己:这些二元论和悖论是怎样在形塑了那些产生于田野工作之中以及其后的写作和发现过程之中的身份的同时,也形塑了我们与被调查者的互动(我们在成为自己的过程中也逐步成为被调查者)呢?

有人曾将定性研究的特点归纳为一种"写上去"(田野笔记)和"写下来"(叙述)的配对过程。但克兰迪宁和康奈利(Clandinin & Connelly,1994)已经说明这种对定性研究的双重文本阅读是过于简单了。事实上,许多文本正是在参与田野工作的过程中被创造出来的。正如里查德森(Richardson,1994,1997;亦可见本书第36章)所指出的,写作决不仅仅是将某些现实加以转录的过程。相反,写作——包括对所有文本、笔记、呈现和可能性的写作——同时也是一种发现的过程:发现主题(有时就是问题本身)以及发现自我。

最晚近的系统表述带来的消息可谓喜忧参半。好消息是在后现实研究中的多重自我——我们自己和被研究者——使得更为动态的、更困难的、更开放的和更复杂的写作和再现形式成为了可能。而坏消息则是我们所创造出的和遭遇到的多重自我使得更为动态的、更困难的、更开放的和更复杂的写作和再现形式成为了可能。

后现代文本再现

在科学方法的常规文本中存在两种与生俱来的危险:它们可能使我们误认为世界是很简单的(而其实并非如此);它们也可能重新记录下一些持久的历史压迫的形式。换个说法,我们面对的是一种权威的危机(它告诉我们说:世界就是"这样的",但其实世界完全可能是另外一种样子甚至是另外多种样子的)和一种再现的危机(它的目标是为了让那些被我们窃取其生活用于社会科学研究的人们保持沉默,同时它还巧妙地服务于重新创造出这个世界——而不是其他一些可能更复杂但是公正的世界——的目的)。斯蒂姆普森(Stimpson,1988)曾观察到:

> 与其他伟大的词语一样,"再现"是一个拼盘。就像一个混杂的菜单一样,它可以同时提供出几种意义。因为一个再现可以是一幅图像——可视的,口头的或可听的……一个再现也可以是一种叙述,一系列的图像和理念……或者,一个再现可以是意识形态的产物,一个巨大的展现世界并使其行为合理化的计划(p.223)。

一种应对可能由文本带来的危险幻象(及其潜藏的意识形态)的方法,就是去创造一种新的、可以打破(传统的)边界的文本;创造一种可以从中心移向边缘,并对中心进行评论和去中心化的文本;创造一种放弃封闭的、有界的世界,转而建立更为开放的、更少传统束缚的世界的文本;创造一种跨越了常规社会科学

的边界的文本;创造一种尝试着建立关于人类生活的而非关于对象的社会科学的文本。

在尝试完成以上任务的试验之中,产生出了所谓“杂乱的文本”(Marcus & Fischer,1986)。“杂乱的文本”并不是指印刷上的错误百出(尽管它们可能在印刷上是非线性的),它指的是那些尝试着去打破科学与文学之间的二元论的文本,那些试图揭示人类经验的矛盾与真相的文本,以及那些通过打破规则来展示(哪怕只是部分地展示)人类怎样应对关于人类存在的永久真实,同时应对生活于那种存在中所必须面对的日常侵扰和悲剧的文本。后现代文本再现不断地寻找到并尝试各种可以拓宽人类经验中理解、声音以及故事性差异的范围的叙述。研究者不仅仅是社会科学家,还应该同时是说书人、诗人和剧作家,他们应该去尝试着进行叙说、第一人称记录、反思性审问,以及对嵌入于再现实践中的各种暴政形式的解构(参见本书第 36 章,另见:Tierney & Lincoln,1997)。

再现可能是当今围绕着现象学研究的争议中最为开放的一种,其原因正在于有关什么构成了正统研究的理念正在不断拓展,而与此同时,叙述的、戏剧的和修辞的结构形式又远远没有得到充分的探索和使用。另外,由于每一次研究或每一位研究者都给我们的理解带来了独特的视角,能限制差异和探索的可能性的就只有参加研究的人数多少以及令研究者感兴趣的社会和内心生活领域的数量大小。

关于后现代再现实践,现在唯一可以肯定的就是它们将以大量不同的新形式露面,而且它们会不断寻找(或要求大量地得到)听众,而这些听众中有许多并不一定在学术圈内。事实上,某些形式的研究甚至根本不会在学术世界中露面,因为它们的目标只是应用于即时的语境之中,服务于本土听众的消费、反思和使用目的。而那些为学术圈内的听众而生产出来的形式则将继续表现出不整洁的、实验性的特点,驱使它们的将会是与至今为止仍保持私密性和“非科学性”的社会世界沟通的需求。

对未来的一瞥

本章中所讨论的议题绝没有涵盖在近期或更为长远的未来中将被讨论的所有议题,但它们确实是一些最为关键的议题。随着各种各样新范式的不断产生,它们的追随者将会不断地寻找共同的基础或是寻找能将自己的研究方式与其他范式的研究方式加以区别的方法,因此相关的讨论、对话甚而争议也一定会继续下去。

在过去我们曾经表达过我们的一个愿望,即希望实证主义研究形式和新范式研究形式的实践者们可以找到某些解决他们之间差异的办法,这样可以最终使所有社会科学家们能够在一个共同的话语——甚至可以是几种传统——中再次共同工作。回头看来,这样的解决方案似乎没有多大可能性,而且看起来也不

会太有效。这倒不是因为实证主义者或是现象学主义者都死守阵地,不肯做任何让步(这本身也是不太可能的),而是因为一些处于后现代时刻和后结构主义苏醒时刻的基本预设,包括不存在单一"真理"的预设(认为所有的真理都只是局部真理);认为在语言学和文本意义上的能指和所指之间的来回运动所创造的再现只会给真实的人、事件和位置带来阴影的预设;认为身份是流动的而非固定的预设——这些预设将无可避免地使我们产生一种看法,即不可能存在某种单一的、可以使所有社会科学家都使用某些共同术语或达成共识的"常规"范式。我们正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其标志为多重声音、相互竞争的意义、范式间的争议,以及新的文本形式等。沿着这条推测的道路走下去,当将来我们记录它的历史时,会发现这乃是一个解放的时代:一种从汉纳·阿伦特(Hannah Arendt)称之为"真理的宰制"中得到的解放;一种从只能听到西欧的声音的状态中得到的解放;一种从世世代代保持的沉默中得到的解放;一种从仅以单色眼镜看世界的习惯中得到的解放。

我们还可能进入一个在研究开展过程中包含了更多精神性或灵性的新时代。我们强调在研究中反映生态价值观,强调在研究中尊重非西方生活的共同形式,强调在研究中充分的反思从而意识到我们的研究是被自身的历史和性别定位所形塑的,强调在研究中深入考虑"人类的繁荣"(Heron & Reason,1997),以上这些都可以将神圣的东西与世俗的东西通过一种促进自由和自主决定的方式重新整合起来。组织理论家伊贡·布伦韦克(Egon Brunswik)在研究人类组织的形式时,曾谈到过"有联结"和"无联结"的变量——即与其他变量有联系或明显没有联系的变量。我们可能正处于一个探索新道路的时期,在这些新道路上,我们的研究既是有联结的,又是无联结的,它是一种帮助我们找到兴趣交叉点的手段,一种帮助我们找到既让我们自己存在也促进他人存在的手段。



参考文献

Addelson, K. P. (1993). Knowers/doers and their moral problems. In L. Alcoff & E. Potter (Eds.), *Feminist epistemologies* (pp. 265-294). New York: Routledge.

Alcoff, L., & Potter, E. (Eds.). (1993). *Feminist epistemologies*. New York: Routledge.

Alpern, S., Antler, J., Perry, E. I., & Scobie, I. W. (Eds.). (1992). *The challenge of feminist biography: Writing the lives of modern American women*.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Babbitt, S. (1993). Feminism and objective interests: The role of transformation experiences in rational deliberation. In L. Alcoff & E. Potter (Eds.), *Feminist epistemologies* (pp. 245-264). New York: Routledge.

Bernstein, R. J. (1983). *Beyond objectivism and relativism: Science, hermeneutics, and praxis*. Oxford: Blackwell.

Best, S., & Kellner, D. (1997). *The postmodern turn*. New York: Guilford.

Bloland, H. (1989). Higher education and high anxiety: Objectivism, relativism, and irony.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60, 519-543.

Bloland, H. (1995). Postmodernism and higher education.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66, 521-559.

Bradley, J., & Schaefer, K. (1998). *The uses*

and misuses of data and models. Thousand Oaks, CA: Sage.

Carr, W. L., & Kemmis, S. (1986). *Becoming critical: Education, knowledge and action research.* London: Falmer.

Carspecken, P. F. (1996). *Critical ethnography in educational research: A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guide.* New York: Routledge.

Clandinin, D. J., & Connelly, F. M. (1994). Personal experience methods. In N. K. Denzin & Y. S. Lincoln (Eds.),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pp. 413-427). Thousand Oaks, CA: Sage.

Denzin, N. K., & Lincoln, Y. S. (Eds.). (1994).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Thousand Oaks, CA: Sage.

Ellis, C., & Bochner, A. P. (Eds.). (1996). *Composing ethnography: Alternative forms of qualitative writing.* Walnut Creek, CA: AltaMira.

Enerstvedt, R. (1989). The problem of validity in social science. In S. Kvale (Ed.), *Issues of validity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pp. 135-173). Lund, Sweden: Studentlitteratur.

Fay, B. (1987). *Critical social scienc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Firestone, W. (1987). Meaning in method: The rhetoric of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research. *Educational Researcher*, 16(7), 16-21.

Foucault, M. (1971). *The order of things: An arch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s.* New York: Pantheon.

Geertz, C. (1988). *Works and lives: The anthropologist as author.* Cambridge: Polity.

Geertz, C. (1993). *Local knowledge: Further essays in interpretive anthropology.* London: Fontana.

Guba, E. G., & Lincoln, Y. S. (1981). *Effective evaluation: Improving the usefulness of evaluation results through responsive and naturalistic approaches.*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Guba, E. G., & Lincoln, Y. S. (1982). Epistemological and methodological bases for naturalistic inquiry. *Educational Communications and Technology Journal*, 31, 233-252.

Guba, E. G., & Lincoln, Y. S. (1989). *Fourth generation evaluation.* Newbury Park, CA: Sage.

Guba, E. G., & Lincoln, Y. S. (1994). Competing paradigms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N. K. Denzin & Y. S. Lincoln (Eds.),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pp. 105-117). Thousand Oaks, CA: Sage.

Harding, S. (1993). Rethinking standpoint epistemology: What is "strong objectivity"? In L. Alcoff & E. Potter (Eds.), *Feminist epistemologies* (pp. 49-82). New York: Routledge.

Heron, J. (1996). *Cooperative inquiry: Research into the human condition.* London: Sage.

Heron, J., & Reason, P. (1997). A participatory inquiry paradigm. *Qualitative Inquiry*, 3, 274-294.

Hertz, R. (1997). Introduction: Reflexivity and voice. In R. Hertz (Ed.), *Reflexivity and voice.* Thousand Oaks, CA: Sage.

Howe, K., & Eisenhart, M. (1990). Standards for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 A prolegomenon. *Educational Researcher*, 19(4), 2-9.

Hutcheon, L. (1989). *The politics of postmodernism.* New York: Routledge.

Kincheloe, J. L. (1991). *Teachers as researchers: Qualitative inquiry as a path to empowerment.* London: Falmer.

Kondo, D. K. (1990). *Crafting selves: Power, gender, and discourses of identity in a Japanese workpla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Kondo, D. K. (1997). *About face: Performing race in fashion and theater.* New York: Routledge.

Kvale, S. (Ed.). (1989). *Issues of validity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Lund, Sweden: Studentlitteratur.

Kvale, S. (1994, April). *Validation as communication and acti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 New Orleans.

Lancy, D. F. (1993).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educatio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major*

traditions. New York: Longman.

Lather, P. (1986). Issues of validity in openly ideological research: Between a rock and a soft place. *Interchange*, 17(4), 63-84.

Lather, P. (1991). *Getting smart: Feminist research and pedagogy with/in the postmodern.* New York: Routledge.

Lather, P. (1993). Fertile obsession: Validity after poststructuralism. *Sociological Quarterly*, 34, 673-693.

Leitch, V. B. (1996). *Postmodern: Local effects, global flow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Lincoln, Y. S. (1995). Emerging criteria for quality in qualitative and interpretive research. *Qualitative Inquiry*, 1, 275-289.

Lincoln, Y. S. (1997). What constitutes quality in interpretive research? In C. K. Kinzer, K. A. Hinchman, & D. J. Leu (Eds.), *Inquiries in literacy: Theory and practice* (pp. 54-68). Chicago: National Reading Conference.

Lincoln, Y. S. (1998a). *The ethics of teaching qualitative research.* Manuscript submitted for publication.

Lincoln, Y. S. (1998 b). From understanding to action: New imperatives, new criteria, new methods for interpretive researchers. *Theory and Research in Social Education*, 26(1), 12-29.

Lincoln, Y. S., & Denzin, N. K. (1994). The fifth moment. In N. K. Denzin & Y. S. Lincoln (Eds.),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pp. 575-586). Thousand Oaks, CA: Sage.

Lincoln, Y. S., & Guba, E. G. (1985). *Naturalistic inquiry.* Beverly Hills, CA: Sage.

Marcus, G. E., & Fischer, M. M. J. (1986). *Anthropology as cultural critique: An experimental moment in the human scienc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Mertens, D. (1998). *Research methods in education and psychology: Integrating diversity with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methods.* Thousand Oaks, CA: Sage.

Michael, M. C. (1996). *Feminism and the postmodern impulse: Post-World War II fiction.*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Noddings, N. (1984). *Caring: A feminine approach to ethics and moral educ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almer, P. J. (1987, September-October). Community, conflict, and ways of knowing. *Change*, 19, 20-25.

Peshkin, A. (1993). The goodnes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Educational Researcher*, 22 (2), 24-30.

Polkinghorne, D. E. (1989). Changing conversations about human science. In S. Kvale (Ed.), *Issues of validity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pp. 13-46). Lund, Sweden: Studentlitteratur.

Reason, P. (1993). Sacred experience and sacred science. *Journal of Management Inquiry*, 2, 10-27.

Reason, P., & Rowan, J. (Eds.). (1981). *Human inquiry.* London: John Wiley.

Reinharz, S. (1997). Who am I? The need for a variety of selves in the field. In R. Hertz (Ed.), *Reflexivity and voice* (pp. 3-20). Thousand Oaks, CA: Sage.

Richardson, Laurel (1994). Writing: A method of inquiry. In N. K. Denzin & Y. S. Lincoln (Eds.),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pp. 516-529). Thousand Oaks, CA: Sage.

Richardson, L. (1997). *Fields of play: Constructing an academic life.*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Rorty, R. (1979). *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Ryan, K. E., Greene, J. C., Lincoln, Y. S., Mathison, S., & Mertens, D. (1998). Advantages and challenges of using inclusive evaluation approaches in evaluation practice. *American Journal of Evaluation*, 19, 101-122.

Salner, M. (1989). Validity in human science research. In S. Kvale (Ed.), *Issues of validity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pp. 47-72). Lund, Sweden: Studentlitteratur.

Scheurich, J. J. (1994). Policy archaeology.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olicy*, 9, 297-316.

Scheurich, J. J. (1996). Validi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Qualitative Studies in Education*, 9, 49-60.

Scheurich, J. J. (1997). *Research method in the postmodern. London: Falmer.*

Schratz, M., & Walker, R. (1995). *Research as social change: New opportunities for qualitative research.* New York: Routledge.

Schwandt, T. A. (1989). Recapturing moral discourse in evaluation. *Educational Researcher*, 18(8), 11-16, 34.

Schwandt, T. A. (1996). Farewell to criteriology. *Qualitative Inquiry*, 2, 58-72.

Sechrest, L. (1993). *Program evaluation: A pluralistic enterprise.*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Smith, J. K. (1993). *After the demise of empiricism: The problem of judging social and educational inquiry.* Norwood, NJ: Ablex.

Stimpson, C. R. (1988). Nancy Reagan wears a hat: Feminism and its cultural consensus. *Critical Inquiry*, 14, 223-243.

Tierney, W. G., & Lincoln, Y. S. (Eds.). (1997). *Representation and the text: Reframing the narrative voice.*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Trinh, T. M. (1991). *When the moon waxes red: Representation, gender and cultural politics.* New York: Routledge.

Tschudi, F. (1989). Do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methods require different approaches to validity? In S. Kvale (Ed.), *Issues of validity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pp. 109-134). Lund, Sweden: Studentlitteratur.

Weiss, C. H. (1998). *Evaluation* (2nd ed.). Upper Saddle River, NJ: Prentice Hall.

定性研究的三种认识论取向：解释主义、诠释学和社会建构论

7

THREE EPISTEMOLOGICAL STANCES FOR QUALITATIVE INQUIRY: INTERPRETIVISM, HERMENEUTICS, AND SOCIAL CONSTRUCTIONISM

⊙ 托马斯·A·施瓦特

哲学话语和文化话语中的标签(label)具有一种被德里达归因于柏拉图的播撒(pharmakon)的特征：它们既可以用来毒害和杀戮，也可以用来补救和治疗。我们需要依靠它们的帮助来确定一种风格、一种气质、一组共同的关注和重点，或是一种有确定形状的想象。但我们同时必须警惕，它们可能蒙蔽我们的双眼，或可能将那些原本变动不居的东西固定化。

里查德·J·伯恩斯坦(Bernstein,1986)

定性研究是学术界中一场始于1970年代的改革运动的名称①。这一运动包含了对于在那些偏好实验、准实验、相关分析以及调查研究策略的领域和学科中进行的社会科学研究的多重批判，包括认识论批判、方法论批判、政治批判以及伦理批判等。在这些学科和领域之内对这些方法论的内部批判，再加上从外部的科学哲学和社会科学哲学的争论中得到的洞见，都为反对派提供了充分的支持和推动力②。这些年来，这一运动已在学术界获得了一种政治上和智识上的地位。它已有了自己的杂志、学术协会、学术会议、大学中的教席，还得到了出版商的支持。所有这一切都支持了——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创造了——这一运动。不仅如此，考虑到出版商们对那些据称是全新的经过改进的关于什么是定性的论述所进行的大力宣传和营销，以及他们通过这些活动所施加的种种影响，声称

① 当然，人类学家们和从事田野工作的社会学家们早在几十年前就已经开展了“定性研究”。但在1970年代，生产和解释定性数据的方法在一大批其他的人文科学研究领域里广泛流传开来。这里无法对这一历史进程展开详细说明，但似乎可以说在1970年代，几种学科的发展潮流汇聚到了一起，从而为田野工作方法论的复兴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这些发展潮流包括对统计假设检验和实验的批评，对心理学中新兴的“自然主义”方法的日益增长的兴趣，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兴起，一部分社会学家对于解释田野调查方法所重新恢复的重视，对结构—功能主义的批评以及随之而来的解释主义人类学的发展，以及科学哲学家群体之外日益清醒的对于已接受观点进行批评的意识。

② 决非巧合的是，这一运动在美国的兴盛正好与越来越多的欧洲哲学家们批判唯科学主义的文献开始被译成英文相伴发生。例如，第一本论述理解的英语著作出现于1975年(Outhwaite,1975)；舒尔茨的著作《社会世界的现象学》(*Der sinn hafte Aufbau der sozialen Welt*)最早是1932年的德文版，其英译本在1967年出版；哈贝玛斯的著作《论社会科学的逻辑》(*Zue logic der Sozialwissenschaften*)最早是1967年的德文版，其英译本在1988年出版，等等。

这场运动有时看起来更像一种"产业"也是不无道理的。

在运动中还需要大量学术的和专业的政治手段,这是毫不令人惊奇的,特别是考虑到这一运动带来了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智识发展时,政治手段更是必要的。当前围绕着学科专业组织、学科间的联盟、什么构成了"正统的"研究、谁掌握着关键学术刊物的编辑权等问题的争斗(Denzin,1997;Prus,1996;Shea,1998)部分地反映了在什么构成了人类研究的适当目标和方法这个问题上的混乱。在大学各系之间围绕着定性研究的意义和价值所展开的争论常常反映了一些更为广泛的争议,即不同学科——包括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女性主义研究、历史学和文学——在智识劳动的目的、价值和伦理等问题上存在的争议。

因此,定性研究作为开展社会科学批判的一个领域或场所,比任何一种社会理论、方法论或哲学来都更为宽广。这是一大群学者们的"家园",这些学者们之间差异很大,平时还会很认真地彼此争执,但他们在一点上是共同的,那就是他们都从总体上拒绝那种代表了社会科学"主流"的唯科学主义、基础主义的认识论、工具性推理以及解脱的哲学人类学的混合体。但人们如何进一步描述这一场所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对那里产生了什么样的兴趣①。对某些研究者来说,这个场所是社会科学中某些特定的值得赞美的德行——诸如对现象真实性的忠实、对生活世界的尊重,以及对日常生活中被粉碎得极细微的细节的重视等——得到支持和拥护的地方。这样,他们就被以下事实所深深吸引了:在社会学和人类学中有着悠久历史的田野研究传统得到了复兴,并且被归入了"定性研究"的阵营之中;与此同时,来自上述传统中内部的批判则激发了对于田野工作者的兴趣、动机、目标、义务和文本的新的思考方式。另外一些研究者之所以会被吸引到这个领域来,是因为他们认为在这里可以展开对人类科学目标的辩论,可以围绕了解社会世界有何意义这一议题进行探索。还有一些研究者可能对于社会理论有着最大的兴趣,因此他们会到这个场所来寻找围绕着符号互动主义、社会系统理论、社会批判理论、女性主义理论的优点所展开的争论的知识。最后,许多当代的研究者们似乎将这个场所看成了一个可以将那些被后现代主义和后实证主义思想所激发的实验方法论和文本策略付诸实验的地方。

在本章中,我主要把这一场所视为一个不同认识论争夺注意力,并以之作为开展定性研究的正当性依据的竞技场。我审视了三种哲学(这三种哲学的不同形式被许多说明定性研究的目标和方法的著作所采用),它们分别是解释主义(inpretivism)、诠释学(hermeneutics)和社会建构论,三者包括了关于理解人类行动的目的和方法的不同视角、不同的伦理承诺,以及在关于再现、效度、客观性等

① 不幸的是,一些研究者之所以对定性研究感兴趣,似乎只是因为他们不想"与数字打交道"。这是一个双重的悲剧。首先,它基于错误的推理之上——定性研究的认识论本身从未禁止将数字作为数据使用;其次,这种取向建立在一种认为所谓的定性研究可能是比所谓定量研究更为"简单"的幻象之上。但我们可以使用什么标准去决定完成撰写田野笔记、实施访谈并记录访谈结果、解释各种各样的定性数据等工作时所需的思考和努力的水平是低于或高于去设计并实施一个审慎而且有意义的统计假设检验所需的思考和努力水平吗?这是很难想象的。应该说,这两类研究工作需要的是不同种类的意识、知识和技巧。

的方法论和认识论议题上所采取的不同取向①。本章以对每种哲学的概览开篇,我还注明了它们是如何既彼此关联又相互争论的。然后我讨论了几种由这些哲学所引发的认识论议题和伦理—政治议题,它们表现了当前对定性研究的目的与正当性的关注的特征。

不可否认,随后而来的将是一场在哲学的汪洋中开始的漫长而艰苦的旅程,它需要更多更为细致的注意,不仅要注意这些哲学本身,而且要注意它们之间的联系。我必须事先道歉,因为那些有哲学头脑的人会对我此处的不完善处理感到惊骇,而那些偏好方法论的人们则会急于转入下面讨论具体方法的章节。但如果我没有讲清楚下面这个道理——即如果仅将社会研究实践视为一种无关理论的、仅依靠方法论的威力就已足够的工作,就不可能完整地定义社会研究——那将是我的失职。社会研究是一种与众不同的实践,一种在活动中转变了当初引导活动的理论和目标的行动。换句话说,当某个人参与到生产并解释数据来回答别人所做所说有什么意义的问题,然后将这些理解转化为公共知识的"实际"行动之中时,他(她)不可避免地会培养起对于什么构成了知识、知识如何被证明为正当的,以及什么是社会理论化的本质和目标等问题的"理论"关注。总之,行动与思考、实践与理论都是在一个连续的批判反思与转型过程中被紧密联系起来的。

背景:第一部分

解释主义与诠释学一般以人文科学中的"人文科学"或"理解"传统为特征,它们的产生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康德主义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们[如狄尔泰、里克尔特(Rickert)、温德尔班(Windleband)、齐美尔(Simmel)、韦伯]对当时居于统治地位的实证主义哲学(以及其后的逻辑实证主义哲学)的回应。这场争论中的一个中心论点是:人文科学在本质上和目标上都与自然科学有着根本

---

① 这三种哲学决不是仅有的吸引了定性研究研究者注意力的哲学。例如,更为晚近的"定性"研究方法就坚实地建基于后经验主义科学哲学之上。也就是说,它的方法论认真地接受了数据不足以决定理论、观察是充满了理论的,以及所有去认识的主张都可能出错等的暗示,而没有被吸引加入大陆哲学家们对于工具性推理和唯科学主义的批判、海德格尔哲学对于"存在"的关注、解构主义(无论是伽达默尔的解构主义,还是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以及女性主义对客观性的批判之中。有关女性主义的、新实用主义的、种族的以及批判理论的哲学将在本书其他部分中加以讨论。有人声称现象学是定性研究的基础认识论,但实际上,除非将现象学的概念简化到类似于漫画的程度,否则就没有可能在一般意义上去讨论定性研究与这种复杂、多面的哲学之间的关系。现象学意味着一种远比将行动者的世界视为"就像它实际上是的那样"这种浪漫化的观点复杂得多的东西。不仅如此,在研究方法入门教程中的一些简单公式(例如,"以现象学为指归的研究者们试图理解不同事件的意义以及在特定情境中与普通人的互动的意义";Bogdan & Biklen,1992,p. 34)常常是误导性的,因为这些定义掩盖了定性研究认识论之间的关键差别,那就是将什么定义为意义。我们可以同时明显地看到海德格尔现象学在哲学诠释学和解构主义方法中的踪影,但这两种踪影的表现又是完全不同的;胡塞尔的现象学思想对舒尔茨的著作有着重要的影响,而后者的思想又成为常人方法学研究者和其他社会学家们的理论源泉。当我们考虑到这些情况时,现象学对于定性研究的影响的复杂性就表现得更为明显了。在本书第18章中对于现象学社会学的传统议题有所涉及。

的区别。解释主义的辩护者们声称人文科学旨在理解人类的行动。实证主义的辩护者们以及科学统一论的拥护者们则坚持任何科学(如果它希望被称为科学的话)的目标都是为社会现象、行为现象和物理现象提供因果解释。

当然,在新康德主义阵营内部也存在着不少关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差异的精确本质的争论。直至今日,关于是否可以根据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目标之间的差异——是"解释"(explanation,erkären)还是"理解"(understanding,verstehen)——来对二者作出根本性区分这一问题仍然悬而未决①。尽管去理解人文科学独特性的辩护者们如何将自己的哲学与上述议题联系起来是相当重要的,但为节省篇幅起见,此处我不准备对此做过多审视,而将直接聚焦于这些哲学自身的关键特征。在开始部分,我将首先对人类行动和意义的解释主义理论做一个速描,然后我将展示哲学诠释学如何批评这种观点,并且为人类研究提供了一种不同的理解。

解释主义哲学

从解释主义的观点来看,人类行动(社会行动)与物体的移动之间的区别就在于前者在本质上是有意义的。这样,要理解某一特定的社会行动(如友谊、投票、结婚、教学),研究者就必须把握构成该行动的意义。说人类行动是有意义的,要么是说它包含了一种标明了某项行动种类的特定的有意图的内容,要么是说某项行动的意义只能通过它所属的意义系统来加以把握(Fay,1996;Outhwaite,1975)。因为人类行动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得到理解的:一个人可以决定说别人的眨眼不是眨眼[这是雷尔(Ryle)举的例子,格尔茨使这个例子广为人知],他(她)既可以将一个微笑理解为一种嘲讽,也可以理解为一种爱慕;各种完全不同的物理运动可以被理解为同一种恳求行动,而对举起胳膊这样一个物理运动又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理解,如理解为投票、打出租车、要求发言等,这要取决于不同的语境以及行动者的不同意图。

为寻求某项行动的意义,或者说,为理解某一具体行动的意义,人们必须按照行动者正在使用的特定方式来进行解释。这一解释或理解(即获得Verstehen)的过程得到了不同方式的再现,并进而导致了解释主义哲学内部以及解释主义与哲学诠释学之间的一些重要的差别。要把握这种差别,有一种可能是最简单的方法,那就是考察对解释性理解进行定义(或理论化)的四种方法,其中三种构成了解释主义传统,第四种则标志着哲学诠释学与解释主义传统的区别。

---

① 但是,与其说这一议题看起来像社会科学中解释主义/诠释学方法的辩护者们与逻辑经验主义者之间的议题,倒不如说它是一种解释主义/诠释学方法的辩护者们内部之间的关注更为确切(Hiley,Bohman,& Shusterman,1991)。参见塔利(Tully,1994)所记载的格尔茨和泰勒关于这个议题交换意见的情况,还可参见:Rouse,1991。

移情认同

第一种对解释性理解概念进行定义的方法最早出现在狄尔泰的早期著作之中。狄尔泰声称要理解人类行动的意义,需要从行动者的内部去把握其主观意识与意图①。这样,理解就需要一种对于行动者的移情认同。这是一种心理重演行动——进入某一行动者的头脑去理解他(她)在动机、信仰、欲求、思想等方面都在想什么。这种解释主义的取向(亦称为动机主义)在科林伍德(Collingwood,1946/1961)关于什么构成了历史知识的说明中得到了解释,它也是人们称之为客观主义和保守的诠释学的这些理论(如 Hirsch,1976)的中心部分。这两种方法都有一个共同的理念,即相信解释者有可能超越或突破其自身所处的历史环境以达到再生产出行动者的意义或意图的目的(我已意识到在此处引入诠释学这个术语是有可能导致混乱的,因为我在上面已经说过我希望在解释主义和诠释学哲学之间划出界限。但客观主义诠释学与解释主义共有着同样的认识论,而正如我下面要说明的,哲学诠释学并不同意这种认识论)②。

我们是否有可能通过一种把握某一行动者意图的过程来达到解释性理解的目的呢?在这一问题上存在着广泛的争论。例如,格尔茨(Geertz,1976/1979)就辩称理解更多地来自于对行动者的小心揣摩,并试着去(通过观察和转换)弄清楚行动者认为自己在干什么。但无论如何,获得一种"内在"的理解——即行动者对于情境的定义——这样一种理念乃是理解定性研究目标的有力的核心概念。

现象学社会学

第二种弄清解释性理解这一概念含义的方法可以在现象学社会学家们和常人方法学家们的著作中找到(我将在后面说明对话分析的近期发展情况)。受舒尔茨(Schutz,1962,1932/1967)著作的影响,现象学分析主要关注的是理解日常的主体间性的世界(亦称生活世界,或 Lebenswelt)是如何建构的。它的目标在于把握我们如何将自己和他人的行动解释为有意义的,并且"在社会世界中个人主体间性的沟通之中去重构行动的客观意义的根源"(Outhwaite,1975,p. 91)。在这种重构过程中常用的两个工具是索引和反思(Potter,1996)。前者表明某一词语或发言的意义取决于其使用的语境。后者则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一个事实,即发言不仅在"说事儿",而且也是在"做事儿";一项发言是建构一项演说行动的一部分。这两个概念是现象学社会学者和常人方法学者们用以理解社会现实和日常生活是如何被建构进对话和互动的方法之一部分(如欲进一步了解此种视角,请参见本书第 18 章)。

---

① 狄尔泰(Dilthey,1958)强调了对他人经验的心理重演的重要性。韦伯(Weber,1949)认可了一种类似的理解概念,即"对于动机的理性理解"(p. 95)。狄尔泰在其晚期著作中淡化了移情认同的概念,转而更多地谈论对文化产品的诠释学解释。

② 参见布雷彻(Bleicher,1980)和加拉格尔(Gallagher,1992)对区分这些诠释学类别的综述。

语言游戏

对解释性理解的第三种定义以对语言方法的分析为代表,它主要从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一书中获取了灵感。这在彼特·温奇(Winch,1958)的著作中表现得特别明显,温奇从维特根斯坦那里借用了一个概念,即存在着许多用语言玩的游戏(检验假设、规定秩序、问候等),他还将这一理念扩展为在不同文化中建构的语言游戏。这些游戏中的每一种都有其自身的规则或标准,以使得游戏对于参与者都是有意义的。按照一种类比的推理,我们可以说人类的行动就像演说一样,是受规则支配的沟通中的一个因素。更简单地说,人类行动是依靠一种它所属的意义系统(按维特根斯坦的说法就是"语言游戏")才变得有意义的。理解的目标正是去理解这些意义系统(制度与文化规范、构建行动的规则等)(Giddens,1993;Habermas,1967/1988;Outhwaite,1975)。

共有的特征

以上对解释性理解的三种构想方式构成了解释主义的传统。这三种方式有以下几个共同特征:第一,它们将人类行动视为有意义的;第二,它们以对生活世界的尊重和忠实的形式表明了一种伦理承诺;第三,从认识论的观点看,它们共有着新康德主义强调人类主体性(如意图)对知识的贡献,而同时又并未因此而牺牲知识的客观性这样一种偏好。换句话说,解释主义者们声称完全有可能用一种客观的方式来理解行动的主观意义(把握行动者的信仰、欲求等)。解释者所再生产出来的或重构的意义被视为行动的原初意义。为了不至于对原初意义作出错误的解释,解释者必须采用一些能够使他们跨出自身历史参照系的方法。这些方法如果得到正确的应用,将使得解释者可以声称自己有一种作为观察者的纯粹理论态度(Outhwaite,1975)。一种保持距离的理论态度或科学思考的行动要求观察者保持一种中立的认知方式(Schutz,1962)。这当然并不一定就会否定以下事实:为了理解人类行动的主体间性的意义,研究者们可能不得不"参与"到他人的生活世界之中去,这有可能成为一种方法论上的要求。

正如舒尔茨(Schutz,1962,1932/1967)曾详细阐明地,解释主义一般包含了理解的两个维度。在初级的意义上,理解就是"一个复杂过程的名称,我们所有人都在日常生活中通过这个过程来理解自己行动的意义以及与我们互动者的行动的意义"(Bernstein,1976,p. 139)。但理解同时也是"一种社会科学中特定的方法"(Schutz,1962,p. 57),一种社会科学家寻求对初级过程的理解的过程。因此,解释主义者的目标就是重建那些参与特定行动的行动者的自我理解。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们假定研究者不能声称行动者搞清自己经验的意义的方式是与社会科学的理解无关的,因为行动者搞清自己行动意义的方式正是这一行动的构成部分(Giddens,1993;Outhwaite,1975)。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解释主义认识论与诠释学认识论具有相同的特征,因

为他们都强调:如果要声称某人已经理解了某一特定行动,那么他(她)就必须把握人类行动产生(或获得)意义的情境(Outhwaite,1975)。这一观点使用了“诠释循环”(hermeneutic circle)这一人们较为熟悉的概念,以之作为一种人文科学所独有的方法或程序:为了理解“部分”(特定的语句、发言或行动),研究者必须把握“全体”(由意图、信仰、欲求或文本、制度语境、实践、生活形式、语言游戏等构成的综合体),反之亦然。格尔茨(Geertz,1976/1979)在他那被人反复引用的对于民族志理解过程的描述中,将诠释循环的概念描绘为:

> 将最为本土化的本土细节与最为全球化的全球结构以一种将双方同时带入视野的方法连续辩证地联结起来……我们在由那些使整体具体化的部分所构想出的整体与由那些激发部分的整体所构想出的部分这二者之间来回跳跃,希望通过一种持续的智识运动将它们转化为对彼此的说明(p.239)。

加芬克尔(Garfinkel,1967)对理解人们如何搞清自己世界的意义的主张也与此类似:“不仅潜在的模式是从它单个的客观证据中演变出来的,而且在轮到单个的客观证据时,它也是在对于潜在模式‘已经知道了些什么’的基础上得到解释的。二者可以用来彼此说明。”(p.78)

最后,解释主义预设了一种对于理解的认识论理解,那就是它把理解视为一种认识者(作为主体的研究者)获取关于某一对象的知识(人类行动的意义)的智识过程。相应地,按照伯恩斯坦(Bernstein,1983)的解释,“理解的诠释学循环”这个概念:

> 从它引导我们走向我们试图理解的文本、制度、实践或生活方式这个意义上说,是‘对象’导向的……迄今为止,解释者以及参与到理解与提问过程中的个人几乎没怎么被提到过,只是说过他(她)必须具备一种洞察力、想象力、开放性和耐心以掌握(理解)这门艺术——一门通过实践获得的艺术(p.135)①。

这样,在解释主义传统中,解释者把要解释的东西对象化了(也就是对对象的监视和抵抗)。在这个意义上,解释者可以保证自己未受解释过程的影响,是

① 伯恩斯坦(Bernstein,1983)补充道:“如果就那些需要遵守的明确规则而言,在获得或者追求这种(理解的)艺术的问题上,根本没有什么确定的方法。”(p.135)但是在解释主义传统内部,对于规则、程序或方法的认识地位还是存在争议的。在我看来,格尔茨、沃尔科特和斯泰克的著作都是说明个人如何达到理解的更为艺术化解释的极好例证。另一方面,哈默斯利(Hammersley)、戈夫曼(Goffman)、洛夫兰德双氏(Lofland & Lofland)、迈尔斯和休伯曼(Miles & Huberman)、普拉斯(Prus)、西尔弗曼(Silverman),以及斯特劳斯和考宾(Strauss & Corbin)的著作详细说明了一种更偏重于社会科学方法的理解方式。这些学者们所强调的那些生产和解释“理解”的方法将效度、相关性放在优先地位,并认为问题与发现都是非常重要的。他们的方法论关注的是提出关于类型、频率、数量、结构、过程、原因、后果,以及社会政治现象的意义的问题,并且为回答这些问题提供经得起推敲的答案。这些答案主要采取了解释或说明这种现象的实质理论或中层理论的形式。但是加芬克尔及其他常人方法学研究者则提出了理解获得理解的方法的重要性的“第三条道路”,这些学者们声称行动者与观察者(也就是社会科学家)都应该被当作生产并管理(亦即完成)有组织的日常生活中的社会行动的“成员”,这样,举个例子说,社会学方法就不过是社会学家们实践其社会学推理的证据。

外在于解释过程的。

哲学诠释学

第四种也是极其不同的一种代表解释性理解的概念出现于伽达默尔(Gadamer,1975,1977,1981,1996)和泰勒(Talyor,1985a,1985b,1995)受海德格尔著作启发而提出的哲学诠释学之中①。让我们从解释主义的一个前提开始，一般说来，解释主义是以一个"注释家"为模型来为解释者的角色定位的。也就是说，它将解释者定位为一个使用诠释循环方法对文本(或人类行动)做批判性分析或解释的人②。科德曼(Kerdeman,1998)的下列解释是一种对伯恩斯坦观点的回应：

> 注释方法论将一个叙述(或社会行动)中的怪异部分与作为整体的叙述对立起来，直到这些怪异部分得到说明或被弄清楚为止。一位解释者的自我理解既不会影响理解过程，亦不受理解过程的影响。事实上，由于解释者和语言学对象被视为彼此分立的，人们相信自我理解会导致偏差并且会妨碍解释的成功(p. 251；亦可参见：Gadamer,1981,pp. 98-101)。

现象学观察者与语言学分析者都声称自己扮演着这种"置身于外的观察者"角色③。他们对于某些特定社会行动(或文本)的理解是纯粹再生产性的，必须以它们是否精准地、正确地、有效地反映了这些行动及其意义为基础来加以判断。

这是一种关于解释者的任务以及他(她)所"生产"出来的理解种类的经典的认识论图景(或更为一般地称为笛卡尔式的图景)，哲学诠释学通过几种方式对这种经典图景提出了挑战。首先，伽达默尔和泰勒的诠释学拒绝了解释主义者关于"诠释学是一种理解的艺术或技巧，其目标在于为人文科学建构一个方法论基础"(Grondin,1994,p. 109)这样一种观点，这种拒绝可以被广义地理解为一项哲学计划。哲学诠释学辩称，理解首先并不是一个受过程管理或是受规则管理的工作；它其实就是成为人类的条件。理解就是解释。如伽达默尔(Gadamer,

① 这里我几乎完全地聚焦于哲学诠释学或本体论诠释学，因为在本书其他部分中已对批判诠释学和激进诠释学的大致轮廓有所讨论。

② 根据里科尔(Ricoeur,1981)认为在诠释学解释中文本和人类行动之间有相似关系的看法，这里我是在可互换的意义上使用文本和人类行动概念的。

③ 我必需再次强调：在这里，置身于外的观察者不能按字面意思去理解，它不意味着解释者就是在观察时保持了一定的距离，或是从某种单面镜中去观察的。这个术语想说明的是一种存在于主体(解释者)和解释的对象(文本、人类行动)之间的认识论联系，在这种联系中解释者是不受解释行动影响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解释者是外在于解释行动的)。在这里成问题的是上面所提到过的理论态度：即认为认识者不是(或者不能够是)被限制在他(她)寻求理解的对象的领域之中的。关注对偏见的管理和追踪、将主体性编成条目、保存一个反思性的流水账、同行述职以及其他类似的工作(在定性方法论文献中的常见程序)都是与这种保持理论态度的命令有关的。

1970)所解释的,理解不是“人类的一种孤立行动,而是我们生活经验的基本结构。我们总是把某些东西当成某些东西。这是我们的世界取向的原始‘既定性’,我们不能将其化约为更简单或更直接的东西”(p.87)。

第二,在解释行动中(也就是“把某些东西当成某些东西”的过程中),我们并未将那些被社会历史性地继承下来的偏见和成见视作一个解释者为获得“清楚”的认识所必须努力摆脱或控制的特征或属性。相信这一点是可能的,就是假设那些形塑着我们理解努力的传统及相关预判都是很容易受我们控制的,而且可以随意地置之不顾。但哲学诠释学则辩称传统并非一些外在的、客观的和过去的东西——一些我们可以摆脱并保持距离的东西(Gadamer,1975)。相反地,如加拉格尔(Gallagher,1992)所解释的,传统是“一种进入所有理解的活生生的力量”(p.87),同时,“尽管事实上传统在大多数情况下只会‘在我们背后’运作,但它们却已经在我们前面规定了我们解释的条件”(p.91)。进一步说,由于传统“对我们是什么以及我们怎样理解世界起着形塑作用,想要跨出传统过程的努力就会像要钻出我们自己的皮肤一样困难”(p.87)。

这样,要达到理解就不能对自己的立场、预判、偏见或成见采取置之不理、逃避、管理或监控的办法。相反地,理解时需要加入个人的偏见①。如加里森(Garrison,1996)所解释的,偏见正是那种“虽然是试探性的,但为了在日常的思考、对话和行动中确定自己的方向又必需要有的(预判)……关键问题并不在于让我们自己摆脱所有的成见,而在于审视我们所持有的那些历史地继承下来且未经反思的成见,并改变那些使我们无法理解他人甚至理解自己的成见”(p.434)。我们“属于”某一传统,而传统又在某种意义上制约着解释,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我们只需在解释中再次展现出传统的偏见即可。尽管预想、成见和预判为解释者对某一物体或他人的理解提供了初始概念,但解释者在遭遇这些需要解释的东西时却需要冒这些成见的风险。

第三,只是在与那些未被理解的、异常的、对我们提出呼吁的东西的对话性遭遇中,我们才可以开放地冒险并测试我们的预想和成见(Bernstein,1983)。理解是参与性的、对话的、问答式的。它总是为语言所束缚,只能通过一种提问与回答的逻辑才可以获得(Bernstein,1983;Grondin,1994;Taylor,1991)②。此外,理

---

① 坦率地说,这一关于参与的概念需要比招认定位或简单地将“某人相对于要解释的对象来说的立足点”编出条目更多的东西。参与意味着以某人的姿态冒险,并接受生活于熟悉和陌生之间的持续的临界体验(Derdeman,1998)。

② 有人指斥伽达默尔的诠释学是一种语言唯心主义。格朗丁(Grondin,1994)为此撰文辩护说,伽达默尔坚持理解从原则上说是语言的,“因为语言包含着我们通过对话互相传递或希望互相传递的唯一的意义。正因为如此,诠释学允许自己使用这一句格言‘可以被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这里所强调的是‘可以’。理解本身是以语言形式出现的,而且处理的都是词句的事情,为了达到那通过语言而得到表达的‘存在’,理解必须能够使用语言的整体内容。理解的语言学本质较少地表现于我们的陈述之中,而更多地表现于我们斟酌字句以说出我们所思所想的这一过程中。对于诠释学来说,理解是用语言来表达的固然是真实的,但意义不大。相比起来,理解存在于一个无休止的‘召集词句’以及寻找可共享语言的过程之中是更富有建构性的。其实,理解就应该被理解为这个过程”(p.120)。亦可参见戴维(Davey,1991)与史密斯(Smith,1991)关于伽达默尔对陈述、陈述性语言以及逻辑的批评是否得到了正当性证明的讨论。

解是在这种问答中生产出来的东西,而不是某位解释者通过他(她)对自己试图理解的对象的分析而再生产出来的。他(她)在“弄明白”一项社会行动或文本的意义这一过程中所寻求的意义是暂时的、向前的,而且总是在特定的理解环境中出现(Aylesworth,1991;Bernstein,1983;Gadamer,1975)。

这种对意义的另类定义与解释主义认为人类行动是有意义的以及意义从根本上说是可以由解释者来决定的理念大相径庭。哲学诠释学对意义持一种非客观主义的观点:“文本(或人类行动)并非一个独立于对它的解释的‘外在客体’,它不能充当一个判断这些解释正确与否的审判官”(Connolly & Keutner,1998,p. 17)。格朗丁(Grondin,1994)注意到“就其形式而言,理解更像是参与一次对话,而非去把握内容和智识上的意义”(p. 117)①。换句话说,意义并非简单地被发掘出来,而是在解释过程中通过相互协商而得到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哲学诠释学反对那种关于意义的幼稚的实在论或客观主义,可以说它所认可的结论就是不存在一种终极的正确解释。这也是一部分建构论者所持的观点,但哲学诠释学认为意义并不一定是建构出来的(即创造出来或组装出来的),而更多的是协商而得的(即是一个达成妥协的问题)。伯恩斯坦(Bernstein,1983)对伽达默尔关于意义出现的前进性、开放性和前瞻性等特征的概念做了如下总结:

> 我们在理解和解释时,总是借助于我们的前瞻性预判和成见,而这些预判断和成见自身也是在历史过程中不断变化的。这就是为什么伽达默尔告诫我们要理解就必须要有差异地理解的缘故。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理解就是武断的和扭曲的。我们的目标永远应该是正确地理解什么是‘事物自身’(我们解释的对象)。但随着我们视界的不断变化,我们提出的问题会有所不同,‘事物本身’到底呈现了些什么也就不一样了。仅当我们预设一个文本自身就含有某种意义,而且可以不受我们预判的影响时,我们才可以说:这些对所有理解和解释所具有的正在发生的和开放的特征的分析都是歪曲的(p. 139)。

最后,正如上面已经提到过的,从遭遇中得到的理解类型总是会马上成为一种“应用”。换句话说,在理解行动中,不存在两个分离的步骤——第一步,获得理解,第二步,应用这些理解。理解本身就是一种在世界中获得的实践经验,也是一种关于世界的实践经验,这些经验部分地构成了我们在世界上所成为的形形色色的人。理解是“生活的”,或者说是(存在主义意义上)存在的。伽达默尔(Gadamer,1981)对此做了这样的解释:

> 像行动一样,理解总是存在风险的,而且从来没有留下过简单应用关于规则的一般性知识去理解各种陈述或文本的空间。在成功的理解之外,它总意味着一种内在意识的增长,这种意识是进入我们精神经验结构的新经

① 亦可参见海克曼(Hekman,1986,p. 145ff)关于人类行动的固定意义是维特根斯坦社会科学(例如,Winch,1958)、舒尔茨的现象学以及常人方法学中的基本社会科学分析单位的论断。

验。理解是一种冒险,像其他任何一种冒险一样,理解是有危险的……但是……它能够贡献一种新的特殊方法,这种方法有助于扩展我们人类的经验,扩展我们的自我知识,拓宽我们的视界,因为理解对任何东西的调节都是与我们自己的调节同时进行的(pp.109-110)。

将理解视为一种即时表现在实际选择之中、参与到实际选择之中(因此它是对实际选择有兴趣的),并关注实际选择的道德—政治知识,这种看法是哲学诠释学的一个中心因素,它(至少是部分地)是从伽达默尔和海德格尔的思想中引申出来的[如邓恩(Dunne)、加拉格尔、史密斯和泰勒等]①。

哲学诠释学并非"解决"误解问题或"解决"关于人类行动正确意义问题的方法论。伽达默尔(Gadamer,1975)反复强调过诠释学的工作"不是要建立一种理解的程序,而是要理清理解发生所需的条件。但这些条件从本质上说并不是解释者必须自动应用于文本之上的一种'程序'或方法"(p.263)。哲学诠释学的目标是哲学的——也就是说,去理解在理解本身的过程中究竟包括了些什么(Madison,1991)。

背景:第二部分

哲学诠释学和社会建构论哲学(如解构主义、批判理论、某些女权主义,以及新实用主义方法等)的先驱出现于那场声势浩大的、意在摆脱对于意义和知识的经验主义的、逻辑原子论的(logical atomistic)、指定的和再现的记录的运动之中②。逻辑实证主义和逻辑经验主义哲学主要关注科学知识的理性重建,使用的方法是对两种科学陈述(一种是解释性陈述,即理论与假设,另一种是描述性陈述,即观察)的语义分析和句法分析。在这种分析之中,理解的社会维度、文化维度和历史维度被视为是外在于科学的,因此它们与关于什么构成了真正的科学知识及其正当性辩护的任何有效的认识论说明都没有关系。逻辑实证主义工作的起点是将知识定义为对一种独立现实的正确再现,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它都

---

① 在伽达默尔和泰勒的哲学诠释学里,理解同时与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概念以及它表现为个人的、实验的知识和推理的独特形式(被称为 phronesis,或称实践智慧)相联系。后者(allo edios gnoseos,即"认知的另一种形式")要求"一种辨别出'何者为所需'的敏感、灵活和洞察力",它与被称为 techne 的实际知识形式形成鲜明对照(Dunne,1993,p.56)。伽达默尔通过以 phronesis 概念为基础对理解行动建模以及以实践哲学为基础对理解(诠释学)建模,将理解、解释和应用联系了起来(Bernstein,1993,p.154ff;Gadamer,1981)。

② 这一"运动"在实用主义(例如米德关于社会自我和语言社会性的理论,杜威的认知行为主义)、科学理论[例如 Quine-Duhem、汉森和库恩)、语言哲学(例如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奥斯廷和劳奇在普遍语言哲学方面的著作)、社会科学哲学(例如温奇)、知识社会学(例如伯格和拉克曼)、现象学(例如,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关于语言的理念)、常人方法学对一种作为经公开解释过的语言形式的情境行动的关注(例如加芬克尔)等领域中带来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大量相关发展。伯恩斯坦(Bernstein,1991,p.326ff)确定了一组在非常一般的意义上描绘了各种后经验主义哲学特征的实用的本质主题,它们是:反基础主义、彻底的不可知论、对自我社会特征的根本强调、培养建立一个研究者群体的需求、对于极端偶然性的意识,以及对人们无法从大多数传统中脱身的认识。

几乎只对建立起科学知识性的效度这个议题感兴趣。

泰勒(Talyor,1987)在其随笔《克服认识论》(*Overcoming Epistemology*)中辩称,逻辑经验主义(或更一般地说,任何基础主义的认识论)从一组联锁的关于意义、知识、语言和自我的预设中为自己汲取了力量。它包含了一种语言哲学,这种语言哲学可以被广义地刻画为经验主义和原子论,因为它预设:①词语或语句的意义是由它们与世界上的事物或事件的状态之间的联系所解释的(简而言之,这就是一种指定的语言观);②语言一定展示了一种规定着术语和语句之间可容许关系的逻辑结构(或句法);③我们不应该将语言的描述功能和评价功能混为一谈甚至相互混淆,以免"使那原本只是某种特定的文化编码或道德编码的语言披上了一层客观地描述世界的外衣"(Smith,1997,pp. 11-12)。

这种语言哲学所支持的认识论是对于某种外在现实的图像式描述或概念的再现。语言与推理被理解为一种在发现和整理现实世界过程中使用的控制工具(Talyor,1985a)。另外,再现的重点是自治的、参与的、认知的行动者,或如伯恩斯坦(Bernstein,1983)所描述的笛卡尔式的认识者①。确实,研究理论和知识理论从这种三方联结——一种语言的经验主义理论、一种自我的原子论,以及一种再现的认识论的结合——之中汲取营养的方法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但多数当代的社会科学实践(至少是间接地)仍继续受到认为通过某些再现的认识论来说明意义和知识是最好的方法这一理念的影响(Shapiro,1981;Taylor,1995),尽管已很少会有社会科学家还会再坚持一种关于再现的粗略响应理论,或是天真地接受再现是模仿的看法。

社会建构论

社会建构论认识论的目标在于以各种各样的方法来"超越"再现主义者(representationalist)认识论②。他们的典型做法是使用一种日常的、无争议的、平淡无奇的建构论为起点,对这种建构论可做如下描述:从一种相当平常的意义上

---

① 泰勒(Talyor,1995)将此称为"第一人称单数的自我";"主要是作为再现主体的人类行动者。这里的再现首先是关于外在世界的再现,其次是关于人们所期望的或所恐惧的终极的描述性再现。这里的主体是单一逻辑的主体。我们与一个'外在的'世界——包括其他行动者、我们和他们所面对的对象、我们自己的身体和他人的身体——处于联系中,但这种联系是通过我们'内在拥有'的再现而得到的。这种主体首先是一个内部的空间,一种使用老术语学的'心智',或者说(如果我们使用当今流行的计算机化模型的话说)是一种能够处理再现的机制。"(p. 169)

② 受篇幅限制,我决定仅集中讨论社会建构论及与其对立的心理建构论。在此我主要关注的是与那些在解释什么构成了公共知识时力图将社会政治因素与认识关注结合在一起的哲学。当然,心理建构论也在强调知识建构中社会因素的重要性,但他们的主要兴趣在于理解这些因素如何在个体的认知行动中扮演重要角色。在社会科学、心理学和教育中,社会建构论视角与心理建构论视角之间及其内部都存在着大量差异(Gergen,1994a,1994b;Phillips,1995,1997a,1997b;Potter,1996),本书中对这些差异难以详述。不仅如此,在术语学中存在的差异也是容易导致混乱的。例如,菲利普斯(Philips)区分了社会建构论和心理建构论;格根(Gergen)将前者称为社会建构论,将后者称为建构论。我在此使用了建构论者和建构论这样的术语来称呼这一连续谱中"社会"的一端。

说,如果我们相信心智在知识建构过程中是主动的,那么我们就是建构论者。我们中的多数人都会同意说认识不是被动的——不是一种简单的将可感知的材料烙印在自己心智之中的过程——而是主动的,也就是说,精神对这些印象做了加工,至少建立起了一些抽象和概念。从这个意义上说,建构论想说明的是:与其说人类发现或揭示了知识,倒不如说人类建构或制造了知识更为恰当。我们发明了概念、模型和图表来弄清经验的意义,同时我们又不断地根据新的经验来检验和修正这些建构物。此外,这种建构还不可避免地具有历史的和社会的维度。我们并不是孤立地建构我们的解释,而是以一种共有的理解、实践、语言等为背景来开展建构工作。

这种通常意义上的建构论亦被称为当代认识论中的视角主义(perspectivism;Fay,1996)。这种观点认为所有知识主张以及它们的进化都发生在一个对世界进行描述和解释的概念框架之中。视角主义反对那种幼稚的实在论以及经验主义认识论,因为后者坚持认为存在着某种对经验世界未经调整的、直接的把握,并认为知识(亦即心智)不过是对"外在"物的简单镜像反映。

社会建构论哲学同样反对这种关于再现的幼稚的实在论观点。但它们在否认自己对关于现实的本体论有任何兴趣这一方面常常走得更远。例如,波特(Potter,1996)在近期著作中详细说明了认识论传统和对话分析传统中的建构论。他的观点建基于对语言和知识的再现理论的批判之上。他辩称"世界……是按照人们谈论它、写作它和讨论它的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被建构出来的"(p. 98),但他坚持认为社会建构论根本不是一种本体论的教条,因此它不会对何类事件存在着以及它们的地位是什么之类的问题发表看法。他最主要的关注点是:一个描述性的发言如何经过社会的(也就是互动的)加工后改头换面,变得看起来似乎是稳定的、事实的、中立的、独立于发言者的,而且只是镜像地反映了世界的某些方面。举个例子,波特强调说"就像国际市场上的货币一样,真理可以被视为一种商品,它是被逐步建立起来的,会不断波动,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再现程序来予以加强或削弱"(p. 5)。对波特而言,社会建构论感兴趣的是发言是如何"工作"的,而他们(这些发言)如何工作这个问题既不是对如何构筑对世界的精神反映的认知分析,也不是对词语和语句之间句法联系的逻辑分析或是对语义内容的经验分析,而是一种对社会实践的理解以及对特定种类的话语表演中的修辞策略的分析①。

与波特类似,邓津(Denzin,1997)辩称话语是一种构建再现与描述的物质实践。他赞许地引用了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的说法"人们不可能在某一特定社会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类型之外来体验这个社会的'真实联系'"(p. 245)。同样地,格根对于所谓的"真实"也颇表怀疑。他主张社会建构论在本体论问题

① 在这种对于语言如何被用于完成某些事情的强调之中,我们可以发现某些与非正式逻辑中产生的某些议题相平行的议题,诸如不是在推理逻辑的意义上,而是在适合于不同论辩计划或对话类型的标准意义上进行的描述、评价、推论和争论(Van Eemeren, Grootendorst, Blair, & Willard, 1987; Walton, 1989)。当然,对于受到极端视角主义或能者的无限表演(*the infinite play of signifiers*)影响的社会建构论者来说,对争论的研究并没有太多理由。

上采取的是一种沉默和不可知的态度:社会建构论对于“外在的世界”既未肯定亦未否定。在格根看来,社会建构论不过是“一种欢迎栖居的智识形式——一组命题、论断、隐喻、叙事及其他诸如此类的东西”(Gergen,1994,p.78)。格根赞成一种关于社会意义的关系理论——“正是人类的互相交换,使得语言具备了表意的能力,这一点应该成为关注的焦点”(1994a,pp.263-264)——他还声称,社会建构论就是邀请人们与一些可能性和实践共舞,这些可能性与实践依靠联系的多种多样的形式来保持自身的一致性。

所有这些观点都与被称为意义现实主义的观点相左——意义现实主义的基本观点是:意义是可被发现的固定实体,它独立于解释者而存在。就这个问题而言,这些社会建构论的观点与哲学诠释学一样都对把意义视为客体这种做法有着广泛的批评,同时它们表现出一种对“意义形成”概念的亲和。这两种哲学都赞同语言的表现主义—建构论理论,从广义的理解看,该理论将语言理解为一种行动系列,我们在此系列中来表达和认识世界中“存在”的确定形式。在他们看来,语言从根本上说既非主要是一种在获得关于世界的知识这一客观过程中所使用的工具,也非“一种我们用以整理世界中事物的工具,而是那些使我们可以拥有现在这个世界的东西。语言使揭示人类世界成为可能”(Talyor,1995,p. ix)。这样,社会建构论与哲学诠释学的鼓吹者们可能会在以下主张上达成共识:我们是自我解释的人,语言建构了人(或者说,如伽达默尔和海德格尔已经解释过的,我们栖居于语言之中)。

但二者的相似性也就仅限于此了。尽管哲学诠释学从理论上反对将意义视为客体这个意义上说是“建构论”的,但它却相信语言(会谈与对话)有揭示意义和真理的潜力(Gallagher,1992;Smith,1997)。伽达默尔和泰勒都认为,在解释这个问题上存在着一种“真理”,但这种真理被构想为一种在实际解释实践中逐渐显现出来的揭示过程,而非如传统认识论所构想的是“一种在某个客观对象与某些再现的外在意义之间一一对应的联系”(Smith,1997,p.22)。与伽达默尔和泰勒的观点截然相反的是,许多(但并非全体)建构论者坚持认为在解释这个问题上不存在什么真理。

“弱”建构论与“强”建构论

社会建构论有一个一般性的预设,即知识并非是客观的、无偏见的、不关心政治的,它没有排除情感的影响,而且包含人类经验的各个方面,相反地,知识从某些意义上说是带有意识形态性的,是政治性的,而且充斥着价值观(Rouse,1996)。这一预设同时适用于弱的解释和强的解释。对社会因素在建构正统的、正当的或者说是真实的解释过程中所扮演角色的弱的或中度的解释可以恰到好处地拒绝对诸如知识、正当化、客观性和证据等这些在再现主义—经验主义—基础主义联合体中发展起来的概念的定义。但这种视角尝试着在另外一种认识论框架中来重铸这些概念,从而保留了一些判断解释是好是坏的方法。而对社会因素在什么建构了合法知识这个问题上所扮演角色的一种强解释或激进的解释

则带来了一种更为极端的怀疑取向,甚至会导致一种虚无主义取向。

"弱"建构论:一个说明

朗吉诺(Longino,1990,1993a,1993b,1996)在女性主义科学哲学的语境中提出了社会建构论的一个温和版本。她的目标在于发展"一种既揭示知识建构的意识形态维度,同时又为科学理论和研究项目的比较性评估提供标准的研究理论"(1993a,p.257)。朗吉诺辩称许多对科学的女性主义批评——包括立场认识论和心理动力学视角——都正确地指出了传统认识论的缺陷:过分排他地聚焦于证明科学知识正当性的逻辑,而忽略了发现的方法或直觉试探法的偏见。她给出了一些例子说明直觉试探法(例如男性中心主义、性别歧视,以及性别意识形态等)如何"限制了假设在特定研究领域的活动中被接受"以及不同的直觉试探法如何使不同的假设被接受(1993b,p.102)。尽管这些女性主义认识论在(通过引入不同的直觉试探法来)帮助"重新描述获取知识的过程"这个意义上说成功地批判了经验主义,然而它们却止步于此了,因为它们无法为我们充分说明如何去选择并证明那些看起来是冲突的知识主张。总而言之,朗吉诺声称许多女性主义认识论在"描述"的意义上说已经相当充分了,但在"规范"的意义上(或称在"规定"的意义上)说还是不充分的。

朗吉诺(Longino,1993)为如何使描述和规范相结合所开出的解决方案是她所称的"语境经验主义"(contextual empiricism)。她为那种认为真实世界制约着我们的知识建构的温和经验主义进行了辩护,宣称基于经验或基于观察的数据构成了假设和理论效度的最难拒绝的基础。与此同时,她断言用来生产、分析和组织数据并将证据与假设联系起来的方法并非控制在一个自主的、无约束的、无实质的主体、认识者,或是理想型的认识行动者手中。相反地,这些事情都是"语境化"的,因为它们是由一种受主体间性决定的背景预设的语境所构成的,这种背景预设是"社会价值和意识形态在研究中得以表现的媒介,它们被精妙地铭刻于理论、假设,以及定义研究项目的模型之中"(1993a,p.263)。

因此,这些背景预设必须接受概念上和证据上的批评,而只要我们仍然死抱着知识是个人认知过程的一种产物的看法,这些批评就不可能存在。但在朗吉诺(Longino,1993b)看来,如果我们将研究与知识生产的实践构想为一种社会过程,并承认客观性是社会互动的函数这一命题,我们就可以开始探索如何去有效地批评这些背景预设。朗吉诺继续解释说"对背景预设的有效批评要求展示和表达出其他可供选择的观点……(这些观点)能使我们发现社会价值和兴趣如何在一些研究项目中得到昭示——若非如此,这些项目原本或许是可以被人接受的"(p.112)。她提出了一组必要的标准,它们可以使给定的科学共同体"获得批评话语不断变化的维度",包括:已被认识到的批评路径/论坛;共同体对批评的回应(而不仅仅是对批评的宽容);共享的评估标准;以及智识权威的平等(p.112)。

朗吉诺倡导一种社会认识论,在这种认识论中,与社会文化实践相联系的意

识形态论题和价值论题与科学研究中的经验论题交织在一起①。她似乎在走一条中间路线,虽然也承认科学知识部分地是社会协商过程的产物,但并未声称科学知识仅仅是社会协商的事情而已。同时,她公开赞同客观性,并强烈地维护研究理论的规范的一面,这样她就明确地避免了那种认为各种解释都各有所长的相对论观点。最后,正如许多女性主义认识论者一样,朗吉诺不仅预设了一种有具体定位的认识的本体论,而且以它为基础建立自己的理论。这种本体论与其说是再现的,毋宁说是更为互动的、关联的和对话的(Rouse,1996)。

"强"建构论

这种取向发展的路径之一是这样的:一些激进的社会建构论者从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这一概念(温奇 1958 年对此给以了详细说明)中得到启发,开始以语言嵌入于社会实践或生活形式之中为前提开始研究②。不仅如此,规制着一种生活形式的规则给生活划定了范围,并使这种生活形式与其他形式相隔离。因此,只有在某一特定的生活形式之中并以这种特定的生活形式为参照,我们才能描述和解读一个行动的意义(Giddens,1993)。理性地评价信仰的标准完全依赖于语言游戏或这些信仰赖以成长的生活形式。这样,不同语言游戏的意义或生活的不同形式之间是不可通约的。一旦这种观点与对根本概念差异的坚持(它在许多观点认识论中经常如此)相结合,就很容易导致认识论相对主义。费伊(Fay,1996)解释道:在认识论相对主义中,"在内容、意义、真理、正确等问题上不允许任何跨越框架的判断,认知的、伦理的或美学的信仰、主张、经验或行动的合

---

① 这是一种努力和尝试,它试图将保持我们的知识主张提到了某些东西或是"有关"某些东西,而非仅仅是"能者的无限表演"这一概念的社会议题与经验议题交织在一起,史密斯(Smith,1996)为这种努力提供了另一个例子。

② 这里我所关注的是不断强调社会因素在知识建构过程中所扮演角色的优先性的强解释,而非那些认为社会因素应被取消的观点。例如,在支持某种激进社会建构论观点的文本中,常常会引用尼采(Nietzsche)的激进视角主义和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但它们对于社会建构论其实支持甚微。尼采(Nietzsche,1979)坚持认为意义(真理、知识)只不过是社会协商过程的产物:"……因此,什么是真实的? 就是一组变动的隐喻、转喻、人神同形同性论……它们经过长期使用后似乎对人们是固定的、经典的、必修的;真理是幻象,是一些人们已经忘记了它们是幻象的幻象。"(p. 174)但对他来说,价值的社会建构必须得到承认并且被认真地批评,其目的在于为个人的价值建构开路并且为之提供正当性证明。这些所谓的社会真理,正如史密斯(Smith,1997)所解释地,乃是"与生命相敌对的,这里的'生命'指的是一种生机勃勃的创造性能量的力量、一股拒绝控制着真理主张的概念分类的感觉特征潮流"(p. 17)。尼采的目标是自我创造和自我转型。德里达(Derrida,1976,1978)似乎也持同样的观点,尽管对此我不敢十分地肯定。一方面,德里达对于任何呼吁或试图再生产出某些巨大的、更为包罗万象的框架的解释都表示出相当的批评(或怀疑)态度。他辩称读者个人有责任去释放或激活文本中的文本性,但这就意味着读者必须使他(她)自己对文本开放,因为任何对文本的新阅读都不仅仅是读者自身的行动。意义是在能指在包含了文本和解释者的文本性舞台上的表演中被建构起来的。但德里达声称对于这种解释过程不存在任何主观的和反思性的控制。这样看来,他似乎赞同对于意义的个人建构,但同时又坚持不存在意义或解释的主观区域(Derrida,1976,1978)。肯定地说,我在此描述的观点与尼采和德里达的观点之间存在一种亲和性。这三种观点都在不同程度上预设了,就我们自己的主观价值和视角(或我们所处群体、社区、文化等的价值和视角)而言,我们所遇到的所有东西都是一种解释。这样,对这三种观点的认识论取向可以做如下归纳:"所有的知识都是解释;解释永远是充斥着价值的;价值是对某些异质的、非认知的能力、过程或事件(诸如渴望的力学、历史,或权力意志)的终极表达,因此,真理的主张就是对这些非认知的能力、过程或事件的终极表达。"(Smith,1997,p. 16)

理性只能在一个特定的概念框架中被决定"(p.77)①。

令人不解的是,尽管如格根和邓津这样的激进社会建构论者明显地赞成语言游戏之间或生活形式之间的不可通约性,但他们同时又声称社会建构论哲学会以某种方式带来人类条件的改善。格根(Gergen,1994a)辩称知识是社会过程的产物,所有关于"真实的"、"理性的"和"好的"的陈述都是各种特定解释者社群的产物,因此这些陈述是颇可怀疑的。但他又将自己的社会建构论哲学与一种有关民主化、可能性和重建的议程联系起来。格根期望社会建构论应该首先成为一种扩展关于人类实践的对话范围并使这种对话更为民主的手段,一种使这些实践服从于某种连续的反思过程的手段。

类似地,邓津(Denzin,1997)在为后现代主义解释人种学进行辩护时,坚定地拒绝了他称为现实主义认识论的理论,这种认识论"断言我们可以生产出对世界的精确再现,而且这种再现真实地描绘了真实经验的世界"(p.265)。他为那种从定位于历史与文化之中的个人角度出发来研究经验世界的观点认识论进行了辩护。但与此同时,他也对某些惯于撰写道德的和寓言体的传奇的人种学实践表示赞同,撰写这些传奇的目的不仅仅是记录人类的经验,而且在于展示文化差异或唤起我们对于他文化的注意。在邓津看来,这些道德传奇是一种为读者赋权的方法,一种使读者发现关于他们自己的道德真相的手段。

另一种类似的悖论在这两种强建构论观点中都有明显的表现。我们可以追问格根:既然我们并无标准来比较在各种各样的框架中哪一种是更好(更为公正、更为民主等)的实践,而且我们从这种比较中既不会得到认识的收获也不会有损失,我们为什么要耗费心力来加入这种对话呢②?我们也可以追问邓津:在从定位于历史和文化之中的经验的比较之中产生的解释这个问题上,难道道德传奇的创造没有预设一种(道德)真理的存在吗?难道这样一种动向没有站出来说:我们需要某些标准来厘清真正的道德真理并使之正当化,从而使这些真理与单纯的幻象或信仰得以区分吗?

总结:永久的议题

定性研究运动建基于一种对于理解他人在做什么或在说什么的深刻关注之上。解释主义哲学、哲学诠释学,以及社会建构论提供了投身于这种关注的不同方法。然而有几个持久的议题是跨越了这三种哲学的,每一个定性研究者都必须运用这些哲学(或其他哲学)的资源在这些议题上达成一致。其中三个最为明

① 这只是从认识论现实主义迈向本体论现实主义的一小步:如果我们所能知道的现实都取决于我们特定的概念框架,那么现实不也就仅仅是它在我们概念框架中的呈现吗(Fay,1996;Smith,1997)?

② 在与泰勒(Talyor,1988)交换意见时,格根(Gergen,1988)驳斥了强评估的理念或是确定某些解释是否比其他解释更好的可能性。不仅如此,格根(Gergen,1994a)还(错误地)解读了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认为后者同意存在某种类型的意义"本质"。在我看来,格根并没有充分地理解伽达默尔和泰勒关于传统不能穷尽作为实践理性的解释的观点。

显的议题是:①如何定义“理解”的真实含义以及如何证明“去理解”的主张是正当的? ②如何根据广泛的设想来建立研究项目的框架? ③如何去想象并占据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研究主体、信息提供者、被调查者、参与者、合作研究者)在作为一种“社会世俗性的”情境或事件的“研究”之中彼此联系的伦理空间? 以及相应地,如何决定研究者在他(她)研究的社会中的角色、地位,如何确定他们在社会中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这些认知的、社会的和道德的议题很明显是相互交织的,但出于分析的目的,在此将对它们做分别论述。

理解以及使理解合法化①

所有那些做了解释性转向(Hileyetal,1991;Rabinow & Sullivan,1979)的定性研究者都有着一组共同的承诺。他们对唯科学主义持严厉批评态度,并拒绝那种关于不受约束的、控制的、工具性的自我的人种学(Smith,1997;Taylor,1995)。他们始终坚持认为包含在理解他人过程中的认知要求不可能通过使用带有逻辑经验主义特征的基础主义认识论预设(例如,观察的中立性,经验的原初“既定性”,经验数据对于理论框架的独立性等)来得到满足。解释主义、所有形式的社会建构论(包括尼采的视角主义、新实用主义,以及解构主义),以及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都“坚定地拒绝了这样一种理念,即存在任何根本的、不依赖于精神的、永久固定的现实,这种现实可以不通过人类建构的中介而直接被把握甚至被明智地思考”(Shusterman,1991,p. 103),至少在人类研究的领域内是如此。换一种多少有些不同的说法,就是有关他人在做什么和说什么的知识一定依赖于其他意义、信仰、价值观、实践等提供的背景与语境。这样,事实上所有关于人类科学和理解的后经验主义哲学自始至终都是一种解释。

但是在定性方法论中关于理解的认知要求并不仅限于以上关于解释是无可避免的主张。我们有必要阐明这种旨在服务于我们理解努力的解释性转向的后果②。广义地说,当前辩论的特征可以用两组不同的后果来描述。

“强”整体论(strong holism)

一方面,存在着“强”整体论,它辩称鉴于我们总是通过解释来看(理解、了解)一切这一事实,我们必须得出结论说,事实上一切都是由解释组成的。根据知识是视角性的和语境性的这一事实,他们得出了一个很强的怀疑论的结论,认为完全不可能判断说某一特定的解释比其他解释更正确、更好或更坏。

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证明一项关于他人正在做什么或说什么的解释是否正当的问题就变得无关紧要了。至于这种证明为什么变得无关紧要,又是怎样变得无关紧要,这取决于我们所讨论的强整体论的特定类型。正当性证明之所

---

① 可参见本书第 34 章中对于判断是否达成了理解的标准和认知要求所进行的更为详尽的讨论。

② 这里开展的讨论非常接近于博曼(Bohman,1991a,1991b),他首先提出了对强整体论和弱整体论的划分并倾向于后者。我并不一定同意他将伽达默尔、罗蒂、德里达、哈贝马斯等人的观点标注为这样两种整体论的划分方法,但这种分类和厘清工作与我在此想讨论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是无关的。

以变得无关紧要,可以是因为解释总是被视为“我们的”解释,从而成为一种仅仅反映了种族优越感的解释(Hoy,1991),也可以是因为解释总是被认为仅仅表达了一种个人的或政治的主体性,还可以是因为人们预设一项解释从来不能超越其自身范围,它无关乎对意义的正当性证明、揭示或澄清,而是“文本主义的”,被纳入了所谓能者的表演的更大游戏中①。受后现代人种学以及其他相关智识潮流的影响,大量关于定性研究的现代文献(如 Clough,1998;Denzin,1994,1997;Lather,1993;Richardson,1997)似乎更倾向于某种形式的强整体论。类似地,一些从事对科学的社会研究的激进社会建构论者——诸如拉图尔(Latour)、伍尔加(Woolgar)、诺尔—塞蒂纳(Knorr-Cetina)、巴斯(Barnes)、布卢尔(Bloor)——也建立起了关于科学知识的强整体论主题。

如何评价相互竞争的(或不同的、矛盾的)解释并在其中做出选择这一议题带来了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构成了理性行为?在各种备选解释中做一个合理的选择又意味着什么?通常情况下,在强整体论或怀疑的整体论中一个普遍的预设是“如果我们不能得到普遍的固定标准来测量几个相互竞争的解释是否有说服力,那么这就意味着我们没有一个理性的基础来区分好的解释和坏的解释,以及区分更有说服力的解释和较少说服力的解释,无论这些解释是针对文本的,还是针对行动的,抑或是针对历史重大事件的”(Bernstien,1986,p. 358)。在给定基础的标准不可能存在的前提下,强整体论者可以得出以下几种典型结论中之任何一种:①他们坚持认为要保持理性这一理念就需要解构;②他们赞同一种非批评的观点多元主义(例如,“多重现实”、许多被同等程度接受的解释等),这种多元主义不要求比较评价;或者是,③他们声称修辞学标准——某项解释是否去鼓励、劝说、强迫、容纳、唤起或取悦——是判断某个解释是否比其他解释更好的唯一适当标准②。

弱整体论(weak holism)

弱整体论或称非怀疑的整体论辩称:我们从关于他人的知识总是依赖于理解的背景这一事实得出这样一些相对主义的、怀疑的结论(甚至更为糟糕的,一些虚无主义的结论)是既无必要亦不值得的。弱整体论主张背景(所有理解的“仲裁”)还“没有强到足以成为一个固定的限度或是强到使人们完全不可能在

---

① 加拉格尔(Gallagher,1992)这样解释德里达的观点:“解释仅仅在能指的可区分系统内部发生,而且无须乞灵于指示物的形而上学现实……德里达激进的表演原则是一种尝试,尝试去(从内部)揭示现实中的形而上学信仰和指示物的身份——客观性、主观性、呈现、存在、真理,或任何其他的在西方传统中运作的形而上学概念。”(p. 283)

② 解构主义或激进社会建构论(以及罗蒂的实用主义)并不把缺乏基础的标准视为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史密斯(Smith,1997)解释道:“相反,对基础的需求将激发一种野心,而这种野心正是哲学中传统的弱诠释学(解构主义)所希望克服的。据称以往哲学中的基础主义鼓励了一种对于‘他性’和‘不可通约者’的不宽容。而弱诠释学可以采用策略的形式来绕开或彻底推翻那种对于那种据信是可以使权力和控制得以实施的理性回答的需求。这种后现代策略的目标就是在思想中为那些据称未被推理同化的东西——如多样性、异质性和差异——提供空间。”(p. 18)

以证据为基础的解释之间进行标准化选择的程度。事实上这种评价总是可比较的、可能犯错误的、可修正的,因为随时有可能出现一个更好的新解释,它既包含了旧解释的长处又避免了旧解释的短处”(Bohman,1991a,p.146)。

弱整体论试图说明什么是决定一项解释是否“有效”或正当的理性基础。但试图证明解释为正当的方式实在是太多了。例如,如上面已解释过的,博曼(Bohman,1991b)、费伊(Fay,1996),从某种程度上说还包括朗吉诺似乎都坚信以下观点:对一项解释的正当性证明应当服从于具有内在一致性和以经验约束为基础的正确性这样一些认知规范。其他的弱整体论者则期望以实践推理为基础来重新定义理性,也就是说,“我们如何能够做比较判断并寻求用好的论证和推理来支持这些判断,而实际上又是如何做的”(Bernstein,1986,p.358)。例如,伯恩斯坦(Bernstein,1983,1986,1991)的“非基础实用人本主义”(他发现罗蒂、哈贝马斯和伽达默尔都讨论过这个主题)给出了一个以习俗、实践、话语及实际真理等主题为基础的弱整体论的例子。伽达默尔(Gadamer,1975)辩称尽管理解行动不能被模式化为一种对客观对象进行确定分析以生产出一个最终的、完全的或确定的解释的过程,但无论如何,从理解是一种实际—道德的知识这一事实中,我们可以看到理解确有规范的一面。泰勒在说明如何在彼此对立的解释之间做选择时,不承认存在任何对经验证据的诉求或是存在任何可以决定性地确认某项解释是否正确的固定标准。但他又发展出一套论断,认为相比较而言,扎根于一种实用理智的叙述形式以及与他关于事件只是对于我们人类才有意义的特定说明相联系的解释是更具优越性的。在泰勒看来,什么被认为是更好的解释这个问题其实就是一种经过正当化证明的、由一个解释转向另一个解释的运动过程①。

为解释性项目定位

定性研究研究者们共同参与的解释性项目到底有什么社会的和科学的目标或目的?在这个问题上研究者们几乎没有什么共识。许多定性研究者们将项目平等地定位在一个解放的议程和一个变革的议程之中。一部分新实用主义者、批判理论家,以及女性主义者则全力投身于旨在批判和摧毁不公正、不民主的教育和社会实践并使之转变的解释工作之中(Howe,1998)。

其他的新实用主义者以及一部分哲学诠释学的捍卫者们则共同拥有一种普

---

① 史密斯(Smith,1997)对泰勒的评价概念做了如下总结:“某一特定的实际评判是否正确,完全取决于这一运动(即正文中所云对更好解释的选择其实是由一个解释向另一个解释的运动。——译者注)两端的解释性位置所具有的相对优势大小。因此,是否得到理智的支持并不一定是根据某些固定标准——这种固定标准被认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而不必依赖于自我解释的语境或视界——来判断的……当特定的推理明显地展示了特定的、具体的案例中的认知收获或认知损失时,它就会很好地运作。要达到这一目标的典型方法是通过确认并解决原初解释中的矛盾、指认出解释所依赖物的混乱,或是承认某些被解释所遮蔽的因素”(p.61)。请注意这些可以产生清晰易懂的发言的办法并不是判断解释自身是好是坏的标准。在决定哪些东西可以被计为一种“认识的收获”时,不能孤立地考虑,也不能脱离实际的解释情境。我曾借用这种没有标准的弱整体论的理念来对评价判断做过详细说明(参见 Schwandt,1996,1997)。

遍的启蒙信仰,相信批判性反思可以改变我们的命运。但他们更多地是将解释项目与对话、交谈,以及被理解为一种可自我变革的解释性交换的教育联系起来,而非直接地将其与政治变革相联系。他们更多地将产生于解释之中的理解视为一种对意义的参与、对某种传统的参与,以及从最终意义上说对某种对话的参与,而较少将其视为一种可由我们随意地将其“应用”于后续行动之中的东西(Grondin,1994)。在他们看来,批判性的解放——从再生产的、霸权的、权威的结构中得到解脱(或逃脱)——从来就没有得到完全实现。批判性反思总是以自主性和权威性为特征的。如加拉格尔(Gallagher,1992)所解释的,对解释项目的这种构想方式并未否认解放以及后续变革的可能性,它所否认的只是绝对解放的可能性:“解放是一个在教育经验中不断前行的过程,而不是一种批判反思的最终结果。”(p.272)

许多后现代主义者对于解释项目的解放性框架或是对话框架表示了高度的质疑。他们转而选择将解释看作一种自发的演出或是一种揭示了诸如自我、认同、客观性、主观性、呈现、真理和存在等概念的多重意义的持续解码过程。

这些建立解释项目框架的不同方法喻示着定性研究是一项充满了自由争论的运动,至少在内部是这样。它是研究者们的一种松散联合,大家似乎只有在共同反对我们前面称之为基础主义—经验论—再现主义信仰集合这一点上才能找到共同语言。

种族的和政治的考虑

社会研究是一项实践,而非一种简单的认知方法。理解他人在做什么和说什么并将这些知识转变为公共的形式包括着道德—政治的承诺。道德议题产生于以下事实,即一个关于知识的理论总会受到某种有关于人类行动的特定观点的支持。例如,泰勒、邓恩及其他学者辩称基础主义—经验主义—再现主义集合建基于一种超脱和客观化的取向之上:主体(认识者)操控着理解的对象并与之形成一种对立关系。不仅如此,社会研究实践的政治维度还与“合法性理由的政治学”——它被鲍曼(Bauman,1992)描述为现代国家兴起过程中的中心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样,社会研究的实践(包括定性研究,但决不仅仅是定性研究)也难以避免地会受到来自现代性文化的核心力量——技术化、制度化、科层化和专业化——的影响①。

当代大量对于民族志现实主义的批判——或更为一般地称作“民族志中的再现危机”——都受到了社会研究实践的道德标准和政治标准的引导,而非仅为社会研究实践的认知需求所引导。这中间的问题在于:如何回答基础性的问题?在我所研究的这些人面前,我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针对这一问题,至少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回答。普拉斯(Prus,1996)的回答坚决地贯彻了超脱的解释主义传统,他维护着一种可能被某些定性研究者批评为常规的、现代性的,甚至是危

① 参见卡尔(Carr,1997)关于教育在20世纪中转化成为一种学校教育的过程是如何与一种解决教育研究的现代“系统的”方法相伴随的讨论。

险的观点,即把研究者看作一个"力图在田野工作和最终产生的文本中将研究者的武断降到最低程度的人……研究者的形象更像一条变色龙……他可以几乎没有困扰地适应环境,他的工作使他人的生活世界以一种尽可能完全而且不受阻碍的方式得以呈现"(p. 196)。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邓津(Denzin,1994)的观点,他的目标是:

> 去创造一种凝视和理解的形式,这种形式要适合于我们称之为后现代的当代大众传媒电影社会。这种凝视从内部破坏了福柯所说的监狱中那种冷静的、分析的、抽象的、偷窥的和有纪律的凝视。这将是一种更新的、更温和的、富有同情心的凝视,它所追求和渴望的不是技术的、工具的知识,而是深度的、(存在主义意义上)存在的理解(p. 64)。

人们应如何去理解普拉斯和邓津所描述的研究者伦理—政治取向之间的差异,在处理自己作为一个研究者的伦理—政治承诺时又会做出怎样的决定,这部分地取决于他(她)为这一类的情境赋予意义时所使用的伦理框架①。这种观察将我们带入了伦理与道德哲学的领域,进入了一个已经超出了本章讨论范围的主题。就当前的目标来说,我们只须简单地指出目前围绕着道德认识论的标准框架正在开展相当活跃的、持续的对话与争论便已足够。

简要说来,这一标准框架包含着下面的共同核心理念:①道德是道义论的(主要关注道德义务和承诺);②道德观点的标志是公平性和普适性;③权力与义务间的冲突完全可以通过争论方式得到解决。这些理念总合起来,就构成了一种对于道德的偏重形式主义的理解。这里的形式主义说的并不是那场广为人知的关于什么是更好的伦理形式理论的争论,而说的是在标准框架中,道德观点是按照形式标准来定义的。形式优先于内容,正如维特莱森(Vetlesen,1997)所解释的:

> 普适性、公平性和非人格性——这些有助于定义"道德观点"的形式标准——现在已成为某个给定项目为达到拥有实际道德内容的条件而必须拥有的特征。换句话说,只有那些使自己服从依赖于(这些)形式标准的判决与合意性解决方案的议题、问题、难题和两难处境……才可以有资格被称为是内容"道德"的(p. 4)。

尽管萨特、布伯、马塞尔、列维纳斯、鲍曼和诺丁斯这些思想家的观点有很大差异,但他们却都对标准框架中定义道德的方式表示了异议。他们都呼唤一种亲密的伦理、关怀的伦理、靠近的伦理,或是一种联系的伦理,他们还坚持道德的理论化必须依靠一种经验的基础,特别是我—你关系的经验。本纳比(Benhabib)将这种取向与那种标准的道德理论化方式的取向以如下方式进行了对比:"那些最使我们着迷以及最为打动我们的道德议题并非产生于政治和经济

---

① 理解如何去面对了解他人的情境在很大程度上也与研究者的角色和责任是怎样被那些宰制着大学的话语所塑形着的有关(Derrida,1983)。这个主题在本书第3章中已被讨论过。

的公正问题之中,而正是产生于我们与他人在'血缘、爱、友谊和性等方面'的关系质量"(转引自:Vetlesen, 1997, p. 4)。这些联系要求的是被纽斯鲍姆(Nussbaum)描述为"关注"——"随时可以被他人的困厄所打动"、心甘情愿地"被他人的生活所触动"(p. 162)——的东西。再来就轮到规范性的关注了,它要求的是一种语境的和叙述的认识方法,而非形式的和抽象的认识方法。这里的语境既指每个个体特定的历史、身份和表意—情感的建构,也指在这些个体带着他们的历史、身份和表意的定义相遇时彼此之间的联系。这两个因素是由叙述联系起来的。

不仅如此,正如鲍曼(Bauman,1993)所观察到的那样,由于这些关系是高度随机应变的和语境化的,道德行动本身"具有一种地方性的矛盾性,它总是以一种不确定的方式将区分关心与宰制以及区分宽容与冷漠的分界线串连起来"(p. 181)。道德的这种与生俱来的脆弱性、不稳定性和无法解决的矛盾性意味着道德生活无关乎决策、计算和程序。相反,它是"一种无基础的、非理性的、不可争论的、未给出理由的,而且是不可计算的强烈欲求,希望向他人伸展,去爱抚,去为了些什么而存在,去为某种目的而生活,去使可能的发生"(p. 247)。鲍曼(Bauman,1995)后来又补充说,从以这种观点看来,道德生活总和起来就是一种"在有适度吸引力或无吸引力的偶然性之间的一串永无止境的解决方案"(p. 66)。这里,"解决方案"的概念不同于经过计算的决策,它不是人们在运用某些原则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同时也没有固定的程序。

在这种思考道德生活的思路中,完全没有关于道德是一种在相互竞争的道德主张之中通过争论得到的解决方案的思想。道德的碰撞并不意味着随后而来的规则,而是意味着表达和沟通。不仅如此,在这一框架中不存在关于那种目的论的、自由主义的理念,认为道德进步是由一种关于社会乌托邦的想象力(尽管这种想象力是不完善的)或是一种相信我们的价值和道德能力可以进化到更好的形式的信仰所推动的。

在这样一个备选的框架中,伦理关系扎根于为他人而存在这一概念的基础之上。为他人而存在的联系优先于意图、优先于选择。在这样一个备选框架中的道德并不是志愿的。在道德行动者这一方,道德的取向优先于任何计算的行动;它优先于目的性、互惠性和契约性。道德从一开始就不是某种先于道德行动的道德决策。它不是任意可选的。诺丁斯将这种道德的概念称为关怀(caring)。但关怀不是一种去执行伦理的方法,也不是某项去形成某种专业服务伦理的特定原则。它是一种伦理取向,是意义和自身带有关系工作内在逻辑的价值得以生长的特定土壤(Thompson,1997)。

关怀或为他人而存在是一种责任,这种责任是先于志愿的、不可移动的、非契约的、非互惠的,而且是不对称的。正如维特莱森(Vetlesen,1997)所解释的:"为他人而存在的核心既非正义亦非权利,既非那些被关注者的快乐亦非他们的幸福,它的核心是责任。这不是一种可以自由选择是否去承担的责任,也不是一种受社会、政治或法律制约的责任;它更多地来自于外部而非内部,它根源于行

动者之外而非行动者之内。"(p.9)他还补充说,有关正义、善良、快乐等的问题都是很重要的,但都是后一步的事,而且它们"无论是一起还是单独地,都没有将道德定义为现象,将责任定义为任务"(p.9)。

如果有人辩称上面简要介绍过的这种伦理和道德的形式化理论直接对应于某些"定量"研究方法论,而另一种备选理论则对应于某些"定性"的方法论,这将是一种非但不正确而且很天真的看法。将这种道德现象学和道德认识论中的工作与对定性研究(或更广义地说,所有的社会研究)的伦理学和政治学思考联系起来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但这一工作确实说明了,要确定一个研究者应该怎样与他人相联系并随后代表他人的框架,至少可以采取两种方法。一方面,伦理—道德联系可以被定义为一个"难题",要解决这一难题,必须采用正确的"凝视"研究伦理,或是采用正确的文本形式,或者是采用正确的方法论。那种解决难题的方法假设我们可以从批评和我们选择的方向中获取某些资源,这些方向以某种方式位于那种需要做出某种特定选择的特定场合之外。它减少了人类存在与有待解决的客观难题之间的两难问题。另一方面,有关联系与再现的问题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有关了解和存在的神秘结合,这种结合在每一次研究者发现他(她)自己的情境中都要以全新的方式去面对。这种方法将"在我所研究的这些人面前,我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的情境理解为一种需要某种特定道德知识的情境。

结　语

我在简单勾勒这些知识(命题)时,本意并不在于提供某种模板或类型学以对当前定性研究的术语进行排列(不仅如此,这里所讨论的所有主题都已远远超出了任何对定性研究的构想,它们已经是一种对于所有当代社会研究的关注)。将各种复杂的理论视角分门别类,再贴上非此即彼的标签,这似乎是一种独特的美国式的倾向①。而这样去贴标签是相当危险的,因为它将使我们对于那些持久的议题、共有的关注、在运动中纵横交错的张力点,以及那些每一个研究者在建立一个社会研究者身份时必须面对的议题都视而不见。在纠缠于这些知识(命题)预先将我们理解"开展"定性研究的意义是什么的努力加以结构化的方法时,我们所面对的问题并不是哪种标签更适合我们——是解释主义、建构论、诠释学,还是别的什么。我们所面对的乃是每一个研究者的选择,选择自己希望怎样

① 当然,将定性研究作为一种不同于定量研究的独特类型的理念是本书中以各种方式描述过的那场运动的起源。在许多人(包括作者自己和我的很多学生)看来,这样一种区分现在是否仍然有助于我们理解人类研究的意义和目的是颇成问题的。我的一个学生最近评论说,我们认为自己是通过学习方法论、通过建立对于定性研究方法和定量研究方法的某种形式的忠诚而成为研究者的。但是,她继续说道,所有的研究都是解释性的,我们面临着一大堆方法,它们适用于不同种类的理解。传统的处理自己作为研究者的身份的做法是将自己归属于某一组特定的方法(或是将自己归为学习"定性方法"或"定量方法"的学生),但这种旧方法已经不再有用了。如果我们还想继续前进,就必须放弃这种区分。

去过一个社会研究者的生活。



Aylesworth, G. E. (1991). Dialogue, text, narrative: Confronting Gadamer and Ricoeur. In H. Silverman(Ed.), *Gadamer and hermeneutics* (pp. 63-81). New York: Routledge.

Bauman, Z. (1992). *Intimations of post-modernity.* London: Routledge.

Bauman, Z. (1993). *Postmodern ethics.* Oxford: Blackwell.

Bauman, Z. (1995). *Life in fragments: Essays in postmodern morality.* Oxford: Blackwell.

Bernstein, R. J. (1976). *The restructuring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theory.*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Bernstein, R. J. (1983). *Beyond objectivism and relativism: Science, hermeneutics, and praxis.*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Bernstein, R. J. (1986). What is the difference that makes a difference? Gadamer, Habermas, and Rorty. In B. R. Wachter-hauser (Ed.), *Hermeneutics and modern philosophy* (pp. 343-376).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Bernstein, R. J. (1991). *The new constellation: The ethical-political horizons of modeynity/postmodernity.* Cambridge: MIT Press.

Bleicher, J. (1980). *Contemporary hermeneutics: Hermeneutics as method, philosophy, and critique.*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Bogdan, R. C., & Biklen, S. K. (1992). *Qualitative research for education: An introduction to theory and methods* (2nd ed.). Boston: Allyn & Bacon.

Bohman, J. F. (1991a). Holism without skepticism: Contextualism and the limits of interpretation. In D. R. Hiley, J. F. Bohman, & R. Shusterman (Eds.), *The interpretive turn* (pp. 129-154).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Bohman, J. F. (1991b). *New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 Problems of indeterminacy.* Cambridge: MIT Press.

Carr, W. (1997). Philosophy and method in educational research. *Cambridge Journal of Education*, 27, 203-209.

Clough, P. (1998). *The end(s) of ethnography*: Now and then. *Qualitative Inquiry*, 4, 3-14.

Collingwood, R. G. (1961). *The idea of history.* Oxford: Clarendon.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46)

Connolly, J. M., & Keutner, T. (1988). Introduction: Interpretation, decidability, and meaning. In J. M. Connolly & T. Keutner (Eds.), *Hermeneutics and science: Three German views* (pp. 1-66). Notre Dame, IN: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Cooper, D. E. (1996). Modern European philosophy. In N. Bunnin & E. P. Tsui-James (Eds)., *The Blackwell companion to philosophy* (pp. 702-721). Oxford: Blackwell.

Davey, R. N. (1991). A response to Christopher Smith. In H. Silverman (Ed.), *Gadamer and hermeneutics* (pp. 42-59). New York: Routledge.

Denzin, N. K. (1994). *Chan is missing*: The Asian eye examines cultural studies. *Symbolic Interaction*, 17, 63-89.

Denzin, N. K. (1997). *Interpretive ethnography: Ethnographic practices for the 21st century.* Thousand Oaks, CA: Sage.

Derrida, J. (1976). *Of grammatology* (G. C. Spivak, Tran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Derrida, J. (1978). *Writing and difference* (A. Bass, Tra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Derrida, J. (1983). The principle of reason: The university in the eyes of its pupils. *Diacritics*, 13, 3-20.

Dilthey, W. (1958). *Gesammelte Schriften.* Leipzig: B. G. Teubner.

Dunne, J. (1993). *Back to the rough ground: "Phronesis" and "techne" in modern philosophy*

and Aristotle. Notre Dame, IN: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Fay, B. (1996). *Contemporary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 Oxford: Blackwell.

Gadamer, H.-G. (1970). On the scope and function of hermeneutical reflection (G. B. Hess & R. E. Palmer, Trans.). *Continuum*, 8, 77-95.

Gadamer, H.-G. (1975). *Truth and method* (2nd rev. ed.; J. Weinsheimer & D. G. Marshall, Eds. & Trans.). New York: Crossroad.

Gadamer, H.-G. (1977). Theory, technology, practice: The task of the science of man. *Social Research*, 44, 529-561.

Gadamer, H.-G. (1981). *Reason in the age of science* (F. G. Lawrence, Trans.). Cambridge: MIT Press.

Gadamer, H.-G. (1996). *The enigma of health*.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Gallagher, S. (1992). *Hermeneutics and education*.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Garfinkel, H. (1967). *Studies in ethnomethodology*.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Garrison, J. (1996). A Deweyan theory of democratic listening. *Educational Theory*, 46, 429-451.

Geertz, C. (1979). From the native's point of view: On the nature of anthropological understanding. In P. Rabinow & W. M. Sullivan (Eds.), *Interpretive social science: A reader* (pp. 225-241).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Reprinted from *Meaning in anthropology*, pp. 221-237, by K. H. Basso & H. A. Selby, Eds., 1976, Albuquerque: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

Gergen, K. J. (1985). The social constructionist movement in modern psychology. *American Psychologist*, 40, 266-275.

Gergen, K. J. (1988). If person are texts. In S. Messer, L. A. Sass, & R. L. Woolfolk (Eds.), *Hermeneutics and psychological theory* (pp. 28-51).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Gergen, K. J. (1994a). *Realities and relationships: Soundings in social construc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Gergen, K. J. (1994b). *Toward transformation in social knowledge* (2nd ed.). Thousand Oaks, CA: Sage.

Gergen, K. J. (1995). Social construction and the educational process. In L. P. Steffe & J. Gale (Eds.), *Constructionism in education* (pp. 17-39).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Giddens, A. (1993). *New rules of sociological method* (2nd ed.).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Grondin, J. (1994). *Introduction to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 (J. Weinsheimer, Tran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Habermas, J. (1988). *On the logic of the social sciences* (S. W. Nicholsen & J. A. Strak, Trans.). Cambridge: MIT Press.

Hekman, S. J. (1986). *Hermeneutics and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Notre Dame, IN: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Hiley, D. R., Bohman, J. F., & Shusterman, R. (Eds.). (1991). *The interpretive turn*.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Hirsch, E. D. (1976). *The aims of interpret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Howe, K. (1998). The interpretive turn and the new debate in education. *Educational Researcher*, 27(8), 13-20.

Hoy, D. C. (1991). Is hermeneutics ethnocentric? In D. R. Hiley, J. F. Bohman, & R. Shusterman (Eds.), *The interpretive turn* (pp. 155-178).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Kerdeman, D. (1998). Hermeneutics and education: Understanding, control, and agency. *Educational Theory*, 48, 241-266.

Lather, P. (1993). Fertile obsession: Validity after poststructuralism. *Sociological Quarterly*, 34, 673-693.

Longino, H. (1990). *Science as social knowledg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Longino, H. (1993a). Essential tensions—phase two: Feminist, philosophical, and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In L. M. Antony & C. Witt (Eds.), *A mind of one's own: Feminist essays on reason and objectivity* (pp. 257-272). Boulder, CO: Westview.

Longino, H. (1993b). Subjects, power, and

knowledge: Description and prescription in feminist philosophies of science. In L. Alcoff & E. Potter (Eds.), *Feminist epistemologies* (pp. 101-120). New York: Routledge.

Longino, H. (1996). Cognitive and noncognitive values in science: Rethinking the dichotomy. In L. H. Nelson & J. Nelson (Eds.), *Feminism, science, and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pp. 39-58). Dordrecht, Netherlands: Kluwer.

Madison, G. B. (1991). Beyond seriousness and frivolity: A Gadamerian response to deconstruction. In H. Silverman (Ed.), *Gadamer and hermeneutics* (pp. 119-134). New York: Routledge.

Nietzsche, F. (1979). *The complete works of Friedrich Nietzsche* (O. Levy, Ed.). New York: Russell & Russell.

Nussbaum, M. C. (1990). *Love's knowledge: Essays on philosophy and literatu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uthwaite, W. (1975). *Understanding social life: The method called Verstehen.*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Phillips, D. C. (1995). The good, the bad, and the ugly: The many faces of constructivism. *Educational Researcher*, 24(7), 5-12.

Phillips, D. C. (1997a). Coming to grips with radical social constructivism. *Science and Education*, 6, 85-104.

Phillips, D. C. (1997b). How, why, what, when, and where: Perspectives on constructivism in psychology and education. *Issues in Education*, 3(2), 151-194.

Potter, J. (1996). *Representing reality: Discourse, rhetoric and social construction.* London: Sage.

Prus, R. (1996). *Symbolic interaction and ethnographic research.*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Rabinow, P., & Sullivan, W. M. (Eds.). (1979). *Interpretive social science: A reade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Richardson, L. (1997). *Fields of play: Constructing an academic life.*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Ricoeur, P. (1981). The model of the text: Meaningful action considered as text. In P. Ricoeur, *Hermeneutics and the human sciences* (J. B. Thompson, Ed. & Tra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ouse, J. (1991). Interpretation in natural and human science. In D. R. Hiley, J. F. Bohman, & R. Shusterman (Eds.), *The interpretive turn* (pp. 42-57).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Rouse, J. (1996). Feminism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In L. H. Nelson & J. Nelson (Eds.), *Feminism, science, and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pp. 195-215). Dordrecht, Netherlands: Kluwer.

Schutz, A. (1962). *Collected papers* (Vol. 1; M. Natanson, Ed.).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Schutz, A. (1967). *The phenomenology of the social world* (G. Walsh & F. Lehnert, Trans.). Evanston, I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Schwandt, T. A. (1996). Farewell to criteriology. *Qualitative Inquiry*, 2, 58-72.

Schwandt, T. A. (1997). Evaluation as practical hermeneutics. *Evaluation*, 3, 69-83.

Shapiro, M. J. (1981). *Language and political understanding.*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Shea, C. (1998, September 11). Tribal skirmishes in anthropology.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pp. A17, A20.

Shusterman, R. (1991). Beneath interpretation. In D. R. Hiley, J. F. Bohman, & R. Shusterman (Eds.), *The interpretive turn* (pp. 102-128).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Smith, D. (1996). Telling the truth after postmodernism. *Symbolic Interaction*, 19, 171-202.

Smith, N. H. (1997). *Strong hermeneutics: Contingency and moral identity.* New York: Routledge.

Smith, P. C. (1991). Plato as an impulse and obstacle in Gadamer's development of a hermeneutical theory. In H. Silverman (Ed.), *Gadamer and hermeneutics* (pp. 23-41). New York: Routledge.

Taylor, C. (1985a). *Philosophical papers: Vol. 1. Human agency and langua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aylor, C. (1985b). *Philosophical papers: Vol. 2. Philosophy and the human scienc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aylor, C. (1987). Overcoming epistemology. In K. Baynes, J. Bohman, & T. McCarthy (Eds.), *After philosophy: End or transformation?* (pp. 464-488). Cambridge: MIT Press.

Taylor, C. (1988). Wittgenstein, empiricism, and the question of the "inner": Commentary on Kenneth Gergen. In S. Messer, L. A. Sass, & R. L. Woolfolk (Eds.), *Hermeneutics and psychological theory* (pp. 52-58).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Taylor, C. (1989). *Sources of the self: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ident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aylor, C. (1991). The dialogical self. In D. R. Hiley, J. F. Bohman, & R. Shusterman (Eds.), *The interpretive turn* (pp. 304-314).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Taylor, C. (1995). *Philosophical argument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Thompson, A. (1997). Surrogate family values: The refeminization of teaching. *Educational Theory*, 47, 315-339.

Tully, J. (Ed.). (1994). *Philosophy in an age of plural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Van Eemeren, F. H., Grootendorst, R., Blair, J. A. & Willard, C. A. (Eds.). (1987). *Argumentation: Across the lines of discipline* (Proceedings of the 1986 Conference on Argumentation). Dordrecht, Netherlands: Foris.

Vetlesen, A. J. (1997). Introducing an ethics of proximity. In H. Jodalen & A. J. Vetlesen (Eds.), *Closeness: An ethics* (pp. 1-19). Oslo: Scandinavian University Press.

Walton, D. (1989). *Informal logic: A handbook for critical argument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eber, M. (1949). *The methodolog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E. A. Shils & H. A. Finch, Trans.). Glencoe, IL: Free Press.

Winch, E (1958). *The idea of a social science.*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新世纪的女性主义和定性研究 8

FEMINISMS AND QUALITATIVE RESEARCH AT AND INTO THE MILLENNIUM

⊙ 弗吉尼亚·L·奥利森

进入新世纪以来，女性主义的定性研究更为分化且充满活力，并对其实践者、追随者和批评者提出了彻底的挑战。在女性主义研究中，对立的思想模式相互碰撞，不同的方法论和分析方法相互竞争，一度清楚的理论间的差别（Fee, 1983）也变得模糊不清，对女性主义研究效力的争论大量出现，女性主义的定性研究呈现出千姿百态的态势。这都是我在本章中要探讨的内容。

这一章的内容来源于我为 1975 年女性健康会议所写的女性主义宣言。在这篇宣言中，我指出“愤怒是不够的”，号召运用直接的学术活动建构、引导和利用激情来纠正有关女性健康的很多领域中的严重问题（Olesen, 1975, pp. 1-2）。作为一个早期在互动—社会结构传统中研究的符号互动论者（Denzin, 1992, pp. 1-2），我赞同互动主义和女性主义中的解构倾向，它们鼓励批判性、建设性地揭示特定的自然、历史和文化情境中关于女性的理所当然的观点。这就避免了“严重的整齐划一”现象（Mukherjee, 1994, p. 6）。我认为研究，不仅仅是关于女性的研究，可以通过借鉴理论性的评论和结合经验的、文本取向的定性模式进行。女性主义的研究，为其他的研究、行动和政策创造了超越和转变的舞台（Olesen, 1993）。我认为，女性主义研究是辩证的，运用不同观点的融合产生新的综合，这些综合又成为进一步研究的基础、惯例和方针（Nielsen, 1990b, p. 29; Westkott, 1979, p. 430）①。

我将对女性主义思想的变化趋势（Benhabib, Butler, Cornell, & Fraser, 1995; Tong, 1989）和定性研究中改变的、时常引起争议的主题（Denzin, 1997; Gubrium & Holstein, 1997; Gupta & Ferguson, 1997; Miller & Dingwall, 1997; Scheurich, 1997）进行探讨。对女性主义的定性研究进行定位，不能认为它只是暂时的智识主题和争论的被动接受者，相反，它影响了定性研究的许多方面，即使有时有些人的观点令人苦恼（Charmaz & Olesen, 1997; Devault, 1996; Smith, 1996; Stacey & Thorne, 1996; Taylor, 1998）。

① 对公共健康的女性主义的观点提出了相似的观点，见：Lupton, 1995。

女性主义吸收了不同的理论性的和实用主义的观点，并且影响了女性主义议程严重分歧的共同情境(心理学中关于这个问题的分析，见 Morawski，1997)。然而，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全球的、同类的和统一的女性主义，不管她们是否将自己界定为女性主义者，不同形式的女性主义都研究有问题女性的不同情境和形成这些情境的制度因素。这就涉及从问题到理论，从政策或行动框架到意识到特定情境的女性的社会公平问题(Eichler，1986，p. 68；1997，pp. 12-13)。女性主义研究提出了新的观点，这些观点来源于对女性的不平等，行动或深入研究的知识重建的研究中(Olesen & Clarke，1999)①。这里谈到的许多问题，都处于批判种族研究和批判法律研究的突出位置——如威廉姆斯(Williams，1991)利用文学理论对法律话语的分析，揭示了法律制定中的主体间性问题；还有(Mari Matsuda，1996)对种族、性别和法律的研究。

我将简单地概括一下女性主义定性研究的范围和类型，以提供一些背景资料，这些只是对许多学科的现有文献的部分说明。这种概括为女性主义定性研究中出现的复杂性的讨论奠定了基础，并为女性主义学者现在争论问题的评论做准备。这也包括对(一些)偏见与可信性、客观性与主观性的担心，以及在陈述、声音、文本和道德问题领域中的新的经验观点(对他人)陈述的需要。最后，我将以新世纪女性主义研究的成就、不足和未来发展的几个问题结束本章的讨论。

我们必须记住女性主义的定性研究是多种多样的——对新的复杂的经验研究进行大量调查的同时，另外的一些研究者仍倾向于社会性别的普遍的和传统的观点。此外，即使在女性主义研究的(经验的或传统的)同一流派中，从声音的处理到怎样准备政策的应用研究都存在分歧。

女性主义定性研究的范围和主题

有些人(包括早期的女性主义者)认为定性研究是所发现的主观的或人际关系领域中最有用的，也是最有限的研究。这既反映了早期女性主义的兴趣在于女性的主观性，也存在着关于定性研究不能解决大范围问题的错误假设。运用更广泛的研究方法，女性主义的研究已经超越了这些有限的观点[莱因哈兹(Reinharz)在 1992 年对此问题有具体描述]，并且出现了新的简短讨论的主题。通过对社会运动及政策和组织的大范围问题的调查，许多学科中扩展的女性主义研究从把主体放在显要位置的女性生活和经历的评价发展到对其关系的分析(定性的女性主义关于社会运动的研究，见 Taylor，1998；Taylor & Whittier，1998，

① 尽管女性主义的定性研究可能没有直接减轻这种情况下女性的痛苦，然而这一研究可以促成法律、政策或媒介的活动(Maynard，1994a)。除了研究结果之外，研究管理对评价女性主义研究的程度提供了基础：它将研究叙述为反常的、没有权力的、没有媒介的吗？它包括研究的微观政治的细节吗？研究中的不同是怎样控制的？它避免了重复的压迫吗(Bhavnani，1994，p. 30)？坎西安(Cancian，1992)发表了相似的女性主义研究的标准。

1999)。

这里短短的几页只能对女性主义定性研究的教育和健康领域进行简短的特征描述,不可能涉及女性主义研究的每一个方面。教育领域的研究比较广泛,从雅克(Acker,1994)对教室活动的观察,到布里茨曼(Britzman,1991)的学生教师"社会化"的后结构主义分析,雷伊(Reay,1998)关于母亲参与孩子教育的社会阶级分析,蔡斯(Chase,1995)对妇女学校主管与控制的结构进行斗争的描述分析,以及法律学校的女性怎样"成为绅士"的研究(Guinier,Fine & Balin,1997)。

在健康和治疗领域,伦珀特(Lempert)的研究将受虐待女性的经历的报道与受虐待的解释和结构问题联系起来。伦珀特的清楚的主体观和布卢姆(Broom)关于澳大利亚国家资助的女性健康诊所的出现怎样与女性主义者在健康照料系统中所秉承的原则相矛盾的论述形成了对照①。

政策分析领域——定量的和男性统治的领域,仍然是不接受女性主义定性研究的地方,在以下两个方面也是如此:①特殊政策问题的主旨、解释和出现;②政策完成的过程②。然而,有些关于女性政策问题的定性研究值得注意:通过对科学的和非专业出版物的内容分析,考弗特和麦克金雷(Kaufert & McKinlay,1985)指出门诊专家、医学研究者和关于雌激素替代治疗的女性主义者所关心的是不同的问题。成功的政策是女性主义者在不同的层次上仔细研究的复杂主题。在对埃伦里奇和皮文(Ehrenreich & Piven,1983)关于女性处境的确定观点的纯理论批判中,布朗(Brown,1992)指出她们没有意识到控制问题。佩彻斯基(Petchesky,1985)的分析揭示了在堕胎的讨论中怎样确定女性的健康问题。弗雷泽(Fraser,1989)对女性需要和政府的解放或控制问题进行了话语分析。蒙提尼(Montini,1997)在对乳腺癌引发的许可运动的研究中发现医生影响了活动家,使她们偏离了想达到的政策目标。

---

① 亨特、乔丹、欧文和布朗纳(Hunt,Jordan,Irwin, & Browner,1989)所做的关于女性健康的经典访谈研究改变了医学中关于女性病人的理所当然的观点;这些研究者发现妇女不赞同治疗的方式是因为她们自己的生活观念,并且女性不是"怪人"(cranks)。这一发现与安妮·卡斯珀(Anne Kasper,1994)对乳腺癌妇女的研究相似。托德(Todd,1989)证明了病人与女病人之间的文化冲突。在不同的层次上,亚德隆(Yadlon,1995)的分析表明护士比医生提供了更多的值得注意的照料,但也对病人施加了相当多的控制。关于更大范围问题的研究,亚德隆(Yadlon,1997)对乳腺癌原因的分析揭示了女性往往归咎于贫穷或瘦弱,而忽视了环境的或其他的身体外的原因;内特尔顿(Nettleton,1991)对牙医业的散漫习惯的解构分析说明了理想的母亲是怎样产生的;戴维斯(Davis,1995)关于整容手术的研究强调了女性的困境;在对女性食物准备的开创性研究的基础上(1991),德沃尔特(DeVault,1999b)提出了"食物和健康的所有权"问题。

② 政策研究提出了"仔细研究"的问题和运用重复选择的评论。女性主义研究者,像许多其他的定性(和定量)研究者一样,发现在对她们开放的社会群体中接近回答者比较容易,而不是较高社会地位的立法者或选择的官员,斯泰西(Stacey,1992)对英国医药局的分析是一个例外。然而,第二个原因存在于研究地方政策制定的失误中,这些地方(市政府、学校委员会、社区行动者组织)的进入可能比较容易。这些研究发展了史密斯(Smith)的制度民族志理论(Campbell & Manicom,1995),特别是坎贝儿(Campbell,1998)分析了政策文本在加拿大照料家庭中怎样为女性主义政策分析提供了新的和有希望的指导。伊斯茨和埃德蒙兹(Estes & Edmonds,1991)关于新出现的政策怎样变成结构的符号互动的模型为女性主义热衷于政策分析提供了价值导向。在政策分析中,定性的女性主义研究者,像通常的女性主义研究者一样,作出了比过去更大的贡献。就像芬奇(Finch,1986)所说的,定性研究对我们理解结构和制定政策做出了重要贡献。

表 8.1 女性主义定性研究中增多的复杂性和典型文本

出现的复杂性	
有色种族女性的作品	Anzaldúa(1990), Collins (1986), Davis (1981), Dill (1979), Garcia (1989), Green (1990), hooks (1990), Hurtado (1989), Zavella(1987)
永恒的白人问题	Frankenberg(1993), Hurtado & Stewart(1997)
后殖民的女性主义思潮	Alexander & Mohanty (1997), Heng (1997), Mohanty (1988), Spivak(1988), Trinh(1989,1992)
女同性恋研究和同性恋理论	Anzaldúa(1990), Butler(1993), Kennedy & Davis(1993), Krieger (1983), Lewin (1993), Stevens & Hall (1991), Terry (1994), Weston(1991)
残疾女性	Asch & Fine(1992)
观点理论	Collins (1990), Haraway (1991), Harding (1987), Hartsock (1983), Smith(1987)
后现代主义和解构主义理论	Clough (1998), Collins (1998b), Flax (1987), Haraway (1991, 1997), Hekman(1990b), Nicholson(1990)
复杂性的后果	
问题化的研究和参与	Behar(1993), Ellis(1995), Frankenberg & Mani(1993), Lather & Smithies(1997), Lincoln(1993,1997), Reay(1996a)
局内人—局外人的不稳定化	Kondo(1990), Lewin (1993), Naples (1996), Narayan (1997a), Ong(1995), Weston(1996), Zavella(1996)
传统概念的解构	
经验	O'Leary(1997), Scott(1991)
差异	Felski(1997), hooks(1990)
社会性别	Butler(1990,1993), Lorber(1994), West & Zimmerman(1987)
新的框架问题	
"偏见"和客观性	Fine(1992a), Haraway(1997), Harding(1996,1998), Holland & Ramazanoglu(1994), Phoenix(1994), Scheper-Hughes(1992)
"效度"和信度	Lather(1993), Manning(1997), Richardson(1993)
参与者的声音	Fine(1992a), Kincheloe (1997), Lincoln (1993, 1997), Mascia-Lees et al. (1989), Opie(1992), Reay(1996), Ribbens & Edwards (1998)
提出理由/给予说明	Behar & Gordon (1995), Ellis (1995), Kondo (1995), Lather & Smithies(1997), McWilliam(1997), Richardson(1997)
研究伦理	Finch(1984), Fine & Weis(1996), Lincoln(1995), Reay(1996), Ribbens & Edwards(1998), Stacey(1988), D. L. Wolf(1996a)

克拉克(Clarke,1998)称这些后期的研究为“中间分析”(meso analysis),指社会的和制度的权利怎样与人类的行动相协调(Maines,1982)。克拉克的女性主义社会历史分析说明了诸如避孕工具生产这样的问题是怎样出现的。这些研究将女性研究问题提高了对当代的和历史的男性统治的科学、政策制定和控制——不仅是女性的,也包括政策过程——的重要批判。高登(Gordon,1994)对领取福利的母亲的社会历史分析是这类研究中最好的例子,她的分析指出了关于女性地位的陈旧的观点怎样进入了新时代,并误导了政策。

新出现的复杂性

如果任何特性都可以说表现了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或者说所谓的女性运动的第二阶段(至少在美国)以来的定性的女性主义研究的特性的话,那么它将增加女性主义研究的复杂性:研究的特性,对被研究者的界定和与被研究者的关系,研究者的特征和所处的位置,以及研究中知识的创造和陈述。事实上,如果在产生的复杂性中有一个占主导地位的主题的话,那就是知识问题。谁的知识?从谁那里,通过谁,为了什么目的,怎样获得的?如斯坦利和怀斯(Stanley & Wise,1990)所说的,“简单地说,女性主义理论家已经从社会科学的女性主义批判的‘反动’立场中脱离出来,进入探讨‘女性主义知识’是什么的领域”(p. 37)。这方面比较有影响的女性主义作品有:科德(Code,1991)的疑问“谁能知道?”(p. ix),哈拉维(Haraway,1991)的存在知识的概念化,史密斯(Smith,1987)的日常世界的清晰度问题和一些关于女性主义定性方法的和方法论的文本(Behar,1996;Behar & Gordon,1995;Butler,1986;DeVault,1999a;Fine,1992a;Fonow & Cook,1991;Hekman,1990b;Lather,1991;Lewin & Leap,1996;Maynard & Purvis,1994;Morawski,1994;Nielsen,1990a;Ribbens & Edwards,1998;Roberts,1981;Stanley,1990;Stanley & Wise,1983;Tom,1989;Visweswaran,1994;D. L. Wolf,1996a)。关于女性主义知识的政治交换,见:Hawkesworth,1989,1990a,1990b;Hekman,1990a;Shogan,1990。

研究重点的增多分化了早期女性主义研究的两个重要主题。第一,麦金农(MacKinnon,1982,p. 353;1983)的“意识觉醒”是女性主义方法论基础的主张让位于更加显著的结构性的观点。科林斯(Collins,1990)意识到了多种知识的发展,在对黑人女性主义思想的分析中明确地提出了这一观点,这部包括戴维斯(Davis,1981)、迪尔(Dill,1979)、乔(Chow,1987)、胡克斯(hooks,1990)、格林(Green,1990)和安扎尔杜亚(Anzaldúa,1987,1990)作品的有影响著作结束了女性主义研究中常存的白人化倾向。此外,女性结构性的存在于变化的组织和个人情境的意识出现了,这种情境与产生知识的主观评价纠缠在一起,就像鲁泽克(Ruzek,1978)在早期对女性健康运动的分析中指出的那样。第二,关于女性在社会生活的竞技场中不受重视的研究——如芬伯(Lorber,1975)关于女性与医学

的研究,埃普斯坦(Epstein,1981)对司法界女性的研究——导致了更加复杂的分析,如海因(Hine,1989)探讨了美国护理系统中排斥和对待非裔美国妇女的结构的、互动的和知识产生的因素。

与这些研究同时发展的是最初将妇女称作家庭范围内无处不在的却不重要的劳动者的研究(Able & Nelson,1990;Finch & Groves,1983;Graham,1984,1985;Nelson,1990)。后来,通过格伦(Glenn,1990)关于日本家务劳动者的研究,罗林斯(Rollins,1985)对家庭清洁的参与观察研究和罗梅罗(Romero,1992)对拉丁语地区家务劳动者的访谈研究,家庭服务、家务劳动和相伴随的知识情境中看上去陈腐但却是对日常生活的根本性批判的种族、阶级和性别问题都呈现出来了。其他的研究,如德沃特(DeVault,1991)关于家庭食物准备的研究,默科特(Murcott,1993)对食物观念的分析,霍克希尔德(Hochschild,1989)对家务劳动已经进入家庭意识的研究,更加证明了家庭范围内的社会性别知识产生的机制。

因此,新出现的复杂性使女性主义研究从对理论学科(Stacey & Thorne,1985,1996)、社会制度以及对女性生活和经验缺少关注的理所当然的批判,发展到对批判的认识论问题的思考与讨论①。这其中最重要的是对被研究者差异的逐渐认识,普遍化的"女人"概念的消失和对研究者自身特性的关注。当代女性主义研究的主流就是支持这些逐渐增加的、大多数被接受的意识。

复杂性增加的促进因素

有色种族女性的著作

除了上面提到的研究之外,有色种族女性的研究形成了对有色种族女性的

① 这种转变已引起了令人烦恼的评论,女性主义研究者已经从早期的关注理解和减轻女性压迫的政治议程转到对女性生活或神秘的认识论问题的描述(Glucksman,1994;Kelly,Burton,& Regan,1994,p.29)。显然,认识论问题的广泛兴趣在那些寻求理解、提高或变动的女性主义观点的研究者中发展起来,但也有大量的研究倾向于对众多方面的干涉和改变。莱瑟和史密西斯(Lather & Smithies,1997)对艾滋病女性的参与研究将后结构主义观点与清楚的改革议程结合起来;普费弗(Pfeffer,1997)对年轻的无家可归的女性生活所做的民族志研究提出了计划的可能性问题。泰勒和道尔(Taylor & Dower,1995)对政策倾向的旧金山社区女性群体的研究,详述了女性的忧虑。奥利森、泰勒、鲁泽克和克拉克(Olesen,Taylor,Ruzek & Clarke,1997)广泛地回顾了女性主义研究倾向于改善女性的健康。定性的女性主义讨论了女性性暴力研究中的困难,如研究者的性骚扰(Huff,1997),跨种族研究(Huisman,1997),控制自己的和他人的情绪(Mattley,1997)以及作为一个行动者和一名研究者之间的界限(Hippensteele,1997)。克拉克和我提出了"话语的结构和重要的实践作为必要的而不是确定的因素来处理"(Clarke & Olesen,1999a,p.13)。肯尼和金塞拉(Kenney & Kinsella,1997)编纂的书中详细叙述了立场理论的政治的和改革的方向。此外,一些杂志(健康照料中的定性研究、教育中定性研究的国际性刊物、女性主义和心理学、护理研究的西方杂志、社会问题杂志、健康和疾病社会学、定性研究、定性社会学、现代民族志、女性主义研究、女性主义评论、性别和社会、社会问题)发表了女性主义的定性的改革倾向的研究。然而,文章长度的限制,使论述和改革观点的建构非常困难,使定性研究报告的详细叙述成为必需。关于学院与社区的联系,见《女性主义文集:女性研究资料季刊》(*Feminist Collections:A Quarterly of Women's Studies Resources*。Vol. 20,No. 3,1999)中的一篇名为《学者和行动主义者之间活力的张力》(The Energizing Tension Between Scholars and Activists)的文章。

错置的理所当然观点的新的理解,并揭示了白人作为创造"他人"的因素的范围——如在英国的亚洲人(Puar,1996)。除了对差异的批判之外,科林斯(Collins,1996)和赫塔多(Hurtado,1998)的著作使女性主义的研究转向对女性压迫形成中的种族、阶级和社会性别的互动的认识,研究者的经验研究也说明了这一点,如泽维拉(Zavella,1987)关于墨西哥美国罐头厂工人的研究,凯普兰(Kaplan,1997)对黑人青少年妈妈的研究。同时,这些在传统的定性类型的研究对美国有色种族女性生活的理解提高到了新的水平。阿扎尔杜亚的经验著作和研究引入了国界、跨国界和女性生活的流动性的概念——家庭的、国家的、性别的、国际的,增加了更多的维度和复杂性。虽然采用不同的形式,但女性主义研究者关于女性和移民的研究中出现了对国界和流动性的重要认识(Espin,1995;Hondagneu-Sotelo,1992)。尽管已有这一作品,女性主义学者宾格和雷德(Bing & Reid,1996)还是提出了反对白人女性主义知识滥用的问题,法律学者克伦肖(Crenshaw,1992)在白人女性主义者关于1991年克拉伦斯、托马斯(Clarence Thomas)听诉会的讨论中也指出了这一问题。

与这些研究并存的是关于批判的研究,这不仅是有色种族女性与白人女性之间关系的结构问题,也是白人女性自身的问题。富兰肯伯格(Frankenberg,1993)的访谈研究转变了研究中特权的、未予认可且名称不详的类型,提出了研究过程中要考虑所有参与者的问题。赫塔多和斯图尔特(Hurtado & Stewart,1997,pp. 309-310)指出"白色人种"是事件的"自然"状态,要求白人的研究应该从有色种族人们的观点出发,发现她们所说的研究中的批判的、非支配的存在(Wyche & Crosby,1996)。这些著作不只是对女性多样性的简单提醒,她们强调多重身份(和主观性)是特殊历史时期和社会情境的尝试性建构(Ferguson,1993)。

后殖民女性主义思潮

如果西方工业化社会的女性主义研究中不断的白人批判动摇了女性主义研究的框架,那么,来自于后殖民地理论家的强有力的、复杂的研究和女性主义思想更加动摇了关于"女人"和"女性"的女性主义研究的基础和女性主义自身的定义。她们提出女性主义依靠当代民族主义背景形成了许多不同的形式(Alexander & Mohanty,1997;Heng,1997)。关于"他者"的不同影响(对被研究者采用压制性定义),她们认为西方女性主义的模式不适合后殖民地女性的研究(Kirby,1991,p. 398;Mascia-Lees,Sharpe,& Cohen,1991)。这样,问题就出现了,如斯皮瓦克(Spivak,1988)的疑问:由于精英思想的存在,那些处于从属地位的人是否会发表意见或者会永远保持沉默。莫汉蒂(Mohanty,1988)也提出了类似问题。除了这些问题,她们还提出了是否第三世界的女性或事实上所有女性都会被看作具有统一主观性的同类女性的问题。敏哈(Minh-ha,1989,1992)利用她影片制作人的专业知识,使女性作为他人(和非他人)的流动框架成为系统的整体,通过弱化女性的概念,主观性和客观性的假设,以及访谈的应用削弱了民族

志研究的基础。这部著作也指出了全球化中的问题,如国外制造业中的不安全的和剥削的工作环境以及国际性交易,都成为女性主义研究的主题。

女同性恋研究

在斯坦利和韦斯(Stanley & Wise,1990,pp. 29-34)对较少关注女同性恋的批判中,女性主义学者放弃了在本质上无视女同性恋或认为女同性恋是可鄙的、有缺憾的理论研究框架。新的研究成果瓦解了女同性恋同质性的观点,如克里格尔(Krieger,1983)对女同性恋群体的民族志研究,斯蒂芬斯和霍尔(Stevens & Hall,1991)对医学怎样不公平地限制了女同性恋的历史分析,威斯坦(Weston,1991)对女同性恋家庭关系的研究,勒温(Lewin,1993)关于女同性恋母亲的研究[说明了母性(而不是性)非同一般的重要性],以及特里(Terry,1994)关于"越轨"的历史编纂理论化的研究。历史研究,如肯尼迪和戴维斯(Kennedy & Davis,1993)关于布法罗和纽约的女同性恋群体的叙述,安扎尔杜亚的早期的研究,以及勒温(Lewin,1996b)对女同性恋群体的文化分析作品的编纂,通过揭示女同性恋群体中的种族和阶级问题以及女同性恋认同的多重基础,进一步区分了这些观点。

社会性别的确切含义也受到了巴特勒(Butler,1990,1993)的尖锐批判,她的女性主义的哲学分析可追溯到威斯特和齐默尔曼(West & Zimmerman,1987)早期社会学叙述的主题。在两个例子中,由于不同的理论原因,这些学者指出性的认同只是表述行为的,而不是特定的或社会归因的,影响了统治女性主义思想数十年的社会性别的二元论观念。

同性恋理论的出现,特别是那些拒绝被同性恋文化或压抑的异性恋文化同化的男女同性恋者成为同性恋研究的开端,这一理论也提出了更加明确的政治立场(Lewin,1996a,pp. 6-9)。勒温(Lewin,1998)关于男女同性恋婚姻的研究说明了那些仪式怎样既反映了同性恋的适应又反映它的消亡。这种抵抗的态度所带来的暗示就是直接关于女性主义的研究和对种族和阶级的复杂贡献的认识。

残疾女性

随着残疾人权利运动和残疾人女性主义者作品的出版,女性之间的不同认识也随之出现。"被社会贬低,排除在女性的活动领域之外,并且是不可见的。"(Gill,1997,p. 96),残疾女性在本质上是去个性化、去性别化的,令人遗憾的是,这种情况有时也发生在女性主义者之中(Lubelska & Mathews,1997,p. 135)。吉尔(Gill,1997)回忆了杰出的加拿大女性主义者邦尼·克雷恩(Bonnie Klein)遭受了致残的事故后,在女性主义者的聚会中被当作局外人(p. 97)。她还指出残疾女性被认为没有能力或兴趣抚养孩子,因此也就不是生育健康议程的一部分(p. 102)。阿希和法恩(Asch & Fine,1992)通过回顾以往的研究中残疾女性的出现对女性主义者来说是作为一个问题来研究的,指出即使是对残疾女性表示同情的研究也仅仅因为她们的残疾才试图认识她们,而忽视了残疾女性作为工人、

爱人、母亲、朋友、运动员和活动家的角色。

观点研究

女性主义学者从若干学科中获得的具有松散联系的理论观点(早期提到的许多观点也可以这样进行归类),受到了女性主义者的批判,即她们认为研究叙述和来源于女性经验的具有显著地位的女性知识中缺失或边缘化了女性(Harding,1997,p.184)。哈拉维(Haraway,1997)——其科学史上具有影响的作品已经成为观点思想的基础和权威——恰当地对观点理论进行了概括,“观点是认识的—情感的—政治的获得,它巧妙地体现了现存社会的—历史的—身体的经验——通过充实的、世故的、话语的、物质的和共同的实践活动而构成”(p.304,n.32)①。在社会学家多蒙西·史密斯、帕特里夏·希尔·科林斯,政治科学家南西·哈特索克(Nancy Hartsock)和哲学家桑德拉·哈丁(Sandra Harding)的研究中,女性的本质的、一般化的概念消失于这种思想环境中:将女性置于具有经验和知识的情境下重现,特别是在劳动的物质范畴和种族的分层系统中。因此出现了这样的观点:所有知识的宣称都是社会的存在,并且许多社会存在,特别是那些处于社会和经济特权阶层底部的,不管是那些独特的女性,还是其他的女性,在获得知识的开端要好于其他人(这不能假设研究者自己的生活或群体是最好的研究起点,也不能断言所有社会存在的相对主义的观点对知识计划具有同等价值)。

尽管根据立场观点的类别对她们进行了分组,但是立场理论家绝不是完全相同的,她们的不同的观点为定性研究者提供了不同的方法(Harding,1997,p.389)。因而,在此讨论这些理论家,并通过这样一个必要的简短的回顾,认识到因细致的思考而不可避免地产生冲突是非常有意义的。

多蒙西·史密斯关注女性的观点,并把日常世界概念化为一个有问题的,即存在于其中及其组织中的女性不断创造、塑造和了解的世界,是被外在的物质因素或表面的协调关系塑造的世界(Smith,1987,p.91)。因此,女性生活的“日常活动”就处于中心位置。为了解那个世界,研究者不必像社会学传统地划分主观和客观、研究者和参与者的做法那样,将女性客观化。研究者必须能“以与确定的社会学策略不同的方式进行思考与研究”(Smith,1992,p.96),这些研究并不是存在于统治关系之外的。这就要求对研究者和女性主义社会学家怎样“作为主体参与到统治的关系中”进行深入的反思(p.96)。史密斯和艾利森·格里夫斯(Alison Griffth)关于学龄儿童母亲工作的研究说明了在讨论中她和她的同事怎样发现了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关于母亲的北美演讲的影响(Griffth & Smith,1987;Smith,1992,p.97)。许多研究者已经自觉地意识到他人的研究发展和利用史密斯制度民族志的观点(Campbell & Manicom,1995)去发现表面的协调关系怎样产生并被维持在制度领域,因而在微观和宏观事物的典型

① 女性主义法律学者的研究也采用了这种类型(例如 Ashe,1998;Bartlett,1990;Fry,1992;MacKinnon,1983;Matsuda,1992,1996;Williams,1991)。

问题之间形成了重要的联系(Smith,1990b,p. 10)(对史密斯的评论,见 Collins,1992;Connell,1992)。

科林斯(Collins,1990)指出黑人女性的观点来自于黑人女性的物质环境和政治状况。从方法论上来说,这要求“选择的认识论,其‘具体知识的标准’和‘方法论的适当性’与黑人女性的经历与意识保持一致”(O'Leary,1997,p. 62)。科林斯和贝尔·胡克斯(Collins & bell hooks,1984,1990)的著作改变了女性主义思考和研究的具体知识,脱离了任何普遍性的观念。科林斯(Collins,1998a)拒绝放弃情境的观点,并明确了黑人女性主义者思考的框架,在此框架中她将黑人女性的观点与交叉研究联系起来,“社会现象、种族、阶级和社会性别的建构彼此相联”(p. 205),然而,总是存在对权力和结构关系的敏锐的思考中(pp. 201-228),这实质上扩展了观点理论。就像科林斯认识到的,复杂性的思考是一项“令人气馁的工作”(p. 225),在这样一个框架中进行定性研究同样使人失去信心。然而,利用社会复杂性的新的理解——以及权力关系的背景——将黑人女性主义的思想发展为批判的社会理论和理想主义的实用主义的新形式是很重要的(p. 228)。

哲学家桑德拉·哈丁早就认识到了女性主义研究的三种类型,她称为“过渡期的认识论”(Harding,1987,p. 186)。为了与哈丁关注的通常意义的现代性、一般的科学和女性主义科学问题一致,这些类型肯定了那些研究模式怎样与传统的科学和客观性问题相联系:

1. 女性主义的经验主义,包括两种类型:①“自发的女性主义经验主义”(与目前的研究规范和标准密切相关);②其次是朗吉诺(Longino,1990)的“前后关系的经验主义”(对科学的社会价值和利益影响的认识;Harding,1993,p. 53)。

2. 立场理论,“主张所有知识的建立都具有社会烙印性,某些客观社会烙印化的知识要好于其他的知识”(Harding,1993,p. 56;1998,p. 163)。

3. 后现代理论,它使女性主义科学赞成的用多种经历讲述女性自己的知识的可能变得无效。

这些仍然是寻找女性主义定性研究不同类型的有用途径,但许多研究运用了几个或所有的三个要素作为女性主义研究者创造性地借鉴并改变她们研究的多种类型,“以避免破坏统治的社会关系及其系统的有限性”(Harding,1990,p. 101)。

这里的问题是科学的恰当形式和是否“所有可能的科学和方法论……都包含在现代的、男权的、西方的和中产阶级的形式中”(Harding,1990,p. 99)。哈丁提到,科学的其他形式也是可能的和适当的。她对女性主义研究作为一种科学活动的关注和产生“较少虚假故事”的尝试,使她拒绝依靠方法论规则严格控制过程,她提出了研究者应该批判地考察她们在进行研究时自己个人的和历史的约束(Harding,1993,pp. 70-71)。她指出,社会学的、文化的和历史的相对主义(仔细倾听他人的观点)与判断的相对主义

(为判定信仰的不同系统和它们的社会起源而放弃许多主张)之间的批判性不同。她的解决方法是运用"强烈的客观性"(Harding,1991)①。强烈的客观性与价值自由的客观性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并假定研究者与参与者之间是相互影响的。后面我会更详细地讨论她对"强烈客观性"的贡献。

南西·哈特索克的观点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相信女性的物质境况为她们提供了产生特殊和特权知识的经验,这些知识既反映了压迫也反映了女性的反抗(Hartsock,1983,1985,1998)。像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无产阶级的生活一样,她们的知识为统治批判和政治行动提供了机会(Hartsock,1997b,p.98)。这并没有假定这类知识是固有的、必不可少的,也没有假设所有的女性都具有相同的经历和相同的知识。然而,在她最近的陈述中,哈特索克(Hartsock,1990)明确了观点的"具体多样性"的可能性(p.171)。每一种观点都形成了不同的世界,每一种都表达了权利的不同影响,以及将观点理论与女性主义的经验主义区别开来的思考(Hundleby,1997,p.41)。这样的知识不仅是个人的,而且来自"个人和群体的互动",并且总是变化的(Hundleby,1997,p.36)。就像哈特索克所提到的,"研究主体不是个别的主体,而是共同的主体或群体"(p.371)。

观点理论及其对女性主义定性研究的暗示没有不受到批判的。有些人非常焦虑观点理论的相对论的危险(Harding,1987,p.187),过分简单化(Hawkesworth,1989,p.347)和引起的效度问题(Ramazanoglu,1989)。另外也出现了对下面问题的批判:实在论的可能性(Campbell,1994;Lemert,1992,p.69),有色种族女性知识传统的忽视(Collins,1992,p.77),不同观点的评价叙述问题(Hekman,1997b,p.355;Longino,1993,p.104;Maynard,1994b;Welton,1997,p.21),认同的不完全理解问题(Lemert,1992,p.68),以及如果研究对无意识渴望的连续的调和和建构,那么作为研究基础的经验的潜在应用问题(Clough,1993a)。其他人也提出带有不稳定因素的同性恋理论破坏了观点理论的可能性,观点理论认为同性恋是异性恋的复制(Clough,1994,p.144)。

在这些问题上观点理论家也没有保持沉默。史密斯(Smith,1993)与克拉夫(Clough,1993a,p.169;1993b)的对话突出了经验的中心性、愿望的位置和文本的重要地位。在对话的过程中,克拉夫提到了史密斯在将社会学解构为经验的统治性话语时走得还不够远,史密斯否定了这一点,指出克拉夫的观点过分倾向于文本而忽视了经验。海克曼(Hekman,1997a,1997b)在观点理论批判的回顾中谈到了如果女性的知识是特权的,那么真理是怎样建立的问题。来自史密斯(Smith,1997)、科林斯(Collins,1997)、哈特索克(Hartsock,1997a)和哈丁(Harding,1997)的回答清楚地表明观点理论已经并被不断地修正(Harding,

① 伊冯娜·林肯(Yvonna Lincoln,个人交流,1999年3月4日)提醒我相对主义的"扩展的连续统",其范围从相信"事物活动"的激进的相对主义者到那些否认价值评估的绝对标准,但是坚持标准应该在特定情境中发展的人,这一情境结合了参与者的叙述,表达了有用知识的观点。这后一种观点没有抛弃特性的观点,而是利用这一方法去避免利用情境中的"科学标准",在这种情境中,"她们以压迫的、无力的或权力重压的方式行动"。

1997,p.389)。女性主义定性研究者认为在将观点理论运用到她们的研究时,如果她们想避免误解和探究观点理论和后现代主义之间的新的关系,她们必须仔细阅读这些理论家最近的著作(Hirschman,1997)。事实上,哈丁(Harding,1996)已经指出"后结构主义观点在运用观点理论对下面的问题进行系统地、批判地研究时非常有帮助:对权力关系的研究,对我们以前所讨论过的由阶级、种族和其他文化力量形成的社会性别的研究,以及这些怎样通过结构的和符号的'话语'传播的研究",后结构主义观点对运用观点理论系统地、批判地研究权利关系的多样性,对阶级、种族和其他历史文化力量形成的社会性别的态度的多样性,以及它们是怎样通过结构的和符号的'话语'传播的非常有帮助(p.451)。科林斯(Collins,1998b)提出后现代的和解构的思想对黑人女性群体权威和社会行动的破坏性影响的同时,也指出后现代主义的权力分析工具在挑战统治性话语和游戏的恰当规则时同样有用(pp.143,154)①。

后现代的和解构的思想

复杂性可能已经出现在女性主义的定性研究中,尤其是这里所讨论的许多主题之中,但是后现代和解构思想的多样的和富有魅力的智慧源泉,深化和增强了显现的复杂性②。事实上,后现代主义和解构主义不同程度地出现在上面提到的主题中,有时成为研究的主要观点(如布特尔或敏哈的分析),有时预言了未来的复杂性(如富兰肯贝利对白人的解构性研究),有时反映了女性主义陈述的不适合这些思想模式的倾向和主题(如科林斯对黑人女性主义思想的分析或卢因关于女同性恋文化的研究)。

考虑到出现的困难多于受压迫情境中女性生活的片面故事,后现代女性主义者把"事实"看作是幻象的破灭。她们对世界的观点是一些故事或文本,这些故事或文本确定了权力和压迫的整体性,事实上"将我们看作决定性规则的主体"(Hawkesworth,1989,p.349)。在女性主义研究中,这些主题出现在人类学、社会学、历史、政治科学、文化研究和科学的社会研究中,也出现在教育和护理研究的经验派系中(见澳大利亚杂志:*Nursing Inquiry*)。

具有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传统的女性主义文化研究强调描述和文本。对女性主义来说这个领域的研究特别复杂,许多学者运用来自阿尔图塞(Althusser)法国女性主义理论、文艺批判(Abel, Christian,& Moglen,1997)、历史分析和精神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观点(Ferguson,1993,p.212,n.3)。与经

① 除了这里引用的立场理论家的最初的文本之外,一些有用的解释性评论也可以在邓津(Denzin,1997)、克拉夫(Clough,1998),以及肯尼和金塞拉(Kenney & Kinsella,1997)的研究中看到。哈丁(Harding,1997,p.387)对立场理论的年代表的概括也有启发意义。

② 关于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和女性主义的文献并不总是像那些开始探索或想加深理解的人那样容易获得。许多有用的研究是1998年的《女性主义研究》的源泉。尼克尔森(Nicholson,1990,1997)、海克曼(Hekman,1990b)、弗莱克斯(Flax,1987,1990)、罗西瑙(Rosenau,1992)、勒莫特(Lemert,1997)、查马兹(Charmaz,1995)对定性研究中的实证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科林斯(Collins,1998b)对后现代主义对黑人女性主义者意味着什么进行了深刻讨论。

典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对妇女、工作和社会阶级的研究——如萨克(Sack,1998)对医院工人的调查和格雷泽(Glazer,1991)对护理职业中的种族和阶级问题的分析——形成对照的是在阿尔图塞的模式中寻找意识形态和主观性、欲望和权威形成的地位的唯物主义女性主义研究(Clough,1994,p.75)。这也遇到了关于愿望怎样在文化产品中表达或怎样从文化产品中推理出来的令人困惑的问题,这些文化产品分布在通过影像的民族志叙述到女性主义研究者面对的超出了多数人简单认识的问题和深入的文化形式问题的运用①(关于描述的女性主义唯物主义的分析,见:Roman,1992)。

这些研究典型地应用了文化客体(比如电影)和它们意义的分析形式(Balsamo,1993;Clough,新闻;de Lauretis,1987;Denzin,1992,p.80;Morris,1988)或对地点和情境的分析(Morris,1998)。这些研究包括对客体和围绕着客体的话语文本的分析,以及"由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文化意义所塑造的现有的文化和经验的研究"(Denzin,1992,p.81)。这些研究预见了沃克丁(Walkerdine,1995)提出的将媒体作为主观性产生场所的理解分析。

关于社会性别和科学女性主义的研究将逐渐增多,特别是在科学领域中,启蒙时期,现代和当代的神圣源泉作为一种文化被分解,显示出实践、话语和对女性生活的控制的暗示(Haraway,1991,1997;Martin,1987,1999),也提出了反抗或干涉的途径。关于女性生殖地位的研究一直都是女性主义定性研究的中心问题(Ginsburg,1998;Gordon,1976;Joffe,1995;Luker,1984,1996),这一问题已经转向了社会性别和科学领域(Balsamo,1993,1999;Casper,1998;Hartouni,1997)。因为这一研究借鉴了各学科的研究,因此不容易对其进行分类。这些研究通常以混合的形式、主旨和内容的形式出现,如哈拉维(Haraway,1997)对技术科学的女性主义研究中,熟练地将小说、生物学、历史、幽默、宗教和视觉形象编织在一起。这些成果对有些人来说可能是不舒服的,或者是危险的和颠覆性的,不仅对男性的统治制度,如科学,对女性主义自身也是如此。

这些思想方式深化了新出现的复杂性:限制女性的场所(社会性别、种族和阶级)和怎样限制女性,多重变化的身份和自我怎样取代了确定的身份(自我)(Clough,1992,1998;Ferguson,1993;Flax,1990;Fraser,1997,p.381)。她们强调这种从二元框架到女性经验、地位和空间的易变概念的转化(Anzaldúa,1987;Trinh,1989,1992)。这种转化伴随着对话语、叙述、文本的强调,经验写作脱离了研究叙述的标准形式,这是后面我要详细讨论的一个问题。后现代主义和解构主义也关注这一问题,正如观点理论家所做的那样,女性主义定性研究者未经检验地接受和坚持传统的实证的定性研究观点(众所皆知的女性主义的经验主义),这一观点被认为推动了女性主义的进程,但是,批评家们也指出这只不过是

---

① 寻求解构的或精神分析的女性主义符号论的女性主义研究者否认对经验的关注(Clough,1993a,p.179)。她们论述到,不管研究者多么亲密,经验总是产生于话语和文本中。文本是深人分析的中心,是社会批判的基本模式。在这一研究中,强调的重点是:①激情;②无意识的神秘和不利的研究;③求生的本能资源不会因儿童期和成年期的社会化而消失;④性特征和文化生活及其描述的政治。

重复了受压迫的结构而已。后现代的观点产生了不稳定的、令人焦虑的问题,即意义、文本、背景的变化和认同的不断增加没有为改革倾向的研究提供基础,而是巩固了现状,消除了结构性的权力,但也没有提出问题或描述文化系统(Benhabib,1995;Collins,1998b;Hawkesworth,1989;Johannsen,1992-Mascia-Lees,Sharpe,& Cohen,1989;Maynard,1994b;Ramazanoglu,1989)。下面我将在女性主义定性研究的部分更加详细地讨论这种影响产生的特殊问题。

复杂性增加的后果

有色种族女性、男同性恋/女同性恋/同性恋理论家、后殖民地研究者、残疾女性、观点理论家和分析家采用后现代视角,结束了女性主义研究的基础和过程的理所当然的概念化和批判的主要概念,如经验、差异和社会性别。没有比上面讨论这两项研究更深入的了,即关于女性作为研究者的重新思考的研究和将女性主义研究者作为无所不知的、统一的、差距的和文本自由的客观知识的探寻者概念的重建研究,这里女性的社会性别为她们进入女性的生活和知识提供了保证。这种假设的消失将女性主义研究推向了对研究者特征和关于研究者研究影响的认识。

研究者的属性

研究者也有特性、特点、历史、社会性别、阶级、种族和影响研究的互动的社会属性。林肯(Lincoln,1997)在她的评论中提到,"如果我们不是单独的个体,而是许多可能性……作为民族志学者,我们就可以运用多重自我创造多样的文本"(p.42)。然而,这些可能性不是静态,它们是结构和实践交互作用的反映。在这一脉络中,富兰肯伯格和曼尼(Frankenberg & Mani,1993)借鉴文化研究,提出了推测的方法,即"稳稳地掌握着对处于统治和从属矩阵之中的主体形成和文化实践的分析"并且"断言主体和她们的历史之间存在着有效的,但不是决定性的关系,这种关系是复杂的、变化的和非'自由'的"(p.306)。尽管她们是在后殖民地的和解构主义的脉络中进行描述,但推测方法的概念仍然适用于发现女性主义的研究机制,因为它认识到研究者和参与者是根据历史和情境来定位的。

许多女性主义者描述了她们研究中的推测机制。基于她自己从工人阶级到中产阶级研究者的生活经历,雷伊(Reay,1998)在对母亲参与孩子早期学校教育的分析中反映了阶级性;菲尼克斯(Phoenix,1994)关于青年社会认同的研究表明访问者的种族和社会性别的假设过于简单;里斯曼(Riessman,1987)指出,访谈中种族和阶级的不同在获得理解的过程中怎样优先于性别;米伦(Millen,1997)研究了当女性主义研究者与那些不赞同女性主义的女性一起研究时的潜在

问题。

关于女性主义研究者的研究影响

由于研究过程中存在多种观点、自我和认同,因而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的主观性变得非常重要,这种主观性成为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模糊的现象学和认识论界限的指示。传统的研究者不是没有注意到这一点,而是担心对主观性的强调,会导致"太亲密……而不能完全排除叙述和解释的主体间效度"(Komarovsky,1988,p.592;也可见 Komarovsky,1991)。这个问题直接导致了关于客观性、"效度和信度"及其中文本和声音的性质问题,后面将对此做简单讨论。不管这些问题,女性主义者开始出版反映这些模糊不清的界限的有争议的,有影响的著作:贝哈(Behar,1993)对墨西哥被调查者的生活和超越自己的民族、学科和个人领域局限的分析;埃利斯(Ellis,1995)对病危的研究及莱瑟和史密西斯(Lather & Smithies,1997)对艾滋病女性的研究。

研究中研究者角色的观点也引起了重要的研究反思,即重新思考是否"局内人"为女性主义研究者了解内部知识开拓了道路的重要问题,一个与科林斯(Collins,1986)"局内人/局外人"的重要概念有关的观点:扎维拉(Zavella,1996)发现她的墨西哥背景没有为她对工厂工作的墨西哥妇女的研究提供有效帮助;勒温(Lewin,1993)对女同性恋母亲的分析表明母性的重要性超过了性取向;纳莱延(Narayan,1997)问道,"一个'本土'的人类学家是怎样本土化的?";康多(Kondo,1990)讲述了以她日本人的身份在日本进行田野研究时的预想不到的,甚至无法控制的经历。这些研究和其他的一些研究,如翁格(Ong,1995)关于中国女性移民的研究和奈普尔(Naple,1996)关于爱荷华州女性的研究,都对具有一种文化的某些特性的女性研究者,由于那种背景,能完全接触到那种文化中的女性知识的观点提出了疑问。她们也困惑隐含的假设,即内在知识是统一的、固定的、不会改变的。威斯顿(Weston,1996)与这些问题的斗争概括了这个问题,"一个单独的个体不能跨越局内人和局外人、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的虚构的鸿沟。以我个人来讲,我二者都不是,但又二者都是。"(p.275)。

如果增长的复杂性动摇了研究者与研究对象曾经确定的观点,它也同样对女性研究者研究的一度理所当然的概念——经验和差异——产生了影响。

经　验

尽管在经验研究和观点框架中研究的女性主义定性研究者仍然将女性的经验作为关键因素,但也逐渐认识到只关注经验就不能考虑经验是怎样产生的(Morawski,1990;Scott,1991),物质、历史和社会环境的特点是什么。从解决问题的角度出发进行研究也会产生一个问题,即这项研究,即使是观点研究,虽然很少关注这个问题,但也是在复制而不是批判压迫系统。个人经验不是对知识的自我宣称(O'Leary,1997,p.47),后现代主义者的观点导致了直接关注实在主义而不依靠经验的风险。历史学家斯科特(Scott,1991)谈到,"经验是一种解释,并

需要解释”(p. 779)。

社会学和人类学中的女性主义研究分析了女性的经验和与经验相联系的物质环境、社会环境、经济环境和社会性别环境:霍克希尔德(Hochschild,1983)关于班机服务者怎样控制情绪的研究,格拉泽(Glazer,1991)对专业护理中种族和阶级的研究,休斯(Hughes,1992)对巴西东北部的母性和贫穷的研究,皮尔斯(Pierce,1995)对法律研究者怎样在法律机构的压抑的产生过程中发挥作用的民族志研究。历史学家克尔伯(Kerber,1998)对女性法律义务和权利的分析也可以归入此类。

差 异

对差异的认识,一种使女性主义思想家和研究者脱离了共享的女性中心认同的概念化运动,出现在刚刚讨论的研究中,但很快又让位于关注概念的最不受攻击的本质以及它的应用是否会导致男性中心的或帝国主义的“他人”(Felski,1997;hooks,1990,p. 22)。对这类概念应用的讨论,如杂交、混合和混血,费尔斯基(Felski,1997)认为这些隐喻“不仅认识到主体之间的差异、认同的整体观念的破裂和复杂化,而且通过对从属关系、相互借鉴、回应和重复的认识,以及从完全特权的立场取消差异指出了主体之间的关系”(p. 12)。

理论家图亚纳(Tuana,1993)阐明了可能的共同兴趣和明显的差异之间的平衡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会使女性主义研究者在她们的研究中抓住这些问题:

> 经验的多样性是现实的,这些多样性通过不同女性的经验的交叉或类似与其他人的经验联系起来。换句话说,与一系列具有连续性的类似事件相比,我们很少能发现不受经济状况、文化强制等影响的普遍共同经验,它类似一个有着相似性连续统的家族,允许经验之间的重大差异,例如一个上层阶级的美国白人女性和一个来自最低种姓的印度女性的不同经历。(p. 283)

然而,在对这种见解的回应中,胡克斯(hooks,1990)和科林斯(Collins,1990)仍然提醒女性主义研究者不能完全放弃一致性。她们宁愿将差异看成是独立的,而不是分裂的,知识的产生接受“来自他人观点的知识的存在和一致的可能性”(O'Leary,1997,p. 63)。这些观点反映了伽达默尔很少被认识到的“视野融合”的概念,“它引起了多重视角和辩证的观念,与观点认识论相比更进了一步,因为它指出了一种卓越的第三者的和新的观点或综合”(Nielsen,1990b,p. 29)。

社会性别

像经验和差异的概念一样,女性主义理论和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概念——社会性别,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使这一概念的现代用法比“第二次浪潮”初期更复杂,更具差异性。追溯到凯斯勒和麦肯纳(Kessler & McKenna,1978)的社会性别的经典的民族方法论框架的理论,包括巴特勒(Butler,1990)的表述行为的社会性别的哲学概括和劳伯(Lorber,1994,p. 5)关于社会性别是完全建构的论述,已经改变了研究的可能性。然而,早期关于社会性别差异的研究在于寻求单独的

个体的解释或特性(Gilligan,1982),现在,在物质、种族和历史环境的复杂矩阵中的社会性别的产生和实现成为研究的重点。女性之间的不同,正如男性与女性之间的相似性一样,已经被认识到了(Brabeck,1996;Lykes,1994)。社会性别作为原因解析、分析类别和研究暗示可以在霍克斯沃斯(Hawkesworth,1997a)的研究中找到,也出现在康奈尔(Connell,1997)、麦肯纳和凯斯勒(McKenna & Kessler,1997)、斯科特(Scott,1997)、史密斯(Smith,1997)对霍克斯沃斯问题的回应,以及霍克斯沃斯(Hawkesworth,1997b)对那些回应的答复中。

问题与张力

前面叙述的变化趋势强调和改变了女性主义定性研究的张力,产生了与研究自身的行动有关的新问题。而早期的研究问题是定性研究的传统问题(怎样处理"偏见",效度怎样,等等),而新的问题是关于声音、文本和道德行为的不确定形式,这是我要简单讨论的内容。女性主义经验主义者和那些在某一观点框架中研究的人倾向于共享这些问题,而那些追随解构主义者道路的人则很少关注偏见和效度,而更多地关注表达和文本以及描述中的主要问题,尽管也有例外(Lather & Smithies,1997)。许多女性主义者借鉴并掌握了这些问题,她们有时沉默,有时强调,许多仍然是互相联系的,特别是在运用写作、描述、声音和表格的实验研究中。

偏 见

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距离的消失以及对两者是相互依赖、非独立主体的认识(Britzman,1998,p. ix)超越了对研究者偏见的传统批判(Denzin,1992,pp. 49-52;Huber,1973),并导致对研究中研究者角色(Fine,1992b;Holland & Ramazanoglu,1994;Phoenix,1994;Warren,1998)和参与者的反映的"强烈反思"的讨论(Appleby,1997)。谢普尔-休斯(Scheper-Hughes,1992)所称的每个研究者引入到她或他的研究中的"文化自我"不再是要消除或控制的麻烦因素,而是一些资源。事实上,克里格(Krieger,1991)早期已经论述了自我的应用是定性研究的基础。如果研究者能对她们的计划进行充分地反思,她们就能利用这些资源去指导数据的收集、创造和解释,也包括她们自己的行动(Casper,1997;Daniels,1983;Stacey,1998)。布卢姆(Bloom,1998,p. 41)走得更远,她指出女性主义研究者和她们的参与者知道她们是怎样交流的,这也是研究叙述的一部分。然而,研究者的反思需运用研究者背景中隐藏的或她们没有意识到的特性因素的调和。当拥护马克思主义的归纳主义女性主义研究者"没有注意到压迫的隐含结构(研究参与者不是无所不知的)和压迫的隐含关系(参与者可能忽视了她具有的特权异于其他女性)"(p. 461)时,格雷里克(Gorelick,1991)明确了这些潜在的问题。谢普尔一休斯(Scheper-Hughes,1983)也提出了在她们的研究中女性主义者对男

性中心观点的无心复制。

客观性

在女性主义的研究中，偏见与主观性问题有关，并提出了客观性问题，甚至是最自由的叙述中的客观性问题（Cannon，Higginbotham，& Leung，1991）。女性主义研究者放弃了关于客观性的传统的和僵化的观点，为这一永恒问题的研究开辟了新的空间。哈丁（Harding，1993，p. 71）指出观察者的经验是非常有用的，并提出了“强烈客观性”的观点，使研究者与被研究者成为批判的、因果关系的、科学解释的中心（Hirsh & Olsen，1995），她还呼吁对研究者的社会地位进行批判研究（见 Harding，1996，1998）。另外，哈丁（Harding，1991）还提到，“强烈的客观性要求我们调查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否定其存在或寻求对这种关系的片面的控制”（p. 152）。她要求女性主义研究者将研究中的参与者作为“关注的背景”（gazing back），研究者从参与者的观点中找到她们自己的社会的现有计划①。这就超出了对研究行为的纯粹的反映，并要求对定性研究的个人的和组织间的知识产生机制进行坚定的深刻评价。正如霍兰德和拉马赞诺格卢（Holland & Ramazanoglu，1994）关于青年妇女性行为的研究中所阐述的，没有使解释的社会本质中立的方法。她们论述到：

> 女性主义研究者只能试图解释这些背景，在此背景之上通过使决策过程的明确化产生出选择性的诠释，而在此过程中又产生了作为决策之基础的方法的诠释和逻辑。这就要承认超出研究者经验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并意识到在她们的资料中缄默和缺失的可能性②（p. 133）。

哈拉维（Haraway，1997，p. 16）主张研究者超越强大的客观性分散研究，从而使研究者观察现象的方向转到多重的新的联合和可能性。

将女性主义的客观性从经典的实证主义定义的束缚和早期的相对主义（所有观点都是平等的）的迷失中解救出来，哈拉维（Haraway，1988）认识到使研究者和参与者已经融合并处于现存知识、责任（避免重新产生女性压迫观点的需要）和部分事实的显著位置。在哈拉维经常被引用的句子中，“没有出处的观点”变成了与具体存在的参与者联系的“有出处的观点”[例如哈拉维所用的客观性的概念，见：贝弗那尼（Bhavnani，1994）关于英国青年工人阶级的研究]。

效度和信度

与客观性有关的问题是叙述所反映或描述的研究者研究事物的程度。女性

---

① 韦斯威斯瓦兰（Visweswaran，1994）对反思民族志和解构民族志做了有益的区分。反思民族志提出了自己的权威，面对研究者的解释的过程和强调研究者怎样对她知道的进行思考；解构民族志放弃了权威，面对解释过程中的权力，并强调我们怎样思考我们知道我们的所知不是天真的。

② 其他的关于决策是怎样制定的女性主义的叙述，包括芬奇和马森（Finch & Mason，1990）关于她们怎样寻找“反例”的详细的报导和里斯曼（Riessman，1990）担心她对离异者报告的分析和社会学家的解释分析的忧虑。林（Ring，1987，p. 771），继黑格尔之后，断言辩证的思想阻碍了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之间界限的稳定。

主义定性研究者关注效度,也关注形成观点的不同方法的"信度"问题(Denzin,1997,pp. 1-14)。对那些在传统的反映社会科学(事实能够被发现)的实证主义起源的脉络中研究的人来说,研究效度有确定的方法。那些轻视这些方法的实证起源的人,相信有获得反映定性研究特性的有效的方法。她们确定信度的方法是通过诸如追踪和成员的"合法性"的策略,以及反映后实证主义观点的方法,这种方法不包括与"真实性"一致的硬性的标准(Lincoln & Guba,1985;Manning,1997)。有些研究者担心是否她们的研究过于尊重或欣赏与她们一起研究的人,并且是否将其他人转变为她们自己的另外版本的女性主义研究者获得了新的启示,如里查德森(Richardson,1993)所说的:

> 我质疑不同类型的效度,并提倡不同类型的科学实践。我所采用的科学实践的模式是女性主义的—后现代主义的形式。它模糊了类型,探查了生活经历,规范了科学,创造了女性形象,打破了二元性,有根据地描述了女性的劳动和情感反应,解构了情感自由的社会科学的神话,并为偏见、自我反思、张力和差异创造了空间(p. 695)。

在推测效度的新方法中(Denzin,1997,pp. 9-14;Scheurich,1997,pp. 88-92),莱瑟(Lather,1993)的违反效度(transgressive validity)是最完善的女性主义研究的模型,一种在女性的解构主义模式中提倡颠覆性运动的模型("保留这种形式去传播和结束标志它的符号";p. 674)。为了能获得导致批判的政治议程的转变空间之外的差异,莱瑟将违反的效度概括为四种类型:①讽刺效度(ironic validity)关注描述中的问题;②超越逻辑的效度(paralogic validity)寻求差异、反抗和不确定性;③根茎效度(rhizomatic validity)在多种场合反对权力;④沉醉效度(voluptuous validity)通过自我约定和反思从容不迫地寻求超越和权力(pp. 685-686)。在这些大胆的分类中,莱瑟克服了许多人所说的合法化中的顽固问题(研究的分析观点中研究者的不可避免的复制;Scheurich,1997,p. 90),在对女性主义定性研究者研究效度的固有问题提供指导时,这一形式仍然有女性解放的特征。莱瑟和史密西斯对艾滋病妇女的研究中指出了获得效度的策略,对女性主义的定性研究提出了质疑(Lather & Smithies,1997)。

声音、反思和文本的问题

不管采用什么观点,一个持续的令所有的女性主义定性研究者烦恼的问题是表达的问题,也是叙述的特性问题,正如蒂尔尼和林肯在她们对《陈述与文本》(*Representation and the Text*,Tierney & Lincoln,1997)的介绍中所说的"重新审查的出现"(p. viii),赫茨编辑的《反思与表达》(*Reflexity and voice*,Hertz,1997)一书的撰稿人也指出了这一点。这个问题可以追溯到女性主义研究的开端和这一章前面提到的,去发现和表达女性声音的尝试。当有色种族女性和后殖民的批评家关注通过什么权力和什么方式参与者的声音才能被听到时,深化、扩展了这一

问题。其中的主要问题是关于叙述是否只是重复了主要学科中出现的统治制度问题，如社会学（Smith，1989，p. 43），和将女性生活的个人问题解释为社会科学的潜在的、压迫的、扭曲的框架问题（Ribbens & Edwards，1998）。许多女性主义者已经提出了表达这一问题的方法，包括表达中心关系的相关的方法（Mauthner & Doucet，1998）、重建研究叙述（Brich，1998）和对较少权力的声音的描述（Standing，1998）。

声 音

怎样使女性的声音，没有剥夺或扭曲的声音被听到，同样是令人烦恼的问题。借用文学手法去表达声音时可能存在着控制的隐含性问题（Masica-Lees et al.，1989，p. 30）。尽管研究者和参与者可能适应了访谈情景中的沉默和评论，但进行叙述的研究者仍处在较权威的位置（Phoenix，1994；Stacey，1998）。只是让录音机运转，呈现回答者的声音，也不能克服陈述的问题，因为访问的过程中已经调和了回答者的评论（Lewin，1991），并且研究者还要对文本进行最后的处理（Lincoln，1997）。即使将这些叙述用于评论或者仅仅出于礼貌或将描述用于没有参与研究的回答者，如艾克、巴里和艾斯韦尔德（Acker，Barry & Esseveld，1991）在她们的参与方案中所发现的那样，妇女们希望研究者做解释。而且，观众的选择也决定怎样发现和形成声音（Kincheloe，1997；Lincoln，1993，1997）①。法恩（Fine，1992b）研究了声音应用的问题（描述的应用使个体的声音反映了群体的观点；假设声音独立于权力关系，研究者的失败使她们弄清了自己在声音关系中的位置，或成为"口技表演者"），并且极力主张女性研究者"清楚地表达如何、如何不，以及在什么条件下"形成和使用声音（pp. 217-219）②。法恩（个人交流，1998 年 3 月 2 日）也指出了法律中的声音问题（好像意识形态、领导权和解释没有触及它们）和通过理解声音产生的环境和支配的压力，批判地分析那些表达之间的张力。米勒（Miller，1997）的回应者对她的解释的抵抗使她提出了谁的知识和解释流行的问题。

叙述的特性

声音的问题引起了叙述的形式、特性和内容的问题，以及民族志描述的作品中的理论问题（Britzman，1995）。如今，重要的经验作品逐渐增多，一些建立在研

---

① 声音的考虑和文本的准备或可选择的陈述提出了出版类型问题。在流行杂志中提出研究资料可能会影响那些不可能接触或看到学术资料中传统的或经验叙述的读者。目前，极少的影响任期、升迁，或利益的理论回顾过程提高了这些外行出版物重要性的认识。莱瑟和史密西斯（Leather & Smithies，1997）采用全部与女性讨论的方法对艾滋病女性的研究中，最早将她们的原稿发表在众多读者通过超市就能获得的读物上。

② 早期的女性主义的叙述发展了新的方法来反映和表达声音，尽管并不是所有的都独立于法恩（Fine，1992b）讨论的问题（对于这类叙述的更多的内容见 Mascia-Lee et al.，1989，pp. 7-8，n. 1）。两个相对照的例子：肖斯塔克（Shostak，1981）对她的话和她的回答者尼莎的话进行了逐字逐句的对话式的叙述；而克里格（Krieger，1983）利用多声道设备记录了一个中西部同性恋社区中女性的声音。尽管克里格（Krieger）清楚地选择了叙述的材料，但她的表达是有缺憾的。

究的基础上，一些反映了女性主义研究者研究的高度反思的和具有洞察力的解释。一些作者利用印刷文本进行研究，其他的则选择了叙述的方式。

实验法也在很多领域繁荣起来①。沃尔弗(Wolf,1992)在台湾人类学田野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声音的三种形式：一个故事、人类学田野笔记和社会科学的文章。贝哈(Behar,1993)打破了生活史研究的传统的人类学形式，使她的声音和她的合作者的声音在双重语态的文本中交织在一起。莱瑟和史密西斯(Lather & Smithies,1997)利用分栏的文本形式表现了她们的研究叙述、回答者的观点、她们对自己的思考和她们研究的过程和结果。里查德森(Richardson,1992,1997)开创性地提出了社会学诗歌和故事的书写和描述(关于文本实践的更详细的内容，见本书第36章)。艾丽斯(Ellis,1995)的叙述、展示和文本，都涉及情感的话题，如堕胎、家庭成员的死亡、黑人—白人关系的经历和配偶的死亡。这一研究有助于为情感社会学研究确定经验的和女性主义的基调。自我民族志，艾丽斯关注的形式，将主体研究者的强烈的个人的和情感的经历置于与更大的社会问题相联系的情境中(Ellis & Bocher,1992,1996)。个人的、传记的、政治的和社会的叙述都与自我民族志交织在一起，自我民族志反过来给它们以启发(Denzin,1997,p.2000)，如埃林森(Ellingson,1998)对医疗机构中交流的反思性叙述。这些观点将个人的和政治的叙述联系起来，并减少了自我中心主义的个人思考的批判(Patti,1994)。

同时，一些女性主义者创作了表演的文本——戏剧读物和剧本。麦考尔和贝克(McCall & Becker,1990)关于艺术世界的研究和后来佩吉特(Paget,1990)关于一名误诊为癌症的女性的令人心酸的剧本都是早期的例子。最近，人类学家康多(Dorinne Kondo)的剧本《不光彩的行为》(*DisGraceful Conduct*)，关于学院中性和种族困扰的问题，围绕着改变“从纯粹的文本范式到表演的、短暂的、非话语的和合作的范式”，并试图介入到另一种康多(Kondo,1995)所谓的“完全不同于普通的学院式的普遍叙事的，有权力的参与形式”中(p.51)。十多年来，以表演文本(performance pieces)为特色的会议提上了女性主义和社会科学会议的议程，并吸引了许多有欣赏水平的，尽管不是能完全理解的观众。关于怎样评价这类研究的问题，对表演和戏剧作品深入思考的研究者已经开始研究(McWilliam,1997)，支持经验写作的评论家在讨论中提出的这个问题(Brown,1998)。

女性主义定性研究的道德规范

女性主义定性研究涉及许多道德问题，关于隐私、意见、秘密、虚伪和引起较

---

① 在巴巴拉(Barbara)和泰德洛克(Dennis Tedlock)的努力下，最好的杂志《美国人类学家》(*American Anthropologist*)通过了出版实验文本的政策，这一政策是几个社会学杂志早已赞同的新形式《定性研究》、《现代民族志》、《中西部社会学季刊》、《定性社会学》(*Qualitative Inquir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Midwest Sociological Quarterly*, *Qualitative Sociology*)。

大领域麻烦的欺骗，关注研究中正当的和公平的行为，避免资料收集和分析过程中或形成的文本中的任何形式的不利因素（不适当的压力，意想不到的公共注意和名誉的丧失）。在研究叙述中，女性主义者已经注意到道德问题，并将道德问题放在显著位置，如法恩和韦斯（Fine & Weis，1996）对她们与贫穷的工人阶级回答者的研究的担忧，卡索尔（Casoer，1997）关于胎儿手术的民族志研究的焦虑，斯泰西（Stacey，1998）关于与回答者的关系和研究道德描述的说明（Ribbens & Edwards，1998；M. A. Wolf，1996）。对一般的定性研究来说，这一点也是事实，即女性主义研究中所涉及的道德伦理问题已经变得更加复杂和特殊。一些研究者面对着强令交出她们的研究资料的威胁（Scarce，1994），州法律为任何人获得基金帮助研究的资料提供了可能，因此对许多人来说就有了对隐私和秘密的新的忧虑。在妇女的生产健康（特别是堕胎）、性取向和无家可归的妇女等领域研究的女性主义研究者对这些问题特别敏感。

这些新的问题和早已存在的关于避免欺骗和诡计而完全告知参与者研究的目标、策略和形式的问题共存。早期的定性的或女性主义文学的撰稿人认为知情同意有问题，但在整个研究过程中，包括成果的出版中，这些意见仍然还是稳定的、持久的。然而也很少注意到这些自由给予的意见会衰弱或改变以至于参与者对后来的研究表示好奇或甚至持怀疑和反对态度（May，1980）。尽管很少的女性主义研究经过指导，但还是存在着一个灰色的领域，在这一领域中谨慎地限制或模糊了有关研究者生活和经历的个人信息（D. L. Wolf，1996b，pp. 11-12），或其他的个人信息，包括性别、政治、金钱、社会阶级和种族，都进入了互动的复杂性中，这种复杂性是以参与者和研究者的自由主观主义和多重现实为特征的。前面的情况是一种研究策略，后面的是日常社会生活的特征。在这两种情况下，信息的缺失可能影响研究者和参与者信息的共同建构。

深思的研究者抓住了早期的和新出现的问题，如前面讨论的知识和社会过程改变了理所当然的女性主义的假设。就像林肯（Lincoln，1995，p. 287）深刻指出的，质量标准现在与道德问题纠缠在一起——例如，研究者指导和获得关于数据收集、分析和陈述的明确、公开和坦诚的协商。这与问题和知识在哪里和怎样产生的问题紧紧联系在一起。

尽管在女性主义研究的开始，一些人认为与女性的研究会产生友好的关系（Oakley，1981），但很快就否定了这一点。女性主义定性研究者对出现在女性主义定性研究主题中的道德问题变得敏感，也就是关于个体参与的问题。芬奇（Finch，1984）关于研究者为了社会沟通对参与者饥饿的无意控制的关注，首先指出了斯泰西（Stacey，1988）被广泛应用的文章和阿布-卢格霍德（Abu-Lughod，1990）关于女性主义定性研究方法论中的矛盾问题。斯泰西要求注意从把回答者作为一种方法到终结的和艰难的妥协的资料获得中的问题，这些问题也包括回答者对报告的控制。然而，这些问题，就像威斯特利（Wheatley，1994）后来指出的，是定性研究的特性，不能解决出现的所有道德困境。

其他的道德困境存在于对“女性话语的盗用”中（Opie，1992；Reay，1996b）。

在一项回答者参与意义制定过程的研究中,琼斯(Jones,1997)遇到了道德困境。当合法化的问题或对女性理所当然观点的质疑与女性主义的观点不一致时,就出现了另一个道德困境(Kitzinger & Wilson,1997)。护士中的女性主义研究者指出,另外的道德问题可能出现在自己的职业领域进行研究时,这种情况下,职业和研究角色可能发生冲突(Field,1991)。

女性主义研究中长期存在的观点是研究者比研究参与者更有权威,因为研究者是道德问题描述的作者。然而,女性主义定性研究者更近地看研究者与参与者的关系时,没有权力的参与者的形象已经发生了改变,同时也认识到研究者的“权力”通常是部分的(Ong,1995)、虚幻的(Visweswaran,1997;M. A. Wolf,1996)、稀有的(D. L. Wolf,1996b,p. 36),并混淆了研究者的责任(Bloom,1998,p. 35),而当研究者跨出这一领域时可能就处于比较有权力的位置,因为她们会描述这一切。

参与研究中的道德规范

这些道德问题和声音、叙述的问题都鲜明地出现在行动主义者的研究中。在这一研究中,研究者和参与者相互合作使女性能够对她们自己和她们的生活和世界的关注主题进行研究。参与研究(本书第22章进行了充分的讨论)面对着研究者和也是研究者的参与者对女性的知识,女性的陈述,资料收集、分析、解释,以及叙述的模式和合作团体关系的质疑。赖特和克雷伯(Light & Kleiber,1991)对温哥华女性健康团体的早期研究,描述了她们从传统的田野工作者到与女性健康团体成员合作研究者的转变,以及缩短研究者和参与者之间距离的困难。资料的所有权问题也出现了(Renzetti,1997)。权力持续问题是合作研究不能消除的利益竞争问题(Lykes,1989,p. 179)。麦金太尔和莱克斯(McIntyre & Lykes,1998)主张女性主义参与行动研究者应该对权力、特权和多种制度进行反思。

在这一意义上,参与者总是与研究者一起“做”研究,建构“资料”解释的意义。在一般的研究中,研究者进行解释,而在参与行动研究中,研究者与参与者一起从事这项工作(Cancian,1992,1996;Craddock & Reid,1993)。这就出现了评价问题(Lykes,1997)和曲解的处理问题。在合作研究的基础上,米斯(Mies,1993)通过研究参与者的偏见认同形成了“意识偏见”的概念(p. 68),引起了研究者和参与者的批判的概念距离,从而辩证地促进双方曲解的修正(Skeggs,1994)。

关于道德规范的女性主义研究

女性主义在两个领域对道德规范进行了研究:①关于道德伦理存在的问题;②健康护理中的实践和情景。关于道德存在的研究有一个很长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吉里根(Gilligan,1982)著名的存在争论的对年轻女孩的道德发展的研究(Benhabib,1987;Brabeck,1996;Koehn,1998;Larrabee,1993)。这一历史重复了

关于护理的问题(Larrabee,1993;Manning,1992;Tronto,1993)和护理所被给予的重要概念的和经验主义的女性主义文献(Olesen,1997,p. 398)的复杂论述。最近,理论家和研究者改变了伦理或道德行为是社会性别中固有的观点(实在论者认为女性是"天生的"照顾者),认为社会性别是社会建构的;认识到护理的特性来自个体与社会环境的相互作用(Seigfried,1996,p. 205)。这些新的关于护理的道德观点超出了对私人领域的个人关系的关注,而关注群体(Seigfried,1996,p. 210)和公共领域中社会转变的可能性(Tronto,1993,pp. 6-9;也可见本书第5章的相关内容)。

女性主义者对健康护理系统中女性的道德(或不道德)待遇的长期关注和研究已经发展到对新技术应用的研究,如帮助生产、遗传检验和所有民族中对老年人、贫困女性的平等照顾中长期存在的问题(Holmes & Purdy,1992;Sherwin,1992;Tong,1997)。

未实现的议程

像前面简单介绍的一样,在世纪之初,女性主义定性研究呈现出复杂的、多样的和具有高度活力的状态,也可以说没有一种单独的声音能占优势或特权地位。在这一领域中,理论的复杂性和观察的困难性决定了女性主义定性研究者所研究的许多主题中,多种声音的存在是可能的。这并不是说这些观点超过了能深化和提高她们将来对困难主题的研究批判。当然,女性主义定性研究的多样性是值得庆祝的,但不值得称赞。放弃强制的二元观点是正确的,这些二元论的观点提出了与传统方法的固有联系而反对所有绝对知识的主张。总体上来看,女性主义研究已发生了变化,正如理论家奥尔韦(Alway,1995)提到的,"试图在产生更少的失误,更少的偏颇和更少的荒谬的陈述的同时,不宣称有什么是绝对的和永远真实的"(p. 225)。这一观点依赖于一个重要的假设,即存在于特定的结构和历史、物质时代情境中的女性最适合发展她们生活的陈述。后来的观点对女性主义的研究是去理解——通过文本、话语和与女性的见面——女性生活是怎样联系的和建构的特殊的批判。

然而,在女性主义定性研究领域仍然有一些没有实现的议程。其中,最重要的是深度发掘种族、阶级和社会性别的意义是怎样出现和组合的,以及它们的不同影响,如科林斯(Collins,1993)对"真实母亲"的分析和艾伦(Allen,1994)对种族、民族和国籍的讨论。这一议程的复杂化是仍然没有完成前面提到的对白人的研究,有色种族的和不同社会地位的女性的议程、情境和机制的实现。因此,史密斯(Smith,1996)建议利用对应关系去发现人们协调行动的方法,特别是"那些联系不同经验场所的社会组织的形式和关系"(p. 194),提供了有希望的开始。埃斯皮恩(Espin,1995)在对移民女性的种族主义和性行为的分析也是这样的。

许多研究者仍然坚持资料收集、分析和经验活动描述的传统的女性主义的观点,另外,一些女性主义研究者也欣赏新的变化①。因此,不管将它们置于哪种研究潮流中,对所有的女性主义定性研究者都提出了两个问题。首先是陈述、声音和文本参与的不变的需求,以避免研究者的回答和代替参与者的陈述。这是一个通过研究资料或发现的简单陈述无法解决的问题。然而,也指出了研究者与参与者交错在一起的资料的共同创造中的固有的道德和分析困难。这不能回避研究者对叙述、文本和声音的责任,这一点前面引用的研究文本已经非常清楚了。

这一问题更加复杂的是这样一个事实,正如克拉夫(Clough,1993a)指出的"文本化不是指一个文本,而是在阅读和写作的活动中提出和抑制、设计和投入希望的过程"(p.175)。尽管这种观察是恰当的,但解决这个问题与选择和确定声音、文本等相比更加困难。不过,就像接下来要考虑的传统问题一样,值得更多地加以研究。

与之并行的依据研究特性采取不同形式的问题是信度和信任的问题,换句话说,就是不采用实证主义者根据知识的、理想的、不变的特征去测量知识的可接受性的测量标准,那又怎样去说明提出的主张是较少错误的、较少荒谬的和较少偏颇的。关于这个问题的较早的方法,在这里回顾的作者中,包括对女性主义研究者自己的立场、观点和实践的一丝不苟的、公开的质疑,将研究的视角转向她们自己,并总是寻找张力、矛盾和复杂性(Humphries,1997,p.7)。这种关注可能是不愉快的,像那些采用熟悉方法的人一样,它只是女性主义定性研究者获得新的和实验观点的一种策略。这样的不断反思不是没有困难:沃瑟福尔(Wasserfall,1997)描述了她自己和她的参与者之间的强烈的、充满张力的不同;劳瑟姆(Lawthom,1997)揭示了作为一名女性主义研究者在非女性主义研究中的问题;戴维斯和格里门(Davis & Gremmen,1998)发现女性主义者的理想有时妨碍了女性主义的研究。

情境和影响

在这一章中,我已经强调了对女性生活情境,以及具有本土框架和历史、物质倾向的现有知识认识的重要性。因此,将女性主义定性研究放在相互作用的情境进行研究是恰当的。

学院生活

学院生活的传统结构——至少在美国——影响了女性主义的定性研究。虽

① 在一篇和密西根大学女性与性别研究所的女性研究者合写的讨论里查德森的《游戏场》(*Fields of Play*)的评论性文章中,勒姆珀特(Lora Bex Lempert)论述了进入实验空间的学者为那些进行社会转型研究和议程共享研究的研究者创造的智力的和描述的空间。

然改革和变化的早期动力多数出现在学院之外，但在最近几十年，女性主义定性研究中主要智力活动在传统的院系中出现，通常是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科学、哲学和历史，跨学科的女性主义研究和文化研究项目中和诸如教育、护理和社会工作等专业的项目中。在这些领域中，发现关注女性问题、观点理论应用等方面发表的研究论文不是什么吃惊的事儿。女性主义定性研究以及支持它的女性主义的广泛存在，意味着高度的差异性的观点和成熟的水平，也指出了定性的女性主义研究的兼收并蓄，从不予考虑或敌视到对真实的、出色研究的赞美（取决于评价者对传统的或经验的观点的偏好）。这些反应如何转化成招聘、任期审查和刊物的采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一个引起好奇的问题是定性的女性主义研究策略的范围问题，一些从传统的观点中借鉴来的并经过修正的观点又被借用到其他学科中。这就产生了从其他的领域中区分女性主义研究的问题。许多女性主义研究者指出前面提到的女性主义研究的标准会继续从方法论上将相似的定性研究与女性主义研究区分开来。

女性主义定性研究是否会改变传统学科的问题取决于女性主义研究类型的复杂性和场所的结构特性。社会学和心理学固守实证主义的观点，这些学科中存在着阻碍或者促进女性主义转变的不同的理论观点（Stacey & Thorne，1985）。然而还是可以看到，这类变化的研究观点是否能重塑社会学，如史密斯（Smith，1974，1987，1989，1990a，1990b）对社会学的激进的批判和科林斯（Collins，1986，1990）对社会学中的二元论思想的影响和永恒的种族主义倾向，或者如克拉夫（Clough，1992，p. 137）提到的，放弃民族志的方法，关注“信息过程的每种形式中描述的重新解读”的解构的观点。在人类学中，贝哈（Behar，1993）和阿布-卢格霍德（Abu-Lughod，1990）提出了这一章中讨论的许多有影响的、传统的人种学观点等基本主题（自己/他人的分离，主体/客体的界限），可以使这一学科从殖民地的和拓殖的过去解放出来（Behar，1993，p. 302；不同的观点，见 Strathern，1987）。在心理学中，法恩和高登（Fine & Gordon，1992，p. 23）极力主张女性主义的心理学家在个人和政治的空间中进行研究，重建心理学，她们促进了行动主义的研究①。而格杰（Gergen，印刷中）为修正心理学，系统地陈述了解释的、后现代的议程。她指出，在心理学中女性主义者对确定的方法而不是有计划的超级理论进行了本土的和部分的改造。尽管女性主义的心理学仍在转变中，莫劳斯基（Morawski，1994）预见了心理研究的基本的新形式的基础。

像在其他的学科中一样，受财政限制的院系的困境影响了女性主义的定性研究。依靠兼职教员衰落的院系或项目，不是经验研究或传统研究转变的理想场所。这是现有女性主义研究者存在的平衡问题，这些女性主义研究者对其他的学者，而不是女性主义者，进行指导并与之联系起来。

① 奈里根、佐那斯、武斯特和格莱德（Narrigan，Zones，Worcester & Grad，1997）以及鲁泽克、奥利森和克拉克（Ruzek，Olesen & Clarke，1997）提出了女性健康中的行动主义的研究议程。

教区制度和出版实践

十多年来,出版者已经出版了上百种女性主义的作品——一些是理论的,一些是经验的,一些是实验的,一些是方法论的。学术论文和书籍的大量涌现,许多对定性的女性主义研究的复杂性的出现和增长有重要的影响,这是许多人欣喜的原因。三十年前,只能提供相对有限的作品。尽管如此,还是提出了关于女性主义研究的质量和将来,事实上,甚至是对过去评价的令人担忧的问题。尤其是许多作品,包括女性主义学者对非英语国家的研究,已经通过美国和英国的出版公司用英语出版了。市场压力显然使英语出版成为必然①。这也意味着获得出版的女性主义研究主要在美国或英国。这就导致对西方的、官僚社会所做的女性主义研究的无差别的观点和有限的或非实在的理解。

幸运的是,不同的观点,如后殖民地的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通过这些出版物消弱了关于"女性"的西方的和类似的假设。主要的女性主义杂志出版了来自亚洲、非洲、拉美、阿拉伯中东地区和西欧的研究者的论文,尽管这些出版还是少数。以女性主义书籍为特色的最主要的大学和商业出版机构已经出版了非美籍女性主义者的作品②。然而,就像莫里斯(Morris,个人交流,1999年4月15号)指出的,因为翻译和市场的问题,只出版了很少的来自非西方的女性主义者的研究成果,梅纳德(Maynard,1996)和史夫仁(Andre Schiffrin)也对此进行了批评。甚至在美国或英国之外用英文出版时,女性主义研究的专著也不会轻易引起西方女性主义者的兴趣,如内尔森和阿尔托德(Nelson & Altorki,1997)的"阿拉伯地区女性研究的专题研讨会"。国际女性主义会议开始讨论这些问题,例如洪堡大学跨学科妇女研究中心资助的在都柏林洪堡大学召开的会议。

在国际会议上可以听到一些这样的研究,但还远远不够,如关于女性健康问题的国际会议,一年两次在新西兰、丹麦、博茨瓦纳、泰国、埃及和韩国等地召开,并且相当多的参与者来自这些地区③。总起来说,许多国际性研究者的女性主义研究提供了补充主题以减弱英文出版物的分量和英语国家女性主义的优势地位。出版经济学指出这种情况可能会继续。然而,女性主义定性研究中增长的复杂性,像前面指出的,许多来自后殖民地的女性主义者的思考。国际性学者的

---

① 在此,我有义务就这些问题与莫里斯(Meaghan Morris)、邓津(Norman Denzin)、克拉夫(Patricia Clough)和林肯(Yvonna Lincoln)交换意见。在对这一部分有益地批判性阅读中,旧金山加利福尼亚大学社会和行动科学研究计划学院的乔治(Annie George)提出了一个问题:非西方国家的许多英文出版物在主要的数据库中没有被列出或被引用。

② 值得注意的是,最近几期英文的女性主义杂志有国际女性主义研究的内容,包括一期特别的《女性主义评论》(*Mohammed*,1988)和《符号》(*Signs*)的一个特别的栏目("性别、政治和伊斯兰教")。中国和日本的女性主义者关于女性办公室职员(Ogasawara,1998)和中国香港及中国南部的工厂女性工人的研究(Lee,1998)是大学和商业出版机构出版的国际性研究著作的范例,就像与女性主义有密切关系的国际性的学者的作品一样(John,1996;Narayan,1997)。

③ 对于那些利用计算机资源和互联网的女性主义定性研究者,女性主义者组织的大量的谈话内容和网站发布了在美国之外举行的国际性会议。然而,不管她们在哪里,计算机和网络资源都能有效地支持女性主义的定性研究。

新观点和策略也将会引起注意,不但在开明的英语国家的女性主义研究者之间,而且在关注出版利润的出版者之间。

结 论

女性主义定性研究以一种比"第二次浪潮"开始时更强硬的姿态进入新世纪,因为理论家和研究者对研究基础进行了批判的研究,并尝试新的经验的和传统的研究观点。最重要的是,女性主义定性研究者比早期更熟知和意识到研究的陈述和管理问题,也为更多的敏感性提供了空间,这一章引用的许多文章已清楚说明了这一点。令人高兴的是,对掌握女性的生活、环境的许多问题有更成熟的观点和更深刻的理解,即使不能解决这些问题,至少也对它们进行适度的干涉和改变。女性主义定性研究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的提出,并不意味着正统的学说——经验的或传统的——将盛行,在我的观念中也不应该那样。所有的女性主义定性研究者,在解决女性的生活和情境问题时,应该坦然地描述她们自己的实践问题,就像这一章引用的许多研究者所极力主张的那样。

另外,我认为:

> 认识到知识的产生是连续的机制——新的框架被其他的框架取代,继而产生新的框架的不断循环是非常重要的。而且,知识难免偏颇。许多人可能发现这些观点的混乱性并视其为不能给任何行动提供稳定根基的倾斜性的连续结构。并不是没有行动、改革、转变或解放的平台,只不过这一平台是非常短暂的。如果一个人的研究被另一个持有不同的更有效观点的研究者推翻或改变,那么,这个人应该感到高兴并继续前进……对于女性主义者更重要的是新的主题,女性主义研究关心和关注的问题不断地产生,不断地受到关注以产生在关键问题上对行动的更具差异性的理解(Olesen & Clarke,1999,p.356)①。

这些问题的范围比较广泛,所涉及的问题也非常迫切,对女性主义者来说还有许多事情要做。

参考文献

Abel, E., Christian, B., & Moglen, H. (Eds.). (1997). *Female subjects in black and white: Race, psychoanalysis, femin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Abel, E. K., & Nelson, M. K. (Eds.). (1990). *Circles of care: Work and identity in women's live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① 正如拉普顿(Lupton,1995)指出的,"重点不是去寻找一个确定的'事实',而是去发现起作用的不同的事实,去强调事实的短暂的政治特性以及不连续的、矛盾的主体立场"(pp.160-161)。

Abu-Lughod, L. (1990). Can there be a feminist ethnography? *Women and Performance*, 5 (1), 7-27.

Acker, J., Barry, K., & Esseveld, J. (1991). Objectivity and truth: Problems in doing feminist research. In M. M. Fonow & J. A. Cook (Eds.), *Beyond methodology: Feminist scholarship as lived research* (pp. 133-153).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Acker, S. (1994). *Gendered education: Sociological reflections on women, teaching and feminism.* Milton Keynes, England: Open University Press.

Alexander, M. J., & Mohanty, C. T. (Eds.). (1997). *Feminist genealogies, colonial legacies, democratic futures.* New York: Routledge.

Allen, S. (1994). Race, ethnicity and nationality: Some questions of identity. In H. Afshar & M. Maynard (Eds.), *The dynamics of "race" and gender: Some feminist interventions* (pp. 85-105). London: Taylor & Francis.

Alway, J. (1995). The trouble with gender: Tales of the still missing feminist revolution in sociological theory. *Sociological Theory*, 13, 209-228.

Anzaldúa, G. (1987). *Borderlands/la frontera: The new mestiza.* San Francisco: Aunt Lute.

Anzaldúa, G. (Ed.). (1990). *Making face, making soul/haciendo caras: Creative and critical perspectives by feminists of color.* San Francisco: Aunt Lute.

Appleby, Y. (1997). How was it for you? Intimate exchanges in feminist research. In M. Ang-Lyngate, C. Corrin, & H. S. Millson (Eds.), *Desperately seeking sisterhood: Still challenging and building* (pp. 127-147). London: Taylor & Francis.

Asch, A., & Fine, M. (1992). Beyond the pedestals: Revisiting the lives of women with disabilities. In M. Fine (Ed.), *Disruptive voices: The possibilities of feminist research* (pp. 139-174).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Ashe, M. (1988). Law-language of maternity: Discourse holding nature in contempt. *New England Law Review*, 521, 44-70.

Balsamo, A. (1993). On the cutting edge: Cosmetic surgery and the technological production of the gendered body. *Camera Obscura*, 28, 207-237.

Balsamo, A. (1999). Technologies of surveillance: Constructing cases of maternal neglect. In A. E. Clarke & V. L. Olesen (Eds.), *Revisioning women, health and healing: Feminist, cultural and technoscience perspectives* (pp. 231-253). New York: Routledge.

Bartlett, K. (1990). Feminist legal methods. *Harvard Law Review*, 103, 45-50.

Behar, R., (1993). *Translated woman: Crossing the border with Esperanza's story.* Boston: Beacon.

Behar, R. (1996). *The vulnerable observer: Anthropology that breaks your heart.* Boston: Beacon.

Behar, R., & Gordon, D. A. (Eds.). (1995). *Women writing cultur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nhabib, S. (1987). The generalized and the concrete other: The Kohlberg-Gilligan controversy and feminist theory. In S. Benhabib & D. Cornell (Eds.), *Feminism as critique* (pp. 77-95).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Benhabib. S. (1995). Feminism and postmodernism: An uneasy alliance. In S. Benhabib, J. Butler, D. Cornell, & N. Fraser, *Feminist contentions: A philosophical exchange* (pp. 17-34). New York: Routledge.

Benhabib, S., Butler, J., Cornell, D., & Fraser, N. (1995). *Feminist contentions: A philosophical exchange.* London: Routledge.

Bhavnani, K.-K. (1994). Tracing the contours: Feminist research and feminist objectivity. In H. Afshar & M. Maynard (Eds.), *The dynamics of "race" and gender: Some feminist interventions* (pp. 26-40). London: Taylor & Francis.

Bing, V. M., & Reid, P. T. (1996). Unknown women and unknowing research: Consequences of color and class in feminist psychology. In N. Goldberger, J. Tarule, B. Clinchy, & M. Belenky (Eds.), *Knowledge, difference, and power: Essays inspired by* Women's ways of knowing (pp. 175-205). New York: Basic

Books.

Birch, M. (1998). Reconstructing research narratives: Self and sociological identity in alternative settings. In J. Ribbens & R. Edwards (Eds.), *Feminist dilemmas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Public knowledge and private lives* (pp. 171-185). Thousand Oaks, CA: Sage.

Bloom, L. R. (1998). *Under the sign of hope: Feminist methodology and narrative interpretation.*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Brabeck, M. M. (1996). The moral self, values and circles of belonging. In K. F. Wyche & F. J. Crosby (Eds.), *Women's ethnicities: Journeys through psychology* (pp. 145-165). Boulder, CO: Westview.

Britzman, D. P. (1991). *Practice makes practice: A critical study of learning to teach.*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Britzman, D. P. (1995). The question of belief: Writing poststructural anthropology. *Qualitative Studies in Education*, 8, 229-238.

Britzman, D. P. (1998). Foreword. In L. R. Bloom, *Under the sign of hope, Feminist methodology and narrative interpretation* (pp. ix-xi).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Broom, D. (1991). *Damned if we do: Contradictions in women's health care.* Sydney: Allen & Unwin.

Brown, R. H. (1998). Review of *Fields of play: Constructing an academic life* by Laurel Richardson. *Contemporary Sociology*, 27, 380-383.

Brown, W. (1992). Finding the man in the state. *Feminist Studies*, 18, 7-34.

Butler, J. (1990). *Gender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London: Routledge.

Butler, J. (1993). *Bodies that matter: On the discursive limits of "sex".* New York: Routledge.

Butler, J. (1994). Against proper objects. *Differences*, 6, 1-16.

Butler, O. (1986). *Feminist experiences in feminist research.* Manchester: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Press.

Campbell, M., (1998). 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 and experience as data. *Qualitative Sociology*, 21, 55-74.

Campbell, M., & Manicom, A. (Eds.). (1995). *Knowledge, experience and ruling relations.*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Campbell, R. (1984). The virtues of feminist empiricism. *Hypatia*, 9, 90-115.

Cancian, F. M. (1992). Feminist science: Methodologies that challenge inequality. *Gender & Society*, 6, 623-642.

Cancian, F. M. (1996). Participatory research and alternative strategies for activist sociology. In H. Gottfried (Ed.), *Feminism and social change* (pp. 187-205).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Cannon, L. W., Higginbotham, E., & Leung, M. L. A. (1991). Race and class bias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on women. In M. M. Fonow & J. A. Cook (Eds.), *Beyond methodology: Feminist scholarship as lived research* (pp. 107-118).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Casper, M. J. (1997). Feminist politics and fetal surgery. Adventures of a research cowgirl on the reproductive frontier. *Feminist Studies*, 23, 233-262.

Casper, M. J. (1998). *The making of the unborn patient: Medical work and the politics of reproduction in experimental fetal surgery.*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Charmaz, K. (1995). Between positivism and postmodernism: Implications for methods. In N. K. Denzin (Ed.), *Studies in symbolic interaction* (Vol. 17, pp. 43-72). Greenwich, CT: JAI.

Charmaz, K., & Olesen, V. L. (1997). Ethnographic research in medical sociology: Its foci and distinctive contributions. *Sociological Methods & Research*, 25, 452-494.

Chase, S. E. (1995). *Ambiguous empowerment: The work narratives of women school superintendents.*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Chow, E. N. (1987). Tile development of feminist consciousness among Asian American women. *Gender & Society*, 1, 284-299.

Clarke, A. E. (1998). *Disciplining reproduction: Modernity, American life sciences, and the problems of sex.*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Clarke, A. E., & Olesen, V. L. (1999a). Revising, diffracting, acting. In A. E. Clarke & V. L. Olesen (Eds.), *Revisioning women, health and healing: Feminist, cultural and technoscience perspectives* (pp. 3-38). New York: Routledge.

Clarke, A. E., & Olesen, V. L. (Eds.). (1999b). *Revisioning women, health and healing: Feminist, cultural and technoscience perspectives.* New York: Routledge.

Clough, P. T. (1992). *The end(s) of ethnography: From realism to social criticism.* Newbury Park, CA: Sage.

Clough, P. T. (1993a). On the brink of deconstructing sociology: A critical reading of Dorothy Smith's standpoint epistemology. *Sociological Quarterly*, 34, 169-182.

Clough, P. T. (1993b). Response to Smith. *Sociological Quarterly*, 34, 193-194.

Clough, P. T. (1994). *Feminist thought: Desire, power and academic discourse.* Cambridge, MA: Blackwell.

Clough, P. T. (1998). *The end(s) of ethnography: From realism to social criticism* (2nd ed.). New York: Peter Lang.

Clough, P. T. (in press). *Autoaffection: The unconscious in the age of teletechnolog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Code, L. (1991). *What can she know? Feminist theor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knowledg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Collins, P. H. (1986). Learning from the outsider within: The soci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black feminist thought. *Social Problems*, 33, 14-32.

Collins, P. H. (1990). *Black feminist thought: Knowledge, consciousness, and the politics of empowerment.* New York: Routledge, Chapman & Hall.

Collins, P. H. (1992). Transforming the inner circle: Dorothy Smith's challenge to sociological theory. *Sociological Theory*, 10, 73-80.

Collins, P. H. (1997). Comment on Hekman's "Truth and method: Feminist standpoint theory revisited." *Signs*, 22, 375-381.

Collins, P. H. (1998a). *Fighting words: Black women and the search for justic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Collins, P. H. (1998b). What's going on? Black feminist thought and the politics of postmodernism. In P. H. Collins, *Fighting words: Black women and the search for justice* (pp. 124-154).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Collins, P. H. (1999). Will the "real" mother please stand up? The logic of eugenics and American national family planning. In A. E. Clarke & V. L. Olesen (Eds.), *Revisioning women, health and healing: Feminist, cultural and technoscience perspectives* (pp. 266-282). New York: Routledge.

Connell, R. W. (1992). A sober anarchism. *Sociological Theory*, 10, 81-87.

Connell, R. W. (1997). Comment on Hawkesworth's "Confounding gender." *Signs*, 22, 702-706.

Craddock, E., & Reid, M. (1993). Structure and struggle: Implementing a social model of a well woman clinic in Glasgow.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19, 35-45.

Crenshaw, K. (1992). Whose story is it, anyway? Feminist and antiracist appropriations of Anita Hill. In T. Morrison (Ed.), *Race-ing justice, en-gendering power: Essays on Anita Hill, Clarence Thoma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reality* (pp. 402-436). New York: Pantheon.

Daniels, A. K. (1983). Self-deception and selfdiscovery in field work. *Qualitative Sociology*, 6, 295-214.

Davis, A. Y. (1981). *Women, race and class.* London: Women's Press.

Davis, K. (1995). *Reshaping the female body: The dilemma of cosmetic surgery.* New York: Routledge.

Davis, K., & Gremmen, I. (1998). In search of heroines: Some reflections on normativity in feminist research. *Feminism and Psychology*, 8, 133-153.

de Lauretis, T. (1987). *Technologies of gender: Essays on theory, film, and fictio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Denzin, N. K. (1992).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and cultural studies. Newbury Park, CA:Sage.

Denzin, N. K. (1997). *Interpretive ethnography: Ethnographic practices for the 21st century*. Thousand Oaks, CA: Sage.

DeVault, M. L. (1991). *Feeding the family: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caring as gendered work*.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DeVault, M. L. (1996). Talking back to sociology: Distinctive contributions of feminist methodolog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2, 29-50.

DeVault, M. L. (1999a). *Liberating method: Feminism and social research*.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DeVault, M. L. (1999b). Whose science of food and health? Narratives of profession and activism from public health nutrition. In A. E. Clarke & V. L. Olesen (Eds.), *Revisioning women, health and healing: Feminist, cultural and technoscience perspectives* (pp. 166-186). New York: Routledge.

Dill, B. T. (1979). The dialectics of black womanhood. *Signs*, 4, 543-555.

Dutton, J., Groat, L., Hassinger, J., Lempert, L. B., & Ruehl, C. (1998). [Review of the book *Fields of play: Constructing an academic life*, by Laurel Richardson]. *Qualitative Sociology*, 21, 195-204.

Ehrenreich, B., & Piven, F. F. (1983). Women and the welfare state. In I. Howe (Ed.), *Alternatives: Proposals for America from the democratic left* (pp. 30-45). New York: Pantheon.

Eichler, M. (1986).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xist, non-sexist, woman-centered and feminist research. *Studies in Communication*, 3, 37-74.

Eichler, M. (1997). Feminist methodology. *Current Sociology*, 45, 9-36.

Ellingson, L. L. (1998). "Then you know how I feel": Empathy, identity, and reflexivity in fieldwork. *Qualitative Inquiry*, 4, 492-514.

Ellis, C. (1995). *Final negotiations: A story of love, loss, and chronic illness*.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Ellis, C., & Bochner, A. P. (1992). Telling and performing personal stories. In C. Ellis & M. G. Flaherty (Eds.), *Investigating subjectivity: Research on lived experience* (pp. 79-101). Newbury Park, CA: Sage.

Ellis, C., & Bochner, A. P. (Eds.). (1996). *Composing ethnography: Alternative forms of qualitative writing*. Walnut Creek, CA: AltaMira.

Epstein, C. F. (1981). *Women in law*. New York:Basic Books.

Espin, O. M. (1995). "Race," racism and sexuality in the life narratives of immigrant women. *Feminism and Psychology*, 5, 223-228.

Estes, C. L., & Edmonds, B. C. (1981). Symbolic interaction and social policy analysis. *Symbolic Interaction*, 4, 75-86.

Fee, E. (1983). Women and health care: A comparison of theories. In E. Fee (Ed.), *Women and health: The politics of sex in medicine* (pp. 10-25). Englewood Cliffs, NJ: Baywood.

Felski, R. (1997). The doxa of difference. *Signs*,23, 1-22.

Ferguson, K. (1993). *The man question: Visions of subjectivity in feminist the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Field, P. A. (1991). Doing fieldwork in your own culture. In J. M. Morse (Ed.), *Qualitative nursing research: A contemporary dialogue* (pp. 91-104). Newbury Park, CA:Sage.

Finch, J. (1984). "It's great to have someone to talk to": The ethics and politics of interviewing women. In C. Bell & H. Roberts (Eds.), *Social researching: Politics, problems, practice* (pp. 70-87).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Finch, J. (1986). *Research and policy: The use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social and educational research*. London: Falmer.

Finch, J., & Groves, D. (1983). *A labour of love: Women, work and caring*.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Finch, J., & Mason, J. (1990). Decision taking in the fieldwork process: Theoretical sampling and collaborative working. In R. G. Burgess (Ed.), *Studies in qualitative methodology: Vol. 2. Reflections on field experience* (pp. 25-

50). Greenwich, CT: JAI.

Fine, M. (Ed.). (1992a). *Disruptive voices: The possibilities of feminist research.*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Fine, M. (1992b). Passions, politics and power: Feminist research possibilities. In M. Fine (Ed.), *Disruptive voices: The possibilities of feminist research* (pp. 205-232).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Fine, M., & Gordon, S. M. (1992). Feminist transformations of/despite psychology. In M. Fine (Ed.), *Disruptive voices: The possibilities of feminist research* (pp. 1-25).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Fine, M., & Weis, L. (1996). Writing the "wrongs" of fieldwork: Confronting our own research/writing dilemma in urban ethnographies. *Qualitative Inquiry*, 2, 151-174.

Fisher, S. (1995). *Nursing wounds: Nurse practitioners, doctors, women patients, and the negotiation of meaning.*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Flax, J. (1987). Postmodernism and gender relations in feminist theory. *Signs*, 14, 621-643.

Flax, J. (1990). *Thinking fragments: Psychoanalysis, feminism, and postmodernism in the contemporary Wes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Fonow, M. M., & Cook, J. A. (Eds.). (1991). *Beyond methodology: Feminist scholarship as lived research.*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Frankenberg, R. (1993). *White women, race matters: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whitenes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Frankenberg, R., & Mani, L. (1993). Cross currents, cross talk: Race, postcoloniality and the politics of location. *Cultural Studies*, 7, 292-310.

Fraser, N. (1989). Struggle over needs: Outline of a socialist-feminist critical theory of late capitalist political culture. In N. Fraser, *Unruly practices: Power, discourse, and gender in contemporary social theory* (pp. 161-187).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Fraser, N. (1997). *Justice interruptus: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the post-socialist condition.* New York: Routledge.

Fry, M. J. (1992). *Postmodern legal feminism.* London: Routledge.

Game, A. (1991). *Undoing the social: Towards a deconstructive sociology.* Milton Keynes, UK: Open University Press.

Garcia, A. M. (1989). The development of Chicana feminist discourse, 1970-1980. *Gender & Society*, 3, 217-238.

Gender, politics and Islam [Special section]. (1998, Winter). *Signs.*

Gergen, M. M. (in press). *Psychology and gender.* Thousand Oaks, CA: Sage.

Gill, C. J. (1997). The last sisters: Health issues of women with disabilities. In S. B. Ruzek, V. L. Olesen, & A. E. Clarke (Eds.), *Women's health: Complexities and differences* (pp. 96-112). 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Gilligan, C. (1982). *In a different voice: Psychological theory and women's developmen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Ginsburg, F. D. (1998). *Contested lives: The abortion debate in an American community* (Rev. e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Glazer, N. Y. (1991). "Between a rock and a hard place": Women's professional organizations in nursing and class, racial, and ethnic inequalities. *Gender & Society*, 5, 351-372.

Glenn, E. N. (1990). The dialectics of wage work: Japanese-American women and domestic service, 1905-1940. In E. C. DuBois & V. L. Ruiz (Eds.), *Unequal sisters: A multi-cultural reader in U. S. women's history* (pp. 345-372). London: Routledge.

Glucksman, M. (1994). The work of knowledge and the knowledge of women's work. In M. Maynard & J. Purvis (Eds.), *Researching women's lives from a feminist perspective* (pp. 149-165). London: Taylor & Francis.

Gordon, L. (1976). *Women's body, women's right.* New York: Grossman.

Gordon, L. (1994). *Pitied but not entitled: Single mothers and the history of welfare.* New York:

Free Press.

Gorelick, S. (1991). Contradictions of feminist methodology. *Gender & Society*, 5, 459-477.

Graham, H. (1984). *Women, health and the family*. Brighton: Wheatsheaf Harvester.

Graham, H. (1985). Providers, negotiators and mediators: Women as the hidden carers. In E. Lewin & V. L. Olesen (Eds.), *Women, health and healing: Toward a new perspective* (pp. 25-52). London: Tavistock.

Green, R. (1990). The Pocahontas perplex: The image of Indian women in American culture. In E. C. DuBois & V. L. Ruiz (Eds.), *Unequal sisters: A multi-cultural reader in U. S. women's history* (pp. 15-21). London: Routledge.

Griffith, A., & Smith, D. E. (1987). Constructing knowledge: Mothering as discourse. In J. Gaskell & A. McLaren (Eds.), *Women and education* (pp. 87-103). Calgary: Detselig.

Gubrium, J. F., & Holstein, J. A. (1997). *The new language of qualitative metho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Guinier, L., Fine, M., & Balin, J. (1997). *Becoming gentlemen: Women, law school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Boston: Beacon.

Gupta, A., & Ferguson, J. (Eds.). (1997). *Anthropological locations: Boundaries and grounds of a field scienc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Haraway, D. J. (1988). Situated knowledges: The science question in feminism and the privilege of partial perspective. *Feminist Studies*, 14, 575-599.

Haraway, D. J. (1991). *Simians, cyborgs, and women: 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 New York: Routledge.

Haraway, D. J. (1997). *Modest_witness@second_millennium: Femaleman meets Oncomouse*. New York: Routledge.

Harding, S. (1987). Conclusion: Epistemological questions. In S. Harding (Ed.), *Feminism and methodology: Social science issues* (pp. 181-190).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Harding, S. (1990). Feminism, science and the anti-Enlightenment critiques. In L. J. Nicholson (Ed.), *Feminism/postmodernism* (pp. 83-105). New York: Routledge.

Harding, S. (1991). "Strong objectivity" and socially situated knowledge. In S. Harding, *Whose science? Whose knowledge? Thinking from women's lives* (pp. 138-163).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Harding, S. (1993). Rethinking standpoint epistemology: What is "strong objectivity"? In L. Alcoff & E. Potter (Eds.), *Feminist epistemologies* (pp. 49-82). New York: Routledge.

Harding, S. (1996). Gendered ways of knowing and the "epistemological crisis" of the West. In N. Goldberger, J. Tarule, B. Clinchy, & M. Belenky (Eds.), *Knowledge, difference, and power: Essays inspired by* Women's ways of knowing (pp. 431-454). New York: Basic Books.

Harding, S. (1997). Comment on Hekman's "Truth and method: Feminist standpoint theory revisited." *Signs*, 22, 382-391.

Harding, S. (1998). *Is science multicultural? Postcolonialisms, feminisms, and episte-mologie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Hartouni, V. (1997). *Cultural conceptions: On reproductive technologies and the remaking of lif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Hartsock, N. C. M. (1983). The feminist standpoint: Developing the ground for a specifically feminis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S. Harding & M. B. Hintikka (Eds.), *Discovering reality* (pp. 283-310). Amsterdam: D. Reidel.

Hartsock, N. C. M. (1985). *Money, sex and power: Towards a feminis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Boston: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Hartsock, N. C. M. (1990). Foucault on power: A theory for women? In L. J. Nicholson (Ed.), *Feminism/postmodernism* (pp. 157-175). New York: Routledge.

Hartsock, N. C. M. (1997a). Comment on Hekman's "Truth and method: Feminist standpoint theory revisited": Truth or justice?

Signs, 22, 367-374.

Hartsock, N. C. M. (1997b). Standpoint theories for the next century. In S. J. Kenney & H. Kinsella (Eds.), *Politics and feminist standpoint theories* (pp. 93-101). New York: Haworth.

Hartsock, N. C. M. (1998). *The feminist standpoint revisited and other essays.* Boulder, CO: Westview.

Hawkesworth, M. E. (1989). Knowers, knowing, known: Feminist theory and claims of truth. In M. R. Malson, J. F. O'Barr, S. Westphal Wihl, & M. Wyer (Eds.), *Feminist theory in practice and process* (pp. 327-351).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Reprinted from *Signs*, 1989, 14, 533-557)

Hawkesworth, M. E. (1990a). Reply to Hekman. *Signs*, 15, 420-423.

Hawkesworth, M. E. (1990b). Reply to Shogan. *Signs*, 15, 426-428.

Hawkesworth, M. E. (1997a). Confounding gender. *Signs*, 22, 649-686.

Hawkesworth, M. E. (1997b). Reply to McKenna and Kessler, Smith, Scott and Connell: Interrogating gender. *Signs*, 22, 707-713.

Hekman, S. (1990a). Comment on Hawkesworth's "Knowers, knowing, known: Feminist theory and claims of truth." *Signs*, 15, 417-419.

Hekman, S. (1990b). *Gender and knowledge: Elements of a post-modern feminism.* Boston: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Hekman, S. (1997a). Reply to Hartsock, Collins, Harding and Smith. *Signs*, 22, 399-402.

Hekman, S. (1997b). Truth and method: Feminist standpoint theory revisited. *Signs*, 22, 341-365.

Heng, G. (1997). "A great way to fly": Nationalism, the state and varieties of Third World feminism. In M. J. Alexander & C. T. Mohanty (Eds.), *Feminist genealogies, colonial legacies, democratic futures* (pp. 30-45). New York: Routledge.

Hertz, R. (Ed.). (1997). *Reflexivity and voice.* Thousand Oaks, CA: Sage.

Hine, D. C. (1989). *Black women in white: Racial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in the nursing profession*, 1890-1950.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Hippensteele, S. K. (1997). Activist research and social narratives: Dialectics of power, privilege,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M. D. Schwartz (Ed.), *Researching sexual violence against women: Methodological and personal perspectives* (pp. 74-85). Thousand Oaks, CA: Sage.

Hirschmann, N. J. (1997). Feminist standpoint as postmodern strategy. In S. J. Kenney & H. Kinsella (Eds.), *Politics and feminist standpoint theories* (pp. 73-92). New York: Haworth.

Hirsh, E., & Olson, G. A. (1995). Starting from marginalized lives: A conversation with Sandra Harding. In G. A. Olson & E. Hirsh (Eds.), *Women writing culture* (pp. 3-42).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Hochschild, A. R. (1983). *The managed heart: Commercialization of human feeling.*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Hochschild, A. R. (with MacHung, A.). (1989). *The second shift: Working parents and the revolution at home.* New York: Viking.

Holland, J., & Ramazanoglu, C. (1994). Coming to conclusions: Power and interpretation in researching young women's sexuality. In M. Maynard & J. Purvis (Eds.), *Researching women's lives from a feminist perspective* (pp. 125-148). London: Taylor & Francis.

Holmes, H. B., & Purdy, L. M. (Eds.). (1992). *Feminist perspectives in medical ethic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Hondagneu-Sotelo, P. (1992). Overcoming patriarchal constraints: The reconstruction of gender relations among Mexican immigrant women and men. *Gender & Society*, 6, 393-415.

hooks, b. (1984). *Feminist theory: From margin to center.* Boston: South End.

hooks, b. (1990). The politics of radical black subjectivity. In b. hooks, *Yearning: Race, gender, and cultural politics* (pp. 15-22). Boston: South End.

Huber, J. (1973). Symbolic interaction as a pragmatic perspective: The bias of emergent theor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8, 274-284.

Huff, J. K. (1997). The sexual harassment of

researchers by research subjects: Lessons from the field. In M. D. Schwartz (Ed.), *Researching sexual violence against women: Methodological and personal perspectives* (pp. 115-128). Thousand Oaks, CA: Sage.

Huisman, K. A. (1997). Studying violence against women of color: Problems faced by white women. In M. D. Schwartz (Ed.), *Researching sexual violence against women: Methodological and personal perspectives* (pp. 179-192). Thousand Oaks, CA: Sage.

Humphries, B. (1997). From critical thought to emancipatory action: Contradictory research goals. *Sociological Research Online*, 2,1-9.

Hundleby, C. (1997). Where standpoint stands now. In S. J. Kenney & H. Kinsella (Eds.), *Politics and feminist standpoint theories* (pp. 25-44). New York: Haworth.

Hunt, L. M., Jordan, B., Irwin, S., & Browner, C. H. (1989). Compliance and the patient's perspective: Controlling symptoms in everyday life. *Culture, Medicine and Psychiatry*, 13, 315-334.

Hurtado, A. (1989). Relating to privilege: Seduction and rejection in the subordination of white women and women of color. *Signs*, 14, 833-855.

Hurtado, A., & Stewart, A. J. (1997). 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 Implications of studying whiteness for feminist methods. In M. Fine, L. C. Powell, L. Weis, & L. M. Wong (Eds.), *Off white: Readings on race, power and Society* (pp. 297-311). New York: Routledge.

Joffe, C. (1995). *Doctors of conscience: The struggle to provide abortion before and after Roe v. Wade.* Boston: Beacon.

Johannsen, A. M. (1992). Applied anthropology and post-modernist ethnography. *Human Organization*, 51, 71-81.

John, M. E. (1996). *Discrepant dislocations: Feminism, theory, and postcolonial histori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Jones, S. J. (1997). Reflexivity and feminist practice: Ethical dilemmas in negotiating meaning. *Feminism and Psychology*, 7,348-353.

Kaplan, E. B. (1997). *Not our kind of girl: Unraveling the myths of black teenage motherhoo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Kasper, A. (1994). A feminist qualitative methodology: A study of women with breast cancer. *Qualitative Sociology*, 17, 263-281.

Kaufert, P. A., & McKinlay, S. M. (1985). Estrogen-replacement therapy: The production of medical knowledge and the emergence of policy. In E. Lewin & V. L. Olesen (Eds.), *Women, health and healing: Toward a new perspective* (pp. 113-138). London: Tavistock.

Kelly, L., Burton, S., & Regan, L. (1994). Researching women's lives or studying women's oppression? Reflections on what constitutes feminist research. In M. Maynard & J. Purvis (Eds.), *Researching women's lives from a feminist perspective* (pp. 27-48). London: Taylor & Francis.

Kennedy, E. L., & Davis, M. D. (1993). *Boots of leather, slippers of gold: The history of a lesbian community.* New York: Routledge.

Kenney, S. J., & Kinsella, H. (Eds.). (1997). *Politics and feminist standpoint theories.* New York: Haworth.

Kerber, L. (1998). *No constitutional right to be ladies: Women and the obligation of citizenship.* New York: Hill & Wang.

Kessler, S., & McKenna, W. (1978) *Gender: An ethnomethodological approach.* New York: John Wiley.

Kincheloe, J. L. (1997). Fiction formulas: Critical constructivism and the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 In W. G. Tierney & Y. S. Lincoln (Eds.), *Representation and the text: Re-framing the narrative voice* (pp. 57-80).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Kirby, V. (1991). Comment on Mascia-Lees, Sharpe, and Cohen's "The postmodernist turn in anthropology: Cautions from a feminist perspective." *Signs*, 16, 394-400.

Kitzinger, C., & Wilkinson, S. (1997). Validating women's experiences? Dilemmas in feminist research. *Feminism and Psychology*, 7, 566-574.

Koehn, D. (1998). *Rethinking feminist ethics: Care, trust and empathy.* New York: Routledge.

Komarovsky, M. (1988). The new feminist scholarship: Some precursors and polemic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50, 585-593.

Komarovsky, M. (1991).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feminist scholarship in sociolog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7, 1-25.

Kondo, D. K. (1990). *Crafting selves: Power, gender, and discourses of identity in a Japanese workpla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Kondo, D. K. (1995). Bad girls: Theater, women of color, and the politics of representation. In R. Behar & D. A. Gordon (Eds.), *Women writing culture* (pp. 49-64).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Krieger, S. (1983). *The mirror dance: Identity in a women's community.*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Krieger, S. (1991). *Social science and the self: Personal essays on an art form.*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Larrabee, M. J. (Ed.). (1993). *An ethic of care: Feminist and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New York: Routledge.

Lather, P. (1991). *Getting smart: Feminist research and pedagogy with/in the post-modern.* New York: Routledge.

Lather, P. (1993). Fertile obsession: Validity after poststructuralism. *Sociological Quarterly*, 34, 673-693.

Lather, P., & Smithies, C. (1997). *Troubling the angels: Women living with HIV/AIDS.* Boulder, CO: Westview.

Lawthom, R. (1997). What can I do? A feminist researcher in non-feminist research. *Feminism and Psychology*, 7, 533-538.

Lee, C. K. (1998). *Gender and the south China miracle: Two worlds of factory wome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Lemert, C. (1992). Subjectivity's limit: The unsolved riddle of the standpoint. *Sociological Theory*, 10, 63-72.

Lemert, C. (1997). *Postmodernism is not what you think.* Malden, MA: Blackwell.

Lempert, L. B. (1994). Narrative analysis of abuse: Connecting the personal, the rhetorical, and the structural.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22, 411-441.

Lewin, E. (1991). Writing gay and lesbian culture: What the natives have to say for themselves. *American Ethnologist*, 18, 786-792.

Lewin, E. (1993). *Lesbian mothers: Accounts of gender in American cultur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Lewin, E. (1996a). Introduction. In E. Lewin (Ed.), *Inventing lesbian cultures in America* (pp. 1-11). Boston: Beacon.

Lewin, E. (Ed.). (1996b). *Inventing lesbian cultures in America.* Boston: Beacon.

Lewin, E. (1998). *Recognizing ourselves: Ceremonies of lesbian and gay commitmen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Lewin, E., & Leap, W. L. (Eds.). (1996). *Out in the field: Reflections of lesbian and gay anthropologists.*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Light, L., & Kleiber, N. (1981). Interactive research in a feminist setting. In D. A. Messerschmidt (Ed.), *Anthropologists at home in North America: Methods and issues in the study of one's own society* (pp. 167-18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incoln, Y. S. (1993). I and thou: Method, voice, and roles in research with the silenced. In D. McLaughlin & W. G. Tierney (Eds.), *Naming silenced lives: Personal narratives and processes of educational change* (pp. 20-27). New York: Routledge.

Lincoln, Y. S. (1995). Emerging criteria for quality in qualitative and interpretive inquiry. *Qualitative Inquiry*, 1, 275-289.

Lincoln, Y. S. (1997). Self, subject, audience, text: Living at the edge, writing in the margins. In W. G. Tierney & Y. S. Lincoln (Eds.), *Representation and the text: Re-framing the narrative voice* (pp. 37-56).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Lincoln, Y. S., & Guba, E. G. (1985). *Naturalistic inquiry.* Beverly Hills, CA: Sage.

Longino, H. (1990). *Science as social knowledg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Longino, H. (1993). Subjects, power, and knowledge: Description and prescription in feminist philosophies of science. In L. Alcoff & E. Potter (Eds.), *Feminist epistemologies* (pp. 101-120). New York: Routledge.

Lorber, J. (1975). Women and medical sociology: Invisible professionals and ubiquitous patients. In M. M. Millman & R. M. Kanter (Eds.), *Another voice: Feminist perspectives on social life and social science* (pp. 75-105). Garden City, NY: Anchor.

Lorber, J. (1994). *Paradoxes of gender.*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Lubelska, C., & Mathews, J. (1997). Disability issues in the politics and processes of feminist studies. In M. Ang-Lygate, C. Corrin, & M. S. Henry (Eds.), *Desperately seeking sisterhood: Still challenging and building* (pp. 117-137). London: Taylor & Francis.

Luker, K. (1984). *Abor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motherhoo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Luker, K. (1996). *Dubious conceptions: The politics of teenage pregnanc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upton, D. (1995). *The imperative of health: Public health and the regulated body.* Thousand Oaks, CA: Sage.

Lykes, M. B. (1989). Dialogue with Guatemalan Indian women: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constructing collaborative research. In R. K. Unger (Ed.), *Representations: Social constructions of gender* (pp. 167-184). Amityville, NY: Baywood.

Lykes, M. B. (1994). Whose meeting at which crossroads? A response to Brown and Gilligan. *Feminism and Psychology*, 4, 345-349.

Lykes, M. B. (1997). Activist participatory research among the Maya of Guatemala: Constructing meanings from situated knowledge.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53, 725-746.

MacKinnon, C. (1982). Feminism, Marxism, method and the state: An agenda for theory. *Signs*, 7, 515-544.

MacKinnon, C. (1983). Feminism, Marxism and the state: Toward feminist jurisprudence. *Signs*, 8, 635-658.

Maines, D. (1982). In search of the meso-structure: Studies in the negotiated order. *Urban Life*, 11, 267-279.

Manning, K. (1997). Authenticity in constructivist inquiry: Methodological considerations without prescription. *Qualitative Inquiry*, 3, 93-116.

Manning, R. C. (1992). *Speaking from the heart: A feminist perspective on ethics.* Boston: Rowan & Littlefield.

Martin, E. (1987). *The woman in the body: A cultural analysis of reproduction.* Boston: Beacon.

Martin, E. (1999). The woman in the flexible body. In A. E. Clarke & V. L. Olesen (Eds.), *Revisioning women, health and healing: Feminist, cultural and technoscience perspectives* (pp. 97-118). New York: Routledge.

Mascia-Lees, F. E., Sharpe, P., & Cohen, C. B. (1989). The postmodernist turn in anthropology: Cautions from a feminist perspective. *Signs*, 15, 7-33.

Mascia-Lees, F. E., Sharpe, P., & Cohen, C. B. (1991). Reply to Kirby. *Signs*, 16, 401-408.

Matsuda, M. (1992). *Called from within: Early women lawyers of Hawaii.*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Matsuda, M. (1996). *Where is your body? And other essays on race, gender and the law.* Boston: Beacon.

Mattley, C. (1997). Field research with phone sex workers: Managing the researcher's emotions. In M. D. Schwartz (Ed.), *Researching sexual violence against women: Methodological and personal perspectives* (pp. 101-114). Thousand Oaks, CA: Sage.

Mauthner, N., & Doucet, A. (1998). Reflections on a voice-centered relational method: Analyzing maternal and domestic voices. In J. Ribbens & R. Edwards (Eds.), *Feminist dilemmas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Public knowledge and private lives* (pp. 119-146). Thousand Oaks, CA: Sage.

May, K. A. (1980). Informed consent and role conflict. In A. J. Davis & J. C. Krueger

(Eds.), *Patients, nurses, ethics* (pp. 109-118). New York: American Journal of Nursing.

Maynard, M. (1994a). Race, gender and the concept of "difference" in feminist thought. In H. Afshar & M. Maynard (Eds.), *The dynamics of "race" and gender: Some feminist interventions* (pp. 9-25). London: Taylor & Francis.

Maynard, M. (1994b). Methods, practice and epistemology: The debate about feminism and research. In M. Maynard & J. Purvis (Eds.), *Researching women's lives from a feminist perspective* (pp. 10-26). London: Taylor & Francis.

Maynard, M. (1996). Challenging the boundaries: Towards an anti-racist women's studies. In M. Maynard & J. Purvis (Eds.), *New frontiers in women's studies: Knowledge, identity and nationalism* (pp. 11-29). London: Taylor & Francis.

Maynard, M., & Purvis, J. (Eds.). (1994). *Researching women's lives from a feminist perspective.* London: Taylor & Francis.

McCall, M. M., & Becker, H. S. (1990). Performance science. *Social Problems*, 37, 116-132.

McIntyre, A., & Lykes, M. B. (1998). Who's the boss? Confronting whiteness and power differences within a feminist mentoring relationship in 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 *Feminism and Psychology*, 8, 427-444.

McKenna, W., & Kessler, S. (1997). Comment on Hawkesworth's "Confounding gender": Who needs gender theory? *Signs*, 22, 687-691.

McWilliam, E. (1997). Performing between the posts: Authority, posture and contemporary feminist scholarship. In W. G. Tierney & Y. S. Lincoln (Eds.), *Representation and the text: Re-framing the narrative voice* (pp. 219-232).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Mies, M. (1993). Towards a methodology for feminist research. In M. Hammersley (Ed.), *Social research: Philosophy, politics and practice* (pp. 64-82). London: Sage.

Millen, D. (1997). Some methodological and epistemological issues raised by doing feminist research on non-feminist women. *Sociological Research Online*, 2, 2-18.

Miller, G., & Dingwall, R. (Eds.). (1997). *Context and method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Thousand Oaks, CA: Sage.

Miller, J. (1997). Researching violence against street prostitutes: Issues of epistemology, methodology, and ethics. In M. D. Schwartz (Ed.), *Researching sexual violence against women: Methodological and personal perspectives* (pp. 144-156). Thousand Oaks, CA: Sage.

Mohammed, P. (1998, Summer). Rethinking Caribbean difference [Special issue]. *Feminist Review.*

Mohanty, C. T. (1988). Under Western eyes: Feminist scholarship and colonial discourses. *Feminist Review*, 30, 60-88.

Montini, T. (1997). Resist and redirect: Physicians respond to breast cancer informed consent legislation. *Women and Health*, 12, 85-105.

Morawski, J. (1990). Toward the unimagined: Feminism and epistemology in psychology. In R. Hare-Mustin & J. Marecek (Eds.), *Making a difference: Psycholog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gender* (pp. 159-183).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Morawski, J. (1994). *Practicing feminisms, reconstructing psychology: Notes on a liminal science.*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Morawski, J. (1997). The science behind feminist research methods.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53, 667-681.

Morris, M. (1988). *The pirate's fiancée: Feminism, reading, postmodernism.* London: Verso.

Morris, M. (1998). *Too soon, too late: History in popular cultur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Mukherjee, B. (1994). *The holder of the world.* London: Virago.

Murcott, A. (1993). On conceptions of good food; Or, anthropology between the laity and professionals. *Anthropology in Action*, 14,

11-13.

Naples, N. (1996). A feminist revisiting of the insider/outsider debate: The "outsider phenomenon" in rural Iowa. *Qualitative Sociology*, 19, 83-106.

Narayan, K. (1997). How native is a "native" anthropologist? In L. Lamphere, H. Ragone, & P. Zavella (Eds.), *Situated lives: Gender and culture in everyday life* (pp. 23-41). New York: Routledge.

Narayan, U. (1997). *Dislocating cultures: Identities, traditions, and Third World feminism.* New York: Routledge.

Narrigan, D., Zones, J. S., Worcester, N., & Grad, M. J. (1997). Research to improve women's health: An agenda for equity. In S. B. Ruzek, V L. Olesen, & A. E. Clarke (Eds.), *Women's health: Complexities and differences* (pp. 551-579). 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Nelson, C., & Altorki, S. (Eds.). (1997). Arab Regional Women's Studies Workshop [Special issue]. *Cairo Papers in Social Science*, 20(3).

Nelson, M. K. (1990). *Negotiated care: The experience of family day care givers.*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Nettleton, S. (1991). Wisdom, diligence and teeth: Discursive practices and the creation of mothers. *Sociology of Health and Illness*, 13, 98-111.

Nicholson, L. J. (Ed.). (1990). *Feminism/postmodernism.* New York: Routledge.

Nicholson, L. J. (Ed.). (1997). *The second wave: A reader in feminist theory.* New York: Routledge.

Nielsen, J. M. (Ed.). (1990a). *Feminist research methods: Exemplary reading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Boulder, CO: Westview.

Nielsen, J. M. (1990b). Introduction. In J. M. Nielsen (Ed.), *Feminist research methods: Exemplary reading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pp. 1-37). Boulder, CO: Westview.

Oakley, A. (1981). Interviewing women: A contradiction in terms. In H. Roberts (Ed.), *Doing feminist research* (pp. 30-61). London: Routledge.

Ogasawara, Y. (1998). *Office ladies and salaried men: Power, gender, and work in Japanese compani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O'Leary, C. M. (1997). Counteridentification or counterhegemony? Transforming feminist standpoint theory. In S. J. Kenney & H. Kinsella (Eds.), *Politics and feminist standpoint theories* (pp. 45-72). New York: Haworth.

Olesen, V. L. (1975). Rage is not enough: Scholarly feminism and research in women's health. In V. L. Olesen (Ed.), *Women and their health: Research implications for a new era* (DHEW Publication No. HRA-3138; pp. 1-2). Washington, DC: 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ervices Research.

Olesen, V. L. (1993). Unfinished business: The problematics of women, health and healing. *Science of Caring*, 5, 27-32.

Olesen, V. L. (1997). Who cares? Women as informal and formal caregivers. In S. B. Ruzek, V. L. Olesen, & A. E. Clarke (Eds.), *Women's health: Complexities and differences* (pp. 397-424). 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Olesen, V. L., Taylor, D., Ruzek, S. B., & Clarke, A. E. (1997). Strengths and strongholds in women's health research. In S. B. Ruzek, V. L. Olesen, & A. E. Clarke (Eds.), *Women's health: Complexities and differences* (pp. 580-606). 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Olesen, V. L., & Clarke, A. E. (1999). Resisting closure, embracing uncertainties, creating agendas. In A. E. Clarke & V. L. Olesen (Eds.), *Revisioning women, health and healing: Feminist, cultural and technoscience perspectives* (pp. 355-357). New York: Routledge.

Ong, A. (1995). Women out of China: Traveling tales and traveling theories in postcolonial feminism. In R. Behar & D. A. Gordon (Eds.), *Women writing culture* (pp. 350-372).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Opie, A. (1992). Qualitative research,

appropriation of the "other" and empowerment. *Feminist Review*, 40, 52-69.

Paget, M. (1990). Performing the text.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19, 136-155.

Patai, D. (1994, February 23). Sick and tired of nouveau solipsism.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p. A52.

Petchesky, R. P. (1985). Abortion in the 1980's: Feminist morality and women's health. In E. Lewin & V. L. Olesen (Eds.), *Women, health and healing: Toward a new perspective* (pp. 139-173). London: Tavistock.

Pfeffer, R. (1997). *Children of poverty: Studies on the effect of single parenthood, the feminization of poverty and homelessness*. New York: Garland.

Phoenix, A. (1994). Practicing feminist research: The intersection of gender and "race" in the research process. In M. Maynard & J. Purvis (Eds.), *Researching women's lives from a feminist perspective* (pp. 35-45). London: Taylor & Francis.

Pierce, J. L. (1995). *Gender trials: Emotional lives in contemporary law firm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uar, J. K. (1996). Resituating discourses of "whiteness" and "Asianness" in northern England: Second-generation Sikh women and constructions of identity. In M. Maynard & J. Purvis (Eds.), *New frontiers in women's studies: Knowledge, identity and nationalism* (pp. 125-150). London: Taylor & Francis.

Ramazanoglu, C. (1989). Improving on sociology: The problems of taking a feminist standpoint. *Sociology*, 23, 427-442.

Reay, D. (1996a). Dealing with difficult differences. *Feminism and Psychology*, 6, 443-456.

Reay, D. (1996b). Insider perspectives or stealing the words out of women's mouths: Interpretation in the research process. *Feminist Review*, 53, 57-73.

Reay, D. (1998). Classifying feminist research: Exploring the psychological impact of social class on mothers' involvement in children's schooling. *Feminism and Psychology*, 8, 155-171.

Reinharz, S. (1992). *Feminist methods in social research*.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Renzetti, C. M. (1997). Confessions of a reformed positivist: Feminist participatory research as good social science. In M. D. Schwartz (Ed.), *Researching sexual violence against women: Methodological and personal perspectives* (pp. 131-143). Thousand Oaks, CA: Sage.

Ribbens, J., & Edwards, R. (Eds.). (1998). *Feminist dilemmas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Public knowledge and private lives*. Thousand Oaks, CA: Sage.

Richardson, L. (1992). The consequences of poetic representation: Writing the other, rewriting the self. In C. Ellis & M. G. Flaherty (Eds.), *Investigating subjectivity: Research on lived experience* (pp. 125-140). Newbury Park, CA: Sage.

Richardson, L. (1993). The case of the skipped line: Poetics, dramatics and transgressive validity. *Sociological Quarterly*, 34, 695-710.

Richardson, L. (1997). *Fields of play: Constructing an academic life*.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Riessman, C. K. (1987). When gender is not enough: Women interviewing women. *Gender & Society*, 2, 172-207.

Riessman, C. K. (1990). *Divorce talk: Women and men make sense of personal relationships*.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Ring, J. (1987). Toward a feminist epistemology.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1, 753-772.

Roberts, H. (Ed.). (1981). *Doing feminist research*. London: Routledge.

Rollins, J. (1985). *Between women: Domestics and their employers*.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Roman, L. G. (1992). The political significance of other ways of narrating ethnography: A feminist materialist approach. In M. D. LeCompte, W. L. Millroy, & J. Preissle (Eds.), *The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education* (pp. 555-594).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Romero, M. (1992). *Maid in the U. S. A.* London: Routledge.

Rosenau, P. M. (1992). *Post-modernism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Insights, inroads, and intrusion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Ruzek, S. B. (1978). *The women's health movement: Feminist alternatives to medical care.* New York: Praeger.

Ruzek, S. B., Olesen, V. L., & Clarke, A. E. (Eds.). (1997). *Women's health: Complexities and differences.* 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Sacks, K. B. (1988). *Caring by the hour: Women, work and organizing at Duke 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Scarce, R. (1994). (No) trial (but) tribulations: When courts and ethnography conflict.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34, 123-149.

Scheper-Hughes, N. (1983). Introduction: The problem of bias in androcentric and feminist anthropology. *Women's Studies*, 19, 109-116.

Scheper-Hughes, N. (1992). *Death without weeping: The violence of everyday life in Brazil.*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Scheurich, J. J. (1997). The masks of validity: A deconstructive investigation. In J. J. Scheurich, *Research method in the postmodern* (pp. 80-93). London: Falmer.

Schiffrin, A. (1998, November 20). Transnational publishing in microcosm: The Frankfurt Book Fair.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pp. B6-B7.

Scott, J. (1991). The evidence of experience. *Critical Inquiry*, 17, 773-779.

Scott, J. (1997). Comment on Hawkesworth's "Confounding gender." *Signs*, 22, 697-702.

Seigfried, C. H. (1996). *Pragmatism and feminism: Reweaving the social fabric.*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herwin, S. (1992). *No longer patient: Feminist ethics and health care.*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Shogan, D. (1990). Comment on Hawkesworth's "Knowers, knowing, known: Feminist theory and claims of truth." *Signs*, 15, 424-425.

Shostak, M. (1981). *Nisa: The life and words of a ! Kung woma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Skeggs, B. (1994). Situating the production of feminist ethnography. In M. Maynard & J. Purvis (Eds.), *Researching women's lives from a feminist perspective* (pp. 72-92). London: Taylor & Francis.

Smith, D. E. (1974). Women's perspective as a radical critique of sociology. *Sociological Inquiry*, 4, 1-13.

Smith, D. E. (1987). *The everyday world as problematic.* Boston: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Smith, D. E. (1989). Sociological theory: Methods of writing patriarchy. In R. A. Wallace (Ed.), *Feminism and sociological theory* (pp. 34-64). Newbury Park, CA: Sage.

Smith, D. E. (1990a). *The conceptual practices of power: A feminist sociology of knowledge.* Boston: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Smith, D. E. (1990b). *Texts, facts and femininity: Exploring the relations of ruling.* London: Routledge.

Smith, D. E. (1992). Sociology from women's experience: A reaffirmation. *Sociological Theory*, 10, 88-98.

Smith, D. E. (1993). High noon in Textland: A critique of Clough. *Sociological Quarterly*, 34, 183-192.

Smith, D. E. (1996). Telling the truth after postmodernism. *Symbolic Interaction*, 19, 171-202.

Smith, S. G. (1997). Comment on Hawkesworth's "Confounding gender." *Signs*, 22, 691-697.

Spivak, G. C. (1988). Subaltern studies: Deconstructing historiography. In G. C. Spivak, *In other worlds: Essays in cultural politics* (pp. 201-221). London: Routledge.

Stacey, J. (1988). Can there be a feminist ethnography? *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 11, 21-27.

Stacey, J. (1998). *Brave new families: Stories of*

domestic upheaval in late-twentieth-century Americ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Stacey, J., & Thorne, B. (1985). The missing feminist revolution in sociology. *Social Problems*, 32, 301-316.

Stacey, J., & Thorne, B. (1996). Is sociology still missing its feminist revolution? *Perspectives: The ASA Theory Section Newsletter*, 18, 1-3.

Stacey, M. (1992). *Regulating British medicine: The General Medical Council.* New York: John Wiley.

Standing, K. (1998). Writing the voices of the less powerful. In J. Ribbens & R. Edwards (Eds.), *Feminist dilemmas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Public knowledge and private lives* (pp. 186-202). Thousand Oaks, CA: Sage.

Stanley, L., & Wise, S. (1983). *Breaking out: Feminist consciousness and feminist research*,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Stanley, L., & Wise, S. (1990). Method, methodology and epistemology in feminist research processes. In L. Stanley (Ed.), *Feminist praxis: Research, theory and epistemology in feminist sociology* (pp. 20-60). London: Routledge.

Stanley, L. (Ed.). (1990). *Feminist praxis: Research, theory and epistemology in feminist sociology.* London: Routledge.

Stevens, P. E., & Hall, J. H. (1991). A critical historical analysis of the medical construction of lesbianis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alth Services*, 21, 271-307.

Strathern, M. (1987). An awkward relationship: The case of feminism and anthropology. *Signs*, 12, 684-790.

Taylor, D., & Dower, K. (1995). Toward a women centered health care system: Women's experiences, women's voices, women's needs. *Health Care for Women International*, 18, 407-422.

Taylor, V. (1998). Feminist methodology in social movements research. *Qualitative Sociology*, 21, 357-379.

Taylor, V., & Whittier, N. (Eds.). (1998). Gender and social movements: Part 1 [Special issue]. *Gender & Society*, 12(6).

Taylor, V., & Whittier, N. (Eds.). (1999). Gender and social movements: Part 2 [Special issue]. *Gender & Society*, 13(1).

Terry, J. (1994). Theorizing deviant historiography. In A. L. Shapiro (Ed.), *Feminists revision history* (pp. 20-30).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Tierney, W. G., & Lincoln, Y. S. (1997). Introduction: Explorations and discoveries. In W. G. Tierney & Y. S. Lincoln (Eds.), *Representation and the text: Re-framing the narrative voice.*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Todd, A. D. (1989). *Intimate adversaries: Cultural conflict between doctors and women patients.*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Tom, W. (1989). *Effects of feminist research on research methods.* Toronto: Wilfred Laurier.

Tong, R. (1989). *Feminist thought: A comprehensive introduction.* Boulder, CO: Westview.

Tong, R. (1997). *Feminist approaches to bioethics: Theoretical reflections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s.* Boulder, CO: Westview.

Trinh T. M. (1989). *Woman, native, other: Writing postcoloniality and feminis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Trinh T. M. (1992). *Framer framed.* New York: Routledge.

Tronto, J. C. (1993). *Moral boundaries: A political argument for an ethic of care.* New York: Routledge.

Tuana, N. (1993). With many voices: Feminism and theoretical pluralism. In P. England (Ed.), *Theory on gender/feminism on theory* (pp. 281-289). New York: Aldine de Gruyter.

Visweswaran, K. (1994). *Fictions of feminist ethnograph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Walkerdine, V. (1995). Postmodernity, subjectivity and the media. In T. lbanez & L. Iniguez (Eds.), *Critical social psychology* (pp. 169-

177). London: Sage.

Warren, C. A. B. (1988). *Gender issues in field research.* Newbury Park, CA: Sage.

Wasserfall, R. R. (1997). Reflexivity, feminism, and difference. In R. Hertz (Ed.), *Reflexivity and voice* (pp. 150-168). Thousand Oaks, CA: Sage.

Welton, K. (1997). Nancy Hartsock's standpoint theory: From content to "concrete multiplicity." In S. J. Kenney & H. Kinsella (Eds.), *Politics and feminist standpoint theories* (pp. 7-24). New York: Haworth.

West, C., & Zimmerman, D. (1987). Doing gender. *Gender & Society*, 1, 125-151.

Westkott, M. (1979). Feminist criticism of the social sciences. *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 4, 422-430.

Weston, K. (1991). *Families we chose: Lesbians, gays, kinship.*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Weston, K. (1996). Requiem for a street fighter. In E. Lewin & W. L. Leap (Eds.), *Out in the field: Reflections of lesbian and gay anthropologists* (pp. 274-286).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Wheatley, E. (1994). How can we engender ethnography with a feminist imagination? A rejoinder to Judith Stacey. *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 17, 403-416.

Williams, P. J. (1991). *The alchemy of race and right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Wolf, D. L. (Ed.). (1996a). *Feminist dilemmas in fieldwork.* Boulder, CO: Westview.

Wolf, D. L. (1996b). Situating feminist dilemmas in fieldwork. In D. L. Wolf (Ed.), *Feminist dilemmas in fieldwork* (pp. 1-55). Boulder, CO: Westview.

Wolf, M. A. (1992). *A thrice-told tale: Feminism, postmodernism, and ethnographic responsibility.*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Wolf, M. A. (1996). Afterword: Musings from an old gray wolf. In D. L. Wolf (Ed.), *Feminist dilemmas in fieldwork* (pp. 215-222). Boulder, CO: Westview.

Wyche, K. F., & Crosby, F. J. (Eds.). (1996). *Women's ethnicities: Journeys through psychology.* Boulder, CO: Westview.

Yadlon, S. (1997). Skinny women and good mothers: The rhetoric of risk, control and culpability in the production of knowledge about breast cancer. *Feminist Studies*, 23, 645-677.

Zavella, P. (1987). *Women's work and Chicano families: Cannery workers of the Santa Clara Valle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Zavella, P. (1996). Feminist insider dilemmas: Constructing ethnic identity with Chicana informants. In D. L. Wolf (Ed.), *Feminist dilemmas in fieldwork* (pp. 138-159). Boulder, CO: Westview.

种族化话语与种族认识论



RACIALIZED DISCOURSES AND ETHNIC EPISTEMOLOGIES

⊙ 格洛利亚·拉德森—比林斯

我思故我在。

——笛卡尔(1937)

我在因为我们在。

——非洲谚语

当笛卡尔宣称"我思故我在"时,他清晰地表明了欧洲人(以及欧裔美国人)之世界观和认识论所依赖的一个中心假设——即个体的心灵是知识和存在的源泉。相反,非洲人的谚语"Ubuntu"翻译成"我在因为我们在",是指个体的存在(以及知识)是因与他人的关系而变化的。两种不同的视角展现了两种不同的以及经常相冲突的认识论,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末,学术界对此争论不休。这两种传统并非仅仅是"选择"或者"倾向"的问题,而是表达了在霸权和解放之间的一种需要深思熟虑的选择。这一强烈的话语表述非要制造事端,它指的是一种急需要做的事情。我选择探讨这种二元对立是为了揭露欧美知识传统的"有效侵略方式"(Ani,1994)。然后,我将追溯受到来自欧美"真理权力"统治下的不同话语和认识论(Foucault,1973),为何两者既是反知识的也是解放的武器。

需要强调的是,认识论的概念不止是一种"认识的方式",这一点是很重要的。认识论是一种"认识的体系",既有一个内部的逻辑,又具有外部的有效性。认识论和"认识方式"之间的区别并非微不足道。比如,文学家创造了文学体裁之间的差别,由此一些著作可以称为"文学"而另外一些著作只能被冠以"民间传说"(folklore)。毫不奇怪,有色人种的文学更有可能被划入民间传说的范畴。这样,民间传说被视为比文学具有更少的严格性、更少的学术性以及或许更少的文化价值。可见,认识论基础的宣称是一个重要的确立合法性的力量。

认识论与世界观紧密地连接在一起。舒加(Shujaa,1997)认为,世界观和知识体系是共生的——也即,一个人怎样看待世界受到他/她所拥有知识的影响。同时,一个人能够拥有什么样的知识也深刻地受到其世界观的影响。因此,人们生活和学习的境况塑造了他们的知识和世界观。由于学校、社会以及知识的结构和程序被设计出来,目的是为了创造出能将主导世界观及知识的生产获得过

程内在化的个体,所以要发展一种不同于主导性之世界观的过程,需要认识者方面积极的努力。主导范式的霸权使其在看待世界上比另外的方式具有更多的权力——它宣称自己是看待世界的唯一合法方式。在本章里,我认为存在着与主导性的欧美认识论相对的、发达的知识或者认识论的体系。

透过欧美认识论传统对于种族的建构,我简要地论述了其意识形态的基础,并接着描述了那些在美国社会和世界上处于从属地位的人群所建立的传统是如何与欧美传统相冲突的。进一步,我还讨论了双重意识(Du Bois,1903/1953)、混合(mestiza)意识(Anzaldúa,1987),以及"种族隐秘(tribal secret)"(Warrior,1995)等观念,它们由有色人种的学者所发现与揭示,旨在说明那种话语的、社会的以及制度结构的方式创造出了主流文化范式以外人群的"他者"意识。然后,我探讨了两种理论观念,"可变性(alterity)"(Wynter,1992)和"批判种族理论"(Delgado,1995a),将它们作为考察种族和族群"他者"之学术研究的一个引题。最后,作为本章的结论,我探讨了这些替代范式对于定性研究方法的意义。

欧洲中心范式的文化逻辑

如果通向何处与你过去的行进不是一个连续过程的话,那么,传统科学方法并不能告诉你应该通向哪里。

罗伯特·M·皮尔西格(Pirsig,1972)

安尼(Ani,1994)说,"掠夺富饶的万物、否定符号的重要性、将现象进行简化直至其仅仅变成一种客体,然后,你占有了知识。这就是欧洲认识论模式的开始以及结束"(p.29)。此种认识论的例证便是在西方形成的种族建构方式(Omi & Winant,1994)。它构成了关于种族的新的语言以及新的真理统治权力(Foucault,1973)。这些新的语言又变成了"公共"语言,它是知识体系,它所探究的客体乃是社会秩序,在其中认识者和探究者总是作为已然的主体而出现的。

温特(Wynter,1992)认为,"作为影响被研究对象行为的'沟通行动',这种知识体系总是产生于秩序所赖以形成的'价值和权威范式'"(p.21)。中世纪欧洲的移民包含了所环围的欧洲、非洲和近东,植根于其的观点便认为"存在着三类种族,它们包括高加索人、黑人以及蒙古人"(Haney Lopez,1995,p.194)。这种三类种族的理论成型可见于康特·亚瑟·迪戈比纽(Count Arthur de Gobineau)在《关于种族不平等的论说》(*Essays on the Inequality of Races*)一书中的论述,它用法语所写,出版于1853—1855年间。迪戈比纽排除了美洲人、印第安次大陆人、东亚和东南亚人以及大洋洲人(那些居住在欧洲人的想象以外的人)等,它反映了一种社会和政治的决定而非科学的解释。

阿普尔比、亨特和雅各布(Appleby,Hunt & Jacob,1994)认为到18世纪,一个革新者的小群体建立了作为"新的真理基础"的科学(p.15)。这个新的真理观

与基督教所确立的老的真理观颇为相似,因为它把"一种与宗教相连的思维习惯——深信可以知晓先验和绝对的真理——转换成一种新的对自然世界的机械式理解"(p. 15)。最终,这种思维和确信的模式被其他探究形式所吸收。

这一新的思维模式来源于启蒙时期,认为科学知识是纯粹的、高尚的,以及简约的。自然科学可以用它的定理来总结,能够运用实验方法去寻求真理。这种思维模式以此推论,每一件事情,从人体生物学到统治艺术都能够以及应当模仿科学。阿普尔比(Appleby et al,1994)称其为科学英雄的模式,"因为它把科学天才当成了文化英雄"(p. 15)。他们指出:

> 直到晚近时期,英雄科学观才占据了统治地位。英雄模式将推理等同于科学:价值无涉、公正,以及紧接着是世界进步的保证。科学从自然本身来规定它的特征,而自然被假设为由运动着的物质所唯一构成,因而它是"中立的"……内在地发源于启蒙时代的中立、价值无涉、科学的客观取向等对战后每一学科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pp. 15-16)。

这种启蒙思维还渗透到了美国革命领导者的思维方式中。然而,这些支持奴隶制的人——华盛顿、杰佛逊、麦迪逊及其他人,不得不为他们所承诺的自由、公正和平等找到合理的解释(Zinn,1980)。杰弗逊(Jefferson)在他的《弗吉尼亚州手记》(*Notes on the State of Virginia*,1784/1954)一书中,坚持黑人和白人永远不能住在一起,因为在两个种族之间存在着"自然"所做的"真正的区分"。但我们知道,种族区分的概念并没有生物学的基础,也不存在任何群体所有成员所共同拥有的基因特征(Lewontin,Rose, & Kamin,1984)。实际上,就连启蒙科学也阐明了群体内的差异比群体之间的差异还要大。目前关于种族的思想则认为,种族是一个社会的建构,同时,种族意义的诞生过程被称作"种族形成"(racial formation)(Haney Lopez,1995)。

现在来看种族形成是如何运作的。洛佩兹(Lopez,1995)写道:"在1800年代的早期,在美国的人们把自己归属于拉丁美洲的国家以及种族。因此,一个墨西哥人也可能是白人、印第安人、黑人或者亚洲人。"(pp. 196-197)然而,到1800年代中期,当美国西南部盎格鲁人和墨西哥人之间的仇恨发展起来以后,社会偏见也发展起来了。这些社会偏见迅速变成了合法的,法律被设计出来以反映和使种族偏见具体化。科学(以及后来的法律)的启蒙观念并没有与种族和阶级优越性的普遍化话语相分离。这种科学的启蒙话语允许主导性的文化去界定、分离,以及使他者客体化。

朔伊里奇和扬(Scheurich & Young,1997)提出认识论的种族主义概念,认为它存在于主导学术和知识产品的研究范式之中。一些有色人种的学者对这种认识论提出了挑战,他们并不仅仅是针对种族主义的,也针对着真理和事实的性质。罗萨尔多(Rosaldo,1993)认为,他所指出的经典时期(大约从1921—1971年)中,"带有距离的规范化描述获得了一种对于客观性来说的专断地位。它们的权威似乎是自证的,以至对于其他文化之语义真理的讲述而言,它们变成唯一合法性的形式……所有其他的构成形式被完全边缘化或者压制"(p. 106)。当经

典形式获得了对客观真理的排他性权力时,民族志(以及其他社会科学的方法)“对客观性所在的揭示,与它对真理的讲述一样都失去了可能性”(p. 115)。

多元意识和多重危险

每个人的单一文明化观念——隐含着对进步和技术的祭拜——让我们变贫穷和毁伤。

Octavio Paz

The Labyrinth of Solitude, 1961

尽管一些有色人种的学者试图在主导性的范式之内去发现合法性(参考Williams, 1882—1883),其他学者则从不同的认识论框架出发去描述主导性范式以外人们的经验和知识体系①。1903 年,杜博依斯(Du Bois)在《黑人民俗的灵魂》(*The Souls of Black Folk*)这本书中提出,非裔美国人“会感受到他的两种身份……两种灵魂,两种思想,以及两种断裂的抗争”(1903/1953, p. 5)。历史学家刘易斯(Lewis, 1993)赞同这个概念,他指出:

> 分离的自我是一个革命性的概念。它不仅具有革命性亦十分深奥。杜博依斯对两重意识的运用使人们可以看得更远和更深入。非裔美国人……以此拥有了“美国世界的第二种视野”,这是一种直觉的能力,让他/她可以去看以及述说高度道德有效性的美国社会。

杜博依斯的双重意识观念,在此并不能被看作一种边缘化和排他的可怜的状态,而是处于一种超越性的地位,可以使一个人对内部与外部——边缘和主流进行观察理解。

杜博依斯的研究具有一个重要的共时性:即他和非裔美国学者伍德森(Woodson, 1933)对主流欧美学术范式的挑战与提出批判理论的法兰克福学派之形成几乎是同时的。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西奥多·阿德诺(Theodor Adorno)和赫尔伯特·马库斯(Herbert Marcuse)是三个主要的学者,它们结合了马克思、黑格尔、坎特和韦伯的理论,并对“美国科学研究者想当然的经验实践”进行了挑战(Kincheloe & McLaren, 1998, p. 261)。然而,除了作为关注“黑人”问题的“黑人”知识分子外,杜博依斯和伍德森在学术的阵营中并不为人所知。他们对欧美学术界的敏锐性和洞察力与法兰克福学派一样富有批判性,但他们从来没有与霍克海默、韦伯、阿德诺和马库斯一样享有同样的礼赞。

杜博依斯的双重意识观念不仅可以应用于非裔美国人,亦同样可以应用于在主流范式之外被建构的任何人群。把这种对多重意识的全面论述当作对复杂

① 这部分的标题取自于金(King, 1988)的“多重危险,多元意识”(*Multiple Joeopardy, Multiple Consciousness*)。

现象的描述是很重要的。它并非试图把一种本质性的概念如“黑人”、“拉丁美洲人”、“亚裔美国人”、“本土美国人”等强加于特定的个体或者群体身上①。相反，这种讨论与认识论的视角得以发展起来的多样化方式有关。实际上，我们在此所引用的学者，并非是为了对特定的种族、族群或者文化群体进行一种判断。他们是一些例证，说明特定的学者如何由于其自身的文化和认同地位之赋予而发展出来特定的认识论立场。

安扎杜亚描述了她的分裂性认同，不仅源于其性别、阶级、种族、宗教以及性征，而且也源于她在美国—墨西哥边界的生活现实。安扎杜亚(Anzaldua,1987)解释了她作为一个墨西哥美国人在边界之生活的复杂性：

> 我和姐妹以及兄弟、朋友在一起时用我的“家乡”口音。它们[Pachuco(称之为Calo)，美—墨口音，奇卡诺西班牙语(Chicano Spanish，指墨西哥裔美国人或在美国的讲西班牙语的拉丁美洲人后裔——译者注)，北部墨西哥西班牙口音，以及标准的墨西哥西班牙语等]与我的心灵最为贴近。在学校、媒体以及工作的环境，我用标准的工薪阶级的英语。而在阅读西班牙和墨西哥文学时，我用标准的西班牙语和标准的墨西哥西班牙语(pp.55-56)。

安扎杜亚的研究，反思了一个墨西哥裔美国女性知识分子长期的知识历史(参考 Acuna, 1972; Almaguer, 1974; Balderrama, 1982; Gomezquinones, 1977; Mirande & Enriquez, 1979; Padi lla, 1987; Paz, 1961)，已经成为伯纳尔(Bernal, 1998)所说的一个墨西哥裔美国女性主义认识论的一部分。墨西哥裔美国女性学者比如阿尔克恩(Alcon,1990)、卡斯蒂略(Castillo,1995)以及德拉托尔和佩斯奎拉(de la Torre & Pesquera,1993)编著的文集印证了这种种族、阶级和性别的交叉性。

但是，重要的是不要去假设存在单一的拉丁裔美国人(或者墨西哥裔美国人)。奥博勒(Oboler,1995)挑战的是，在“西班牙的”这种醒目的标签下，试图融合西半球讲西班牙语人的做法：他认为，这种标签掩盖了他们试图从一个比想象和建构还要更加复杂和多元的情形中去创造一个单一意识的内在的问题。他写道：

> 在这种“西班牙的”伦理标签之下，2 300万不同种族、阶级、语言和民族起源、性别和宗教的人的不同社会和政治经验被同一化了。或许毫不奇怪，这个词语的意义和用法已经成为社会科学、政府机构以及更广泛的社会中的论辩的主题(p.3)。

同样，美国印第安人也不得不与那种对他们的通常看法做斗争。尽管有一种朝向“泛印第安主义”(Hertzberg,1971)的运动，美国印第安人文化的差异却是非常大的。对美国印第安人的那种广泛的一般化概述被本质化了。然而，美国

---

① 尽管在这篇文章中，我所指的是非裔美国人、拉丁裔美国人、亚裔美国人、土著美国人以及白人等，但并非霍林格尔(Hollinger,1995)所称的“族群五边形”的具体化。在过去的20世纪里，将不同的种族、族群和文化群体进行分离的边界已经渗透至深，创造了更复杂和更加多面向的认同。

联邦政府朝向印第安儿童的“文明化”和去部落化运动，通过学校广播而帮助不同的印第安群体意识到他们的部落经验并非是独一无二的，美国印第安人也分享着任何人的共同问题和经验（Snipp，1995）。洛马瓦伊马（Lomawaima，1995）认为，“自从联邦政府将注意力转向文明化印第安人的‘问题’后，它的目标明显地教育印第安人非印第安化：重新确认殖民地的权威（如目标、保持等）、系统消除本土语言、宗教的对话（与基督教），以及使经济重新构建以朝向农业、小规模的手工业以及性别分化的劳动力。”

沃里尔（Warrior，1995）则询问，是否早期美国印第安学者的调查能够对当代美国本土知识分子批判研究的发展有重要影响。他指出当理解第四世界形式的学术研究[比如沃德·邱吉儿（Ward Churchill）和M·安尼特·詹姆斯（M. Annette Jaimes）的研究]时要非常小心，因为当它号召将美国印第安文化作为一种所有历史时期本土人群所共享的全球意识来理解时，会倾向于将其本质化。沃里尔的研究呼吁“知识分子的主权”（p. 87）——一种从主导性话语的专制和压迫中获得自由的地位。

在亚洲太平洋岛国，有一种多元意识的观念。洛（Lowe，1996）用“异质性、混杂性以及多样性”表现了这种特点（p. 60）。她指出：

> 将作为一种组织工具的“亚裔美国人的认同”进行明晰化，提供了使不同的亚洲人群体可以理解其不平等的环境和相关的历史的同一性。“亚裔美国人文化”的塑造对于这种努力是很重要的，因为它使不同亚洲来源的社区，以及那些被排外和边缘化的制度与机构明晰化并得到赋权。然而，在某种程度上，亚裔美国人文化固化了其认同、压制了他们之间的差异——民族起源、一般化、性别、性征、阶级等的差异——它还会冒这样的风险：不仅低估了亚洲人之间的差异和混杂性，而且也许不经意地支持了种族主义的话语，将亚洲人建构成为同质性的群体。

埃斯皮里图（Espiritu，1992）也提醒我们，“亚裔美国人”作为一个认同范畴是在过去的30年里形成的。在那之前，多数亚洲后裔的移民人群“在文化上和政治上都认为他们与其他亚洲后裔群体是不同的”（p. 19）。实际上，在不同的亚洲群体之间以及内部存在历史的敌意，这使他们很难超越民族忠诚而成为同一性的群体。同时，在美国，亚洲移民面对着日益增长的反亚洲情感。它导致一些亚裔群体“从对象群体中分离出去，而不至于作为其成员并承受任何可能的消极后果”（p. 20）。

特林（Trinh，1989）和莫汉蒂（Mohanty，1991）对亚裔美国人身份进行了后现代的分析，并挑战了针对亚裔美国人的任何一元式界定。他们解释了亚洲人在主流移民中被表达的方式，而非将其建构为一个虚构的团结。一个对亚洲人的歪曲和想象的最生动例子体现在黄（Hwang）的戏剧《蝴蝶夫人》（*M. Butterfly*）中，它表现了那种想象的特征——如大小、性情、柔顺——是怎样导致一位法国军方的后勤官员即使处于亲密的关系情境中对一名女性产生的误解。

洛（Lowe，1996）提醒我们“‘亚裔美国人’群体化不是一个自然和静态的范

畴。它是一个社会性建构的统一体,一个由于假定的政治原因而情境化的特殊的定位"(p.82),但它同时也是由"变化的动力和亚裔美国人的文化异质性"所构成的"(p.68)。

所有这些群体(即非裔美国人、本土美国人、拉丁裔美国人以及亚裔美国人)的共同之处是种族化的经验。每一个群体都是由许许多多的民族和祖先的起源而构成的,但是欧美认识论的主导性意识形态强迫每一个群体进入到一个本质化和总体化的单位中,它们被视为几乎没有内部的差异。然而,与此同时,这些群体的成员则将这些一元性的种族主义标签用于政治或文化的目的。用种族主义的标签来区分意味着认可群体成员乃作为局外人或他者而拥有一些共同的经验。

边缘的生活

人类学家潘迪安(Pandian,1985)指出,在西方共信犹太—基督教(Judeo-Christian)的地方文化中(Geertz,1983),真正的基督教徒是中世纪自我改变(self alterity)的隐喻,它指的是可以改变的自我的"他者"范畴,而对于其他文化中的"自我隐喻"来说,"他者"则有特殊的意涵。温特(Wynter,1992)认为,作为"他者"的建构,它具有一种视角上的优势。此优势并非指从属群体所体验的经济、社会和政治上的劣势,而是指没有固定中心,并允许"广泛角度之视野"的方式。这种优势亦非源于种族/文化上的内在差异,而是一种被建构他者的辩证特点,正是此种建构规定了有色人种超越自我/他者规范的临界地位(King,1995)。金(King,1995)进一步指出,这种认识论方案比仅仅增加多元化的视野或者为中心提供某种支持更有益。此外,这一临界地位或者说可变点试图超越那种"要么/或"之类的认识论。可变性并非二元式的,它具有多元化、各方平等的立场,这种立场或者是正当的,又或者是按照等级来排序。自觉意识到可变性的视角使我们不致对其他的视角比如黑人、印第安人、亚洲人、拉丁人等进行本质化及对相反认识的同一化(West,1990)。

这些在临界地位上的人群,他们不会寻求从边缘移动到主流,因为他们明白主流所造成的破坏性影响——它需通过权力和不平等关系以将其拉向主流地位。这一临界观点与底层穷人和工人阶级对中产阶级的观点相类似。当穷人和工人阶级试图去领会主导性阶级的观念时,他们的视角与其自身的经验相关联。因为多数穷人和工人阶级人群依赖于主导阶级去获得诸如食品、衣物、住所及工作等,所以他们被迫学习主导性的实践,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如此。那些打黑工的人如儿童照看工或者非裔美国保姆等,他们在主导群体的家中寻求其自我认同。在那里,他们通过模仿来获得某种信仰和行为模式。

莱格西(Legesse,1973)认为,处于临界点的群体被强制性地进行自我改变,以达到主导文化模式所规定的理想状态。这种主导文化模式所建立的规则和规

定目的是为了制约社会中的思想与行动。因此，“问题是，在认识者已成为社会化之主体的模式下，关于社会现实的‘人类知识性质’应当是什么”（Wynter，1992，p. 26）①。

> 因此每一种秩序（或者优良的学术传统），其体系性的主流视角都与来自可变性视角之挑战发生激烈碰撞……目前学术研究的任务是要坚定地维护着那些对于秩序存在来说具有批判性的制约内容。

因此，临界性视角的任务便是揭示出，当主导性视角为了维持其权力关系而贬低主流之外的行为时，他们用来歪曲“他者”之事实的方式是怎样的。这种临界性的视角也是主导秩序可以自我界定的条件，“这种界定是要让我们得到增权，从我们特定的秩序的‘规定和约束’中解脱，从那种‘一般化理解的范畴’中得到解脱”（Wynter，1992，p. 27）。

批判种族理论：对主流正统的挑战

种族化话语和种族认识论或者临界视角都有可能在其中被运用到的一种研究范式，便是批判种族理论（CRT）②。德尔加多（Delgado，1995b）指出：

> 1970 年代的中期，伴随着贝尔（Derrick Bell）和弗里曼（Alan Freeman）的早期研究，批判种族理论得以出现。这两位学者都对美国种族改革的缓慢步伐十分关注。他们认为法律诉讼（filing amicus brief）的传统取向，是引导抗议和游行以及呼吁有良知之市民的道德敏感性，和以前相比反而效果更差，收获亦更少。不久后，其他法律学者也加入贝尔和弗里曼中，分享他们在传统公民权力斗争策略上的教训。

批判种族理论既是被称作批判法律研究（CLS）的早期法律运动之产物，也是从其中分离出来的结果。批判法律研究乃是一个左翼法律运动，它对传统的注重教条和政策分析的法律研究提出挑战，要求法律形式可以表达出社会和文化环境中的个体和群体特征。CLS 学者也对下面的这种传统观念提出了挑战，即认为“公民权利斗争表达了朝向社会转型的一种长期和稳定的过程”（Crenshaw，1988，p. 1334）。

克伦肖（Crenshaw，1988）指出，“批判（法律）研究者尝试着分析作为人为产物的法律意识形态和话语，认为它的运行是为了再造美国社会并使其合法化”（p. 1350）。CLS 运动中的研究者将法律教条进行解码，揭示其内部和外部的不一致性，并揭示了“法律意识形态用以创造、支持及使美国目前的阶级结构合法化”的方式（p. 1350）。CLS 对于法律话语的贡献是它对于社会中合法性结构的

---

① 我自己的家庭成员中有在富裕的白人家中做家政工作的。在他们的工作里，他们学到了中产阶级礼节、时尚和金钱观等。

② 这一节的部分内容改编自：Ladson-Billings，1998。

分析。许多 CLS 意识形态是从格莱姆西(Gramsci,1971)的研究中得到阐发的,同时依赖于格莱姆西的"霸权"观念来描述美国社会压迫性结构之持续的合法性(Unger,1983)。然而,对于物质和社会转型,CLS 并不能提供一个范式的策略。韦斯特(West,1993)宣称:

> 批判法律理论家从根本上置疑美国文化和社会中普遍性的占主导地位的自由主义范式。这种彻底的质疑主要并非是一种建构性尝试,以推动建立一种新的法律和社会秩序概念,而是对在自由主义传统下,法律形式主义者、法律实证主义者以及法律现实主义者的那种不一致、断裂、沉默以及视而不见进行鲜明的揭露。批判法律研究更多的是对法律学校那种教育策略之合法性和权威的系统性攻击,而非宣告未来的一种可信和可实现的新社会与法律系统(p. 196)。

CLS 研究者批评主流法律意识形态,因为它把美国描绘成一个理想社会,但是他们并没有在批评中将种族主义包括在内。因此,有色人种法律研究者的不满自然地导致 CRT 的出现。

CRT 一开始就表达了其观念,认为种族主义"在美国社会是正常的,不是异常的",同时由于种族主义缠结在美国社会的秩序构成之中,故在这个社会中,它的出现对人们来说既是正常也是自然的。实际上,贝尔在《井底的面孔》(*Faces at the Bottom of the Well*,1992)这本书中的前提假设便是:种族主义是美国社会中永恒的装置。因此,那些为种族社会正义而斗争之人的策略是暴露和揭示所有各种改头换面的种族主义形式。

其次,CRT 有时运用故事讲述的方式而与主流法律学术研究相背离,通过这种方式它"分析那些塑造着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人群,构成关于种族共同文化的神话、预想以及智慧"(Delgado,1995,p. xiv)。巴纳斯(Barnes,1990)写道,"批判种族理论家……将来源于'他者'之共享历史的经验性知识与他们持续的斗争整合起来,以改变种族霸权之下日渐破坏的社会"(pp. 1864-1865)。因此,压迫性的经验如种族主义、性别主义等对于一个 CRT 视角的发展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

CRT 的第三个特征是它对自由主义批评的坚持。克伦肖(Crenshaw,1988)认为,自由主义的视角认为"公民权利的运动是一个长期和缓慢的过程,但是总是努力向上的",但它是有缺陷的,因为它并没有理解目前法律范式的局限,而是强调渐进主义,试图成为社会变迁的一种催化力量。CRT 提出,种族主义需要彻底的变迁,但是自由主义并没有一种机制来应对这种变迁。相反,自由主义法律实践支持引用法律来争取获得有色人种公民权利的艰苦漫长过程。

第四点,CRT 认为,白人一直是公民权利立法的主要受益者。比如,尽管积极的行动政策在整个国家范围内受到攻击,但它也是一个对白人有益的政策。对数字的观察揭示出,采用积极行动政策的主要获益方一直是白人女性(Guy-Sheftall,1993)。其争论的逻辑是这些妇女所赚取收入将会用来支持家庭内的其他白人——包括男性、女性和孩子。故总体上,对白人女性雇佣之保证于整体上对白人是有利的。

最近对批判种族理论的重要作品进行编辑时，编辑们就指出，不存在“所有人（CRT研究者）都赞成的规范学说或方法论”（Crenshaw，Gotanda，Peller，& Thomas，1995，p. xiii）。不过，这些学者在两个共同的兴趣点上依然是可统一的——理解“在美国，白人统治和有色人种服从的政体是如何被创造和维持的”（p. xiii），以及改变存在于法律和种族权力之间的连接纽带。

在追求这些兴趣之时，法律学者譬如威廉姆斯（Williams，1991）和贝尔（Bell，1980，1992）皆为早期批判种族理论家之一员，他们的观点亦可抵达一般大众。一些人或许认为他们之所以可发出广泛呼吁，是因为具有将强制性的故事纳入他们所置身法律问题的能力。由于叙述调查的日见盛行，许多社会科学研究者对故事材料的这种运用方式都抱有特别的兴趣（Connelly & Clandinin，1990）。但是，仅仅因为研究共同体可以接纳故事来作为叙述调查之一部分，并不意味着可以判定所有的故事知识建构与学科的发展的意义上都是合法的。

劳伦斯（Lawrence，1995）宣称，尽管总地说来，在法学（或者任何学科）的文献中并没有告知或记录下普通人的故事，但在法学中的确存在讲述故事的传统，他认为诉讼便是高度形式化的故事讲述。普通人的故事虽未能进入到文献记录或研究中，并不意味着普通人的故事不具有重要性。法学或其他科学所具有的历史情境性质，使得那些被驱逐或者边缘化的群体成员的声音被消除掉了。针对这种状况，许多CRT的学者在将边缘性的权力带入关于种族正义的法律话语中时，把重点放在这些“声音”的角色之上。批判种族理论家尝试将来源于共同压迫历史的有色人种的文化观点注入到他们的努力之中，意图重建在种族霸权的压力之下面临瓦解的社会。

而直至晚近，CRT几乎没有找到一条通向法律之外文献的途径。在我自己与泰特（Tate）的研究中，我们提出一些主题，将它作为对传统多元文化教育范式的挑战（Ladson-Billings & Tate，1995）。我们认为，在美国社会中种族问题继续保持着缄默状态；国家被假设为建立在产权而非人权之上；可以把种族与财产的交织作为一种有力的分析工具，去解释社会和教育的不平等。后来，泰特（Tate，1997）提供了一种对批判种族理论及其前身的综合性描述，希望教育研究团体可以更加充分地理解CRT的意义，以及其在教育中的可能用途。在讨论中，他引用了卡尔默（Calmore，1992）对CRT的界定。

> 它是反对派学者的一种形式……它挑战着那种普适性观念，认为白人的经验/判断就是权威的标准，它约束着有色人种，并在规范意义上对适当的思想、表达、呈现以及行为进行衡量、指引、控制以及制约。如同法律学者的表述，批判种族理论对那种将种族和种族主义与法律相连的主导性话语提出了挑战。他们的任务是界定在法学中被掩盖和遵从的价值与规范……批判种族研究者……希望证明，作为有色人种，（他们的）经验对于分析法律系统和种族服从来说具有合法性、适当性和有效基础。对于视角的转换来说……这一过程是至关重要的。理论—实践（practice）的取向，也可称为实践行动（praxis），发现在那些遵从这种实践的人之中具有一种关注的多样

性……从这一种优势出发,应当拿出一点时间来考虑法律、社会和文化是如何作为文本的——它不太像一种文学作品,而更像一个传统的黑衣牧师对诗歌或者圣经的引用,在其中权威的支持力量便依托于他的说教之中。在此,文本不仅仅是一个随意的故事。如同圣经,它们乃是对权威、先决力以及认可的表达。有色人种的人群日渐提出,大量的这些法律、社会和文化文本必须要受制于基本的批判主义并进行重新解释(pp. 2161-2162)。

尽管 CRT 已被用来作为理解法律(特别是公民权利法)的一种分析工具,但如同前文所述,它还没有被成功地运用于法庭和法律案例或学派的实践世界之中。实际上,CRT 所得到的首次公众曝光对兰尼·吉尼尔(Lani Guinier)作为总统资格的公民权提名来说是失败惨重的。CRT 的激进理论主张被看作是对"美国方式"的一种挑战。吉尼尔(Guinier,1994)在作品中的相应表达被看作是与美国宪法中一"人"一次投票的观念是相对立的。她提出,在后南非的种族隔离时代,有必要保证作为少数族裔的白人具有政治的声音,尽管事实上在选举中他们的数目远超过其他人。同样地,她指出,在美国也许不得不寻求新的方式来表达有色人种的声音,超越那种一人一次投票的多数人的规则。吉尼尔的观点意味着她不能得到承认,总统对于她的提名未置一词。

CRT,认识者和被认识者

权力和一种范式的推动不仅仅是方法论的倾向。它还是一种手段,通过它去把握现实以及赋予其意义和预测性。

雷·莱斯特(Rist,1990)

临界性、可变性、CRT 以及整合种族化话语和种族认识论的新的定性研究形式,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解释认识者(研究者)和被认识者(主体、参与者、被调查者、合作者)之间的关系。科德(Code,1991)问道,认识者的性别在知识的建构中有影响吗?她得出肯定的结论。我认为伴随认识者的性别、种族、族群、语言、阶级、性征,以及其他的差异形式都会表明他或她与知识及其生产的关系。然而,纳拉亚(Narayan,1993)认为,假设由于研究者(作者是人类学家)是一个特殊种族或者族群的一员,她或他就有那种特殊的群体或者共同体的 emic 知识是危险的:

由此,"本土"人类学家被认为是局内人而不去考虑他们的复杂背景。种种"本土"人类学家之间的差异也明显地被忽略掉了。一个具有美国贫穷少数族裔背景的人,尽管存在偏见但尽力去接受教育,当研究她自己的社区时,她与一个来自第三世界的精英群体的成员——拥有优秀的教育和财产继承,在海外学习人类学然后回国在弱势人群中做田野调查,这两者可以等同吗?对于特定地方的问题他们是否会比较敏感,并承认选择第三世界制

> 度基础的学者也许对于西方基础上的理论、书籍、政治立场以及书写的技术等有不同的看法？一个中产阶级的白人专业人员对他自身社会的研究来说，是否也是一个“本土”人类学家（p. 677）？

如果我们接受一个群体成员资格所意味着的本质化观念，那么纳拉亚的观点有很好的说服力。我们知道我们用来论述的范畴亦带有界限划分。谁以及什么构成了群体成员的资格总是被论及。不过，寻求一种更好地表述本土和社区知识的研究取向仍然是值得去努力的。

阿森特（Asante，1987）在伍德森和杜博依斯的著作基础上，试图去塑造一个“非洲中心”的教育取向。尽管其他黑人学者对他的取向进行挑战，认为他是一个中心主义者以及一个种族“拉拉队的领队”，但阿森特（Asante，1991）自己的语言表明他对替代范式的寻找更倾向于从主导视角的压迫中脱离：

> 非洲中心性不是欧洲中心性的黑人版本。欧洲中心性奠基在白人统治者的观念上，他们的目的是要保护白人在教育、经济、政治等上的特权和优势。与欧洲中心性不同，非洲中心性不允许采取降低其他群体视角的种族中心的固化措施。进一步，欧洲中心性表达的是将欧洲人特殊的历史现实作为人类经验的总和。它把欧洲的现实当成普适性的，即把白人的经验表达为应用于一般意义上人类的状况，而非白人的经验则被看做特定群体，并因此是非人类的（p. 172）。

如我所述，阿森特（Asante，1987）主要的论点是有色人种的学者一直在寻求“一个与……西方标准之关系的立足之地，而西方标准则被作为强加于其他文化的阐释量度”（p. 11）。他认为对于一个“灵活的参考框架”（p. 11）来说，它将允许认识者和被认识者之间形成更具动力性和转换性的互动。

同样，安扎杜亚（Anzaldua，1987）提醒我们，主导性的文化被掌握权力的人所界定并经常作为一种专制力量而存在，反对“他者”对文化的界定。对于认识者和被认识者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她的反映是希望朝向一个新的混血型的意识，这是一种边界地带的意识。她的工作以一种阿森特所提出的更具动力性的方式，代表着认同、表达和学术研究的复杂性。她的研究以一种流动的、令人激动的方式在展览和艺术、散文和诗歌以及西班牙语和英语之间移动，并用多元性的方式展现了这种边界性：

> 因为我，一个混血儿
> 不断地从一种文化中走出
> 又进入到另一种去
> 这是因为我同时在所有的文化中（P. 77）

她用一种不带感情的、包含歧义的风格，来强调多元的认识论立场，在这种立场下，所有的人发现了他们自身，甚至对于那些抱持一元话语假设的人。

当海沃特（Highwater，1981）指出“存在于人们之间的最大的距离不是空间，而是文化”（p. 3），他提出了类似的问题。他进一步宣称表达的重要性，认为它是

一种“在现实和描述现实的符号之间的复杂、无限的变化关系”(p.70)。表达的概念能够(而且应该)被扩展到学术界。关于谁是研究者,为了谁去研究,学术研究者必须接受挑战。为了谁的问题不仅与辩护有关,更与谁能够行动以及行动者的展现有关。行动者则通过认识论和话语的形式来行事。

范农(Fanon,1968)认为,尽管被压迫者为了他们的解放采取了各种反对压迫者语言的手段,但彻底的解放仍将来自于使用新话语的新的个体。这种新的话语代表了黑人女性主义者洛德(Lorde,1984)的主要观点,在她不断被引用的一篇文章中,她指出,“主人的工具将永远不会再被用来拆除主人的房子”。然而,其他的学者则提出,“主人的房子只能由主人的工具来拆除”①。在这种认识论上的摇移不定中——在旧的话语和新的话语之间——许多有色人种学者发现了他们自己。对于学者的承认、提升、任期和出版的机制主要被主导性意识形态所控制,而有色人种的学者发现他们自己也同时受训于这种主导性传统之中,他们亟需从中脱离。

一边是有色人种被训练所做的研究,一边是他们本质上需要去做的研究,这两者的矛盾感情造就了德尔加多—盖谈(Delgado-Gaitan,1993)所描述的“局内人/局外人地位”之状况。一个人刚开始是个局外人,当逐渐获得足够的信任时即获得局内人的地位。但是这种从“局外人”到“局内人”的位移,则可以变成一种压迫和殖民化的形式。如同维利纳斯(Villenas,1966)所指出,“通过将被研究者之主体客观化,通过假设性的权威以及不去质问研究者的优势地位,民族志学者已经作为被研究者的一个殖民者在参与”(p.713)。罗萨尔多(Rosaldo,1989)也警告,主导话语将“孤独的民族志学者”理解为“如夸父追日般寻找土著居民”(p.30)是很危险的。在土著居民中花掉时间后,照样孤独的民族志学者便回到他(或她)舒适方便的办公室,书写一个“真实”的文化记录。而出产“新研究”的学者则已经对自己及他们的研究问各种各样的问题了②。西德尔—沃克(Siddle-Walker,1996)由此提出资料和“真正”资料之间区别的问题。有色人种学者的局内人地位可以让他们对被压迫人群通过保留及“歪曲”资料以保护自己也推翻主导范式的方式保持警惕。这些行动可以对被研究社区的猜疑进行反思,而非恶意看待。

在我自己的研究中,尝试过将我自己以及关于我的研究的故事告诉大家(Ladson-Billings,1997)。这一话语之转向并非仅仅是一个新的自我陶醉方式,而是对自己作为一个研究者的定位表示关切——我是谁,我相信什么,我具有什么样的经验——因为它对我研究了什么,怎样研究的以及为什么要做研究产生了影响。非裔美国儿童的教师实践是成功而且值得仿效的,而我对进行这一研究的决定则是政治性的(而非党派的)(Ladson-Billings,1994)。它也将有色人种社

① 这一陈述由小盖茨(Henru Louis Gates,Jr.)1997年在Wisconsin-Madison大学举办的Nonton Anthology of African Literature会议上发表。

② 温特(Wynter,1992)将1960年代的族群研究——非裔美国人、美裔印第安人、亚裔美国人、墨西哥裔人、波多黎各裔人,以及拉丁裔的研究——作为“新研究”来表达他们与旧的范式和正统的决裂。

区的研究过程去神秘化，这些社区的成员常常被当做客体而很少是研究的受益者①。

在我的研究中，打破了一些传统研究的约束。我通过低收入的非裔美国父母而找到那些优秀的老师，允许他们去设想自己对于课题之理论导向的责任，同时，我创造了一种研究上的合作，其中本人只是和教师们呆在一起的九个成员之一，而非作为专家/研究者。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的这种变迁关系强迫我用一种更加自我呈现和接受攻击的方式来参与。在此过程中，我将自己所写的每件事的研究副本都发一份给其他成员。当我错误表达了他们的思想和观点时，他们会指责我，而当我写对的时候他们则表示肯定。在超过三年的过程中，我们成为一个朋友群体，共同关注非裔美国儿童的教育。在这么长的时期内，紧密的研究形式使成员要想欺骗或者隐藏自己的感觉变得很困难。这也表示研究资金的结束并不意味着关系的结束。所以，七年以后，我们继续相互商讨，并互致祝福卡。我知道谁经历了丧亲之痛，谁从疾病中痊愈，谁的孩子上了大学，谁成了祖父祖母等。我的研究是生活的一个部分，而我的生活也是研究的一个部分。

渴望了解以及被了解是人类生存的重要特征。不幸的是，有色人种的知识或关于他们的知识一直被欧美文化逻辑所压制、歪曲和否定，它代表着一种"对知识空间的攻击性掠夺，就像土地的掠夺一样，攻击者占有其他人的领土而宣称是他自己的"(Asante，1987，p.9)。

批判种族理论给研究者提供了一个机会，使其可以处于一个对于研究者(及被研究者来说)的不同关系中。CRT的一些关键特征是故事讲述、相反的故事讲述(counter-storytelling)，以及"对自身的现实进行命名"等(Delgado，1995a)。定性研究中故事讲述的价值可以说明，同样的现象如何以依赖于故事讲述者的那种不同和多样化的方式去讲述。比如，当一个人类学者将男性婴儿生殖器的割礼描述为仪式时，罗森费尔德(Bertha Rosenfeld)讲述的也许只是作为她家庭的犹太教传统一部分，是对她新出生侄子的一段精彩的表演罢了(Ladson-Billings，1993)。哪一个故事是真的？谁的故事可获得合法性？谁有权力来塑造公众对于事件逻辑和价值的感知？人们或许认为在此呈现的例子是一种夸大其辞，就像霍莱斯·迈纳(Horace Miner)的经典"Nacirema中的身体仪式"(Nacirema是American的倒写)表现的那样，但它的确是不同讲述者权力的一个代表。如威廉姆斯(Williams，1995)所指出：

> 要成为一个故事讲述者……就是假定对于一个人来说的那种令人敬畏的回忆的压力，同时，要在适当的时候，用笑声和眼泪、欢乐和悲伤、忧郁和激情来展现这些极为重要的角色。故事讲述者并非从来都在整体上属于他或她自己。故事讲述者在讲述及重新讲述关于部落的状况时，牺牲掉了每件事情。

① 在一次专业会议上，我的一个非裔美国妇女同事提出，非裔美国社区已经成为"资料农场园"，研究者们收获了好处却对实质情形无所贡献。

……故事是否正确地把握了"事实"并非总是重要的。印第安的故事讲述者更感兴趣于故事中的"真理"。同时,一个伟大的故事讲述者总是使故事中的"真理"符合时机的需要(pp. xi-xii)①。

没有什么故事比西姆普森(O. J. Simpson)的谋杀判决那么广泛地引起人们的争论。起诉人讲述了一个故事,一个疯狂和有极强控制欲的人几年来对其前妻实施虐待,当得知她的浪漫情事后便杀死了她。他们把它当作一个一目了然的案子。他们提出西姆普森有动机这样做并且他们掌握有证据。但是辩护律师却讲述了另一个故事。他们认为起诉人的想象是不真实的,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乃是洛杉矶警察部门的一部分。他们改变了案子的重心,将谋杀案变成在美国警察部门对有色人种(特别是黑人和拉丁美洲男性)的一般化认识。尽管讲述大量不同的故事是多数法律案例的构成部分,无论刑法或者民法,但陪审团对这两个故事的反应则让白人和/或中产阶级美国人深受打击。

对审判后的分析显示,尽管陪审团中至少有一个白人和一个拉丁美洲成员,但一个以黑人为主的陪审团并不能够让一个黑人名流获罪。还有分析则认为,陪审团并非有足够的智慧去做出正确决定。西姆普森谋杀案的判决紧随四个洛杉矶警察对金殴打一案之后。尽管整个国家(包括陪审团成员)都通过录像带看到了殴打过程,但郊区,一个以白人为主的陪审团仍对警官的殴打案实施了从轻判决。在那次判决中,辩护律师则展示出如何对录像带进行各种类别分析能导致一个不同于真实观察的解释来。根据金的经历以及驾驶记录,辩护律师的故事让陪审团成员觉得是可信的。

同样,研究文献中"故事"也会被不同人以不同的方式来理解。在1960年代的教育和社会科学研究文献中,关于有色人种儿童乃是"文化剥夺"和"文化劣势"的故事(Bettelheim,1965;Bloom,Davis,& Hess,1965;Ornstein & Vairo,1968;Riessman,1962)。这是一种亚标准(substandard)的故事,将有色人种和穷人的儿童反常化,而将学校和社会中白人中产阶级的文化表现作为规范的和正确的方式。在联邦和地方层面的政策即来源于这些故事,它尝试去"弥补"有色人种儿童及其家庭的不足。

西德尔—沃克(Siddle-Walker,1996)提出了关于"好的"隔离学校的相反故事,它呈现了一个有色人种的工人阶级社区内完全不同的状况。实际上,在美国南部便存在相反的故事,尽管受到主流文化的忽视和反对,有色人种依然协力工作,努力去保证他们的孩子得到更好的教育。历史上的黑人学院、大学、种族学院以及早期的种族研究项目便提供了这样的示例,它证明有色人种尝试建立自己的教育结构和话语,以挑战那种排外性的观念,这是其展示自身优秀之处的唯一途径。

① 在关于门彻(Menchú,1984)的生活故事里,这种观念得到有趣地体现,它的题目是"我,Rigoberta Menchú"。后来,一名达特蒙(Dartmouth)的研究者参观了门彻的危地马拉村庄,发现与她的自传"不一致"和"伪造"的地方(Stoll,1999)。

1969年,圣弗兰西斯科学院(现在是圣弗兰西斯科大学)的亚裔美国人研究项目按照民主和广泛的原则推出了一个独立的研究计划(Hirabayashi & Alquizola,1994)。这一计划(与学院的种族研究计划相呼应)是第三世界的解放浪潮而引起的学生罢课所带来的结果。计划的目标是对所有“非白人”申请者实行开放和直接的入学,课程和人员雇佣的事务由社区来控制,实施自我管理。这种教育模式要以激进的方式从高等教育那种管理严密、层级制以及科层形式的特征中走出来。关于亚裔美国人的研究计划敢于展示这样一个相反的“故事”,表明它对于主流范式来说具有分裂性和动摇性。

农场工人的孩子去做田野工作

> 每一个安息日,我的主人都在公众场合给船员读祷文。当第一次看见他念的时候,我一生中从来没有那么惊奇过,我发现书在和主人谈话,我想是的,因为我观察到主人看着书,而他的嘴唇则不停地翕动着。我希望那种现象也发生在我身上。一旦我的主人读完以后,我就跟着他到放书的地方……没有人的时候,我就把书打开,用耳朵贴近它,非常希望它可以跟我说点什么。
>
> 詹姆斯·格朗尼奥索(James Gronniosaw)

当我还是一个在费城玩耍的小孩子的时候,那里有许多非裔的美国男子(一些是我的家族中的人),夏天他们常常在街角等着农场工人的交通车。这辆破烂的黄色校车到黑人社区里寻找合适的工人,让他们到田间去做艰苦的拾马铃薯、草莓或其他季节性水果与蔬菜这样的劳动。

当我搬到加利福尼亚时,我看到了站在街角那些有着棕色面庞的人们。这个时候,不是校车,而是一辆敞棚卡车会停在路边,里面的人去挑选一些等在街角的人,到建筑工地去做日间劳力。在一所国家最有名的大学不远的地方,是学校拥有的一个草莓农场,那里一群来来回回的农场工人就在非人道的和肮脏的环境中生活和工作着。几年里,这个自夸家庭收入平均大约$300 000的社区里,我看到许多黄色面孔的人在日渐增加的餐馆厨房中做刷盘子和拖地的工作。有色人种和穷人的“真正”田野工作在学术文献中很少被充分地呈现出来。

今天,当我试图从事自己的研究工作时,日渐增长的有色人种学者数量打动了我,他们选择回到进入那些田地、建筑工地、厨房中去,让他们自己的种群发出自己的声音——他们的视角、世界观和认识论。这些学者,就像格朗尼奥索(前文引用过)一样,他们正尝试让从属人群的生活“与他们对话”。由于厌倦了附耳去听主人书的讲话,有色人种的学者正书写新的文本,它来源于那些与他们相像的人群的生活和经验。这些学者比如格沃尔特尼(Gwaltney,1980)、托里斯—古兹曼(Torres-Guzman,1992)、涅托(Nieto,1992)、泰卡基(Takaki,1989,1993)、埃

利森(Ellison,1986)、邱吉尔(Churchill,1992,1993)、西尔克(Silko,1977,1981)、斯皮瓦克(Spivak,1988)、胡克斯(hooks,1984,1989,1992)以及无数其他人的研究已开始重塑关于有色人种社区学术研究的面貌。也许更重要的是有色人种的研究工作,他们已经把工作放在对主流范式的批判审视上。学者如塞德(Said,1979)、安妮(Ani,1994)、默里森(Morrison,1992)以及黄(Hwang,1994)等用解构性的知识去改变"(在一个)知识的'考古学'中(Foucault,1972)……意识和(发展)认知的自治性,以揭示种族的信仰结构——以及其他的话语实践"(King,1995,p.276)。

例如,尽管科林斯(Collins,1990)为说明黑人女性主义的立场而发展出一个理论类别,但这种类别同时也代表了对于欧美范式的一种批评框架。科林斯认为,对于具体的经验比如意义的标准而言,在知识评价中对话的运用代表着一种关怀伦理和个体责任伦理。在本文化里,科林斯要询问的是,你经历了什么?你讨论的是什么?我怎样知道你所关心的事情?以及,你是谁?然而,对主体的考察在实证主义范式中常常是缺失的,它依赖于一种客观性观念,即使往往无法获得这种客观性。

有色人种研究者对其社区的回归以及对欧美范式的批判性审视,并非是号召一种对他者的那种浪漫的、"高尚的野蛮人"观念。相反,这一工作要揭示各种差异的复杂性——种族、阶级和性别等。吉尔罗伊(Gilroy,1993)的研究则为种族、族群和性别的复杂与多元化理解提供了一个突出的例证:

> 关于国籍、放逐以及文化从属等的主题强调(种族化)主体必然的分裂性与差异化。这种分裂性近来则进一步与性别、性征以及男性主导等问题混合在一起,(种族与少数族裔)女性的斗争已经使我们无法回避这些问题……由于在地方性与直接性层面的斗争中出现了内部共同体的对抗,所以它们作为分化的衡量指标尤为重要,这些主题在地方与世界上还在日益活跃着。

种族化话语和族群认识论上的研究要点并不仅仅是将学术研究"有色化"。它要挑战霸权性的结构(和符号),它们还在各地维持着不公正和不平等。我们的研究亦并非要摒弃欧洲或欧美学者的工作,而是要清楚地认识到他们的研究局限性。我们从有色人种所获得的动力,是要提升定性研究解决问题的可能性。

种族化话语和族群认识论对学术研究的贡献,或许可以用一个蹩脚但相当类似的对比来形容,那就是体育世界。早在1947年,"美国的最爱娱乐"——职业棒球——是白人的一种游戏。有色人种的队员没有"资格"参加大的球队。有一次,一名黑人队员被选入球队,顿时引发了关于"降低标准"的讨论。然而,职业排球并未发生滑坡现象。将有色人种运动员——非裔美国人、拉丁裔人、亚洲人等——纳入进来,使更具竞争力及在世界上更加广泛地参与的比赛发展了起来。

同样,有色人种的学者仍然为在学术界中无法表达自身而感到失落。常常被关注的问题是,有色人种学者会不会达到一定的标准,雇佣这些学者会不会降

低制度的声望和地位等。但是如果整个群体都被系统地排除在知识生产过程以外,又如何能够发展出广泛的学术研究呢?一些人也许认为有色人种学者受制于种族化的话语和族群认识论,他们的学术发现因而是带有"偏见"的。但是,多元意识视角和从临界性出发的观点认为,具有种族主义和族群歧视体验(在苛刻的信任中生存)的有色人种学者会有一种视角上的优势。如德尔加多(Delgado,1995c)提出,"许多少数族裔成员讲两种语言,生长在两种文化体系中……那么,这样看来……在掌握和运用批判性的社会思想中,谁更有优势呢?谁倾向于同时用两种或多种方式来思考每一件事情呢?又是谁实质上将后现代主义作为他或她存在的一个条件来认识呢?"(p.8)

定性研究的范式转换既与表达(representation)有关,又超越了表达。它们将要发展出一种"对模糊性的包容"来(Anzaldúa,1987)。实际上,安扎杜亚(Anzaldúa,1987)早已预言过这种情况:

> (混血女性①)(La mestiza)发现她们无法将概念或观点保持在严格的边界上。人们期望边界和围墙将不合时宜的观点排除在外,而它已成为一种固定的习惯与行为模式。固定便意味着死亡。只有保持了灵活性,她们才能够从深度和广度上延展自己的精神。混血女性常常不得不从习惯形式中走出来;从同一性的思维,以及试图用理性来达致唯一目标的分析推理中走出来,转变到一种差异性的思维方式来,它的特征便是从系统的模式和目标中脱离,朝向一种更加整体性的视角,去吸纳而非排除。新的混血意识开始发展出了一种对差异和模糊性的包容态度。

新的混血意识所带来的"礼物"是一种学术研究的新视角。为接受此礼物,学者们必须摆脱那种严格范式的约束,建立一种与知识、认识者和被认识者的新关系。可变性——及临界性——并非占据着特权地位,毋宁说是一个具有优势的地位。它提供了一个创造"公共学术"(J. E. King,个人交流,1998 年 4 月)的机会,并以此促进了社会行动和转型。

CRT 给批判的定性研究者带来什么不同

科林斯(Collins,1998)指出,她不会用语言去"表现似乎客观且政治无涉的权威",她所选择的语言"既是知识的也是政治的决定"(p. xxi)。她引用法律学者威廉姆斯(Patricia Williams)的话来问,"否定其自身的'非人格'的书写究竟是什么?"(p. xxi)。由此,CRT 要求批判定性研究者在一种自我揭示(self-revelatory)的模式下行事,并承认在其中双重(或多重)意识的作用。我决定将批判种族理论框架运用在我的学术研究中,它与我对政治的理解和我在黑人儿童教育方面的个人立场是密切关联的。我所有的"自我"都在这一研究中得到体

① 一般指欧洲人与印第安人的混血。——译者注

现——作为社区成员的自我、作为黑人妇女的自我等。这种纵横交织、多面向的研究不会导出技术—理性取向来的。技术—理性取向也不会虑及“知识的考古学”(Foucault,1972),而它对于挑战主流和边缘之间那种不公正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立场是很重要的。

CRT 所赋予我们的礼赠,是它毫不犹豫地挑战那些非人道和非人格化的学术研究。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并非仅仅是“定量”和“定性”研究之间的某种差异。早在20年前,克龙巴赫(Cronbach,1975)就试图指出定量和定性之间虚假的分裂。我们需要为之斗争的问题是范式性和认识论的。在这些范式以外,还存在着许多特殊的方法论视角。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1990)、内特尔斯和珀尔纳(Nettles & Perna,1997),以及威尔逊(Wilson,1987)都尝试运用定量方法去批判性地审视社会不平等问题。他们展现的大量及不一致的数值强调了人们的服从和被排除在社会外的状况。因此,参与观察、叙事调查,以及访谈等的运用并无特殊魔力。事实上,定性研究者也必须反对那种认为定性研究可以表达更多研究“真实”形式的观点。当考虑定性研究的不同例证时,我们必须留心“研究过程”中可能见不到研究者的情况。民族志学者作为一个大救星,讲述着一个人为的组织严密及通顺的故事。他们与电视记者不同,后者以普通大众的简单视角来引导一种访谈,而对于民族志研究者,问题、格式以及声音腔调等的评论都无法提供给他们①。

在 CRT 中,研究者对自己以何种面貌出现非常在意,如同贝尔(Bell,1987,1992,1998)和德尔加多(Delgado,1992,1993),他们创造出具有可变性的自我,能够与权力进行直接的对话。贝尔,一个黑人女性,就是这种自我的体现。在德尔加多的影响下,出现了罗德里格,他也是贝尔半个伙伴,去反对主流的法律学术研究。CRT 所带来的社会科学的个体性考察有助于打破传统的知识研究的神秘性。当威廉姆斯(Williams,1991)在法律学校的合同课程上,将她受到奴役的最伟大的母亲的账单展示出来时,学生对于合同的原有观念顿时瓦解了,他们原以为合同乃是一种无涉人类感情和个体重要性的文件而已。

CRT 帮助我们提出关于知识的控制与生产这样的重要问题——特别是有关对有色人种人群和社区的认识:在批判的定性研究者话语中,“种族”的位置在哪儿?在什么程度上批判的定性研究者要重新界定自由主义?当我们拥抱那种关于人类的能动性的后现代视角时,它又怎样同时模糊了集体性努力的需要?批判的定性研究以何种方式去“研究连接性”,或者以何种方式来表明“我们与研究情境以及被访者乃处于一种关系中,同时理解在那种关系里我们都是多元性的存在”(Fine,1988,p. 135)。

---

① 在完成这一章时,刚好播放完电视记者沃尔特与声名狼藉的莫尼卡·莱温斯基的访谈。我感到很震动,因为访谈以后,有如此多的人就问题的类型、沃尔特的询问方式,以及她所省略的问题等进行评论。

结　语

当回过头来反思这一章的论述时，人们或许认为我总是在讨论"学术研究"的主张与种族、族群的"混合"。其不足之处乃是缺少一种客观性和政治性的调查。对于我来说，奥特劳(Outlaw,1995)的论述可以提供一个合适的结语：

> 为什么种族和族群与哲学有关系？简单来说，因为我相信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时期，其中种族和族群对于我们能够和希望实现的未来幸福而言，具有非常大的挑战性，它使我们不得不去重新根本性地审视那些具有基础性的确证：我们是谁？我们的生活应该是什么样的？怎样从个体和集体两个层面去实现我们的目标？因为这些关注在两千多年里，为许许多多西方的哲学(及同类的探索领域)提供了动力核心……最后，对于这些问题来说，它还深入地体现了一种个体性的维度……因为它们都以一种显著的方式构造着我的存在以及影响着我的日常生活，并且由此限定了所有与我发生互动的人的生活。我是一个哲学家，讲授着学科历史的一部分，但我也以一个种族/族群群体之一员的身份而从事这些工作的，这些种族群体在美国的存在……以奴役和其他形式压迫的浩劫而为特征的，然而却已被位列万神殿的西方哲学家中一些"最智慧"的头脑给合理化(rationalized)了。因此，不仅在实践生活中我主张种族和族群政治很少与基本性的因素有关，而且我还要同时与那种本质性的原因观念进行斗争，它们假定引致生活提升的启蒙有一种本源之所在……我要求自己要去对抗这些内在的错误观念，同时，也要求一种净化的知识和社会空间，在此我们走到一起，在包含正义的和平和谐的环境中工作和居住(pp. 305-306)。

参考文献

Acuña, R. (1972). *Occupied America: The Chicano struggle toward liberation*. New York: Canfield.

Alarcón, N. (1990). Chicana feminism: In the tracks of "the" native woman. *Cultural Studies*, 4, 248-256.

Almaguer, T. (1974). Historical notes on Chicano oppression: The dialectics of racial and class domination in North America. *Aztlan*, 5(1-2), 27-56.

Ani, M. (1994). *Yurugu: An African-centered critique of European cultural thought and behavior*. Trenton, NJ: Africa World Press.

Anzaldúa, G. (1987). *Borderlands/la frontera: The new mestiza*. San Francisco: Aunt Lute.

Appiah, K. A. (1992). *In my father's house: Africa in the philosophy of cultu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ppleby, J., Hunt, L., & Jacob, M. (1994). *Telling the truth about history*. New York: W. W. Norton.

Asante, M. K. (1987). *The Afrocentric idea*.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Asante, M. K. (1991). The Afrocentric idea in

education. *Journal of Negro Education*, 60, 170-180.

Balderrama, F. E. (1982). *In defense of la raza: The Los Angeles Mexican consulate and the Mexican community*, 1929-1936. Tucs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Barnes, R. (1990). Race consciousness: The thematic content of racial distinctiveness in critical race legal scholarship. *Harvard Law Review*, 103, 1864-1871.

Bell, D. (1980). *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 and the interest convergence dilemma. *Harvard Law Review*, 93, 518-533.

Bell, D. (1987). *And we are not saved: The elusive quest for racial justice*. New York: Basic Books.

Bell, D. (1992). *Faces at the bottom of the well.* New York: Basic Books.

Bell, D. (1998). *Afrolantic legacies.* Chicago: Third World Press.

Bettelheim, B. (1965). Teaching the disadvantaged. *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 Journal*, 54, 8-12.

Bloom, B., Davis, A., & Hess, R. (1965). *Comprehensive education for cultural deprivations.* Troy, MO: Holt, Rinehart & Winston.

Calmore, J. O. (1992). Critical race theory, Archie Shepp and fire music: Securing an authentic intellectual life in a multicultural world. *Southern California Law Review*, 65, 2129-2230.

Castillo, A. (1995). *Massacre of the dreamers: Essays on Xicanisma.* New York: Plume.

Churchill, W. (1992). *Fantasies of the master race: Literature, cinema, and the colonization of American Indians.* Monroe, ME: Common Courage.

Churchill, W. (1993). I am indigenist. In W. Churchill, *Struggle for the land: A land rights reader.* Monroe, ME: Common Courage.

Code, L. (1991). *What can she know? Feminist theor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knowledg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Collins, P. H. (1990). *Black feminist thought: Knowledge, consciousness, and the politics of empowerment.* New York: Routledge, Chapman & Hall.

Collins, P. H. (1998). *Fighting words: Black women and the search for justic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Connelly, F. M., & Clandinin D. J. (1990). Stories of experience and narrative inquiry. *Educational Researcher*, 19 (5), 2-14.

Crenshaw, K. (1988). Race, reform and retrenchment: Transformation and legitimation in anti-discrimination law. *Harvard Law Review*, 101, 1331-1387.

Crenshaw, K., Gotanda, N., Peller, G., & Thomas, K. (1995). Introduction. In K. Crenshaw, N. Gotanda, G. Peller, & K. Thomas (Eds.), *Critical race theory: The key writings that formed the movement.* New York: Free Press.

Cronbach, L. (1975). Beyond the two disciplines of scientific psychology. *American Psychologist*, 30, 116-127.

de la Torre, A., & Pesquera, B. (Eds.). (1993). *Building with our hands: New directions in Chicano studi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Delgado, R. (1992). Rodrigo's chronicle. *Yale Law Journal*, 101, 1357-1383.

Delgado, R. (1993). Rodrigo's sixth chronicle: Intersections, essences, and the dilemma of social reform. *New York University Law Review*, 68, 639-674.

Delgado, R. (Ed.). (1995a). *Critical race theory: The cutting edge.*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Delgado, R. (1995b). Introduction. In R. Delgado (Ed.), *Critical race theory: The cutting edge.*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Delgado, R. (1995c). Racial realism—after we're gone: Prudent speculations on America in a post-racial epoch. In R. Delgado (Ed.), *Critical race theory: The cutting edge.*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Delgado Bernal, D. (1998). Using a Chicana feminist epistemology in educational research. *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 68, 555-582.

Delgado-Gaitan, C. (1993). Researching change and changing the researcher. *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 63, 389-411.

Du Bois, W. E. B. (1953). *The souls of Black folk.* New York: Fawcett.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03)

Ellison, R. (1986). What America would be like without Blacks. In R. Ellison, *Going to the territory* (pp. 104-112). New York: Random House.

Espiritu, Y. L. (1992). *Asian American panethnicity: Bridging institutions and identities.*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Fanon, F. (1968). *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New York: Grove.

Fine, M. (1998). Working the hyphens: Reinventing self and other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N. K. Denzin & Y. S. Lincoln (Eds.), *The landscape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Theories and issues* (pp. 130-155). Thousand Oaks, CA: Sage.

Foucault, M. (1972).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A. M. Sheridan Smith, Trans.). New York: Harper & Row.

Foucault, M. (1973). *The order of things: An archa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s.* New York: Random House.

Frankenstein, M. (1990). Incorporating race, gender, and class issues into a critical mathematics literacy curriculum. *Journal of Negro Education*, 59, 336-351.

Geertz, C. (1983). *Local knowledge: Further essays in interpretive anthropology.* New York: Basic Books.

Gilroy, P. (1993). *Black Atlantic: Modernity and double consciousnes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Gomez-Quinones, J. (1977). On culture. *Revista Chicano-Riqueña*, 5(2), 35-53.

Gordon, R. (1990). New developments in legal theory. In D. Kairys (Ed.), *The politics of law: A progressive critique* (pp. 413-325). New York: Pantheon.

Gramsci, A. (1971).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Q. Hoare & G. N. Smith, Eds. & Tran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Guinier, L. (1994). *The tyranny of the majority: Fundamental fairness in representative democracy.* New York: Free Press.

Guy-Sheftall, B. (1993, April). *Black feminist perspectives on the academ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 Atlanta.

Gwaltney, J. L. (1980). *Drylongso: A self-portrait of Black America.* New York: Random House.

Haney López, I. F. (1995).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ace. In R. Delgado (Ed.), *Critical race theory: The cutting edge* (pp. 191-203).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Hertzberg, H. W. (1971). *The search for an American Indian identity.* Syracuse, NY: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Highwater, J. (1981). *The primal mind: Vision and reality in Indian America.* New York: Meridian.

Hirabayashi, L. R., & Alquizola, M. C. (1994). Asian American studies: Re-evaluating for the 1990s. In K. Aguilar-San Juan (Ed.), *The state of Asian America: Activism and resistance in the 1990s* (pp. 351-364). Boston: South End.

Hollinger, P. (1995). *Postethnic America: Beyond multiculturalism.* New York: Basic Books.

hooks, b. (1984). *Feminist theory: From margin to center.* Boston: South End.

hooks, b. (1989). *Talking back: Thinking feminist, thinking Black.* Boston: South End.

hooks, b. (1992). *Black looks: Race and representation.* Boston: South End.

Hwang, D. H. (1994). Foreword: Facing the mirror. In K. Aguilar-San Juan (Ed.), *The state of Asian America: Activism and resistance in the 1990s* (pp. ix-xii). Boston: South End.

Jefferson, T. (1954). *Notes on the state of Virginia.* New York: W. W. Norton.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784)

Kincheloe, J. L., & McLaren, P. L. (1998). Rethinking critical theory and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N. K. Denzin & Y. S. Lincoln

(Eds.), *The landscape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Theories and issues* (pp. 260-299). Thousand Oaks, CA: Sage.

King, D. K. (1988). Multiple jeopardy, multiple consciousness: The context of a Black feminist ideology. *Signs*, 14, 42-72.

King, J. E. (1995). Culture centered knowledge: Black studies, curriculum transformation, and social action. In J. A. Banks & C. M. Banks (Eds.), *Handbook of research on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pp. 265-290). New York: Macmillan.

Ladson-Billings, G. (1993). Through a looking glass: Politics and the history curriculum. *Theory and Research in Social Education*, 21, 84-92.

Ladson-Billings, G. (1994). *The dreamkeepers: Successful teachers of African American children.*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Ladson-Billings, G. (1997). For colored girls who have considered suicide when the academy isn't enough: Reflections of an African American woman scholar. In A. Neumann & P. Peterson (Eds.), *Learning from our lives: Women, research and autobiography in education* (pp. 52-70).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Press.

Ladson-Billings, G. (1998). Just what is critical race theory and what is it doing in a "nice" field like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Qualitative Studies in Education*, 11, 7-24.

Ladson-Billings, G., & Tate, W. F. (1995). Toward a critical race theory of education. *Teachers College Record*, 97, 47-68.

Lawrence, C. (1995). The word and the river: Pedagogy as scholarship and struggle. In K. Crenshaw, N. Gotanda, G. Peller, & K. Thomas (Eds.), *Critical race theory: The writings that formed the movement* (pp. 336-351). New York: Free Press.

Legesse, A. (1973). *Three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an African society.* New York: Free Press.

Lewis, D. L. (1993). *W. E. B. Du Bois: Biography of a race* 1868-1919. New York: Henry Holt.

Lewontin, R. C., Rose, S., & Kamin, L. (1984). *Not in our genes: Biology, ideology and human nature.* New York: Pantheon.

Lomawaima, K. T. (1995). Educating Native Americans. In J. A. Banks & C. M. Banks (Eds.), *Handbook of research on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pp. 331-347). New York: Macmillan.

Lorde, A. (1984). *Sister outsider: Essays and speeches.* New York: Crossing.

Lowe, L. (1996). *Immigrant acts: On Asian American cultural politics.*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Menchú, R. (1984). *I, Rigoberta Menchú: An Indian woman in Guatemala* (E. BurgosDebray, Ed.; A. Wright, Trans.). London: Verso.

Mirande, A., & Enriquez, E. (1979). *La Chicana: The Mexican American woma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Mohanty, C. T. (1991). Under Western eyes: Feminist scholarship and colonial discourses. In C. T. Mohanty, A. Russo, & L. Torres (Eds.), *Third World women and the politics of feminism* (pp. 50-80).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Morrison, T. (1992). *Playing in the dark: Whiteness and the literary imagina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Narayan, K. (1993). How native is a "native" anthropologist?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95, 671-686.

Nettles, M., & Perna, L. (1997). *The African American education data book.* Fairfax, VA: Frederick D. Patterson Research Institute.

Nieto, S. (1992). We have stories to tell: A case study of Puerto Ricans in children's books. In V. A. Harris (Ed.), *Teaching multicultural literature in grades K-8* (pp. 171-201). Northwood, MA: Christopher-Gordon.

Oboler, S. (1995). *Ethnic labels, Latino lives: Identity and the politics of (re) present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Omi, M., & Winant, H. (1994). *Racial form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1960-1990* (2nd

ed.). New York: Routledge.

Ornstein, A., & Vairo, P. (1968). *How to teach disadvantaged youth*. New York: McKay.

Outlaw, L. (1995). Philosophy, ethnicity, and race. In F. L. Hord & J. S. Lee (Eds.), *I am because we are: Readings in Black philosophy* (pp. 304-328).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Padilla, F. (1987). *Latino ethnic consciousness*. Notre Dame, IN: Notre Dame University Press.

Pandian, J. (1985). *Anthropology and the Western tradition: Towards an authentic anthropology*. Prospects Heights, IL: Waveland.

Paz, O. (1961). *The labyrinth of solitude: Life and thought in Mexico*. New York: Random House.

Pirsig, R. M. (1972). *Zen and the art of motorcycle maintenance*. New York: Bantam.

Riessman, F. (1962). *The culturally deprived child*. New York: Harper & Row.

Rist, R. (1990). On the relations among educational research paradigms: From disdain to detentes. In K. Dougherty & F. Hammack (Eds.), *Education and society: A reader* (pp. 81-95).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Rosaldo, R. (1989). *Culture and truth: The remaking of social analysis*. Boston: Beacon.

Rosaldo, R. (1993). After objectivism. In S. During (Ed.), *The cultural studies reader* (pp. 104-117). New York: Routledge.

Said, E. W. (1979). *Orientalism*. New York: Vintage.

Scheurich, J. J., & Young, M. (1997). Coloring epistemologies: Are our research epistemologies racially biased? *Educational Researcher*, 26(4), 4-16.

Shujaa, M. (1997, April). *Transformation of the researcher working toward liberati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 San Diego, CA.

Siddle-Walker, V. (1996). *Their highest potential: An African American school community in the segregated South*.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Silko, L. M. (1977). *Ceremony*. New York: Viking.

Silko, L. M. (1981). *Storyteller*. New York: Seaver.

Snipp, C. M. (1995). American Indian studies. In J. A. Banks & C. M. Banks (Eds.). *Handbook of research on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pp. 245-258). New York: Macmillan.

Spivak, G. C. (1988). *In other worlds: Essays in cultural politics*. New York: Routledge.

Stoll, D. (1999). *Rigoberta Menchú and the story of all poor Guatemalans*. Boulder, CO: Westview.

Takaki, R. (1989). *Strangers from a different shore: A history of Asian Americans*. Boston: Little, Brown.

Takaki, R. (1993). *A different mirror: A multicultural history of America*. Boston: Little, Brown.

Tate, W. F. (1997). Critical race theory and education: History, theory, and implications. In M. W. Apple (Ed.), *Review of research in education* (Vol. 22, pp. 191-243). Washington, DC: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

Torres-Guzman, M. E. (1992). Stories of hope in the midst of despair: Culturally responsive education for Latino students in an alternative high school in New York City. In M. Saravia-Shore & S. F. Arvizu (Eds.), *Cross cultural literacy: Ethnographies of communication in multiethnic classrooms* (pp. 477-490). New York: Garland.

Trinh T. M. (1909). *Woman, native, other: Writing postcoloniality and feminis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Unger, R. M. (1983). The critical legal studies movement. *Harvard Law Review*, 96, 561-675.

Villenas, S. (1966). The colonizer/colonized Chicana ethnographer: Identity, marginalization, and co-optation in the field. *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 66, 711-731.

Warrior, R. A. (1995). *Tribal secrets: Recovering American Indian intellectual*

tradition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West, C. (1990). The new cultural politics of difference. In R. Ferguson, M. Gever, T. M. Trinh, & C. West (Eds.), *Out there: Marginalization and contemporary cultures* (pp. 19-36). Cambridge: MIT Press.

West, C. (1993). *Keeping faith: Philosophy and race in America.* New York: Routledge.

Williams, G. W. (1882-1883). *History of the Negro race in America from 1619 to 1880: Negroes as slaves, as soldiers, as citizens* (2 vols.).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Williams, P. (1991). *The alchemy of race and rights: Diary of a law professo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Williams, R. (1995). Foreword. In R. Delgado, *The Rodrigo chronicles: Conversations about America and race* (pp. xi-xv).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Wilson, W. J. (1987). *The truly disadvantaged: The inner city, the underclass, and public polic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Woodson, C. G. (1933). *The miseducation of the Negro.* Washington, DC: Association Press.

Wynter, S. (1992). *Do not call us "Negroes": How "multicultural" textbooks perpetuate racism.* San Francisco: Aspire.

Zinn, H. (1980). *A people's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HarperCollins.

批判理论和定性研究的再思考 10

RETHINKING CRITICAL THEORY AND QUALITATIVE RESEARCH

⊙ 乔·L·金奇洛　彼特·麦克拉伦

批判研究的渊源

自诞生于德国法兰克福之始，在将近70年的时间中，批判理论一直致力于解构和批评社会现状。在此过程之中，它激发了高度情绪化的反响，其中，既有来自于支持者的热切拥护，也有反对者的猛烈抨击。这些彼此之间形成鲜明对照的反应，正好说明批判理论依然非常重要。我们可以反对批判理论，也可以为之辩护，但是我们不能无视其存在，特别是在当前这个历史性的时刻。事实上，将研究意图定位在批判理论的视野之内的定性研究，在我们看来，依旧在生成不无危险性的知识，这种知识所包含的信息和洞察力可以倾覆秩序，可能推翻真理所具有的至高无上的权威。

批判理论是一个被广泛引用却又经常被误解的词汇。它经常被归源于由法兰克福学派发展起来的理论传统，该学派由一帮与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有密切关系的理论家组成。但是，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之中，没有任何人宣称曾经提出过系统的文化批评主义方法。起初，霍克海默、阿德诺和马库斯是以与德国传统的哲学和社会思想对话作为切入点的，他们特别强调与马克思、康德、黑格尔、韦伯进行对话。对这些批判理论家有利，并且影响了他们的政治敏感性的是，当时，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破坏，战后的德国经济萧条，通货膨胀，失业激增，而与此同时德国和中欧的罢工和抗议却遭到失败，人们急切需要对现实进行重新解释。在这一点上，他们不同于马克思主义者的正统，同时也强化了他们的信念：不公平和压迫塑造了现实世界（Bottomore，1984；Gibson，1986；Held，1980；Jay，1973）。早期的批判理论家侧重于关注资本主义本质的变化，分析了与这种变化相伴而来的统治形式的变异（Agger，1998；Gall，Gall & Borg，1999；Giroux，1983，1997；Kellner，1989；Kincheloe & Pinar，1991；McLaren，1997）。

法兰克福学派建立十年之后，纳粹统治了德国。由于法兰克福学派成员的

犹太人身份所面对的遭受迫害的危险,以及他们与马克思主义的联系,霍克海默、阿德诺和马库斯离开了德国。当这些批判理论家最终选择在加利福尼亚立足之时,他们为美国文化所惊异。霍克海默、阿德诺和马库斯对美国社会科学研究者对任何事情都视为理所当然的经验主义习气大为不快,他们力图挑战这种社会科学所具有的共同信念,即研究者能够描述并且对任何人类行为进行精确测量。这些理论家对美国渐进改良式的平等主义辞藻与现实之中存在的种族和阶级歧视之间的矛盾大为不满,在美国居留期间,他们完成了他们的主要著作。1953 年,霍克海默和阿德诺返回德国重建社会研究所。值得注意的是,马库斯继续留在美国,给他在社会理论领域的工作寻找新的听众。大大超出他本人意料的是,他的名望高涨,成为了 1960 年代学生运动的精神领袖。批判理论,特别是马库斯关于情感和性解放的著作,为新左派的主张提供了哲学基础。出于对心理和文化革命政治的关注,新左派极力鼓吹一种马库斯式的政治解放学说(Gibson,1986;Hinchey,1998;Kincheloe & Steinberg,1997;Surber,1998;Wexler,1991,1996b)。

亲身经历过 1960 年代政治气氛的许多学者,都将学术注意力集中在批判理论之上。由于被晚近才起源于资本主义所哺育的后启蒙文化之中的统治形式挫败,这些学者看到批判理论之中存在一种方法,可以使学术工作从这种权力形式之中得到暂时的解放。他们对批判理论之中关于经验的社会建构的辩证观点印象深刻,开始将他们的学科看作是社会和历史背景下权力关系和话语的体现,而这些权力关系和话语正是产生于这种社会和历史背景之中。隐含在社会经验的建构本质之中的"可能性话语"向这些学者暗示,对社会科学的重建最终能导向一个更加平等、更加民主的社会秩序。对人类行为的新的后结构主义式的概念化,以及关于人们至少可以部分地决定他们自身存在的预言,为社会研究的解放形式提供了新的希望,这不同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后者强调历史发展的铁律,资本主义具有不可改变的罪恶,而无产阶级经受着特权的奴役,同时也是社会变革的参与者。例如,当亨里・吉罗克斯(Henry Giroux)和其他批判教育家在评论马克思主义学者鲍尔斯(Samuel Bowles)和金蒂斯(Herbert Gintis)的观点——即学校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文化和官僚制度再生产的工具——之时,他们认为,通过教师和学生在解放教育框架之下的协调努力,作为一个充满希望的地方,学校能够成为反抗的阵地,具有民主的可能性,这与鲍尔斯和金蒂斯的决定论观点形成对比。吉罗斯(Giroux,1988)特别指出,学校可以从培养年轻人的批判能力的目的出发,而非压迫的目的出发,转变成为讲授知识、道德和社会关系形式的机构。

批判式的谦恭:我们对批判理论和批判研究的另类理解

在涉猎批判理论和批判研究的二十多年之中,我们被数以百计次地要求,对

什么是批判理论这一问题给予更加确切的解释。我们发现这一问题难以回答，因为：①存在诸多批判理论，而不仅仅是一种；②批判的传统常常处于变化和进化的过程之中；③批判理论力图避免过分的确切性，因为批判理论家之间存在观点不一致之处。指出该理论所具有的一些固定的特点，违背了这些理论家的意愿，他们没有为社会政治和认识论信念规划蓝图。在给予如上这些否定性的回答以后，现在我们试图从新千年开始之际的批判理论和批判研究的本质之中"概括"出一点独特性。请注意，这只不过是我们的主观分析，很多才华横溢的批判理论家将会从我们的归纳之中发现众多问题。

在这一微不足道的意义上，我们初步阐述一种概念重建了的、世纪末的批判理论，在 20 世纪最后四分之一的时间里，这一理论屡遭"后式话语"（post-discourses）的批评和攻讦（Bauman，1995；Carlson & Apple，1998；Collins，1995；Giroux，1997；Kellner，1995；Roman & Eyre，1997；Steinberg & Kincheloe，1998）。在此背景下，概念重建之后的批判理论质疑如下假定，该假定认为，一些国家是无可挑剔的民主和自由社会，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欧盟国家。在整个 20 世纪，特别是从 1960 年代早期以后，与其说这些社会中的个人之间是平等和独立的，不如说他们已经适应并且习惯了统治和服从关系。关于这个世纪后半期的技术和社会变迁给信息的生产和获得提供了新的形式，批判理论家辩称，自我导向问题和民主式的平等主义应当被重新评价。进而，遭受"后式话语"（如后现代主义、批判式女权主义、后结构主义）攻讦的批判理论家认为，个人关于他们自身和世界的观念所受到的社会和历史力量的影响，比先前所想象的还要深刻。20 世纪晚期以来，媒体上充斥着西方文化，关于社会和信息环境的这一变化，批判理论家需要以新的方式研究和分析个体的建构过程（Agger，1992；Flossner & Otto，1998；Hinchey，1998；Leistyna，Woodrum，& Sherblom，1996；Quail，Razzano，& Skalli，2000；Smith & Wexler，1995；Sünker，1998）。我们将从如下几方面简要阐述我们对于新千年的批判理论的理解。

批判理论的概念重建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认为，社会理论如同一份地图，或者是一位导游，它引导人们通向某一社会领域。在研究语境之中，它并没有决定我们是如何看待这个世界的，而是帮助我们为了探析社会而设定问题和策略。批判理论特别关注权力和正义问题，还有经济形式、种族问题、阶级和性别、意识形态、话语、教育和宗教，以及其他社会制度和文化力量与社会系统结构之间的相互作用。

批判式启蒙。在这里批判理论通过分析一个社会之中的个人和群体之间的权力和利益竞争，识别特定情境中哪些人获得利益，哪些人有所损失。批判理论家宣称，特权阶层常常倾向于维护现状，以确保他们的既得利益，对这种行为的动力进行分析往往成为批判研究的核心关注点。关于特权的研究则是以种族、

阶级、性别和性为中心得以展开的(Carter, 1998; Howell, 1998; Kincheloe & Steinberg, 1997; Kincheloe, Steinberg, Rodriguez & Chennault, 1998; McLaren, 1997; Rodriguez & Villaverde, 1999; Sleeter & Rodriguez, 1995)。因此,对批判式启蒙的寻求即是揭示特定社会安排下的赢家和输家,以及该权力得以运作的过程(Cary, 1996; Fehr, 1993; King, 1996; Pruyn, 1994; Wexler, 1996a)。

批判式解放。为了寻求解放,人们结合成为一个以正义为导向的共同体,试图获得对其自身的控制。批判研究力图揭示那些妨碍个人和群体形成一些抉择的力量,而这些抉择对他们的生活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通过这种方式,可以达致高度的自治和人的能动性。在新千年伊始,我们得谨慎地使用解放这一词汇,因为,如同众多评论家已经指出,没有人能够完全从其所处社会政治背景之中完全解放出来,而正是这种社会政治背景产生了他们自身。同时,许多人已经质疑与之相伴而来的力图解放"他人"的傲慢之举。这些重要的评论必须得到批判研究者的认真对待。因此,当批判研究者在寻求那些在不经意之中塑造我们自身的力量之时,我们敬重那些能够从个人的经验之中推演出不同结论的人士(Butler, 1998; Cannella, 1997; Kellogg, 1998; Knobel, 1999; Steinberg & Kincheloe, 1998; Weil, 1998)。

拒斥经济决定论。对批判理论进行概念重建之时的一个告诫是,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主张"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即经济因素规定人类存在的其他方面的本质,而批判理论传统并不接受这一信条。批判理论家明白,在21世纪之初,存在多种形式的权力,包括如前所述的基于种族、性别和性分野的统治。当然,在讨论这一主张之时,一个得到概念重建的批判理论也不能宣称经济因素对于塑造日常生活无足轻重。经济因素无法与其他方面的压迫区分开来(Aronowitz & DiFazio, 1994; Carlson, 1997; Gabbard, 1995; Gee, Hull, & Lankshear, 1996; Gibson, 1986; Haymes, 1995; Steinberg, 1995, 1999; Kincheloe &, Steinberg, 1999; Martin & Schumann, 1996; Rifkin, 1995)。

工具或技术理性批评。概念重建以后的批判理论,将工具/技术理性视为当代社会最具压制性的特征。这种"超级理性"形式沉迷于手段的考量,而不是优先考虑结果。批判理论家认为,工具/技术理性更加注重方法和效率,而不是目标。它止步于询问"如何",而非"为什么应该"。在研究文献中,批判理论家宣称,许多唯理性主义学者是如此侧重于关注技术、程序问题以及精确的方法,而忘却了研究行为的人文主义目标。工具/技术理性出于对"正确"的方法的考量,常常将事实与价值割裂开来,在此过程之中失去了对于价值选择方面的理解,而这种价值选择常常是包含在所谓的事实之中的(Alfino, Caputo, & Wynyard, 1998; Giroux, 1997; Hinchey, 1998; Kincheloe, 1993; McLaren, 1998; Ritzer, 1993; Stallabrass, 1996; Weinstein, 1998)。

欲望的影响。再结构化的批判理论欣赏后结构主义的精神分析,将其作为推进解放研究方案的重要资源。在这一点上,批判理论家更加能够加深对于人类心智建构的复杂性的认识。这种精神分析帮助批判研究者洞悉无意识过程,

这一过程创造了对于渐进式变迁的抵抗,并导致了自我摧残(self-destructive)行为。传统精神分析将个人视为是理性而自主(autonomous)的,后结构主义精神分析拒斥了这一倾向,从而为批判理论家反思各种形式的权力、身份、力比多(libido)、理性和情感的相互作用提供了新的工具。在这一结构之中,心智不再脱离社会政治领域而独立存在,事实上,欲望能够被社会建构,并且可能被执掌权力者用于毁灭和压迫。另一方面,批判理论家可以通过激发欲望,以促进进步和解放事业。放弃对于女权主义理论的领导以后,批判研究者意识到了存在于传统精神分析之中的家长制的痕迹,并寻求摆脱其小资产阶级的、种族优越论的以及憎恨妇女的习气。去除这些瑕疵之后,后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帮助研究人员获得了对于幻想和想象力的角色,以及与之相关联的社会文化结构和精神的意义的敏感性(Alford,1993;Atwell-Vasey,1998;Barrows,1995;Block,1995;Britzman & Pitt,1996;Elliot,1994;Gresson,2000;Kincheloe,Steinberg,& Villaverde,1999;Pinar,1998;Pinar,Reynold,Slattery,& Taubman,1995;Samuels,1993)。

批判理论与权力的再概念化:霸权。我们对于批判理论的概念重建,迫切需要对于权力运作方式的差异性和复杂性的理解,而正是这种权力运作,支配并形塑了意识。批判理论家所考察的权力是一个极端模糊的概念,需要进行详细研究和分析。批判理论家之间似乎正在形成一种共识:权力是人类存在的一种基础性要素,它的运行规定了人类传统的压迫性和生产性本质。事实上,我们都被赋予权力,同时我们的权力又都被取消殆尽,通过权力,我们拥有支配能力,而当我们试图使用这种能力之时又受到限制。由于篇幅有限,我们在这里集中探讨批判理论对权力的压迫性这一个侧面的关注,尽管我们知道批判研究曾经对权力的生产性一面进行过重要论述——其赋权能力,建立批判性民主制度的能力,促使边缘人群反思他们自身的社会政治地位的能力(Apple,1996b;Fiske,1993;Freire,2000;Giroux,1997;Macedo,1994;Nicholson & Seidman,1995)。

在关于压迫性权力及其产生不平等和人类苦难的能力的文献之中,格莱姆西(Antonio Gramsci)的观点在批判研究之中具有核心地位。格莱姆西指出,20世纪的统治权力不仅通过身体的力量体现出来,而且通过媒介、学校、家庭和教堂等文化设施,以社会心理的力量赢得人们对于统治的赞同。格莱姆西式的霸权注意到了赢得大众的赞同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必须在对个案进行逐一分析的基础上进行认真研究。进行权力研究的学生和研究人员、教育家、社会学家,以及我们全体都被霸权化了,那是因为我们的知识领域是在有限的、不同的关于社会政治世界的各种学说基础上组合而成的。霸权被局限在有限的社会心理范围,从一个不公平的权力体系之中获得赞同——这种权力体系被合法地描写成为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一系列社会关系。在这个意义上,批判理论家注意到了霸权之下的赞同从来没有被完全建立起来,因为它经常遭到不同群体所提出的不同方案的挑战(Grossberg,1997;Lull,1995;McLaren,1995a,1995b;McLaren,Hammer,Reilly,& Sholle,1995;West,1993)。

批判理论与权力的再概念化: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家明白,霸权的形成不能

与意识形态的生产隔离开来。如果说霸权是赢得其“服从者”的同意的比较强有力的工具,那么,意识形态霸权则包括文化形式、意义、仪式,以及同意社会现状,和同意处于这一社会现状之中的个人特定位置的请求。与霸权相比,意识形态使批判理论家超出了单纯的对于统治的解释,他们使用诸如宣传等词汇来形容通过媒介、政治、教育和其他社会文化产品等方式,强制性地促使公民接受压迫企图。概念重建后的批判研究认可更为精致的、暧昧的并且境遇更加独特的统治形式,拒绝将民众假定为愚笨的、易受控制的受害者形象的宣传模式。意识到这种霸权性的意识形态的研究者明白,统治性意识形态的话语和实践塑造了我们对于现实的看法(Lemke,1995,1998)。人们关于他们所在的世界及自身在这一世界中的作用存在一个解释性的构造,当对这一构造得以形成的权力共谋进行细致入微的理解以后,我们关于霸权性的意识形态的观点在认识论上成为了具有建设性的批判形式(Kincheloe,1998)。这种认知矫正了早先关于意识形态的描写,早先意识形态被描述成为一个整体的、单向度的实体,它被独裁的统治阶级以隐秘的方式施加于众。为了理解在不同阶级、种族和性别群体之间的斗争,以及资本各部门之间的冲突同时爆发的背景之下的统治,意识形态的批判理论家考察了不同社会场景之中这些冲突卷入不同观念、利益和方案的方式——这些场景事先被认为外在于意识形态斗争领域(Brosio,1994;Steinberg,2000)。

批判理论与权力的再概念化:语言/话语权。批判研究者开始发现语言并不是社会的简单反映。它是一种不固定的社会实践,其意义的转换依赖于其所处的语境。与先前的理解相反,批判研究者逐渐认识到如下事实,语言并非是中性而客观地描述“真实世界”。更确切地说,从批判的视角来看,语言并不是关于世界的简单描述,而是服从于对世界的建构。牢记着这些观点,批判理论家开始研究作为一种规则和统治形式、以话语形式出现的用语方式。话语实践被定义为一套默认的规则,这些规则确定哪些是能说的,哪些是不能说的,谁能以权威的名义说话,而谁只能听着,谁的社会建构是有效的,谁的是错误的或者不重要的。例如,一份教育文献中,合法的权力话语在不经意之间告诉教育者,学生可以阅读哪些书,哪些教育方法应当得到利用,还有,哪些信仰体系和看待成功的方式可以得到讲授。在所有形式的研究之中,话语权力确认了特定的研究策略、叙述格式和表达模式。在这个意义上,权力话语颠覆了语词意义的多样性,确立了一个正确的版本并将一种特殊的霸权/意识形态信息植入读者的意识之中。这一过程常常被认为是在施行言论禁锢。对于意识的建构有兴趣的批判研究者,非常留意这些权力的运作(Blades,1997;Gee,1996;Lemke,1993;Morgan,1996;McWilliam & Taylor,1996;Steinberg,1998)。

聚焦于文化、权力和统治之间的关系。20世纪最后十年,文化对于理解权力和统治的努力来说,获得了新的重要性。批判理论家曾经争辩到,文化必须被视为一个斗争领域,在这里,知识的生产和传播往往是一个竞争的过程(Giroux,1997;Kincheloe & Steinberg,1997;McLaren,1997;Steinberg & Kincheloe,1997;Steinberg,1998)。以各自领域的知识生产形式为基础,主流文化和从属文化表现

为不同意义系统。大众文化,包括 TV、电影、光盘游戏、电脑、音乐、舞蹈以及其他产品,在对权力和统治进行批判研究之时扮演了日益重要的角色。当然,在这一背景下,文化研究与以往相比,发挥了日益显著的作用,它不仅考察大众文化,而且考察引导文化生产的潜在规则。文化研究者注意到了大众传播媒介改变了文化运作的方式,他们认为在新千年伊始的文化认识论会与数十年以前迥然不同。新的文化和文化统治正在产生,尽管真实的文化和虚拟的文化之间的差异日渐模糊。对这种模糊效果的夸张性的宣传,导致了一种丧失传统的时间、社群、自我和历史观念的社会紊乱。来自于地方、国家和国际空间的电子图像的轰炸,产生了一种新的文化时空结构,震撼着我们对于我们各自所处的意识。这种符号和图像的扩散,形成了当代西方社会的一种控制机制。反霸权的文化研究成功的关键取决于:①将关于超现实的叙述、图像和符号生产与政治经济性的权力结合起来的能力;以及②一旦这种关联被提示和描写出来,就能估计这一高度复杂的后果的能力,即描述出个体在现实空间中处于不同种族、阶级、性别和性取向中的形象和标志(Ferguson & Golding,1997;Garnham,1997;Grossberg,1995;Joyrich,1996;Thomas,1997)。

批判理论之中文化灌输(cultural pedagogy)的作用。文化生产常常被认为是一种教育形式,因为其创造知识、形成价值观,并建构认同。在我们看来,这一限定有助于批判理论家把握统治和压迫的现状,从而用之于建立一个更加公正、民主和平等的社会。最近几年来这一教育动态被认为是文化灌输(Berry,1998;Giroux,1997;Kincheloe,1995;McLaren,1997;Paillioter,1998;Semali,1998;Soto,1998)。灌输是一个有用的词汇,但是在过去只被用于课堂讲授和学校教育。在使用文化灌输这一词汇之时,我们特别用之来说明特定的文化行动方式产生特定的看待事物方式的霸权形式。在批判理论的语境之中,我们关于文化灌输的观点是说,当前这个电子化的时代的新教育者是那些能够利用大众传播的财政资源的占有者。这一共同的统治教化过程能够运行得如此之好,以至于在新千年的开始之际很少有人对之抱怨——这种信息政治并没有制造晚间新闻。在当代社会之中,我们能够想象,还有另外一种机构能够在信息和意义系统方面同时获得这种教化权力吗?如果基督教会充分强大,能够驱使教育性"商业单位"每隔几分钟就在电视和收音机上吹嘘让每个人都接受宗教信仰的重要性,那会怎么样?犹太教、穆斯林、印度教、天主教和卫理会教徒如果拒绝接受官方的解释(真正的教义),即受到下地狱的惩罚,假设这一镜头一周七天都被用于向北美居民和他们的孩子们播放,毫无疑问,许多人将会感到受到侮辱,并将组织起来进行政治行动。西方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屈服于这种对于民主制度的共同的教化方面的威胁,人们悲观地看到精英们通过复杂的文化灌输,在政治体制和政治意识方面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控制权。批判研究者致力于揭示这一过程的细节(Deetz,1993;Drummond,1996;Molnar,1996;Pfeil,1995;Steinberg & Kincheloe,1997)。

批判研究与解释的核心:批判诠释学

批判理论取向的定性研究的一个极重要特征,涉及对于信息的解释这一经常被忽视的领域。我们在1990年代进行批判研究的教学和写作的时候,这一解释性的或诠释性的方面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了。许多没有理论背景的从事定性研究的学生在课堂上,或者在他们的作业之中向我们请教,已经提及他们研究之中的资料解释的复杂性和多维度的特性。以批判理论研究为取向的批判动力学(critical dynamic)出现以后,在研究过程之中有很多环节,但是没有哪个环节比解释这一环节更加重要。在本文之中,我们在开始讨论批判定性研究之时,将对批判诠释学和知识生产的关系进行论述(Madison,1988;Slattery,1995)。

批判诠释学的传统(Grondin,1994;Gross & Keith,1997;Rosen,1987;Vattimo,1994)认为,在定性研究之中只有解释(interpretation),尽管有很多研究者可能叫嚣着辩护,事实是能够自明(speak for themselves)的。解释的诠释性行为,要从最基本的层面上澄清所观察到的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沟通性的理解方式。不仅所有的研究只不过是一种解释行为,而且,诠释学主张,对于其自身的感知也是一种解释行为。这样,理解的需要是人类存在的基本特征,因为当遭遇不熟悉者之时经常要求创造意义,把握意义。当然,同样的情形也适合于所熟悉的人。事实上,在研究常常自以为很熟悉的文本之时,我们逐渐发现,有时候熟悉可能即是最为陌生之处。因此,不应感到惊奇,即使是那些所谓的客观的定性研究的写作也是一种解释,而不是价值无涉的描述(Denzin,1994;Gallagher,1992;Jardine,1998;Smith,1999)。

受诠释学传统和后现代批评的影响,批判研究者开始重新审视关于权威的原初界定。没有一种纯粹的解释存在——事实上,没有方法论,社会或者教育理论,或者其他话语形式能够宣称其取得了可以生产权威性知识的特权地位。研究者在就一些问题发言/写作之时,必须联系到世界的其他一些方面,如,总是使用“与……有关”的语式。作为世界的创造物,我们在一定程度被迫适应了这个世界,这种适应又使我们的理论和观点不能脱离这个世界。这样,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我们注定要在这个世界所设定的边界和视界之内,以解释者的身份进行分析。尽管存在这些限制,从诠释过程之中获得的解释能力仍然使我们达到一种新的理解和欣赏境界,这种境界又使我们能“将我们的解释方式”融入已经呈现于面前的经验之中。尽管存在语境障碍,诠释学家可以穿透关于非概念化事实的苍白而非充分的描述,对社会内容进行详尽的解说,这种解说是以其产生背景、生产者的意图以及建构过程之中所动用的意义为特征。这种详尽的描述/解释的出台,并没有循序渐进的蓝图或者呆板的公式。与学习任何艺术形式一样,学习诠释学分析,只有依照杜威式的建议——从实践之中学习。处于这种情境之中的研究者在实践这一技能之时,将紧扣文本进行解说,并将叙述过程与其语

境动力学,以及其他文本联系起来,在讲述之时,则首先是以他们自己,然后是以公众作为阅听对象(Carson & Sumara,1997;Denzin,1994;Gallagher,1992;Jardine,1998;Madison,1988)。

解释的批判诠释学方法

这些对于诠释性解释的本质的关注是在哲学诠释学的范畴下出现的。在这一领域的诠释学学者试图探讨并且澄清解释和理解得以发生的条件。使批判式定性研究得以成长起来的批判诠释学,偏离了标准的诠释学方向,后者是从解释的目的和过程之中提出问题的。在批判理论推动之下,诠释分析的目的被发展成为一种文化批评的形式,试图揭示社会文化背景下的权力动力。与批判诠释学类似,定性研究者在读者与文本之间,文本与其生产者之间,历史背景和现在之间,以及一个特殊的社会环境和其他社会环境之间架构起桥梁。达到这一解释性的目标非常困难,标准的诠释学领域的学者通过对知识生产和文化进行成功地解释,推动人种学家、历史学家、符号语言学家、文学评论家和情境分析人员参与这一桥梁架构过程(Gallagher, 1992; Kellner, 1995; Kogler, 1996; Rapko, 1998)。

以架构诠释性的桥梁为基础,诠释学领域(解释者通过这一分析程序寻找形塑文本解释的历史和社会动力)之中的批判研究者热衷于来来回回地探究与整体直接相关的部分,以及与部分直接相关的整体。这一方面还没有见到最终的解释,尽管这一领域的工作仍然在推进,且无须终止(Gallagher,1992;Peter & Lankeshear,1994;Pinar et al. ,1995)。这一关于整体与部分的运动,与关于抽象与具体之间的分析潮流结合起来。这种动力学在进行解释之时,关注宏观的社会力量(普遍性)和个人的日常生活(特殊性)之间的相互影响。批判诠释学将具体、部分和特殊作为焦点,但是在某种意义上将这些问题置于对社会力量、整体和抽象(普遍性)的更为广阔的背景之中进行理解。聚焦于部分预示着关注特殊性这一动向,这强化了我们依照社会和心理力量来对其进行理解的敏锐性,正是这种社会和心理力量塑造了他或她自身。他们对于部分和独特性的关注,通过将特殊性情境化,为诠释学观察事物奠定了基础,这种视角在传统的对于抽象的一般性的寻求之中被忽视了(Gallagher,1992;Kellner,1995;Miller & Hodge,1998;Peters & Lankshear,1994)。

诠释学领域的相互交流促使分析家依照新的理解对既存的概念架构进行审视。此时分析家对预设进行重新思考并重新概念化,以为研究特殊的文本提供新的研究方法。依据作者的观点进行诠释性理解,并不意味着重复他或者她对于最初问题的回答。在诠释过程之中,作者的答案只有促成了新问题的产生,才对于我们考虑和弄清一个特殊的文本现象是有价值的(Gallagher,1992)。在这样的背景下,诠释领域的研究者必须警觉已经变得模式化了的文本去熟悉化技

术。例如,关于巴比(Barbie)的外形的女权主义批评,以及对于理想女性形象的构建,在大众文化分析之中是如此习以为常,以至于巴比的其他读物都受到了抑制(Steinberg,1997)。在诠释领域内,批判诠释学分析家在这个案例以及其他许多案例之中,必须引进新的形式——对习以为常的去熟悉化的去熟悉化——以便使理解的水准更为深刻(Berger,1995;Steinberg,1998)。

在诠释学领域内部,我们应该提出新的隐喻以形成新的分析方法,从而使我们打破熟悉的模式。比如,若将电影作为大众媒介的梦想,可以帮助大众文化的批判理论家以一种梦的研究的心理分析形式,将解释行为再概念化。这样,批判理论家为了推进关于大众文化的文化研究,可以借助于在对梦的征兆分析过程之中的心理分析工作,借助于心理分析通过可视化的形象和描述帮助人这一工作方式。当研究者将这些新的隐喻应用于诠释学领域之时,他们必须意识到,研究者是在不断将隐含的比喻引进解释过程之中(Berger,1995;Clough,1998)。这些隐喻是在解释本身得以发生的社会历史阶段、文化和语境之中形成的。这种意识非常重要,必须被引介到批判诠释学圈子的相互交流之中。如同杜威(Dewey,1916)在数十年之前所观察到的,个体在一定程度上采纳他们所在社会群体的价值观和视角,这些因素逐渐影响他们看待世界的方式。事实上,这些群体所具有的价值观和视角帮助人们确定什么是重要的,而什么是不重要的,哪些应当被认为是值得注意的,哪些应当忽略。诠释学分析家必须认识到这一解释动力学,并确认他们已经被包含在对于理解的寻求过程之中(Madison,1988;Mullen,1999)。

具有诠释学背景的批判理论家在从事研究之时,将杜威的观点牢记在心。他们承认,他们在研究过程中体现出来的个人思想和解释框架,都处于一定历史背景之中,尽管这些处于变化之中,尽管这些与文化和意识形态潮流纠缠不清(Hinchey,1998;Kincheloe,Steinberg,& Hinchey,1999)。于是,解释性视角的社会建构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意识建构充满矛盾,是各种各样的在意识形态方面相互对立的力量相互碰撞的结果。把握了认同结构与解释性视角之间的关系之后,批判定性研究者可以更好地理解他们自身主张的语源——特别是使这些主张得以形成的权力运作方式。经常隐藏在意识背后的语言、漫谈以及其他一些因素,在不经意之间塑造了研究者储存在他们研究工作之中的意义(Goodson,1997)。正是由于衷心接受这一观点,格莱姆西提出,批判哲学应当被视作是一种自我批判的形式。他进一步说,关于自我的更高层次的理解的出发点,即包含了一种自我意识,这种意识是由权力所驱动的社会历史力量的产物。他曾经写道,批判的观点内含有一种使其接受者对他们以往用以把握世界的意识形态框架进行批判的能力(Coben,1998)。

通过对杜威和格莱姆西关于自我生产的理论以及对批判诠释学和批判式的定性研究的目标进行分析,我们可以知道模糊性的、封闭式的解释过程是如何操作的。一旦我们明白"事实"并不是简单地需要特定的解释,我们将改变批判的方向。

诠释的视域:批判研究的定位

如果研究者没有将这些考虑在内,就容易受未经检验的假定支配。由于所有的解释都具有特定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众多批判研究者同时研究解释者(通常是分析者本身)和解释对象是如何被时间和空间背景建构起来的。在这种背景下,社会理论的重要性浮现出来。按照这种方式,研究者把批判社会理论带入到诠释学领域,以便理解那些在不经意之中即被烙刻上社会意义和价值观痕迹的隐藏的结构和潜在的文化动力(Cary, 1996; Gallagher, 1992; Kellner,1995)。对解释者和文本进行社会、历史定位,是一项非常复杂的事业,要求对支配性的意识形态力量进行细致的分析,这种支配性的意识形态力量将日常生活的微观动力和结构的宏观动力,如白人至上主义、父权制度和阶级精英主义联系起来。众多批判定性研究工作的诠释核心,即是考察研究过程、主题和社会历史结构定位的相互作用。

在考虑到解释过程的这些方面之后,分析家开始理解伽达默尔(Gadamer, 1989)提出的观点,社会基本架构影响研究者的问题,而这些又反过来影响了解释的性质。在明确上述定位过程之后,现代主义者所持的社会文本存在一个有效的解释的观点,将被彻底消解。研究者,无论他们承认与否,往往有许多他们所认同的观点、学术倾向性、社会或者政治集团(Kincheloe,1991;Lugg,1996)。在这一点上,批判研究者宣称,并不要求研究者梳理世间所有联系,而应把握他们所认同的那些联系,并理解这种联系对于研究者探究社会和教育现象的方式的影响。伽达默尔将研究者所说的这些世界性的联系称为"视野"(horizons),并将解释的诠释性行为看作是"视野的融合"。当批判研究者参与视域的融合之后,他们就进入了文本的传统。在这里,他们将考察生产的条件和先前解释的环境。随之,他们将发现文本曾试图过度决定意义的方式(Berger, 1995; Ellis, 1998; Jardine, 1998; Miller & Hodge,1998;Slattery, 1995)。

诠释学传统将解释政治置于中心地位。和普通人一样,批判研究者创造历史,并且在他们从来不必亲自选择的意义结构中生活。正是理解了这点,批判研究者认识到,社会文化分析的一个主要方面是,要对连接人们日常生活经验和这种经验的文化表达的方式进行剖析。这一工作包括将嵌入在文化表达之中的意识形态编码揭示出来。由于在这些文化表达之中运用的许多意义都是想当然的,并且这些意义以一种典型的未经识别的方式回归到了日常生活之中,这使揭示过程非常复杂(Denzin,1992;Kogler,1996)。越是优秀的分析家,越是能够揭示"无声而行"(what-goes-without-saying)的领域里的意义,这一领域之前被认为是不值得评论的。

在这个历史时代,传播的电子模式对于意义的表达和生产变得极其重要,而这种生产又确定了人类普遍的文化境遇,以及对文本的特定解释(Goldman & Papson,1994;Hall,1997)。从很多方面,它被描述成是后现代条件所创造的二手文化,在市场上经过包装和修饰之后,通过流行和大众媒介不间断地传播。批判

分析家指出,这一媒介化文化对于教育的影响,正在从政治/意识形态层面扩展到认识/认知层面。比如,印刷媒介的效果力图定位成为一种线性模式,倡导一种理性、连续、划一的形式;而与此同时,电子媒介所主张的非线性模式,则可能导致更具情感性的反应,从截然不同的方向上引导人们(du Gay, Hall, Janes, MacKay & Negus,1997;Shelton & Kincheloe,1999)。因而,后现代条件下,关于电子媒介的影响以及对教育的冲击的定位,需要研究文化和政治过程的学者加以评估,更重要的是在这个千年交替的年代,研究过程自身也必须得到评估(Bell & Valentine,1997;Berger,1995;Bertman,1998;Denzin,1992;Kellner,1995)。

批判诠释学:为批判研究奠定基础

批判诠释学怀疑任何声称发现了终极真理,或者发现了文本和其他经验形式的本质的解释模式(Goodson & Mangan,1996)。批判诠释学更倾向于如下解释路径,这一路径假定人类经验的意义从来没有被充分揭示出来——对研究者是如此,甚至对那些亲身经历者也是如此。因为语言往往不太可靠,其意义不断在"修正过程之中",批判诠释学明白,解释在语词上永远存在瑕疵,永远不能直接得到表达。批判诠释学试图寻求探明文本的实践,如科学研究和经典理论是如何运作以维护既有的权力关系,并支持现存的权力结构的(Denzin,1992)。当然,如我们所提到的那些批判研究者,在近来的解释模式之中,以政治性的方式来处理私人性事务。批判诠释学将批判研究建立在如下基础上,在这里人们试图将个人遭遇的日常生活困境与权力、公正、民主等公共问题联系起来。一个典型是,在一般的文化研究和文化分析领域,批判诠释学解构了社会文化文本,这一文本鼓励对无权者的常规生活方式进行贬低(Denzin,1992;Gross & Keith,1997;Rapko,1998)。在这种情况下,批判诠释学也相对展开了对于如下文化文本的研究,这一文本使维护社会有权者的权利和特权的意识形态得到了强化(Allison, 1998; Fine, Weis, Powell, & Wong, 1997; Frankenberg, 1993; Kincheloe et al., 1998; Rains, 1998; Rodriguez & Villaverde, 1999)。

在将私人性事务政治化的过程中,批判诠释学通过对现阶段的衍生性主题进行分析,为唤醒批判意识提供了一种方法论。这些衍生性主题可被用于考察当代文化领域的意义制造权力(Peters & Lankshear,1994)。在从事定性研究的圈子之中,依然有人抵制这么一种观点,该观点认为,电影、电视和流行音乐都或多或少地卷入了当代最重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论战。批判诠释学承认流行文化在后现代条件下的这一中心地位,并寻求揭示,其是如何阻碍或促进那些为了实现民主社会而进行的斗争的(Kellner,1995)。通过考察媒介文化在物质上所产生的影响,批判诠释学追踪分析了文化力量在政治方面对于听众的作用方式,即不仅塑造他们的政治信仰,而且形成他们的认同(Steinberg & Kincheloe,1997)。在这个方面,保罗·费采雷(Freire,1985)对于批判诠释学的发展所做的贡献极有价值。费采雷明白,文化衍生性主题在批判性的社会分析中处于中心地位,他假定,解释过程既是一个本体论(属于存在范畴)的范畴,也是一个认识

论(属于知识范畴)上的行为。在本体论层面上,我们作为人的使命,以及我们作为一种存在的基础,即是置根于对世界进行解释性的诠释,基于此,我们才能成为更完整的人。在认识论意义上,批判诠释学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方法,凭借这种方法,我们可以对于我们的存在条件,以及塑造这种条件的衍生性主题进行探索。于是,我们获得了一种能力,在对环绕着我们的文化进行命名的过程之中,我们既可以有目的地生活,也具备了一种对其进行评估的执行能力。在当前的电子社会之中,这种能力将变得更加重要,因为文化领域的社会政治影响还没有得到命名,而在这一陌生而新奇的社会背景下,我们对使我们自身性格得以成形的探索方法缺乏考察。批判诠释学正是填补了这一空白(Kincheloe & Steinberg, 1997;McLaren,1997;Peters & Lankshear,1994)。

批判诠释学将解读世界作为对世界进行评估,并使之更加美好的一系列巨大努力的一个组成部分。了解到这点,可以很容易理解,为什么批判诠释学聚焦于统治及其对立面——解放。统治限制自我导向和民主社会的建设,而解放则使之成为可能。统治在意识形态上被合法化,但是批判诠释学者将其消解,这些学者将帮助批判研究者发现,他们和他们的主题是如何被纠缠于意识形态的过程之中的。对于意识形态的揭露和批判,是批判诠释学促使世界更为美好的努力的一个主要目的。一旦我们的视野被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的合谋者所阻碍,我们为了一个民主社会而付出的努力将付诸东流(Gallagher,1992)。那些种族、阶级和性别特权的权力拥有者(Kincheloe & Steinberg,1997),在接近资源方面有多种途径,从而能够强化意识形态,并表达意志,而那些没有这些特权的个人无法做到这点(Bartolome,1998; Carlson & Apple,1998;Denzin, 1992; Gresson, 1995; Hinchey, 1998; Jipson & Paley, 1997; Leistyna et al., 1996;Peter & Lankshear,1994;Pinar,1998)。

“中立”的学术文化中的派性研究

在有限的篇幅内,不可能对所有的批判传统都一视同仁地论述,这些传统曾经从马克思、康德、黑格尔、韦伯、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以及欧洲大陆的社会理论家,如福柯、哈贝马斯、德里达,拉丁美洲思想家费采雷,法国女权主义者伊利加雷(Irigaray)、克里斯特瓦(Kristeva)和西苏(Cixous),或者俄罗斯社会语言学家巴赫金(Bakhtin)和维果茨基(Vygotsky)等人思想中汲取灵感——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均被当代的批判研究者列入参考文献的清单之中。今天,在许多领域都存在着批判理论家的学派,而且,即使是对这些学派的一些最为杰出者进行粗浅的评论,也需要很长的篇幅。

已经有很多书籍对法兰克福学派成员之间常常充满敌意的争论进行了描写,这个事实提醒我们,要注意不同批判理论家学派的“包装”。批判理论不应被视为革命思想的通用法则,这些思想被客体化和简化为断断续续的公式化的口

号或策略。很明显,在介绍这一经过我们进行概念重建的批判理论的独特版本时,我们对批判传统的界定已经非常宽泛,目的在于简化理解;然而,正如我们先前所断言,这会惹怒许多批判研究者。作为修正,我们决定把焦点放在各个批判学派思想潜在的共同点上,而不是他们之间的分歧。当然,提出一个实际上并不存在的虚假的共同点或者一致性,总是件冒险的事情,然而在一些评论性的章节之中,这些情况还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将批判理论家定义为那些试图将她或者他的工作,作为一种社会或者文化批评形式的研究者或理论家,他们接受如下一些基本假定:所有思想都是以社会性或历史性的权力关系为媒介;事实永远不会被孤立于价值领域之外,也不会抹煞其意识形态的痕迹形式;概念(concept)和对象(object)之间的,符号(signifier)及其所指(signified)之间,并不存在永远稳定或者固定的关系,这一关系常常以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关系为媒介;语言在主体性(意识到了的和未被意识到的认知)的形成过程之中具有中心地位;任何社会之中,总会有一些群体具有特权,凌驾于他人之上,这一特权产生的原因可能非常广泛,当下层阶级认为他们的社会地位是自然而然、必要或者不可避免的时候,具有当代社会的特点的压迫就会不可阻挡地再产生出来;这种压迫有很多方面,而每次都只能忽略其他方面,只关注其中的一个方面(例如,阶级压迫和种族压迫),常常会忽略了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最后,研究实践的主流,一般都会包含阶级、种族和性别压迫制度的再生产,虽然绝大多数没有诉诸文字(Kincheloe & Steinberg,1997)。

在现今学科边界模糊的潮流当中,文学理论家从事人类学研究,而人类学家撰写关于文学理论的著作,或者政治科学家致力于常人方法学家的分析,或者哲学家从事拉康主义式(Lacanian)的电影评论,这些现象并不鲜见。我们提交的这份观察,并非是为我们对待批判传统的肆意的折衷论寻找借口,而是要说明,任何将批判理论描绘成为非连续的分析学派的尝试,都不能捕捉到当代批判分析的杂交特性(hybridity endemic)。

熟悉批判理论家传统的读者,在本章之中能够识别出"新出现"的四种根本不同的从事社会分析的学派:最接近霍克海默、阿德诺和马库斯作品的新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传统;米歇尔(Michel)福柯系谱的著述;与德里达接近的后结构主义解构实践;以及与德里达、福柯、利奥塔(Lyotard)、埃伯特(Ebert)和其他人相伴随的后现代主义。在我们看来,批判的民族志已经受到所有这些视角的不同方式和不同程度的影响。从批判理论那里,研究者继承了对于科学的实证主义观念和工具理性的富于说服力的批判,特别是阿德诺的否定的辩证法的观点,他在概念和对象之中加入了一种不稳定的矛盾关系。从德里达那里,研究者们获得了解构客观真理的方法,这种客观真理被称为"身体的在场"。对德里达来说,语词的意义是不断地滞后的,因为在一个给定的语言系统之中,一个语词只有与不同的其他语词在一起才具备意义。福柯提醒了研究者探究暗含在权力关系之中的话语方式,以及权力和知识是如何辩证而连续地实践的,这种实践决定了哪些被认为是合理而真实的。我们曾将受到这些作家影响的很多著作的特点概括

为“戏谑”而“反叛”的后现代主义理论观点。

在个人被赋权的情况下，批判研究能得到最好的理解。旨在以批判为名的考察，必须直面一个特殊社会，或者社会公共领域的非正义现象。因此，研究变成了一种促进转型的努力，由于贴着政治的标签，这种努力不至于尴尬，由于与解放意识联系在一起，这种努力不会让人害怕。尽管传统研究者固守中立性的藩篱，批判研究者在以更加美好世界为目标的斗争中，频繁坦陈他们的党派性质。传统研究者认为，他们的工作是描述、解释或再现现实中的某一片段，而批判学者们将他们的工作看作是形成政治行动的第一步，而这些政治行动能够矫正现实世界中已经被发现了的不公正现象，或者研究工作本身所造成的不公正现象。霍克海默（Horkheimer，1972）在论证批判理论和研究从来都不能够仅仅满足于知识增长之时，曾经简要阐述了这个观点（参见 Agger，1998；Andersen，1989；Britzman，1991；Giroux，1983，1988，1997；Kincheloe & Steinberg，1993；Quantz，1992；Shor，1996；Villaverde & Kincheloe，1998）。

批判传统之中的研究采用自觉的批评形式——自觉是指研究者力图逐渐觉察到意识形态强制性和认识论假定，这种强制和假定活跃于他们的研究之中，同时也活跃于他们自身主体性的、主体间性的，以及规范化引文的宣称之中。于是，批判研究者进入了对他们所持假定的讨论和公开检讨，这样，没有人会因为他们将认识论方面和政治性的成见带入研究领域而感到困惑。在详细分析之时，这些假设也会有所调整。导致这种调整的原因，可能是由于研究者认识到这一假设并不能引向解放行动。这种解放行动的源泉，取决于研究者是否有能力揭示出表象世界的矛盾，这一表象世界被主流文化认为是自然而神圣的（Giroux，1983，1988，1997；McLaren，1992a，1997；San Juan，1992；Zizek，1990）。这种表象，批判研究者宣称，隐藏着不平等、非公正和剥削性的社会关系。例如，如果我们不把教室里的暴力看成是随机的或者孤立的事件，是异常的个体刻意违反某种社会病理学意义上的特定规范，而是将其描绘成犯罪和抵抗，那么，这就预示着潜伏在日常课堂生活下面的“政治无意识”，并非与种族、阶级和性别压迫实践无关，而是和他们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玩偶城的孩童：超现实世界中的批判理论

后现代文化

在20世纪的最后25年，批判理论的传统观点不得不让步于兴起之中的后现代主义语汇。我们关于批判理论概念重建的观点，是我们促使传统的批判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进行对话的一种方式（Kincheloe，Steinberg & Tippins，1999）。我们将首先分析后现代主义，之后再阐明它与我们所理解的批判理论之间的关系。

在以西方文明的宏大叙事丧失合法性为标志的现今阶段，对理性力量的信

念已经失去,传统宗教正统地位已经被粉碎了,学者们持续地辩论后现代主义这个词汇的意义究竟是什么,一般会认为,它是继现代主义之后的一个划时代的概念。实际上,这一个新纪元是否是一个与“现代”阶段相断裂的阶段,甚至这是否构成一个独立的阶段,学者们还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在这种困惑之中,学者们关于“后现代主义”这个术语在当前条件下运用的争论似乎是可以理解的。一些批判研究著作已经将后现代主义这个术语作为20世纪末的一个别称而加以接受,这些著作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开始探讨当批判理论遭遇后现代条件,即超现实世界之时,会发生什么情况。超现实这个术语被用来描述信息社会,在全社会之中充满着不断增长的表达形式:如电影、图像、电子,等等。这些表达方式,已经深刻地影响了对我们的认同加以塑造的文化叙事的结构。生活的戏剧是如此高频率地在电视上反映出来,以至于人们越来越能预言结果,并且认为这样的结果是社会生活“自然”而“正常”的过程(Fraser,1995;Gergen,1991;Heshusius & Ballard,1996;Kellner,1994;Morley & Chen,1996;Nicholson & Seidman,1995)。

随着许多后现代分析家,我们变成了模仿者,成了彼此模仿的混合体。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带着一种后现代的厌倦,带着无法避免的焦虑,走进生活,很少感动。电视、计算机、录像机和立体声耳机,带着一种曾经塑造过我们的认知和情感机能的表现形式侵扰我们,使我们的情感弥散开来,而那些表现形式的侵入方式仍然没有被充分地了解。在政治领域,传统主义转动着文化战车,排斥他们想象之中的精灵,如世俗人文主义、“极端自由主义”和乌托邦主义,没有认识到后现代的超现实主义对他们神圣的制度所带来的冲击。例如,核心家庭的重要性已经开始减弱,这并非是因为“激进的女权主义者”的攻讦,而是由于随着电子通讯系统的出现,家已经被重新定义了。一些特定的信息模式使个体的家庭成员能够不间断地和特定的亚文化保持接触。由于各种沟通形式的影响,他们虽然身在家中,情感性寄托却已经超然其外了(Gergen,1991;McGuigan,1996;McLaren,1997;Poster,1989;Steinberg & Kincheloe,1996)。我们越来越多地通过传统的文化类电视节目来了解社会世界并对异文化进行判断。超现实向我们展示了一种新的文化形式,它并不是简单地提供了一些相互孤立的技术,而是构成了象征权力的社会技术和关系。看待这些新的技术,不能脱离社会和制度背景,正是在这些背景下,它们得到运用并且在家庭、社区和工作场合发挥作用。对其进行研究,还必须考虑到社会之中“观察资格”是如何分布的,以及多样性的社会和话语是如何实践的,而正是这些实践,生产出了这些新的媒介文化(Buckingham,1989;Hall,1997;Taylor Saarinen,1994)。

电子传播产生了新的文化空间形式,并且重构了对时间的体验。我们经常会受到一种对于媒体景象的虚假归属感的激励,而获得社群成员的身份。超现实世界的居民从早上6点的目击新闻“媒体人物”提供的共同声明之中获得了暂时的慰藉。“在三州社区之家捎来您邻居的新闻”,媒体策划人员试图软化超现实主义的锋芒,以弱化社会眩晕在情感上的影响。电视将其观众带到一个准虚拟的地方——超现实世界,与此同时,世界却没有被电视带入家中(Luke,1991)。

后现代社会理论

我们认为，将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视为一体很容易让人误解。虽然它们之间确实有相似之处，但不能将其完全等同起来。我们还认为，将后现代性与后现代主义等同起来，或者断言，将这对词汇用比较现代主义和现代性的简单方法来进行对比，也是错误的。正如彼特斯（Peters，1993）所言，“这么做，等于把争论装进了严格的（而且幼稚的）现代主义术语学里面，而这种术语学包含了彻底的二元对立，特别强调一组术语与另外一组之间的相互矛盾”（p. 14）。我们使用后现代性这一术语来形容后现代状况，在这里，我们将超现实和后现代理论这些词汇看作对这种状况进行描述的涵盖式术语，在哲学和社会科学之中，这些术语包含了反基础主义的涵义。另外，我们在使用这一术语之时，在非常一般的意义上还包含了后结构主义思潮这一涵义。

后现代理论路线将拒斥一些根深蒂固的假定作为起点，这些假定包括启蒙理性式的、传统西方认识论上的，以及一些认为在讲义以外还存在“可靠”的表达现实的方式。自主的、先验的主题的神话被质疑，而惯例的概念被边缘化了，取而代之的是高度的不确定性，以及对社会实践的文本分析。作为批判主义的一种类型和志趣所向，以及作为1970年代早期的人道主义和人类问题研究的一个核心追问，后现代主义社会理论反对黑格尔绝对知识的反历史性，同时，使自身从反历史性的、先验的和自鉴的真理的不可能性之中解脱出来。颠覆了认为知识只有在反映了“真实”存在的世界才成其为知识的观点，取而代之的是，真实是一种社会性的建构或者符号的产物。进而，用什么来建立和引导科学实践和论辩的一致性，在这方面的规范性共识，已经成为认识论上不确定性的一个智识目标（Pinar et al.，1995；Shelton，1996）。

后现代批判主义的出发点是，他们认为，意义是由“表示者”（signifier）的连续性的游戏构成，对其进行批判的目标是解构西方式的关于真理的元叙事模式，以及隐藏在普遍理性的单线性进化的历史观背后的欧洲种族中心主义。后现代理论既寄托了人们的希望也反映了大家的担心，它既是批判理论家和政治保守主义的奇怪结合，也有对社会和制度关系的现状的玩世不恭的赞同，对意识形态操纵的猛烈批判，以及对知识得以产生出来的主体性实践的消解。

戏谑和反叛的后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批判主义并不是铁板一块的，为此，在本文中我们对两股理论潮流进行了区分。第一种潮流曾被埃伯特（Ebert，1991）敏锐地描述为“戏谑式的后现代主义”（p. 115）——这种社会理论路径被严格限制在改变社会和政治体制上压迫性权力的能力之中。戏谑式的后现代主义通常专注于由“表示者”的连续性游戏，以及不同性质的要素所构成的现实。同样地，戏谑式的后现代主义（参

见,如,Lyotard,Derrida,Baudrillard)确立了解构西方式元叙事模式的反身性片段,它断言"意义本身是自我分割且不可判定的"。

我们力图论证批判研究者们应该对戏谑式的后现代主义的批判采取谨慎的姿态,因为,正如埃伯特(Ebert,1991)指出的,它倾向于重新记录现实,并将历史简化为对意义的补充,或者是文本性的自由浮动的轨迹。作为一种批判模式,它将追问止步于对特殊性和地方性压迫形式的关注,但是常常未能将对这一形式的分析与更为宏观的统治性的压迫结构联系起来(Aronowitz & Giroux,1991;McLaren,1995a;Sunker,1998)。

有一种后现代社会理论,我们试图用来作为怀疑式的、光怪陆离式的后现代主义的平衡物,这种理论被称作"反抗性的后现代主义"(Foster,1983),"激进的批判理论"(Zavarzadeh & Morton,1991),"后现代教育"(Aronowitz & Giroux,1991),"反叛的后现代主义"(Ebert,1991),"积极的后现代主义"(Slattery,1995),"批判的后现代主义"(Giroux,1992;McLaren,1992b,1997;McLaren & Hammer,1989),和"后形式主义"(Kincheloe,1993,1995;Kincheloe & Steinberg,1993;Kincheloe,Steinberg & Hinchey,1999;Kincheloe,Steinberg & Villaverde,1999)。这些形式的批判并非戏谑式后现代主义的替代物,而是这种批判的继承和扩展。反叛式后现代主义给戏谑式的批判带来了一种物质上的干预形式,因为它不仅仅是基于文本理论的区别,也基于社会和历史的分歧。这样,后现代批判可以视为一种干预主义,一种对于西方文化变相的批判。埃伯特(Ebert,1991)之后,反抗的后现代主义力图证明"文本(意义)是物质性的实践,是冲突性的社会关系"(p.115)。符号世界如同观念世界一样,常常充满物质性的冲突和竞争性的社会关系。从这种视角出发,我们可以确认,"表示者"是一种意识形态性的机制,任何时候都与语境上可能的一系列"被表示的"(signified)相对应。换言之,由于陷入了真实的社会和历史的冲突之中,分歧被政治化了。

反叛式的后现代主义与批判理论的对话性的合作,涉及批判实践和后现代的高度不确定性之间的相互影响。由于选择了意义解放的策略,因此,批判理论为后现代批判提供了规范性的基础(也就是,对压迫性和自由式的社会关系进行区分的基础)。如果缺少了该基础,后现代批判总是会受到虚无主义和不作为主义的攻击。实际上,规范性的、没有扎实基础的后现代批判,无法提供一种在道德上具有挑战性,在政治上富有灵变性的行动方案。阿罗诺维茨(Aronowitz)、吉罗克斯(Giroux)、金奇洛(Kincheloe)和麦克拉伦(McLaren)指出,如果后现代批判要给学校教育是文化政治的一种解放形式这一观点提供有价值的贡献,那么它就必须与那些现代主义的平等主义动力联系起来,而这种平等主义的动力促进了解放式的民主。做到这点,后现代批判能够扩展解放式民主的事业,而学校教育则通过促进对于权力是如何运作的全新的理解,通过联合那些由于种族、性别和阶级原因而被排斥的群体,对这一事业提供支持(Aronowitz & Giroux,1991;Codd,1984;Godzich,1992;Kincheloe,1995,1999;Lash,1990;McLaren,1997,1999;Morrow,1991;Pinar,1994,1998;Rosenau,1992;Steinberg & Kincheloe,1998;

Surber,1998;Welch,1991;Wexler,1996a,1997;Yates,1990)。

批判研究与文化研究

文化研究是一个具有跨学科、交叉学科,甚至反学科性质的领域,这一领域是在对于文化的各种定义的相互竞争过程之中形成的。与传统人文主义研究不同,文化研究对将文化与高等文化之间划上等号表示质疑;作为替代,文化研究断言,对于文化生产的种种表达形式进行分析,应该与其他文化过程和社会历史结构结合起来。这一定位,使文化研究成为一种混杂了艺术、宗教、政治、经济和传播活动的大杂烩。在这个背景下,尽管文化研究和流行文化研究相互关联,但是其主要关注点并非流行文化,注意到这一点非常重要。文化研究的旨趣非常广泛,通常涉及包容性规则和排斥规则的产生与本质,正是这些规则主导了学术评价——特别是这些规则和权力关系相互影响的方式。主导学术评价的这些规则与知识的生产与研究规则是不可分割的。因此,文化研究提供了一种具有多重涵义的学术性的批判(Abercrombie,1994;Ferguson & Golding,1997;Grossberg,1995;Hall & du Gay,1996;McLaren, 1995a;Woodward,1997)。

在批判研究的历史上,理论研究方面的最重要的一个基地是伯明翰大学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为了将批判理论和日常经验的特殊性联系在一起,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研究者们曾论证,所有的经验在意识形态面前都是不堪一击的。与此同时,他们还宣称,超出日常经验之外的理论化工作,将产生形式化的、确定性的理论。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一个杰出代表是保罗·威利斯(Paul Willis),他的著作《学会劳动:劳工阶级的孩子是如何获得劳工阶级的工作的》(*Learning to Labour: How Working Class Kids Get Working Class Jobs*)出版于1977年,比科林·莱西(Colin Lacey)的《高镇规则》(*Hightown Grammar*,1970)晚出版7年。他的这一著作以一种批判式的方式重新界定了民族志研究的本质,激发了一股批判研究的高潮,大卫·罗宾斯(David Robins)和菲利普·科恩(Philip Cohen)在1978年出版了《关节三明治:成长在劳工阶级城区之中》(*Knuckle Sandwich: Growing up in the Working Class City*),保罗·戈里甘(Paul Corrigan)于1979年出版了《对出色的街道男孩进行教育》(*Schooling the Smash Street Kids*),迪克(Dick Hebdige)于1979年出版了《亚文化:风格的意义》(*Subculture: The Meaning of Style*)。

在维利斯的著作出版之后,还出现了批判女权主义研究,包括一本题为《女性抗争》(*Women Take Issue*)(*Women's Studies Group*,1978)的论文集。1985年,克里斯琴·格里芬(Christine Griffin)出版了《典型女孩?》(*Typical Girls?*),第一次扩展了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提出的女权主义研究。《典型女孩?》被认为是对维利斯的《学会劳动》的回应,它分析了在男权制世界里建构起来的青春期女性意识。格里芬和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性别研究小组的同事们认为,她们对男权制的认知是主体性生产过程之中的一种主要训导技术,这样,他们在跨文化研究的方向下

推进了批判研究。除了对阶级进行考察,性别和种族分析也开始受到重视(Quantz,1992)。后结构主义认为,权力不仅仅是社会的一个方面,而且是社会的基础。这样,男权不仅仅是妇女必须斗争的众多力量中的孤立的一个,它还影响了社会的所有方面,实际上决定了妇女的生活(参见 Douglas,1994;Finders,1997;Fine et. al.,1997;Frankenberg,1993;Franz & Stewart,1994;Shohat & Stam,1994)。

韦斯特(West,1993)更是将批判研究推进到了多文化领域,他仍将批判焦点集中在女性、第三世界和种族问题。他吸收了新马克思主义的后殖民主义批判主义和文化研究中取得的理论成果,更进一步洞察了日常生活中的权力运作。在这个背景下,塞马里和金奇洛(Semali & Kincheloe)在《什么是本土性知识? 来自学院的声音》(*What is indigenous knowledge? Voice from the Academy*, 1999)一书中,研究了本土知识作为一种动力,为以社会变革为目标的批判式的努力提供了资源。他们争辩道,批判研究者应当探讨这种类型的知识,以理解诸多西方学者未曾想象过的情绪、敏感性和认识论。在这个后殖民主义泛滥的背景下,塞马里和金奇洛借用本土性知识提出的观点,挑战学院派关于"正规科学"的观点,以及他们所接受的关于被鉴定的信息的观点。这些学者将关于批判研究的对话引向新的方向,他们明白,评价本土性知识、发展后殖民抗争形式、学术改革、对研究和解释进行概念重建,以及为了社会正义而进行的斗争,在概念上是不可分割的。

在《作为一种仪式性表演的学校教育》(*Schooling as a Ritual Performance*)一书中,麦克拉伦(McLaren,1999)将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文化研究计划、批判教育学和批判的民族志结合起来。他把他的理论分析的基础放在后结构主义主张之上,这种主张认为能指和所指之间的联系是任意的,但是这种联系的形成受历史、文化和经济力量的影响。界定学校生活的基本的文化叙事模式,学校试图使学生的街头文化和街头知识边缘化,学生对此进行反抗。麦克拉伦把学校作为一个文化场所,在这里象征资本被人们以仪式性的戏剧形式进行斗争。《作为一种仪式性表演的学校教育》持如此观点,研究者如果不通过种族、阶级、性别和其他结构性地位来进行社会分析,就无法对他们自身和他人进行内省式的把握。结构完整、血肉饱满的知识形式,以及学生们街头文化的节奏和姿势,与教室里所传授的抽象的、正式的知识截然不同。老师们认为,一旦知识是在学校教育文化之外非正式地建构起来的,就将威胁到普遍主义和武断的欧洲中心论关于高等文化的理念,后一理念正是在学校课程教学基础上形成的。

批判研究者致力于对批判理论进行概念重建,认识到这一工作与文化研究、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是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此时,他们面临着依照多样性和差异性对民主的理念进行批判式界定的后式话语(post-discourse)。传统的社群观念常常以启蒙价值观的名义,将统一性置于多样性之上。由于种族压迫、阶级和性别差异,以及下层声音和被边缘化的群体被排除在外,而这些社群的成员

是不愿意加入这些群体的，一般的后结构主义者，特别是后结构主义女权主义者将这种提倡共产主义社会者的梦想视为政治上的无能。这一时刻，开始出现了对批判理论的核心进行理论关注的女权主义运动。实际上，在女权主义批判之后，批判理论再也无法回归到原有研究范式，而在原来的范式之中，社会阶级的观点具有不可动摇的特权地位，并在种族、阶级和性别三位一体的概念体系中被提升到了的核心地位。由后结构主义和女权主义所进行的批判理论概念重建，提升了差异化政治的地位，拒绝对他者进行病态化或者毒化。在这个背景下，共产主义更容易复活和复兴（Wexler，1996b，1997）；在被神圣化了的欧洲中心论的奴役下的外围群体，能够渐渐获得尊重，被"分类了的"研究对象潜在地获得了主体的特性。韦勒（Kathleen Weiler）的《女性教育与变迁：性别、阶级和权力》（*Women Teaching for Change*: *Gender*, *Class and Power*, 1988）是女权主义理论主导下的批判研究的范例。韦勒不仅表明，女权主义理论可以扩展到批判研究领域，而且还展现了解放的观念是如何在女权主义认识论下得以进行概念重建的（Aronowitz & Giroux，1991；Behar & Gordon，1995；Bersani，1995；Brents & Monson，1998；Britzman，1995；Christian-Smith & Keelor，1999；Clatterbaugh，1997；Clough，1994；Cooper，1994；Hammer，1999；Hedley，1994；Johnson，1996；Kelly，1996；King & Mitchell，1995；Logones，1987；Maher & Tetreault，1994；Morrow，1991；Rand，1995；Scott，1992；Sedgwick，1995；Steinberg，1997；Young，1990）。

聚焦于批判民族志

批判研究者竭力从幕后走出，超越已有经验，揭示意识形态对自我导向欲望的压迫途径，直面在人类意识的建构过程中的权力自身的再生产方式，这个时候他们使用了太多的研究方法。此时，拉舍（Lather，1991，1993）以其催化效度（catalytic validity）的观点开阔了我们的视野。催化效度是指促使研究对象对世界，以及研究得以成形的途径进行理解的程度，其目的在于促使他们对研究进行改变。处于经验主义框架之内的非批判研究者或许会认为，催化效度是一种奇怪的观点。具有催化效度观点的研究，不仅展示了研究过程对现实加以改变的冲击力，还对这种冲击加以引导，以便使研究对象能够获得自我理解和自我导向。

《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ism*）（参见 McLaren，1999；Semali & Kincheloe，1999）一书所阐明的理论，涉及了关于知识主体和客体的分析的重要争论。这一著作开创了全新而且重要的分析模式，尤其是在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相关的问题上。批判研究者最近试图超越与西方人类学相伴随的客体化和帝国主义视角（从知识主体的殖民化的观点出发，对所谓的被调查者进行想象）努力，他们尽管用心良苦而且值得赞赏，但也并非是完美无缺的（Bourdieu & Wacquaat，1992）。正如富克斯（Fuchs，1993）早就观察到的，近来试图发展出一

种更具有反身性的民族志写作方法的努力,受到了严重的限制。在这方面所遇到的挑战,可以归纳为如下问题:知识的主体如何逐渐认识他者?研究者如何尊重他者的观点并且邀请他者发表意见(Abdullah & Stringer, 1999; Ashcrofu, Griffiths, & Tiffin, 1995; Brock-Utne, 1996; Goldie, 1995; Macedo, 1994; Myrsiades & Myrsiades, 1998; Pieterse & Parekh, 1995; Prakash & Esteva, 1998; Rains, 1998; Scheurich & Young, 1997; Semali & Kincheloe, 1999; Viergever, 1999)?

近期以来,民族志著作的自我反省方式是,试图将所谓的调查对象作为"参与者(participant)"来进行对待,以避免将他者对象化(通常指的是西方人类学家和非西方文化之间的关系),尽管如此,仍然存在一种风险,即对殖民性的统治结构和后殖民主义统治结构的揭露,可能,而且实际上也在无意之间使这种结构得到维系并得到巩固,从而通过一种隐蔽的种族中心主义而重复着自由主义的价值。富克斯(Fuchs, 1993)警告,用其他社会受强制方式的同样的方式来强迫研究者,这种企图可能会导致"个人自身世界的'他者化'"(p. 108)。这种努力常常没有质疑既存的民族志方法论,因此当研究者的世界被进一步客体化的时候,会无意地扩展了其有效性和适用性。

福柯用以处理这种两难困境的方法是,通过批判传统的自省式哲学,将社会理论从其自身文化的认识论中间"分离"出来。然而,福柯陷入了以本体论观点看待他自己的方法论主张的陷阱,他取消了预设的与"内省"观相联系的理解观(Fuchs, 1993)。杜蒙特(Louis Dumont)的进展稍好一些,他认为文化产物需要同时从内部和外部进行考察。然而,杜蒙特试图通过识别超个人的意识结构和超自我的社会结构,来推动一种"不同社群之间的相互解释"(Fuchs, 1993, p. 113),此时,他热切希望建立一种对社会进行比较分析的统一框架。鉴于福柯和杜蒙特拒绝将他们自身纳入对象化的过程之中,试图"超越他们自身世界的绝对基础"(Fuchs, 1993, p. 118),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将其自身作为一位社会行动者,整合到用以进行分析的社会领域。布迪厄是通过"将自己预先假定的民族志内容方法论化"(Fuchs, 1993, p. 121)来实现这种整合的。但是,这种观察者(人类学家)的自我对象化并非没有问题。富克斯(Fuchs, 1993)指出,在布迪厄之后,首要的问题在于"忘掉了与世界的理论关联和实践关联之间的区别,也就是把自己与客体对象之间维持的理论关联强加给客体对象"①。(p. 120)。在某种程度上,布迪厄的研究方法没有完全摆脱成为一种"客观主义的确认"的窠臼,但是,至少这是研究者对他自身自我理解的前提条件进行反思的一种热切尝试——一种从事"民族志者的民族志"写作的尝试(p. 122)。

后现代的民族志经常会——在不同程度上——和后殖民主义研究者的关注领域交叉,但是它在什么程度上提及剥削问题和资本主义剥削的社会关系,依然

---

① 布迪厄反思社会学的一个核心观念就是所谓的"对象化的对象化",将社会科学构建研究对象的过程本身作为对象来研究。为了贯彻这种"对象化的对象化",布迪厄建议进行两次巴什拉式的决裂,第一次是和日常的常识观念决裂;而第二次是要和学术界的各种理论理性的观念决裂,清楚认识到理论生产条件本身所包含的各种局限。——译者注

是值得质疑的。后现代民族志——我们在此想到了一些著作,如保罗·莱比诺(Paul Rabinow)的《摩洛哥实地研究的反思》(*Reflections on Fieldwork in Morocco*, 1977),詹姆斯·布恩(James Boon)的《不同的部落,不同的作者》(*Other Tribes, Other Scribes*,1982)和迈克尔·陶西格(Michael Taussig)的《萨满教、殖民主义和野蛮人》(*Shamanism, Colonialism, and the wild Man*,1987)等著作——都分享了曼加纳罗(Manganaro,1990)所强调的信念"人类学没有非政治性的,没有人类学能抽离意识形态进而能够脱离社会结构的影响,更关键的是,能脱离意识形态而对社会结构产生影响。如果人类学的文本是政治性的,这个问题就不成其为问题,而真正的问题应该是,在特定的人类学文本之中附加了什么样的社会政治属性"(p.35)。

牛顿和斯泰西(Newton & Stacey,1992—1993)指出,民族志当前的后现代文本实验将"文化的后殖民困境作为人类学对其自身进行彻底改造的机会"(p.56)。现代主义民族志,根据这些作者的观点,"构造了权威性的文化叙述,在不经意之中,不仅建立了西方民族志者对本土性学者的权威,而且延续了西方对殖民地文化的权威"(p.56)。他们争辩(跟随克里福德)道,民族志能够也应该争取避开殖民主义民族志周期性的讽喻模式———种田园诗般的、乡愁性、拯救性的文本,这种文本认为,由于西方侵略者的历史纪录,原始文化濒临消亡。这种"拯救性的文本"的叙述结构,将土著文化描绘成连续性的、真实的,忧伤地"逃离过去"的文化,而由于它的复杂性和非权威性,西方的继承者们代表了它的未来(p.56)。

后现代民族志著作面临着一种挑战,这种挑战来源于对地方性经验复兴的简单超越,对文化差异的非批判性地推崇(包括处于民族志学者自身文化内部的表面性差异),以及对诠释主义人类学所赞成的普遍性价值和全球特性的框架的借用(Silverman,1990)。我们所描述的反叛的后现代主义,能够帮助定性研究者挑战主流的西方研究实践,而这种实践是以一种基本的认识论和一种普遍有效性的知识宣称为外衣的,其代价是地方性的、被征服者的知识(Peters,1993)。这并非是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间的选择,而是一个是否挑战一种预设的选择,而这种预设提供了人们成为一个研究者所需要的标准化的判断。克莱潘扎诺(Crapanzano,1990)警告,"人类学家既不能预设神秘的七弦琴,也不能想象荆棘之冠,虽然我坦陈,我听到了救世主保护他的子民的愿望之中的回声"(p.301)。

康纳(Connor,1992)认为克里福德的著作并不是简单的"文化作品",而是对"符合民族志著述的激进性对话形式的艺术和文化范畴的内在性颠覆,这种颠覆发生在文化之间,同时也是跨文化的",而克里福德的著作和巴泰勒(Georges Bataille)、莱里斯(Michel Larris),以及社会学学派具有密切的关系"(p.251)。克里福德(Clifford,1992)认为他自己的著作是一种尝试,试图要"增加'书写文化'之中的参与者的数量和语汇……它并不是要求在多个作者之中实行一种简单多数式的民主,而是要求至少要放松执笔者/人类学家所独自掌握的控制权,开放

民族志各个层级之间的讨论,以及在权力主导和非平等的条件下的话语沟通"(p.100)。克里福德引用马库斯和费希尔(Marcus & Fisher,1986)的著作,警告了现代主义民族志"表达精练化"和"转喻冻结"的做法,即用群体生活的某一方面作为该团体整体的代表;作为替代,克里福德力促以多场域性的民族志形式来反映"超民族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力量,这些力量在地方性或者区域性的世界中穿梭,同时也构成了地方性和区域性的世界"(p.102)。不应当给文化提供固定而具体化的描绘性文本,它应该被更好地理解成转移、互换、分裂、定位和区隔。

虽然批判民族志以一种不为传统民族学接受的方式承认了解放和历史的关系,虽然其诠释目标是发现人类活动的社会文化条件和现行的社会政治结构的问题,但是,我们并不认为这足以重构社会系统。当然,在我们看来,这是一个必要的开端。我们赞成克拉夫(Clough,1992)的观点,他认为"现实主义叙事允许经验社会科学成为社会批判的平台和基础"(p.135)。不仅仅要对民族志的田野方法,而且要对其阅读和写作实践进行批判分析。资料收集必须让位于"对每一形式的表达进行再解读"(p.137)。正如经验科学的作者的叙述结构,民族志需要面对无意识的过程,正是这一过程之中证明了其规范性表达的正当性,也是在这一过程之中导致了对于恋母情结或者著述欲望的拒斥,以及二元对立式的差异性的减少。正是在这个二元减少的过程中,男性的民族志学者最经常获得了一种特权,被认为是"经验实证主义的实际代表"(p.9)。

批判民族志关于效度的新问题

批判研究传统已经达到了这样一个阶段,他们开始认识到真理宣称总是不经意地处于或者暗含在权力关系之中。然而,不同于一些后现代主义研究的"戏谑"流派所提出的主张,我们并不认为因为我们不能绝对地认识真理,真理就简单的等同于权力的运作。我们这么说,是因为真理牵涉到调整性法则,这一法则要求一些陈述比其他陈述更有意义。否则,真理就会变得无意义,如果这成立,那么解放实践就失去了目标,只是为了解放而解放。正如卡斯拜肯(Carspecken,1993,1999)的评论,每次我们行动的时候,在我们行为的每个细节,我们预先假定存在某些标准化或者普遍性联系导向真理。真理通过标准化宣称、主体间性宣称和主体性宣称,以及通过直指(deictically)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基础性和固定性意义,以一种实用主义的方式与意义进行内在关联。

卡斯拜肯解释说,研究者们能够清楚阐述他人的规范化和评价性的宣称,如果他们生活在产生这种宣称的文化和话语环境之中,开始和这些主张的持有者用同一种方式看待这些宣称。普遍性宣称必须体现在每个特定的规范性宣称之中,问题必然是这些规范是否代表整个群体。在观察之中,当发现有限的普遍性宣称即和实践相矛盾的时候,权力关系即清晰可见。此处最为关键的是,根据卡

斯拜肯的观点，在其他人的规范性主张或者所认同的主张之中，研究者能够确认，哪些是他们在意识形态上能够接受的，同时，他们能够忠于他们自身的主体性宣称，不让规范性的评价主张干预他们的观察。批判研究继续质疑规范性的和普遍性的宣称，这些宣称不能在表达性政治之外得到分析，脱离了这些宣称得以产生的物质性条件，或者外在于主体结构的阅读和书写行为之外。

在他的著作《教育研究中的批判民族志》(*Critical Ethnography in Educational Research*,1996)之中，卡斯拜肯提到了批判认识论的观点，即一种对于权力和思想、权力和真理宣称之间关系的理解。在对什么是批判认识论中的“批判”进行简短说明以后，他通过梳理欧洲大陆的现象学、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社会理论，主要是胡塞尔和德里达的著作，阐释了社会建构主义的温和形式，并论述了主流认识论之中成熟的批判主义。卡斯拜肯将这种温和的建构主义思想化约为，我们已经做出的价值考量深刻地影响了我们的所见所闻，而批判主义研究只不过是将其自身置于“正确的”政治价值观之中。例如，某些建构主义者提出，批判研究需要做的一切，即是在社会正义的方向之下“偏执”于他们所做的工作。卡斯拜肯认为，这种形式的建构主义思想是不可行的，因为毫无疑问，它是以视觉为中心的；也就是说，它依赖于视觉感知去建构其理论基础。与主流民族志叙述对可感知的比喻的依赖不同，批判民族志，恰恰相反，强调沟通的经验和结构，以及文化的典型形式。

卡斯拜肯提出，批判民族志要在本体论范畴之中做出区分(也就是说，主体性、客体性、规范性—评价性)，而不是采纳由众多建构主义者所赞同的“多元真实性”的立场。他认可一种原则性很强的立场，即研究的价值取向不能决定研究的发现，要尽可能这样。此外，批判民族志学者应当使用批判认识论；也就是说，他们应该支持将这种认识论原则应用于所有研究者。在形成这种主张的过程之中，卡斯拜肯使许多批评者矫正了对于批判民族志的认识，这些批评者以往认为批判民族志忽略了有效性问题。

为了建构一种全社会性的批判认识论，批判民族志学者需要理解人类经验的整体模式以及它们与沟通结构之间的关系。卡斯拜肯解释道，这一过程的初步工作包括考察研究者的偏见，以及发现研究者的价值取向。随后的工作包括通过收集个案资料整理原始记录，进行初步的重构性分析，生成对话性资料，发现社会系统之间的关系，并使用这种系统之间的关系去解释发现结果。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工作构成了卡斯拜肯系统分析方法的基础。随着对卡斯拜肯所提出来的复杂步骤的每一步的讨论，即是对要研究路径进行明确阐释，以重构横向和纵向的有效性，并达至注重实效的分析视域。为了使理论与实践联系起来，卡斯拜肯使用了他对一个休斯敦内城区基础教育项目的分析资料，该项目主要用于帮助学生学习冲突管理的技能。

另外一个给人深刻印象的特点是卡斯拜肯的对沟通行为的说明和分析，尤其是他认为意义是具体的，而理解具有主体间性，既不是客观的，也不是主观的。卡斯拜肯研究的出发点主体间性，综合了黑格尔、米德、哈贝马斯和泰勒的思想。

他建议批判民族志要仔细地记录肢体语言,因为行为的意义并没有存在于语言当中,更主要存在于动作和行动者的身体状态之中。依据卡斯拜肯的观点,主观性是从主体间性之中衍生出来的(客观性也是如此),而主体间性涉及"感觉性身体"的对话构造。最后,卡斯拜肯强调宏观水平的社会理论、环境条件、需求和欲望满足方式的社会性构造、文化惯例对于学生的影响、经济剥削,以及行动的政治和文化环境的重要性。

卡斯拜肯关于导向有效性宣称的路径的许多灵感来自于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卡斯拜肯认为哈贝马斯抓住了语言和主体间性的前语言学基础,将语言置于主体间性概念之后。然而卡斯拜肯通过引入一个与泰勒(Charles Taylor)的研究大体一致的表达/实践模式,超脱了严格的哈贝马斯式的行动理论。虽然哈贝马斯和泰勒经常指责对方的立场,可是卡斯拜肯却以一种令人信服的方式将两者结合起来。泰勒对理解的整体性模式和行为准则的强调为卡斯拜肯所接受,这对于将沟通理性的理论,与关于具体化意义的研究,以及有意义行动的隐喻性基础联系起来,提供了可能。这同时提供了一种途径,可以将吉登斯关于部分/整体之间关系、虚拟结构、行为准则和沟通理性的观点综合起来。这也从另一方面表明,卡斯拜肯的研究既不同于哈贝马斯,但同时又和哈贝马斯的理论,以及关于意义和有效性之间的内在联系的观点保持了连续性。

批判民族志的最新创见

1990年代末期,除了卡斯拜肯对以批判为基础的民族志的睿智洞察之外,解构方法和反省性方法也得到了蓬勃发展[这一讨论是以特鲁巴(Trueba)和麦克拉伦(McLaren)即将出版的著作为基础]。在韦斯威斯瓦兰(Kamala Visweswaran)的重要著作《女权主义民族志的神话》(*Fictions of Feminist Ethnography*,1994)一书中,她坚持道,反身性民族志,如同规范性民族志一样,止步于"宣讲模式",向阅读者传授知识,而这些阅读者在共享性的话语之中具有确定的身份。与此相反,解构民族志通过持续不断地延缓或拒绝说明或者理解,实践一种"质问模式"。在解构民族志之中,阅读者作为阐述性主体①,并不具有一致的身份。尽管反身性民族志主张,民族志学者和被调查对象是不可分离的,民族志者仍然被视作是知识的统一主体,他们可以通过诠释性努力,在观察者和被观察者之间建立一致性(这与现代主义诠释学传统一样)。相反,解构性民族志常常会认可一种碎片化的、非稳定的、多方位的主体性(如后现代主义者解释传统),破坏了这种一致性。反身性民族志质疑其自身的权威;而解构性民族志取消了自身的权威。这两种批判民族志的方法,都可以被用于揭露研究拉丁美洲裔群体的民族志学者所拥戴的持续的欧洲中心主义权威。这两种方法的目标在

① 在话语分析之中,陈述中的主体(the subject of the statement)并不直接等同于阐述性主体(the subject of the enunciation),如拉康所说,"作阐述的我和陈述中的我,并非同一个我"。——译者注

实质上都是批判主义：也就是说，将分析对象从牢固的、坚不可摧的、形形色色的专制统治下解放出来，同时对主体性自身进行反思，将其视为一个与文本和情境相联系的永不封闭的，常常是局部性的、叙述性的承诺。这一方法能够帮助民族志学者警惕那些盎格鲁调查者对于墨西哥移民的诽谤式描述。正如贝哈(Behar,1993)指出，在经典的社会学和民族志对于墨西哥人和墨西哥裔美国人家庭的描述之中，

> 充斥着类似于对黑人家庭的刻板形象进行描述的陈词滥调，一个独裁的、性欲旺盛的、大男子主义的丈夫，和一个温顺而谦卑的妻子带着一群孩子，这些孩子喜爱他们善良而穷困的母亲。这些陈词滥调在过去的几年之中遭到了强烈的批评，特别是受到那些 Chicana① 评论家的批评，这些人已经超越了形形色色的对非裔美国人和拉裔家庭生活进行评论的"贫困理论"。

批判民族志者对文化概念进行的推进，常常把文化看成一个复杂的生产圈，包含了无数交互性连接和相互之间的信息传输活动，如常规、仪式、行动条件、可理解性和意义创造系统、解释惯例、关系系统，以及社会行动者的内部和外部环境(Carspecken,1996)。在斯蒂沃特(Kathleen Stewart)近期的民族志研究著作《路边空间》(*A Space on the Side of Road*,1996)之中，她中肯地分析了文化的矛盾性特征，以及其流动性和难以捉摸的多层次性，她评论道：

> 文化，当从其生产形式和传播途径来进行考察之时，不能简化为社会价值观和信念的固化，或者生活经验在世界中的直接沉淀，而是积聚成为一个路边的空间，在这里具有社会性的事件能够呈现其自身。我们要"一睹尊容"……只能通过对日常生活化的事情的理想形态进行多层次的叙述。我们只有徜徉于不同文本类型之间才能对其进行描绘——这些文本类型包括浪漫主义的、现实主义的、历史性的、空想性的、社会学式的、超现实的。在这里没有最终的文本解决方案，试图通过将我们自己"置身"于文本之中，或者试图通过描绘"田野工作经验"，或者试图将研究对象的声音汇集起来，似乎他们能为其自身辩护，这些努力都无法解决诠释者/被诠释者之间，以及主体/客体之间的对话问题(p.210)。

依照胡安(E. San Juan,1996)的观点，对文化——既包括语言文化又包括物质文化——的重新理解成为了任何解放政治的关键。胡安写道，作为社会过程和实践的文化观念，从根本上说根源于物质性的社会关系之中——包括维持体系(经济学)、决策体系(政治学)、学习和沟通体系(文化)以及生产和哺育体系(社会再生产领域)——如果你赞同，这必然是任何进步性的和解放性方法的基础性原则，或者范式(p.177;Gresson,1995)。

在最近的民族志作品《焦灼的催眠曲：关于暴力的人类学的篇章》(*Charred*

---

① Chicano，同 Chicana，是指墨西哥裔美国人或在美国的讲西班牙语的拉丁美洲人后裔。——译者注

Lullabies: Chapters in an Anthropology of Violence, 1996)一著中,丹尼尔(E. Valentine Daniel)拒绝将人类学家概括成为"适应论者"[如哈里斯(Marvin Harris)]或"象征论者"[如认知论者,列维-斯特劳斯(Levi-Strauss)式的结构主义者,施内德尔(Schneider)式的象征主义者,格尔茨(Geertz)式的解释主义者),他认为文化"不再外在地等待被发现、被描述和被说明,而是这么一种事物,民族志学家要以解释者的身份才能进入其中"(p. 198)。换言之,文化是人类学家和被调查者以对话的方式进行的共同创造。然而,即使是以这种方式对文化进行的概念重建也是有其问题的。正如丹尼尔本人指出,即使某人自认为是"文化共同创造的过程论者",而不是"文化发现的本质论者",他仍然得承认,他是在以理性为中心的传统之中开展工作的,这一传统或多或少将特权授予语言,而非行动。

批判民族志已经得益于这种对于文化的新的理解,以及这种为了文化批判而进行的新的学术融合的可能性,这种融合始于强调经验性、主体性、反身性和对话性理解的各个学术流派之间的渗透和混合。这些观点所带来的好处是,社会生活不再被认为是供研究者进行研究的先验本体。随之而来的另外一个好处是,要以一种完全的客观化的方式对社会生活进行研究的意识形态也不复存在。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对社会生活的任何描述或分析,都强调其意识形态定位。权力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卷入文化之中,进而主导统治和剥削实践的,而在日常社会生活之中这种统治和剥削却被认为是自然而然的,批判民族志学者,如约翰和科马洛夫(John & Comaroff, 1992)等,为我们理解这些问题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按照科马洛夫的观点,霸权指的是"符号和实践、关系和区别、图像和认识论的顺序——从得到历史性定位的文化领域来看——如同自然和已经被接受的世界的面貌,以及居住于其中万物一样,被认为是理所当然了"(p. 23)。这些自明的,同时也不应被点破的观点和实践据称为人们所共享,一旦其内在矛盾被揭示、揭露出来,并且被认为具有随意性和可变更性,那么就明确变成了"意识形态的观点"。这样,意识形态指的是得到明确阐述的世界观、统治性的叙事、话语控制,或者是集体性符号生产的组织化安排。主流的意识形态即是表达了社会统治阶级的意志。

沿着这个论证思路,霸权"是不容质疑的,因而是不需要直接的论证",而意识形态"更易于被认为是对立性的意见和利益,因而可以进行讨论"(Comaroff & Comaroff, 1992, p. 24)。意识形态变成了特定群体的意志表达,而霸权则是一种常规或者构造,在整个政治共同体中得到共享和移植。霸权的运作则是通过沉默和不断重复从而植入主流的世界观。在附属性的、边缘化的群体之中可能也存在对立性的意识形态——无论这些群体是组织严密的还是松散存在的——不接受霸权的约束。因此,霸权从来就不是完全的和彻底的,它总有一些疏漏之处。

结论:全球化和私有化世界之中的批判研究

批判性的后现代研究要求研究者们重新构造他们对于世界的观念,并不是

以随意的方式,而是要求破坏那些看起来是自然而然的东西,要求质疑那些显而易见的东西(Slaughter,1989)。反对性和反叛性的研究者,作为助产士,不能将他们的研究努力与先锋派学术所追求的情境切合性混淆起来,对后者来说,他们具有为被压迫阶级代言的名分,在实际上却并不需要回到他们所研究的劳工阶级共同体之中。更确切地说,他们要将工作置身于转型实践之中,这一实践有助于减少痛苦,缓和压迫。反叛性的研究者拒斥了都市批评家流露在著述之中的傲慢态度和显现在研究之中的武断措辞,他们关心这么一些问题,现状是如何演变而来的,特定的制度安排是为谁的利益服务,我们用以进行分析的框架来自于何处?事实已经不再仅仅是简单的"是什么",所坚信的真理不再仅仅通过它们所对应的事实来进行检验。从事批判的后现代研究,即是在一个促使世界的穷困、苦难和政治欺诈日渐减少的梦想所勾画的粗略的方案的指引下,参与一个批判性的建设世界的过程。简言之,它是愤世嫉俗式的理性年代里的一个实用主义蓝图。批判性后现代研究的障碍是,要对全球资本主义的剥削及其对全球工人阶级的分化进行抵御,或者进行抨击,而这将使麦克拉伦更为赞同并仰仗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传统。

美国受教育的左派不能提供一种抵御性的力量,以抵制资本的肆意运转,而取而代之的是我们的信念,要创造一个超国界的全球社会,民族国家不再是社会组织的基本形式。我们已经看到,所有国家正在逐渐形成一个统一的国际市场和劳动分工,资本的民族性却在减弱(Robinson,1998)。劳动力和资本的跨国性已经催生了文化实践的物质手段,并激化了资本和劳动之间的矛盾。随着全球资本主义的萌芽而来的不稳定性的加剧,来源于过度积累、过度投资、过度生产能力、过高的产量,以及全球金融威胁的新发展。其底线是,生产出来的产品以市场价格进行销售之时必须获得利润的回报。尽管全球的劳工阶级努力地抵御资本所推动的针对他们劳动的剥削,资本主义仍然能够动态而且持续地自动重新组织和重新启动其自身,以致它所积累的驱动力是无法停止的。市场管制的努力不能有效克服资本在全球的恐怖统治。现在需要做的是颠覆资本主义的基本法则,推翻资本自身的统治。资本主义的集中化、中心化和跨国化已经威胁到了资本运动的法则。我们不仅仅要从市场竞争的视野,还要从生产的视角出发对全球化资本主义进行考察。私有化和自由贸易的逻辑——社会劳动是价值的手段和尺度,剩余社会劳动是利润的来源——现在可恨地成为了公民权利的原型,影响着我们对于什么是"美好社会"的理解,创造了一种意识形态的形式,这种意识形态孕育了资本和劳动力结合起来的必要因素,它阐明,新的民族志研究方法不应该把全球资本主义看成是分析的终点,而是分析的起点。由于学校越来越多地受到为跨国资本主义服务的公司的资助,而且由于新自由主义继续引导教育政策和实践,美国人民面对着教育现实的挑战(Kincheloe,1999)。文化教育逐渐和晚期资本主义的生产进程的结合成为了现实(Giroux & Searles,1996;McLaren,1997)。虽然,作为研究,我们可能对全球资本主义不感兴趣,但是我们应该确信,它对我们是感兴趣的。

在未来数年之中,批判民族志将面临着令人望而却步的挑战,尤其是因为资本主义已经自然而然成为一个常识性的现实——即使作为自然本身的一部分——社会阶级这个术语也被敌意更少的词汇社会经济地位所代替。近期后现代民族志关注的焦点是不对称的性别和种族关系,尽管这个关注点是非常重要,阶级斗争却被作为了一个过时的问题(Kincheloe & Steinberg,1999)。当对社会阶级进行讨论之时,它通常被看成是相互关联的,而不是相互敌对的。在对"社会地位"而不是对"阶级斗争"进行讨论的语境下,后现代民族志已经确立了它的特权地位,它在功能上服务于企业家的资本主义、私有产权和社会生产的个人占有的社会再生产逻辑(McLaren,1995b)。与以往相比,批判研究需要强调对客观性的、物质性的工作条件和劳动关系进行关注,以防止新自由主义的法团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霸权进一步巩固。

与全球化进程随之而来的是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以多种方式进行强化,这使我们回归到批判研究的本原。正如我们已经对男权制、白人至上主义,以及在人道主义旗帜之下研究者意识之中所具有的阶级精英论进行了深入的考察,我们也希望将批判性的观点引入对资本主义统治的考察——主要是因为这种观点曾经深入地主张推翻对于人类劳动的剥削,以及全球统治精英的联合。在这种背景下,我们评述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志实践的重要的新进展,这些实践则完善并拓展了我们在后现代和后殖民主义民族志范围内所看到的许多令人兴奋的新方法。如果未来新的批判研究实践要有益于创造一个更加公正、民主和平等的世界,他们应该考虑到所有这些重要的动向。批判的范围已经开始调动它所预设的潜能。我们希望这篇文章能够激发读者们确认研究的必要性并投身于艰苦的工作,使得批判实践更加接近其真实。

参考文献

Abdullah, J., & Stringer, E. (1999). Indigenous knowledge, indigenous learning, indigenous research. In L. Semali & J. L. Kincheloe (Eds.), *What is indigenous knowledge? Voices from the academy*. Bristol, PA: Falmer.

Abercrombie, N. (1994). Authority and consumer society. In R. Keat, N. Whiteley, & N. Abercrombie (Eds.), *The authority of the consumer*. New York: Routledge.

Agger, B. (1992). *The discourse of domination: From the Frankfurt school to postmodernism*. Evanston, I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Agger, B. (1998). *Critical social theories: An introduction*. Boulder, CO: Westview.

Alfino, M., Caputo, J., & Wynyard, R. (Eds.). (1998). *McDonaldization revisited: Critical essays on consumer and culture*. Westport, CT: Praeger.

Alford, C. (1993). Introduction to the special issue on political psychology and political theory. *Political Psychology*, 14, 199-208.

Allison, C. (1998). Okie narratives: Agency and whiteness. In J. L. Kincheloe, S. R. Steinberg, N. M. Rodriguez, & R. E. Chennault (Eds.), *White reign: Deploying whiteness in America*. New York: St. Martin's.

Anderson, G. (1989). Critical ethnography in education: Origins, current status, and new directions. *Review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59,

249-270.

Apple, M. (1996a). Dominance and dependency: Situating *The bell curve* within the conservative restoration. In J. L. Kincheloe, S. R. Steinberg, & A. D. Gresson Ⅲ (Eds.), *Measured lies: The bell curve examined.* New York: St. Martin's.

Apple, M. (1966b). *Cultural politics and education.*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Press.

Aronowitz, S., & DiFazio, W. (1994). *The jobless futur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Aronowitz, S., & Giroux, H. (1991). *Postmodern education: Politics, culture, and social criticis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Ashcroft, B., Griffiths, G., & Tiffin, H. (Eds.). (1995). *The post-colonial studies reader.* New York: Routledge.

Atwell-Vasey, W. (1998). Psychoanalytic feminism and the powerful teacher. In W. F. Pinar (Ed.), *Curriculum: Toward new identities.* New York: Garland.

Barrows, A. (1995). The ecopsychology of child development. In T. Roszak, M. Gomes, & A. Kanner (Eds.), *Ecopsychology*: Restoring the earth, healing the mind. San Francisco: Sierra Club Books.

Bartolomé, L. I. (1998). *The misteaching of academic discourses: The politics of language in the classroom.* Boulder, CO: Westview.

Bauman, Z. (1995). *Life in fragments: Essays in postmodern morality.* Cambridge, MA: Blackwell.

Behar, R. (1993). *Translated woman: Crossing the border with Esperanza's story.* Boston: Beacon.

Behar, R., & Gordon, D. A. (Eds.). (1995). *Women writing cultur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ll, D., & Valentine, G. (1997). *Consuming geographics: We are where we eat.* New York: Routledge.

Berger, A. A. (1995). *Cultural criticism: A primer of key concepts.* Thousand Oaks, CA: Sage.

Berry, K. (1998). Nurturing the imagination of resistance: Young adults as creators of knowledge. In J. L. Kincheloe & S. R. Steinberg (Eds.), *Unauthorized methods: Strategies for critical teaching.* New York: Routledge.

Bersani, L. (1995). Loving men. In M. Berger, B. Wallis, & S. Watson (Eds.), *Constructing masculinity.* New York: Routledge.

Bertman, S. (1998). *Hyperculture: The human cost of speed.* Westport, CT: Praeger.

Blades, D. (1997). *Procedures of power and curriculum change: Foucault and the quest for possibilities in science education.* New York: Peter Lang.

Block, A. (1995). *Occupied reading: Critical foundations for an ecological theory.* New York: Garland.

Boon, J. A. (1982). *Other tribes, other scribes: Symbolic anthropology in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cultures, histories, religions, and tex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ottomore, T. (1984). *The Frankfurt school.* London: Tavistock.

Bourdieu, P., & Wacquaat, L. (1992).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Brents, B., & Monson, M. (1998). Whitewashing the strip: The construction of whiteness in Las Vegas. In J. L. Kincheloe, S. R. Steinberg, N. M. Rodriguez, & R. E. Chennault (Eds.), *White reign: Deploying whiteness in America.* NewYork: St. Martin's.

Britzman, D. (1991). *Practice makes practice: A critical study of learning to teach.*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Britzman, D. (1995). What is this thing called love? *Taboo: The Journal of Culture and Education*, 1, 65-93.

Britzman, D., & Pitt, A. (1996). On refusing one's place: The ditchdigger's dream. In J. L. Kincheloe, S. R. Steinberg, & A. D. Gresson Ⅲ (Eds.), *Measured lies: The bell curve examined.* New York: St. Martin's.

Brock-Utne, B. (1996).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within Africa.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ducation, 42, 605-621.

Brosio, R. (1994). *The radical democratic critique of capitalist education*. New York: Peter Lang.

Buckingham, D. (1989). Television literacy: A critique. *Radical Philosophy*. 51, 12-25.

Butler, M. (1998). Negotiating place: The importance of children's realities. In S. R. Steinberg & J. L. Kincheloe (Eds.), *Students as researchers: Creating classrooms that matter* (pp. 94-112). London: Taylor & Francis.

Cannella, G. (1997). *Deconstructing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Social justice and revolution*. New York: Peter Lang.

Carlson, D. (1997). *Teachers in Crisis*. New York: Routledge.

Carlson, D., & Apple, M. (Eds.). (1998). *Power/knowledge/pedagogy: The meaning of democratic education in unsettling times*. Boulder, CO: Westview.

Carson, T. R., & Sumara, D. (Eds.). (1997). *Action research as a living practice*. New York: Peter Lang.

Carspecken, P. F. (1993). *Power, truth, and method: Outline for a critical methodology*. Unpublished manuscript.

Carspecken, P. F. (1996). *Critical ethnography in educational research: A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guide*. New York: Routledge.

Carspecken, P. F. (1999). *Four scenes for posing the question of meaning and other essays in critical philosophy and critical methodology*. New York: Peter Lang.

Carter, V. (1998). Computer-assisted racism: Toward an understanding of cyber-whiteness. In J. L. Kincheloe, S. R. Steinberg, N. M. Rodriguez, & R. E. Chennault (Eds.), *White reign: Deploying whiteness in America*. New York: St. Martin's.

Cary, R. (1996). I. Q. as commodity: The "new" economics of intelligence. In J. L. Kincheloe, S. R. Steinberg, & A. D. Gresson Ⅲ (Eds.), *Measured lies: The bell curve examined*. New York: St. Martin's.

Christian-Smith, L., & Keelor, K. S. (1999). *Everyday knowledge and women of the academy: Uncommon Truths*. Boulder, CO: Westview.

Clatterbaugh, K. (1997).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on masculinity: Men, women, and politics in modern society*. Boulder, CO: Westview.

Clifford, J. (1992). Traveling cultures. In L. Grossberg, C. Nelson, & P. A. Treichler (Eds.). *Cultural studies* (pp. 96-116). New York: Routledge.

Clough, P. T. (1994). *Feminist thought: Desire, power and academic discourse*. Cambridge, MA: Blackwell.

Clough, P. T. (1992) *The end (s) of ethnography: From realism to social criticism*. Newbury Park, CA: Sage.

Clough, P. T. (1998). *The end (s) of ethnography: From realism to social criticism* (2nd ed.). New York: Peter Lang.

Coben, D. (1998). *Radical heroes: Gramsci, Freire and the politics of adult education*. New York: Garland.

Codd, J. (1984). Introduction. In J. Codd (Ed.), *Philosophy, common sense, and action in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pp. 8-28). Geelong, Victoria, Australia: Deakin University Press.

Collins, J. (1995). *Architectures of excess: Cultural life in the information age*. New York: Routledge.

Comaroff, J., & Comaroff, J. (1992). *Ethnography and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Boulder, CO: Westview.

Connor, S. (1992). *Theory and cultural value*. Cambridge, MA: Blackwell.

Cooper, D. (1994). Productive, relational, and everywhere? Conceptualizing power and resistance within Foucauldian feminism. *Sociology*, 28, 435-454.

Corrigan, P. (1979). *Schooling the Smash Street kids*. London: Macmillan.

Crapanzano, V. (1990). Afterword. In M. Manganaro (Ed.). *Modernist anthropology: From fieldwork to text* (pp. 300-308).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Daniel, E. V. (1996). *Charred lullabies*:

Chapters in an anthropology of violenc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Deetz, S. A. (1993, May). *Corporations, the media, industry, and society: Ethical imperatives and responsibilitie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Washington, DC.

Denzin, N. K. (1992).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and cultural studies.* Newbury Park, CA: Sage.

Denzin, N. K. (1994). The art and politics of interpretation. In N. K. Denzin & Y. S. Lincoln (Eds.),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pp. 500-515). Thousand Oaks, CA: Sage.

Dewey, J. (1916). *Democracy and education.* New York: Free Press.

Douglas, S. (1994). *Where the girls are: Growing up female in the mass media.* New York: Times Books.

Drummond, L. (1996). *American dreamtime: A cultural analysis of popular movie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a science of humanity.* Lanham, MD: Littlefield Adams.

du Gay, P., Hall, S., Janes, L., MacKay, H., & Negus, K. (1997). *Doing cultural studies: The story of the Sony Walkman.* London: Sage.

Ebert, T. (1991). Political semiosis in/or American cultural stud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emiotics*, 8, 113-135.

Elliot, A. (1994). *Psychoanalytic theory: An introduction.* Cambridge, MA: Blackwell.

Ellis, J. (1998). Interpretive inquiry as student research. In S. R. Steinberg & J. L. Kincheloe (Eds.), *Students as researchers: Creating classrooms that matter* (pp. 49-63). London: Taylor & Francis.

Fehr, D. (1993). *Dogs playing cards: Powerbrokers of prejudice in education, art, and culture.* New York: Peter Lang.

Ferguson, M., & Golding, P. (Eds.). (1997). *Cultural studies in question*, London: Sage.

Finders, M. (1997).. *Just girls: Hidden literacies and life in junior high.*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Press.

Fine, M., Powell, L. C., Weis, L., & Wong, L. M. (Eds.). (1997). *Offwhite: Readings on race, power and society.* New York: Routledge.

Fiske, J. (1993). *Power works, power plays.* New York: Verso.

Flossner, G., & Otto, H. (Eds.). (1998). *Towards more democracy in social services: Models of culture and welfare.* New York: de Gruyter.

Foster, H. (Ed.). (1983). *The anti-aesthetic: Essays on postmodern culture.* Port Townsend, WA: Bay.

Frankenberg, R. (1993). *White women, race matters: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whitenes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Franz, C., & Stewart, A. (Eds.). (1994). *Women creating lives.* Boulder, CO: Westview.

Fraser, N. (1995). Politics, culture, and the public sphere: Toward a postmodern conception. In L. J. Nicholson & S. Seidman (Eds.), *Social postmodernism: Beyond identity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reire, A. M. A. (2000). Foreword by Ana Maria Araujo Freire. In P. McLaren, *Che Guevara, Paulo Freire, and the Pedagogy of Revolution.* Boulder, CO: Rowman and Littlefield.

Freire, P. (1985). *The politics of education: Culture, power, and liberation.* South Hadley, MA: Bergin & Garvey.

Fuchs, M. (1993). The reversal of the ethnological perspective: Attempts at objectifying one's own cultural horizon. Dumont, Foucault, Bourdieu? *Thesis Eleven*, 34, 104-125.

Gabbard, D. (1995). NAFTA, GATT, and Goals 2000: Reading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post-industrial America. *Taboo: The Journal of Culture and Education*, 2, 184-199.

Gadamer, H.-G. (1989). *Truth and method* (2nd rev. ed.; J. Weinsheimer & D. G. Marshall, Eds. & Trans.). New York: Crossroad.

Gall, J., Gall, M., & Borg, W. (1999). *Applying educational research: A practical guide.* New York: Longman.

Gallagher, S. (1992). *Hermeneutics and education*.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Garnham, N. (1997). Political economy and the practice of cultural studies. In M. Ferguson & P. Golding (Eds.), *Cultural studies in question*. London: Sage.

Gee, J. (1996). *Social linguistics and literacies: Ideology in discourses* (2nd ed.). London: Taylor & Francis.

Gee, J., Hull, G., & Lankshear, C. (1996). *The new work order: Behind the language of the new capitalism*. Boulder, CO: Westview.

Gergen, K. J. (1991). *The saturated self: Dilemmas of identity in contemporary life*. New York: Basic Books.

Gibson, R. (1986). *Critical theory and education*. London: Hodder & Stroughton.

Giroux, H. (1983). *Theory and resistance in education: A pedagogy for the opposition*. South Hadley, MA: Bergin & Garvey.

Giroux, H. (1988). Critical theory and the politics of culture and voice: Rethinking the discourse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In R. Sherman & R. Webb (Eds.),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education: Focus and methods* (pp. 190-210). New York: Falmer.

Giroux, H. (1992). *Border crossings: Cultural workers and the politics of educ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Giroux, H. (1997). *Pedagogy and the politics of hope: Theory, culture, and schooling*. Boulder, CO: Westview.

Giroux, H., & Searles, S. (1996). The bell curve debate and the crisis of public intellectuals. In J. L. Kincheloe, S. R. Steinberg, & A. D. Gresson Ⅲ (Eds.), *Measured lies: The bell curve examined*. New York: St. Martin's.

Godzich, W. (1992). Afterword: Reading against literacy. In J.-F. Lyotard, *The postmodern explained*.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Goldie, T. (1995).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indigene. In B. Ashcroft, G. Griffiths, & H. Tiffin (Eds.), *The post-colonial studies reader*. New York: Routledge.

Goldman, R., & Papson, S. (1994). The postmodernism that failed. In D. Dickens & A. Fontana (Eds.), *Postmodernism and social inquiry*.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Goodson, I. (1997). *The changing curriculum: Studies in social construction*. New York: Peter Lang.

Goodson, I., & Mangan, J. (1996). Exploring alternative perspectives in educational research. *Interchange*, 27(1), 41-59.

Gresson, A. (1995). *The recovery of race in America*.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Gresson, A. (2000). *America's atonement: Racial pain, recovery discourse and the psychology of healing*. New York: Peter Lang.

Griffin, C. (1985). *Typical girls? Young women from school to the job market*.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Grondin, J. (1994). *Introduction to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 (J. Weinsheimer, Tran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Gross, A., & Keith, W. (Eds.). (1997). *Rhetorical hermeneutics: Invention and interpretation in the age of science*.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Grossberg, L. (1995). What's in a name (one more time)? *Taboo: The Journal of Culture and Education*, 1, 1-37.

Grossberg, L. (1997). *Bringing it all back home: Essays on cultural studies*.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Hall, S. (Ed.). (1997). *Representation: 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and signifying practices*. London: Sage.

Hall, S., & du Gay, P. (Eds.). (1996). *Questions of cultural identity*. London: Sage.

Hebdige, D. (1979). *Subculture: The meaning of style*. London: Methuen.

Hedley, M. (1994). The presentation of gendered conflict in popular movies: Affective stereotypes, cultural sentiments, and men's motivation. *Sex Roles*, 31, 721-740.

Held, D. (1980). *Introduction to critical theory: Horkheimer to Haberma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Heshusius, L., & Ballard, K. (Eds.). (1996). *From positivism to interpretivism and beyond: Tales of transformation in educational and social research*.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Press.

Hicks, D. E. (1999). *Ninety-five languages and seven forms of intelligence*. New York: Peter Lang.

Hinchey, P. (1998). *Finding freedom in the classroom: A practical introduction to critical theory*. New York: Peter Lang.

Horkheimer, M. (1972). *Critical theory*. New York: Seabury.

Howell, S. (1998). The learning organization: Reproduction of whiteness. In J. L. Kincheloe, S. R. Steinberg, N. M. Rodriguez, & R. E. Chennault (Eds.), *White reign: Deploying whiteness in America*. New York: St. Martin's.

Jardine, D. (1998). *To dwell with a boundless heart: Essays in curriculum theory, hermeneutics, and the ecological imagination*. New York: Peter Lang.

Jay, M. (1973). *The dialectical imagination: A history of the Frankfurt school and the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 1923-1950. Boston: Little, Brown.

Jipson, J., & Paley, N. (1997). *Daredevil research: Recreating analytic practice*. New York: Peter Lang.

Johnson, C. (1996). Does capitalism really need patriarchy? Some old issues reconsidered. *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 19, 193-202.

Joyrich, L. (1996). *Reviewing reception: Television, gender, and postmodern cultur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Kellner, D. (1989). *Critical theory, Marxism, and modernit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Kellner, D. (Ed.). (1994). *Baudrillard: A critical reader*. Cambridge, MA: Blackwell.

Kellner, D. (1995). *Media culture: Cultural studies, identity and politics between the modern and the postmodern*. New York: Routledge.

Kellogg, D. (1998). Exploring critical distance in science education: Students researching the implications of technological embeddedness. In S. R. Steinberg & J. L. Kincheloe (Eds.), *Students as researchers: Creating classrooms that matter* (pp. 212-227). London: Falmer.

Kelly, L (1996). When does the speaking profit us? Reflection on the challenges of developing feminist perspectives on abuse and violence by women. In M. Hester, L. Kelly, & J. Radford (Eds.), *Women, violence, and male power*. Bristol, PA: Open University Press.

Kincheloe, J. L. (1991). *Teachers as researchers: Qualitative paths to empowerment*. London: Falmer.

Kincheloe, J. L. (1993). *Toward a critical politics of teacher thinking: Mapping the postmodern*. Granby, MA: Bergin & Garvey.

Kincheloe, J. L. (1995). *Toil and trouble: Good work, smart workers, and the integration of academic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New York: Peter Lang.

Kincheloe, J. L. (1998). Critical research in science education. In B. Fraser & K. Tobin (Eds.),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science education* (Pt. 2). Boston: Kluwer.

Kincheloe, J. L. (1999). *How do we tell the workers? The socioeconomic foundations of work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Boulder, CO: Westview.

Kincheloe, J. L., & Pinar, W. F. (1991). Introduction. In J. L. Kincheloe & W. F. Pinar, *Curriculum as social psychoanalysis: Essays on the significance of place* (pp. 1-23).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Kincheloe, J. L., & Steinberg, S. R. (1993). A tentative description of post-formal thinking: The critical confrontation with cognitive theory. *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 63, 296-320.

Kincheloe, J. L., & Steinberg, S. R. (1997). *Changing multiculturalism: New times, new curriculum*. London: Open University Press.

Kincheloe, J. L., Steinberg, S. R., & Hinchey, P. (Eds.). (1999). *The post-formal reader: Cognition and education*. New York: Falmer.

Kincheloe, J. L., Steinberg, S. R., Rodriguez, N. M., & Chennault, R. E. (Eds.). (1998). *White reign: Deploying whiteness in*

America. New York: St. Martin's.

Kincheloe, J. L., Steinberg, S. R., & Tippins, D. (1999). *The stigma of genius: Einstein, consciousness and Education*. New York: Peter Lang.

Kincheloe, J. L., Steinberg, S. R., & Villaverde, L. (Eds.). (1999). *Rethinking intelligence: Confronting psychological assumptions about teaching and learning*. New York: Routledge.

King, J. (1996). Bad luck, bad blood, bad faith: Ideological hegemony and the oppressive language of hoodoo social science, In J. L. Kincheloe, S. R. Steinberg, & A. D. Gresson Ⅲ (Eds.), *Measured lies: The bell curve examined*. New York: St. Martin's.

King, J., & Mitchell, C. (1995). *Black mothers to sons*. New York: Peter Lang.

Knobel, M. *Everyday literacies: Students, discourse, and social practice*. New York: Peter Lang.

Kogler, H. (1996). *The power of dialogue: Critical hermeneutics after Gadamer and Foucault*. Cambridge: MIT Press.

Lacey, C. (1970). *Hightown Grammar: The school as a social system*.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Lash, S. (1990). Learning from Leipzig ... or politics in the semiotic society.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7(4), 145-158.

Lather, P. (1991). *Getting smart: Feminist research and pedagogy with/in the postmodern*. New York: Routledge.

Lather, P. (1993). Fertile obsession: Validity after poststructuralism. *Sociological Quarterly*, 34, 673-693.

Leistyna, P., Woodrum, A., & Sherblom, S. (1996). *Breaking free: The transformative power of critical pedagogy*. Cambridge, MA: 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

Lemke, J. (1993). Discourse, dynamics, and social change. *Cultural Dynamics*. 6, 243-275.

Lemke, J. (1995). *Textual politics: Discourse and social dynamics*. London: Taylor & Francis.

Lemke, J. (1998). Analyzing verbal data: Principles, methods, and problems. In B. Fraser & K. Tobin (Eds.),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science education* (Pt. 2). Boston: Kluwer.

Lugg, C. (1996). Attacking affirmative action: Social Darwinism as public policy. In J. L. Kincheloe, S. R. Steinberg, & A. D. Gresson Ⅲ (Eds.), *Measured lies: The bell curve examined*. New York: St. Martin's.

Lugones, M. (1987). Playfulness, "world"-traveling, and loving perception. *Hypatia*, 2(2), 3-19.

Luke, T. (1991). Touring hyperreality: Critical theory confronts informational society. In P. Wexler (Ed.), *Critical theory now* (pp. 1-26). New York: Falmer.

Lull, J. (1995). *Media, communication, culture: A global approach*.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Macedo, D. (1994). *Literacies of power: What Americans are not allowed to know*. Boulder, CO: Westview.

Madison, G. B. (1988). *The hermeneutics of postmodernity: Figures and theme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Maher, F., & Tetreault, M. (1994). *The feminist classroom: An inside look at how professors and students are transforming higher education for a diverse society*. New York: Basic Books.

Manganaro, M. (1990). Textual play, power, and cultural critique: An orientation to modernist anthropology. In M. Manganaro (Ed.), *Modernist anthropology: From fieldwork to text* (pp. 3-47).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Marcus, G. E., & Fischer, M. M. J. (1986). *Anthropology as cultural critique: An experimental moment in the human scienc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Martin, H., & Schuman, H. (1996). *The global trap: Globalization and the assault on democracy and prosperity*. New York: Zed Books.

McGuigan, J. (1996). *Culture and the public sphere*. New York: Routledge.

McLaren, P. (1992a). Collisions with otherness: "Traveling" theory, post-colonial criticism, and

the politics of ethnographic practice — the mission of the wounded ethnographer.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Qualitative Studies in Education*, 5, 77-92.

McLaren, P. (1992b). Literacy research and the postmodern turn: Cautions from the margins. In R. Beach, J. Green, M. Kamil, & T. Shanahau (Eds.), *Multi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n research.* Urbana, IL: National Council of Teachers of English.

McLaren, P. (1995a). *Critical pedagogy and predatory culture: Oppositional politics in a postmodern era.* New York: Routledge.

McLaren, P. (1995b). *Life in schools* (3rd ed.). New York: Longman.

McLaren, P. (1997). *Revolutionary multiculturalism: Pedagogies of dissent for the new millennium.* New York: Routledge.

McLaren, P. (1998). Revolutionary pedagogy in post-revolutionary times: Rethinking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ritical education. *Educational Theory*, 48, 431-462.

McLaren, P. (1999). *Schooling as a ritual performance: Toward a political economy of educational symbols and gestures* (3rd ed.). Boulder, CO: Rowman & Littlefield.

McLaren, P. (2000). *Che Guevara, Paulo Freire, and the pedagogy of revolution.* Boulder, CO: Rowman & Littlefield.

McLaren, P., & Hammer, R. (1989). Critical pedagogy and the postmodern challenge. *Educational Foundations*, 3(3), 29-69.

McLaren, P., Hammer, R., Reilly, S., & Sholle, D. (1995). *Rethinking media literacy: A critical pedagogy of representation.* New York: Peter Lang.

McWilliam, E., & Taylor, P. (Eds.). (1996). *Pedagogy, technology, and the body.* New York: Peter Lang.

Miller, S., & Hodge, J. (1998). *Phenomenology, hermeneutics, and narrative analysis: Some unfinished methodological business.* Unpublished manuscript.

Molnar, A. (1996). *Giving kids the business: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America's schools.* Boulder, CO: Westview.

Morgan, W. (1996). Personal training: Discourses of (self) fashioning. In E. McWilliam & P. Taylor (Eds.), *Pedagogy, technology, and the body.* New York: Peter Lang.

Morley, D., & Chen, k. -H. (Eds.). (1996). *Stuart Hall: Critical dialogues in cultural studies.* New York: Routledge.

Morrow, R. (1991). Critical theory, Gramsci and cultural studies: From structuralism to post-structuralism. In P. Wexler (Ed.), *Critical theory now* (pp. 27-69). New York: Falmer.

Mullen, C. (1999). Whiteness, cracks and inkstains: Making cultural identity with Euroamerican preservice teachers. In P. Diamond & C. Mullen (Eds.), *The postmodern educator: Arts-based inquiries and teacher development.* New York: Peter Lang.

Myrsiades, K., & Myrsiades, L. (Eds.). (1998). *Race-ing representation: Voice, history, and sexuality.*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Newton, J., & Stacey, J. (1992-1993). Learning not to curse, or, feminist predicaments in cultural criticism by men: Our movie date with James Clifford and Stephen Greenblatt. *Cultural Critique*, 23, 51-82.

Nicholson, L. J., & Seidman, S. (Eds.). (1995). *Social postmodernism: Beyond identity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ailliotet, A. (1998). Deep viewing: A critical look at visual texts. In J. L. Kincheloe & S. R. Steinberg (Eds.), *Unauthorized methods: Strategies for critical teaching.* New York: Routledge.

Peters, M. (1993). *Against Finkielkraut's la defaite de la pensee: Culture, postmodernism and education.* Unpublished manuscript.

Peters, M., & Lankshear, C. (1994). Education and hermeneutics: A Freirean interpretation. In P. McLaren & C. Lankshear (Eds.), *Politics of liberation: Paths from Freire.* New York: Routledge.

Pfeil, F. (1995). *White guys: Studies in postmodern domination and difference.* New

York: Verso.

Pieterse, J., & Parekh, B. (1995). Shifting imaginaries: Decolonization, internal decolonization, and postcoloniality. In J. Pieterse & B. Parekh (Eds.), *The decolonialization of imagination: Culture, knowledge, and power.* Atlantic Highlands, NJ: Zed.

Pinar, W. F. (1994). *Autobiography, politics, and sexuality: Essays in curriculum theory,* 1972-1992. New York: Peter Lang.

Pinar, W. F. (Ed.). (1998). *Curriculum: Toward new identities.* New York: Garland.

Pinar, W. F., Reynolds, W., Slattery, P., & Taubman, P. (1995). *Understanding curriculum.* New York: Peter Lang.

Poster, M. (1989). *Critical theory and poststructuralism: In search of a context.*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Prakash, M., & Esteva, G. (1998). *Escaping education: Living as learning within grassroots cultures.* New York: Peter Lang.

Pruyn, M. (1994). Becoming subjects through critical practice: How students in an elementary classroom critically read and wrote their worl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form,* 3(1), 37-50.

Pruyn, M. (1999). *Discourse wars in Gotham-West: A Latino immigrant urban tale of resistance and agency.* Boulder, CO: Westview.

Quantz, R. A. (1992). On critical ethnography (with some postmodern considerations). In M. D. LeCompte, W. L. Millroy, & J. Preissle (Eds.), *The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education* (pp. 447-505).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Quail, C. B., Razzano, K. A., & Skalli, L. H. (2000). *Tell me more: Rethinking daytime talk shows.* New York: Peter Lang.

Rabinow, P. (1977). *Reflections on fieldwork in Morocco.*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Rains, F. (1998). Is the benign really harmless? Deconstructing some "benign" manifestations of operationalized white privilege. In J. L. Kincheloe, S. R. Steinberg, N. M. Rodriguez, & R. E. Chennault (Eds.), *White reign: Deploying whiteness in America.* New York: St. Martin's.

Rand, E. (1995). *Barbie's queer accessories.*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Rapko, J. (1998). Review of *The power of dialogue: Critical hermeneutics after Gadamer and Foucault. Criticism,* 40(1), 133-138.

Ritzer, G. (1993). *The McDonaldization of society.* Thousand Oaks, CA: Pine Forge.

Robins, D., & Cohen, P. (1978). *Knuckle sandwich: Growing up in the working-class city.* Harmondsworth: Penguin.

Robinson, W. (1998). Beyond nation-state paradigms: Globalization, sociology, and the challenge of transnational studies. *Sociological Forum,* 13, 561-594.

Rodriguez, N. M., & Villaverde, L. (2000). *Dismantling whiteness.* New York: Peter Lang.

Roman, L., & Eyre, L. (Eds.). (1997). *Dangerous territories: Struggles for difference and equality in educ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Rosen, S. (1987). *Hermeneutics as politic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Rosenau, P. M. (1992). *Post-modernism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Insights, inroads, and intrus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Samuels, A. (1993). *The political psyche.* New York: Routledge.

San Juan, E., Jr. (1992). *Articulations of power in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tlantic Highlands, NJ: Humanities Press.

San Juan, E., Jr. (1996). *Mediations: From a Filipino perspective.* Pasig City, Philippines: Anvil.

Scheurich, J. J., & Young, M. (1997). Coloring epistemologies: Are our research epistemologies racially biased? *Educational Researcher,* 26(4), 4-16.

Scott, J. W. (1992). Experience. In J. Butler & J. W. Scott (Eds.), *Feminists theorize the political* (pp. 22-40). New York: Routledge.

Sedgwick, E. (1995). Gosh, Boy George, you

must be awfully secure in your masculinity? In M. Berger, B. Wallis, & S. Watson (Eds.), *Constructing masculinity*. New York: Routledge.

Semali, L. (1998). Still crazy after all these years: Teaching critical media literacy. In J. L. Kincheloe & S. R. Steinberg (Eds.), *Unauthorized methods: Strategies for critical teaching*. New York: Routledge.

Semali, L., & Kincheloe, J. L. (1999). *What is indigenous knowledge? Voices from the academy*. New York: Falmer.

Shelton, A. (1996). The ape's I. Q. In J. L. Kincheloe, S. R. Steinberg, & A. D. Gresson Ⅲ (Eds.), *Measured lies: The bell curve examined*. New York: St. Martin's.

Shohat, E., & Stam, R. (1994). *Unthinking Eurocentrism: Multiculturalism and the media*. New York: Routledge.

Shor, I. (1996). *When students have power: Negotiating authority in a critical pedag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ilverman, E. K. (1990). Clifford Geertz: Towards a more "thick" understanding? In C. Tilley (Ed.), *Reading material culture* (pp. 121-159). Cambridge, MA: Blackwell.

Slattery, P. (1995). *Curriculum development in the postmodern era*. New York: Garland.

Slaughter, R. (1989). Cultural reconstruction in the post-modern world. *Journal of Curriculum Studies*, 3, 255-270.

Sleeter, C., & McLaren, P. (Eds.). (1995).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critical pedagogy,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Smith, D. G. (1999). *Interdisciplinary essays in the Pedagon: Human sciences, pedagogy and culture*. New York: Peter Lang.

Smith, R., & Wexler, P. (Eds.). (1995). *After post-modernism: Education, politics, and identity*. London: Falmer.

Smyth, J. (1989). A critical pedagogy of classroom practice. *Journal of Curriculum Studies*, 21(6), 483-401.

Soto, L. (1998). Bilingual education in America: In search of equity and justice. In J. L. Kincheloe & S. R. Steinberg (Eds.), *Unauthorized methods: Strategies for critical teaching*. New York: Routledge.

Stallabrass, J. (1996). *Gargantua: Manufactured mass culture*. London: Verso.

Steinberg, S. (1997). Kinderculture: The cultural studies of childhood. In N. Denzin (Ed.), *Cultural studies: A research volume* (Vol. 2, pp. 17-44). Greenwich, CN: JAI.

Steinberg, S. (Ed.). (2000). *Multi/intercultural conversations*. New York: Peter Lang.

Steinberg, S. R. (1997). The bitch who has everything. In S. R. Steinberg & J. L. Kincheloe (Eds.), *Kinderculture: The corporate construction of childhood*. Boulder, CO: Westview.

Steinberg, S. R., & Kincheloe, J. L. (Eds.). (1997). *Kinderculture: Corporate constructions of childhood*. Boulder, CO: Westview.

Steinberg, S. R., & Kincheloe, J. L. (Eds.). (1998). *Students as researchers: Creating classrooms that matter*. London: Taylor & Francis.

Stewart, K. (1996). *A space on the side of the road: Cultural poetics in an "other" America*.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Sünker, H. (1998). Welfare, democracy, and social work. In G. Flosser & H. Otto (Eds.), *Towards more democracy in social services: Models of culture and welfare*. New York: de Gruyter.

Surber, J. (1998). *Culture and critiqu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critical discourses of cultural studies*. Boulder, CO: Westview.

Taussig, M. (1987). *Shamanism, colonialism, and the wild man: A study in terror and healing*.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Taylor, M., & Saarinen, E. (1994). *Imagologies: Media philosophy*. New York: Routledge.

Thomas, S. (1997). Dominance and ideology in cultural studies. In M. Ferguson & P. Golding (Eds.), *Cultural studies in question*. London: Sage.

Trueba, E. T., & McLaren, P. (in press).

Critical ethnography for the study of immigrants. In E. T. Trueba & L. I. Bartolomé (Eds.), *Immigrant voices: In search of educational equity*. Boulder, CO: Rowman & Littlefield.

Vattimo, G. (1994). *Beyond interpretation: The meaning of hermeneutics for philosophy*.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Viergever, M. (1999). Indigenous knowledge: An interpretation of views from indigenous peoples. In L. Semali & J. L. Kincheloe (Eds.), *What is indigenous knowledge? Voices* from the academy. Bristol, PA: Falmer.

Villaverde, L., & Kincheloe, J. L. (1998). Engaging students as researchers: Researching and teaching Thanksgiving in the elementary classroom. In S. R. Steinberg & J. L. Kincheloe (Eds.), *Students as researchers: Creating classrooms that matter* (pp. 149-166). London: Falmer.

Visweswaran, K. (1994). *Fictions of feminist ethnograph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Weil, D. (1998). *Towards a critical multicultural literacy: Theory and practice for education for liberation*. New York: Peter Lang.

Weiler, K. (1988). *Women teaching for change: Gender, class, and power*. South Hadley, MA: Bergin & Garvey.

Weinstein, M. (1998). *Robot world: Education, popular culture, and science*. New York: Peter Lang.

Welch, S. (1991). An ethic of solidarity and difference. In H. Giroux (Ed.), *Postmodernism, feminism, and cultural politics: Redrawing educational boundaries* (pp. 83-99).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West, C. (1993). *Race matters*. Boston: Beacon. Wexler, P. (1991). Preface. In P. Wexler (Ed.), *Critical theory now*. New York: Falmer.

Wexler, P. (1996a). *Critical social psychology*. New York: Peter Lang.

Wexler, P. (1996b). *Holy sparks: Social theory, education, and religion*. New York: St. Martin's.

Wexler, P. (1997). *Social research in education: Ethnography of being*.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Culture of Schooling, Halle, Germany.

Willis, P. E. (1977). *Learning to labour: How working class kids get working class jobs*. Farnborough, UK: Saxon House.

Women's Studies Group, 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1978). *Women take issue: Aspects of women's subordination*. London: Hutchinson, with 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Woodward, K. (Ed.). (1997). *Identity and difference*. London: Sage.

Yates, T. (1990). Jacques Derrida: "There is nothing outside of the text." In C. Tilley (Ed.), *Reading material culture* (pp. 206-280). Cambridge, MA: Blackwell.

Young, I. (1990). The ideal of community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 In L. J. Nicholson (Ed.), *Feminism/postmodernism* (pp. 300-323). New York: Routledge.

Zavarzadeh, M., & Morton, D. (1991). *Theory, (post) modernity, opposition*. Washington, DC: Maison-neuve.

Zizek, S. (1990). *The 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 London: Verso.

文化研究[①] 11

CULTURAL STUDIES

⊙ 约翰·弗劳　米甘·莫里斯

1980 年代，伴随着学术界对于"后现代主义"的争论，以及由"全球化"所引发的政策辩论，文化这一词汇的使用，逐渐被媒体赋予了一种与艺术和文学作品毫不相关的意义。当澳大利亚一位政治家宣布"重新安排工业政策实际就是重新塑造文化态度"(引自 Loosley，1991)的时候，他没有把文化定义成一种审美愉悦的范畴，一系列经典著作，或者是一种民族身份的表达。他也不是在经济意义上把文化说成是一种重要的出口产业，尽管他可能曾经这么做过("Culture Fills"，1990)。更确切地说，他要表达的是指一系列对我们的工作方式施加影响的复杂的社会习俗、价值观和期望。这也是媒体巨头默多克(Rupert Murdoch)于 1990 年在澳大利亚的电视讲话中所宣扬的。伴随着澳大利亚历史上最糟糕公司的破产，一个金融失控和公司犯罪的年代结束了，墨尔本当地的 ABC 电视台的七点半报道请教默多克，"我们"应该如何去拯救我们的经济。默多克马马虎虎地回答说，"哦，你们知道的：改变文化。"

默多克希望我们"了解"，他正在引用一个新自由主义的巧妙公式：经济问题需要"文化性的"解决方案，这一公式如今在澳大利亚已经被广泛认可；在其他地方，也被官僚、政治家、经济学家、记者、金融家，以及工会和企业领袖们所广泛接受。在这个意义上，文化不仅仅是一个供诠释者("评论家")进行专业化辩论的深奥话题。相反，"改变文化"是挑战其他人日常工作生活方式的一种手段，无论是在一个公司的架构内(澳大利亚主要的混凝钢铁生产商首席执行官认为"改变文化不是一个快速的过程，有点像 ARC 那么古老而涉猎广泛")，还是在一个产业部门内部(一位市场专家提供了一份题为"为服务而改变文化：如何影响购物中心的服务文化的改变"的报告)，或者在整个国家的经济体系内("休斯教授认

---

① 作者注：我们应该向以下人表示感谢：Chua Beng-Huat，Larry Grossberg，Gay Hawkins，Vivien Johnson，Allan Luke，Brian Massumi，Tony Mitchell，Elspeth Probyn，David Rowe，Darren Tofts，Keyan Tomaselli，Graeme Turner，Rob Willson。

为澳大利亚‘已经开始扶植文化出口’”)①。

换言之,文化本身被想象成为一种可塑性很强的媒介,在政治上居于强势地位的社会精英们能够随心所欲地对其加以改造和模塑。对于这些日常生活的经济评论家而言,改变文化首先意味着“更少的工人生产出更多的产品”;全球化被普遍地看成是导致这种强制理性的无情力量。但是这个过程具有社会意义,而这些意义可能由于地域差异而有所区别。它意味着在工作场所改变行为细节(“工作实践”),进而改变居住和家庭生活的结构和组织。它可能意味着促使工人们更注重合作精神。在某些情形下,它也可能意味着为了获得“国际关注”而改善种族和性别关系。它可能会由于造成了“结果不平等”而激化阶级意识,因此,使人们更加接受贫困——特别是对那些在岗工作的人士而言。美学含义接踵而来。在澳大利亚,“集体的意识形态”(Knight,1990,p.5)一直十分强大,承认这些改变意味着质疑关于我们现代历史的标准化神话的价值——平等主义,“互助精神”(团结),向上流动,对所有人的“机会均等”——以及与之相伴随的关于我们民族乐观、个性发展和社会福利的想象,这种想象仍然流行在我们的社会之中(Morris,1998a;Turner,1994)。

尽管如此,新自由主义的文化批评也不能完全从“艺术和文学”关注中解脱出来。1980年代末爆发了一场媒体辩论,涉及对于澳大利亚传统的国家认同的不同方面的评价(享乐主义和“福利主义”是当时评论界最流行的话题;参见Robinson,1989),此后十余年中,使澳大利亚社会民主得以持续一个世纪的经济和社会安排被拆除或者毁坏了。然而这一论战仅仅是东亚经济奇迹在“文化”维度产生影响的一个片断(Garnaut,1989)。评论家将“儒家资本主义(Confucian Capitalism)”提升为一种新的文化模式,对西方是一个文化教训,这使历史的文明社会理论遭遇数十年的冷落之后,回归到了主流(Huntington,1996;也参见Chen,1998a)。在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裙带资本主义(Crouy Capitalism)”成为了同一群批评论家批评的对象,也成为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出“文化改革”药方的依据(涉及数百万人;参见Arndt & Hill,1999)。

将文化对于经济生产力的所有其他次要的目标搁置一边,也抛开新自由主义的华丽的道德说教(和决定论),这一用法引人注目地凸显了文化这一词汇在当代文化研究中的一种使用方式。在这个背景下,文化也被认为是直接与工作及其组织联系在一起;与工作场所、家庭、邻里关系和街道之中的权力和性别相关;与自我感和归属感得以形成的阶级、地缘和血缘的复杂关系相关联;和社会关系所承载和塑造的梦想和欲望相关联。简而言之,用威廉姆斯(Williams,1958/1961)的话说,文化是一个能够标识一个社会群体的“整个生活方式的”术语,这一群体则是由话语和权力构造起来的(p.16)。它不是一个社会区隔(Bourdieu,1984)和“良好”品味得以展现的独立领域。它是一个嵌入性的实践和话语(文本、图像、谈话、行为代码以及将这些组织起来的叙事结构)的网络,这

---

① 这些依次引自如下报刊栏目:Swan Steels,1989;一个购物中心会议广告,刊于《澳大利亚金融评论》(*Australia Financial Review*,1992年8月13日);以及“贫瘠的表演”(Poor Performance,1989)。

一网络塑造了社会生活的每个方面。

认同与共同体

文化是包罗万象的观点通常被认为是人类学意义上的用法,正如罗萨尔多(Rosaldo,1997,p.29)指出,一种理解文化研究的方式,即是这种关于文化的观点:从人类学到文学、法律、社会历史、传播、商业、媒介研究,以及其他更多领域"迅速传播"的结果。但是,认为文化是指社会群体的存在——其形成、维系,及其与其他群体的界限,以及不断重构的过程——的观点,又引发了一个严重的问题:这些群体所宣称的同质性属于什么类型? 如果说,对人类学家来说"文化研究看起来不再作为一个客体化的事物,或者是一个自闭的、连贯的、模式化的意义领域"(Rosaldo,1997,p.29),我们就有更多的理由质询,文化研究采用什么层面上的文化概念——是民族—国家层面的和/或"民族性"文化? 阶级、性别、种族、性特征、族群,还是共同体层面的文化? 答案是,可以采用以上任何一个层面的涵义,而且,这些涵义彼此之间很难彻底区分开来。

在人文和社会科学之间现在出现了许多类似的答案。文化研究的实践者和定性研究其他领域很多同事一道,就文化的同质性与差异性、社会位置及其变动、历史经验和变迁等问题,进行了数十年的争论,任何全面的关于文化研究的书目都会覆盖这本书之中的许多章节。然而,可以公正地说,文化研究的这些争论并没有改变既有的学科格局,而是直接成为了其中的一个领域。即使是对主要出版物的最粗略的考察,也会发现文化研究的实质正是形成于形形色色的女权主义(Butler,1990;de Lauretis,1986;Grewal & Kaplan,1994;hooks,1981;Hull,Scott & Smith,1982;Mohanty,Russo,& Torres,1991;Prpbyn,1993;Sheridan,1988;Shiach,1999; Wallace, 1978)与阶级意识化的族群和批判式的种族研究(Anzaldua,1987;Frankenberg,1993;hooks,1990;Jordan & Weedon,1995;Matsuda,1996;Moraga & Anzaldua,1981;Roediger,1991;Ware,1992),与男同性恋、女同性恋以及性取向特异的人群的研究(Bulter,1993;Chang,1998;Crimp,1987;de Lauretis,1991;Fuss,1991;Sedgwick,1993;Warner,1993;Watney,1987),与后殖民主义和传播研究(Ang,1999;Bhabha,1994;Chambers & Curti,1996;Chow,1991,1993;Clifford,1997;Gilroy,1993;Hargreaves & McKinney,1997;Morley & Chen,1996;Prakash,1995;Spivak,1988,1990),以及与本土人士的学术研究(Bennett & Blundell,1995;Bennett,Turner & Volkerling,1994;Langton,1993;Valaskakis,1988,出版中)相互影响,彼此交锋之际。

通晓这段相互影响的历史和常常白热化的辩论之后,绝大部分的文化研究工作者已经敏锐地意识到,将想象的社会同质性作为解释文化文本的基础是非常危险的。这持续推动着将文化作为一个裂变为原来各个组成部分的变化过程(如 Carby,1982/1996;Chambers & Curri,1996;Gilroy,1987,1996;hooks,

1992b;McRobbie,1981;Steedman,1986;Williams,1985;Women's Studies Group,1978),强调多样性和差异性,正是这些多样性和差异性界定了"社会群体"(Frankenberg,1997;Hall,1996;Hall & du Gay,1996;Lowe,1996;Sedgwick,1990),质疑那些整体性文化的观点,这些观点假定文化过程的终点即成功形成一个整体而且连续的"社会"或者"共同体"(Hunter,1988b)。与此同时,这一推动力促使文化研究追问群体是如何"通过文化活动逐渐认识到自身是一个群体(作为一个体现个体和社会的利益、同一性和差异性的特殊组织)的"(Frith,1996a,p. 111);考察"认同感和欲望的深刻的矛盾情结"(Hall,1996,p. 444),这种情结能够横跨这种最严格的、历史上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分工和不平等的结构关系,并使之更为复杂(hooks,1992a;Mercer,Ugwu,& Bailey,1996;Muecke,1997);从而追求一种跨越流行界限的关联性和解释性的政治,而不是在高度分裂的群体之间或者群体内部寻找"同质性"(Benterrak,Muecke,& Roe,1996;Clifford,1997;Grossberg,1992;Haraway,1991;Hayward,1998;McRobbie,1994)。

这种批判和肯定的双重运动,逐渐使文化研究呈现不一致性,不仅带有一种"消极的世界主义(evasive cosmopolitanism)"(Willenmen,1994,p. 210),否认群体之间的实际分界线有效性与重要性(burden),将差异视为一种消费性物品,而一致性纯粹是一种虚构,并且和那些为评论家所担心的好战的文化民族主义、本质主义和特殊主义一道,经常讨论"文化的致命性问题"(Hartman,1997)。例如,吉尔罗伊(Gilroy,1992,1993)既反对"表意多元主义(notional pluralist)",也反对以"例外论(exceptionalist)"的方法来解释黑人流行文化,他提出第三种视角,即"反—反要素主义(anti-antiessentialism)",认为黑人身份既不是一个可供任意使用的范畴,也不是永恒不变的种族本质,而是"语言、姿势、肢体符号和欲望等实践活动的产物",这些实践活动包括种族主义的活动和影响。"种族化的主体性",吉尔罗伊(Gilroy,1993)写道,"是社会实践的产物,是从中想象性地衍生出来的"(p. 102)。在一个不同的背景下,萨凯(Sakai,1997)提供了一个关于"'日本'的起源"的具有可比性的论证。通过分析西方和日本的现代帝国民族主义均将"普遍主义"捆绑在"特殊主义"之上,他指出,以单一的语言、人种和民族所确认的同质性所具有的竞争力,是于18世纪启动转型的特定的制度的产物(参见Sakai,1991),而不是这种转型的前提。

尽管辩论起源于不同的学术领域,这些论点都和韦勒门(Willemen)的电影研究著作中的观点相似,即"共同体所主张的那种类型同质性"不仅仅是易变的和临时性的(如同后现代的真实性所具有的),同时也是一定实践的真实的而且相应而生的产物,这一过程则是分析家的研究对象。文化研究一般不以一种哲学语式来进行一种本质主义的非此即彼的辩论(Fuss,1989;也可参见Grossberg,1997a,pp. 18-19;McRobbie,1997b),而是更多地对危险的政治冲突进行考察,这种冲突是在具体的背景之下,为了针对特定的人群而出现的,发生在不同的社群或者民族之间(Baker,Diawara,& Lindeborg,1996;D. Bennett,1998;Chen,1998b;

Parker, Russo, Sommer, & Yaeger, 1992; Teer-Tomaselli & Roome, 1997)。同时也更多地对历史性的斗争进行阐明,这种斗争发生在竞争性的叙事方案(如关于"认同"的方案)和复杂的社会经验之间,而这些方案和经验急待组织起来(Abbas, 1997; Berlant, 1997; Bhabha, 1990; Chakrabarty, 出版中; Chow, 1998a; Lilley, 1998; Morris, 1998a)。因此,当诺波尔、珀因廷和塔巴(Noble, Poynting & Tabar, 1999)从斯皮瓦克(Spivak, 1990)处借用"策略性的"本质主义的观点,将其扩展到文化融合研究之时,他们研究了生活在悉尼西南部的操阿拉伯语的处于特定的社会空间的年轻人,是如何通过变通性将自己认同成移民,或者是"黎巴嫩人"(一些人实际上是叙利亚身份),或者是澳大利亚人,从而应对不同的日常生活背景的;对于这些年轻人而言,"身份和环境的相互影响产生了奇特的实践化合物"(Noble et al., 1999, p. 39)。

通过对日常生活之中约束性和激励性的物质场景(contexts)(参见 Grossberg, 1993, 1998a)①的强调,文化研究实际上要以地理性的、历史性的因素来深入理解文化,如同人类学不断地与关于文化的审美性观点进行斗争之时所做的一样(Clifford, 1988)。经验的空间和实践框架对于情景关系的分析是同样重要的,这种分析旨在寻求把握普通人的经历、事件和时机的复杂性,在这种复杂性之中"身份"得以形成和改变;正如阿劳(Allor, 1997)在一篇关于 Montreal "主体"的论文中所述,以还原地方政治的本来面目为目标的文化研究"必须准确地关注生活形态的逐渐形成过程"(p. 25)。

定位文化研究

人们广泛质疑"文化"研究方法作为一个领域拥有其统一的范畴的观点,一个原因在于 1970 年代以来复杂的国际背景,而文化研究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关于文化的局限和潜力的稳定的、专业化的共识没有轻易的出现,旧的殖民体系、隔阂和"情感结构"(Williams, 1961b, p. 64; 1979)最近被经济全球化重

① 在文化研究之中,"场景"这一概念扮演了重要角色,它从来不是指一种具有影响力和决定性的背景(在一些文化社会学中它存在这种含义),这种背景可以与"文本"或者其他研究对象分离开来。许多论文对文化研究和其他"研究文化"(参见 Rodman, 1997)的方法进行了区分,格罗斯伯格(Grossberg, 1997a)指出,其"激进的场景论"是"文化研究唯一"特点(p. 253; 也参见 Grossberg, 1997b, 1998a)。在这种用法中,"场景"并不是指环境,相反,它是指定位于文化之中的"日常生活的特定细节",可以被理解为"特定的实践主体"和"特定的社会力量,制度和权力关系"(Grossberg, 1993, p. 9)。分析家的任务是逐一阐述这一定位过程:"特定研究的场景不是经验性地事先给定的;它不得不由研究计划和处于危险之中的政治性问题加以界定。在特定时刻,场景可能非常狭小,如邻里关系,或者城市区域,或者甚至如一些存在种族问题的地方高中;它也可以非常广阔,如冷战之后的全球资本主义。简单说,文化研究的场景可以是任何东西,什么都可以具有场景性"(Grossberg, 1997a, p. 225)。按照这种观点,文化研究首先是场景研究而不是"文化"的研究,而场景(包括对于场景的研究、理论化和概念的界定)是在社会实践之中产生的。接着要讨论的是,虽然什么都可以成为文化研究考察的对象,文化研究实际上并不主张文化就是"任何事情",或者任何事情都具有文化性;尽管文化被解释成实践的特定主体,文化并没有包含可以促进或者限制这些实践的社会经济力量、制度和权力关系。

现或者重新制造出来,仍然继续影响着事件的社会意义的形成(Appadurai,1996;Jacobs,1996;Jameson & Miyoshi,1998;Said,1993;Wilson & Dissanayake,1996;Wood,出版中),而新的斗争、对话和联盟正在形成,超越了以往强大的地缘政治甚至是语言界线。对于今天的许多学者而言,身份和共同体问题不仅仅由种族、阶级和性别问题构成,还包含了对于地域、文化记忆的深刻关注,以及这些学者进入"国际"论辩空间的形形色色的语汇,这种辩论空间不仅仅是被西方先行占据者统治着(Chen,1992;Tomaselli,1998b),还被英语所操纵(Cho,1996)。在这种情况下,正如伯兰德(Berland,1997a)所观察到的,"文化和地域需要我们关注,不是因为我们的观点具有确定性或权威性,而是因为它们脆弱不堪,并且充满争议"(p.9)。

在文化研究之中,如同在其他学科之中一样,全球化同时被作为一个事实和问题话题进行讨论,恰如丘恩(Chun,1994;或参见 Chua,1998;Grossberg,1997b,1999;King,1991;Massey,1997)所做的有益区分。无论我们赋予这个术语什么价值,有一点至少很清楚,在过去30年中,大范围的经济、地缘政治和技术变迁已经推动了更高的教育和学术出版工作(Cohen,1993;Morris,1998b;Readings,1996),这些变迁不仅影响了文化研究工作的主题,而且还为跨国性的学术运动的出现提供了条件。这些条件包括,与以往相比,学者们有了新的机会和动机去在更加广阔和更加多样性的范围进行旅行、交谈、出版、比较和翻译他们的著作。然而,这些条件还包括大学生活的公司化和理性化,以及各国之间在制度性价值和程序层面上不断增长的相似性。在一些国家,上述条件甚至还包括由于入学率的提高,而国家向公立大学提供资助的减少,从而导致文化研究成为教育的一种"廉价"形式(Steedman,1992b),以及原先不同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系科被压缩成了一个单一而且不稳定的复合物。因此,对文化研究的"成功"抱有矛盾心理成为一个不断重复的主题也就不足为奇了(Ferguson & Golding,1997;Grossberg,1993;Kraniauskas,1998;Morris,1997a)。

然而,与英语成为一种全球性的语言类似,文化研究由于其实践的背景的不同而千差万别。众所周知,提供一张文化研究领域的"地图"或者提出"概要观点"是很困难的,它不是简单的认识论上的拘谨(不承认"了解"的主张)的问题,而是源于实践上的限制:在该领域总是有众多人从特殊的处境之中意识过来。例如,当凯利(Carey,1997)痛惜早期英国文化研究中的"乡土观念"的消逝时,他如同美国人一般抱怨今天文化研究是"非常差劲的空洞无物的学术领地",他把该领域内新的国际主义解读成不过是"前后对照和相互引用的模式,虽然跨越两大洲但在任何一个校园之中的智识方面都影响甚微"(p.2;或参见 Carey,1995)。从我们所处的第三个大洲澳大利亚来看——很难忽视来自第四洲(东亚和东南亚)的影响,而且在澳大利亚文化研究范式有效地控制了"某些"大学的系科——在此凯利的观点不仅是狭隘的而且是错误的。

然而,在某些方面它也似乎有一定道理。人们的普遍印象认为文化研究是英国和美国的事务(引发或者带动了少数外国来访的作者),这主要是由人类学

(During,1999;Grossberg,Nelson,& Treichler,1992;Storey,1996)以及一些分布广泛的历史与主题造成的(Brantlinger,1990;Ferguson & Golding,1997;Hall & du Gay,1996;Harris,1992;McGuigan,1997;McRobbie,1997a;Nelson & Gaonkat,1996)。然而,从其他地方来看,这些著作并不显得"空洞无物";相反,它们来自于一个强大的自我中心化的力量,甚至有时候人们会误以为它无所不在。于是问题在于,如何结合其他的定位方式去给凯利的"文化研究"进行地理学定位,而其他的定位方式有,例如陈(Chen,1998a)以"非殖民化问题"为中心组织的"亚洲腹地的文化研究",吉比安(Gibian,1997)以对 *Tabloid* 杂志上刊登的活灵活现"大众文化"评论为基础进行的"北美"文化研究谱系,或者托马赛利(Tomaselli,1998b)的坚决主张,即各式各样的非洲文化研究"起源于'历史相对论';关于各个时期、各个社群的非洲研究将作为一个整体,在该领域所提供的框架之中得到复兴"(p. 395)。

绘制一张更大的地图是不能完成的,尽管它处于开始阶段。我们自身周边容易利用的地理性定位工作的突出之点就是所使用的范畴的灵便性;扫视一个领域,人们可以看到,民族形成地区,而地区又分为区域,而民族之内或者民族之间的又形成了共同体。因而,存在澳大利亚文化研究(Frow & Morris,1993;Turner,1993)的文集,也存在澳大利亚—亚洲"交流"文集(Dever,1997),存在"亚洲和太平洋评论"而涵盖澳大利亚的文集;其他的文集则是将澳大利亚与南非(Darien-Smith,Gunner, & Nuttall,1996)以及几个历史上也曾经是英联邦殖民地的国家联系起来(D. Bennett,1998)。还有一些关于亚太文化研究(Birch,1994;Wilson & Dirlik,1995)、太平洋文化研究(Hereniko & Wilson,出版中;Wilson,出版中)、拉丁美洲文化研究(Garcia Canclini,1995;Moreiras,1999;Yudice,Franco, & Flores,1992)、墨西哥文化研究(Garcia Canclini,1993)和"墨西哥裔美国人"文化研究(Chabram-Dernerscsian,1999;Fregoso & Chabram,1990)的文集和论文。连同英国文化研究(Turner,1996)一起,我们还发现了爱尔兰文化研究(Gibbons,1996;Sharkey,1997;Waters,1996)和"按国别"组织的关于法国(Forbes & Kelly,1996)、德国(Burns,1995)、俄国(Kelly & Shepherd,1998)、西班牙(Graham & Labanyi,1996)和意大利(Forgacs & Lumley,1996)文化研究的文集。我们发现"北欧日耳曼"文化研究(Vainikkala & Eskola,1994)和包括整个非洲大陆的非洲文化研究(Diawara,1998;Tomaselli,1998a;Wright,1998)。关于黑人文化研究的各种"评论"性定位式项目,是该领域之中地缘政治可流动性,以及包含在准确场景化过程中的重要性的最好范例:除了关于黑人流行文化(Dent,1992)的跨国性工作和黑人文化研究(Mercer,1994)之外,还有关于不列颠黑人文化研究的国际性的文集(Baker et al. ,1996);其他的论文把黑人经验看成是不列颠内部(Owusu,1999)和美国内部(Lubiana,1997)的地域化的文化,以及这些地域化文化之间的流散(Gilroy,1993)。

这些项目并不是在空洞无物的学院之中产生的,因此,它们积极发展了智识工作对其自身在历史、社会和地缘政治承诺中的情景性特征的感知——这一点

得到了阿皮亚(Appiah,1992)的肯定,他将他父亲利用他的多种身份"作为阿散特人、加纳人、非洲人、基督教徒和理论家"(p.4)的能力描述成为一项"遗产"。如果这种在自由性的背景之下进行的远距离的文化研究所带来的位置感得到许多社会科学家的支持,对它进行理解而获得的"定位"是一个开放性的、多元而直接的、相关联的过程;这也不同于传统所宣称的"语言和文学"研究,传统的主张将文化解读成为一个有边界的民族或者文明的表达。然而,民族的形成包含了一种对其理想的同质性形式进行界定的原则。审美哲学(有时候被受过社会科学训练的学者将其与"文本主义"混淆在一起),极大地影响了现代西方人对文化的思考,这种影响不仅通过阅读(Hunter,1988a,1992)和写作(Clifford & Marcus,1986;Steedman,1997)的"自我形塑"教育,也通过"民族语言"的安排,这一安排在艺术和人文课程之中与历史联系在一起。文化研究拒绝给予"文学"特权,反对将"语言"和"文化"等同起来;文化研究质疑同质化的叙事,与产生于社会运动的"研究"领域建立了亲密联系,将欧洲式的普遍性重新描绘为帝国支配下的地方主义(Chakrabarty,2000),它被作为一种来自于"英语世界之外"的学者的"挑战"(Bennett,1993),如中国研究(Chow,1991,1998b)、法国(Chambers,1996)和德国(Bathrick,1992)研究,而受到欢迎,这里仅仅提及了少数几个案例。

在方法论的层面上,无论在地理和历史上多么危险,文化研究都十分重视"设定"独特的目标以用于分析(Hebdige,1988)。然而,这种独特性的观点,不同于现代主义社会理论所带来的非透明性和不可转译性的价值(Harvey,1989;Morris,1992);这个观点的概念化,并非是要反对其他既存的"一般性"和"普遍性"。因此,麦克霍尔(McHoul,1997)论证道,当我们转而注意"特殊文化对象的实用性和经验性(也就是说,非主要属性)地位所带来的限制性"之时,即可能正好存在一种一般性的模式,用以"发现文化对象的地方性特征"(p.15)。最近,文化理论家们正在关注米歇尔·德塞都(Michel de Certeau,1984)、德勒兹和瓜达希(Deleuze & Guattari,1987)、阿根本(Agamben,1993)的著作,已经使用"单一性"来描述"既非普遍性的(即,概念上的)也非特殊性(即,个体的)的存在模式"(Grossberg,1996,p.103;参见 Shaviro,1997);正如布莱安·马苏米(Brian Massumi)的说明,单一性可以准确地"防止个体和它所认同的类别完全吻合"(pp.123-124),此处所谓认同,被理解为使一个群体得以区分开来的公共属性①。

在文化研究领域,这些相当困难的论证对于任何涉及文化的一致性和差异性的工作,都具有实际意义。最为直接的是,它们挑战了文化研究领域众多关于这些问题论战之中所使用的术语,无论是在社会还是在地缘政治框架之内。对于格罗斯伯格(Grossberg,1996)来说,他们提议使用一个"没有认同的归属性概念",允许关系到集体行动、政治性认同和联盟之时采取新思考方式。他将美国

① 例如,德赛都(De Certeau,1984)在他关于日常生活实践的富有影响的研究之中设计了一个"单一性科学";也就是说,"一种联结日常追求和特定环境之间关系的科学"(第 ix 页),然而,阿根本(Agamben,1993)将其哲学描述成寻找一种路径,摆脱一种"迫使知识在个体性的不可说明性和普遍性的可理解性进行选择这一虚假的两难困境"(p.1)。

民权运动作为过去一个成功的范例加以引用,"单一性的政治",他写道,"需要定义人们所归属之处,或者,在更根本意义上说,是人们的足迹所至"(pp. 103-104)。普罗比因(Probyn)在她题为《无处可依》(*Outside Belongings*,1996)的著作之中号召,要进一步关注由"归属性期待"而带来的运动;她叙述生动、经验丰富;她对 Montreal 城日常生活中的民族、女权主义和同性恋的归属政治之中的"断裂性片刻"进行了丰富的描述和经验性审视,使用单一性这一概念,用以"把握我们在各个特殊类别之间不断游弋的方式"(p. 9)。

文化,文化研究和媒体

在关于认同、位置和共同体的讨论之中,媒体的重要性,是文化研究中我们所要强调的第二个背景性特征。如果说,文化研究只对流行的媒介文化感兴趣这一广为流传的观点是错误的,那么,文化研究便被说成是对 20 世纪下半叶传播技术的社会提升(social uptake)的一个回应(Meyrowitz,1985),并且密切关注这一提升在世界范围内对"整体的生活方式"的改变过程。

绝大部分关于现代流行文化的研究工作都或多或少地讨论过媒体(Dent,1992;Grossberg,1997c;McRobbie,1994;Storey,1994),而绝大多数关于"流行"与"媒介"文化相互交融的文献,都竭力证明两者存在显著的差异;文化研究在流行和媒体的相互联结和交迭之处都非常繁荣。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媒体研究就是文化研究的"典型",它们二者之间也不能相互转换;对媒体研究和文化研究的转换,以及媒体研究不同分支之间的关系进行重新定义,是近年以来电影(Diawara,1993;Friedberg,1993;Naficy & Gavriel,1993;O'Regan & Miller,1994;Willemen,1994)、杂志(Hartley,1992a,1996)、音乐(Frith,1996b;Keil & Feld,1994;Lipsitz,1994;Mitchell,1996;Rose,1994)、音乐电视(Frith,Goodwin & Grossberg,1993)、收音机(Johnson,1988;Miller,1992)以及,可能最受关注的电视(Allen,1987;Ang,1996;Geraghty & Lusted,1998;Hartley,1992b;Mellencamp,1990;Morley,1992;Silverstone,1990;Morley,1992;Silverstone,1994)研究的一个方面,甚至是关注的焦点。

电视对于文化研究的发展之所以如此重要,部分是因为难以将美学形式的研究,与对它们的经济和社会重要性的研究区分开来。电视最初是作为一种"驯服"的工具,在公众、公共、家庭和个人之中得到广泛使用,它似乎能够被平等地定义成为一种艺术、一个产业、一股社会力量、一套教育制度、一个销售媒介、家庭和内部装修的一种空间设计、市场和政府之间进行交易的一个场所、"生活"圈子或者消费网络的一个中转站(Kowiniski,1985),或者更近一些,家庭办公、娱乐和教育的一个潜在终端。哈特里(Hartley,1998)解释批判方法的含义:"电视是众多艺术之中的一个,它的功能决定形式,因此'文本分析'对媒介所处的符号语言学环境提出了要求,而不是简单的个体性的展示或者剪切"(p. 42)。这里的

“符号语言学”的环境包括实践性的政治和经济活动以及社会关系(Tomaselli, 1996),因此,对电视文本的严格解读,包含了一种对研究开始之际所给定的边界进行分析式的“超越”(Probyn,1999b)。

如果说形成(form)是一个无休止的,并且“正在进行”的过程,那么,文化研究就可以与“精读(close reading)”技术区分开来,后一种技术有时应用于电影和电视解说,按照典型的文学评论,这是一种与诗歌并列的独立的文学形式。上述理解也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媒体被置于更为广阔的社会和文化活动网络之中,这些活动网络创造、改变和启动了媒体,但是没有将其包含在内。将历史悠久的“亚文化”研究传统置于一边(Gelder & Thornton,1997;Hall & Jefferson, 1976;Hebdige,1979;McRobbie,1981,1994),对体育运动的研究正在迅速发展成为一个有其自身指向的跨学科领域(Martin & Miller,1999;Morse,1983;Rowe, 1995;Whannel,1992),如同对科学文化的研究(Haraway,1989,1991;Ross,1996),以及对电脑空间和“技术文化”的研究(Aronowitz, Martinsons, Menser, & Rich, 1996;Benedikt,1991;Penley & Ross,1991;Turkle,1984);关于政治文化的日益增长的研究文献,正在形成另外一个研究领域(Berlant,1997;Chua,1995;Clarke, 1991; Feuert, 1995; Grossberg, 1992; Hall, 1988; Massumi, 1996; Morris, 1998a; Street,1997)。

与此同时,对美学形式的“精细”(即,详尽而仔细)研究没有被放弃;相反,它被包含在研究对象之中的符号语言学“环境”扩充和丰富起来。例如,米伦凯姆普(Mellencamp,1992)扩展了对电影、媒体事件和电视情景剧的细腻的解读,以把握“灾难、丑闻、年龄和戏剧”之间的关系,在美国媒介文化之中这些关系围绕着女性被社会经济性地组织起来;布朗宁(Browning,1995)利用她舞蹈家所具有的肢体形式的语言知识,记录了巴西舞蹈文化的社会历史及其政治和宗教价值;而科林斯(Collins,1995)的案例研究通过几个视觉性和表演性的媒体,以展示艺术和文化史的这些素材如何在信息技术的大量本土化利用过程中发生改变的,在媒体“泛滥”的经济之中这些素材是到处扩散而不是趋于消失。

简而言之,文化研究不是孤立地研究一个单一的文本,“作者”、产业、技术或者程序化的模式,而是倾向于强调循环在不同媒体之间以及社会生活的其他时间和空间之中的问题或者缺憾。为了做到这点,有些研究以多种视角检视一个广泛分布的媒体事件(Dayan & Katz,1992;Wark,1994)或一个广为人知的媒体形象,这一事实促成了将该领域视为“麦当娜研究”的闹剧(Benson & Metz,1999)。当然,还有巴比(Barbie)的研究(Rand,1995),戴安娜(Diana)研究(Re:Public, 1997)和埃尔维斯(Elvis)研究(Rodman,1996),更不用提及“海湾战争”研究(Kellner, 1992)和“疯牛病研究”(McCalman, 1998)。然而,正如默里森(Morrison,1992)的研究文集《安尼塔山》(*Anita Hill*)所详细揭示的,这类工作大多数并非是对这个或者那个流行事件进行故作羞涩的集中卖弄,而是一种批判性的媒体研究,这种研究作为一股力量,不仅遵照现存的社会冲突、欲望和权力关系行事,而且还持续性地帮助生产这些事件,有时还会将其改变。这一观点把

关于所谓的暂时性的流行事件的严肃研究和产生于近年的关于艾滋病全国流行的政治的重大工作联系起来(Crimp,1987,1990;Erni,1994;Patton,1992,1994),而且甚至和生态危机和斗争的"文化研究"联系起来(Berland,1994;Jagtenberg & McKie,1997;Langton,1998;Ross,1991,1994;Slack & White,1992)。

文化研究有时候产生超出学术圈子和跨越国界的论战,本身也间或制造了媒体事件。在1990年代早期的一阵关于美国学术界"政治正确性"的忙乱之后,《社会文本》(*Social Text*)杂志对"科学争端"问题的攻讦(Ross,1996;参见Michael,1996;Nakayama,1997;Slack & Semati,1997)是近期最广为人知的例子。这些机会有效地推动学术界向非学术界的听众澄清他们的工作(Berube,1994;Gates,1992;Lumby,1997;Morris,1997b;Wark,1999)。然而,除了鼓励自我保护,由于"话语之争"得以发生的更为广阔的背景,媒体圈对于"文化研究的形象"的争论还涉及利益问题(Perera,1993)。皮若拉(Perera,1993)分析了1991年澳大利亚和马来西亚之间的一场重要的外交争端,这场争端起源于一家澳大利亚电视台播放了一场题为《大使馆》(虚构了一个"亚洲国家",但明显类似马来西亚)的连续剧;她认为电视节目本身立刻充当了争论的"中介和对象";媒体扮演了一个活跃的角色,将这一事件和其他事件联系起来,她指出类似的危机质疑了"文化地位和权威,而这种文化地位和权威在许多全球性的话语领域都需要进行澄清"(在这种情况下,海湾战争、鲁斯迪事件和后现代主义),但也必须将冲突放置到"世界性的和历史性的框架"之内进行理解(pp. 19-21)。

社群之间,以及跨社群边界的"话语之争"日益增长,部分是因为新通讯技术使越来越多的人能够接收和比较不同地方性的、区域性的、民族性和"全球性"的话语,这些话语涉及他们自身或他人的生活——有些时候这些话语不同于他们亲眼所见的东西。然而,这并不必然会发展成为普遍性、完全意义上的"全球文化"。相反,技术变迁(及其成本和收益的分配)因其所发生的环境的差异而具有截然不同的后果。例如,在一些国家,国家空间或话语网络的新颖性和持续性超过了"国际性"媒介产品的影响(比如,美国);奥里根(O'Regan,1993)论证道,在澳大利亚,直到1980年代引入卫星网络之后,随着联邦播放管制和媒体市场的变革,在以往具有很强地区性的媒体系统中,才开始强调"空间捆绑"和国家化。他认为,其中的悖论是,这种强调实际上将关于自我、政治和身份的"去情景化"思考方式置于优先地位,与此同时,却逐渐培养了一种更具国家性和国际性的理念;它既肯定却又否定了国家边界和区域自治,同时又鼓励"信息通道"的进一步发展(关于这些观点,也可参见Berland,1992;Carey,1989)。

这些相互矛盾的趋势,有助于解释关于权力、财产和表达的公共辩论是如何日趋激烈的;谁拥有,谁应该拥有权力,这种权力代表了谁的意志,是如何表达的,是在什么条件下表达的?如果新的国家性的基本架构,实际上仅仅如同地方性的、区域性和全球性的信息流一样,对文化和政治边界进行重新划分,那么,对图像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环节进行控制这一复杂的问题,即和整个政治、经济、法律和外交范围内的事务纠缠在一起,而后面这些事务在社群和社群之间,以及不

同政治体系之中存在差异(Birch,1994;Chua,1995;Gaines,1992;Im,1998;Kang,1999;Ma,1999;Wark,1994)。与此同时,“涉及其他文化的有哪些话语,特别是在这些话语能被其他文化之中的成员见到的时候”(Chow,1991,p. 19)这一问题在政府、学院和媒介议程之间循环,而促使这一问题得以循环的技术性和地缘经济性的条件,恰恰使来自于既有体制之中的任何确定性的控制都成为不可能。在该背景下,“现代青年”和“儿童”是媒介不可控性的受害者和障碍这一历史性的、沉重的焦虑,将变得更为强烈(Davis,1997;Grossberg,1992;Jenkins,1998;Johnson,1993;Kim,1998;Stratton,1992)。

这些发展已经形成了文化研究的两股主要潮流。其中一股主要是历史性的,它研究过去的“话语之争”,而这些争论的起源、合法化、复杂化的过程各不相同,有时候甚至挑战殖民统治、国家政权建设计划,和/或特定社会形态之中的“国内的”、日常性的种族、阶级和性别分工(Chun,1994;Dyer,1997;Lort,1993;McClintick,1995;Spigel,1992;Stam,1997;Tomaselli & Mpofu,1997);一项紧密相关的工作的主体,则如海利(Healy,1997)所说,博物馆的“记忆工作”是现代公共文化教育的有效形式(Bennett,1995;Crimp,1995;Dibley,1997;Marrie,1989)。第二股主要潮流则集中关注媒体现在和将来的多元化和网络化的“公共文化”,探讨其中呈现出来的主体性、公民权责、民主和社群的新的实践(Gilbert,Glover,Kapal,Taylor,& Wheeler,1999;Hartley,1996;Hawkins,1999;Lumby,1999;McGuigan,1996;Miller,1998;Moon & Davidson,1995;Morris & McCalman,1999;Robbins,1993a;Wallace,1990)。在实践之中,与我们所预期的“文化史”和“媒体研究”之间的显著区别相比,这两股潮流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哈特里(Hartley,1996)关于现代性之中的新闻的研究是关于“流行性真实”的学术史,也是“后现代公共领域”的鲜明宣言;托夫茨(Darren Tofts)描绘了电脑文化的史前史,并探讨了其与更为古老的“记忆交换”形式的连续性(Tofts & McKeitch,1998);而艾普特(Apter,1999)历史性地分析了“虚拟的”公民权责对于生活在由法国殖民主义形成的“国家”领土上的人们的含义。

旅游研究也许可以最好地描述族群和“象征”之间的复杂联系,这种联系关注政治和经济斗争,引发了文化研究的实践者的兴趣。对许多地方性和区域性的经济体来说,旅游业的影响范围和重要性迅速扩大,关于其社会成本和生态影响的争论也日益激烈(Craik,1991;Lanfant,Allcock,& Bruner,1995)。这一背景下的一个重要影响即来自于本地居民要直接面对世界范围的成本和后果(Chiu,1995;Palmer,1998;Teaiwa,1999)。在澳大利亚历史上,作为移民社会的技术实践、“建国”实验和种族灭绝宣传方案的目标(Mickler,1998),土著群体曾经使用媒体发动一场他们自己的话语“战争”,以保护他们自己的语言和生活方式(Michaels,1986,1994),通过发展他们自己的手工艺和旅游事业来增强自身的经济独立性(Healy,1999;Johnson,1994),通过对政府施加压力以使其处于窘迫之中,从而树立“信用”,教育公众并对土著形象进行更多的控制(Johnson,1996),通过这些手段,推进他们的政治斗争,以使他们能在国际背景,以及在地方和全

国范围内能够自决(Bennett & Blundell,1995;Fourmile,1989;Langton,1993;Meadows,1996)。

虽然关于这种“符号”政治的实际效果常常存在争论,土著媒体的行动至少对澳大利亚公众所讨论的许多语汇进行了挑战(而且我们将证明,进行了改变),这些语汇包括种族、殖民主义、文化价值、国家认同和历史、土地所有权,以及环境伦理——也就是说,他们有效地影响了我们的政治和智识生活(Muecke,1992)。此外,类似的情况还有围绕妇女形象而进行的女权主义斗争,以及移民团体试图改变盎格鲁—凯尔特式的澳大利亚的表达“规范”的努力。在这种背景下,它不仅仅是文化研究的一个设想,即人们能够争夺和改变媒体社会之中文化产业所传播的意义,而且,它可能是这个领域最著名的主张(Ang,1985;Chambers,1986;Hall & Jefferson,1976;Hebdige,1979;Fiske,1989a,1989b;Jenkins,1992)。相反,人们实际上如此做这一事实,即是当代政治的产物,也是社会环境的决定性因素之一,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文化研究得以实践。

概念和方法

莫斯(Mauss,1970)在其关于礼物的论文的开头写道:

> 在这些“早期”社会中,社会现象不是孤立的,每一现象都包含了组成社会结构的所有要件。在这些总体性的社会现象之中,如同我们计划给予它们如此称呼,各种制度都在寻求同时性的表达:宗教的、法律的、道德的和经济的。除此之外,该现象有自身的审美样式,而且它们展示了形态上的类型(p.1)。

对于文化研究而言,我们认为,社会关系的类似之处被认为集中于复杂的现代社会之中的关键要素(pressure points)之上,而不是出现在莫斯所谓的“古代”社会结构的微观表达之中。更为重要的是,社会关系通过这些关键性要素呈离散状分布,这构成它们的复杂性,但是没有展现一个社会的整体性。文化研究没有使用“整体的社会现象”这一词汇,相应的概念可能是“场域”(截然不同的决策和指示的交汇点和交流点),尽管“事件”(片刻的实践,具有多种明确的时间和社会轨迹)的概念取代了“表达”的概念。

这样,大型购物中心——举一个老套而重要的例子——并不是一个可供透视某一时代或者文化的组织状况的典型(它不是后现代状况或者消费资本主义的象征或者本质),它是许多异质性的事件得以发生的场所,也是诸多异质性的社会关系得以终结的场所。当然,它是商品生产和运输的众多链条的末端,也是将其与消费者联结起来的市场体系的终端(还是金融结构的终端,而这种金融结构是以上诸环节的基础)。这些环节既是区域性和全国性流通的一个部分,也从属于世界的流通环节(超市的“美食”走廊或熟食货架,都使资本主义市场的全球性本质清晰可见,与此同时,也唤醒了对于其发展历史的记忆,无论生产部门是

否在其覆盖的范围内充分本地化;在每一个案例之中,包装和表达的形式——例如“奇异的”或者“新鲜的”——都承载着特定意识形态和特定的审美策略)。从另外一个维度上说,购物中心是一种建筑结构,依照某一国际性的模版加以设计(锁定一个或两个大型商店确立大的格局,作为配套的有专门的停车场和步行交通体系,还有由专卖店、服务和设施等进行的组合),它构成了(或者未能构成)社区特定的存在和形象,按照设计好的方式运行,以展示与工作相伴随而来的报酬和欢乐(或者,也没有达到这个目的)。它依据男性和女性对空间的不同反应,同时也按照成人、儿童和年轻人对空间的反应来设定标准化的区分手段。当然,它也十分明确地区分富裕的客户(正是这一社区的主人)和那些不受欢迎的人(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如学龄儿童,还可能得到接受;其他人,如流浪汉和醉鬼,是不会被接受的)。购物中心的审美组织,取决于欲望的满足,以及身体在空间之中的组织,它是一种世俗性的、得到精心设计的空间强制形式。

然而,它也是一种被投入实际使用的空间,是一种被转向终端的空间,后者是建筑师、管理者和门卫所无法预见的。这或许是文化研究最为熟悉的一个课题:结构往往是使用过程之中的一种建构,其用途没有包含在事先的预见之中。购物中心的表达空间是一种冲突性的空间,其意义是通过迥然不同的想象和需求得以逐渐规划和设计出来的。这就意味着一种确定性的自由,一种或许仅仅在上述复杂的相互作用约束之下的功能。但是,在明白了自由的表象是如何可能的这一问题自身不过是一个权力阴谋以后,文化研究的评论可望谨慎地将任何先验的价值强加于这种使用公共空间的能力之中。

为了了解隐藏在类似于购物中心这样复杂场所之中的独特结构,理论家(因为这从来就不仅仅是一项描述性的活动)愿意,或者必然,利用来自于许多学科的理论,或者跨越许多学科——而这些跨学科或者“多视角”(Kellner,1997)的方法,概括了文化研究的工作方法的特点。这些学科视角包括如下:

- 形式迥然不同的经济理论;与购物中心管理、商品供给和需求、雇佣的区域性模式相关的一些技术性的方法;关于商品生产和流通的更为理论化的论述。
- 美学理论,特别是与建筑紧密关联,同时也和广告和展览紧密联系的理论;音乐学理论,或者社会音乐学理论,如关于莫扎特的作品或关于其现场表演的讨论;讨论美学和经济学之间的相互关系的高水平论文。
- 政治理论,既包括一种与规划许可证,以及财产价值争端相关的“常规”形式,也包括一种微观的理论,关注空间之中的身体政治。这些首先利用了法律和城镇规划的理论,随后是福柯式的关于对肉身进行规训的论述,或者是象征互动论,或者常人方法学,或者是城市地理学。
- 性别理论(其自身即为一个混合型的理论),分析性别关系是如何根据神话式的空间结构、不同性别的消费欲望、雇佣结构以及是否提供儿童保健等因素组织起来的。
- 人种学理论,以研究对于购物中心加以利用和进行反馈的独特性,理解其

生动的经验。

- 历史理论,可能讨论消费组织的变迁,也许分析从以"后现代"或者"后福特主义"为中心的消费到再组织化的资本主义体系的变迁,或者分析共同体和公共领域的组织模式的变迁,并将其理论化。
- 或许是更为专门的一种文化研究理论,它将购物中心作为一种错综复杂的文本结构进行理解,将购物理解成流行文化的一种形式,这种流行文化与其他文化形式,以及构成"生活方式"的话语和实践状况直接关联。

对上述学科的应用起主导作用的可能是政策话语,这种话语可能服务于购物中心的管理者和投资者,或者地方政府,也可能是对购物中心如何改变共同体的结构形式这一问题有兴趣的社群。最终,人们可能综合利用社会学、符号语言学和哲学来讨论这些使分析能得到明确阐述的立场——将评论家划分成参与者和观察者,实践者和反思性知识分子,并对这种非稳定的二元性进行调和,而这种调和正是在人们所占有的文化资本带来的特权,以及所掌握的致使这种反思性成为可能的学科制度形式所赋予的特权基础上得以进行的,或许正是这种"自我定位"和限制性的分析时机,极为清晰地将文化研究工作与文化研究的实践者所采用的其他分析模式区分开来。不同于社会科学之中的诸多实证主义分析,文化研究倾向于向其研究对象加入一种批判性的说明,这种说明与文化研究过程自身所激发出来的问题相关——同时加入一种关于制度框架和学科规则的批判性的说明,正是在这一过程之中文化研究的规则得以形成。与此同时,文化研究并不是一种充斥着制造一幅详尽知识地图梦想的"多学科"形式,它没有包容先验性的空间(这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的整体化形式),正是在这种先验空间之中知识可以得到综合化,并获得一种"普遍性的"理论(Deutsche,1996;Morris,1992)。

相反,文化研究包括了一种偏爱(在这一术语的两个层面的意义之上),它毫不隐瞒其非全面性,因而它是党派性的,坚持知识所具有的政治性。由于这一原因,在社会功能方面富于变化,甚至有时候相互冲突的批判实践的"分裂",在文化研究领域,没有引发知识异化的讨论。虽然,关于智识工作的政治在文化研究之中并没有达成共识,没有被设想成为"一个整体",我们还是要论证,文化研究的智识蓝图常常在一定程度上被标记上了社会关怀的印记(T. Bennett,1998b;Frow,1995;hooks,1990;Robbins,1993b;Ross,1989)。

关于虚构对象(购物中心)的讨论,不仅指出了文化研究的工作方法,还阐明了其基本原理。文化研究通常以一种看似古怪的方法进行,从独特性、细节、常规性的细枝末叶,或者大家习以为常的事实着手,再进一步揭示关系的复杂性,以及多重社会领域之中的复杂性,而正是这些领域使这些独特性得以呈现出来。购物中心是由一系列多样而相互重叠的系统(经济学的、美学的、人口统计学的、管理学的以及空间的系统,等等)组织而成,它是许多完全不同的学科的对象,并且这些学科之中没有任何一个与其研究对象有特殊的关系,这就是说,它受制于不同类型的解读版本,也不存在一种总体性的原则,可以将各种版本的解读形成

一个连贯的整体。按照解读版本进行研究,意味着不同知识体系所具有的特殊的解读版本,与具有该立场的使用者所采取的“通俗性”解读版本之间存在一种关系(解读版本和购物中心之中“要做的事情”联系在一起,而不是与解析实践相分离——然而,这种解析实践亦即其自身乐意而且有兴致“做的事情”)。这也是文化研究一个特有的步骤:一个相对化和民主化的步骤,试图确保讨论的目标不会和我们已经知道任何应该知道的事情的这一假设相互隔离,同时也确保每一学科与其他任何学科的关系都会被连续考虑到。

另一个讨论所有这些的方法,可能就是将其作为对于流派这一概念进行理解的一种方式。在文化研究的许多分析之中,学科和流派的混同与方法论的混乱有关,或许也和一些不安全感有关,这种不安全感源于文化研究作为一门学科的合法性,但是或许也和文化研究考虑其对象的方法相关,文化研究认为其对象是一种形式上的关系(一种网络性的关联),而不是一种实质上的关联。弗里德曼(Freadman,1992)论及此问题之时写道:

> 随着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专业化,我们将自身置于一种写作和阅读的风险之中,必须十分谨慎地采用一种仅仅只能称为单一性的“方法”……如果我是对的,可以将社会性条件极为精当地描述成为一种由异质性的一般性的实践所进行的占用和授权,那么,解释的单一化策略将总是错失良机(p.280)。

“社会性”概念包含了文化研究赋予文化概念的积极性、程序性的意义,这两者直接相关:它们都和意义结构的实践(而不是执行)有关——例如,类型和编码——也和既处于这种实践之外又和这种实践相交错的社会空间的构造有关(关于常人方法学对于这一社会空间的建构和维系的理解,这里有一个清晰的类比)。

文本概念被文化研究作为一个基础性范畴使用之时,具有确定的意义。然而,文本概念发生了变化,它并不是一个可以单方面建构意义的场所(著作、演出、电影,服装,等等),更不是一件单一的物品(一个“文本”),它起到了沟连各个方面的作用。如果购物中心是以文本性的模式加以构思的,那么这个“文本”就涉及了实践、制度结构以及它们所固有的复杂的中介形式,法律性的、政治性的、金融方面的状况,以及特殊的权力和知识流,还有特定的多层次的语义组织。与此同时,这种“文本”仅仅存在于内在文本的关系网络之中(可以说,这是一个建筑、社区结构和后现代空间的商业文化网络)。它是一个本体论意义上的混合性实体,在这里没有具有特殊地位的,或者“正确”的解读形式。正是这一因素,而不是其他因素,促使文化探究关注它所分析的文本性结构的接受者或者使用者的多样性——也就是说,是一种开放式的社会生活文本——因此,这也促使文化研究质疑其自身所进行的解读的权威性,或者终审性(Ang,1991,1996;Hay, Grossberg, & Wartella, 1996; hooks, 1992a; Morley, 1992; Morris, 1990; Stacey, 1994)。

文化研究与学科性

我们所讨论的文化概念,预告了文化研究的学科化——那就是将文化作为一系列相互争论和互相冲突的话语实践,它与社会团体的形成过程和再构过程具有紧密联系——取决于一种理论上的悖论,因为它假定了一种对立关系(在文化和社会之间,在表达和现实之间),这种对立关系是文化研究存在的条件,但是又是其必须竭力消解的对象。无论是取消这种对立关系,还是解决其紧张关系的努力遭到失败,都是文化研究工作的组成要素。如果话语溶入了真实(real)(如果人们认为这些话语仅仅是反映了,或者退一步说,或多或少准确地代表了事实,而事实却是独立存在的,与话语所反映的真实不一样),这将会使真实的文本性建构(作为叙事、愿望、复述)过程失去方向感。相反,如果真实仅仅是话语的加总("除了文本之外别无他物",正如漫画所讽刺的一样),那么文化研究事业将失去紧迫感。

然而,文化研究事业没有将认识论上的问题作为主要关注点,而是更多地关注社会过程,正是在这一个过程之中,真实的类型化和社会群体的类别化得以形成。在这里,社会这个词主要是在语言学和政治性的意义上使用,与权力关系纠缠在一起。福柯关于权力/知识的观点,为考察意义和社会关系之间的纠缠关系提供了一种有价值的思考方式(Burchell, Gordon, & Miller, 1991; Foucault, 1980; Frow, 1988; Morris & Patton, 1979)。此外,格莱姆西"清晰度(articulation)"概念发展(Grossberg, 1992; Hanczor, 1997; Laclau, 1977; Morley & Chen, 1996; Tormaselli & Mpofu, 1997),以及其他相关概念,都来源于阐释(enunciation)这一语言学概念(Chambers, 1998, 1999; Morse, 1998; O' Regan, 1992; Probyn, 1993)。

文化概念对于其他许多学科非常重要,最值得注意的也许是文化人类学和文化社会学。我们可能问,这一概念用于文化研究之时,其独特意义,或者不同的意义是什么?一种答案是,没有任何独特性;另外一种答案也可能是,文化研究不应该被认为是一门"学科"。也许是因为文化研究太年轻了,还没有形成作为一门学科所要求的边界。而且,文化研究的形成——虽然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来源于其对于学科性本身的反叛(T. Bennett, 1998a, 1998b; Nelson & Gaonkar, 1996; Striphas, 1998)。然而,文化研究者非常清楚其自身研究工作与其他研究领域工作之间的区别——"文化研究是什么并不重要"(S. Hall, 1992, p. 278)——而且,它也许可以有效地探讨本研究领域和其他领域之间的差异和重叠之处。

最明显的差异是研究对象。尽管,人类学是由其自身与"处于不同时代的他者"的关系加以界定的(Fabian, 1983)——他者同样是由一个迥然不同的时间结构里的社会文化性差异,特别是由所谓的社会组织方面的质的差异加以界定的——文化研究则将与自身所在社会之中的普通文化(这是两个含义非常丰富的词语,然而可以用其代表一种时间点)作为研究对象。当然,当代人类学也有一种类似的转向(Auge, 1995),但是,这往往——例如,关于乡村社区或者工人阶

级社区,或者无家可归者的民族志研究——将差异性持续性复制成为同一的结构,从而在本文化之中把握异域风情。文化研究有时候也陷入了这一陷阱,以此种方式对待亚文化,比如,将其作为主流文化之中的一种异类,或者具有破坏性的外来者,但是它在没有这种异国情趣化的资源的情况之下,推动对于文化组织的多样化形式的研究。

另外,在方法论取向上也存在差异。尽管文化研究采用了很多由民族志发展出来的进行田野观察和描述的技术(Ang,1985;Brunsdon & Morle,1978;Radway,1991;Skeggs,1997;Thomas,1999;Willis,1977),它对复杂的工业化社会的关注,意味着其他方法也可能是合适的。关于文化编码和实践的信息,除了通过与被调查者的讨论,或者参与观察以外,还可以通过其他途径获得(在很多案例之中,可以获得大量书面和电子版本的档案),有些时候,作者自身就是所研究的文化之中的成员。因而,文化研究往往大量使用文本分析技术,处理多种资料,采用更折衷的方法论,还要面对作者和所研究的文化之间更复杂的、有疑问的关系——也就是说,它是通过激化个人和政治距离以及个人和政治牵连之间的紧张状态的人类学问题的(Byrne,1995;Field,1991;Jackson,1998;M. Z. Rosaldo,1984;R. Rosaldo,1989;Stewart,1996;Taussig,1997)。

至于文化社会学,文化研究当然要吸收其所使用的统计调查技术(Bennett,Emmison & Frow,1999)。然而,文化研究更多关注文化的现实效果和形成过程,而能力、偏好和接近途径的分配问题常常是第二位关注的问题。但是,这两个学科之间差异越来越集中,而不是趋于分散化(Alasuutari,1995;Chaney,1994;Denzin,1992,1997;Long,1997),这也同样适用于文化研究和社会文化史之间的重叠关系(Davis,1983;Denning,1996;C. Hall,1992;Johnson,1993;Pickring,1997;Steedman,1986,1992a,1992b;Steinberg,1996),以及文化研究和文化地理学之间的关系(Duncan & Ley,1993;Fincher & Jacobs,1998;Jacobs,1996;Keith & Pile,1993;Massey,1994)。最终,人们可能发现,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交叉之处,而近些年来,后者已经将其研究对象重新界定,已经包括文本性(textuality)分析及文本性的社会关系史,而不仅仅是文学的文本和文本系统本身(Armstrong,1987;Barrell,1991;Brown,1996;Chambers,1999;Grewall,1996;Guillory,1993;Mignolo,1995;Radway,1997;Suleri,1992;Viswanathan,1989)。文化研究没有严格地拘泥于流行文化研究,而和民俗研究几乎没有什么共同点,包括对大众媒体研究的"民俗"取向,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没有必要。正如内尔森、特里彻勒、格罗斯伯格(Nelson,Treichler & Grossberg,1992)所写:

> 文化研究没有要求我们批判精英文化形式——或者仅仅追随布迪厄,简单地承认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形式之间的差别是其自身权力关系的产物。相反,文化研究要求我们识别特定实践的运作过程,并探讨这些实践是如何连续性地划定正统文化和流行文化之间的界线,而在一定背景之下这些实践又产生了什么样的后果(p. 13)。

文化研究关心的是关系系统的构造和运行,而不是由这些过程所形成的范

围。因此,文化研究一个特别的关注点是(它和许多后结构主义思想有许多共同之处):关注边界和限制,尤其是关注这些界线的模糊性,以及随之而来的流派和学科的混杂性。例如,哈特里(Hartley,1992b)指出,可能“混杂性不是一个问题,而是文化研究的一个基本规范”(p. 102),而他给一个国际电视评论提供的辩护理由是,除非是通过关系性的术语,否则,无论是电视还是国家都难以得到理解。奥里根(O'Regan,1992)将文化批评和文化政策都视为“可渗透性系统”,从而重新表述了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问题。而格雷斯(Grace,1993)考察了文化经营“高度商业化”过程之中产生的价值和效用、艺术和商业、美学和逻辑、“游戏”和“战争”之间越来越不确定的关系。

这一关注的后果,并不是要将分析溶入全方位的描述(将“文化研究”视为“研究文化”),而是将关于文本性/文化性网络的描述,与促使这种描述成为可能的表述立场之间的关系置于显著位置(Hartley,1999)。这又重新变成了一个表达性(这与类别结构对于文本性的组织和启动有关)和政治性(这与文本性的社会关系有关——也就是说,关系到言说者以及他们的话语结构所承载的某一社会身份和权威的相对地位)的问题。之前,则是基于对具体场景和特定事例的兴趣,在这些场景和事例当中,权威和作者身份问题之间的冲突已经得到缓解(或者没有缓解)和处理(或没有处理)。这些并没有对明确关注跨文化冲突和后殖民斗争的研究形成限制,如,沃克(Wark,1993)在关于 Midnight Oil 乐队的论文之中,考虑到了流行媒体文化之中的权威政治;而钱伯斯(Chambers,1998)阅读了三部艾滋病日记(写于法国、美国和澳大利亚),此后与作者们所共同认同的“问题性的幸免于难者”观点达成了妥协,这些作者的主题是他们本人的死亡过程与结果,而读者的阅读行动则成为某种形式的悼念。文化研究的自我定位性的动力,也使出现在特定项目过程之中的知识分子的权威和身份问题成为一个显著问题。文化研究之中的诸多工作,和其他形式的定性研究一样,都对运用对话、合作和合成的写作和研究模式,以及在学术界和他们所工作的社群之间培育更为开放的关系有着浓厚兴趣(Frankenberg, 1993; Johnson, 1990; Langton, 1993; McRobbie,1999;Muecke,1997;Owusu,1999;Ross,1997)。

系谱和潜力

近几年来,许许多多批判式的论述开始清理文化研究的成就和困难,其中的一些研究提供了文化研究之中出现的“系谱”,将其视为一个严肃的学术领域(T. Bennett, 1998b; Brantlinger, 1990; Clarke, 1991; Crimp, 1999; Ferguson & Golding,1997; Gilroy, 1987; Grossberg, 1997a; S. Hall, 1992; Harris, 1992; Rodman, 1997;Williams,1989)。从某些意义上讲,系谱是对智识工作的误导,它们用于研究个人性行为:它们没有教育我们往何处去,应该去哪里,或者是试图要去的地方。然而,文化研究最为著名的不列颠系谱并非如上所说那么无足轻重,这是因

为,它接连不断地提供着有效的分析模式,以至于其他研究计划不用界定他们的研究渊源和关注点(McNeil,1998;Tomaselli,1998b;Wright,1998)。这一影响深远的"不列颠文化研究"事业形成于1950年代,被认为是对公与私、主与次、"宏大"和"日常生活"的等级差别的挑战,在那个时代这些差别统治着英国的文化领域(和英国的学术教育界;Bennett,1993)①。随着1964年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在这里,关于亚文化的研究以及关于种族与性别政治的研究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早期开始引人注目)的成立,不列颠文化研究在文化理论之中坚持发展了能动性概念,将其作为一个新兴研究计划。这意味着,不是要研究人们是如何被动地继承文化,而是要研究我们是怎么应对我们在日常生活("实践")之中遭遇并使用到的文化产品,以及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制造了什么"文化"。受后结构主义解读理论和经验主义受众研究的影响,这一转向导致了对于流行文化的重新定义,流行文化不再被界定为美学实践的某一"层次"("低层的"),而是被界定为一个社会"论辩区域",按照霍尔(Hall,1981)的著名论断——这是一个不同兴趣争夺霸权的舞台(Hall,Critcher,Jefferson,Clarke & Roberts,1979)。

这种对能动性和论辩性的强调,得到了当今世界大部分文化研究的认同。然而,我们认为,其他系谱和其他形式的智识实践,至少对这一领域的发展形成了重要影响。加拿大思想家哈罗德·伊尼斯(Harold Innis)关于技术、帝国主义和空间(Berland,1997a,1997b;Kroker,1984),美国思想家卡里(Carey,1989)关于空间和通讯(Munson & Warren,1997)的先驱性工作,已经对将场所(place)研究和文化史关于媒体和文化政策的研究的结合产生了影响(Bennett,1992,1998b;Meadows,1996;O'Regan,1993)。福柯的两部著作具有特别大的影响:与其他可资利用的以语言和文本为中心的话语理论相比,《知识考古学》(*Archaeology and Knowledge*,1972)开创了一个更具有延展性和更为制度化的话语分析模式;《性史》(*History of Sexuality*,1978)第一卷就社会权力,以及性的概念重建方法,展示了一幅复杂的微观社会学图景。勒菲弗(Lefebvre,1971/1984)和德塞图(de Certeau,1984)的作品,也探讨了将日常生活的结构和实践加以理论化的文化研究方法;而布迪厄的文化社会学则针对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遗留下来的文化和社会传统进行了强烈的反驳。

纳入这一新兴学术领域的清单可以被不断地扩充,也许由于文化研究是新领域这一标签,缺乏确定的方法论和得到明确界定的对象,它在试图界定其自身的特殊性时,综合而且积极地利用众多理论资源。现象学和常人方法学的影响,

---

① 根据通常的叙述,这个挑战来自于学者所形成的"学问性的"一代,如特纳(Turner,1996)指出,这来源于"战后英国受教育机会的增加,以及成人教育的扩展,而这些正是战后重建的一种方式和福利国家的一种手段"(p.44;Steele,1997)。劳工阶级的子弟,如豪格加特(Hoggart,1957)和威廉姆斯,将其任务理解为推广普通大众的文化,反对高文化的英国精英主义所具有的规范性价值观。后者培育了对前工业化英国民间文化的乡愁,而新知识分子则考察并确认了产业工人阶级的流行文化。但是,正如特纳所指出,这个教育现代化的阶段也恰好是战后"工业"性大众文化扩张的阶段——这些文化大多源于美国,或者受美国启发。早期对发展的批判性反应是模糊的和否定性的。嵌入在"民间"和"大众"之间的"流行"文化,成为了不稳定且富有争议的研究对象(Frow,1995;Grossberg,1997c;Hall,1981;Miller & McHoul,1999)。

当然也体现在它拒绝给予“专业”读者以诠释特权，以及其对于日常生活的经验维度的关注。格拉姆西式的将文化理解为论辩场所的观点，近年来已经越来越多地受到了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影响。

而女权主义者对日常性的和“个人性”生活政治的理解，如同任何单个的知识分子的影响一样，具有根本性和长久性。关于文化（以及文化理论）的批判，对1970年代早期妇女解放运动的“第二波”是至关重要的。虽然要概括这一个复杂且多样化的社会运动对于文化研究的“影响”十分困难，我们可以指出女权主义这一潮流影响之下的两个后果。其中的一个趋势是，将“自我（self）”视为是社会性的创造，而不是个人性表达的简单反映。例如，许多女权主义者往往将“个人性即政治性”的口号理解为，必须将国家的资源夺取过来，促使女性拥有更多机会掌握社会财富和权力，从而改变其生活，增进其利益。文化政策领域的工作则可以从女权主义以往的巨大成功之中找到先例（尽管它并不总是这样）。另外一个趋势是，假定日常性政治不仅要面对阶级、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以及性和性别的运作，而且还涉及它们对于智力生活和教育的影响。科索伊斯（Curthoys，1988）在1970年即主张，我们“必须分析为什么公共生活已经被认为是历史的焦点，为什么公共生活完全被男性所占据”（p.4）。而现在，文化研究则在更为广阔的范围之内继续这一质疑，它既是对教育的一种批评，又是一种教育学试验（Giroux & Shannon，1997；Luke，1996；McCarthy & Crichlow，1993；Striphas，1998）。

这里要指出的是，文化研究不仅是对过去三十多年的政治和社会运动的一个反应，还从这些运动之中衍生出了许多主题，其研究前沿，其论辩方法，在某种程度上，其理论侧重点和具有特色的工作方法，都来源于对那些运动的考察。由于这一原因，在我们看来最具有创新性的工作，依然将兴趣集中于把握特定形式符号行动的意义和特定时刻文化实践的后果——该领域的实验“系谱”有时候可以帮助我们明白这些意义和后果——而不是提供一个案例以反驳相对陈旧的文化理论。文化研究（正如我们所见）并没有敌视“理论”；理论工作也可以被视为一种文化实践形式。在这一全新领域之中出现的，仅仅是一场理论上的争论——这场争论发生在人文主义和形式主义、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和新历史主义之间——常常可以通过某种严格意义上的混合而在实践之中加以解决（Deutsche，1996；Grace，1993；Nightingale，1996；O'Regan，1996）。

我们试图指出，近年以来一个类似的趋势是“学科性”争论的强化，这些争论发生在“文本主义”和民族志的拥护者之间（Ang，1996；Hartley，1992a，1998；Morley，1998；Murdock，1995，1997），以及政治经济学和“诠释性”文化研究之间（Garnham，1995a，1995b；Gibson-Graham，1996；Grossberg，1995）。虽然这些争论对于巩固其领域是多么有效和多么必要，其未来的方向或许会更为直接地取决于实验式经验主义，例如，普罗比因（Probyn，1998，1999a）关于食品、时尚和农业经济的著作；陈（Chen，待出版）关于“KTV”流行于整个台北市的政治—历史性图解；或者埃姆伯利（Emberley，1998）关于毛皮贸易的文化政治研究。这些经验主义研究项目，非但没有“反理论”，还反映了学科性的区隔和融合这一复杂的问

题,以明确阐明他们的目标。

在这一点上,它们都必须从近来关于文化这一普遍性概念的"理论性"批判实践之中进行学习和思考(Grossberg,1998b;Massumi,1996,1997;Readings,1996;Spivak,1993)。在本章开头,我们讨论了新自由主义对于学术界以及更为广阔的社会和经济生活的影响,这些批评则已经开始再次挑战文化研究自身的基础范畴和制度构造——或许,还有文化研究实践的必要条件。无论"文化"的未来如何,毫无疑问,无论是对于经验主义研究的承诺,还是对于"研究"本身所处的社会和政治框架的不断质疑,都将继续是不可缺少的。对一个如此密切关注媒体社会之中"艺术"和"日常生活"之间的不确定边界的领域而言,这一领域还关注"流行文化"影响实践、塑造现代公民梦想的多样化方式,关注制度性知识、欲望对于其研究目标的冲击,关注当代文化经济之中故事与空间、事件和场域、"历史制造"和"发生"之间的复杂而又具有广泛牵连的关系。

参考文献

Abbas, A. (1997). *Hong Kong: Culture and the politics of disappearanc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Agamben, G. (1993). *The coming community* (M. Hardt, Tran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Alasuutari, P. (1995). *Researching culture: Qualitative method and cultural studies.* London: Sage.

Alessandrini, A. C. (Ed.). (1999). *Frantz Fanon: Critical perspectives.* New York: Routledge.

Allen, R. C. (Ed.). (1987). *Channels of discourse: Television and contemporary criticism.*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Allor, M. (1997). Locating cultural activity: The "Main" as chronotope and heterotopia. *Topia*, 1, 42-54.

Ang, I. (1985). *Watching* Dallas: *Soap opera and the melodramatic imagination.* London: Methuen.

Ang, I. (1991). *Desperately seeking the audience.* London: Routledge.

Ang, I. (1996). *Living room wars: Rethinking media audiences for a postmodern world.* London: Routledge.

Ang, I. (1999). On not speaking Chinese: Postmodern ethnicity and the politics of diaspora. In M. Shiach (Ed.), *Feminism and cultural studies* (pp. 540-564).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nzaldúa, G. (1987). *Borderlands/la frontera: The new mestiza.* San Francisco: Aunt Lute.

Appadurai, A. (1996). *Modernity at larg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globalizati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Appiah, K. A. (1992). *In my father's house: Africa in the philosophy of cul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pter, E. (1999). *Continental drift: From national characters to virtual subject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Armstrong, N. (1987). *Desire and domestic fiction: A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novel.*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rndt, H. W., & Hill, H. (Eds.). (1999). *Southeast Asia's economic crisis: Origins, lessons and the way forward.* Sydney: Allen & Unwin.

Aronowitz, S., Martinsons, B., Menser, M., & Rich, J. (Eds.). (1996). *Technoscience and cyber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Augé, M. (1995). *Non-places: Introduction to an anthropology of supermodernity* (J. Howe, Trans.). London: Verso.

Baker, H. A., Jr., Diawara, M., & Lindeborg, R. H. (Eds.). (1996). *Black British cultural studies: A read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Barrell, J. (1991). *The infection of Thomas de Quincey: A psychopathology of imperialism.*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Bathrick, D. (1992). Cultural studies. In J. Gibaldi (Ed.), *Introduction to scholarship in moder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pp. 320-340). New York: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Benedikt, M. (Ed.). (1991). *Cyberspace: First steps.* Cambridge: MIT Press.

Bennett, D. (Ed.). (1998). *Multicultural states: Rethinking difference and identity.* London: Routledge.

Bennett, T. (1992). Putting policy into cultural studies. In L. Grossberg, C. Nelson, & P. A. Treichler (Eds.), *Cultural studies* (pp. 23-37). New York: Routledge.

Bennett, T. (1993). Coming out of English: A policy calculus for cultural studies. In K. K. Ruthven (Ed.), *Beyond the disciplines: The new humanities* (pp. 33-44). Canberra: Australian Academy of the Humanities.

Bennett, T. (1995). *The birth of the museum: History, theory, politics.* London: Routledge.

Bennett, T. (1998a). Cultural studies: A reluctant discipline. *Cultural Studies*, 12, 528-545.

Bennett, T. (1998b). *Culture: A reformer's science.* London/Sydney: Sage/Allen & Unwin.

Bennett, T., & Blundell, V. (Eds.). (1995). First peoples: Cultures, policies, politics [Special issue]. *Cultural Studies*, 9(1).

Bennett, T., Emmison, M., & Frow, J. (1999). *Accounting for tastes: Australian everyday cultur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ennett, T., Turner, G., & Volkerling, M. (Eds.). (1994). Post-colonial formations [Special issue]. *Culture and Policy*, 6(1).

Benson, C., & Metz, A. (Eds.). (1999). *The Madonna companion: Two decades of commentary.* New York: Schirmer.

Benterrak, K., Muecke, S., & Roe, P. (1996). *Reading the country* (Rev. ed.). Fremantle, Western Australia: Fremantle Arts Centre Press.

Berland, J. (1992). Angels dancing: Cultural technologies and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In L. Grossberg, C. Nelson, & P. A. Treichler (Eds.), *Cultural studies* (pp. 38-55). New York: Routledge.

Berland, J. (1994). On reading "the weather." *Cultural Studies*, 8, 99-114.

Berland, J. (1997a). Nationalism and the modernist legacy: Dialogues with Innis. *Culture and Policy*, 8(3), 9-39.

Berland, J. (1997b). Space at the margins: Colonial spatiality and critical theory after Innis. *Topia*, 1, 55-82.

Berlant, L. (1997). *The queen of America goes to Washington City: Essays on sex and citizenship.*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Berube, M. (1994). *Public access: Literary theory and American cultural politics.* London: Verso.

Bhabha, H. K. (Ed.). (1990). *Nation and narration.* London: Routledge.

Bhabha, H. K. (1994).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Birch, D. (Ed.). (1994). Cultural studies in the Asia Pacific [Special issue]. *Southeast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22(1-2).

Bourdieu, P. (1984).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R. Nice, Tran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Brantlinger, P. (1990). *Crusoe's footprints: Cultural studies in Britain and America.* New York: Routledge.

Brown, B. (1996). *The material unconscious: American amusement, Stephen Crane, and the economics of pla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Browning, B. (1995). *Samba: Resistance in motio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Brunsdon, C., &: Morley, D. (1978). *Everyday television: "Nationwide."* London: British Film Institute.

Buhle, P. (Ed.). (1986). *C. L. R. James: His life and work.* London: Allison & Busby.

Burchell, G., Gordon, C., & Miller, P. (1991). *The Foucault effect: Studies in governmentality.* London: Harvester Wheatsheaf.

Burns, R. (Ed.). (1995). *German cultural studies: An introd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utler, J. (1990).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New York: Routledge.

Butler, J. (1993). *Bodies that matter: On the discursive limits of "sex".* New York: Routledge.

Byrne, D. (1995). Intramuros' return. *UTS Review*, 1(2), 2-29.

Carby, H. (1996). White woman listen! In H. A. Baker, Jr., M. Diawara, & R. H. Lindeborg (Eds.), *Black British cultural studies: A reader* (pp. 223-239).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Reprinted from *The empire strikes back: Race and racism in seventies Britain*, pp. 212-235, by 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Ed., 1982, London: Hutchinson)

Carey, J. W. (1989). *Communication as culture: Essays on media and society.* Boston: Unwin Hyman.

Carey, J. W. (1995). Abolishing the old spirit world.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12(1), 82-88.

Carey, J. W. (1997). Reflections on the project of (American) cultural studies. In M. Ferguson & P. Golding (Eds.), *Cultural studies in question* (pp. 1-24). London: Sage.

Chabram-Dernersesian, A. (Ed.). (1999). Chicana/o Latina/o cultural studies: Transnational and transdisciplinary movements [Special issue]. *Cultural Studies*, 13 (2).

Chakrabarty, D. (in press). *Provincializing Euarope: Postcolonial thought and historical differenc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Chambers, I. (1986). *Popular culture: The metropolitan experience.* London: Methuen.

Chambers, I., & Curti, L. (Eds.). (1996). *The post-colonial question: Common skies, divided horizons.* London: Routledge.

Chambers, R. (1996). Cultural studies as a challenge to French studies. *Australian Journal of French Studies*, 33(2), 137-156.

Chambers, R. (1998). *Facing it: AIDS diaries and the death of the author.*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Chambers, R. (1999). *Literature.*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Chaney, D. (1994). *The cultural turn: Scene-setting essays on contemporary cultural history.* London: Routledge.

Chang, H.-H. (1998). Taiwan queer valentines. In K.-H. Chen (Ed.), *Trajectories: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pp. 283-298). London: Routledge.

Chen, K.-H. (1992). Voices from the outside: Towards a new internationalist localism. *Cultural Studies*, 6, 476-484.

Chen, K.-H. (1998a). Introduction: The decolonization question. In K.-H. Chen (Ed.), *Trajectories: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pp. 1-53). London: Routledge.

Chen, K.-H. (Ed.). (1998b). *Trajectories: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Chen, K.-H. (in press). The formation and consumption of KTV in Taiwan. In B.-H. Chua (Ed.), *Consumption in Asia: Lifestyle and identity.* London: Routledge.

Chiu, Y.-L. (1995). From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to an alternative cultural politics: On Taiwan primordial inhabitants' a-systemic movement. In R. Wilson & A. Dirlik (Eds.), *Asia/Pacific as space of cultural production* (pp. 120-144).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Cho, H. (1996). Feminist intervention in the rise of "Asian" discourse. In Asian Centre for Women's Studies, *The rise of feminist consciousness against the patriarchy* (pp. 144-170). Seoul: Ewha Woman's University.

Chow, R. (1991). *Woman and Chinese modernity: The politics of reading between West and East.*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Chow, R. (1993). *Writing diaspora: Tactics of intervention in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Chow, R. (1998a). *Ethics after idealism:*

Theory-culture-ethnicity-reading.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Chow, R. (Ed.). (1998b). Modern Chinese 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 in the age of theory: Reimagining a field [Special issue]. *Boundary 2*, 25(3).

Chua, B.-H. (1995). *Communitarian ideology and democracy in Singapore*. London: Routledge.

Chua, B.-H. (1998). Globalisation: Finding the appropriate words and levels. *Communal Plural*, 6(1), 117-124.

Chun, A. (1994). The culture industry as national enterprise: The politics of heritage in contemporary Taiwan. *Culture and Policy*, 6(1), 69-89.

Clarke, J. (1991). *New times and old enemies: Essays on cultural studies and America*. London: Harper Collins.

Clifford, J. (1988). *The predicament of culture: Twentieth-century ethnography, literature, and ar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lifford, J. (1997). *Routes: Travel and transl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lifford, J., & Marcus, G. E. (Eds.). (1986). *Writing cultur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Cohen, S. (1993). *Academia and the luster of capital*.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Collins, J. (1995). *Architectures of excess: Cultural life in the information age*. New York: Routledge.

Craik, J. (1991). *Resorting to tourism: Cultural policies for tourist development in Australia*. Sydney: Allen & Unwin.

Crimp, D. (Ed.). (1987). AIDS: Cultural analysis, cultural activism [Special issue]. *October*, 43.

Crimp, D. (with Rolston, A.). (1990). *AIDS demo graphics*. Seattle: Bay.

Crimp, D. (1995). *On the museum's ruins* (L. Lawler, Photog.). Cambridge: MIT Press.

Crimp, D. (1999). Getting the Warhol we deserve. *Social Text*, 59, 49-66.

Culture fills Aussie tills. (1990, October 11). *Daily Telegraph Mirror*.

Curthoys, A. (1988). *For and against feminism*. Sydney: Allen & Unwin.

Darien-Smith, K., Gunner, L., & Nuttall, S. (Eds.). (1996). *Text, theory, space: Land, literature and history in South Africa and Australia*. London: Routledge.

Davis, M. (1997). *Gangland: Cultural elites and the new generationalism*. Sydney: Allen & Unwin.

Davis, N. Z. (1983). *The return of Martin Guerr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Dayan, D., & Katz, E. (1992). *Media events: The live broadcasting of histo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de Certeau, M. (1984).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S. F. Rendall, Tran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de Lauretis, T. (Ed.). (1986). *Feminist studies/critical studie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de Lauretis, T. (Ed.). (1991). Queer theory: Lesbian and gay sexualities [Special issue]. *Differences*, 3(1).

Deleuze, G., & Guattari, F. (1987). *A thousand platea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B. Massumi, Tran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Denning, M. (1996). *The cultural front: The laboring of American cultur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Verso.

Dent, G. (Ed.). (1992). *Black popular culture*. Seattle: Bay.

Denzin, N. K. (1992).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and cultural studies*. Newbury Park, CA: Sage.

Denzin, N. K. (1997). *Interpretive ethnography: Ethnographic practices for the 21st century*. Thousand Oaks, CA: Sage.

Deutsche, R. (1996). *Evictions: Art and spatial politics*. Cambridge: MIT Press.

Dever, M. (Ed.). (1997). *Australia and Asia: Cultural transactions*. Richmond, UK: Curzon.

Diawara, M. (Ed.). (1993). *Black American cinema*. New York: Routledge.

Diawara, M. (1998). *In search of Afric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Dibley, B. (1997). Museum, nation, narration: The Museum of New Zealand—Te Papa Tongarewa "telling New Zealand's story." *Culture and Policy*, 8(3), 97-118.

Duncan, J., & Ley, D. (Eds.). (1993). *Place/culture/representation.* London: Routledge.

During, S. (Ed.). (1999). *The cultural studies reader* (2nd ed.). London: Routledge.

Dyer, R. (1997). *White.* London: Routledge.

Emberley, J. V. (1998).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fur.*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Erni, J. N. (1994). *Unstable frontiers: Technomedicine and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curing" AID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Fabian, J. (1983). *Time and the other: How anthropology makes its objec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Ferguson, M., & Golding, P. (Eds.). (1997). *Cultural studies in question.* London: Sage.

Feuer, J. (1995). *Seeing through the eighties: Television and Reaganism.*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Field, N. (1991). *In the realm of a dying emperor.* New York: Pantheon.

Fincher, R., & Jacobs, J. M. (Eds.). (1998). *Cities of difference.* New York: Guilford.

Fiske, J. (1989a). *Reading the popular.* Boston: Unwin Hyman.

Fiske, J. (1989b). *Understanding popular culture.* Boston: Unwin Hyman.

Forbes, J., & Kelly, M. (Eds.). (1996). *French cultural studies: An introd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orgacs, D., & Lumley, R. (Eds.). (1996). *Italian cultural studies: An introd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oucault, M. (1972).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A. M. Sheridan Smith, Trans.). London: Tavistock.

Foucault, M. (1978).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 1. An introduction* (R. Hurley, Trans.). New York: Random House.

Foucault, M. (1980). *Power/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2-1977 (C. Gordon, Ed.; L. Marshall, J. Mepham, & K. Soper, Trans.). New York: Pantheon.

Fourmile, H. (1989). Aboriginal heritage legislation and self-determination. *Australian-Canadian Studies*, 7(1-2), 45-61.

Frankenberg, R. (1993). *White women, race matters: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whitenes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Frankenberg, R. (Ed.). (1997). *Displacing whiteness: Essays in social and cultural criticism.*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Freadman, A. (1992). The vagabond arts. In *In the place of French: Essays in and around French studies in honour of Michael Spencer* (pp. 257-291). Mt. Nebo: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Boombana.

Fregoso, R. L., & Chabram, A. (Eds.). (1990). Chicana/o 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Special issue]. *Cultural Studies*, 4(3).

Friedberg, A. (1993). *Window shopping: Cinema and the postmoder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Frith, S. (1996a). Music and identity. In S. Hall & P. du Gay (Eds.), *Questions of cultural identity* (pp. 108-127). London: Sage.

Frith, S. (1996b). *Performing rites: The value of popular music.*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rith, S., Goodwin, A., & Grossberg, L. (Eds.). (1993). *Sound and vision: The music video reader.* London: Routledge.

Frow, J. (1988). Some versions of Foucault. *Meanjin*, 47(1-2), 144-156, 353-365.

Frow, J. (1995). *Cultural studies and cultural valu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row, J., & Morris, M. (Eds.). (1993). *Australian cultural studies: A reader.* Sydney/Chicago: Allen & Unwin/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Fuss, D. (1989). *Essentially speaking: Feminism, nature, and difference.* New York: Routledge.

Fuss, D. (Ed.). (1991). *Inside/out: Lesbian theories, gay theories.* New York: Routledge.

Gaines, J. (1992). *Contested culture: The image, the voice and the law.* London: British Film Institute.

García Canclini, N. (1993). *Transforming modernity: Popular culture in Mexico.*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García Canclini, N. (1995). *Hybrid cultures: Strategies for entering and leaving modernit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Garnaut, R. (1989). *Australia and the Northeast Asian ascendancy.* Canberra: Australian Government Publishing Service.

Garnham, N. (1995a). Political economy and cultural studies: Reconciliation or divorce?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12(1), 62-71.

Garnham, N. (1995b). Reply to Grossberg & Carey.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12(1), 95-100.

Gates, H. L., Jr. (1992). *Loose canons: Notes on the culture war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Gelder, K., & Thornton, S. (Eds.). (1997). *The subcultures reader.* London: Routledge.

Geraghty, C., & Lusted, D. (Eds.). (1998). *The television studies book.* London: Edward Arnold.

Gibbons, L. (1996). *Transformations in Irish culture.* Cork: Cork University Press.

Gibian, P. (Ed.). (1997). *Mass culture and everyday life.* New York: Routledge.

Gibson-Graham, J.-K. (1996). *The end of capitalism (as we knew it): A feminist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Cambridge, MA: Blackwell.

Gilbert, J., Glover, D., Kapal, C., Taylor, J. B., & Wheeler, W. (Eds.). (1999). Diana and democracy [Special issue]. *New Formations*, 36.

Gilroy, P. (1987). *There ain't no black in the Union Jack: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race and nation.* London: Hutchinson.

Gilroy, P. (1992). Cultural studies and ethnic absolutism. In L. Grossberg, C. Nelson, & P. A. Treichler (Eds.), *Cultural studies* (pp. 187-198). New York: Routledge.

Gilroy, P. (1993). *The Black Atlantic: Modernity and double consciousnes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Gilroy, P. (1996). British cultural studies and the pitfalls of identity. In H. A. Baker, Jr., M. Diawara, & R. H. Lindeborg (Eds.), *Black British cultural studies: A reader* (pp. 223-239).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Giroux, H., & Shannon, P. (Eds.). (1997). *Education and cultural studies: Toward a performative practice.* London: Routledge.

Grace, H. (1993). A house of games: Serious business and the aesthetics of logic. In J. Frow & M. Morris (Eds.), *Australian cultural studies: A reader* (pp. 69-85). Sydney/Chicago: Allen & Unwin/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Graham, H., & Labanyi, J. (Eeds.). (1996). *Spanish cultural studies: An introd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Grewal, I. (1996). *Home and harem: Nation, gender, empire, and the cultures of travel.*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Grewal, I., & Kaplan, C. (Eds.). (1994). *Scattered hegemonies: Postmodernity and transnational feminist practice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Grimshaw, A. (Ed.). (1992). *The C. L. R. James reader.* Oxford: Blackwell.

Grossberg, L. (1992). *We gotta get out of this place: Popular conservatism and postmodern culture.* New York: Routledge.

Grossberg, L. (1993). *Cultural studies: What's in a name?* [B. Aubrey Fisher Memorial Lecture]. Salt Lake City: University of Utah, 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

Grossberg, L. (1995). Cultural studies vs. political economy: Is anyone else bored with this debate?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12(1), 72-81.

Grossberg, L. (1996). Identity and cultural studies: Is that all there is? In S. Hall & P. du Gay (Eds.), *Questions of cultural identity* (pp. 87-107). London: Sage.

Grossberg, L. (1997a). *Bringing it all back home: Essays on cultural studies.*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Grossberg, L. (1997b). Cultural studies, modern logics, and theories of globalisation. In A.

McRobbie (Ed.), *Back to reality? Social experience and cultural studies* (pp. 7-35).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Grossberg, L. (1997c). *Dancing in spite of myself: Essays on popular culture.*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Grossberg, L. (1998a). The cultural studies' crossroads blues. *European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1, 64-82.

Grossberg, L. (1998b). The victory of culture: Part 1. Against the logic of mediation. *Angelaki*, 3(3), 3-29.

Grossberg, L. (1999). Speculations and articulations of globalization. *Polygraph*, 11, 11-48.

Grossberg, L., Nelson, C., & Treichler, P. A. (Eds.). (1992). *Cultural studies.* New York: Routledge.

Guha, R. (1997). *Dominance without hegemony: History and power in colonial Indi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Guillory, J. (1993). *Cultural capital: The problem of literary canon form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Hall, C. (1992). *White, male and middle-class: Explorations in feminism and history.* New York: Routledge.

Hall, S. (1981). Notes on deconstructing "the popular". In R. Samuel (Ed.), *People's history and socialist theory* (pp. 227-240).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Hall, S. (1988). *The hard road to renewal: Thatcherism and the crisis of the left.* London: Verso.

Hall, S. (1992). Cultural studies and its theoretical legacies. In L. Grossberg, C. Nelson, & P. A. Treichler (Eds.), *Cultural studies* (pp. 277-294). New York: Routledge.

Hall, S. (1996). New ethnicities. In D. Morley & K.-H. Chen (Eds.), *Stuart Hall: Critical dialogues in cultural studies* (pp. 441-449). New York: Routledge.

Hall, S., Critcher, C., Jefferson, T., Clarke, J., & Roberts, B. (1979). *Policing the crisis: Mugging, the state, and law and order.* London: Macmillan.

Hall, S., & du Gay, P. (Eds.). (1996). *Questions of cultural identity.* London: Sage.

Hall, S., & Jefferson, T. (1976). *Resistance through rituals: Youth subcultures in post-war Britain.* London: Hutchinson.

Hanczor, R. S. (1997). Articulation theory and public controversy: Taking sides over *NYPD blue*.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14(1), 1-30.

Haraway, D. J. (1989). *Primate visions: Gender, race, and nature in the world of modern science.* New York: Routledge.

Haraway, D. J. (1991). *Simians, cyborgs, and women: 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 New York: Routledge.

Hargreaves, A. G., & McKinney, M. (Eds.). (1997). *Post-colonial cultures in France.* London: Routledge.

Harris, D. (1992). *From class struggle to the politics of pleasure: The effects of Gramscianism on cultural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Hartley, J. (1992a). *The politics of pictures: The creation of the public in the age of popular media.* London: Routledge.

Hartley, J. (1992b). *Tele-ology: Studies in television.* London: Routledge.

Hartley, J. (1996). *Popular reality: Journalism, modernity, popular culture.* London: Edward Arnold.

Hartley, J. (1998). Housing television: Textual traditions in TV and cultural studies. In C. Geraghty & D. Lusted (Eds.), *The television studies book* (pp. 33-50). London: Edward Arnold.

Hartley, J. (1999). "Text" and "audience": One and the same? Methodological tensions in media research. *Textual Practice*, 13, 491-512.

Hartman, G. H. (1997). *The fateful question of cultu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Harvey, D. (1989).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An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change.* Oxford: Blackwell.

Hawkins, G. (1999). Public service broadcasting in Australia: Value and difference. In A. Calabrese & J. Burgelman (Eds.), *Communication, citizenship and social policy: Rethinking*

the welfare state (pp. 173-187). Boulder, CO: Rowman & Littlefield.

Hay, J., Grossberg, L., & Wartella, E. (Eds.). (1996). *The audience and its landscape.* Boulder, CO: Westview.

Hayward, P. (Ed.). (1998). *Sound alliances: Indigenous peoples, cultural politics and popular music in the Pacific.* London: Cassell.

Healy, C. (1997). *From the ruins of colonialism: History as social mem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ealy, C. (1999). White feet and black trails: Travelling cultures at the Lurujarri Trail. *Postcolonial Studies*, 2(1), 55-73.

Hebdige, D. (1979). *Subculture: The meaning of style.* London: Methuen.

Hebdige, D. (1988). *Hiding in the light: On images and things.* London: Routledge.

Hereniko, V., & Wilson, R. (Eds.). (in press). *Inside out: Literature, cultural politics, and identity in the new Pacific.* Boulder, CO: Rowman & Littlefield.

Hoggart, R. (1957). *The uses of literacy.* London: Chatto & Windus.

hooks, b. (1981). *Ain't I a woman: Black women and feminism.* Boston: South End.

hooks, b. (1990). *Yearning: Race, gender, and cultural politics.* Boston: South End.

hooks, b. (1992a). *Black looks: Race and representation.* Boston: South End.

hooks, b. (1992b). Representing whiteness in the black imagination. In L. Grossberg, C. Nelson, & P. A. Treichler (Eds.), *Cultural studies* (pp. 338-346). New York: Routledge.

Hull, G. T., Scott, P. B., & Smith, B. (Eds.). (1982). *All the women are white, all the blacks are men, but some of us are brave: Black women's studies.* Old Westbury, NY: Feminist Press.

Hunter, I. (1988a). *Culture and government: The emergence of literary education.* London: Macmillan.

Hunter, I. (1988b). Setting limits to culture. *New Formations*, 4, 103-124.

Hunter, I. (1992). Aesthetics and cultural studies. In L. Grossberg, C. Nelson, & P. A. Treichler (Eds.), *Cultural studies* (pp. 347-372). New York: Routledge.

Huntington, S. P. (1996).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Im, Y.-H. (1998). The media, civil society and new social movements in Korea, 1985-93. In K.-H. Chen (Ed.), *Trajectories: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pp. 330-345). London: Routledge.

Jackson, M. (1998). *Minima ethnographica: Intersubjectivity and the anthropological projec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Jacobs, J. M. (1996). *Edge of empire: Postcolonialism and the city.* London: Routledge.

Jagtenberg, T., & McKie, D. (1997). *Eco-impacts and the greening of post-modernity.* London: Sage.

Jameson, F., & Miyoshi, M. (Eds.). (1998). *The cultures of globalization.*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Jenkins, H. (1992). *Textual poachers: Television fans and participatory cultures.* New York: Routledge.

Jenkins, H. (Ed.). (1998). *The children's culture reader.*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Johnson, L. (1988). *The unseen voice: A cultural study of early Australian radio.* London: Routledge.

Johnson, L. (1993). *The modern girl: Childhood and growing up.* Sydney/Milton Keynes, UK: Allen & Unwin/Open University Press.

Johnson, V. (1990). *Radio birdman.* Sydney: Sheldon Booth.

Johnson, V. (1994). *Western desert artists: A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Sydney: Craftsman House.

Johnson, V. (1996). *"Copyrites": Aboriginal art in the age of reproductive technologies.* Sydney: Macquarie University/National Indigenous Arts Advocacy Association.

Jordan, G., & Weedon, C. (1995). *Cultural politics: Class, gender, race and the postmodern world.* Oxford: Blackwell.

Kang, M. K. (1999). Postmodern consumer culture without postmodernity: Copying the crisis of signification. *Cultural Studies*, 13, 18-33.

Keil, C., & Feld, S. (1994). *Music groov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Keith, M., & Pile, S. (Eds.). (1993). *Place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London: Routledge.

Kellner, D. (1992). *The Persian Gulf TV war.* Boulder, CO: Westview.

Kellner, D. (1997). Critical theory and cultural studies: The missed articulation. In J. McGuigan (Ed.), *Cultural methodologies* (pp. 12-41). London: Sage.

Kelly, C., & Shepherd, D. (Eds.). (1998). *Russian cultural studies: An introd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Kim, S. (1998). "Cine-mania" or cinephilia: Film festivals and the identity question. *UTS Review*, 4(2), 174-187.

King, A. D. (Ed.). (1991). *Culture, globalization and the world system.* London: Macmillan.

Knight, S. (1990). *The selling of the Australian mind: From first fleet to third Mercedes.* Port Melbourne: Heinemann Australia.

Kowinski, W. S. (1985). *The malling of America: An inside look at the great consumer paradise.*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Kraniauskas, J. (1998). Globalization is ordinary: The transnationalization of cultural studies. *Radical Philosophy*, 90, 9-19.

Kroker, A. (1984). *Technology and the Canadian mind: Innis, McLuhan, Grant.* Montreal: New World Perspectives.

Laclau, E. (1977). *Politics and ideology in Marxist theory.* London: Verso.

Lanfant, M.-F., Allcock, J. B., & Bruner, E. M. (Eds.). (1995). *International tourism: Identity and change.* London: Sage.

Langton, M. (1993). *"Well, I heard it on the radio and I saw it on the television...: An essay for the Australian Film Commission on the politics and aesthetics of filmmaking by and about Aboriginal people and things.* North Sydney: Australian Film Commission.

Langton, M. (1998). *Burning questions: Emerging* environmental issues for indigenous peoples in Northern Australia. Darwin: Northern Territory University, Centre for Indigenous Natural and Cul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

Lefebvre, H. (1984). *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rn world* (S. Rabinovitch, Trans.).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71)

Lilley, R. (1998). *Staging Hong Kong: Gender and performance in transition.* Richmond, UK: Curzon.

Lipsitz, G. (1994). *Dangerous crossroads.* London: Verso.

Long, E. (Ed.). (1997). *From sociology to cultural studies.* Oxford: Blackwell.

Loosley, S. (1991, March 17). Step towards real changes. *Sunday Telegraph.*

Lott, E. (1993). *Love and theft: Blackface minstrelsy and the American working clas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owe, L. (1996). *Immigrant acts: On Asian American cultural politics.*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Lubiana, W. (Ed.). (1997). *The house that race built.* New York: Pantheon.

Luke, C. (Ed.). (1996). *Feminisms and pedagogies of everyday life.*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Lumby, C. (1997). *Bad girls: The media, sex and feminism in the 90s.* Sydney: Allen & Unwin.

Lumby, C. (1999). *Gotcha: Life in a tabloid world.* Sydney: Allen & Unwin.

Ma, E. K.-W. (1999). *Culture, politics and television in Hong Kong.* London: Routledge.

Marrie, A. (1989). Museums and Aborigines: A case study in internal colonialism. *Australian-Canadian Studies*, 7(1-2), 63-80.

Martin, R., & Miller, T. (Eds.). (1999). *Sport-Cult.*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Massey, D. (1994). *Space, place and gender.* Cambridge: Polity.

Massey, D. (1997). Problems with globalisation. *Soundings*, 7, 7-12.

Massumi, B. (1992). *A user's guide to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Deviations from Deleuze and Guattari.* Cambridge: MIT Press.

Massumi, B. (1996). The autonomy of affect. In P. Patton (Ed.), *Deleuze: A critical reader* (pp. 217-239). Oxford: Blackwell.

Massumi, B. (1997).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belonging and the logic of relation. In C. Davidson (Ed.), *Anybody* (pp. 174-189). Cambridge: MIT Press.

Matsuda, M. (1996). *Where is your body? And other essays on race, gender, and the law.* Boston: Beacon.

Mauss, M. (1970). *The gift: Forms and functions of exchange in archaic societies* (I. Cunnison, Trans.). London: Cohen & West.

McCalman, I. (Ed.). (1998). *Mad cows and modernity: Cross-disciplinary reflections on the crisis of Creutzfeldt-Jakob disease.* Canberra: Humanities Research Centre/National Academics Forum.

McCarthy, C., & Crichlow, W. (Eds.). (1993), *Race, identity and representation in educ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McClintock, A. (1995). *Imperial leather: Race, gender and sexuality in the colonial contest.* New York: Routledge.

McGuigan, J. (1996). *Culture and the public sphere.* London: Routledge.

McGuigan, J. (Ed.). (1997). *Cultural methodologies.* London: Sage.

McHoul, A. (1997). Ordinary heterodoxies: Towards a theory of cultural objects. *UTS Review*, 3(2), 7-22.

McNeil, M. (1998). De-centring or re-focusing cultural studies: A response to Handel K. Wright. *European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1, 57-64.

McRobbie, A. (1981). Settling accounts with subcultures: A feminist critique. In T. Bennett, G. Martin, C. Mercer, & J. Woollacott (Eds.), *Culture, ideology and social process: A reader* (pp. 113-123). London: Batsford Academic & Education.

McRobbie, A. (1994). *Postmodernism and popular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McRobbie, A. (Ed.). (1997a). *Back to reality? Social experience and cultural studies.*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McRobbie, A. (1997b). The Es and the anti-Es: New questions for feminism and cultural studies. In M. Ferguson & P. Golding (Eds.), *Cultural studies in question* (pp. 170-186). London: Sage.

McRobbie, A. (1999). *British fashion design: Rag trade or image industry?* London: Routledge.

Meadows, M. (1996). Indigenous cultural diversity: Television northern Canada. *Culture and Policy*, 7(1), 25-44.

Mellencamp, P. (Ed.). (1990). *Logics of televisio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Mellencamp, P. (1992). *High anxiety: Catastrophe, scandal, age, and comed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Mercer, K. (1994). *Welcome to the jungle: New positions in black cultural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Mercer, K., Ugwu, C., & Bailey, D. A. (Eds.). (1996). *Mirage: Enigmas of race, difference and desire.* London: ICA Editions.

Meyrowitz, J. (1985). *No sense of place: The impact of electronic media on social behavio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ichael, J. (1996). Science friction and cultural studies: Intellectuals, interdisciplinarity, and the profession of truth. *Camera Obscura*, 37, 125-154.

Michaels, E. (1986). *The Aboriginal invention of television in central Australia 1982-1986.* Canberra: Australian Institute of Aboriginal Studies.

Michaels, E. (1994). *Bad Aboriginal art: Tradition, media, and technological horizon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Mickler, S. (1998). *The myth of privilege: Aboriginal status, media visions, public ideas.* Fremantle, Western Australia: Fremantle Arts Centre Press.

Mignolo, W. D. (1995). *The darker side of the Renaissance: Literacy, territoriality and*

colonization.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Miller, T. (Ed.). (1992). Radio-sound [Special issue]. *Continuum*, 6(1).

Miller, T. (1998). *Technologies of truth: Cultural citizenship and the popular media*.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Miller, T., & McHoul, A. (1999). *Popular culture and everyday life*. London: Sage.

Mitchell, T. (1996). *Popular music and local identity: Rock, pop and rap in Europe and Oceania*. Leicester: University of Leicester Press.

Mohanty, C. T., Russo, A., & Torres, L. (Eds.). (1991). *Third World women and the politics of feminis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Moon, M., & Davidson, C. N. (Eds.). (1995). *Subjects and citizens: Nation, race and gender from Oroonoko to Anita Hill*.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Moraga, C., & Anzaldúa, G. (Eds.). (1981). *This bridge called my back: Writings by radical women of color*. New York: Kitchen Table/ Women of Color Press.

Moreiras, A. (1999). The order of order: On the reluctant culturalism of anti-subalternist critiques. *Journal of Latin American Cultural Studies*, 8(1), 125-145.

Morley, D. (1992). *Television, audiences and cultural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Morley, D. (1998). So-called cultural studies: Dead ends and reinvented wheels. *Cultural Studies*, 12, 476-497.

Morley, D., & Chen, K.-H. (Eds.). (1996). *Stuart Hall: Critical dialogues in cultural studies*. New York: Routledge.

Morris, M. (1990). Banality in cultural studies. In P. Mellencamp (Ed.), *Logics of television* (pp. 14-43).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Morris, M. (1992). The man in the mirror: David Harvey's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In M. Featherstone (Ed.), *Cultural theory and cultural change* (pp. 253-279). London: Sage.

Morris, M. (1997a). A question of cultural studies. In A. McRobbie (Ed.), *Back to reality? Social experience and cultural studies* (pp. 36-57).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Morris, M. (1997b). The truth is out there. *Cultural Studies*, 11, 367-375.

Morris, M. (1998a). *Too soon, too late: History in popular cultur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Morris, M. (1998b). Truth and beauty in our times. In J. Bigelow (Ed.), *Our cultural heritage* (pp. 75-87). Canberra: Australian Academy of the Humanities.

Morris, M., & McCalman, I. (1999). "Public culture"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in Australia: A report. *Public Culture*, 11(2), 319-345.

Morris, M., & Patton, P. (Eds.). (1979). *Michel Foucault: Power, truth, strategy*. Sydney: Feral.

Morrison, T. (Ed.). (1992). *Race-ing justice, en-gendering power: Essays on Anita Hill, Clarence Thoma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reality*. New York: Pantheon.

Morse, M. (1983). Sport on television: Replay and display. In E. A. Kaplan (Ed.), *Regarding television* (pp. 44-66). Los Angeles: American Film Institute.

Morse, M. (1998). *Virtualities: Television, media art, and cybercultur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Muecke, S. (1992). *Textual spaces: Aboriginality and cultural studies*. Kensington: New South Wales University Press.

Muecke, S. (1997). *No road (bitumen all the way)*. Fremantle, Western Australia: Fremantle Arts Centre Press.

Munson, E. S., & Warren, C. A. (Eds.). (1997). *James Carey: A critical reader*.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Murdock, G. (1995). Across the great divide: Cultural analysis and the condition of democracy.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12(1), 89-95.

Murdock, G. (1997). Cultural studies at the crossroads. In A. McRobbie (Ed.), *Back to*

reality? Social experience and cultural studies (pp. 58-73).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Naficy, H., & Gabriel, T. H. (Eds.). (1993). *Otherness and the media: The ethnography of the imagined and the imaged.* Newark, NJ: Harwood.

Nakayama, T. K. (1997). The empire strikes back: The Sokal controversy and the vilification of cultural studie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Inquiry*, 21 (2), 45-55.

Nandy, A. (1983). *The intimate enemy: Loss and recovery of self under colonialism.* Bomba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lson, C., & Gaonkar, D. P. (Eds.). (1996). *Disciplinarity and dissent in cultural studies.* New York: Routledge.

Nelson C., Treichler, P. A., & Grossberg, L. (1992). Cultural studies: An introduction. In L. Grossberg, C. Nelson, & P. A. Treichler (Eds.), *Cultural studies* (pp. 1-16). New York: Routledge.

Nightingale, V. (1996). *Studying audiences: The shock of the real.* London: Routledge.

Noble, G., Poynting, S., & Tabar, P. (1999). Youth, ethnicity and the mapping of identities: Strategic essentialism and strategic hybridity among male Arabic-speaking youth in south-western Sydney. *Communal Plural*, 7 (1), 29-45.

O'Regan, T. (1992).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policy moment." *Meanjin*, 51, 517-532.

O'Regan, T. (1993). *Australian television culture.* Sydney: Allen & Unwin.

O'Regan, T. (1996). *Australian national cinema.* London: Routledge.

O'Regan, T., & Miller, T. (Eds.). (1994). Screening cultural studies [Special issue]. *Continuum*, 7(2).

Owusu, K. (Ed.). (1999). *Black British culture and society.* London: Routledge.

Palmer, L. (1998). On or off the beaten track? Tourist trails in Thailand. *UTS Review*, 4(1), 67-91.

Parker, A., Russo, M., Sommer, D., & Yaeger, P. (Eds.). (1992). *Nationalisms and sexualities.* New York: Routledge.

Patton, C. (1992). From nation to family: Containing African AIDS. In A. Parker, M. Russo, D. Sommer, & P. Yaeger (Eds.), *Nationalisms and sexualities* (pp. 218-234). New York: Routledge.

Patton, C. (1994). *Last served? Gendering the HIV pandemic.* London: Falmer.

Penley, C., & Ross, A. (Eds.). (1991). *Technocultur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Perera, S. (1993). Representation wars: Malaysia, *Embassy*, and Australia's *Corps Diplomatique.* In J. Frow & M. Morris (Eds.), *Australian cultural studies: A reader* (pp. 15-29). Sydney/Chicago: Allen & Unwin/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Perera, S. (Ed.). (1995). *Asian and Pacific inscriptions: Identities, ethnicities, nationalities.* Bundoora, Victoria, Australia: Meridian.

Pickering, M. (1997). *History, experience and cultural studies.* London: Macmillan.

Poor performance "shooting Aust in the head." (1989, October 26). *Australian Financial Review.*

Prakash, G. (Ed.). (1995). *After colonialism: Imperial histories and postcolonial displacement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obyn, E. (1993). *Sexing the self: Gendered positions in cultural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Probyn, E. (1996). *Outside belongings.* New York: Routledge.

Probyn, E. (1998). McIdentities: Food and the familial citizen.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15(2), 155-173.

Probyn, E. (1999a). Beyond food/sex: Eating and an ethics of existence.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16(2), 215-228.

Probyn, E. (1999b). Disciplinary desires: The outside of queer feminist cultural studies. In M. Shiach (Ed.), *Feminism and cultural studies* (pp. 431-458).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Radway, J. A. (1991). *Reading the romance: Women, patriarchy and popular literature* (2nd ed.).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Radway, J. A. (1997). *Feeling for books: The Book-of-the-Month Club, literary taste, and middle-class desire.*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Rand, E. (1995). *Barbie's queer accessories.*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Readings, B. (1996). *The university in ruin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Re : Public. (Ed.). (1997). *Planet Diana: Cultural studies and global mourning.* Nepean: University of Western Sydney, Research Centre in Intercommunal Studies.

Robbins, B. (Ed.). (1993a). *The phantom public spher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Robbins, B. (1993b). *Secular vocations: Intellectuals, professionalism, culture.* London: Verso.

Robinson, P. (1989, June 18). Fair go, we're all bludgers. *Sun Herald.*

Rodman, G. (1996). *Elvis after Elvis: The posthumous career of a living legend.* New York: Routledge.

Rodman, G. (1997). Subject to debate: (Mis) reading cultural studie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Inquiry*, 21(2), 56-69.

Roediger, D. R. (1991). *The wages of whiteness: Race and the making of the American working class.* London: Verso.

Rosaldo, M. Z. (1984). Toward an anthropology of self and feeling. In R. A. Shweder & R. A. Levine (Eds.), *Culture theory: Essays on mind, self and emotion* (pp. 137-157).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osaldo, R. (1989). *Culture and truth: The remaking of social analysis.* Boston: Beacon.

Rosaldo, R. (1997). Whose cultural studies? Cultural studies and the disciplines. In P. Gibian (Ed.), *Mass culture and everyday life* (pp. 26-33). New York: Routledge.

Rose, T. (1994). *Black noise: Rap music and black culture in contemporary America.* Boston: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Ross, A. (1989). *No respect: Intellectuals and popular culture.* New York: Routledge.

Ross, A. (1991). *Strange weather: Cultur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the age of limits.* London: Verso.

Ross, A. (1994). *The Chicago gangster theory of life: Nature's debt to society.* London: Verso.

Ross, A. (Ed.). (1996). *Science wars.*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Ross, A. (Ed.). (1997). *No sweat: Fashion, free trade and the rights of garment workers.* London: Verso.

Rowe, D. (1995). *Popular cultures: Rock music, sport and the politics of pleasure.* London: Sage.

Said, E. W. (1993).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London: Chatto & Windus.

Sakai, N. (1991). *Voices of the past: The status of language in eighteenth-century Japanese discours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Sakai, N. (1997). *Translation and subjectivity: On "Japan" and cultural nationalis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Sedgwick, E. K. (1990). *Epistemology of the close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Sedgwick, E. K. (1993). *Tendencies.*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Sharkey, S. (1997). Irish cultural studies and the politics of Irish studies. In J. McGuigan (Ed.), *Cultural methodologies* (pp. 155-177). London: Sage.

Shaviro, S. (1997). Beauty lies in the eye. *Canadian Review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25, 461-471.

Sheridan, S. (Ed.). (1988). *Grafts: Feminist cultural criticism.* London: Verso.

Shiach, M. (Ed.). (1999). *Feminism and cultural stud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ilverstone, R. (1994). *Television and everyday life.* London: Routledge.

Skeggs, B. (1997). *Formations of class and gender.* London: Sage.

Slack, J. D., & Semati, M. M. (1997). Intellectual and political hygiene: The "Sokal affair."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14(3), 201-227.

Slack, J. D., & White, L. A. (1992). Ethics and cultural studies. In L. Grossberg, C. Nelson, & P. A. Treichler (Eds.), *Cultural*

studies (pp. 571-592). New York: Routledge.

Spigel, L. (1992). *Make room for TV: Television and the family ideal in postwar Americ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pivak, G. C. (1988). *In other worlds: Essays in cultural politics.* London: Routledge.

Spivak, G. C. (1990) *The post-colonial critic: Interviews, strategies, dialogues.* New York: Routledge.

Spivak, G. C. (1993). *Outside in the teaching machine.* New York: Routledge.

Stacey, J. (1994). *Star gazing: Hollywood cinema and female spectatorship.* London: Routledge.

Stam, R. (1997). *Tropical multiculturalism: A comparative history of race in Brazilian cinema and culture.*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Steedman, C. (1986). *Landscape for a good woman: A story of two lives.* London: Virago.

Steedman, C. (1992a). Culture, cultural studies, and the historians. In L. Grossberg, C. Nelson, & P. A. Treichler (Eds.), *Cultural studies* (pp. 613-622). New York: Routledge.

Steedman, C. (1992b). *Past tenses: Essays on writing, autobiography and history.* London: Rivers Oram.

Steedman, C. (1997). Writing the self: The end of the scholarship girl. In J. McGuigan (Ed.), *Cultural methodologies* (pp. 106-125). London: Sage.

Steele, T. (1997). *The emergence of cultural studies 1945-65: Cultural politics, adult education and the English question.*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Steinberg, M. P. (1996). Cultural history and cultural studies. In C. Nelson & D. P. Gaonkar (Eds.), *Disciplinarity and dissent in cultural studies* (pp. 103-129). New York: Routledge.

Stewart, K. (1996). *A space on the side of the road: Cultural poetics in an "other" America.*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Storey, J. (Ed.). (1994). *Cultural theory and popular culture.* Hertfordshire: Harvester Wheatsheaf.

Storey, J. (Ed.). (1996). *What is cultural studies? A reader.* London: Edward Arnold.

Stratton, J. (1992). *The young ones: Workingclass culture, consumption and the category of youth.* Perth, Western Australia: Black Swan.

Street, J. (1997). *Politics and popular culture.* Cambridge: Polity.

Striphas, T. (Ed.). (1998).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cultural studies [Special issue]. *Cultural Studies*, 12(4).

Suleri, S. (1992). *The rhetoric of English Indi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wan steels ARC for competition. (1989, November 26). *Sunday Telegraph.*

Taussig, M. (1997). *The magic of the state.* New York: Routledge.

Teaiwa, T. (1999). Reading Gauguin's *Noa Noa* with Hau'ofa's Nederends: "Militourism," feminism and the "Polynesian" body. *UTS Review*, 5(1), 53-69.

Teer-Tomaselli, R. E., & Roome, D. (Eds.). (1997). Popular culture and identity [Special issue]. *Critical Arts*, 11 (1-2).

Thomas, M. (1999). *Dreams in the shadows: Australian-Vietnamese lives in transition.* Sydney: Allen & Unwin.

Tofts, D., & McKeitch, M. (1998). *Memory trade: A prehistory of cyberculture.* Sydney: 21C/Interface.

Tomaselli, K. G. (1996). *Appropriating images: The semiotics of visual representation.* Durban/Hojbjerg: Smyrna/Intervention.

Tomaselli, K. G. (1998a). African cultural studies: Excavating for the futur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1 (1), 143-153.

Tomaselli, K. G. (1998b). Recovering praxis: Cultural studies in Africa. *European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1, 387-402.

Tomaselli, K. G., & Mpofu, A. (1997). The rearticulation of meaning of national monuments: Beyond apartheid. *Culture and Policy*, 8 (3), 57-76.

Turkle, S. (1984). *The second self: Computers and the human spirit.*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Turner, G. (Ed.). (1993). *Nation, culture,*

text: Australian cultural and media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Turner, G. (1994). *Making it national: Nationalism and Australian popular culture.* Sydney: Allen & Unwin.

Turner, G. (1996). *British cultural studies: An introduction* (Rev. ed.). Boston: Unwin Hyman.

Vainikkala, E., & Eskola, K. (Eds.). (1994). Nordic cultural studies [Special issue]. *Cultural Studies*, 8(2).

Valaskakis, G. (1988). The Chippewa and the other: Living the heritage of Lac du Flambeau. *Cultural Studies*, 2, 267-293.

Valaskakis, G. (in press). *Being native in North America.* Boulder, CO: Westview.

Viswanathan, G. (1989). *Masks of conquest: Literary study and British rule in Indi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Wallace, M. (1978). *Black macho and the myth of the superwoman.* New York: Dial.

Wallace, M. (1990). *Invisibility blues: From pop to theory.* London: Verso.

Ware, V. (1992). *Beyond the pale: White women, racism and history.* London: Verso.

Wark, M. (1993). Homage to catatonia: Culture, politics and Midnight Oil. In J. Frow & M. Morris (Eds.), *Australian cultural studies: A reader* (pp. 105-116). Sydney/Chicago: Allen & Unwin/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Wark, M. (1994). *Virtual geography: Living with global media event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Wark, M. (1999). *Celebrities, culture and cyberspace.* St. Leonards: Allen & Unwin.

Warner, M. (Ed.). (1993). *Fear of a queer planet: Queer politics and social theor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Waters, J. P. (1996). Ireland and Irish cultural studies [Special issue]. *South Atlantic Quarterly*, 95(1).

Wamey, S. (1987). *Policing desire: Pornography, AIDS, and the media.*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Whannel, G. (1992). *Fields in vision: Television sport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London: Routledge.

Willemen, P. (1994). *Looks and frictions: Essays in cultural studies and film theory.* London/Bloomington: British Film Institute/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Williams, R. (1961a). *Culture and society* 1780-1950. Harmondsworth: Penguin.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58)

Williams, R. (1961b). *The long revolution.* London: Chatto & Windus.

Williams, R. (1979). *Politics and letters.* London: New Left.

Williams, R. (1985). *The country and the city.* London: Hogarth.

Williams, R. (1989). The future of cultural studies. In R. Williams, *The politics of modernism* (pp. 151-162). London: Verso.

Willis, P. E. (1977). *Learning to labour: How working class kids get working class jobs.* Farnborough, UK: Saxon House.

Wilson, R. (in press). *Reimagining the American Pacific: From "South Pacific" to Bamboo Ridge and beyo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Wilson, R., & Dissanayake, W. (Eds.). (1996). *Global/local: Cultural production and the transnational imaginary.*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Wilson, R., & Dirlik, A. (Eds.). (1995). *Asia/Pacific as space of cultural production.*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Women's Studies Group, 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1978). *Women take issue: Aspects of women's subordination.* London: Hutchinson, with 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Wood, H. (in press). *Displacing native: The rhetorical production of Hawai'i.* Boulder, CO: Rowman & Littlefield.

Wright, H. K. (1998). Dare we de-centre Birmingham? Troubling the "origin" and trajectories of cultural studies. *European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1, 33-56.

Yudice, G., Franco, J., & Flores, J. (Eds.). (1992). *On edge: The crisis of contermporary Latin American cultur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性别，酷儿理论与定性研究 12

SEXUALITIES，QUEER THEORY，AND QUALITATIVE RESEARCH

◎ 乔舒亚·加默森

当本世纪初期社会科学研究者开始探索和研究同性恋的生活时，这些研究者们面临着很明显的现实障碍，即他们很难找到研究的参与者。那时同性恋被视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并遭到众多惩罚，当有些人怀有对同性的渴望并与同性交往时，他们需要恪守秘密，同性恋者的生活是脆弱的"双面"生活。故而寻找同性恋者参与研究非常困难。大约半个世纪以后，为争取同性恋者权利和自由的运动极大地改变了上述状况。这时，人们便认为寻找志愿者参与研究是件容易的事儿了。

事实上，从某个侧面来讲，事实确实如此。尽管同性恋者遭受的侮蔑、惩罚日益增强，同时他们要更加严格地保守与同性交往的秘密，但是他们依然公开、坦然地居住在一起，他们也常常是有组织的社区成员。这使得寻找和研究同性恋者从此变得不再困难。然而，社会科学研究者对性别研究的历史的某些方面类似于对妇女、种族的研究历史：这种历史与政治和社会运动紧密相联，并时刻警惕着不要将"科学"运用于对边缘化的抵制，特别是这种研究还非常青睐定性的研究方法——这一方法至少看起来较少对研究主体进行客观化，而更多地考虑文化与政治意义的建构，从而为各种曾被压抑的声音和实践提供了更大空间。因此，从这个侧面来讲，对这一领域研究的开始也标志着新的性别主体在政治和学术领域的出现。它使得这一鲜为人知的群体被公诸于众。

然而，这一研究主题出现的同时也正在消亡。特别是在过去十年中，这一研究主题在许多方面显得问题迭出，令人费解。随着"酷儿理论"的壮大（这一理论从社会建构者的视角出发，强有力地糅合了后结构主义对一体化的批判），同性恋主题自身自动地走向了相反的方向，它变得更加难以捉摸，更不用说被研究了。正如其他学术领域的发展一样，抛开被自定义为其核心问题的性、种族、性别、国别或阶级，"酷儿理论"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解构的理论。这正是本文要讲述的核心问题：我们是如何从对性主题的存在（唯一需要找寻和研究的主体）不假思索的偏信到同性恋研究的盛行（它充斥着同性恋者对自己生活的书写和描述），到开始怀疑性主题并非必须用于研究，并到现在的对性主体性的解构的出

现。上述的这些可以构成一个故事,而且在本质和意义上与定性研究有着并行不悖之处和相似的历史。正如邓津和林肯所说:早期传统的对于稳定主体的"客观性"研究随着时间的流逝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让位于后现代主义对客观性的置疑,并产生了"一个总是摇摆不定的中心"(Lincoln & Denzin, 1994, p.575)。

笔者追述这些相关历史,目的在于指出一些对性别定性研究有巨大作用的主要驱动力:在这些动力的影响之下,对研究者来说这意味着去研究那些自称为是同性恋者,双性恋者,或移性恋者的人;对于定性研究来说这意味着去最大程度地置疑对于同性恋者,双性恋者,或移性恋者的社会分类的稳定性和文字表述的现实性;还意味着去探究"现实经验"在这种研究和描述当中的地位;对研究来说也意味着无章可循与制度化同时并存,特别是在一些政治与科研紧密结合的领域。

性别研究的政治学:定性研究的推动力

性别研究特别是同性恋研究,总地来说,一直以来都与定性研究紧密相联——以此作为本章一个总的起点,笔者将首先快速地概括一下这一研究实践(民族志、参与观察、深度访谈、内容分析、历史研究等),当然这未必可以成为一个严密的体系。这一实践明显有别于定量研究,并经常置疑认识论对于实证主义的假设,其看似散漫却相当独特的研究重点在于:对文化意义的建构和阐释的过程、团体与个人的界分、社会互动、对日常行为实践的研究等。

定性研究的推动力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其政治背景,性别研究也是在这一背景当中形成的。尽管社会科学中性学流派早已存在,但同时也存在着另一种更强有力的和由来已久对实证主义科学和一些科研团体的置疑,那就是认为实证科学和一些科研团体的性学研究与自定义的同性恋者的旨趣出入很大。这些实证科学主义者和研究者们认为同性恋是病态的、耻辱的,并试图探究越轨性行为的起因,进而寻求治疗办法。这一置疑给定性研究开辟了内在的轨道。另外,定性研究由于重在分析意义的建构和日常的生活经历,它特别适合于研究行动目标的可视性、文化的挑战,以及自我的测定。最后,由于同性恋者的研究给其自身带来了新的理论上的发展——特别是其批判性地对性别分类和身份进行社会建构,并拓展了当代社会中同性/异性两性上的意义——它着眼于解释性的事件,使得它更适合于用定性研究去分析。

与此同时,定性研究得以发展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因为先前缄默的声音被融入到了该研究当中。这些声音与性学研究相互影响。邓津和林肯(Denzin & Lincoln,1994)将定性研究发展的历史定义为五个重要"时刻",性学研究正是在这一复杂的过程当中而诞生:从传统的"对实地研究殖民化的解释"即关心"有效的、可信的和客观的解释"(1900—1950);到现代主义者尝试用正规的定性研究方法去阐释因果联系(1950—1970);然后过渡到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界线变

得模糊的阶段,在这一阶段,观察者“在解释他们所描述的事物时不再享有特权了”(1970—1986);接着出现的阶段被称为“表述的危机”阶段,在这一阶段,研究和描述变得更具反身性,并且认为“定性研究者能直接捕捉现实生活”的假设也不再盛行(1986—1990);到了当代“后现代的时刻”,“宏观理论”和“超然研究者的概念”就被彻底抛弃了(pp.7,9,11)。

显然,定性研究在其发展的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意义。事实上,笔者讲述的所有一切也不可能成为永恒——这也正是本章所要讲述的中心议题。笔者用了一个较为广义的概念“性特征”来强调尽管笔者所要讲述的领域大多是有关非异性恋的、性地位的形成、身份和行为具有非一致性,但人们对这些研究客体的认知也在如下重要方面发生了变化:对同性恋的研究已经不再完全等同于对男女同性恋者的研究,也不再完全等同于从同性恋者的角度去研究社会。对男女同性恋者的研究,以及最新出现的酷儿研究的意义已经发生了改变,这些改变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与同性恋研究相关的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而实现的。男女同性恋者、双性恋的、同性恋的、变性者诸如此类的词都被用来定义性和性别,人们的自我意识或者从自身固化下来,或者通过多样的社会过程而稳固下来。“同性恋者研究”(以及近来的男女同性恋者、双性恋、变性等)这些概念亦主要被视为对同性恋群体的研究。无论是从身份界定还是学科划分来讲,“酷儿”一词已经成为一个更为复杂、难以达成共识和令人费解的概念(Gamson,1995)。尽管有时它被用于描述“有色人种”,例如男女同性恋者、双性恋者和变性者,但从政治维度上讲其意义更加宽广,它包括了性和性别之外的所有内涵。笔者在这里采用“酷儿”一词,原因在于它所具有的独特意义,它体现了对同性恋身份界定的不稳定性。酷儿是一种身份,这一身份标志着无论从自身角度或具体行为来讲,它都是对性和性别的偏离,它永远处于变化当中。酷儿理论和酷儿研究不是将研究的焦点过多地放在对某一特定的人群上性别分类的过程和解构上。二者事实上与其自身的政治体系不可分割。

实证主义的矛盾关系

特别是随着1960和1970年代女性主义和男女同性恋者运动的发展,性学研究从一开始就与矫正同性恋者病态的、受侮辱的社会地位的政治运动紧密相联(Adam, 1995)。因为从历史上讲,实证主义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一直在强调同性恋是病态的、越轨的或两者皆是。许多后石墙时代(post-stonewall)的性学研究就算不是公开敌视性学研究的“科学”方法,但至少也对此存在模棱两可的态度。实证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对性学研究因此是呈敌视态度的。

最早的同性恋研究见于一些训练有素的医学和自然科学研究者的性研究当中。他们从实证主义的模型出发,这样一来,寻求自然界使性道德化的客观真理的诉求就被掩盖了。虽然这些研究者通常从自由化的意图出发,旨在将性从宗教的桎梏中解脱出来,但他们始终都认为同性恋是越轨行为,与常态背道而驰。他们的目的就是去破译治疗学的源头(Weeks, 1985)。简言之,这些研究者虽然

从自由者的角度出发,但他们仍然不假思索地将同性恋视为病态的、危险的,或是犯罪①。同性恋在官方一直被视为是一种心理上的失常。直到1973年,经过诸多努力,美国精神病协会在对精神失常者的治疗与劳力统计项目中终于找到了"科学地"研究同性恋与同性恋被侮蔑、被矫正的社会地位之间的政治联系(Bayer,1981),从而改变了将同性恋视为是精神失常的认识②。毫无疑问,对于在政治上与同性恋运动有联系的研究者来说,特别是对那些探究和解释意义而非"事实"的研究者而言,定性研究通常更为研究者所欢迎,因为它在研究者与"主宰者的工具"之间保持了距离。

当然,就对性实践和性观念的研究而言,以定量研究为主导的科学研究长期以来一直占据着有效而显著的地位。它们中的大多数集中在研究同性的活动,这当中又有相当一部分更进一步去揭示非正常的性特征所具有的正态和可敬的一面:从1940—1950年代的金塞等人(Kinsey, Pomeroy, & Martin, 1948; Kinsey, Pomeroy, Martin & Gebhard, 1953)到1960—1970年代的马斯特斯和约翰逊(Masters & Johnson,1966),到1990年代的基于"性的社会组织"的大规模调查(Laumann, Gagnon, Michael, & Michaels, 1994)。例如,根据传记作者的记录,金塞报告的策略即通过堆积科技术语和运用大量的统计数据去"呼唤科学!"(Jones, 1997, p. 107)。金塞的贡献在于他提出了性的续谱概念,揭示了广为流传的、典型的和所谓的越轨行为是如何通过提供"科学的证据以重新审视传统的道德态度",进而去改变有关性的盛行提法的(D' Emilio, 1983, p. 33)。其结果是"婚前性行为、通奸、同性恋成为可被接受的体面话题"(Jones, 1997, p. 100)。与此相似的是,胡克尔(Hooker,1958)的研究比较了心理学资料中男性同性恋者与相应的非同性恋者的样本,他的研究"实证地显示了同性恋者的'正常性'"(Nardi & Schneider 1998, p. 3)。

这种试图解开同性恋之谜的研究一直持续到今天——尽管今天这些研究通常与个人的识别、政治的联盟和性的边缘化紧密相联。事实上,特别是在心理学领域,或更狭义上的政治科学和经济学领域当中,社会研究者经常尝试去挑战异性主义者,他们运用科学的工具和逻辑去解开同性恋者之谜:有研究发现,同性恋者的子女与非同性恋者的子女相差甚微(如:Patterson, 1992, 1995);有些研究则尝试去发现在不同的人群当中公众反同性恋的程度以及在这些人群当中犯罪的性质和广度(如:Herek, 1989, 1997);还有些研究是去分析同性恋者的经济境况(如:Badgett, 1995)。这些研究一般是具有防卫性质的社会研究,用"事实"

---

① 这事实上是一种表现同性恋者的压迫不同于其他边缘化的团体的重要表达方式:例如,尽管在很多方面我们有对女性的一些固化认识(比如,女性有歇斯底里的倾向),但女性的地位并不总是被视为病态的或非正常的;或者尽管在某种意义上种族研究将拉丁美洲裔的美国人视为劣等的(包括认为他们更具有犯罪倾向),而黑人自身并不总是被视为有罪的和需要被矫正的。

② 韦克斯(Weeks,1985)论述到,"为保护其自身,许多性学家成为了性规范的鼓动者。对科学的呼唤进而便成了一种使权力关系的参与合法化的装腔作势的姿态。对在科学上持中立态度的科学知识的生产(关于女性、性的变异性、性的越轨者或维护者)可以变成限定和划分性行为的依据"(p. 79)。

去检验和置疑对一个看似同一的社会的假设①。正如男女同性恋者战略性研究机构对其自身使命所陈述的那样,这一组织是"去从事公正和独立的学术研究,并分析那些批判性地针对男女同性恋者、双性恋者和变性者的社区的公共政策","而最至关重要的一点是,我们用公正的、独立的研究去抵制(右翼的)谎言"(Institute for Gay and Lesbian Strategic Studies,1998)。就算当自然科学的模型被用于性学研究,科学与同性恋者生活之间的历史性矛盾也不容忽视。

早期对科学与性学之间的矛盾关系的另一个反映是去调查"越轨者"本身,并将他们置身在自己的时空当中,脱离方法论上(有时是政治上)的影响。性学研究一定程度上展示了定性研究的"传统的"和"现代的"的趋势:它"展示了实证主义的科学范式",实地研究"外来的和奇异的"他人,"从社会科学的视角看文学的自然主义"并通常"将研究主体浪漫化了"(Denzin & Lincoln, 1994, pp.7, 8)。虽然上述研究使研究者更加接近被研究者的主体实践,但这种研究并不能一下子跳出政治的束缚。例如,从1970年代早期开始,对男同性恋者定性的社会学研究主要集中在污点处理上(如:Humphreys, 1970; Leznoff & Westley, 1956; Reiss, 1961),并将同性恋视为"越轨性世界的乱伦者、娼妓、罪犯、茶室、浴室和酒吧的一部分"(Seidman, 1996, p.7)。然而,正如塞德曼(Seidman,1996)所说:尽管"大多数社会学研究的目的在于将同性恋视为不公正的歧视下的受害者",社会学研究却"助长了公众对同性恋的这样一种认识,即与正常人、可敬的异性主义相比,同性恋者是异己的、怪异的人种"(p.7)。然而,随着同性恋者运动的不断壮大,这些被视为奇异的人类也开始从事自己的研究,去研究和描述他们自身,这为性学研究和定性研究的融会开辟了新的道路。

运动与少数群体研究以及对自我的阐释

在1970至1980年代,受女性主义启示的女性研究和受民权运动影响的种族研究影响了对同性恋的研究,学者们所开辟的新的同性恋研究领域(绝大多数研究者自称是同性恋者)开始"解析"同性恋者被"隐藏"的历史,"去重写同性恋者的过去"(Duberman, Vicinus, & Chauncey, 1989;也见 Faderman, 1981; Katz, 1976)并开始记载经验的现实(如:Krieger, 1983; Levine, 1979; Newton, 1972)。上述的这些研究多见于传统的历史和人种学研究当中,但它同时又与学术界以外的某种定性报告的假设交相呼应;在这些定性报告中,个人的阐述和经验的真理被用于去重写在历史上一直被否认的同性恋者的主观性(Jay & Young, 1972)。事实上,更进一步地研究是出现在白人、男异性恋者的团体中,特别是从边缘者立场出发而写成的自传作品,例如比较经典的有作品集《这座桥使我回想起过去:激进的有色女性作品》(*This Bridge Called My Back: Writting by Radical*

---

① 这些研究曾在指导制度化的异性主义(heterosexism)和同形异义(homophobia)上显得特别有用,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制度上的焦点,正像我们将要看到的一样,定性研究变得越来越重要了。

Women of Color, Moraga & Anzaldua, 1981)①。

这些与政治相联系的"讲述我们自己的故事"的事业,不仅为定性研究另辟蹊径,同时也隐约地对客观的科学研究给予了认识论上的批判。正如女性主义者和黑人中心论(Afroncentric)派的理论,它们都是以日常边缘化的经验生活作为建构理论的基石(Collins, 1990; Harding, 1987; Smith, 1974)。它们也开启了个人记述法的研究先河,进而对同性恋者过去和现在的生活给予了新的阐释。这说明外行者的经历可以为我们看社会和政治生活提供独到的视角,而所谓的有关性的客观事实的东西,事实上只是白人非同性恋者的主观认识而已——总而言之,所有的知识都是有其社会根源的。当然,我们也不应该过分夸大上述的变化,我们还应该看到:在一个将女同性恋者侮蔑为不起眼的病态人的环境里,女同性恋者对女同性恋者的研究不仅仅是对此的巨大挑战,而且也是对定性研究的一个普遍挑战。"旁观者"的客观性被认为增强了定性研究的信度,同时非本土的研究者又保留了"去描绘被研究者的权利"(Denzin & Lincoln, 1994, p.8)。对同性恋者自身而言,他们的声音也通过访问、民族志研究、自传和历史的重新建构而得以体现出来,仅仅依赖权威只可能削弱研究的客观性。

上述不同的研究分支都吸取了对于自我的"实质性"假设。而在斯通沃尔(Stonewall)以后,在邻里和组织机构中对自我的各种观念的收集,都与相对新的"性的少数群体"运动密不可分:不管它们源于何处,性的差异是自然的变化;性的分类与那些自然的变化一脉相承;因而同性恋者便成为了一个与种族少数群体一样的少数派。例如,在1980年代早期,当学者们开始揭示和描绘同性恋者过去和现在台前幕后的生活时,人们便认为男女同性恋者代表了相似的个体,并且构成了时空当中一个稳定的群体。而正如埃普斯坦(Epstein,1987)和德埃米利奥(D'Emilio,1983)所说,同性恋的模式被视为"实质"和同性恋的社区被视为"少数群体"只不过是激进的政治运动的工具而已。1970到1980年代,种族的自我特征充斥于整个政治和研究领域。埃普斯坦(Epstein,1987)认为,"它有明显的政治功效,因为它允许集会的方式特别适合于美国的状况,美国有着民权运动的斗争史,和基于种族和利益群体的竞争"(p.20)。性研究的发展,不仅仅存在于模棱两可地趋向于实证科学的境地,而且回应于少数群体集会的美国政治传统。定性研究将会把性的少数群体共同的、鲜活的生活展示出来。重在研究真正的男女同性恋者的共同之处,这曾经是少数群体研究。

建构主义者的转向

上述这些方法是有效而合法的,特别是在一个对少数群体诉求具有敏感性和对非正常的性充满了神秘和陈辞滥调的政治环境当中。这些研究方法也是对他们自身假设的巨大挑战,这一挑战进一步增强了定性研究的重要性和其中心地位。正如克拉夫(Clough,1994)论述的那样:"认为同性恋的身份及其行为具

① 很有趣的是,当双性恋运动在1980年代形成之时,许多有关双性恋的作品运用了个人叙述的描述方式,如:Hutchins & Ka'ahumanu,1990。

有特殊性,只可能是要求我们去进一步探究这种特殊性和其特定的历史和文化建构(p.143)。这最后导致了对同性恋行为或同性恋身份缺乏统一的认识”。像一些散点一样,多学科交汇的性研究已经开始融合,其主要的“实质主义的”前提假设也在迅速消亡。认为不同的性主体在实质上有相同的性核心(取向或倾向)的认识,现在被认为是错误的。同时,认为同性恋者与少数群体是相同的物种,因此具有与少数群体相同地位的认识也受到了置疑。与此相关的更加普遍意义上的认识是:自然界赋予的性有其“真理”,因而它可以与其他自然主体一样被研究,任何真理只要超越了与性、躯体和欲望的社会性连接,便会变得站不住脚了(见斯坦的对性“实质主义的批判”:Stein,1992)。

事实上,实证主义性研究的传统已经随着时光的流逝被另一种研究策略掩盖了其光彩,这种研究策略对于自然科学的方法和假设适合于做性研究的观点持反对态度。正如许多行动主义者(activist)和一些研究人员采用了女性主义的视角一样,女同性恋者的女性主义者是与同性恋者的政治直接相关的(Phelan, 1989;Whittier, 1995)。同性恋学者将实证的研究方法批判为将性的社会秩序视为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这种批判的声音最早来源于做定性研究(符号互动、现象学和标签理论)的社会研究者的实地研究当中。这些研究者呼吁去区分社会的和互动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人的肢体和欲望被赋予了内涵,并被转化为富有政治重要性的社会类别和具有重要意义的集体行动种类的根基。

自1970年代以来,随着对实证主义的社会研究开展的普遍挑战,松散的性学研究也开始在“解构自然化”的推动下纠正其自身:性从性质上讲不再是像植物或细胞一样被作为研究的固化现象;而是附着于个人、团体和社会的肌体以及欲求当中的一系列内涵(Gagnon & Simon, 1973)。正如埃普斯坦(Epstein,1996)归纳的那样,“我们反对性是生物给予的自然化的观念,反对弗洛伊德性趋力的模型,也反对金塞过分强调行动的堆垒;社会学家认为,性的意义、身份和种类是多学科相互协调后的社会和历史的产物——简言之,性是被构造出来的”(p.145)。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证明了性意义的文化和历史系统的多样性(如Greenberg, 1988; Ortner & Whitehead, 1981),这一系统从将“同性的”作为一个整体去研究,到将“同性的”(和后来异性的)视为一个社会种属和身份“而被分析,其相对的历史的、经济的和政治的根基被予以审视”(Nardi & Schneider, 1998, p.4;也见McIntosh, 1968; Plummer 1981, 1992)。

尽管具有理论的取向,建构主义在方法上却注重分析适合于做定性研究的问题,并试图去“阐释或解释与人有关的现象(Denzin & Lincoln, 1994, p.2),即:性的类别是如何被建立和改变的,有何效果?与身份界定有关的同性实践是何以被建立或不被建立的?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虽然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将性的分类视为理所应当的事情,并研究被认为是与性的类别相关的事物(比如同性恋者如何生活、同性恋的病源学等),同性恋的研究者也开始从政治、历史和社会学的角度去研究这些分类和身份自身。给肌体和享乐赋予意义的各种各样的“性体系”(Rubin, 1975)也成为了焦点问题。例如,在一项早期研究当中,庞斯

(Ponse,1978)利用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去解析“在女同性恋亚文化中的身份的社会构建及其意义”,随后的许多研究也具有与此相同的目的并采用了与此相似的方法。基于构建主义体系所研究的问题具有深刻的解释性质,定性研究的方法——民族志的(ethnographic)、社会历史学的,等等——进而开始将自身建设成为热门学科①。而且由于“实质主义”有关性在很大程度上根源于性科学的假设遭到了越来越多的反对,性学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距离也日渐加大了②。

同时,在有许多学者卷入的政治运动当中,那些发现自己被定义于集体身份之外的人(劳工阶层的人们、有色人种、性的激进人群等)试图挑战与此相关的类别界定。这些挑战将问题聚焦于对性身份的有问题的建构上,对正在进行的对同性恋“少数群体”的批判性的解构上,以及对种族、性别和性身份关系的探讨上(如 Clarke, 1981; Hempjill, 1991; Seidman, 1993)。这些冲突表明,“我们”是谁,已经不再是一个约定俗成的东西,而成为一个比对同性恋少数群体研究所意想的更加复杂和多元化的东西。一位重要的先驱在对同性恋的评论当中指出,男同性恋领域中的边缘人所强调的将性的特征或性欲置于首位的论断会导致错误的选择(比如对女同性恋者和黑人身份的界定),并会掩盖种族、性别、民族、性、体能和阶级之间的重要联系。

这些受运动所驱动的取向用排他性和多样化为自己开创了道路,并逐渐转化为定性研究:比如托马斯·阿尔马圭儿(Tomas Almaguer),他回顾了人种学和传记学的许多作品进而去描绘奇卡诺男同性恋者如何通过两个孑然不同的性体系去规划其自身。这两个性体系即欧美体系和墨西哥/拉丁美洲体系。欧美体系强调直线式的男同性恋主轴,而墨西哥/拉丁美洲体系则以被动—主动为主轴贯串始终(Almaguer,1991)。这一切正是发生在一个“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界线变得模糊起来”的时代(Denzin & Lincoln, 1994, p.9),许多对性多元化身份进行再理论化的呼声也出现在一些有色同性恋者当中。这些人活跃在诸如影视、文学研究领域或非学术界中(如 Harper 1991; Hemphill, 1991; Trujillo, 1991)。

建构主义的社会学根基和多元身份的政治根基相互融合,二者都受到了福柯(Foucault,1978)和受福柯影响的历史研究(如 Greenberg, 1988)的极大影响。福柯作品的有力介入加强了定性研究和性学研究的联系,并开创了将性身份予以理论化的新阶段。同性恋被视为一个当代历史和文化的“新发明”,而行为与身份相融合使得这一发明成为可能。福柯(Foucault,1978)在其著名的论述中指出,虽然鸡奸曾被视为“一种被禁止的行为”和暂时的越轨,但是随着“大爆炸”式的19世纪的来临,同性恋便随之变成了一个“物种”、“一种角色、一种过往、一

---

① 建构主义者的思路和作品尽管对“实在论”的假设持质疑态度,但还在某种程度上享有1980年代少数群体运动的特征;当我们追溯“同性恋”成形的过程并将其写入历史时,当我们摒弃了公认的同性恋主体时,“对于产生同性身份,并将同性恋奠基为新的少数群体的社会因子分析”便“将男女同性恋者的亚文化合法化为一个类似于少数民族群体的少数群体”(Seidman, 1996, p.9)。

② 对“实质的建构主义者”的论述并不罕见(Stein, 1992),笔者在此不再赘述。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当我们探究同性恋的生物基础时,我们会发现:尽管实质主义和建构主义没有与定性研究紧密相联,但建构主义者的性观念却很受定性研究的青睐,实质主义的观念也经常与实证科学紧密相联(Burr, 1996)。

段历史和一种生活方式"(p.43)。

福柯的作品《性史》(*History of Sexuality*,1978)以前所未有的笔触论述了性"演说"的社会建构,置疑了科学知识是一种进步的论断,并鼓励人们去重新审视这一研究领域中人们已经习以为常的性类别的界定。当机构性分析在某种程度上变得偏离正轨之后,对此进行的性演说也进而变为"我们自己的真理",包括那些"反演说",诸如少数民族身份,特别是科学的性研究——现在都成为被分析和解构的焦点。随着性的类别构建、宣扬、意义建构和界定成为调研的主要课题之后,定性的性学研究也便成为了那个阶段的研究焦点。

然而那一阶段最初也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研究方法和认识论的干扰。定性研究者在1980年代晚期所面临的权威和立法的危机(诸如Clifford & Marcus,1986)主要是由于在性学和其他领域受到了福柯的有力推动。福柯认为方法上的实践,诸如精神分析的个案研究等所有的方法都在它们特定的"真理王国"中占有一席之地,并且没有任何一种知识的建构是游离于政治关系之外的。酷儿理论和酷儿研究正是在对方法的批判和对认识论的怀疑的相互交织中脱颖而出的。

"酷儿理论"以及对身份的批判

随着性学的定量研究沿着自身轨迹的不断发展——尽管它有时也偏离或规避同性恋的定性研究①,"酷儿理论"的出现使得性学研究在1990年代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由于深受后结构主义理论的影响,并主要产生于以人文主义为根基的文化研究中,同时又与富有反抗、与常态抗衡精神的"酷儿"政治有某种联系,酷儿理论最初便在1980年代的一系列学术会议中崭露头角(Epstein, 1996; Gamson, 1995; Stein & Plummer, 1996)。酷儿理论借用了建构主义和福柯的视角,但同时又强调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所关心的问题——即关注身份和与身份相关的政治问题,也就是关注对话与解构,并对"广义的阐释"持质疑态度(Kellner, 1988; Seidman & Wagner, 1991)。酷儿理论的出现标志着定性研究领域中后现代主义时刻的到来,其中性取向,即"犹如新生事物,而先前被压抑或沉寂的声音开始出现在人们的对话当中"(Lincoln & Denzin, 1994, p.575)有些令人费解,但这一取向同时也成为性学研究中最有力的推动力。除了诉求上的重心外,作为一种定性研究本身,酷儿理论也经历了一个不断被检测和自身不断成型的过程。

---

① 离婚在当时是极其少见的,因此1995年的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的社会和行为科学性学报告中呼吁"在社会和文化的背景中去建构性行为的重要性",同时"帮助人们意识到性不是一个个体的系列组合,或与特定的举止和物理上的躯体相联的行为片断,而是代表了一系列的性行为和规范,这些行为和规范对个体以及社会的意义及其重要性是随着时间而改变的"(di Mauro, 1995, pp.4-5)——也就是说,对于过去二十年中多数的定性性学研究而言,它还是颇有新意的。

酷儿理论带来了一系列的重要变化和挑战,极大地改变了定性研究的主要领域。一方面,定性研究的一些主要领域被拓宽了:研究不再只集中于同性恋者的生活和身份界定,或是同性恋和少数群体的身份研究,而是强调当代社会中各个侧面同性与异性之间的区别。比如,正像伊夫·考索夫斯基·塞奇维克(Eve Kosovsky Sedgwick)在《不切实际的认识论》(*Epistemology of the Closet*)中所写的那样,若从广义上探讨酷儿理论的根基,"对于当代西方文化某一个侧面的理解和认识不仅是很不够的,而且也破坏了酷儿理论的实质——因为这样不能将当代对同性/异性恋定义的批判性分析纳入其中"(p. 1)。

这是对那些先于并使得酷儿理论成为可能的理论和研究的背离,它使得研究的目标"从解释当代同性恋现象到质疑同性/异性恋的运作,从极力关注同性恋现象到将异性恋视为社会和政治的组织原则,从关注少数群体的政治诉求到关心知识与差异的政治主张"(Seidman, 1996, p. 9)。对所谓"反常态"的各种各样的解构和批判亦呈现出了不同的模式和形态,认为"人性与异性恋是同义词"(Warner, 1993, p. xxiii)的观点已经成为酷儿研究所重点批判的东西。

另外,酷儿理论在理论上也占有一席之地。它的政治诉求常常被等同于是反同化主义的,反常态的和解构的(Berlany & Freeman, 1993; Cohen, 1997; Duggan, 1992)。如亚历山达所说,"'酷儿'应该去挑战和模糊我们对于性和性别分类的理解和运用"(Alexander, p. xvii)。正如双性恋者和移性恋者被纳入"酷儿"政治的种属中一样,分享性和性别的差异性,比如,双性恋和移性恋越来越成为理论和研究的中心问题,这一现象已闻名于酷儿研究之中。这些研究事实上模糊了性与性别的界线(如 Epstein & Straub, 1991; Garber, 1995; Stryker, 1998a)。与这一显著变化同步而行的是形而上学和方法论上的转移,它们动摇了定性的性研究的根基。

对话、语言和身份界定

不足为奇,上述这些变化所带来的改变已经成为一个研究方法上的问题:对男女同性恋者、移性恋者和双性恋者的实地研究,目前已经被对话分析通过文献回顾的形式视为是酷儿研究之外的东西。如 1990 年代早期的定性研究,酷儿理论曾对"生活经历是可以被捕捉的,同时是可以被研究者所直接描述的"论断提出过质疑,酷儿理论相反将其视为是特定场景之下的语言活动(包括进行"社会研究"时的对话),通过这种形式,性主体便得以显现。塞德曼这样解释到:

> 酷儿理论不仅仅视异性恋和同性恋为一种身份界定或社会地位的标志,而且将其视为区分知识、语言的社会种属。这些知识和语言规划了我们对身体、欲望、性和身份的界定。这是一种常态的语言,正是它规定了更多的道德标准和科层政治……酷儿理论呼吁对同性恋的研究应当不仅仅是对少数群体的研究——它使得男女同性恋、双性恋成为研究的主体——而是对通过性(异性恋、同性恋)将"社会"组合成一个整体的知识和社会实践的研究——躯体、欲望、行为、身份、社会关系、知识、文化以及社会机构(Seidman, 1996,

pp. 12-13)。

正是对知识、语言和对话的研究使得文学分析对于酷儿理论来说如此重要。事实上,正如克拉夫(Clough,1994)所说,对于酷儿理论者来说,"性别或性并不是一个文字现实,或是一个社会构建的实体,而是一个文学现实",因此,如理论学家巴特勒(Judith Butler)所指出的"对社会的重新解读把意想和现实、传奇和历史、争论与学术对话,以及社会科学与文学批判的界线变得模糊起来——所有这些都存在于同性恋和异性恋的对立之中"(p. 155)。

从酷儿理论的视角出发,定性研究者对"现实",比如说对男女同性恋者的调查,只是反映了男女同性恋者生活的一个缩影,而另一些主要的异性恋主义的机构,如军队或学校对"社会现实"的认识以及研究方法也是相当肤浅的。事实上,后结构主义者将社会现象融入到文学现象当中,同时将社会作为一个客体去"解读",就意味着它已经超越了实地研究对个人的、集体的或机构的社会行为的研究界线。"基于后结构主义者将文化符号运用于文学实践之中",塞德曼强有力地论述到,"也基于这些实践是从结构性的场景中凝缩而成的,我们因此反对对后文化主义的缺陷进行批判"(Seidman,1993, p. 135)。尽管酷儿理论也没有明确的意旨,但酷儿理论的视角已经开始去重新定义究竟什么样的研究可以被称为是用文学武器武装起来的定性研究,虽然这些研究先前也曾被实证的社会研究者视为是定性研究(如 Plummer, 1998)。

当然,如果将对酷儿理论的关注从性的生活体验转移到"文化的语法现象"(grammar of culture),即"语言和对话与权力、产出、组织以及多样的场景与机构的流通之间的关系"(Tierney, 1997, pp. 9-10),这在某种程度上便要归功于文化研究中的知识分子霸权。性学研究中的后结构主义者对社会主体的存在持深刻和明显的质疑态度,而这些社会主体是先于其松散的构造而存在的,这些社会构造的"实践"又是可以很容易地被研究和表现出来的。在关注知识、语言和性等的同时,酷儿理论也鲜明地反对"相辅相成的同性恋理论中居于支配地位的概念:即对同性恋身份统一性的假设"(Seidman, 1996, p. 11)。

对同性恋身份界定的批判贯穿于酷儿研究的所有论著当中:身份应当是多样的、不同的、不完整的、不连贯的、受约束的、非一体化的、非固定的和变化的——研究者很难在研究性主体时将其视为是固化的和随时随地便可供提取的社会种属。比如,巴特勒(Bulter,1991)曾说,"我总是被身份界定的问题所困扰,这些问题就像绊脚石,我需要去理解它们,推动它们,并把它们当作是不可避免的障碍"(p. 14)。她说,身份界定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错误"(Butler, 1993, p. 21)。酷儿理论家沙思·菲兰(Shane Phelan)阐释到,"当我们还将女同性恋者视为是一个有意义的种属时,将女同性恋者再进行细分便遭到了反对,同时女同性恋者也被视为是一种批判性的性解构概念,而非具有单一的政治内涵的社会生活的集合体"(p. 766)。沃尔纳(Warner,1993)曾写到:

> 男女同性恋者是被多重界线所定义的,因而随之而来的问题即谁是而谁又不是他们中的一员便成了一个非但模棱两可,而且永久存在,且需要论

证的问题。无论如何,被定义为男同性恋者或女同性恋者都是模棱两可的,有些时候定义也是因他们的行为所决定的……“酷儿”因此指出了在定义那些与酷儿政治有利益冲突的人群时所存在的困难(pp. xxv-xxvi)。

身份界定,不应该被视为社会研究的起点,更不应该使研究者固步自封,停滞不前。事实上,基于后结构主义者的评论,社会主体的存在,首先是从社会主体对自身的意识开始的,而社会主体的构建也是经过了一个散漫的过程——如社会研究——以及持续不断的身体再现,或性及性别的“表演”。巴特勒(Butler,1993)写到:

社会认知的散漫状况是先于社会主体的存在并制约着社会主体的:认知并不是被社会主体所给予的,相反,认知促成了社会主体的形成。另外,认知的不完整性,并以这种不完整性所开创和动员起来的社会身份表明了社会主体形成过程中的不稳定性和不完整性(p. 18)。

因此,普拉默(Plummer,1992)曾言简意赅地论述到,“世界上并不存在必须被研究的客体……对男女同性恋的研究‘构造’了一个被用于分析的客体,而这一客体本身是非常扩散的、支离破碎的、重叠的和多样的:它使一个并不存在的实体得以形成”(p. 11)①。曾被早期性学研究认为是机构或主体的存在形式,也被酷儿“拒绝去命名一个社会主体”的理论攻击得遍体鳞伤(Sediman, 1993, p. 132)。当然,这种现象也并非仅仅存在于性学研究当中——比如女性研究者和行动者在很多年里也曾面临过相同的问题(Nicholson, 1990; Spelman, 1989)——只是这一问题在当前的酷儿研究中显得特别突出而已。

不足为奇,酷儿研究的上升势头也与其面临的冲突并存。许多冲突集中体现在普拉默(Plummer,1998)所谓的“对男女同性恋者生活经历过度的咬文嚼字”上,这也就是说“对对话的分析超越了对真实的社会现象的分析”。他写到:

在经验世界,有很多研究是值得做的。过分注重对文本的分析是很有害的。到了我们该摒弃文本分析的时候了——而且是越快越好。尽管男女同性恋的研究越来越花里胡哨地在诗歌、小说及戏剧中崭露头角,却很少有研究真正关注过男女同性恋世界里正在发生的事情(p. 611)。

普拉默或许有些夸大其辞了。事实上,有大量的对男女同性恋生活的研究存在,而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并不是我所指称的“酷儿”,即完全摒弃或未被后结构主义论断所影响:例如有对公司里男同性恋者生活经历的研究(Woods & Lucas, 1994),有对本土美国文化多样性的探讨(Williams, 1992),有对媒体对男女同性恋问题覆盖面的分析(Alwood, 1996),还有对男女同性恋青年的研究(Herdt & Boxer, 1993)等。这些研究不仅仅在持续不断地论证学科界分问题,而且在澄清

① 正如普拉默(Plummer,1992)所说,对客体分析的忽略植根于建构主义者的论述当中,他们的论述先于酷儿理论而存在并为酷儿理论奠定了基础。同时,在与其他理论一同构建“男女同性恋主体”错误的统一体时,酷儿理论澄清了男女同性恋者的研究,但又使得这一研究本身问题叠出。

一个很重要的并存在分歧的问题,即性的定性研究到底可以和应该是什么样的,特别是在考虑到无可否认的政治和社会实践的边缘化问题、异性恋制度问题以及男女同性恋者共同面对的反男同性恋运动问题。但是,不管身份界定的问题是多么的复杂,男女同性恋者、双性恋者和移性恋者似乎在界定和认识他们自身时不存在任何问题。

虽然定性的性学研究还没有确定自己的研究方向,但被酷儿研究所推动的"对日常生活经历"的研究已日益处于上升地位。在性学研究建构自身的同时,它也开始在其内部形成了不同派别。由于定性研究与酷儿理论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定性研究的重心已经与酷儿理论相互交织在了一起。酷儿理论对一体化的主体所带来的挑战也使得形而上学在转化成方法论时面临着困难。如果活生生的社会生活总是由一些对话的符号所组成,而后将这些社会生活视为生活经历去研究而非叙述,或者是作为自传去报道——这样好像是真实地再现了现实生活,这些事实上都是错误的。如果从自发的角度讲,性别自身是被"异性恋常规性"所创造出来的"文学现实",是关于一些种属的传说,这些传说仅仅存在于正在进行的一系列的身体行为当中,那么,以此为基调的对性别自身的认识在研究中只会是去天真地复制"异性恋常规性",而不是去终止它。如果男同性恋者与女同性恋者的存在是暂时的,是被漫无目的地制造出来的,是不稳定的,或只是行为上的存在,并且只代表部分的身份界定——如果它们永远都是被引用的——那么,研究者何以去研究性以及与性身份界定有关的人群?即使是将日常对话作为分析的客体,研究者又何以去研究它的运作——如果从定义上讲研究者不是被排除于这一客体之外?究竟从何种意义上讲,一个研究者或作者是一个被漫无目的地构造起来的社会主体,或适合去做文本的解构,或去评论常态意义下建构起来的性?研究者究竟应当做些什么?

定性研究所面临的共同挑战

笔者上述的关于理论和研究的各种流派——男女同性恋少数群体研究,建构主义者的性学研究,酷儿理论——在性学研究相当大的压力下共同存在,这些研究有着不同的研究客体、流派根基、实践规则以及对于知识分子和政治实体身份界定种属的不同假设。尽管它们都关注一些定性研究所共同关心的问题,即意义构建和有关性的研究和政治间的关系问题,但每个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又对某些可以而且应该被做的研究有不同的内涵。总而言之,这些理论流派都有意无意地给研究者带来了巨大的理论与实质上的挑战。

酷儿理论给定性研究所带来的实质性挑战

正如其他一些以身份界定而发端的运动一样,男女同性恋研究特别是酷儿理论给学术研究中的更多传统领域带来了系统性的挑战。如果"闭门造车"确实

是西方的思潮、实践和研究的中心结构特征的话,那正如塞奈韦克所说,我们必须批判性地对其进行分析。因此,当前性学研究领域所面临的实质性挑战不仅仅包涵了对研究领域中的男女同性恋主体的挑战,而且这种挑战还要更深刻地揭示每一个社会领域(当然也包括了社会科学知识的再生产)是如何被同性/异性这一二分的结构所构造出来的。对这种批判性思维的接纳与吸收,必将给定性研究指出更有前途的研究新方向。

到目前为止,人们在实践上还没有什么新的举措。人们正在进行的是对酷儿理论内涵的再反思,而这种反思同时也为研究开辟了新的方向。比如杜甘(Duggan,1998)就曾指出,要通过“动摇异性合理性而非自然化同性恋者身份”去“使政府酷儿化”(p.570),另外,法学研究者、政治科学家,以及社会科学家已经开始去探究种族、性以及性别符号的交叉对政府是如何的有用(Alexander, 1991; Eaton, 1994),进而去进一步揭示政府是如何通过对法律对话的细致解构而达到使异性恋正常化的目的(如 Duggan & Hunter, 1995, pt. Ⅱ)。相似的有重要意义的社会导向也发生在其他的社会过程和结构当中,类似的分析所研究的不仅仅是同性恋者、双性恋者和移性恋者是如何生活的,而且也包括研究特定的社会机构是如何使得异性恋在某种物质条件下合法化的。这同时也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即什么样的定性研究和分析是特别适用的。

对统一主体的解构

酷儿理论是对早先被性别、欲望所定义的自主的、连贯的自我(以及自我的集合体)概念的挑战。这些概念至少在我们看来,给性学研究提出了许多形而上学和方法论上的问题。尽管这些问题将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存在,并且具有正向的意义,但研究者们还是将身份界定的复杂性认为是他们工作中的一部分。其中一个研究策略就是建立一个长期的将身份界定自身作为研究重点的传统,并将不稳定性、多样性,特别是身份界定融合到研究和分析当中。社会学家阿琳·斯坦(Arlene Stein)在其作品《性和敏感性》(*Sex and Sensibility*,1997)中讲述了“自我的故事”——即一些妇女在访谈中讲述了她们“在某些经历当中的自我关系,这样一来,女同性恋自我身份的界定便得以发展起来,这也使得故事讲述者自身成为整个记述过程的中心”(p.7)。

酷儿理论的影响扎根于研究课题的形成过程中:斯坦的研究并非是探讨“真正的自我”是如何被揭示出来的,而是讨论人们讲述的变化无常的故事是如何进行“自我界定工作”的。这些研究考虑到了“自我界定变幻无常的特性以及集体的边界”,如斯坦所说,“使身份界定非中心化的模式是女同性恋文化及其社区的影射”(p.201)。事实上,对双性恋和移性恋身份界定的关注也是源于同样的驱动力,对复杂身份的分析——用斯特里克(Stryker,1998b)的话来说,就是要“动摇被自然化的以性别、化身与身份界定形式存在的异性恋合理化”(p.145)。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脉络体现在:研究者所进行的以性为基础的社会运动曾一度在理论和实践上站在创造“集体身份”的最前沿。不是理所应当地假设一群

人的“自我”的意识是先于社会运动而存在的,相反,研究者们所探究的是集体的界线、旨趣和意识是如何建立和不断修正的(Phelan, 1989; Taylor & Whittier, 1992)。酷儿在这里已经成为一个探究集体行为逻辑的渊泉和课题。在一篇讨论“酷儿”的文章当中,笔者自己也曾这样写到:

> “酷儿”揭示了它自身与其他身份界定运动所面临的共同的两难选择(比如种族、民族以及性别运动):固化的身份种类是压迫和政治权威存在的基础……如果身份确实是比运动更加不稳定、具有流动性和结构化——如果人们认真地面对酷儿理论所引发的挑战,那么对于以身份界定为基础的社会运动而言(如为争取男女同性恋者权益的运动),将会有什么情况发生呢?酷儿理论要求我们去发展一个有关集体身份形成以及其与机构和内涵关系的更加成熟的理论,这种理论还应当包涵了将身份界定独立超脱出来的驱动力(Gamson, 1995, p. 391)。

当笔者将酷儿理论对身份界定的论述细加琢磨以后,笔者的研究脉络也得以另辟蹊径——当然不会脱离定性研究的方向,因为定性研究包括了对日常生活身份的界定:集体身份是何时、为什么和怎样被解构和融合的,集体身份又是如何被特定的组织机构和交往环境所规划出来的(Gamson, 1996, 1997)。

尽管这些研究在其数据收集和描述方式上都比较传统,但社会研究者们已经开始用酷儿理论去置疑这些描述方式。虽然传记写作的传统是描述政治行为和真正的性自我,但酷儿定性研究却日益将研究者权威性的声音放置到了许多相互竞争和处于非主导地位的声音当中——没有任何一种声音是“真正的声音”。认为男同性恋者的人种史是“将人种学家视为女同性恋者或男同性恋者是人种学研究显而易见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Wafer, 1996, p. 261)的观念并不能与后结构主义者的观念相吻合,后结构主义者认为这种同性恋者身份是既非稳定的又非统一的;对后结构主义者来说,是“对深透在社区和身份界定领域的同性恋人种学的日益关注,和对身份界定不稳定性的日益认可,特别是在复杂的文化环境当中”(Lewin, 1995, p. 327)。人种学的研究,并不是对身份的揭示,而是被修正为在这一研究领域中,与其他流派一样“是界定身份的另一种模式”(Lewin, 1995, p. 332)。

威斯顿(Kath Weston, 1996)用集合个体阐述的方式去描绘可以被我们称为对性别过程的酷儿研究。威斯顿写到,“任何事情和任何人可以用许多不同的方式去被给以性别定义”;将同性关系作为研究的重点并不是像先前的研究一样,使得女同性恋者更为人所关注,而是使得“性别的模式为更多的人所知”(pp. 2-3)。特别重要的,这样做还使得描述更具有实践的色彩,这样一来,作者对女同性恋的描述就显得不那么具有权威性了。因此,威斯顿通过自己的观察,将对许多不同女同性恋者的访谈集中了起来,这些被访问的女同性恋者有教师、作家、工人、护士、艺术家、舞蹈小姐以及来自于不同种族、阶级和宗教背景的女士。威斯顿还写到,“这种描述在描绘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特定人群时并不是做得非常好”(p. 4)。她的书旨在阐明上述的这些观点,并介绍相应的阅读策略:

> 我故意编辑和组织了这些访谈,进而探讨身份界定的问题。女同性恋者不停地将自己称为是“雌雄同体的”或女同性恋的、妖媚的,也有一些女同性恋者很少用这些词或根本不用这些词。这一策略使得语言的历史从年代学向蒙太奇转变,这一转变也是为了打破关于使得女人得以成为女人、女同性恋者以及扮演男性角色的女同性恋者的文化假设。评论与访谈之间的交锋……给读者提供了一个空间,以至于读者的身份可以在故事讲解者、人类学家、旅行同伴、理论家、旁观者等之间不停转换……同时也在差异和欲望之间划分界线。

尽管上述的策略并不常见,但它给认真考虑同性恋者的身份界定问题的定性研究所带来的潜在影响却是显而易见的。

研究及理论化机构与对话间的关系

最终的或者是最富有成效的挑战并非来自于酷儿理论以及男女同性恋的研究本身,而是来自他们之间的差异性以及试图去调和其差异性的尝试。塞德曼(Seidman,1993)论述到,“在身份政治的维护者和后结构主义的批评者中,存在着自我和代理政治先入为主的状态。机构性分析和历史性分析以及完整的政治视角似乎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塞德曼还说,“在身份政治和后结构主义中,自我和代理政治先入为主的状态已经转化到了去分析自我如何扎根于机构和文化的实践当中”(pp. 136-137)。或者用另一种表达方式来说就是:虽然男女同性恋的研究,包括那些更加精细的植根于社会学研究中的建构主义研究小视了散漫的酷儿理论——而酷儿研究是将社会生活作为文本,进行人性主义的分析;也小视了机构上的因素。散漫的和机构上的因素间的关系(它也是政治上行动主义的一个重要驱动力。Gamson, 1995)因此也被非理论化并不被研究了。这一困境曾被社会研究者(通常更多地受到机构性因素的影响)和人类学家(通常更多地受到谈话变化的影响)的专业划分以及实证研究和理论研究之间的划分所夸大化了——这些划分也是在这一领域刚刚形成的。

机构取向的男女同性恋定性研究与无明确取向性的酷儿理论相互交织,可以而且应该为定性研究提供重要的新取向。当然这当中也存在着一定风险,不仅仅是在研究和理论上,而且在日常的政治上:集体行为在现存的“男同性恋者”、“女同性恋者”、“双性恋者”和“移性恋者”等社会种属的基础上,被用于抵制歧视(或用于维护其他利益),或通过文化的干预去改变这些社会种属的边界和运用。这要求我们去缜密地探究那些同时发生的、相互之间有联系的社会过程,性欲的实践正是通过这些过程被赋予了制度上、文本上和实践上的形态。在不久的将来,定性的社会研究者将在填补不同定性研究取向间存在的沟壑上批判性地发挥作用,这些沟壑往往是让人觉得忧心忡忡,并在政治上反复无常。定性的社会研究者的作用不仅仅体现在文本和实践上,或是言谈和机构上进行取舍,也不仅仅是解决酷儿的变动性和同性恋的稳定性问题,而且体现在如何将性

学研究面临的压力转化成创造新成果的源泉上①。



参考文献

Adam, B. (1995). *The growth of a gay and lesbian movement* (2nd ed.). Boston: Twayne.

Alexander, J. (1991). Redrafting morality: The postcolonial state and the Sexual Offences Bill of Trinidad and Tobago. In C. T. Mohanty, A. Russo, & L. Torres (Eds.), *Third World women and the politics of feminism* (pp. 133-152).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Almaguer, T. (1991). Chicano men: A cartography of homosexual identity and behavior. *differences*, 3, 75-100.

Alwood, E. (1996). *Straight news: Gays, lesbians, and the news medi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Badgett, M. V. L. (1995). The wage effects of sexual orientation discrimination. *Industrial and Labor Relations Review*, 48(4).

Bayer, R. (1981). *Homosexuality and American psychiatry.* New York: Basic Books.

Berlant, L., & Freeman, E. (1993). Queer nationality. In M. Warner (Ed.), *Fear of a queer planet: Queer politics and social theory* (pp. 193-229).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Burr, C. (1996). *A separate creation: The search for the biological origins of sexual orientation.* New York: Hyperion.

Butler, J. (1991). Imitation and gender insubordination. In D. Fuss (Ed.), *Inside/out: Lesbian theories, gay theories* (pp. 13-31). New York: Routledge.

Butler, J. (1993). Critically queer. *GLQ*, 1, 17-32.

Clarke, C. (1981). Lesbianism: An act of resistance. In C. Moraga & G. Anzaldúa (Eds.), *This bridge called my back: Writings by radical women of color* (pp. 128-137). New York: Kitchen Table/Women of Color Press.

Clifford, J., & Marcus, G. E. (Eds.). (1986). *Writing cultur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Clough, P. T. (1994). *Feminist thought: Desire, power and academic discourse.* Cambridge, MA: Blackwell.

Cohen, C. (1997). Punks, bulldaggers, and welfare queens: The radical potential of queer politics? *GLQ*, 3, 437-465.

Collins, P. H. (1990). *Black feminist thought: Knowledge, consciousness, and the politics of empowerment.* New York: Routledge, Chapman & Hall.

D'Emilio, J. (1983). *Sexual politics, sexual communiti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Denzin, N. K., & Lincoln, Y. S. (1994). Introduction: Entering the field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N. K. Denzin & Y. S. Lincoln (Eds.),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pp. 1-22). Thousand Oaks, CA: Sage.

di Mauro, D. (1995). *Sexuality research in the United States: An assessment of the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Executive summary). New York: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Dory, A. (1993). *Making things perfectly queer: Interpreting mass cultur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Duberman, M., Vicinus, M., & Chauncey, G. (Eds.). (1989). *Hidden from history: Reclaiming the gay and lesbian past.* New York: Penguin.

Duggan, L. (1992). Making it perfectly queer. *Socialist Review*, 22, 11-32.

Duggan, L. (1998). Queering the state. In P.

① 这一方法被运用于娱乐传媒的例子可见《畸形人的反驳:庸俗的谈话节目与性的不一致》(*Freaks Talk Back: Tabloid Talk Shows and Sexual Nonconformity*, Gamson, 1998)。

M. Nardi & B. E. Schneider (Eds.), *Social perspectives in lesbian and gay studies* (pp. 564-572). London: Routledge.

Duggan, L., & Hunter, N. D. (1995). *Sex wars: Sexual dissent and political culture.* New York: Routledge.

Eaton, M. (1994). Homosexual unmodified: Speculations on law's discourse, rac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exual identity. In D. Herman & C. Stychin (Eds.), *Legal inversions: Lesbians, gay men, and the politics of law* (pp. 46-73).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Epstein, J., & Straub, K. (Eds.). (1991). *Body guards: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gender ambiguity.* New York: Routledge.

Epstein, S. (1987). Gay politics, ethnic identity: The limits of social constructionism. *Socialist Review*, 93/94, 9-54.

Epstein, S. (1996). A queer encounter: Sociology and the study of sexuality. In S. Seidman (Ed.), *Queer theory/sociology* (pp. 145-167). Cambridge, MA: Blackwell.

Faderman, L. (1981). *Surpassing the love of men: Romantic friendship and love between women from the Renaissance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Foucault, M. (1978).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 1. An introduction* (R. Hurley, Trans.). New York: Vintage.

Gagnon, J., & Simon, W. (1973). *Sexual conduc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Gamson, J. (1995). Must identity movements self-destruct? A queer dilemma. *Social Problems*, 42, 390-407.

Gamson, J. (1996). The organizational shaping of collective identity: The case of lesbian and gay film festivals in New York. *Sociological Forum*, 11, 231-262.

Gamson, J. (1997). Messages of exclusion: Gender, movements, and symbolic boundaries. *Gender & Society*, 11, 178-199.

Gamson, J. (1998). *Freaks talk back: Tabloid talk shows and sexual nonconform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Garber, M. (1995). *Vice versa: Bisexuality and the eroticism of everyday life.*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Greenberg, D. (1988). *The construction of homosexual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Harding, S. (1987). Conclusion: Epistemological questions. In S. Harding (Ed.), *Feminism and methodology: Social science issues* (pp. 181-190).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Harper, P. B. (1991). Eloquence and epitaph: Black nationalism and the homophobic impulse in responses to the death of Max Robinson. *Social Text*, 28(9), 68-86.

Hemphill, E. (Ed.). (1991). *Brother to brother: New writings by black gay men.* Boston: Alyson.

Herdt, G. H., & Boxer, A. M. (1993). *Children of Horizons: How gay and lesbian teens are leading a new way out of the closet.* Boston: Beacon.

Herek, G. M. (1989). Hate crimes against lesbians and gay men. *American Psychologist*, 44, 948-955.

Herek, G. M. (1997). Heterosexuals' attitudes towards lesbians and gay men. In M. Duberman (Ed.), *A queer world: The Center for Lesbian and Gay Studies reader* (pp. 331-344).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Hooker, E. (1958). Male homosexuality in the Rorschach. *Journal of Projective Techniques*, 22, 33-54.

Humphreys, L. (1970). *Tearoom trade: Impersonal sex in public places.* Chicago: Aldine.

Hutchins, L., & Ka'ahumanu, L. (Eds.). (1990). *Bi any other name: Bisexual people speak out.* Boston: Alyson.

Institute for Gay and Lesbian Strategic Studies. (1998). Mission statement [On-line]. Available Internet: http://www. iglss. org.

Jay, K., & Young, A. (Eds.). (1972). *Out of the closets: Voices of gay liberatio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Jones, J. H. (1997, August 25-September 1). Dr. Yes. *New Yorker*, pp. 98-113.

Katz, J. N. (1976). *Gay American history.* New York: Thomas Y. Crowell.

Kellner, D. (1988). Postmodernism as social

theory: Some challenges and problems.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5, 239-269.

Kinsey, A. C., Pomeroy, W. B., & Martin, C. E. (1948). *Sexual behavior in the human male.* Philadelphia: W. B. Saunders.

Kinsey, A. C., Pomeroy, W. B., Martin, C. E., & Gebhard, P. (1953). *Sexual behavior in the human female.* Philadelphia: W. B. Saunders.

Krieger, S. (1983). *The mirror dance: Identity in a women's community.*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Laumann, E. O., Gagnon, J. H., Michael, R. T., & Michaels, S. (1994).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sexuality: Sexual practices in the United Stat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Levine, M. (1979). Gay ghetto. *Journal of Homosexuality*, 4, 363-377.

Lewin, E. (1995). Writing lesbian ethnography. In R. Behar & D. A. Gordon (Eds.), *Women writing culture* (pp. 322-335).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Leznoff, M., & Westley, W. A. (1956). The homosexual community. *Social Problems*, 3, 257-263.

Lincoln, Y. S., & Denzin, N. K. (1994). The fifth moment. In N. K. Denzin & Y. S. Lincoln (Eds.),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pp. 575-586). Thousand Oaks, CA: Sage.

Masters, W., & Johnson, V. (1966). *Human sexual response.* Boston: Little, Brown.

McIntosh, M. (1968). The homosexual role. *Social Problems*, 16, 182-192.

Moraga, C., & Anzaldúa, G. (Eds.). (1981). *This bridge called my back: Writings by radical women of color.* New York: Kitchen Table/ Women of Color Press.

Nardi, P. M., & Schneider, B. E. (1998). Looking: The sociological baselines [Part introduction]. In P. M. Nardi & B. E. Schneider (Eds.), *Social perspectives in lesbian and gay studies* (pp. 3-4). London: Routledge.

Newton, E. (1972). *Mother camp.*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Nicholson, L. (Ed.). (1990). *Feminism/ postmodernism.* New York: Routledge.

Ortner, S., & Whitehead, H. (Eds.). (1981). *Sexual meanings: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gender and sexual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atterson, C. (1992). Children of lesbian and gay parents. *Child Development*, 63, 1025-1043.

Patterson, C. (1995). Families of the lesbian baby boom: Parents' division of labor and children's adjustment.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31, 115-124.

Phelan, S. (1989). *Identity politics: Lesbian feminism and the limits of community.*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Phelan, S. (1993). (Be)coming out: Lesbian identity and politics. *Signs*, 18, 765-790.

Plummer, K. (1981). Homosexual categories: Some research problems in the labelling perspective of homosexuality. In K. Plummer (E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homosexual* (pp. 53-75). London: Hutchinson.

Plummer, K. (1992). Speaking its name: Inventing a lesbian and gay studies. In K. Plummer (Ed.), *Modern homosexualities: Fragments of a lesbian and gay experience* (pp. 3-25). London: Routledge.

Plummer, K. (1998). Afterword: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s of the sociology of samesex relations. In P. M. Nardi & B. E. Schneider (Eds.), *Social perspectives in lesbian and gay studies* (pp. 605-614). London: Routledge.

Ponse, B. (1978). *Identities in the lesbian world: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self.* Westport, CT: Greenwood.

Reiss, A. J. (1961). The social integration of queers and peers. *Social Problems*, 9, 102-120.

Rubin, G. (1975). The traffic in women. In R. Reiter (Ed.), *Toward an anthropology of women* (pp. 157-210).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Sedgwick, E. K. (1990). *Epistemology of the close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Seidman, S. (1993). Identity and politics in a "postmodern" gay culture: Some historical and conceptual notes. In M. Warner (Ed.), *Fear of a queer planet: Queer politics and social theory*

(pp. 105-142).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Seidman, S. (1996). Introduction. In S. Seidman (Ed.), *Queer theory/sociology* (pp. 1-29). Cambridge, MA: Blackwell.

Seidman, S., & Wagner, D. (Eds.). (1991). *Postmodernism and social theory.* New York: Blackwell.

Smith, D. E. (1974). Women's perspective as a radical critique of sociology. *Sociological Inquiry*, 4, 1-13.

Spelman, E. V. (1989). *Inessential woman: Problems of exclusion in feminist thought.* Boston: Beacon.

Stein, A. (1997). *Sex and sensibility: Stories of a lesbian gener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Stein, A., & Plummer, K. (1996). "I can't even think straight": "Queer" theory and the missing sexual revolution in sociology. In S. Seidman (Ed.), *Queer theory/sociology* (pp. 129-144). Cambridge, MA: Blackwell.

Stein, E. (Ed.). (1992). *Forms of desire: Sexual orientation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onist controversy.* New York: Routledge.

Stryker, S. (Ed.). (1998a). The transgender issue [Special issue]. *GLQ*, 4(2).

Stryker, S. (1998b). The transgender issue: An introduction. *GLQ*, 4, 145-158.

Taylor, V., & Whittier, N. (1992). Collective identity in social movement communities: Lesbian feminist mobilization. In A. Morris & C. Mueller (Eds.), *Frontiers in social movement theory* (pp. 104-129).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Tierney, W. G. (1997). *Academic outlaws: Queer theory and cultural studies in the academy.* Thousand Oaks, CA: Sage.

Trujillo, C. (Ed.). (1991). *Chicana lesbians: The girls our mothers warned us about.* Berkeley, CA: Third Woman.

Wafer, J. (1996). Out of the closet and into print: Sexual identity in the textual field. In E. Lewin & W. L. Leap (Eds.), *Out in the field: Reflections of lesbian and gay anthropologists* (pp. 261-273).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Warner, M. (1993). Introduction. In M. Warner (Ed.), *Fear of a queer planet: Queer politics and social theory* (pp. vii-xxxi).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Weeks, J. (1985). *Sexuality and its discontents.* New York: Routledge.

Weston, K. (1996). *Render me, gender me: Lesbians talk sex, class, color, nation, studmuffin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Whittier, N. (1995). *Feminist generations: The persistence of the radical women's movement.*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Williams, W. (1992). *The spirit and the flesh: Sexual diversity in American Indian culture.* Boston: Beacon.

Woods, J. D., & Lucas, J. H. (1994). *The corporate closet: The professional lives of gay men in America.* New York: Free Press.